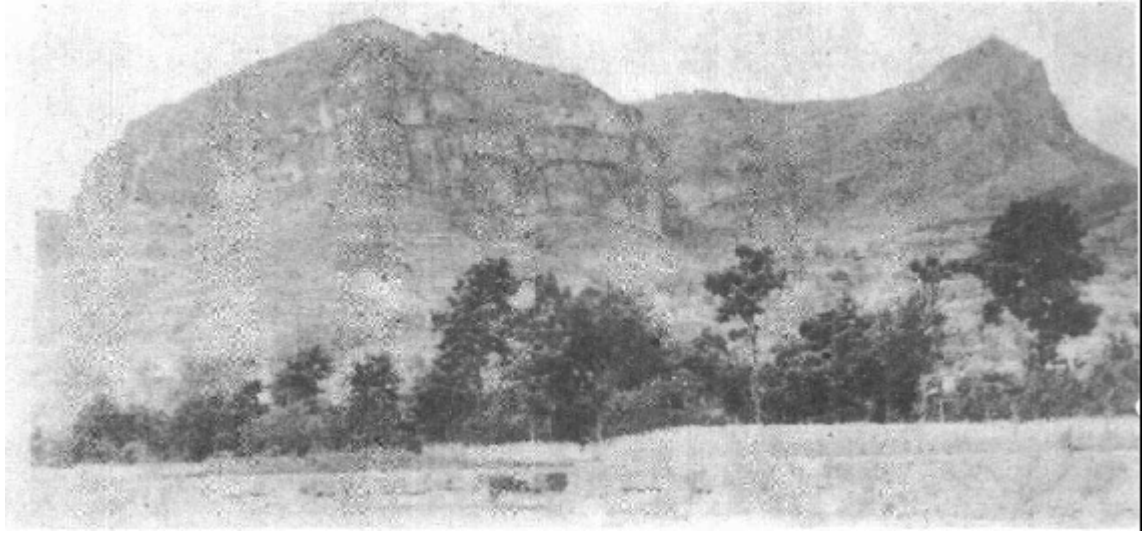




作者 王增寿 20 岁时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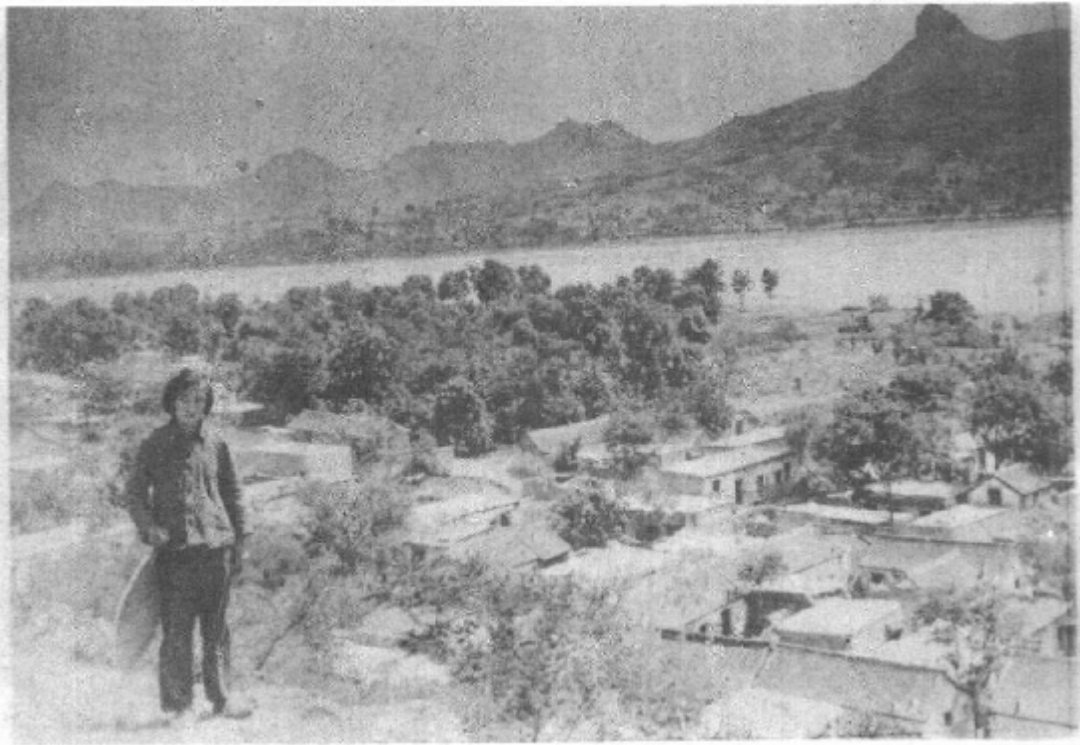
1945.9.12 摄于山西孟县



作者家乡——河北曲阳县宋家庄村

即友人柯棣华夫人郭庆兰同志

称之为“明朗的天的‘全新世界’宋家庄”



站立者是小妹兰芬 1964.6.4 摄

在战争年代救死  
扶伤的经验值得学习

王平



一九九五年三月

良医良相

增寿日长也

孫毅



1994.10.27.



實踐的經驗，  
是最寶貴的。

尹明堯



一九九五年三月

勤奮好學  
堪稱楷模

為王增壽同志介紹生涯之題

錢信忠

一九九四年三月

視察後我處各處立書出版成功。

醫院胸心外科專家王增壽院長戎醫台屋五十五載

忠誠為國為事以獻身是天上之榮也

紅燭照秋

術功其傳百年

吳昭輝 敬詞

一九九四年秋

良医亦良法  
人民的福音

善贈增壽同志篆

庚午年冬月利培植



# 代序

经请示于前单，老韩以毅司令员同意，以孙将军写给我的这封短信作为（代序）。

作者 1995.4.30. 住于石家庄

## 增寿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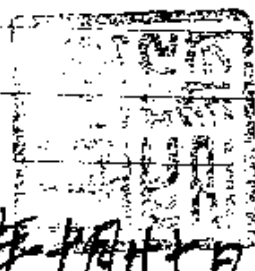
来信和书的目录均看过，认为很好可以出版，教育后人。你利用退休余暇，运用丰富医疗经验，精神可嘉。真是晚霞似火，余热生辉。要向你学习。希望继续奋勉！另外给你写一个条幅，用以激励。此致

敬礼！

孫毅

一九九〇年十月廿七日

于前部。



## 代序 II——《戎医生涯》读后感

王增寿老前辈的近四十万字回忆录体大作，我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阅读完毕，受教育颇深！这本书，是我党领导下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医生涯的缩影，写出了—一个少年成长为我军优秀医务工作者和领导者的发展道路，写出了我军医疗战线在极为艰苦困难条件下的奋斗精神，写出了继承老红军优秀品质而形成与创造的极为宝贵的我军光荣传统。通过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歌颂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赞美了人民群众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刻画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鞭撻了敌人的罪行和内部败类的丑恶，抒发了一个忠诚共产党员的爱与憎。作者还以老一代医务工作者的身份，揭示了我军医疗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阐发了许多学术上的问题与个人见解，探讨了军事医疗卫生工作规律，并且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建设性观点。上述这些，在当前条件下，对增强党的观念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纠正不正之风，对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对培植高尚的社会道德风范，都是十分有益的。总

之，这本书政治上没有问题，内容是好的，我期待它的出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相信这部著作的面世，将增添革命历史的一席足迹，启迪后人；沿着这条足迹所开辟的道路，会有更多的追随者走下去，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特约编辑 张 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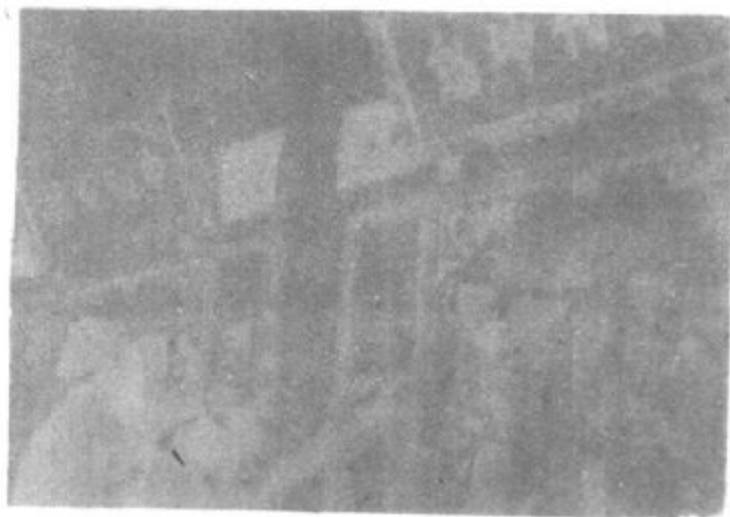
1995年10月15日

## 部分历史照片资料

(1) 古北口杨家庙

(左3手指者是作者)

1945年12.24



(2): 1946.5.4 在滦平县城



(3): 作者夫妇首次合影  
(于阜平县王快镇。  
1947.5.3摄)





(4): 作者(右)与王仲元  
医生于1948.11.27合影于  
山西阳高县城

(5): 晋察冀军区第一后方  
医院第四分院医办室留影  
(作者与李耀、陈志忠医  
生, 1949.2. 驻阳高织锦庄  
时合影)





(6): 我 (与贵银) 在厄运中 1949.9.16 留影于集宁



(7): 我在厄运中父亲  
闻讯来我驻地集宁看望  
我们  
(1949.12.6 摄)



(8): 作者(右)与战  
友辛福祥同志相逢在阳  
高  
1949.3.27 摄



(9)：作者与贵银在绥远省城归绥市小校场  
军区分科医院时留影（1950.12 摄）



(10): 该照片是1987.2.1 从周起义大姐处获得复印之。作者位于前二排由左向各第3位。当时,我军区分科医院由我首次开展肠切除吻合术成功,突破了“四肢外科”范畴,使我军区自此进入“腹部外科”的新纪元。我被全院评选为工学代表参加大会。



(11): 作者与伴侣贵银在绥远军区后方医院工作时

1951.9.24 于包头市摄



(12): 作者与战友史正明  
(右) 同志 1951.8.18 合影于  
包头市



(13): 贵银于包头病愈后 1952 年  
包头市

## 自序

我有幸自幼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直至彻底打败内外敌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过程，感到无比高兴、自豪和幸福。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透过我普通一兵——军医<sup>①</sup>实践的小小侧面，来反映我军在反侵略、解放战争中成千上万白衣战士的光辉事业和形象；歌颂我伟大中华，歌颂党和人民，倾诉我的一片钟情；歌颂老区人民、八路军、军民英烈及战友们所付出的牺牲和艰苦奋斗、救死扶伤革命英雄主义及乐观主义精神；无情揭露日寇、汉奸、特务、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残忍、丑恶（对我人民内部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也有所涉及）。我严格遵守历史的真实，由于现在写它，也赋予新的认识和评价，以期历史地“回顾已往，珍视成就，着眼未来，激发前进”，并为我党史、军史、军事医学史提供微薄的资料和经验成果。我憎恨侵略战争，拥护正义，坚信正义必胜，敌人无论怎样强大也必然失败，历史不可忘，更不能忘本。

---

<sup>①</sup> 一名普通的军队医生，1939年就读于晋察冀三军分区卫生部医干训练班，1940年任军医，一直从医至今从未离开临床。离休前任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河北省外科学会副主委等职。

FPDP/37/1-

我写它不是为了“古董”陈列供人欣赏，而是想通过我的叙述，期望尤其年轻同志了解我们的过去，能从中吸收经验教训，汲取营养和力量，珍惜我们的今天，为实现我国的“四化”，为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贡献力量。希望后人甚至尚未出世的医学家们，从我们“土”八路这段珍贵戎医经验中，能领略其精粹及我辈未竟的愿望和课题，并留下使之有所寻觅的线索与痕迹，便于继续探索达到理想的高峰，并不断前进。

同是医生、教授，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历史背景迥异，所以，各自的成长道路也不会相同。我本人正当身心发育的金色童年，却遭到了日本强盗罪恶地踏入我神圣祖国，并肆意践踏蹂躏我们，使我们这代人，只能少小离开父母，从戎与敌战斗。我们渴望学习，尤其渴望上正规大学，但在战火纷飞硝烟中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用无书自抄（见书末附件3）的方法以艰苦的自学为主要方式来学习医疗本领，通过战争学习战争，提高医疗技术，完成艰巨的战伤急救及医疗任务，这是历史的真实，不容歪曲！

我对我所经历的每一历史时期的军医生涯，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并经过大量回顾性研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体会，但是否正确、妥切还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工作有无意义和价值？当然只有后人发言权。

尤其我在1984年6月底病倒了，并同时并发右耳感音性耳聋之后，增加了我写它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我



做为我军一位幸存的医生，自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将我军卫生工作传统传下去，使之不断于我辈之手。传下去是我辈义务，不传是我们之责。传了，后人接不接受是后人的事，总应尽到我辈之责才感欣慰。我数次举笔，想而生畏：这么多年酷似汪洋大海的事，写什么、怎样写？经认真思索还是从幼年、从战争开始谈起为宜。我五尺之躯，生于父母，成长于亲爱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培养与教育之下。所以，党才是我的最大恩人。无她谈不到戎医，更谈不到我的一切。我不是专写战争，而是通过战争反映军医工作在当时的真实和价值，写我终生热爱、坚定不移的医生职业。

通过战争写医疗，是本书贯彻始终的一条红线。许多章节是科技性专著，对我军医疗的人民性、战伤治疗、军事医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回顾性考证与总结，给我“土”八路这段珍贵的医疗实践，赋予了科学剖析，得出我军卫生工作传统“不仅光荣而且是科学的”的结论。尤其阐明了我军军医为何能在任何恶劣环境下完成艰巨复杂的医疗任务，保证战争进行直至胜利的缘由。

本书共分两篇 12 章、154 节近 40 万字，融医于史为一体的纪实性史书，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欣赏，也适合我医界同道共同研究。

以我个人而言，虽然自幼参军，却一生坎坷，深深体会生活虽是酸甜苦辣绚丽多彩，然而岁月无情人有情。幸亏有我的伴侣、战友贾贵银同志，与我患难与共，度过逆境直至幸福的今天。

本书能够问世，我首先感谢党中央“老有所养”的英明决策。这个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使我回首写史，戎医生辉将贯我全生，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愿望。

凡对本书做过贡献的所有单位和个人，我均一律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我对每一史料的正与误反复调研核实，做了大量的预备性工作，在此基础上认真撰写每一章节，但由于本人政治、技术、文化水平有限，不妥之处难以避免，衷心地希望我过去的前辈、首长、战友和广大读者同志们予以指正，我将不胜感激之至。

王增寿 1995年9月于石家庄

# 目 录

## 曙光篇

历史部分的照片资料

- 第一章 少小从戎**…………… (1)
- (一) 与学医有关的童年轶事…………… (1)
- (二) 参军前社会一片混乱…………… (5)
- (三) 见到光明和希望…………… (8)
- (四) 参加八路军…………… (10)
- (五) 终生难忘的供给部…………… (14)
- 第二章 学医与自学**…………… (19)
- (一) 入伍后的身心成长…………… (19)
- (二) 戎医伊始…………… (23)
- (三) 我最早耳闻目睹的两位国际友人何明清和  
        白求恩大夫…………… (30)
- (四) 战火中诞生的医干训练班及其战斗生活… (38)
- (五) 自学的回顾…………… (60)
- 附：我的《集前》集…………… (65)
- 《作日记》…………… (67)
- (六) 自学的心得体会…………… (72)
-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中的休养所**…………… (76)
- (一) “百团大战”与休养所…………… (77)
- 兵站医院在平阳，医生路上开步走…………… (79)
- 为“百团大战”服务的医疗工作…………… (82)

(二) 反“扫荡”中的休养所 .....	(90)
1940年冬季反“扫荡”——化整为零的 办院方式 .....	(91)
1941年秋季华北大“扫荡”——化整为小零至 农家范例 .....	(100)
1943年一年两次惨酷“扫荡”——山洞办院的 “高级”形式 .....	(119)
(三) 反“扫荡”中医院工作的基本策略和 经验总结 .....	(147)
<b>第四章 前方战斗生活与战场救护 .....</b>	<b>(155)</b>
(一) 保卫麦收的战斗与围困西雹水炮楼 .....	(157)
(二) 阜平追击战 .....	(165)
(三) 1943年反“蚕食”斗争 .....	(169)
(四) 紧张、幽默与乐观 .....	(174)
(五) 反攻后的战斗生活 .....	(178)
鬼子投降 .....	(178)
西进山西 .....	(179)
袭击阳泉车站 .....	(192)
向寿阳进军 .....	(194)
袭击东长寿 .....	(199)
北上途中 .....	(203)
急进热河通过“无人区” .....	(210)
古北口争夺战 .....	(220)
(六) 前方战斗生活及战伤救护的回顾和 认识 .....	(227)
我们这代人 .....	(227)
我党我军始终关心卫生工作 .....	(230)

	部队卫生工作特点·····	(233)
	(七) 对抗战时期的科技知识与医疗	
	技术的浅谈·····	(240)
	(八) 技术练兵·····	(251)
<b>第五章</b>	<b>大灾年的“医疗”工作</b> ·····	(254)
	(一) 严重问题及严重性·····	(254)
	(二) 灾荒中的医疗工作·····	(261)
	(三) 大生产运动·····	(269)
<b>第六章</b>	<b>抗日战争胜利我的简要结束语</b> ·····	(279)
<b>第七章</b>	<b>解放战争中的野战医院及后方医院</b> ·····	(286)
	(一) 黎明前的概况·····	(286)
	(二) 新乐战役·····	(290)
	(三) 对革命卓有贡献的冀晋军区第二野战	
	医院·····	(293)
	(四) 转战晋北的戎医生涯·····	(299)
	消灭顽敌的智村战斗·····	(301)
	智村战伤特点及创新·····	(305)
	伤员闹事与“解散”支部·····	(313)
	土改斗争与“胜利”剧团·····	(317)
	转战晋北的思索·····	(324)
<b>第八章</b>	<b>察南战役</b> ·····	(328)
	(一) 背景·····	(329)
	(二) 穿越五台山·····	(330)
	(三) 战前准备·····	(345)
	下五台山·····	(345)
	过“土改关”与军事整编·····	(348)
	左町印象(一次丰收的尸体手术实习)···	(350)

打应县·····	(354)
(四) 战伤医疗的鼎盛时期·····	(356)
下关与杜家河·····	(356)
下关罕事两桩·····	(359)
(五) 战伤医疗飞速发展·····	(362)
1、换药的突破, 实行新(创伤)疗法·····	(363)
换药观念的更新·····	(363)
新(创伤)疗法的适应症与反指征·····	(364)
推行消毒碗制·····	(367)
医生亲自换药和无菌“三环节”·····	(370)
优劣创面的识别与处理(食盐的妙用)·····	(371)
2、手术系列化、专业化管理的进化·····	(375)
3、对战伤“三大仇敌”的认识·····	(380)
4、“对孔”引流问题·····	(383)
5、对“流注”原理有关的两项手术——	
取弹片与取腐骨术·····	(387)
6、评定残废等级问题·····	(389)
(六) 对已往战伤的回顾及体会·····	(396)
<b>第九章 驰骋晋、察、绥战场的日子里</b> ·····	(404)
在山西阳高大王庄和丰镇的日子·····	(407)
平张与平绥战役期间的转辗行动·····	(411)
绥远孤山战斗战伤治疗的成败经验·····	(417)
平张战役间隙医疗经验小结的回顾·····	(419)
科技丰收的大同战役·····	(425)
解放战争以来医疗经验前瞻性回顾·····	(439)
<b>第十章 彻底打败美蒋反动派成立新中国</b> ·····	(448)
(一) 护理教育势在必行·····	(448)

(二) 立功运动在本院	(451)
(三) 最后一村老平地泉——进入腹部外科 新纪元	(456)
(四) 解放战争胜利, 庆祝新中国诞生	(462)
(五) 厄运缠身	(465)
<b>第十一章 “绥远方式” 的斗争实践</b>	(476)
(一) 新形势下战斗部队生活片段	(476)
(二) 绥远和平解放	(480)
(何谓绥远方式?)	(482)
“绥远方式” 斗争的复杂性	(482)
解除思想“疙瘩” 促进改编进程	(488)
反谍胜利, 一网打尽	(490)
本院进城前后的不同感受	(493)
战绩	(500)
剿匪与手术队工作总结	(501)
与日本人一同工作的回顾	(507)
(三) 为抗美援朝战争医疗服务	(512)
大兵团作战接收大批伤病员医疗 任务	(515)
伤病员闹事及我的思索	(521)

## 生輝篇

对流逝的岁月回顾 (照片资料)

<b>第十二章 戎医生涯的总思索、总体会与探索</b>	(541)
(一) 没有红军焉有八路?!	(541)
(二) 为何我军医能在任何恶劣环境下胜利完成 医疗任务?	(543)
(三) 我军卫生工作重要性的分析与认识	(548)

(四) 我军医院特点及工作方法的分析·····	(550)
(五) 怎样做好(外科)医生工作?·····	(553)
(六) 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的形成、内容及 意义·····	(562)
艰苦奋斗, 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563)
严格合理的制度·····	(566)
一丝不苟的严谨科学作风·····	(574)
泼泼辣辣, 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	(579)
(七) 我军医院常常遇到的若干重要 问题·····	(579)
正确认识与处理学术问题·····	(579)
学术问题的正与误·····	(583)
关于医生对医疗事业的指导思想 问题·····	(585)
关于“医生永不脱离临床”的信念·····	(588)
医疗上的快与好问题·····	(591)
关于病人挑人(治疗)的问题·····	(593)
关于怎样处理病人“感恩”送礼 问题?·····	(595)
(八) 给后人留下未竟的课题·····	(600)
(九) 回首与盼望·····	(608)

## 附件

- ①《内蒙古农村牧区影响手术创伤愈合的因素——  
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的调查报告  
(附手术 238 例)》····· (1)
- ②白求恩大夫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  
组织和技術》片断····· (16)



③抄书（绷带学、妇产科、眼科学）片断·····	(22)
④《在绥远军区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 发言稿》片断·····	(30)
⑤“闹鬼”·····	(34)
⑥曲阳县抗战形势图·····	(42)
<b>编后遐思记</b> ·····	(1)

## 第一章 少小从戎

### (一) 与学医有关的童年轶事

我于 1925 年旧历四月十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宋家庄一个中农家庭里。当时我家老幼七口，祖父王朝言已衰老，唯有父亲王鑑美（图 1）是主要劳力，种地养



图 1 父亲王鑑美 1900 - 1965

母亲庞五亭 1909 - 1967

活全家。我七岁上小学读书，连读五年。至十二岁（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至此我

中断了学习。当年九月家乡来了红军，次年春节后，我十三岁于 1938 年旧历正月十七，奔赴我县灵山镇参加了八路军。

这就是我参军前的简历。我的身世即便如此简单，也有或大或小的童年轶事。据父亲说，在姐姐下边，我有过两个哥哥，都在几岁时先后夭折，由于重男轻女的旧观念，所以，我一出世即被视为至宝，我出生后一百天内，老人们不敢承当生了男孩，佯称添了一个丫头，怕我不成人，起名增寿。那时在我家男孩有至高无



图2 我姐妹三人：素芬、艳素、增寿

上的地位，当然我在姐姐艳素、妹妹素芬（图2）中是最受宠的，不用说吃穿用都先让我。谁知“好景”不长，在我六岁那年（1931年）严冬的旧历十一月十六日，亲爱的母亲崔吉瑞生小弟弟横位难产。我的家乡地处偏僻太行山谷，生活贫穷，文化落后，缺医少药，根本谈不到什么医疗条件，遇病只有去请巫婆，请“高

明”的老娘婆治疗，小弟弟一只胳膊外露，老娘婆无法处理，就用秤钩向外拉……，这样胡来的结果，当然只能是要命。果然于几天后，可怜的母亲终于诀别了我姊妹三人，被迷信、愚昧无知、文化落后夺去了她年仅35岁的生命。临终前神智清晰舌头僵硬了还嘱这嘱那，不忍抛开我们的惨状，实令我不忍回顾。由于农村文化落后，母亲连个“影子”也没留下，我为纪念母亲，1964年6月照了一张母墓照片，还被“四人帮”的小爪牙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大打出手，人身遭到许多非难。

母亲去世后，过了四年，于1935年我村来了几个传教士，办起的一个教会小医院。他们是从祁州来的，为首的是新西兰金发女郎凯瑟琳·霍尔（Katheren·hall）——中国名字叫何明清的女士，另外还有两三个中国人，虽然这种教会医院是以所谓慈善事业为幌子，但却挽救了不少像母亲那样的疑难险症。自然，跌打损伤，脓痈疗毒及钳产、碎胎之类需作手术的病人，都可得救了，因此，老人们说：“如果何先生早来几年，你娘也死不了。”我相信的确如此，因为何先生会碎胎。我亲眼看到，作为一个外国妇女的何明清女士，对当地人民和蔼可亲，疾行如风，不怕狗咬，不怕劳累，日夜兼程地出诊抢救病人，其认真负责的医疗作风及高明的医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得知何女士和白求恩大夫一样，同情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她说：“八路军比上帝好。”她抢救我军伤病员，利用宗教在日寇面

前掩护我群众和干部，她从北平等大城市带来 40 多位知识分子到边区工作，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她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诚挚的国际友人（见《曲阳党史资料》二十期 26—36 页）。她曾应邀访华参加过 1960 年国庆庆典。但遗憾的是，当她要来我家乡重访故地故友时，由于当时实行“左”的政策，又由于她是耶苏教徒，未能如愿，她曾提出过抗议，她已于 1973 年 4 月 3 日与世长辞。1994 年 9 月按其生前遗嘱，由其侄女护灵，将骨灰洒于我村西梁上。

后来，父亲续娶了继母庞五亭，母亲也十分贤惠地敬老抚小，将我姊妹三人拉扯大，的确是不易的，母亲的慈祥永远为我后辈所怀念。后来生了长寿、芬素、永寿、兰芬等弟弟妹妹。

我们同龄的小伙伴们，常玩“先生看病”的游戏，这是受何女士及中医看病的影响，我在 1980 年中秋回家探亲时，童年的小伙伴们刘振元、张德子等来家看我，德子兄弟还风趣地说：“咱们小时候玩先生看病，终了来，只有你成了真正的先生”。大家不由一笑，以示其然。

当时，我虽然不懂得救死扶伤，更未想到我会一生从事医生职业，但对医生可以治病救人的感性认识是肯定无疑的。这对我坎坷的生平、终生热爱医生职业，是不无缘由的。

## (二) 参军前社会一片混乱

芦沟桥事变后，谣言四起，莫衷一是，人心惶惶，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连我们这些当时不怎懂事的小孩子，也深知我国人民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不知何时当亡国奴。

首先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惶惶南逃。开始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个部队着灰军装，装备精良，每个士兵起码有突出的两大件——步枪和斜背在身的大片刀，还有钢盔，挖工事的小锹镐以及麻制伪装，荷枪实弹，成二路纵队行军，官长都分别在队列前边，令行禁止，很少和村民谈话……，看来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由于兵乱，年轻妇女都很自然的回避，在狭窄的街上，看热闹者，多是男子及老弱儿童。据说，他们曾与日本鬼子战斗过，顶不住，故南撤，是从涞源走马驿、倒马关过来的。由于山沟路窄，虽然踩坏一些庄稼，到还不怎伤害老百姓。所以，老乡们敢亲眼看过往士兵。然而老年人唉声叹气，说：“这么多军队，都截不住日本鬼子，完了！”我们小小的心灵里也留下了兵败如山倒的悲哀烙印。

又见到，从北边逃荒的人民，扶老携幼，身背肩扛着举家仅有的杂物，疲惫地与二十九军同路南逃。记得有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背着他老母艰难地蹒跚行来，实在走不动了，在我村庙台上暂息，放下他奄奄一

息的老母悲痛垂泪。我祖父特给他们送来一壶开水，这位男子哭啼着表示谢意，祖父问他们要到哪里去？由于关外口音，吱吱唔唔也听不太懂，连他们自己也不知要去何方，二十九军与这些逃难的难民同行，不知他们有何想法！

在此之前，先后有好几个哑吧来过，不会“说话”，住在北头店里，手持备好的文字折式手札，与人们交谈。后来人们说，这些人是汉奸、密探，究竟确否？也不得而知。当时已无政权，南镇国民党保卫团龟缩在局子里，团丁也分散回家了，这样乱的社会，那还有人过问。不过当时这些精明的“哑吧”，的确是从未见过的不速之客，他们能够文字交谈，难道是真哑吧吗？！

接着南逃的是中央军，着草绿色军装，荷枪实弹，虽然大队行军，但较二十九军混乱得多，装备也很好，除没有大片刀外，不逊于二十九军，这个军队在小休息时有的人还显示他们在前线如何如何与敌作战，以功臣自居，我们小孩侧耳静听，回家还向老人们汇报，老人们叮嘱少出去，别说话。这个军队行动混乱，有时抓人给他们带路，由于抓人，壮年男子也不敢随便上街观看过兵的情景了。大门虽无紧闭，但呈现出一片恐怖凄凉的气氛。

就是这个中央军，最后队尾的一个营哗变当土匪不走了，大队已匆匆南窜到党城一带，又回过头来镇压这个哗变的营，一天，鸡冠山山顶南端的墩台上还映着将落的夕阳，突然听到从南边传来的砰砰乒乓的枪声

……，枪声连续，还误以为是机关枪呢，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声，村里乱成一团，祖父、父母拿了点盖窝，牵上驴锁好门，领我们兄妹与乡亲们一同向北面的西沟里跑去。枪声不响了，也不敢回家，就在西沟露宿半夜，被褥浸湿，有点寒战，蚂蚱、铜钟（金铃子）、蟋蟀等秋虫齐鸣，呈现一片秋色夜景。后半夜皓月皎洁，大约凌晨两三点钟，听到人们喊“兵走啦，回家吧！”人们牵驴拾被，回到村里。次日，见到两个负伤哗变的士兵，一个将双眼打瞎，脸上血迹模糊，一个腿上负伤行走困难。我村的乡亲比较温和，怕他们以后报复，这两个伤兵要水要饭，人们都给他们端到庙台食用，后来这两个人相互照应着向南离去，听说走到七里多的南家庄北湾子里，就被南家庄、树沟的老乡打死了，将尸首扔在蓖麻棵下。诚然，这两个国民党士兵也是失败主义的牺牲品，从这点，可以说是无辜的，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上战场杀敌是军人的天职，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不为国效力，临阵脱逃，还要当土匪危害老百姓，落此下场，该是咎由自取，也不足惜。当然重要的责任不在士兵，而在他们的官长，最终是国民党蒋介石负责。

又有一次说土匪来了，我全家连夜跑到姐姐的婆家上三土门暂避，因从未走过夜路，见到路上白色像是石头的东西，当向其踏足时却混水四溅，原来是水坑。所以，我还未参军，已知水坑在夜间是白色似石的东西了，不可踏。



这一阶段，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道听途说，大多是悲观泄气之言，人们哪有心思生产，认为家乡不久也会落入敌手，百姓会变成亡国奴的。

### （三）见到亮光和希望

正当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离我村二十五里的灵山镇来了红军（刚刚改名为八路军），这大概是1937年九月末或十月初，派出动员会（即前线动员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到各村宣传演讲，记得一位标准唐县口音的男同志，小个，穿一身粗布灰军装，腰扎皮带来我村宣传，他在庙台上叉腰演讲，男女老幼越来越多，他讲得很好，说：“我是唐县张各庄村人。……北边有个平型关，我八路军在那里打了大胜仗，消灭日本鬼子坂垣师团精锐部队，那里的鬼子已被我打垮了。不怕了，截住了！这个部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现在叫八路军，是专门救我们老百姓、打日本鬼子的。我们应该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拥护、支援八路军，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参加八路军，上前线，保家乡，人人有责……”老乡们虽不懂得鼓掌称赞，但愁眉苦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后来人们亲切地称这位同志为“老唐县”，大概是个教师之类会说话的知识分子吧。从此，人们常成群传颂、津津乐道，认为动员会说对。这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之处，一个向南惶惶

溃逃，一个则迎敌北上堵截，挽救了当时的危机，人心大快！开始像姐姐她们年轻妇女都不敢出门，后来也敢上街、上地里参加正常农事活动了，这是我生平首次感到宣传工作的威力。二十九军兵虽精良纪律也好，但闷着头行军当地群众仍是人心惶惶，大概他们也自知南逃理短，他们的行动也无法宣传。而我们的“老唐县”只身一人，却代表了共产党的伟大声音，所以威力极大，振奋人心，鼓舞了军民士气，可见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这时，我本村小学老师冯国玺已率先参加了八路军，因他是白色恐怖下的老党员，一参军就是挎盒子炮的游击队政委，继而有潘占国、冯茂林、冯高林、宋海金等同志先后去灵山参加八路军，他们都是大人。这时我心动了，想去参军抗日，曾跟庞家洼五舅老党员庞文运去灵山动员会问过，人家嫌小不要。

灵山的红军，为首的司令员是陈漫远，政治委员王平，副司令员黄永胜。开始，在1937年9月份有唐子安首长带一教导队来过灵山，后由当时的白区党员庞子英、王银科、冯国玺等组织动员会，我的远房舅舅庞占双也由庞子英将他招来动员会工作，后由王平政委认定这个动员会，由他们组织宣传建立政权。又由数量极微的红军为骨干，扩大军队，即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当时司、政、供、卫各部都驻灵山商号怀仁堂最大的地主庞步勤家。

这个军队，与众不同，一律不让叫老总，让称同

志，后来父亲曾带我去灵山赶集同时打听参军的消息，只见灵山的红军衣着极为朴素，没有真正的军装，都穿灰色或黑色军装。由于人们传说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朱毛的军队，所以灵山集上做买卖的人，都不敢说商品是我的，谁要问：“这是谁的？多少钱？”就答“咱们的，看着给。”这显然是国民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谣言的遗毒，但，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见到这些朴素无华、和蔼可亲的人，难道他们会是那种人吗？这种诽谤当然不消自灭。

跟着父亲到东河滩西北方，有约二三十名穿黑军装的男女小孩，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在那里练习跳舞，说是三分区宣传队后来改称冲锋剧社是专门演文明戏的。我想：谁说小孩不能当兵？他们不都是小孩吗？我参军的心情更加迫切。

#### （四）参加八路军

这一步非同小可，参加了我军意味着步入革命征程，也为两个多月后步入戎医生涯创造了条件，没有参军，学医就是一句空话。而且我为准确无误的参加了真正的革命队伍而庆幸。因为当时打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者有之，在我家乡周围就有八路军和八路军的招兵处，七路驻在完县，还以每月3.5元高薪及排以上军官可以带太太为诱饵，引诱抗日心切的青年上钩，结果，真有人上当，第二年已完全证实七路军的司令员孟阁臣亲

日反共为敌效劳，是一个地道的汉奸，所以被我军全部歼灭，孟阔臣枪毙了，有的俘虏又当了八路军，为革命走了弯路，而且历史上曾参加过杂牌军的污点者有之。其实像我们当时十二、三岁的年龄，也很难分清谁真谁伪，我只见到灵山镇的红军那样朴实不会是坏人的，所以坚定的参加了八路军，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里程碑，由于党的培育，各方面进步很快，为我日后终生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奠定了基础。

参军经过也很简单，由于我二次去灵山的见闻，当兵之心已坚，开始老人们踌躇未定，大概是说，让无亲娘的孩子去当兵是否合适？话虽未明，我已理解到这一点，我曾与祖父说，我愿上学但已不可能了，到军队还可以学习知识，祖父王朝言非常开明，豁然应允，并说：“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无见过不打人的军队，这个军队错不了，让孩子去吧”。尤其当次年——1939年我考入分区医训班后，祖父更为高兴地说：“在家里哪里会有这样好的学校？”鼓励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恩于八路军。

1938年刚过，有一天先参军的冯茂林哥回家来看祖父，当天下午（正月十七）我即跟冯到灵山镇（图3）供给部去自动参军。第二天见到部长肖直久同志，部长问：“小鬼为何当兵？”我答“为抗日”，部长满意地笑了，随后让管理科长分配工作，结果分配我到会计科任勤务员，科长庞占双正是我的舅舅，我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扫地、打水、打饭、叫人、擦灯罩等内部勤务



图3 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图中的灵山阁顶已被日寇拆毁，修筑残杀我国人民的炮楼，1964年6月3日摄

工作，还不时地让我做些文书工作，如帮科员们向各乡写公函条子等。

参军后，给我发了一套灰粗布单军装，套在我的棉衣外面，衣大人小，穿不起来，酷似一个小大衣，美其名为军装实不过一个中式大褂多了四个明兜而已。裤子也大得很，还扎上裹腿，觉得也很体面，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宣传队小孩们的快乐情景，但可惜的是在灵山镇防期间，从未再见过穿黑衣的小兵。

参军后不久，司务长葛振英同志给我发了一元钱，说是你二月份的津贴费，我心中一怔！简直不敢相信钱已属我。事后，“烧”得不知怎样化费这么大的钱！

我开始提出参军，老人们踌躇心情是易于理解的，尤其是父母更容易担不是。我参军后不久，家里果然闹了一场小风波：自小宠爱我的三老姑（姑奶奶）王秋香，她在南镇多年寡居，但经常来家照顾我们所谓没娘的孩子，她听说让我去当了兵，回到家来和祖父、父母大闹一场，并哭着说：“从此我再也不来了（决裂）。”我有一天回家看看，正遇到姐姐从婆家回来住娘家。姐姐边哭边给我剪修这件大得出奇的军上衣。但后来他们都知，不是老人们尤其更不是母亲硬把我赶出去当兵，而是我自己愿意自动入伍的。风波平静了，姐姐后来高兴的说：“你当兵是对的，如果咱娘在世，恐怕也不让去当兵，还是咱爷看得远，不当兵，你怎能学成医生呢？”

几乎与我同时，不少小孩都参军了，如我村的冯天才、下三的赵成国、庞家洼的庞继善等都先后参加供给部工作。我们这些人没有当过儿童团，因它是1939年后才有的。

当兵就意味着打仗，当兵，就有牺牲的可能，所以，当兵就要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和思想准备。果然，1938年8月12日曲阳高门抗击日寇的一仗，就有长征干部十一大队长年仅25岁的朱仰兴和我村年仅27岁的白区党员冯国玺同志，都过早的与世长辞。后来又

有我村冯高林、冯长庆、潘占国、宋海金等同志先后为国捐躯，被日寇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破坏了他们幸福的家庭。尤其是冯国玺同志，在白色恐怖国民党统治时期，保卫团抓捕他，他跑到北阁响岩寺化装成“和尚”，他吹得一手好大管，混入和尚乐队中是不会相形见拙的，他忍饥受饿，掩护其他同志，真不愧是我党的一位好同志。

### （五）终生难忘的供给部

我在三分区供给部工作时间短暂，总共不过一年半，但对它的感情却很深厚，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供给部是我走向革命大路的起始点，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最早获得党和八路军启蒙教育的地方。

1938年的“供给部”，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供给部，因无东西可供，记得科长们还让我帮他们给灵山周围附近的村庄写过筹备给养性质的摊派条子，如让朱家峪送煎饼，庞家洼送干粮……等，但在肖直久同志的具体领导下，依靠一些年青有为、精明强干的同志，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使供给部很快成长壮大，不仅迅速搭起了各办事机构的架子，而且迅速发展了不少生产物资的厂子：

在石门村，成立了被服厂，由陈同印、老方师傅、王殿甲、刘玉振文书的父亲等为骨干，很快投入军装、子弹袋、绑腿的生产，随被服厂的建立，还成立了劳作

团（由妇孺组成）；由庞贵全、杨周易等工人办起雏型的鞋厂，虽然还主要是由地方做公鞋，第一任厂长王珍，后来又有姚志千（唐子安妻）……庞焕洲等同志领导鞋厂逐步完善于史家沟、梁家沟、塔子沟、木兰、黑角、这儿里……等村；还由邢竹三科长领导成立了修械所，不仅修枪枝，而且还可制造手榴弹，虽然性能不怎么好，但毕竟是自己生产的武器，所以意义重大（后搬到蟒栏、牛眼沟）；成立了石印厂，是以柴根森、刘玉田等为骨干，该厂可印刷、可刻字（后来调归分区政治部领导，搬到中迷城去了）。

随着部队的扩大，加之敌人的封锁，战争残酷性增加，各方面的物质都需要加强，部长将庞占双科长从六区队调回，以他为主：在花盆村办了纸厂；满心村办了油坊；桑会村办了煤炭合作社，以解决燃料困难，办该社困难很大，因此地正处于凤凰山鬼子炮楼的鼻子下，还有运输问题，他终于在燕川煤矿及家乡亲友的大力支持下办起来了；他还在西迷城办起了军用品合作社等。……

这种蒸蒸日上的景象与日新月异的成果，的确振奋人心，更值得我们和平时期借鉴。条件那样艰苦，物质那样缺乏，技术力量那样单薄，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做到？我想最基本的是：代表党形象的老红军部长的直接领导；骨干力量的中坚作用，如庞占双、邢竹三、冯昌隆、胡展民、庞忆昔、王龙章、刘捷三等各位科长的身体力行、组织实施；同时，与同志们一致的抗战热



情和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使我部队的军械、粮秣、被服、工矿实业以及沟通供需的商业等各种条件顺利建立起来。有力地保证了当时以游击战为特点的战需要，坚持了我晋察冀三分区的抗日战争。然而这位劳苦功高的革命先辈肖直久部长，后来在1943年11月秋季反扫荡中牺牲于阜平柏崖，现长眠于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内，我每当看到他的肖像及陵墓就心里难过，情不自禁想起往事。这是我1979年3

月5日摄于他墓旁的照片)肖部长:1928年参加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暴动,1930年参加红军,经长征,历任运输员、事务员、供给员、科长,后来到分区当部长。我们活着的人永远怀念他。



图④肖直久部长墓

我与供给部同时由小到大的迅猛成长,它是我永远难忘的老单位,在那里我不仅身体而且理想、知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刚参军,由于矮小穿不起军装来,夏初给我发了第一套合身的绿斜纹单军装,仅时隔两三个月后发第二套时,第一套就小得不能穿了。可见我八路军小米“威

力”之大。（后来身高继续增长，到十六岁后已成人，以后再未增长）。

党分配我当勤务员、卫生员，我均毫无疑意地服从组织，也为我终生热爱的医生职业创造了条件，次年（1939年8月）即考入分区卫生部医务干部训练班，离开后再未能回供给部。

我和爱人贾贵银，是双方父母在我俩六、七岁时就给订婚的，在供给部时，双方老人急促催办完婚，就择本年阴历四月二十四，用旧婚礼为我俩完婚。但我二人互不相识，更谈不到爱情，事后我回部队，她长期住在娘家，婚后很少见面及团聚。1944年11月1日我们曾生过一个男孩，活了七、八天死于战乱环境。我们真可谓“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婚姻；但久之，我们终于成为患难与共的亲密伴侣和战友。由于战争分居十来年之久，至贵银1949年4月二次参军我们才有团聚。

听了肖平、罗传孔、杨文考等各位指导员的政治课及积极参加救亡室活动，对我的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思想认识有了不少进步，经党的培育和考验于1938年8月由罗传孔、杨文考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补期三个月，按时转为正式党员。直属队总支书记，指着我对肖部长说：“这个小鬼不错，我们已批准他转正了。”我的政治生命是从唐县石门供给部光荣入党开始的。供给部也是我形成某些坚定信念、理想、抱负的地方。

胆子由小变大，世面越见越多，反面的也开始见

到，我生平第一次看枪毙人是在石门村。1938年春，天还不暖和，听说今天毙人，高兴得又蹦又跳，去河滩入列队伍，还有本村群众男女老少围观。片刻后，监护排战士将罪犯（土匪，33岁，山东人）赤身押入会场时，我全身发冷，懊悔不该来看，但已不可能离开了，经肖部长简单地宣布其罪行及宣布枪决后，还问他有何说的？这个罪犯还“阿Q”式地挣扎说：“我叫×××，33岁，33年后，又是一条男子汉。”等无聊的话，并要喝酒，给他端一大碗一饮而尽，监护排的同志们把他推搡着到离会场约50米远的地方，还未来得及让他跪下，枪声已响，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从这以后，对枪毙人不害怕了。特别在1939年政治整军（实际肃反）中，几乎全直属队每周六下午要到稻园村政治部驻地参加除奸科主持的公审大会，每次公审最少杀一人，多至二、三人。当时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不镇压的确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胆量也不是天生就大，以后见杀坏人也习以为常了。

在我自己的生平中，供给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自石门村已开始了我光辉的政治历程。我虽然已是八路军战士，但还是未脱开儿童的稚气，如：1939年春节，我第一个离家后的大年，还盼年，买一把小炮放，在石门村喂鸽子，在秦王村喂松鼠，在宋家峪抓蝥蝓……。我虽已是光荣的中共党员，但在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仍局限于极简单的“为了抗日”的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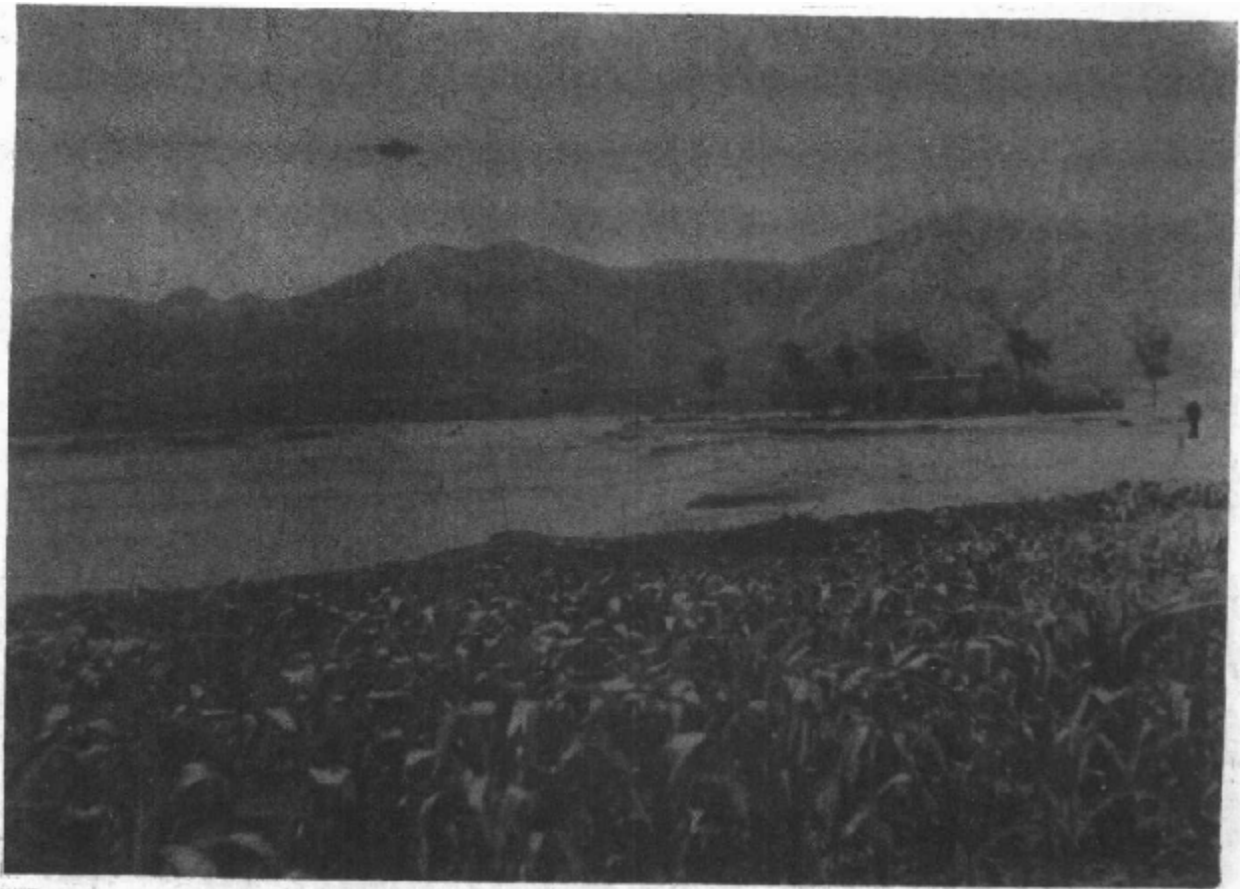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学医与自学

### (一) 入伍后的身心成长

军队是武装集团，我们已是穿起军装的“老百姓”了，不同于在家时的老百姓，军队的每个成员都应毫无例外的懂得最普通、最起码的军事知识，不准任何人标新立异，养成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训练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的良好军事素质，才能完成生与死的战斗任务。军队的医务工作者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由于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抗争的战斗，就不允许我们慢腾腾地认识和处理战伤，需要迅速把伤员运到安全地带，然而我们处理得是否及时、正确，直接关系到战友的生命。及时，一般说是军事知识能否熟练的掌握问题，正确，则是我们战伤救护专业水平和平时的学习问题。总之，所有成员都应懂得军事知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决非是多余额外负担。否则，在战场上将与战友没有共同语言，影响完成战伤救护。当然，军事训练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后的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

我参军后，三分区的首脑机关都驻在灵山镇，在我的家乡除了县城，灵山也算是一个大地方了，但却无合

适的大操场，由司令部管理科组织各部全体军人，把灵



灵山镇东河滩 1938 年大操场旧址 1964.6.3 摄

山东河滩图 5 的鹅卵石搬掉，垫土踩平成了理想的大操场，早晨听号令起床、出操，副司令员黄永胜亲临操场督促和指挥，要求很严，开始出操，主要是跑步，记得每晨要跑六圈，大约 6 里之遥。由于我个子太小体力也差，使尽全力也难以一气坚持下来，心里多么着急：赶快长大能跟上队有多好，免得丢人现眼。每次早操都有我们不少小孩和身体不好的中途报告退出队列散步。后来，又训练变换队形及立正、稍息、敬礼、开步走等起

码知识，这些都比跑步要好得多，均能坚持下去。

在灵山镇遇到两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我各单位所有部队都集合在大操场，请国民党友军——工兵团联欢，见到人家均穿绿色军装，装备精良，裹腿、子弹袋、枪衣都是帆布织的。我们的副司令员和友军的工兵团长都相互讲了团结抗日友好的话。当时，我未感到有什么异常，等散会回来后人们传说“你们没看到灵山阁上我们已架好了机枪，要不老实就收拾他！”传说这个部队被我改编了，又有人说：“没有改编，仍在朱家峪（离灵山二里）驻”说这个团是国民党给我们派来的，来后表现不错，后来又回去了。到底那种说法正确？至今未详。但是我们知道，有不少的反动武装如银坊一带联庄会（地主武装）、孟阁臣的七路军都被我们解决了。所以，从这次以后，每当与友军一块开什么大会，总要悄悄环顾周围有什么动静、制高点上有没有架设机枪。

另一次，我在卫生部受卫生员训练的过程中，我前方部队从漫石道抓到一个活鬼子，记得快到“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也是在同一个操场开大会，黄永胜副司令员讲话后，命令将日俘带上台来示众，这个鬼子好像头上有伤，光着头，血迹斑斑，敞着怀，歪歪扭扭地站在台上呈现一副狼狈像，台下同志们咬牙切齿地大喊：“枪毙！……”。将这个家伙吓得战战兢兢，东张西望，可能在想：不知要怎样处置我了。同志们有人站起来要求首长枪毙他给死难者报仇！但还有党的俘虏政策，只

要已放下武器不再反抗就不能再杀掉了。后来副司令员让带下去了。虽然没杀，同志们当时的觉悟水平还觉得没解了气，但却使同志们精神大振，看到了日本鬼子所谓武士道精神也不过如此。当议论到这家伙怕群众起来打死他的那种战战兢兢的狼狈像，同志们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后来，听说这个家伙越狱逃跑迷失方向，反到跑到我边区腹地仁景树村被仇恨的老乡抓住给打死了。

参军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供给部就曾多次转移，我初步经受了行军、战斗转移的锻炼。大约在参军后两个月，突然命令供给部转移，这是我们第一次移防，还不会打背包，当天移防到唐县套里村，后听说，这次转移的原因是原在曲阳城驻防的国民党东北军何国柱的部队，突然向城北迂回至二十里外的水头涧村，当时我们搞不清它是要打鬼子还是要打我们，所以，部队向东北方转移二十多里，我们住在套里天主堂，驻防不几天，又经南家庄——我村村东的河滩，向北经邓家店、梭头、赤岳至宋家峪暂驻。这些村庄都在我家南北不出十五里的范围内。又经宋家峪出发经水峪口、干河铺往北经于家寨至石门村驻防，先后住在陈清泽和与我同岁的陈明新家，这个村庄驻防时间很长，约半年左右。在石门供给部有了迅速的发展：被服厂、鞋厂、劳作团、修械所、监护排都在这里诞生，也是我走向卫生工作之始。接着移防蟒栏，在该村每日下午做丢手绢的游戏，虽已古老的掉了牙，但当时的确是活跃部队生活的文娱活动。记得日寇轰炸机常来骚扰，我们曾到东北方向二

三里路的黄岩村防空，以后一闻敌机嗡嗡之声就形成条件反射。

## （二）戎医伊始

1938年4月，供给部驻在唐县石门村时，得知房东陈清泽的儿子陈相如在冲锋剧社工作，和我同龄，他母亲可能是见我思亲，时常问这问那，并主动向她丈夫说：“这孩子和咱墨周同岁，在家也很圣”，我从内心当时很喜欢从事唱歌跳舞，但一个刚刚参军的小孩子，又身居隔行的供给部，怎么可能如愿以偿呢？我虽知陈相如是宣传员，但一直无缘相遇。从此，再也不想当宣传员的事了，因为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参加革命工作，职务不能自己挑选，要服从组织、战争的需要。时隔不久，分区卫生部为了健全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决定从各单位抽调高小毕业生，集中培训卫生员。可怜的供给部，当时连一个高小生也找不出，就决定让我去参加训练，回来当然就是卫生员了。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分配。我的家乡初夏也很热了，我奉命持单位介绍信，背起背包，从石门出发向南，经仁景树、葫芦汪、磨子山的山谷于下午来到灵山镇卫生部报到。

这个训练班为一个队，队长是权力同志，下分六个班，还有一个看护排，训练时间为40天。这段时间部队整训、军事训练安排的特别紧张，真可谓连撒尿的时



间也没有，行动一律整队，军训早操除“要命”的六圈跑步外，还学习一些队列知识、拔慢步、跳木马、跳远等。每日两餐，是我八路军老规矩，上午9点下午4点多年如一，是我军的生物钟，乍一改变还很不习惯。吃饭规定十分钟撂饭碗，否则要受批评。午睡，睡不着也不准说话，走动又会影响他人。本来天热，再加出操上课已是满头大汗了，中午又给加了一顿饭，就是喝稀粥，真是欲慢不能，欲快太烫也不能，只听一片吸溜声大汗淋漓。每天傍晚，首长按花名册个个点名及奖评当天的优缺点。在这里就有幸福祥、高秉占等同志参加了学习，而且老辛还当班长。

这一段，可以说是我生平中军事训练最紧张的一次，虽然很累，但为以后的训练基本功，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事实上，后来所有的整训，从未超过这次训练的紧张程度，只是训练的项目不同而已。所以，这个训练班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如其说是医的开端，倒不如说是戎的开端。

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极为简单的初级卫生知识，有：战伤救护、包扎、止血、动静脉出血的鉴别、各种绷带的打法、休克虚脱的处理、人工呼吸法、骨折的处理及副木的使用，还有中暑、冻伤的简单处理、最常用的药物知识……等。

农历五月端午节后，训练班结束了，结业前还请来分区首长作了指示，要求回到各自的单位努力开展卫生工作。

感谢组织让我当了卫生员，使我终生的医生职业成为可能，我深知党员从事的任何职业是党确定的，而自己是无权挑选的。我的心像一团火，无论党确定我从事何职业，我将立志要熊熊地燃烧起来，首先要烧毁日本鬼子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污辱和灾难，为建设不受日寇宰割的幸福生活而竭尽全力。

我回到石门供给部驻地，在管理科及救亡室（即俱乐部）大力协助与支持下，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善言善写教师出身的王龙章会计为主任，我是副主任，下有几个委员组成，开展公共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检查活动，每周一次，经委员会评定优劣名次，在救亡室墙壁上公布，当时我已能用绘画的形式用于卫生检查，上面横画：飞机、汽车、骑马、步行、乌龟，下面相对应按名次写明各单位。这一方式对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起到作用，争先恐后地力争先进坐飞机，不当乌龟。当然首先是监护排最为尊重我的意见，该排的战士都比我年龄大，只有贾九如、李国栋和我年龄相近，二位小伙伴对我的卫生检查十分支持。只有劳作团是个拉后腿的单位，常常当“乌龟”，它的“团长”李桂馨主任有一次悄悄地将劳作团三字在龟下撕去，我给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管理科很郑重的批评了他们。也难怪他们当不了模范，因为都是家属组成，多数年龄较大，有的还带着孩子工作，做钉扣子、缝扣门、缀绑腿带等劳动，是被服厂的附属单位。

我写到劳作团，不由得想起弦外之音：小小的劳作

团，也可说是好坏人辈出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位李荣阁（李敏）同志当主任，她是从完县调来石门的，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完县当妇救会主任去了，在一次反“扫荡”中被围困在棒子（玉米）地里，开始以生玉米充饥，后患病不能行动，活活饿死在棒子地里，死得非常可怜，至今老供给部的人如庞占双对她十分惋惜。也曾有过一个大胖子主任孙玉兰，定县清风店人，后听说她是日寇奸细，被我军法处处决了。同是巾幗，一红一“皇”，却有天渊之别，但竟是真实的。

话收回来，石门村西头就驻有我分区第一休养所，所长肖秉敏、老医生苏其昌、医生米宏志等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我常领病人去一所看病，或是为病人要药，后来关系很密切了，经过供给部开介绍信与一所联系，肖所长批准给了一些极常用的药品及器械，如：阿斯匹林、十滴水、220、碘酒、药棉、纱布、救急包等一些常用药，在石门张马驹家艰难地建起了一个小医务室，将药械摆在桌子上，好像是医生用的一样，不会换药，常去一所请教米宏志医生并看他怎样换，其实大病治不了，送往休养所，小病也治不好。移防到川里村后，距第二休养所驻地花塔村有二十多里，看病、送病人就不像在石门村那样方便了，所以，经邓有光所长又补充一些药物如依比膏、海碘仿、撒鲁尔、三溴片、单那尔宾等，所以，一些小伤病就在本单位给点药或换换药，实践的机会比过去相对多一些。就这样可怜的水平，竟然也有向我要药和请我治疗者，真是难为情！记得在川

里，不知从银坊还是哪里抬来一个下肢炸伤的伤员，血迹模糊，还在流血，将我的酒精、棉花、纱布、绷带、红汞等差不多一次都用完了，可想我这医务室有多大了。

医疗实践的机会相对比在石门时增加了，但稍微重大的问题还是离不开休养所，可是去一次往返 50 里，从早上动身出发，办完事当天回来就到后半晌了。记得一直顺唐河东岸绕行，去花塔须经古道口、河北村、山南庄等，步行去一趟不仅费力而且很慢，因此，学会了骑马，从不敢让它跑，到能撒蹦子，从此就方便得多了。

由于工作关系，与一、二所的领导 and 同志们都处得关系密切。我们虽不是直属关系，但供给部是离不开人家的。我深感医院工作的重要性，自初就是很突出的。邓有光所长，是长征中的老司药，由于积劳成疾，在 1939 年因肺结核死于东迷城卫生部。

1938 年深秋，鬼子向我边区内地进攻，供给部向东北方转移至川里村驻防，当时我虽是卫生员，但令我押几十个驮子，中途住一夜，次日到达目的地，当时我背一支打联庄会缴获的十三响小枪，一直押着驮子完成了任务。这次，可以说是首次执行具体的战斗任务，故我不仅是个卫生员，而首先是个小战士。这次军事行动，聂帅在回忆录 435 页记载是我晋察冀“东线我三分区和一分区部队，先后在曲阳北和东西庄战斗中，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 1000 余名。至

11月7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们粉碎了”。这次军事行动，我们缺乏经验，转移前供给部将不少物资，包括各团缴上来的珍贵胜利品如警报机、望远镜（是很笨重最初型）、手摇发电机、手杖式手枪、手杖式匕首、钢笔手枪、日军飞机残骸及螺旋桨等许多好东西，分三个丈深大坑埋入这些贵重物资，大坑位于石门村后救亡室左侧的坟地里，堆成大土丘，前面还插上伪装的死者姓名牌，都被敌人识破察觉，将物资都劫走了，很是可惜。

卫生员是我革命卫生工作的组成部分和起点，接着在大水灾后起到相当的作用。

1939年供给部驻防唐河南边的唐县秦王村，与川里、古道口基本是隔河相对应的位置，记得正当槟果结实的时候，于7月10日，这里下了一场大暴雨，晚间山洪爆发，冲掉了位于沟口的槟果树及许多房屋、操场，军实科被服厂住在刘老布家，前后三节院子，眼看着被水吞去前两节，军民都退到最后一节焦急地整夜观察水情。这场大水造成了沿岸众多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使秦王村水土流失，房屋倒塌断垣残壁，山水成泉，地皮菜、马屁泡（马勃）、蘑菇丛生。古坟冲毁后，昼为朽木，夜放“鬼火”（磷光），至一周后才逐渐消失。我们小孩子们常去河道看面朝下的死尸、大树、门窗、死猪之类，……据说川里上游一个叫做贵角村（后改为民安庄）的小村，人们正在酣睡，被无情的洪水冲去一部分，连房带人统统冲入唐河。该村老人们说，这

是历来从未有过的大洪水。也是我生平几十年中唯一见到的一次大洪水。这次灾害也给人们造成健康和生命的危害，以及精神恐怖。当时，我医务室本来住在东岸姓马的老乡家，因过西边打球，突降大雨，河水猛涨被隔在军实科被服厂里，军民紧张地渡过一夜之后，次日才到医务室这边来，见房子已裂缝，仅有的一些药品已潮解。特别是溴化物，已失去剂形变成了水。

害腹泻者甚多，即以次硝苍（次硝酸铋）、炭末治疗，小伤自然是涂些红汞、碘酒之类及换药处理。唐河的水仍很大，过河困难，不能及时到唐河彼岸的古道口二所去求援，所以，真正独立地给灾后军民治疗小伤小病，这还是第一次。但还是孩子稚气的我，喂着一只小松鼠，工作之余也忘不了玩耍。

这场水灾，在整个边区也是极其严重的，据张侠著（晋察冀概况）第32页描述说“三九年夏秋之交，连日暴雨，河川泛滥，北岳区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灾。人民赖以生存的富庶田园——沙河、滹沱河、唐河等大河两岸滩地170.427亩，冲去了147.627亩，……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被毁良田17万顷以上，损失粮食60万担以上，淹没村庄1万多，人畜伤亡惨重，灾民300万，到处闻见哭声，接着又是日寇秋季“扫荡”。

由于天灾人祸，1939年无新棉衣可发，而是穿去年已穿过的经拆洗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衣，以克服困难，渡过灾年。

就是我这个小小卫生员，职务虽微，在党的领导和

同志们支持下，经1年零4个月的工作实践却成了三分区供给部首任卫生“大员”了，初步地建立了卫生组织的雏形和工作秩序。当时虽未意识到它对我终生的职业选择有何意义，但是，这个陌生而又非我主动自觉的卫生工作，已闯入我的生平中来，悄悄地成为我卫生职业的起步。

(三) 我最早耳闻目睹的两位国际友人何明清与白求恩(图6)大夫

他们高大的形象，高贵的品德，率先楷模的光辉榜样，始终占有位置。对我终生从事

医生事业是有教育启蒙意义的。

何明清女士在第一节中已简要的谈过了，她是我幼小仅十年的生平中见到的第一位外国医生，是我心目中受崇敬的长者，我们由于年龄相差几十岁，虽是同行但从无共过事，去年春节中我应新(西兰)中友协汤姆先



生所委托的马保如女士来访 Katheren·Hall 女士事迹，据我回忆过去亲眼目睹她的光辉形象和我当地人民热烈拥戴，我写了《我对国际友人何明清女士的印象》一文给了马女士，被《凯瑟琳·霍尔传》所采用。我认为起码应肯定她以下 4 点：

1、她身为一位高薪教会阶层的外国女士，能够率先在我缺医少药偏僻贫脊的故乡农村安家落户，就很不简单，可以说，她是“赤脚”医生的先行者和创始人。她不仅只身，而且她带领吕中玉、甄素玲、刘、韩等数人成立诊所为民廉价治病，而且与我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不怕脏累抢救病人，为人造福，实是一个率先楷模的乡村医院，即按时过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是一所模范的初级卫生保健组织。她的行动<sup>①</sup>，也是我们本国医生难以做到的。

2、在凶狠的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的“扫荡”中，在日寇要残杀中国人的关键时刻，她能毅然站到我国人民一方，以其宗教诊所掩护我干部和群众，是伟大国际主义友谊和勇气，她的行动已将“有神论”自行否定。

3、由于她做了许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好事，而被日寇驱逐出境，就可说明她是敌还是友了。

---

<sup>①</sup> “医师道德规范”——本宣言 1948 年 9 月瑞士日内瓦第 2 届世界医学联合会全体会议通过，……1994 年 9 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第 46 届世界医学联合会全体会议修订。在我正式获得医师资格之际，我庄严宣誓：我要终生为人类服务；要对我的教师们表示敬意和感谢；要以科学和庄重的态度从事医师职业；要首先考虑患者的健康；要尊重和保守患者的秘密，即使患者病故之后，要尽力维护医师职业的光荣和高尚；要尊重同事，平等相处对待患者一视同仁，不论其年龄、疾病或残疾、宗教信仰、出身、性别、国籍、政治派别、民族、性定向或社会地位；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要极端地尊重人的生命，不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做违法的事，我郑重地、自愿地并以我的名誉做出这些承诺。



4、她在我家乡周围百里中，无人不晓宋家庄有一位外国女医生何先生，可谓有口皆碑齐口称颂的人。

白求恩大夫（Dr Norman·Bathune）是我当时 14 岁生平中见到的第二位外国友人。他从大西洋彼岸的加拿大，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支援我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辗转来到我晋察冀边区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1939 年夏在边区党代表大会上他说：“你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你们并不孤立，世界人民支持你们。……反抗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多么美好的语言啊！加之他的工作精神受人崇敬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下面我谈一些未见书报鲜为人知的事例：

就在我们家乡附近驻防时间里，先后见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古道口村二所，于 1939 年春，白大夫来所检查工作，见在一个大院子里，周围坐满了伤病员，身着灰色军装、黄发兰睛身材高大的白大夫坐在中央，有中国同志协助他一个个地检查伤病员，听说就在这次视察中他曾扯住所长高彪同志的领子，声色俱厉地不知在说什么，翻译郎林告诉他说：“白大夫生气了，他问你的衣服为什么这样干净？而疥号的衣服却那样脏？”高所长动员全所、全村军民妇女，给疥号病员们拆洗衣服，使病员卫生改观。

第二次在花塔二所，听说白大夫正为伤员动手术，我们小伙伴们悄悄地在一个大北屋的窗外，扒着窗台透过窗户纸的洞，见到白大夫穿着一件橡皮围裙在炕沿上

坐着吸纸烟，手术可能是动完了的样子，一些人在地上在做什么。这个装束和场面很像他弯着腰在小庙里给伤病员动手术的画面。

1939年三、四月间，日寇飞机对我根据地进行了轰炸，在黄石口村扔下了八颗炸弹，我们在川里的习惯防空作法是：听到飞机嗡嗡声和防空号令，就应立即就近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以尽可能避开敌人的轰炸目标，减少损失。听高其贤医生说：“白求恩大夫的方法回然不同，他一听到飞机声，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到病房陪伴伤病员。据说经后来给白大夫做工作，他才同意轻伤病员可以外出分散隐蔽防空，重者仍要有医生看护陪伴。”这种精神，无疑是高尚的。

传说：白大夫个子虽高大，但吃得很少，上级照顾给他的罐头，他给伤病员吃；

他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外出喜领一条大黄狗伴行，我也曾亲自见到过；

公家优待给他的零用钱，很大方地给人，买一盒火柴也许要给卖者许多钱。后来由郎翻译掌握使用。

他是军区卫生部顾问，聂荣臻司令员对他的意见也非常尊重，就说松岩口于1938年9月15日落成模范医院（即现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时根本不适合我敌后的游击战争环境，刚刚开诊不久，就被日寇的冬季“扫荡”中焚毁于一旦。白大夫确受教育，认识到游击战没有前后方之分，固定医院不现实，后来他创用流动医疗队，发明了有名的“芦沟桥”牲口驮架式的换药

台，展开是换药台，合起来是骆驼子，机动灵活，很适合山地游击战争。这在《白求恩大夫》影片上也能反映出来。

他来中国时，妻子不愿分离，不让来，说要走就离婚，白大夫宁肯忍受离婚痛苦也要来中国。他的确有一位离婚的妻子，在他给聂司令员的诀别信中可反映出来。他的离婚妻叫：弗朗希丝·坎贝尔·彭尼。

这些传说的真实程度如何，当然我也无必要具体地去考察，但我相信群众的传说总是来自实事而非瞎说的。

白求恩大夫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術》一书（附书末）对我外科技術起到过一些作用。我作为纪念品保存至今。他的托马氏架和牵引扣，至今仍不失为战地医院有实用价值的固定和牵引股骨的有用器械。

在花塔二所是最后的一见。1939年10月中旬，日军对我北岳军区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他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斗，这次战斗阿部规秀中将被我军击毙。后来，白大夫为了抢救败血脓毒症的中国伤员而自己被感染，这个后来称之为战伤“三大仇敌”的脓毒症，在既无抗生素甚至连磺胺药也无问世的年代里，白大夫深知自己的病治疗无望，而给聂司令员写的感人肺腑的诀别信后，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白大夫光荣的牺牲于唐县黄石口，边区军民十分惋惜这位忠诚的国际友人和技术高

明的好医生，毛主席写文章纪念他称之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技术精益求精、工作上极端认真负责的最高尚的人。

这封临终前的诀别信，曾登载在边区《抗敌三日刊》上，他将他的书、器械赠给军区卫生学校使用，他还委托聂司令员将一匣子照片（还有其他物品）及一把战刀转交给他离婚妻子作纪念。甚至将私人用的行军床送给聂夫人用，将××（小皮球？）送给郎琳的小宝宝吧……。白求恩同志的高风亮节，纯朴发自肺腑的战友语言，使人读之不禁悲痛涕零和肃然起敬。1940年2月军区决定将卫校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

边区人民亦对得起战友，白大夫去世后，在唐县军城南关西山上先后修筑了著名的白求恩墓（图7）和晋察冀抗日战士纪念坊，后来听说成为晋察冀烈士陵园。这个工程要是现在不难完成，然而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期间，在缺砖无瓦的穷困边区，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个陵墓用的砖，都是从南往北一站一站由青年妇女救国会会员（我妻贾贵银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抬运到军城墓地的，而且有我县雕刻艺人们利用汉白玉刻成的白求恩像屹立在“地球”之巅，还有我国书法家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聂荣臻司令员的笔迹。这在山谷的边区来说，可以说是一流的建筑了。记得陵墓落成典礼后不久，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在1941年秋季报复“百团大战”的华北大“扫荡”中，就把雄伟的肩枪的抗日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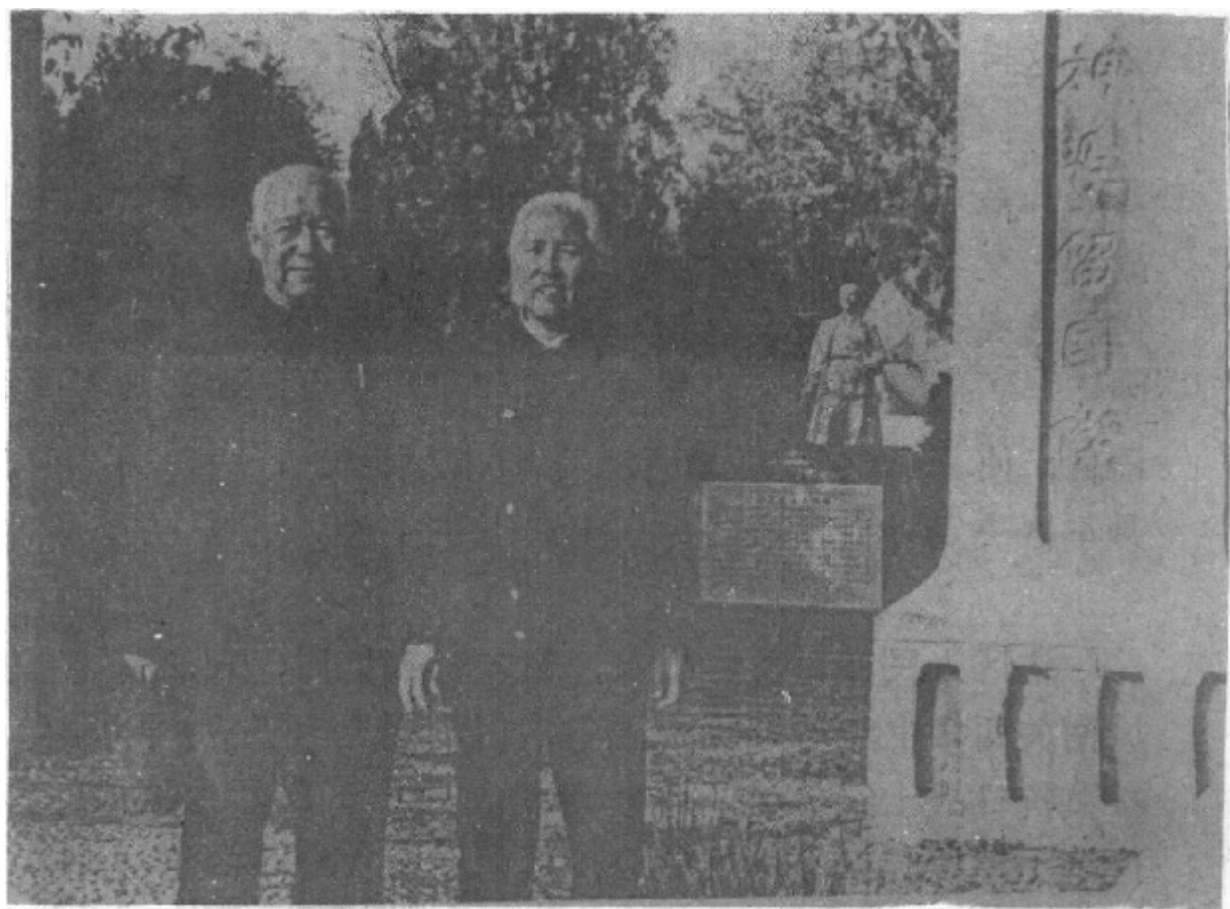


图7 我与贵银在建党70周年之“老区行”中，  
在唐县南关拜谒白求恩墓。

摄于1991年10月24日白墓及抗日战士纪念坊旧址前  
雕像给破坏了，真是可恶之极！所幸者，白求恩墓的塑像，没有毁掉。现在他的遗骸已迁移至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然而在南关的旧陵和黄石口去世时的病房小屋，却作为教育后代的永久纪念了。

但他“病人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名言，却并

未真正完美的付诸实施，做了一些，还远远不够，换言之，现在“病人仍在叩门”，山区、老区和全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治疗困难的问题，仍未能很好的解决。我认为，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是给我们青年同道留下的作业、课题。

白大夫的光辉形象。他的国际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政治责任感、高风亮节的抱负和为了伤病员健康生命所表现出的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

近与我的老师、原三分区卫生部长尹明亮将军取得了联系，他对白大夫的为人，给予很高的更全面的评价，并寄给我他早在1986年11月作的《忆白求恩大夫》诗词一首，特附于此，做为我师生二人对伟大战友怀念吧。

## 附：忆白求恩大夫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尹明亮

当年相识晋察冀，  
正值烽火鏖战激。  
抗敌急需救护术，  
天助华佗降神医！

医术高明扬四海，

谦逊热情好平易。  
舍生忘死救伤员，  
多少英雄泪湿衣。

“模范医院”<sup>①</sup> 亲手创，  
“两个极端”<sup>②</sup> 不过誉。  
“白求恩篮”<sup>③</sup> 成传统，  
“芦沟桥箱”<sup>④</sup> 显奇迹。

以身殉职惊天地，  
全军将士奋杀敌。  
国际主义树楷模，  
崇敬之情常依依

.....

#### (四) 战火中诞生的医干训练班及其战斗生活

1939年大水灾刚过，分区卫生部为了战争的需要培养医务干部，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具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办了这所一般

① 白求恩一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就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造成一所模范医院。

②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③ 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白求恩提倡下病房换药，并亲自创造出一种用木板制成的药篮子。当时大家都叫“白求恩篮子”。

④ 白求恩苦心设计的一种用牲口驮运药品、器械的箱子，他自称为“芦沟桥”。

学校所没有的学校生活的医学校，命名为医务干部训练班，它规模虽小，但我军坚持革命战争，直至胜利，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只一年，除当年反“扫荡”外，还三移其址，教材教具自己解决，开荒种地、政治整军，紧张的军训，真可谓是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形成了战时办医校的特殊政治环境，但这对我们全体学员日后政治上的成长获益匪浅。

这一切，离开边区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从全分区各部队现职卫生员、看护员、调剂员等及部队工作的青年中招考学员，文化程度要求高小毕业以上，八月上旬在卫生部考试。当时我工作的供给部，可怜这么大的供给部仍没有一个高小生，通知我去试考。我打起背包持介绍信由唐县秦王村出发去卫生部驻地——军城北关报到。记得当天夜间住在距北关村只有三里路的稻园村司令部卫生所内，遇到了唐县藉王承祥老医生，我们原并不相识，但王老却给予我很大鼓励，他好像父辈情谆谆嘱咐：“大侄子，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你一定要认真考试，不可马虎一点”，我十分感谢他的热情好意，次日上午拜别王老径直到北关报到。这时卫生部等待考试的已有四五十人之多。

八月初的一天，在北关一个大屋（后来的教室）里举行集体考试，首长监场，很是严肃。记得连续考试：算术、作文、政治时事。一发考卷，就有人退出了考场，这些同志可能比我文化程度还低，虽来不及通知爷



爷和父母得知，他们要知道我有机会在考医训班，不知有多高兴呢！一定也像王老对我的期望，所以，决心十足、信心坚定，及不及格一定要认真考试。在我来说，算术的困难较多，因没学过分数，所以分数以上的考试题都有困难，分数以下的如：应用四则、小数点、分式题等都不感困难，特别在作文、政治时事，实际都是作文题，我抒发了痛恨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同情受苦难的父老，拥护救国救民的共产党八路军，并表示要努力认真学医，以医疗技术为抗日战士服务……

过一两天，在教室张榜公布了，人们拥挤着争看自己是否榜上有名？我一看我被录取，十分高兴，马上跑去告诉王老和给祖父、父母写信报喜，自然皆大欢喜，都鼓励我好好学习，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哪能读上这么好的学校！

从榜上，共录取了 21 人，淘汰一半多人，后来得知，我是医训班年龄最小的学员（14 岁）。我们医训班有队长张树林同志，管理班里具体行政、教学组织等事宜。下编两个班：我在一班，幸福祥同志是我的班长，副班长王仲申，学员有年龄最大的李德庆（比我大 9 岁），往下有：谢满城、马增寿、张世荣、李福才、康惠民、彭哲（泽）怀、王琛、徐俊卿（因肺结核很快退学，他原是译电员）。二班长孙巨川（和老李年龄相近），副班长任作祥，学员有：齐清海、赵忠信、周守义、张振洲、刘文利、刘莲田、裘润杰、刘树生、张春元等同学。每位学员发一个十字挎包（图 8）装讲义之

用，要说特殊，这书包是我班唯一的“特殊化”待遇。

除了我们自己上课外，其他一切活动如：早操、点名、政治活动（每星期六下午为党日）、参加公审大会、开荒种地、反“扫荡”、政治整军开军人大会等，都和部里全体同志一同活动。开课前，我们医干训练班投入紧张的筹备劳动，如垒讲台，抹黑板，横置长木板用土坯支起高低二层，高层当桌，低者当凳，墙壁上还挂了几张生理解剖图，有骨骼、肌肉、消化、循环、呼吸、神经、泌尿生殖、皮肤



图8 书包

五官等系统的图，这几张图，就是我班最主要的教具了，对我们初学者以后对照尸体进行解剖学习，起到有用的感性认识的作用，尤其骨学学得较好，以及肌学、消化系、截肢离断术的作用更为显著。

通过短短几天的共同生活，同学之间初步熟悉了，后来知道李福才由抗大教导队来，李德庆是十二大队干部考入外，其他同学都是卫生人员考入的。点名时，我和马增寿常常混淆一同答“到”，后来才知谁先谁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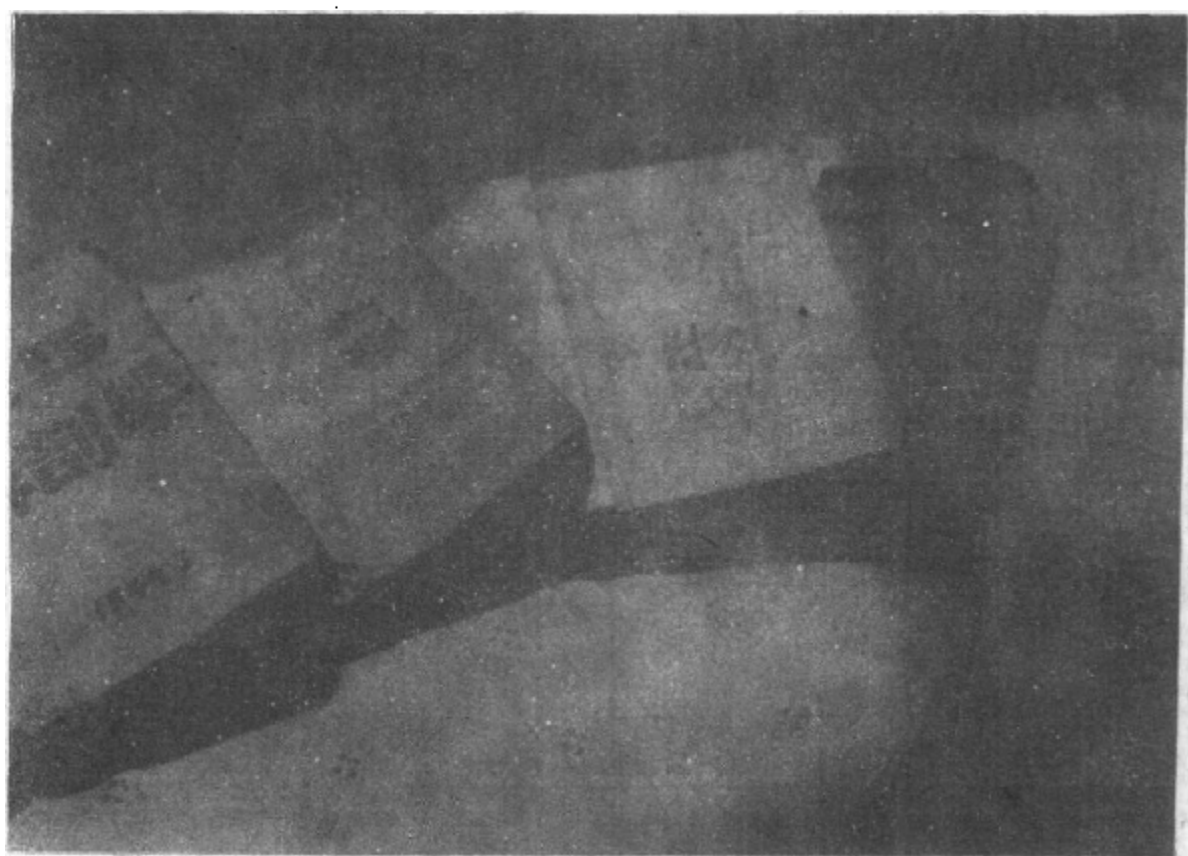


图9 其中内科学、外科学总论、诊断学等讲义，  
后部分都是我们自刻自印的。

1939年8月16日正式在北关村开课。我们全体同学都努力认真学习，奋发图强，白天灌注式，早晚自习，因无灯要早早起床背书，学习生活自然是十分紧张的。开课不久，在北关出现一个有趣的插曲：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命令紧急集合立即出发。我一班出发

去老姑村一所，二班去候各庄二所。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急行军奔赴目的地。途中见老乡们在地里劳动，村里的妇女儿童嘻笑如常，路上常常从对面迎来牲畜驮子……，跑了一身大汗，到了20多里的老姑村，见到所长苑欣斋同志，把我们安排住处后，队长才传达部首长的指示，大意上：“军区来人检查来了。军区卫校也来人了，要我们这两个班去军区卫校，分区不同意放我们，部长佯称我们是看护班，所以赶快分散隐蔽，以保留我医训班”。到一所后，怕军区查出来，改称看护一班。现在证实，确是如此，江一真同志在《河北日报》1979年11月12日纪念白求恩的文章《生命，像火花一样燃烧》一文中写有：“……我们在外科实习周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卫生学校。自各分区卫生队、休养所抽调学员来学习。第一次就集中了500多人，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1940年2月，军区决定将卫校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这件事，从表面看，似属于本位主义，但当时我们同学由衷地感谢部首长这样重视我们，表态一定要加倍地努力学习。后来，军区知道受骗，卫生部也受到批评，处于无奈，将刘文利、王琛二位同学送到白校交差。刘、王二位毫无疑问是白校毕业生，现在领导与权威也得承认他们的学历；然而我们在1979年评定技术职称时，却不被承认学历，实在不算公道！

我们十分崇敬的老师：

尹明亮（图10）部长——长征干部、老医生，是

我们十分崇敬的一位长者，他身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动作敏捷，穿着“考究”利索，操一口江西话，但我们都能听懂，声音哄亮，写一笔流利的行草好字，他负责讲授内科、药物、德文、诊断学等，讲课深入浅出，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教师。后来得知他备课充



图10 老师尹明亮部长

分，讲课认真，要求很严，责任心也最强。他身为部长，每次外出开会、公干，总要先讲完课才走。1939年冬季反“扫荡”，他不仅是我们的部长、老师，而且是直属队的总指挥，人们称他尹政委，指挥全直属队战斗与转移，每日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他不准我班进房内休息，而是命令立即上课，我们随便在个什么地方列队坐在被包上、膝盖当桌子等候他来上课，他多半和我们同时，下马，警卫员牵马等候，他仍认真讲授课程，好像根本没有打仗一样。在既无教室又无黑板的战斗环境下，当然是以灌注式教学为主，上完课，才允许我们进老乡家宿营。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他竟一字不丢地如期完成他所承担的所有教学任务。记得：我们所发的部分教材讲完了，无书可念，部长指示克服困难，自己解决教材。

1939年深秋，卫生部移防到离我村只八里路的曲

阳南家庄村。课堂设在王振铎大伯家的西屋（这时增加了女同学崔健吾等3人，后来她在某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表现得很好）。我们多数同学都参与刻腊版和到树沟村政治部宣传科（图11）去印刷。我们的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物、内科学后面的大部分，几乎都是这一段中印成的。我们就这样边刻、边印、边读，保证了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1940年我班学习后期，尹部长去二团检查工作（驻防曲阳野北村），也要将我全班带去参与工作，这对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是有效的方法。对我们很多同学后来成为医疗、行政管理之才不无关系。总之，尹明亮老师是我们这代人的“引路人”；是造就我们“成人”的最受尊敬的前辈与长者。我们所以学得了一点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本领，是与尹部长的辛勤培育分不开的。同时，他为我们日后漫长医疗生涯里的自学才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孙锋老师，是分区医务科长，他身材魁梧，精明强悍，为我们讲组织、解剖、外科学，他是我分区能够掌握手术技能的外科医生，他承担我们的外科学课程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例如组织学讲得透彻，解剖学中的骨学讲得十分认真，比近代医学院校所授者毫无逊色，所以，对我们班中的一些人，后来能够从事某一外科医疗专业是一块稳固的“奠基石”。同时我们还学了尸体解剖、手术等，取得了不少知识和感性认识。应该说外科在战时是核心课，老师为让我们学好解剖，刚开课不

久，要讲骨学，却无骨标本。他让学生们设法找一副，到哪里去找呢？老乡坟地里有的是，但不能违犯群众纪律去挖人家坟，同学们立刻想到半个多月前刚刚杀掉的我内部奸细，人们高兴地一哄而起借了老乡的锹镐，去驻地北关往北东侧的梯田根部去挖，刨开地皮即恶臭四溢，这种使人窒息的恶臭真是难以形容，尸体已变成了黑褐色，皮硬如革，除项部砍的刀痕及多处刺刀痕迹外翻并腐败外，简直是“硬皮症”无法肢解，但又已经挖开骑虎难下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还是年长点的同学，如李德庆、齐清海等，表现得特别不怕脏臭，戴上大口罩忍受恶臭，用二十九军的大片刀将四肢、头部均肢解开了，由于皮太硬，再无法更细致的肢解，借了大锅在野外架火煮之。数人一班看守，从没想到沸腾的大锅里，头、足分离，一上一下实是难看，一会儿手浮上来，一会儿头又浮上来……，汤成黑褐色，很像炖茄子汤的色泽，所以，我一生不吃炖茄子，每当遇到这种菜，就立刻想起煮人骨而无法下咽。架火看锅白昼还可以，太阳下山了，黄昏夜幕渐渐降临，一边看着锅里煮的不寻常的东西，一边又看到东北方向的尸坑，不禁毛骨悚然。幸有大同学们给撑腰壮胆，才敢继续煮下去，终于骨肉分离，再将骨换碱水煮沸，肉腱已全退，最后清水煮沸，终于无臭了，作出了漂亮的骨标本。同学们如获至宝似地学习骨学，夜间在被窝里还凭触觉学习和讨论。

政治课老师刘易秦，他是东北流亡入关的知识分

子，对日寇铁蹄蹂躏有刻骨仇恨，由于他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高，每当讲到日寇侵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情况，声泪俱下，对我们的感染力极强，他的课又处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内，对我们政治上的成长是很有影响的。

在临床实习阶段，王诤主治医师，出力不小，使我们受益匪浅。还有杨根主任、齐树勋主治医师都为教学出过力。

在我们学习期间，还参加了紧张的军训，口号是：“创造模范铁的党军”。我们的课程，本已很紧张，然而在这一号召下，我们出操、爬山（村北鸡冠山的南麓山头）、紧急集合、急行军（有一次眼看到了我村边）、着装（在北湾子沙滩上一声哨令，都将被包解开、脱衣安卧，数分钟后，另声哨令穿好衣服、打好被包入列），又给每人发边区制造的手榴弹4枚，做好伪装（草帽圈）……。这一段更加紧张，早晚不得“安宁”，消耗体力很大，幸有亲爱的三老姑王秋香，她在二姐家作客，常唤我去吃偏饭，在同学中成为笑柄。经过军训，军事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无论如何也无去年在灵山那段军训紧张。这不寻常的军训，使部队有了质的飞跃，原来这是为全线主动歼敌的“百团大战”做充分的准备，只是我们不知而已。当时司、政、供、卫各部分别驻防西、中、东三个迷城村练兵整训，部队当然更紧张。我们早操常常爬中迷城有小石屋的东山（图12）。着装到八里外的吉祥庄（图17）村边操练，但比



南家庄时有了经验，即先穿裤、穿鞋，穿上衣后立即背起被包就走，边跑边结纽扣，可以大大加快着装速度，否则必定耽误宝贵时间。紧急集合，大多在夜间进行，有时黑灯瞎火将袖子当裤腿穿自然是穿不进造成笑柄！轻装，所有的人事先不通知，紧急集合在大操场，一声令下，一律打开被包，接受首长检查，一切比较笨重的物品，一律不能要，亲爱的母亲庞五亭给我做的一个一尺多宽三尺长的小褥被查住，让处理，我只好捎回家去了。

军事演习，这是最有意思的实战演习。夏收季节某日，天气炎热，正在上课，班长回来传达命令说：“有情况，紧急集合。快！快！”我们将借物送还老乡，临时厕所的荆笆也速拆掉送还，不一会儿部队集合出发了，田兴谱科长指挥部队，尹部长骑马与部队同行。不时传口令，一会慢行，一会急行，一会跑步前进……，累得大家精疲力竭、口干舌燥，直向唐河东的神南村进发，部队稍事休息，还要活跃部队情绪，唱歌、啦啦队。在中午之前，同志们都相信是真有情况，因为部长和监护排都同时行动。待到神南村前，看到老乡继续田间劳动，没有一点慌张迹像，又无枪声，顿时明白这些反常现象是演习。在神南村住一夜，正是集日比较热闹，又生平首次见到了侏儒人：头大如成人，满脸胡须语音粗，但躯体似小儿，次日又回东迷城。事后追问：“是否有人泄密？”人们将所见的反常汇报，部长一笑了之，以示理解。

这年在6.23大会上，司、政两部进行了检阅和比赛，会址在中迷城，主持人首先划分了各部队的防空区，青年们都参加了比赛，有：投弹、刺杀、跳远、队列变换等，除直属机关外，还有警卫连、通信连、侦察连等参加。没想到，这是检阅我们实战能力的盛会，在“创造模范铁的党军”口号下，这样的军政训练活动，竟未引起敌人的特别注目。

当时党组织不是公开的，但谁是党员、谁是群众人们都知道，党员当然要比群众活动更多，如我班康惠民同志还非党员，进步心切曾哭鼻子。因这时已经有了新规定：不足18岁的青年，不能再直接入党了。一般是须先参加青年队，18岁以后才被接收入党。当时卫生部政委肖平，支书即指导员甄维新同志，党日活动抓得很紧，每周六下午过党日，总要开会、学习党的知识、讨论问题、到群众中去宣传、了解当地反动党、团、会道门等，所以，除周六下午常常参加公审大会杀汉奸特务外，每个星期日都不能休息，工作情况向小组长汇报，人们因此而不愿过这个紧张的周末。救亡室墙报活跃，歌咏活动普遍开展，有一名青年干事主抓，记得当时的《黄河怨》——“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唱得有声有色；并学会了齐唱、二重唱，在歌的旋律、音色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的确有了一定水平。还有：《军民一家人》、《死心踏地的坏特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九·一八”小调》、《五四青年节歌》、《我给抗日战士洗衣裳》、《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等许多歌曲，的确是鼓舞士气、激发革命热情，军民团结、除奸反特等颇有政治意义的好歌，起了很好的舆论作用，又充实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也有过“左”的东西，就在那次6.23大会的比赛期间，首次见到地主游街示众场面，游街的人是东迷城绳老墩的父亲，身上拴了许多条绳子，放射状地被人们牵拉着行进，戴着吊死鬼式白纸高帽，上写着游街人的“头衔”和姓名，前面一人敲锣，让他喊述自己的罪过，周围军民围了许多人，他被群众吐了许多唾沫，这个人很久不敢出门，据说他的罪过是反对女儿的民主婚姻。这无疑是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遗风，在土地革命时期是需要的、正确的，因土豪劣绅一贯压迫人民群众，会场就是战场，当众打下革命对象的威风本身就是斗争胜利。但后来情况变了，仍用不变的斗争方式就不妥了。直至“文革”不仅复兴起来，而且达到比任何时期都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左”的不符合《宪法》的行为，因其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也不能以高帽子上的头衔判刑，最后处理还得靠犯罪事实、靠法律。我党有过多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希望不再发生这种庸俗、谩骂式的行为。

由于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党的性质、最低最高纲领，党员义务及支部作用等许多重大而基本的知识，得到了飞速的长进，远远越过“为了抗日”的理论水平而起了质的变化。这对我以后的戎医生涯、理想、信念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对我

们这代人的青少年时期思想定型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优待抗属、烈属中，我们做为当地驻防的子弟兵主动地帮助东迷城乡亲春耕、夏锄，我们与战友刘锡祥的父兄关系很好，故他曾特邀我班去他家帮忙代耕，我们部队不吃不喝只是干活，亲密的军民关系出自内心，不是虚情假意，这种军民鱼水之情与我军民同住在一个院内生活有关，确非今日可比拟。

以后开始手术见习，当时还不会说这个词。在南家庄，村南大道沟东岸王来国的一间北屋，是我们的手术室，中间放两张桌子作手术台，有一次，孙峰老师给前方转来的一位因止血带一直未放而坏死的手做截肢，我们看到这只黑褐色水肿的残手很是恐惧！好在人多老师给解剖开，看了腕横韧带前的掌长肌和韧带内的尺侧和桡侧屈腕肌等。

又一次尹部长作术者，作一个小肿瘤摘除术，当时很感稀罕。我钻得最快、最靠里、最靠前，二十多人围观手术，我站的位置可以说是“雅座”了，但当时“无福享受”，我一看病人是我们张管理员，他右前臂掌侧面长着一个可能是纤维小瘤（切开白色质硬），指大，注射麻药也没看见，当老师用手术刀沿掌长肌纵行切开皮肤时，我已心中忐忑由喜转惊，又见鲜血流出，露出了白色肌腱，心想这大概就是“筋”，不一会，眼黑头晕，咕咚一声栽倒在地，立即有人将我移出室外，便意窘迫，大汗淋漓……，原来是神经性休克了，向旁边一看，还有崔健吾和王仲申也在那里“乘凉”。事后得知，

我3人感觉相同，多数同学笑话我们出了洋相。我确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心想我能学医吗？我能当外科医生吗？敢给伤员作手术吗？……太可怕了。后经两次尸体解剖实习，才敢由远而近并亲手在尸体上操作一下，由恐怖变胆大，由畏难变高兴地继续从事医学学习了。

碰上我入伍后第二次反“扫荡”即：1939年的冬季反“扫荡”，“日寇集中1.8万人以阜平为目标，分七路合击我军。敌虽于11月26日进占阜平，但未达合击目的，敌被迫于12月3日撤出阜平，8日全部退出了根据地。此次作战共108次，毙伤敌4000余人，俘日军13人，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但我根据地遭敌很大破坏，损失严重”。

我们地处三分区南家庄，这时已是初冬，已吃上秋白菜和冻柿子，领到补丁擦补丁的灰色旧冬装。前一天作了反“扫荡”动员，我们照常上课，次日下午队伍紧急集合就要出发了，我跑去看望卧床不起的二老姑（二凤）和亲爱的慈母般的三老姑王秋香（图13），她老人家一听说我要走，眼泪直流，她送出我门外站在临街墙南角处，眼泪汪汪地一直目送我直至看不见为止，谁知与三老姑匆匆地一别，竟是最后的永别（不久，她即患病不语，卧床十来天不吃东西，一动不动地离开了人世，享年57岁。她是我家各代人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父亲为她移墓重葬，我和弟弟长寿曾于1947年特给老人上坟扫墓，至今我兄妹仍十分怀念她）。我们从南家庄出发，向灵山方向行进，老乡们也都赶驴、背

物、扶老携幼打游击去了。

这次反“扫荡”中，显示了尹明亮部长在突围中的指挥才能。他负责全直属队的总指挥，直属队主要是后勤各部、冲锋剧社等，只有一个警卫连是战斗部队，次日，我们自西面的庞家洼、铁岭北向东（图14）急行军，敌人正从南镇北镇向北面的树沟、南家庄、宋家庄等村进发，空中有一架飞机掩护敌人前进。我们听到防空号后，人们欲正常地卧倒防空，然而驰骋在马上尹政委却命令部队向东（套里村）跑步前进！虽然敌机好像戴着“铃铛”似地盘旋，但它毕竟不能下到地面战斗。我们则不管它是否扫射，按首长的命令向东继续前进，约20分钟，我们已越过铁岭北去套里村的通天河滩，转入树沟东坡之后的大道了，尹政委命令警卫连掩护部队转移，警卫连长接受命令后整队喊：“下枪口帽！上刺刀！”跑步上东坡顶控制制高点。仅差几分钟就与北进之敌遭遇，如果遭遇可以想象无战斗力的直属队和气势凶凶的老日本鬼子碰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恶果！由此看来，尹部长不仅是位好医生、好教师，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显示了他指挥果断的才能。

我们在反“扫荡”中，无论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也要保护好书，学员们都知道丢掉了书就象战士丢掉武器一样的重要。

记得当天由套里向北经下三土门、迷城到达候各庄宿营，当晚下了鹅毛大雪，好似毫无风尘，树枝上挂满了厚厚的银花，与反“扫荡”的紧张气氛很不合拍。尹

政委命令每人都要做好伪装（草帽圈），戴在头上或盖在被包上以防敌人空袭。这天部队向西面转移，果然敌机不断骚扰，由于那年大水灾经济困难，发的旧棉衣是灰色的，深一块浅一块的补丁，加上伪装草帽圈，到还色泽和谐，有益于不暴露目标，冲锋剧社的同志们受到特别优待，给他们发表里全新的绿棉军装，反穿之，一崭白色与雪无异，一路上多次防空，敌人未能发现我们的踪迹。相比之下，120师穿黑灰色军装，不时与我们交叉相遇，由于他们的衣服色深，在白花花的雪地里目标大，所以，常遇敌机俯冲扫射，受到一定损失。

这次反“扫荡”跑路不少，经唐县（行营沟）至曲

了正常学习，直至结业。

由于蒋介石蓄意与我党摩擦已达高潮，去年又遭水灾，经济困难。《晋察冀概况》第32页说：“三九年夏秋之交连日暴雨，河川泛滥，北岳区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灾。……接着又是秋季“扫荡”。春天一来，人们没有吃的”中共中央提出生产自救克服困难的号召，各部队积极响应。

我卫生部刨地开荒种谷子，实际我们未及收获就参加“百团大战”了。那时已有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队，他们发动了开荒比赛，年轻人虽然饭量较大，但劳动效率和成果是显著的。我们全体同志去东迷城南沟开荒，管理科长田兴普已将任务划分了，监护排、医训班是主要劳力，我一、二班即一二青年队，各分一个山坡，情绪热烈，提出轻伤不下“火线”（我左手无名指肚被砸成两半，还继续刨地不止，受到表扬，至今仍留下一个“光荣”的小瘢痕）。一、二班除啦啦队互喊一些比赛口号外，还齐声互喊一些病名、药名如：Tetanus、Malaria、Camphor Depulata、Morbiry、Cascara Saglada……等，监护排、看护排还对我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们还自己种菜，早上起来，抬着尿罐去浇菜施肥。开荒种地短暂的实践，为我们渡过1942年的灾荒和后来的大生产运动增加了感性认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进行了见习实习与临床医疗实习：

1、部里及老师为使 we 增加才干，通过军法处先



后拨给我们两具处决后的新鲜尸体。第一次在一所驻地古洞村南的药王庙内进行尸体解剖，由孙锋及王诤医生主刀和简单的讲解。我接受南家庄看手术休克的教训，未敢太靠前，后来觉得并不害怕，也随之作点什么操作，通过这次尸解实践，胆大了，更加深了人体系统的解剖知识及兰尾摘除、膝关节离断、留腓骨之截肢及截肢术等感性认识。夜间看尸也是一种意志锻炼，尸体在药王的正殿存放，我们怕野兽损坏尸体将殿门关得好好的才去南侧配殿休息，睁眼看见泥菩萨，闭眼睡不着，李德庆同学年龄最大胆量也最大，同学们都佩服他。

第二次是夏初播种前课程接近尾声阶段，在东迷城大店解剖一具新鲜女尸（图 17），女尸是很少见的，战争期间也很少见。当然除对女性生殖器官较前次有所感性认识外，其他方面仍无超出前次的水平。不过老师讲的、示范的外科知识很少；否则，收获会更多些。

这两次尸解实习无论如何也是党和首长对我医干训练班的特别照顾，无疑，对我班学以致用、学用一致是有益的。

2、当时以杨根主任、王诤和齐树勋医生等为主，利用东迷城大店改建成“阔气”的病房，有外科室、药房，还有直流电皮肤理疗机一台，院内树荫下土制的“胖椅”（沙发）也是很时髦的，可惜雨一淋就完了。在这里将我们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记得伤员指导员朱云生的上肢截肢（未让我们看手术）、甄凤山大队长的“霍乱”（可能是急性胃肠炎）都是在这里抢救成功

的。同学们除用部里自配的生理盐水互相练习静脉注射，往往因配制的质量不佳引起低热无力。同学们抢着去给病人注射，尤其静脉更感兴趣。学习听、打诊和操作理疗机，大多情况每天跟王诤医生查房学习。

3、接近毕业了，大家加紧看书、复习迎接最后的考试。灯油又不多发，照明困难，我们每天自动早早起床，大约4时左右就起来看书了，天还黑洞洞看不清字，就先背昨天的课，稍亮再看新内容，我们的这种举动引起了领导的关注，张树林队长劝我们要注意身体不要垮了。也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感慨，二班小房东早早起来赶驴在驮什么，看到我们这种忘我的情景，他说：“增寿，你们学个医生可也真不容易，太辛苦了！”我们军民小伙伴相互谦虚的勉励几句后，继续看书不止，当时又无表，好长时间之后，才听到起床号、早操号，再去参加集体活动。

有一天，队长透露说：“有任务，要很快毕业。”大约八月初的某天，进行总考试，我记得药物、内科、外科、诊断、德文……门门考试，我均由于平时接受较快复习彻底而无何费力，最后名列第四，圆满地完成了医干训练班的学习任务。

八月上旬的一天，隆重毕业典礼，还有新调来的周副指导员，书写张贴欢送标语并领呼口号：“庆祝干部班胜利毕业！欢送同志们到前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由于部里全体同志参加，田老健家的教室已盛不下而在院内数行纵队坐着开会的。我们全班同

学，虽然学的内容、时间相同，但分配的职务却不一样，可能主要根据我们所学习的成绩、个人经历、年龄等有所不同。分配的有医生、见习医生、医助、司药、看护长等。虽然我们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紧张学习同窗一年并和房东们相处密切，依依难舍，但为了战争胜利，二十来人分别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

当时，我个子虽然长高了不少，但只15岁，可能嫌我年龄太小及一位个子最小的刘树生同学，没有立即分配工作，仍跟王诤医生每日治疗不止。但很快我八路军战争史上一个壮观的时刻“百团大战”打响了，我班虽然人数不多，但立即成为战伤救治的一支生力军，投入了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这时我想到了为何部首长去年不把我们上交军区卫校？原来是“百团大战”在等待干部。感到本位主义虽然不对，但也确有先见之明！

前方医疗任务繁重，一天，尹部长通信员将我唤去，部长说：“分配你到‘兵站’医院第四休养所去工作。”我毅然同意，表示毫无疑异地服从命令。部长立即写了亲笔介绍信给田学文所长、智定邦指导员，大意是“兹介绍王增寿同志去你所任见习医生，请接洽。此致布礼（布尔什维克敬礼），部长署名和月日”（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我立即整理行装打起被包当天出发，奔赴阜平县平阳镇四所去报到。我想：我受党和八路军如此艰难的培育，应报恩党和八路军及老区人民，立志为伤病员诚实地服务一辈子，以对得起党和人民！从此开始了我终身职业医生生涯至今。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正式”学医任务，构成了我戎医生涯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回想这段经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因为我们要学到一点为伤病员服务的知识，是多么不易！我医干训练班自然谈不到“正规”，与现在的医科大学相比固然形式迥异，但它是在敌强我弱困难重重战略阶段解决战时医疗任务的真正的实体；它对战争贡献之速、之大是现今医学院校所无法比拟的，只以“百团大战”我军区自己的战绩来说，共消灭4900多敌人，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等战绩，就都有我班每个成员的一份力量。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任何人也勾不掉的历史。

综上所述，我医干训练班可以得出以下结语：

1、它是在敌强我弱战略阶段边学习、边战斗、边整训、边生产的产物。从而为抗日战争增添了一支医疗卫生工作的生力军，完成了大量医疗任务，忠诚地为战争服务，保证、支持革命战争的顺利地进行。

2、医训班本身证明，在战斗间隙、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也可以培养医务干部并取得了成功经验。

3、由于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所以可达立竿见影效果。它的贡献是肯定的，而且是可以和任何医学院校相比拟的，例如1943年我们已可担当截肢术的术者，完成截肢、离断手术，正规大学生也不过如此而已。

4、医训班不仅使我们学到了为战争服务的必要医学知识，而且提高了每个成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质，培养了我们放到哪里就在那里，叫干什么就

干什么的良好品德。使我们成为有医学本领，有坚定抗日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理想的人。

5、医训班为它每个成员日后的自学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自学达到相当可观的政治水平，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如“流行病学、中医学、烧伤治疗、心脏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阶段等。

6、医训班成员大多成为我军（及地方）医疗机构的骨干、出色的管理专家、医师。大至军区后勤卫生部副部长（李德庆）、分部副部长（赵忠信），最小也大都带“长”字——处长、院长、站长、司药长等，这已为《硝烟弥漫中的白衣战士——华北卫生人员名录》一书所证实，我班20人中已有齐清海等8位同学书上有名。

### （五）自学的回顾

已往的50多年中，除参军后医干训练班系“纯”学习机会外，主要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学习与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医疗技术水平的。就连先后二次外出沈阳医学院（图20），阜外医院（图21、22）进修历时两年零五个月，也同样是通过亲自管病人的医疗实践提高医疗技术与医生素质的。当然首先应感谢党给予了我实践的机会，同时外出进修也是工作的需要。

进修中有时为了搞清一个问题，要化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如在普外科看扎脾动脉的方法，甲亢的知识，骨科的速取骨片方法，窥膀胱技术的“诀窍”等等。所以

我学到的知识，回内蒙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内医”在学院的实习同学和下级医生等。在十年内乱的“文革”期间已证实整我最狠的正是其中的某些人，还有“内医”六〇级乌盟班，我院护校红卫兵，对我们的无理造反就更别提了，因他们虽是“造反先锋”，但也是受害的群众。某些人对我大打出手，使我非常寒心，因有的人是我自己精心



图 20 作者在沈阳医学院  
(第一附院) 进修结束前  
(左 1 是作者，  
1959 年 7 月于北陵)

挑选，并加以重点培养，我们完全为了事业，丝毫无愧于同志，为何适得其反？至今未全解。值得继续研究，因每代人都会遇到相同问题，希望政工专业予以解疑。但我相信技术的传播本身以及无论传给谁，都对人民健康事业是有益的。

古人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同意这个



图 21. 1964·胸心外二科进修生在阜外医院  
(后排左二是作者)

观点，我相信这一哲理，无论小学、大学，任何程度的任何人都适用。如小学水平不再学习，不仅是科盲，而且会倒退为目不识丁的文盲，如再继续不停地学习可以提高文化技术水平，攀登科学高峰。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有种种不同，有凭门子的大学生，也有在校成绩优异的高才生，无论谁，他不再继续学习，或已满足已得之文凭，也会以老卖老变成知识落伍者的。所以，自学对任何人都是严肃的课题。

回顾我的自学内容、方法、主要措施，老实讲，就以获得现有这点知识也是很不易的。我的情况是：

1、由于老人的关怀培养让上小学，在赵鸿业老师的培育下，打下最初步的文化基础。以书写汉字来说是



图 22 阜外医院进修医师结业留念 1965.8  
(前排左 4 系作者)

很不像样的。还是参军后在文书徐光同志的指点下，懂得了方块字的书写要领，使飞跃地有所进步。（我将此知识传授给很多同志，如看护员高福进就进步很快）。

2、无论在部队工作还是转业到地方，只要有补习文化的机会，就积极主动的参加。如分科医院的文化补习，集宁师范组织的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我都积极参加，尤其后者是占用别人还在睡眠中的一个小时——上午 4 点半至 5 点半借四小教室上课，别人快起床了，我们也下课了，白天的正常医疗工作、医院管理工作均不能受任何影响。这一时期我的古文、文法、代数、平面几何、初中化学、作文等都有所进步。

3、纯粹自学，主要是在包头东门外后方医院期间，



体会到初中课程自学是完全可以学会的，这一段我将数学中的应用四则、分数、繁分、三角、比例、代数、母子和与差、百分比等均自学成功了。但学到高中解方程后无人指教，同时工作繁忙，自学即遇到了困难。

4、读报、读杂志（当时太少了）如《熔炉》；读哲学历史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著《通史》四卷及《近代史》等；甚至来自敌人方面的书籍，如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及我们《评中国之命运》，闫锡山的《兵农合一》等，都对提高文化、政治水平、社会知识等方面，获得了必要的知识。读古今小说的优秀文学作品，经过几年的自学，由正适合口味的《三国演义》，逐渐轻易地读懂了较难懂的《聊斋志异》，这说明文化程度在徐缓的提高，前进的动力是自学。

5、医疗技术的自学要比学习文化、政治、社会知识更要花费大的精力。学以致用、学用一致是我的学习宗旨。学习为了战争，又通过战争学习战争。虽然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主要困难是无书，获得一点知识真不容易！为了克服无书读的困难，就只有自己抄书（附书末）学习，我的《集前》、《医务杂录第一集》上分别抄写了白校教材眼科学、绷带学、妇产科等知识，即可见一般了。

抗战期间，我曾获得一本《局部解剖学》如获至宝，这样大的篇幅就免得自抄了。该书末我又将1943年—44年在台峪安王庙一所期间的技术练兵材料——麻醉、四肢、疝、痔手术等材料，订为一本，随身携

带，对我医生工作贡献很大，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均未离我身，如：1945年8月西进山西大反攻，在大雨滂沱急渡沙河的险情中、1945年10月我军袭击阳泉车站，敌人对我机枪扫射中……，它都未曾离开过我。尤其以后学习解剖知识对四肢手术的参考中，起到非凡的作用，所以它是功勋图书（参见图41）之一。

6、作日记：写日记是自学文化知识及写作组织能力的好方法，起到锻炼写作基本功的作用。我一生写了不少东西，可以说大都源于它的基础，所以对我一生医疗、医院管理任务的完成都是有极大帮助的。为了节约综合分析时间，特将我的《集前》、《作日记》两文列后参考。

### 附：我的《集前》集

我有一本严格讲不称其谓书的《集前》集，早在1962年对它的各部份自作了“插言”、“后记”之类的注释，但我认为它是并不全属于我的，而是我党我军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集前》（见图24）的全书——从包书皮的边区报纸至全书每一篇的内容，都可谓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物”了。它是我已丢失的财产，后在1960年父亲从老家找回内蒙，故我甚为珍视，因它的各方面都对我有鞭策，自感深思和不能忘本。如：

环境艰苦，难以想像的低劣条件；  
渴望学知识的欲望；  
“工整”而认真的书写；  
虽苦而乐观主义精神；  
鱼水般的军民、上下级、工休关系；  
自力更生，连它本身的成形及墨水等，无一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所以，它显示我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无不胜的微小体现。

前三分之二，主要是抄别人的书，从1941年唐县豆铺村四所驻防时开始摘抄的。都是前人的经验（知识），现也已很少参考价值。当时年龄虽小（十六岁），水平幼稚，但已有初步选择对工作、生活有益内容的观念了。年幼求知欲炽盛，渴望学习又无书，就只有抄书学习，才能在艰难条件下解决学习的欲望。

后三分之一麻纸部分，所记东西不多，但大都是我自己经验的雏形综合。它们的实用价值已大部消失，但它对我的鞭策作用是：那样的艰苦条件还拚死拚活地忘我学习，然而现居高楼大厦优越的天堂之中，书林文海与无书读的过去，简直是天渊之别了，如再不努力学习，实在是对过去的背叛了。可惜年龄不让人，但不能忘记过去，不能自己不学习，也不能不促使别人学习，这是我八路军战士自应有的毅力与品格。

注：《集前》上虽未反映于纸面上，但我这一时期的最高技术水平要算截肢术了。第一例是1943年在阜

平台峪第一休养所工作时，为一位严重手炸伤的绰号“外国能”的铁匠作前臂截肢术的。

### 附：《作日记》

作日记即是写文章，因以日记事，所以是天天不间断地写文章。我是从1941年4月23日开始连写三年多。

任何事物都是由浅入深的过程。由记“流水帐”，通过战争实践，逐渐增加了实践斗争、思想的深化及工作体会等。日记的内容及写作方式、组织能力，都随作日记有了很大提高。

记得，起初由只记月、日、星期×、晴、阴，后增加了一个括号增记阴历月日，内容杂无章绪，实在是食之无味的“豆腐帐”。

在1941年秋季日寇七万大军的大“扫荡”的三个多月中，写了不少东西，曾记得用地图形式描述了白花山南麓的战斗经过，可惜均已散失，否则，将是有价值的战争史料。写了不少感想，并将儿童时期记忆特别深刻的往事——送水庙会、春节画灯谜等，做了清晰的回忆，突破了豆腐帐的旧框框，它是那时只有16岁的我的少年时期的可靠记载。

写日记占据了我宝贵有意义的战斗空隙，而且一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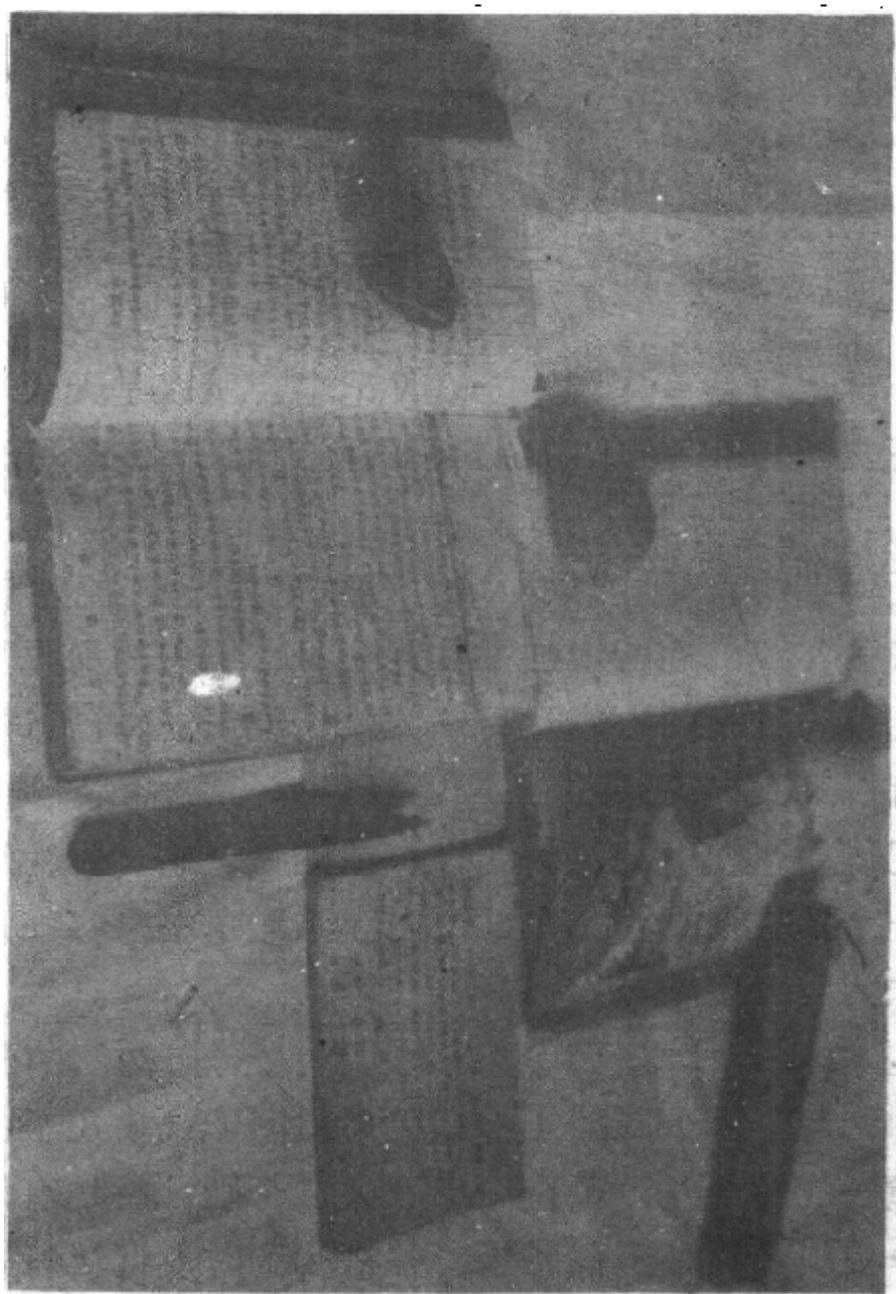


图 24 新民水笔（〈集前〉上、〈医疗杂录〉左下、  
〈胡琴大谱〉右上、口琴）

是用一只自 1940 年就开始使用的“新民”（图 24）水笔完成的，直至今日仍在为革命工作服务。我打算将它传给孩子，做为永久纪念，或许对孩子是一激发向上的动力。

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文章内容的主题上。事先想好要写的中心内容，根据内容的核心命一恰当的小标题写在文首，然后叙述。这时已感到了写文章的欣快感。曾记得我休养四所驻防平阳时，为副指导员庞鸿生写他献血给伤病员作蛋白刺激疗法的事迹就是一例。

1942 年日记中更增加了歌曲、图（绘）画，特别是中迷城操场东面的小山及武家湾西坡看到我家乡的一连串的著名标志——尖沟尖（猴儿山）、钹子山、鸡冠山、莲花山等素描，极为逼真，达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

另外，写作能力的提高，与读古今小说等文学作品相得益彰，它对突破流水帐大有积极作用。因为在小说里可以学到不少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都对漫长的人生是有用的。旧小说有很大魅力，对我影响最深刻的要算曹雪芹的《红楼梦》及张恨水的《现代青年》了。

用于医疗实践后，很自然地为了寻材方便，增添了目录，随写随将页数编好，直至成为一本书，随时可以查找需要的资料。

以上，是我写日记的一般过程，也是自学者在社会工作所必需的一段基本功锻炼过程。它对我工作能力的

提高（计划、预见性），对我一生至今的社会实践，起到基础文化知识的作用。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后，多亦利用了这一基础知识。再将实践的直接知识及所见所闻的间接知识分别录于不同的集子上，使之更有条理、更有系统地为工作服务。

总之，这一切，都源于作日记的影响，所以是作日记的继续和发展。我对作日记的总体会是：

①天天作日记，即天天写文章，天长日久即可提高写作组织能力，由“流水豆腐帐”至能触景生情，应视为是一飞跃，但还不够。仅这一飞跃对自学的人来说，也非一蹴而成的，必须经过一翻的艰苦磨练才能达到。所以，作日记是提高文化和写作组织能力的良好方式之一。

②何以它能提高工作能力？是因为写日记与工作实践紧密相联。这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观点的。文章源于实践。所以，要打算做好一件什么事——即写一篇什么有意义的文章，就要心中有数由浅入深地去按排：计划、步骤、方法，总结，即题纲、内容安排与提炼及综合功夫等等。虽然常有失败和变更计划的事，但可胸有成竹地去指导工作，以达到欲争取达到的目的，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也要经过由浅入深的锻炼过程。以小比大，道理类同；否则才是不合逻辑的幻想，相信它是真理，因已被实践所证实。

③应写出好文章，只有此愿望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对待事物的正确立场、观点，有自己的观点，才能爱憎

分明地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但后者，因限于头脑中的知识贫乏、局限，往往不易或不能达到。必须善于学习，才能在前人的基础水平上创新。与其它事物一样，一定也有其认识发展过程，出现不完善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及时觉察和修改纠正，甚至有时全篇取消亦不可惜。

看小说，开始只为消遣，后来渐体会它就是在学习文学知识，它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知识，有些知识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自1948年在张家口首次看电影《波兰游击队》后，逐渐加多看电影。感到认真地看电影亦可收到与看小说同样的学习效果 and 目的，但印象之深远逊于小说。电影的最大优点是省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一本小说的精华。当然印象之深浅，是与作品的质量成正比的。小说，除费时外，还有很多优点是电影所不及的。

总之，作日记是幼年时代不可缺少的一课基本功，奠定文化、社会知识基础。尤其对文化低而自学的人更为重要。

作日记能锻炼独立思考、提高写作组织能力与工作能力，对日常工作实践的预见性、条理性奠定基础大有益处。已为我已往四十三年实践所证实。

(该文原作于1961年5月于内蒙古集宁)



## (六) 自学的心得体会

1、自学本身可称其谓一门学问，既是自学，当然主要是自己凭借独立思考钻研学习，而且要善于“不耻下问”请教高明，以加速自学速度。

由于自学，当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和毅力，只有自学才有可能与正式上学的人同样掌握知识，无知识有再大的决心也是徒劳的。

毅力来自要做好医生工作的决心和信念。实践证明自学可以获得无逊于“洋”大学的水平。

2、自学可以有所作为——现在的语言叫做“自学成才”，可以胜任无愧于任何人的所谓高级医生，而医生又是与护士、教师相类似的光荣职业。

有无文凭无所谓，有当然好。学历是我们过去（及现在一直）渴望的，但这种学习机会权利被无情的战争剥夺了，因而只好自学，付出双倍的劳动，才能获得与文凭同级的知识，服务于革命战争和人民健康，所以，也同有文凭者一样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们并不讳言，有的“高知”是人家刻苦学习与师生共同努力获得的硕果，“文凭”是象征这种努力的结晶。我们也不讳言，自学者也有不成才者。

我本人已获得主任医师的技术职称并受聘，但我得出结论：文凭≠水平，水平=文凭，自学可获得水平，因而也可获得实际存在的“文凭”。

3、作日记可以融汇为经常性的总结经验，它是提高写作、工作能力的重要方法。是积累资料和某项工程素材的重要措施。

4、依靠自学可以完成“洋”的同样“工程”，如：战伤心得、骨科成果、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及流行病学研究等“工程”。这无疑首先来源于对医生事业的热爱，回顾以往，虽遭受过严重打击，受过不白之冤，直至1983年12月9日才予以平反，身心受到莫须有的迫害，甚至爱人也遭株连……，但一直未能动摇我热爱医生职业，终生从医的决心和毅力。相反受到医护同道、广大伤病员及驻地群众的同情和爱戴，并倍加谨慎的努力工作，接连受奖。我最早最高的一次奖赏是1950年10月10日绥远军区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的奖励（附书末4）。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鼓舞斗志的格言，但我体会有志者要想完成的目标，因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都是有志者是肯定的真理。而且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得出：“医生决不可脱离临床”的信念，并永远忠于这条信念。所以我认为理想、信念是精神支柱，力量无穷。

我们自学者，同样可带出品学兼优的有出息的同志来。少年时医训班一结业，即带出了一个王永海同志。以后毫不夸张的讲，医护人员受我们教益者，不是成十而是成百上千是肯定的，如内蒙医学院同学史玉文离开数年后，仍念念不忘想来我院我这个上级医生指导下工

作；（当然在“文革”期间恩将仇报者也非少数，如“内医”医疗系六零级乌盟班就是这样的红卫兵大学生，他们是造反的群众，也是受害最大者，他们不尊重老师，是肯定学不到应获得知识的。）

5、实践出真知，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真理。我认为自学的本身这一主要活动，就是重要的实践，因而，自学也是出真知的必经过程。所以，自学本身即实践，自学就能出真知。自学与实践密不可分，相互转化。

自学是我一生工作的支柱，回顾全过程，自学占据我主要活动的重要地位。自学没有任何省力的窍门，而且还要化费比正式学习者成倍的繁重得多的精力与劳动，才能获得和人家相同的知识。但当证实自学的知识和“洋”的相一致，甚至有某些创新特点时，则有说不出的喜悦和乐趣。例如：对骨与关节结核中的脊柱结核我创用 S 形及弧形皮肤切口还早于天津骨科时<sup>①</sup>；窥膀胱自学插管成功及大、小循环图解洞悉并应用于临床医疗实践时；等……。

自学是永无止境的，直至生命结束也有急需学的知识，只是学习的目的、手段、方法不同而已。自学犹如“马拉松”，要有目标、有速度，最要紧者是毅力。

我要遵循敬爱的周总理教导的“活到老，学到老，

---

<sup>①</sup> [注]：我们最早于 1970 年 11 月 11 日创用 S 形（及弧形）皮肤切口，用于 T9—10TB 截瘫已两月及 S 形脊柱畸形女患，（张粉莲，38 岁，农民，住院号 10，内蒙察右中旗西营子乡二道凹村），在全麻下经此切口同期行脊髓减压、病灶清除、脊柱固定术。术后次日痛觉恢复，足趾能动，下肢发热，次年 3 月 12 日随访双下肢已可自由活动，但仍未离床。从此，我院即一直使用弧形切口，同期完成双侧结核手术。天津骨科医院编《临床骨学科》（二）结核，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4 年 4 月 1 日第一次印刷之第 229 页才有弧形切口的描述。

改造到老”的方向奋进！

###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中的休养所

休养所就是当时的医院，“休养”二字似与战争不谐，但仍须遵循历史沿用“休养所”一词。

当时以聂荣臻司令员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多数处于山区。而我们三分区的“堡垒”又是山中之山的——白花山、神仙山等，我们医务工作者，在山里为战争坚定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前已述及1938年、1939年每年一次小的反“扫荡”外，从1940年以后，我们经常过着《鸡毛信》样的战斗生活，驰名全国的华北大“扫荡”——“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我们边区。以冀西言，40年、41年、43年三年四次反“扫荡”，环境可谓恶劣，战斗可谓日趋残酷，但却为我晋察冀以至全军光辉战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具体到我们，实质上乃是：怎样在山地办医院？及医院怎样适应任何“正常”与非常情况下医疗工作的问题。

前方救护与“后方”医疗本是相互分工联系、互有交叉不能完全分割的整体。尤其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抗日战争，前后方都是相对的，特别在敌强我弱的反“扫荡”战中，敌人疯狂地深入我边区腹地，“后方”如没有武装保护反无前方安全和机动灵活。但我们

都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有边区父老人民群众全力无私的支援，都获得了战争胜利。

### (一) “百团大战”与休养所

我军战前在开展“创造模范铁的党军”号召下，加强了军事训练，学习连环画〈李铁牛〉，使我部队的军事素质及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日本鬼子和他的走狗汉奸、特务竟未发现我军立即要发动一场消灭它的大战役，昨天还看不起我“土”八路，万没想到一夜之间它却大难临头——1940年8月20日夜10时“百团大战”打响了。

我三分区军民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战役，百团大战的伟大功绩，虽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的恶毒诬蔑诋毁，但同志们英勇参战主动杀敌的革命精神，震撼威慑敌伪的作用是无法抹煞的。“百团大战”一词却成了战友们引以自豪的象征和动力。

事实胜于雄辩，仅我军区的近处南边石太线、北边的灵丘、广灵、涞源，就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战绩，敌人的许多据点被我拔除了、铁轨翻过了，公路不通了，后来我参战民兵为节省人力赢得宝贵时间，找到了破坏交通的新窍门，就是挖掉一半铁路或公路，使其悬空软硬不等，敌军车辆同样无法通行。敌人最重要的大据点井陉煤矿被我军攻克。我部队的所有成员多少都有胜利品一皮大衣、军毯、大皮靴、皮裹腿、饭盒、雨布等，最

少也有 1 顶日本栽绒帽或直筒毛袜。边区军民欢欣喜悦自不待言。

回头看，这次由 115 个团参加的大战役是战果辉煌的。《聂荣臻回忆录》（505 页）说：“根据北岳、冀中和冀西三个地区的战后统计，军区部队在三个半月连续战斗中，作战 330 多次，毙伤俘日伪军 4900 多人，缴获各种炮六门，长短枪 900 多支，弹药十万余发，还有大量军用物资”。“从整个华北战区统计数字来看，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过程中，各战区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 1800 多次，毙伤日伪军 2.5 万余人，俘日军 281 人，伪军 1.8 万余人，拔除敌人大小据点 2900 多个，缴获各种炮 53 门，步枪马枪 5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铁路 900 多里，公路 3000 余里，桥梁、车站、隧道等 260 余处，使正太路中断一个月之久，给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最重要的战果，则是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不同，是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的，抵抗得十分顽强（354 页）……死不投降，……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355）”，实际这些亡命徒是日寇武士道精神的牺牲品。

由于敌人遭到残败，立即对我进行报复性“扫荡”，也反证了“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和意义。

## 1、兵站医院在平阳，医生路上开步走

我从医训班刚毕业，“百团大战”打响了，这时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为战役服务，八月底，我接受尹明亮部长的命令，并持他的亲笔介绍信，毅然奔赴第四休养所驻地的阜平县平阳村（镇）报到任见习医生，从此，踏上漫长坎坷的医生职业之路，直至暮年的今天还在走，我饮水思源，为报恩党和老区人民，无疑一直要走到人生尽头。

四所是个新成立的医疗机构，所长田学文、指导员智定邦、主治医生权立、副指导员庞鸿生等同志，下属一个看护排，共六、七十人的单位，在平阳承担前线下来的伤病员的中转和治疗任务，（军区兵站设在阜平城南庄）。记得所接收的伤病员除打娘子关我二团的伤员外，都不是三分区部队的，有平山、井陘等口音，说话不大懂，同志们管他们叫“老西”，也有军区驻地阜平的病人住院，如晋察冀边区银行的老宋即当时住院病人之一。

接收的大多是坐担架的重伤病员，骑牲口的轻病人很少，所以对这一批批伤病员的接诊（分配与住进病房）及巡诊（查房）任务很大，当时换药由外科室担任，而权立医生和我负责全村病人的查房、开处方等诊疗工作，我在医训班所学到的知识，都得到了应用，对临床工作起到重大作用。如没这次学习肯定是难以想像



的。至于负责担架队指挥、招待等管理工作，任务也是繁重的，都有行政工作同志负担了。

在平阳大约住一二月，一批批的伤病员，多半经我们治疗几天后，就派看护押担架转往一所和别所去，留下的伤病员我们一直负责治疗到底。

值得提出的是：(1) 我们指导员智定邦（后改名智钧）同志，是一位战争时期难得的知识分子，他是山西五台人，在太原学记者的，操一口标准的五台话，他写的速写符号我们都不认得，他还有一杆粗如“小棒锤”似的水笔，感到当一名记者很不简单。由于他的督促及组织人们投稿，我曾写了我所副指导员庞鸿生同志自愿多次献血，供医生作异性蛋白刺激疗法的先进事迹——即将人的静脉血注入病人的臀肌，以期达到发轻热，增强病人机体抵抗力的疗法——，表扬他模范行为团结友爱的高尚精神，曾被当时边区《抗敌三日刊》（后改“子弟兵”）选中，前后数次刊登了我的稿子，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稿被刊登。我后来在智指导员的具体指导下，很快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及青年、组织委员等，终于成为他的一名助手，这与智指导员的亲手培育是分不开的。另外，我感到他对我后来的作日记、对我主动自学是有积极影响作用的，因而智定邦同志在我幼小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是我的战友，还是我的启蒙先生。

(2) 我怀着对党、对八路军、对老师、老前辈尹明亮部长的崇敬和报恩心情，想在艰巨繁忙的战伤治疗任务中努力加倍工作，未料到，身体不做美，在我本来即

患疟疾的基础上，加上忙累很快复发隔日疟，尝够先寒、后热、再大汗淋漓的发作滋味，身体虚弱贫血，脾肿大，腹部膨胀进食困难，加之又无特效药 Chinin Hcl，所以身体很快垮下来，但无人仍须坚持工作。只要疟疾不发作就工作，发作后立即爬起来继续工作，甚至连洗自己一件衣服，也感到十分吃力和勉强。除了工作同志，就连当时住院的老宋也常来看望我，并帮助我在疟疾发作时候打病号饭，所以就认识了老宋，临别他还送一条双笺绿帆布腰带作纪念，遗憾地只知他是冀中人，但名字已想不起。如此亲密的工休（医患）关系，至今难忘。

在平阳这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感受是：①兵站医院必须设在交通枢纽上，才有相应的机动性，适应伤病员承前送后的任务（同时又有后方医院性质的日常医疗工作），忙起来不可开交，但将这批伤病员转院之后，就相对轻闲一些，可以说是节奏的，但这个“节奏”的主动性不在我们手中，而是受战争（具体战役、战斗）所左右。我一生做过几次大小不等的兵站医院工作，这一初步尝试，对我前方战救尤其解放战争全过程中及抗美援朝期间大量接收伤病员起到感性认识作用。是一次实际的战斗“演习”。②遇到智定邦同志这位好战友，对我以后人生的自学本领，为党服务的主动性，起到启蒙作用。

## 2、为“百团大战”服务的医疗工作

我四所是分区卫生部下辖总院五个所之一，严格讲，在抗日战争敌强我弱阶段不存在真正的后方医院，而相对的“后方”医院、休养所的组织形式是经得起战争考验的良好形式。

“百团大战”进行中（中秋节前后），我所奉命迁往唐县宋家峪，二地相距数十里，记得转移时，担架、牲口驮同行，我所带休养员一同转移到达目的地。这里最突出的是军民关系情同鱼水，工作十分忙累。

宋家峪地处白花山南麓交通枢纽娘子神村东侧 5 里的大道旁，有情况便于向山上转移，全村人家 100 多户，葛姓居多，全村南北向，伤病员几乎布满全村各户，为消灭日寇方便我军，乡亲们都腾出房屋给伤病员住。这是我参军后甚有印象的驻地之一。就以我的房东来说，所部及我二位医生同住葛金库（大名文玉）家，（见图 26 至图 28）记得当时只金库家就住了 30 多人，大娘全家 5 口挤到东屋北头，其余所有房屋都由我所所部、医生、伙房及十来名病员居住，每日在院子里开饭，军民几十口人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嘈杂，然而房东刘青春大娘总是和蔼相待从不嫌弃。大娘的子女三人中儿子金库最小，大娘对我二人常以长辈相待，所以后来我们以兄弟相称是再贴切不过了。两个女儿桂成桂恩，后来大女婿病故桂成改嫁到豆铺村，次年我四所曾

移防豆铺，常见到大姐十分亲切，可以说那时的军民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用鱼水关系形象的比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南屋西头是病人居住处。金库妈刘青春大娘说：“小王医生才十五岁，比俺金库大一岁，也是个孩子。”（后经其孙女葛欣证实，我比他父大4岁，大娘刘青春娘子神村人）。后又搬到双举家住，双举妈每



图 26 唐县宋家峪小房东葛文玉（金库）弟

当我疟疾发作时常可怜我无人侍候，所以不断地给送一碗白粥或杂面汤等饭给我吃。宋家峪距赤岳村5里，他们得知岳父姓名就更加亲切，桂成大姐、禄琴等人还常常逗逗打打开玩笑。然而这些房东亲人均已离开人世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终生难忘，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不胜涕零！

主治医生权立同志患了肺结核，发热、咯血、盗汗回完县老家休养，又调不来人，只剩我一人带病工作，还常发隔日疟，所长还让我每天教会曲阳与我同龄的王永海同志一个药名，会读、会背、会写，不久王永海可掌握100个以上的药名，能够胜任调剂员的工作了，也是我生平首次教学工作的尝试。

一批批接收伤病员最高峰时达400多人，绝大多数是“百团大战”下来的伤病员，这时正值我军进行涞（源）灵（丘）战役，故要收容涞灵战役的伤病员。据



图 27 我 51 年前住过的旧址——1940 年秋三分区  
第四休养所驻防唐县宋家峪时，  
我即住在葛文玉弟家南屋（背后）

聂帅在其《回忆录》提到：“涞灵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同我们争夺相当激烈，它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边区内部。展开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扫除这些据点，使根据地更加巩固”（500 页）。这次战役是一团、二团和三团打的，9 月 23 日扫除了涞源城东三甲村据点，同时三团集中力量攻击东团堡，战斗十分激烈，同敌展开白刃战。“经反复冲杀，敌支持不住，又不愿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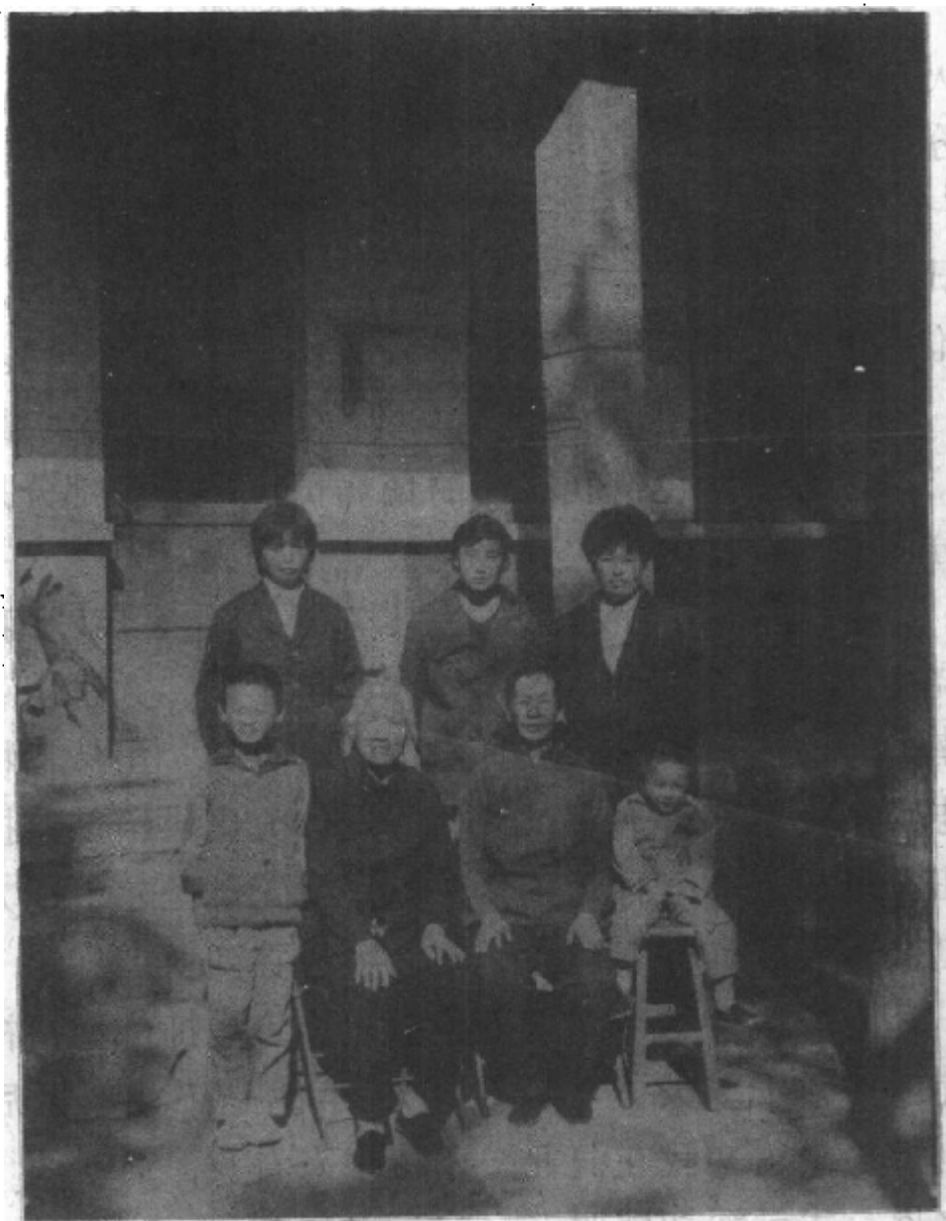


图28 “老区行”中，贵银与葛文玉弟的遗孀贾改子弟妹全家合影。我们军民友谊已延至51年的第4代了。

前排→：外孙贾南峰、贵银、改子、外孙女少辉。

后排→：太女儿同凡、儿媳贾看好、二女儿葛欣。

1991年10月24日摄

降，遂将据点所有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东团堡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对敌震动很大”（502页）。“整个战役于十月十日结束。涞灵战役进行了18天，共歼日伪军11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290多支（挺），各种枪弹4.5万多发，我军也有较大伤亡”（502页）。所以，收容的伤病很大部分是一分区广灵、灵丘、涞源人，口音难懂，也有我二团的伤病员，还有少部分是我三分区驻地周围的病人及极少数地方病人。

有各式各样的战伤（枪、炸伤），有疟疾、痢疾、高烧待诊患者等病种，当年死亡率也不低，太平房设在村南一小屋内，有时三五具尸体同时存放，虽然牺牲的同志唤不上名字，还有认识的战友如分区供给部监护排三班孙班长（绰号孙秃子）及鞋厂女工陈圣尔、地方干部刘清等同志，都因病、伤先后牺牲在四所。

还有分区供给部文书刘玉振同志，患抑郁型精神分裂症，昏睡十多天方苏醒。1978年他是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得知我在河北，还特地来看我，对所谓“救命之恩”表示深切感谢。

1940年疟疾流行猖獗，药品困难，无特效药Chinin Hydroehlic，代之以主要是大蒜成分的自制扑疟母星及在发作前针刺大椎穴等疗法，都不中用，再要合并痢疾、腹泻、下腿浮肿就死了，实际是由于疟疾反复发作迁延不治形成恶液质死亡，所以，当时人们有不怕“打摆子”，就怕拉痢之说。

总之，我四所是一所伤病俱全、男女皆有、病种不少的“综合”医院。

因医生只我一人，工作当然紧张，这叫那唤，日夜忙碌，不得稍闲，我多半上午在金库家南边打谷场上先看门诊，能行动的病人由休养排长督促集合起来集中看病，我们用的处方笺是小得可怜大约  $8 \times 8\text{cm}$  大小的麻纸片。我的同学刘树生同志，当时在我所休养，有时也帮我开几个处方。接着又去全村各家巡诊（查房）诊治重患，我们在全抗日战争期间，从无工作服，自己的军装一身滚，听诊器、体温计装在自己的衣兜内，随时拿出使用，到也甚感方便。开完处方由看护员（有时房东帮助）去药房取药。……

一天到晚夜以继日地工作，老实讲，已十分劳累，还经常疟疾发作，但心情上却十分愉快，感到这正是尽到做医生的天职，向党向八路军报恩，虽苦却甜。

看护排的同志们，非常辛苦，看护长张春元同志是我同学，全排在他领导下，每天日日夜夜投入到换药和护理伤员等工作中。换药，是当时繁重的工作之一，因医疗观念陈旧及技术水平所限，当时规定必须每天换药一次，迂出血、化脓或其他特殊情况还多换一次。用过的所有纱布都要洗后再用，为了节约棉花，用小纱布卷代替棉球擦伤口，用后洗净消毒再用直至用到没有“尸壳”为止。护理工作任务更是繁重，一切取药、服药、找医生、打饭、打水、端大小便器、处理死者送太平房等繁重的劳动，都由看护排的同志担任。



医生是休养所内重要的成员，好像什么工作都需医生经手、过目才行，所以一批批的伤病员住院登记、动员出院等行政、政治工作也须医生参加，记得有一次在智定邦指导员领导下，我去一个大院做动员出院的工作，立即有十数人站起来争相要求出院回前方，有一山西同志带头说：“我是共产党员，×团的同志谁回团跟我走！立即有人响应。记得这位同志个子高、消瘦、面色苍白贫血，无条件修饰的满腮胡子，据说是一位排长，但我知他是疟疾患者，贫血这样严重怎能出院？当然又将他留院继续休养治疗。但战友们这种顽强、进取、乐观、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无私革命精神，是十分可敬，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行政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最早的实践与体会。后来多年实践证明，伤病员出院不必动员是浅显道理。

这一段的工作，事实上是后方医院的正常工作。其基本体会：

(1) 同是我四所一个单位，随着任务的改变性质也在改变。在平阳是“兵站”医院，宋家峪阶段则是后方医院“正规”治疗性质。遗憾的是当时还不会开刀做手术，由于某种原因，将手术技术延迟了2—3年，使战伤治疗受损不小。

(2) 因陋就简利用群众的民房、火炕、地铺都可作病房，全村即全院（所），没有人民群众支持，是根本办不到的。就那样陈旧技术水平，疗效不负医护人员的辛勤，一批批的伤病员痊愈出院重返前线，增加了我军

的战斗，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

(3) 军民亲密无间，我虽是八路军中一名刚刚工作的小医生，房东大娘（金库妈、双菊妈）却把我当作她们自己的孩子般的爱护，这种感情使我倍受感动，老实讲，从小我还没有充分地享受到正常儿童的母爱就离开父母参军了。

亲密的工休关系，如我与银行老宋之间的友谊，还有先进的休养员主动要求出院回前方，配合了出院工作，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4) 人少任务重，任务并不因人少而不来，由于主治医生病休，又调不来人，在这特定的条件下，只剩我（医训班年龄最小的）只身一人带病坚持工作，承受了最高达 400 多人的医疗任务压力，实践证实了一个少年所蕴藏的（潜力）能量。少年能完成大人同样的工作任务，为我初步踏上医生道路的征途，打下坚实的基础。我能为八路军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百团大战”尽微薄之力，是我可以自慰，问心无愧之举。

(5) 初步熟悉了医院工作制度和初步掌握了伤病的（最平常的）对症治疗，将医训班所获的间接知识，用于临床的最初体会。现在时隔 50 多年，仍能背写那时 50 个以上的西药原文名，至今仍未淘汰的老药还有 Aspirin、Rivanol、Tr.jod、Lesol、食盐、阿片、红汞等。并提高了对疟疾发病与治愈规律性的认识，提高疟疾治愈率，达到了即便无 CHinin，也可减轻症状。

(6) 短期内带会了调剂员王永海同志，是最早的教

学体会。

(7) 我住过的房东成十上百，自曲阳灵山镇庞步勤家——五台澆阳村张黑父女——绥远乌拉特草原，最后一村的集宁老平地泉杨寿山家，不完全统计共 116 户房东。然而宋家峪葛金库（文玉）澆阳张黑等家是我印象最深的驻地和房东，现在金库弟遗孀贾改子一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葛欣及其儿子贾南峰等后裔，友谊仍在延续常有来往。我祝愿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日久天长永不分离。

## （二）反“扫荡”中的休养所

抗战全过程中，尤其敌强我弱的相持阶段之前，“扫荡”与反“扫荡”是我根据地最常见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日寇利用其暂时的兵力优势，对我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的进攻和“扫荡”，气焰不可一世，实际敌人错误地低估了我军有群众支持的无穷潜力，所以，它的每次大小扫荡都归于失败。日寇是黷武主义者，根本不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奥妙所在。这一点，不仅日寇不懂，我敢说国民党军队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由于敌强我弱，敌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插入我边区腹地，所以严格地讲，在反“扫荡”战中，无何前、后方之分，后方机关不掌握武装，更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性、艰巨性及危险性。就连 1943 年已处于相持阶段的一年两次的“扫荡”，也仍具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对敌人的大小“扫荡”都认真对待，故获全胜。

我们冷眼讥讽敌人的“扫荡”，对敌人炫耀武力的罪恶“扫荡”嗤之以鼻！我八路军及边区人民永远不会被杀绝，我晋察冀仍巍然屹立！而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的完蛋了。

反“扫荡”，具体到我休养所来说，主要是在山地战斗中如何使医院适应各种恶劣环境，以期完成为战争服务的医疗任务。

### 1、1940年冬季反“扫荡”化整为零的办院方式——

敌人在我军华北战场全线出击的破袭战中，受到极大损失，恼羞成怒，立即纠集兵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报复，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结果还是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聂录》说：“一个半月接连不断地破袭战，使华北敌人极为震惊，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伪军也纷纷动摇。敌人为了挽救局势，急调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便构成了战役的第三阶段。”（503页），“敌人对北岳的“扫荡”，是十一月九日（旧历十月初十作者注）开始的，集结兵力达一万二千多人，先由北向南，然后由东向西，分路平行推进。敌人所到之处，见房便烧，见人便杀，……”（503页）

晚秋的四所，工作已进入规律，宋家峪村庄稼全已收获了，地里只剩下散在竖立的高粱棵和白萝卜樱，北瓜将要拉蔓，蔓叶枯萎，北瓜还睡在地里，蝈蝈声已消

失，接到分区命令说：“敌人刚刚吃了大亏，恼羞成怒进行报复，立即进行坚壁清野，粮食衣物都藏起来，人撤走，打游击，要进行反‘扫荡’了”，当时全体军民的反“扫荡”经验尚少，如多数老乡将大门用石头垒起来，以为这样敌人就可不进家了，将衣物藏在柴草垛里，事实证明这是毫无用处的，敌人来后，都给烧掉了。

我所奉命向白花山南侧的大岸村转移，全体伤病员分两组。一组重患多，由田学文所长带领上山进驻南白花，另一组由智定邦指导员带领数十名伤病员进驻大岸村，我也在这组，正是这时调来了主治医生李清秀同志。大岸村位于宋家峪北面5里，我们这组担架、毛驴、步行，由宋家峪出发，向北走不远，入西沟（见图29）顺河槽步步登高西行不远即到达目的地。乡亲们说：“大岸是大庵的变音，很早以前有尼姑庵”。村靠北山根，村前小溪流水哗哗作响，该小村陈姓居多是从赤岳搬来种地而定居的。我们正住在碾子北面的陈占斌家（见图30）。村很小，家家户户是病人，我们房东家，南屋、北屋都住病人，火房设在该院。重者十余人安置在离村三四里地东北面山上天然山洞里（即马莲沟虫王洞，图31、32古代佛教遗址）。我们每日基本定时诊断治疗，上山为重患巡诊，还不断地给乡亲们看病。

因我组轻者多，故主要住在村里，有情况上山。司务长孔繁华也曾买过一只羊，给全体工休改善伙食，记得鞋厂工人高杏花是位很活跃的大姐，她组织女患者主



图 29 1940 年冬季反‘扫荡’，我四所移往白花山南侧的大岸村途中，（图 29—34 均系建党七十周年‘老区行’中摄）贵银与侄女葛欣合影于流水潺潺、步步登高的西沟里



图 30 大岸村小房东陈占斌兄已故，贾银、葛欣与陈的女儿荣鲜合影（背景即北屋遗址）

动帮助我们一同去河槽洗羊下水，她给擀面条等。工休关系密切。

敌人进山了，从灵山→稻园→军城都是敌人的据点，智定邦指导员常派看护员张生科（稻园村人）到离我们最近的稻园据点侦察敌情，有一次派张下山后，一去不回，后来听说被敌人抓去了。

山头上有哨，一有情况即向村北山上转移，从无损失。由于敌人出来搜山多半在上午，所以我们多半早上吃完饭就上山，下午下山做饭治疗，由于工休用一口锅，全村军民用一盘碾，条件不便，所以遇有情况，常常吃半生不熟的夹生小米饭，有时盛上一碗，边走边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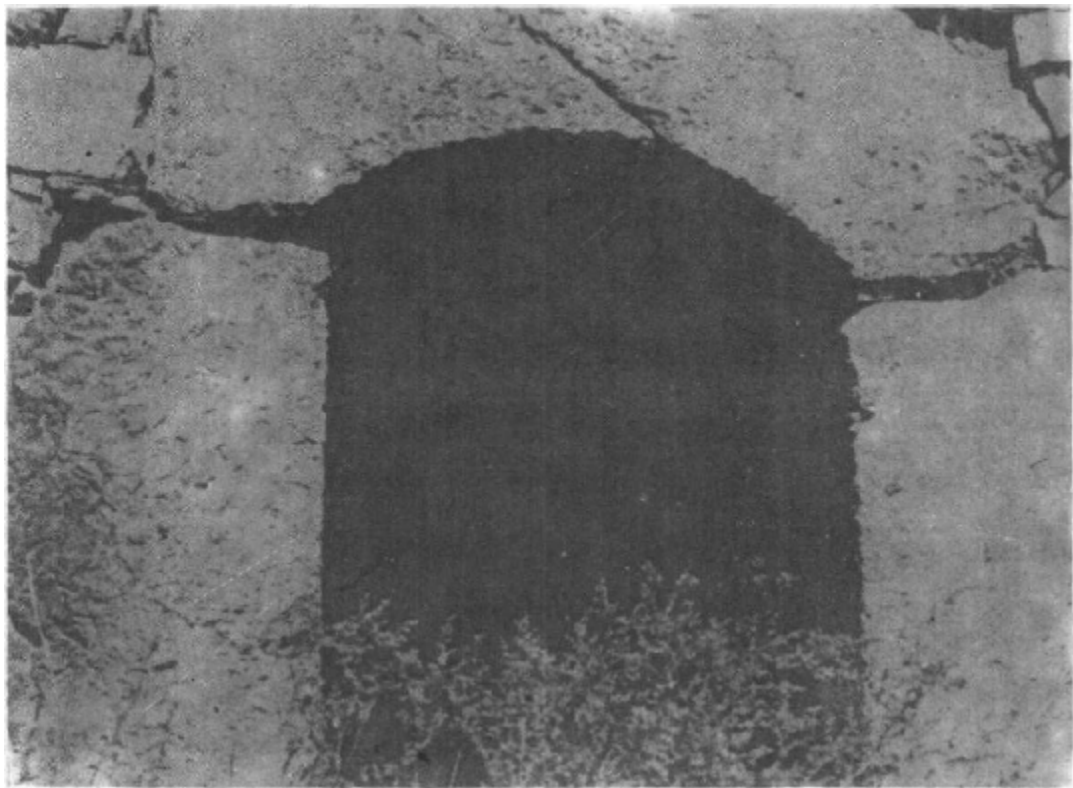


图 31 马莲沟虫王洞，是古代佛教文化遗址。  
洞里蛙头形，约占 40—60 人

或上山后再吃，同志们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吃的是“倒头饭”（这里丧俗，人死后开锅第一碗半生不熟的饭供奉死者）。

有一天午后，按规律已过了搜山时间，突然听到枪声，人们喊“敌人来了！快跑！……”军民一起往北山上转移，这时我们住的院里已跑得无人了，我见北屋草铺上还有一高烧患者张炳金（唐县冯村人），焦急万分，他站不起，走不动，在地铺上撮空摸墙。当时心想，绝不能将他丢下被鬼子杀害，我本来也患疟疾，顾不上多想，背起患者即往村西跑去，再拐向村后东北面崎岖小径向山洞背去，欲将他背往山洞安身，一直背出约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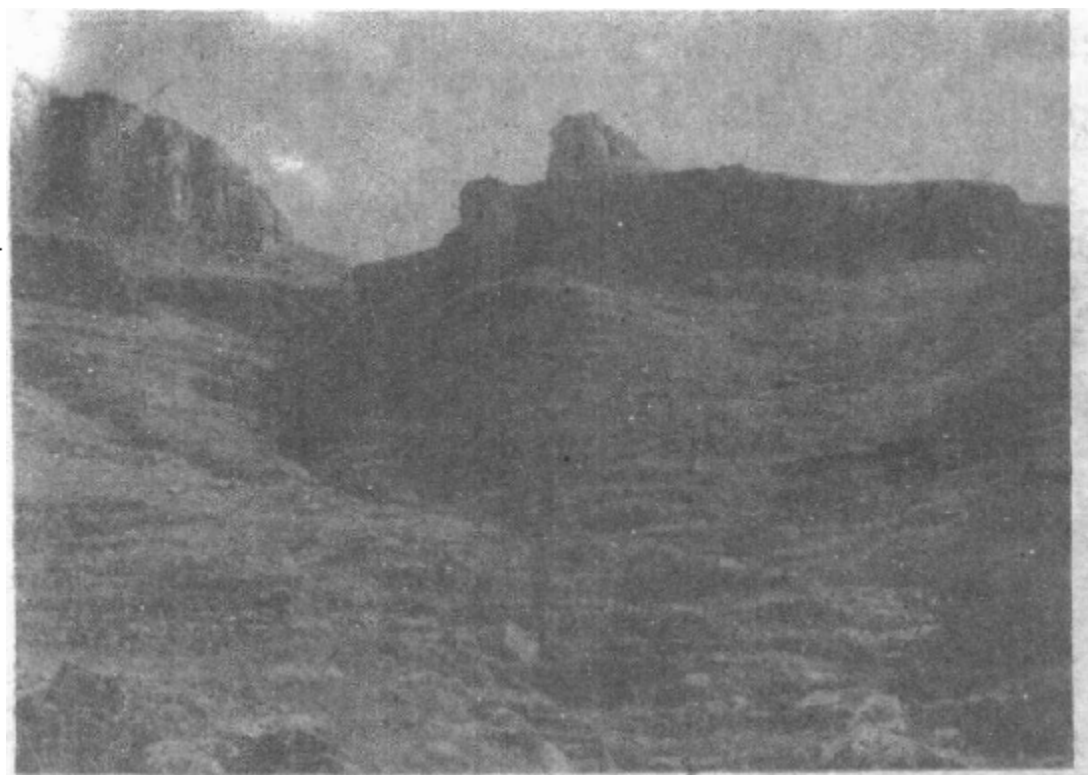


图 32 去大洞的中途，翻山经鞍口即马莲沟

多实在腰酸腿软无力走不动了，在半山背荫处稍息（图 32），这时遇到大岸村陈占鳌大伯，他也来主动帮我，交替背着老张向上攀登直至背上山洞（见图 31）。这个洞叫虫王洞，位于马莲沟顶，顶后即南白花村了。张当然感激，几年以后他退伍，还特去我家看望祖父，说王医生救过我命。这点区区小事，后来受到各级领导表扬奖励，很抱谦！

我们去山洞途中，绕到山头眺望，见约二十多个鬼子边吆喝边经大岸村向西行进，鬼子的凶相，真像电影那样：一个个身着黄“皮”，足登累赘的大皮鞋，戴着瓜皮小帽，有的敞开衣襟挽起袖子，肩扛上了刺刀的三八枪……他们好像是一个小队的样子，成纵队顺山间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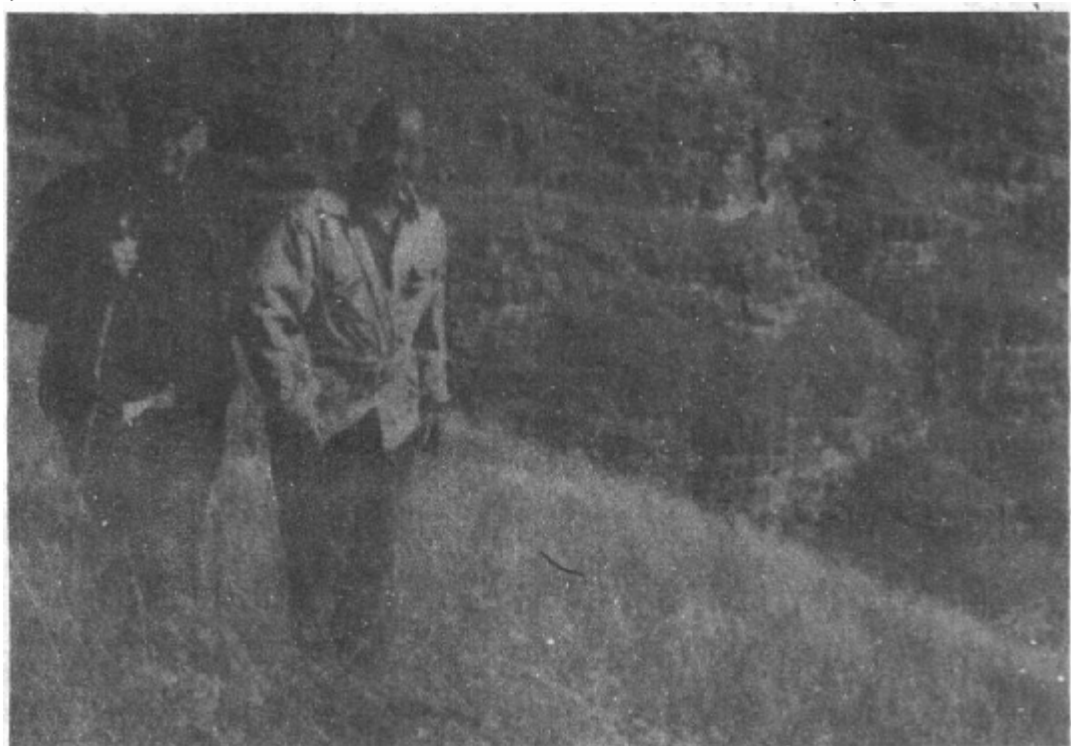


图 33 白花山马莲沟 [洞口位于齐颈向右的  
悬崖劈裂缝处，图系作者（持棍者）与陈洪喜弟]

路蛇行向西往稻园方向而去。

这天晚上我们都无下山，我与两位看护员同志在洞前方的第二道山梁护禾小屋内轮流巡逻放哨，寒气袭人，手、脸、足部都特别冷，直到山头东方发白，旭日渐渐微露，这是一天最警惕的时刻，见无敌人上山，才放心地去大洞休息，等候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山洞是我军天然的最牢固的病房，它能避风雨、不怕烧，不怕毁，在战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好地方，白花山、神仙山的山洞，在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发挥了很好作用是有功勋的，所以我对石洞至今颇有感情。我前后住过四个大小山洞，大岸这个虫王洞，洞口三块大石

砌成门，是古代佛教文化的遗迹。面积不大，洞内蛙头形能容 40 至 60 人，但这个洞地处悬崖的北壁，洞口向东南，必须先走西侧窄径，径下开始是不太高的小悬崖，洞的另端逐渐径窄至完全消失于悬崖峭壁，这有入无出的地形，在军事上对打游击是不利的，为了保障洞里的安全，必须在洞外适当位置设哨，以便及时发现敌情及时转移隐蔽。洞里都打草铺，就地和衣而卧，重伤病员住里边，少数工作人员住西侧，洞口支着一口锅，负责重患的吃饭和治疗、护理，由于地方不大，工休同住一洞，工作十分方便，工休感情十分和谐与亲切。

敌人以势逼人，山下“扫荡”，搜山更加频繁，我们又奉命向上搬到白花山坳的大西峪，（现名文书岩），这个小村，只有三户人家，是从江家沟搬来的哥三个，老大媳妇回娘家，说什么也不回来了，大哥很苦恼，房子很少，我们没处居住，就把老乡看庄稼避风雨的小石屋和羊圈克郎（石囫圇，有墙无顶圈羊用）自己打上顶苫点草，打地铺作病房居住，白天、晴天还好，夜间冷得很，再遇下雨简直无处藏身，所以，伤病员们伤情病情都比在大岸时加重。

我本人疟疾发作频繁，有时一日一次发作，症状加重，不能吃饭，简直不能工作了，所以有时从早睡到晚，又从晚睡到次日，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昏昏晕晕，再加寒战不能行动了，幸亏敌人一直未上到这个高度搜山，甚侥幸！

敌人有搜山顶的迹象，我们被逼迫上了北梁，向下

一戳就是东沟村，再向西北走二里即南白花我所部的所在地了。田所长热情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榆皮米面纳糕和点酸菜，好吃极了，就暂在所本部工作，照常巡诊治疗。由于山上细粮奇缺，重病想吃点面片，还必须由医生批准开条，而且最多只限每顿4两（125克面粉），我们的权力可谓大矣！

我组又奉命回到大西峪。记得有一天上午，智指导员派一付担架来抬我，带来信说“扫荡”结束了，让我们所有人都下山。这时我的身体好一些，未坐担架，与民夫同志们一同慢慢步行回到豆铺村，我们三位医生驻在张刚儿家。

《聂录》说：“从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518页）。“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找我们党政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518页）。这次报复性“扫荡”，“在我军民的英勇打击下，进攻边区内地的敌人到十一月底撤离。他们原指望用反复、连续合击的疯狂的烧杀来挫伤我军主力，摧毁我根据地，但是由于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敌人的企图，再一次失败了”（504页）。

这次“扫荡”敌人一直未达大西峪的高度，所以山上各村相对地比较安全些，但山下遭到敌人烧杀抢掠，就我们小的局部而言，损失是惨重的。

我三分区的损失惨重。凡敌所到之处房屋被烧、财物、牲畜被敌抢掠一空，杀害我们许多人。我家的房屋

几乎全部烧光，衣物被烧掉，家里的人连件换的衣服也没有了。唐县赤岳村全村 140 户人家房屋烧毁 2/3，共约 500 余间。

这都是日本鬼子强加给边区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多少家庭失去欢乐，多少人无家可归……，难道这是能饶如放吗？！

墙上还悬挂了几张系统解剖图，这几张图是李医生让我临摹下来的，即循环系统心脏大小循环；呼吸系统的肺、气支管、肺泡；消化系统从口经胃至肛的全部器官；神经系统图，有二名看护员维持秩序，一人在门口唤病人顺序进室并用手势指向某医生的诊桌，诊毕，病人持开好的处方，从另一个门出去，隔壁即药房窗口，一名看护员维持秩序，守一桶开水，给病人取出药后，立即目睹患者服下去。东屋是外科室，负责轻伤员的换药交换绷带。现在看来，这一通过式的诊疗方式及操作，秩序井然，是集中诊治轻患合理而有效的管理方法。可惜只实践了一段时间，以后多年在战火纷飞的环境内，没有这种优裕条件了。

(2) 住院病人的医疗质量有所提高。当时病人不太多，大约 200 人左右，也几乎占满全村各家。这年除疟、痢、倭麻质斯（寒腿、风湿症）外，部队回归热特多，又无特效药 606、914（均砷制剂（Salvasan），只好克服困难寻找比较有效的代用药物，我所用 1—3% 220（红汞）溶液，（及 1% Rivanol 溶液），每天要给病人做不少静脉注射，由于溶液红色，回血看不到，通过治疗实践注射技术有所提高。李德庆同学在豆铺曾作中药常山代规宁的小犬实验。

以智定帮指导员和一位东北大学生于力文书，领导我们的政治技术学习，让我负责给看护排上医务课，给村里妇救会、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上卫生课，记得一位韩春海，家贫一字不识，我特地帮他学习识字，

给他特编一小册文化课本，犹如我上小学时的“弟弟来，妹妹来，来来来。”之类的极其浅薄的文字，后来他有了进步。智指导员组织大家排练节目，曾在下街河滩开过军民联欢晚会，活跃军民的文化生活，我参加了口琴队（参图 24），至今仍能演奏《儿童舞曲》等乐曲，军民沉醉在幽扬愉快的乐声中。诚然，刚遭到敌人“扫荡”的边区人民是很贫困的，但在贫困中又有军民鱼水情的乐观主义精神。记得在豆铺有一个皎洁的月夜，二位李医生已呼呼入睡，独我辗转床侧终不能寐，自作《失眠之夜》一曲，当然水平谈不到，但它是我生平以来所写的第一首乐曲，“文革”中还遭到恶毒攻击，说无阶级性。这真是黑白颠倒，不值一斥。

由于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夏季军装改发便衣，以便在更残酷的“扫荡”环境中减少目标，便于医疗活动。记得都发给浅、白、兰、黑等色的粗布，作何式样，自己随意，我们差不多都请房东大娘给裁作，但无论怎样做，却都不像农民打扮，好似不言而喻自行统一了式样：双兜对襟浅、白上衣，兰或黑裤，女同志都作反兜大襟上衣。这种装束，倒都像是男女区干部。

同时加强反特保密教育，为了斗争需要不准在战时喊职务而喊名字。一位休养排长在反“扫荡”中大喊：“智定邦！……”而未喊指导员，受到智指导员的表扬。叫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是专门对付汉奸、特务的保密手段，想来，战时保密是很重要的。后来的分区首长都编了代号，如司令员称 301，政委 302，参谋长 303 等。

所里开始有了女同志。分区卫生处医务科齐子新排长培养了一些女看护，来我所的这位是因没有文化，故分到所里当洗衣员，望都人，她住在豆铺一个老太太家，她哭哭啼啼找领导说连续数夜有人撬她的窗子。指导员派休养排长陈丙银同志持枪抓坏人。陈躲在女同志住处对过的牲口圈里监视，连续二夜无动静，第三夜已夜深了仍无动静，因而思想麻痹正欲入睡之际，忽然见到一个穿白上衣的瘦个男人鬼头鬼脑自窗外向屋内窥视，陈排长瞄准该人哗啦一声，子弹上膛扣动板机，不料子弹无响，是个臭弹，退出子弹再压子弹时这个人已跑，从此，这个人再无来过，保障了女同志的安全。后经村里治安员共同调查定论，估计此人是想要流氓，不是特务汉奸。

这可谓是“和平宁静”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不久，所长、指导员等首长又去白花山看地形了，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聂帅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平时就认真进行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519页）。

敌占区的乡亲们和山里乡亲们同样地遭受杀身灾难。由于我们去年发动了百团大战，敌人遭受惨重损失，《聂录》记载：“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总司令，……他到华北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520页）。就在这里发生了灭绝人性的野北惨案，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未见野北惨案的纪念文章，我经灵山二姨



王荣仙、妹妹王素芬代为进一步调查，我特地在这里概述惨案始末，以纪念死难的无辜乡亲们：野北村属曲阳县六区，自灵山沦陷为敌占区后，周围的人民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土匪都还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然而日本鬼子连离据点仅三四里的野北村也不放过杀戮。据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嫁到王家村的李胜女说：“1941年旧历六月十四（即七月八日）凌晨，鬼子包围了全村，把所有人都抓到李忙儿、李混子院子里，房顶架着机关枪向乡亲们扫射，顿时两个院子里乱成一片，大人孩子的哭声、枪声交织在一起，乡亲们一个个倒在血泊里，鬼子还生怕不死，扫射后用刺刀一个个检查，发现未断气的再刺死，我当时才八岁，母亲、叔叔、姐姐、两个哥哥都被打死，我姑将我压在身下，鬼子发现姑姑未死又刺四刀，我装死，待鬼子走后才从血泊里爬出来，浑身染红血腥，真是残忍极了。李四廷、李小七、李二兵三家都全家被敌杀害，成了绝户断了烟火。尤其对小孩更为狠毒，一位老奶奶，抱着刚满月的婴儿跪在地上哭哭哀求：“太君！剩下一个吧！”鬼子嘻嘻一笑，乒乒两枪老幼倒在血泊里。鬼子另发现一个小孩未死，敌人提起孩子两条小腿，恶狠狠地将孩子摔死在墙上脑浆四溅。鬼子对一孕妇，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向着孕妇的肚子刺去，鬼子仰头哈哈大笑。鬼子走前放火烧房，将大娘活活烧死在北屋，共烧毁民房80多间。尸体横躺竖卧布满两个大院，真是血流“成河”，烟火弥漫，血腥扑鼻，无人掩埋尸体。……”

各区乡亲都伸出友谊的手，边区政府把孤独灾民迁往内地，妹妹素芬说：“那年我家收容祖孙女二人，孙女叫二菊，她哥被杀害，她们是幸存者，是装死混在血泊里，夜里才跑来我村，在我家住了很久。

我的战友李国栋全家被敌杀害，自此更激发了他报仇雪恨的抗日决心。

野北村与我村相距咫尺，印象特深，这个惨案共杀害我同胞 146 人，其中多数是妇孺共 130 人左右，其余都是青壮年男子。

这次惨案正是出自大战犯冈村宁次上台后，七、八月份的治安强化运动中，这个罪恶的运动矛头是针对敌区活动的八路军和革命人民的。我写这段文字，以悼念在野北、平阳惨案中所有遇难的乡亲们、同胞们。我认为这段文字不是 1941 年大“扫荡”的案例，而是冈村罪恶行动的组成部分。几乎与此同时期（9 月 22 日）日寇在曲阳沟里村制造惨案，杀害我村民 83 人，烧毁房屋 300 间，（见《暴行录》（二）第 375 页，）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被蒋介石弄去，1945 抗战胜利后，我们强烈要求解回边区处决，但听说蒋介石竟把他放回国去了。后看到过国民党高级将领亲日派何应钦将他放跑逃避严惩的材料，多年后何死，冈村为报答放虎归山不杀之恩，来到何的墓前祭典。这个刽子手杀害我边区人民太多了，实属于不杀不能平民愤的特大战犯。

《聂录》说：冈村宁次“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

立刻集中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地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520页）。“他作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521页）。《聂录》中又提到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时指出：“……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518页）。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527页）。重读聂帅的这段著述，感到格外亲切。我感到聂帅是真正的军事家，文武双全的革命家，我做为一个他还不知的小兵，从内心钦佩，我们具体地是跟着他步步走向胜利。

我冀西这次经历的空前的敌人七万大军的大“扫

荡”与冀中五·一大“扫荡”，聂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它是我冀西整个抗日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凶、兵力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扫荡”。以后敌人更加外强中干了，已接近相持阶段，我边区做出的重大牺牲，加快了胜利的进程，缩短了敌人的寿命。

秋季大“扫荡”开始了，我四所奉命到白花山上打游击。山上以南北白花为中心，伤病员布满整个山顶上的各村各点。山上总指挥是司令部管理科张献科长，我四所仍住南白花，供给部的被服厂住北白花，常常碰到我参军时的管理员冯昌隆（这时已是副处长）及文书刘玉振同志。还有军区工业部（兵工厂）的大批同志，他们个个均穿杏黄色军装，因是生产子弹的，荷短枪，子弹充足，令人十分羡慕。由于他们服装色泽特殊，在山上易于辨认，但他们后来吃了杏黄色的大亏，还有区里的男女干部如贾禄琴等。

我所也增加了女生班，即卫生处齐子新他们培养的一批新看护，由她带来定县姑娘吕素珍、吕俊杰、胡青梅等一班人分配给四所领导，还有不识字的我村妇女贾素银、三茜二位女同志当洗衣员，女生班自然要放在条件最好的南白花了。人们每天早上洗脸，下午洗脚都到河槽哗哗作响的流水中去洗，有时稍有不慎即挨了“蝎子螫”，原来是蝎麻简称“蝎子草”在作祟。

我们住在南白花村长甄老池家，他的小妹小三儿，是一个顽皮天真的小姑娘，小圆脸，大眼睛，前额垂着一撮齐齐的头发帘，梳着一根“白毛女式”的短小辫，

常到我们住室玩耍，学说村里发生的事情。小小的年纪却成为军民之间的联络员了。而她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听说已嫁到黄石口去了。

离老池家不远路西的一家农民，在这战火纷飞条件下，却在办喜事娶媳妇，虽无花轿和鞭炮，但一副醒目的对联却吸引着村里所有的成员，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是“手拉手儿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诚然“对头”二字不够文雅，但它却是我有生以来首次见到的新对联，也是与过去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结婚对联如“天作之合”、“钟鼓乐之”之类是有根本区别的。听说他们是自由恋爱婚前是见过面的，人们争看新媳妇，但因军民人杂谁也没有看准谁是新媳妇。但无论如何说明这样偏僻平时人烟稀少的山村，已经将封建主义打倒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充分说明我边区人民，在全国远未摆脱封建枷锁的战争年代已享受到民主政治了，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现在自主婚姻自然是常事不足为奇，但在那个刚从封建社会脱胎出的《刘巧儿》之类的事并非多见，山下正在“扫荡”战火纷飞，山上新式结婚就更为珍奇。现在50多年过去了，在新中国，竟然还有卖钱姑娘（买卖婚姻），对比之下，实在是不算体面。

当时在南北白花村里，村边、河槽见到邂逅而行或对面坐着的男女，是谈情说爱，是聊天就不得而知了。

……

总之，白花山周围的山下，每天在杀人、放火烧

房、奸淫妇女，听说临时修筑的公路已可从稻园直通涞源了，然而山上的南北白花村成了“和平盛世”的繁华中心，好似有十分安全感的“大后方”。但谁都预感到“好景”不会长，敌人是要闯入我们的“乐园”的。

由于斗争的需要，这次采取了化整为小小零的策略，我们主治医生李清秀同志自己分配自己管东沟一个村，南白花是所本部休养点，给我组分配自白花直至菜地的所有小村，我组还有汪振宽、王玉生、高永吉三位看护同志，伤病员疏散到许多小村。菜地是个大点，有二十名左右轻伤病员，有炊事员一人给做饭，而别的地方都采取男女病人疏散到老乡家里，和老乡一同吃饭、劳动、住宿、打游击，战斗结束后再结算。有的来到老乡家，长者就给论“姿”排辈，以便于有必要时掩护。尤其是女同志都受欢迎，原因有二，一是女同志，嘴俏，大娘、大叔一叫房东就高了兴，容易搞好军民关系；二是女同志化装容易，她可以梳辫子、挽起髻、剪发头，样样不难，所以很易获得房东的好感。而男同志都差一些，所以往往男病人诉说疏散后的苦衷，要求回所部休养。

别组不用说了，由于我组任务分散，我多半带一看护员每天须从南白花出发，从西往东经过葫芦万→饮马池→双洞→（大福巾）→菜地，一去二十里，须上山梁及下沟壑。巡诊完毕，处理好各位病人在菜地吃饭，之后原路而归还省力些，有时由于还有任务，须从菜地翻

过岭，来到小完县（这是完县一农民搬来种地定居故得名），别虎窝（即蚂蚁窝的意思现改名石堂村）等都是两三户人家的小村，处理疏散在老乡家的病人，所到之处伤病员特别欢迎我们去巡诊，在这成天见不到几个人的山谷里，工休关系是与山下农村不同的，因而特别亲切。所幸者，我组多数是轻患大多能生活自理。石堂村有个山洞，特别显眼，又由于是轻患我们没有利用。我们每天往返一次须走 40 多里地，我组同志心里明白李医生分配任务不算公道，然而同志们都是年轻人，多走几里路不算什么。见到别虎窝一位房东大娘和她“闺女”（女病人）微笑的面孔，心里特感愉快。我敢肯定地说，除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能够和老百姓相处得这样好，其他任何党任何军队都是办不到的，这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具体体现，这是日本鬼子、蒋介石所无法学会的东西。经过这样的战斗生活，军民之间、工休之间的感情真正融合在一起，多少年后谈起战斗友情，仍是激动不已，这是平时难以达到的。记得一件小事：我的同学孙巨川医生，因发高烧隐蔽在菜地这个点，想吃槟子，我千方百计求人弄到几个给他送去，很多年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小事。当然，更非和平时期人们同住一楼，床凳铿锵咳嗽喷嚏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能比拟的了。究竟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只有人们在最艰难时刻同生共死的友谊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好景不长，敌人就要合围我们了，大概是深秋或初冬，上级动员同志们要进一步轻装坚壁清野。我组也检

查了各疏散点的情况，有的病人多留几天药，并互相鼓励注意安全，预祝粉碎敌人的“扫荡”，有一位曲阳籍的轻病人说：“请医生放心，我们不会等着让鬼子抓去，我们会自己打游击的。”我在菜地村砍了一根白腊杆作拐棍，夜间活动更方便了。我将仅有的一个家里给的彩条褥子及童年时期的《日记》隐蔽起来，当敌人搜山后丢失，非常心痛，我怀念我童年的真实纪录，如果《日记》仍存，该有多好。同时又心痛我的“贵重”财产，有褥子的同志为数是很少的，这一下，我丢掉了褥子，也成了“贫农”。

有一天，我组正在去菜地巡诊，伤病员已找不到了，老孙也找不到了，乡亲们大多都跑了，说敌人已合围上来。我们由于地形熟悉拟从小路突围下山，遇到曲阳一轻病人和我们一同从菜地村向南边悬崖峭壁的九龙观小路突围，下崖不远就是百寺沟、酸枣沟——马家峪，下山又继续往吉祥庄去了，老乡说：“你们下来的正好，敌人刚经吉祥庄到东迷城去了。”差一点与敌遭遇。所以是成功的突围和转移，这可能即聂帅说的，跳出合击圈不能早，也不能迟，要恰到好处的一次。同时，我们穿便衣，减少了目标，然而工业部的同志们因穿杏黄色军装遭到重大伤亡和损失。后来遇到我所智指导员带的部分同志会合于吉祥庄。在智指导员领导下，暂在一起打游击，有情况就上吉祥庄东南方的山坡去，夜间露宿在大青籽树下，铺上千草，虽然凌晨被露水浸湿，但同志们都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后来又分组活动



以减少目标。

《聂录》说：“日本侵略军在 1941 年秋季大‘扫荡’中，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对山区根据地的破坏和摧残是极为严重的”（536 页）。全面情况我们不知，单是白花山就被摧残得够严重的。

敌人在白花山上已“扫荡”三四天后，情况不明，我们奉命由庞鸿生副指导员带我们三四人上山清查，又从马家峪，酸枣沟上山至菜地——回白花。走一村查一村。这时敌人已退下山去，经清查：我所的损失不大，病员无伤亡，少数同志失踪，“扫荡”结束又自动归来。然而整个山上的损失很大：总指挥张科长牺牲了。房屋被烧毁，工业部的同志死伤些人，上山后见到菜地去饮马池村之间的河沟旁有一具杏黄军装的无头尸，头也不知那里去了，好几天后才将尸体掩埋，一看即知死者是工业部的同志。被服厂的同志夜间也从我们下山的小路突围出去，有人掉下悬崖牺牲。“和平盛世”的南白花已七零八落，人烟稀少，景象凋零。到东沟村见稻园村的一位 40 多岁的大娘在啼哭，才知她的女儿已死去，我们上山来时就见到东沟村这位臀部受到鬼子贯通枪伤的十八、九岁的姑娘，完全不能行动，只有她母亲陪她，有情况就将她隐蔽在棒子秸内，敌走后母亲再侍候女儿吃喝拉尿，她母怕她被敌人搜出被奸污，将体现女孩美的头发帘和漂亮的长辫剪去，使她成秃头，在这生死攸关的恶劣环境里，她的母亲体现了最高尚的母爱，当时同志们还背地里赞扬这位善良的女性，终究这位苦

命的姑娘也未逃脱来自日寇杀害的厄运。像这样的母女亲人生死别离之情何止她一家？仅山下南边的赤岳村，就先后被日寇枪杀 10 人，其中不少是老人，他们是：陈连善被杀在村东头，陈云述、陈连群被打死在南沟，还有范田义的父母双亲，范二喜之母，西文之母，大禹之母及贾新德、范八斤之弟等都被日本强盗夺去了生命，失去了天伦之乐。听素平妹说，古洞村一位很漂亮的小脚姑娘李焕金，皮肤特白特细竟被敌轮奸，抓去一个多月，她过继的娘（姑）成天啼哭，焦急万分。三道岗路旁树上梆着两具杀死的尸体已发酵发黑，恶臭四溢，无人解尸。

我们为轻装在山上坚壁的东西都丢了，有人说是敌人抢去了，有人说是自己人偷走了，反正东西是没有了，就在这同舟共济危难中，仍有发国难财者，实给我老区人民脸上抹黑，这与坚蔽的地方目标较大有关，这是像去年“扫荡”用石块堵门一样的教训。等于告诉贼人“此地无银三百两”，以后坚壁更讲艺术了，不仅敌人找不到，有时连自己也忘记标志找不到了。

这一切，都是日本鬼子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的罪恶。有压迫就有反抗，野北惨案后，怀有刻骨仇恨的 16 岁村民张俊彦等六人，伪装给鬼子送柴送水，赤手空拳，拿下了野北炮楼，硬击死日本强盗冈部一三和岛田贞夫，拔掉了这个“钉子”，受人称颂。前述大受日寇之害的赤岳村支书陈夺喜同志，在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带头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1942 年负伤成二等

残废，43年复员，是唐县有名的扩军模范。他不仅为本村乡亲而且为全民族的死难同胞报仇杀敌。这样例子屡见不鲜。

后来在山下一段时间里，我们奉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我负责的这个组有汪振宽、高永吉、李国栋（清范人），还可能有王玉生。我们是医务人员，但首先是抗日战士，在反“扫荡”的环境中，不可能事事请示首长，事事等首长下命令，而必须根据情况自己酌定行动计划，我们在打游击的实践中增长了军事才能，也提高了政治水平。我们每人只有最少的一点行装，高永基同志还背着四五斤白面，等必要时食用。我组曾在唐县河南村驻数日，有一天发现“敌”情，乡亲们都跑了，我们也一同拟上赤城活动，见唐河桥上出现长长的队伍通过，从桥东过桥往西去了，疑是敌人来了，后来得知是二团带病出征的一个连。这年疟疾猖獗，全团3000多人中，只剩下160来人还是带病出征，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当时我们分析队伍之大之长不像敌人，所以在山上先看看再说。得知确情后，我们又回河南村住。

像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有事就到赤城山上活动，有这样两件事，至今时常在脑海里回萦：

有一天，在赤城山上见无敌情，我四人决定下村去做饭吃，我们来到村里见到一位大婶，求在她家做顿饭吃，大婶很慷慨同意做，大婶见我们白水煮面片，嘻嘻地笑着说：“你们这白汤白水的怎么吃？”不一会儿，她从园子里捋回一把荇达叶给我们放在锅里，又给放一点

盐。吃得非常可口，莜达叶之滑溜松软，面片之香长久记忆不忘。但后来在六十年代，我在内蒙专门复试一次，同样是莜达叶涩而难咽，完全不是赤城大婶菜叶之香。所以，古人说的“人饥甜如蜜；人饱蜜不甜”的谚语是确切的。我们应该人在福中要知福，人在福中还不知福就是忘本思想在潜移默化。我们当然不必要再回到苦难的实践中去，但要知道幸福来之不易。也不要忘记赤城大婶他们老区人民的恩情，他们还未解决温饱，我们要高消费地享受心中能平静吗？！

又有一天，敌人来了，我们即走出河南村，在张各庄或明福村，见定唐支队某小队在黄昏中集合，欲往沟外转移，我当时跟在人家队尾走了一截路，边走边踌躇，感到任务不同，责任重大，我们不能到‘沟’外去，好似无娘之孩的心情，也很使人难受，心想有个‘娘’（领导）多好啊！最后决定仍要留在赤城山上打游击。我四人在黄昏中又上山与乡亲们一同露宿在一个地埝里，有一个人说：“同志！你们怎么和我们一块住？”很显然是怕我们连累了他，我四人和他大声口角辩论：“我们（八路军）为什么不可以和老乡一块住？这又不是你家的地埝，是你家的，请我们也不来……”乡亲们都坐起来了，有一位乡亲解劝说：“同志，算啦，他不会说话，人荒马乱的不要往下说了”，我们照样铺上了点干草露宿在这个地埝里。过了好久，哪个人又拉起骡子和家人走了。我们看透他不是好百姓，后经询问得知他是一个财主（富农）。这就不奇怪了，未经好好思想

改造的富农怎能和八路军和平相处？这个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抗日不能依靠这些有钱人，只有以不怕死的贫雇农为骨干，才能打倒日本鬼子。

上述二例，隔日不长，在几乎同一时期、同一条件所遇到的一亲一疏，何等泾渭分明！赤城大婶一撮碱盐一把菜叶蕴藏着多么深厚而宝贵的鱼水情谊；而后者有钱人就这样讨厌八路军，地富怎能喜欢要革他命的八路军呢？！他只会给我们增加消灭剥削穷人翻身的决心，岂有他哉！

随着边区缩小，遇到次年 1942 年颗粒不收大旱灾年，日寇加紧进攻“扫荡”，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小爪牙到处蠢动，配合它的反共高潮。边区内国民党头子（胡仁奎）跑到敌区去了，而宋劭文主任仍在极困难的时期留在边区与人民同甘共苦，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与尊敬，边区内部国特（即国民党特务）破坏参军、交公粮（掺砂子）、抗公鞋、暗害我军哨兵等，有的财主干脆跑到敌占区的定州、保定甚至北平去了。大张各庄不法地主赵子恩暗杀我战士未遂，在 1942 年反国特时畏罪上吊自杀，人民给他的坟上插了一块“人民公敌赵子恩之墓”的牌子，遗臭万年。

当时边区内的阶级斗争的确是客观存在，所以也经常杀坏人。这种客观事实是不能否定的。

后来派我组去唐河西岸的郑家庄去联系疏散伤病员，刚妥，“扫荡”快结束了。

虽然敌人用尽吃奶之力集重兵七万，用了深沟高垒，“三光”政策“扫荡”我冀西根据地，梦想消灭我军主力，拔除冀西这个眼中钉，它用了最长的时间、最残酷的手段，我们虽然受损惨重，日寇也未能达到消灭我根据地的目的，相反使我们更增强了对日寇的仇恨，我们越战越强，证明我边区军民是打不烂、攻不碎的钢铁长城，胜利地结束了日寇罪恶的华北大“扫荡”。

《聂录》记载：“1941年秋季反‘扫荡’斗争，北岳和平西地区部队，同敌进行大小战斗800多次，毙伤敌人5500多名。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52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90—192页）中描述：“于8月14日开始‘扫荡’我们号称‘百万大战’中有记载有：“……粉碎了敌军的‘扫荡’。但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摧残，被杀害和抓走的达两万五千多人，房屋毁15万多间，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

我们奉命到白花山下马家峪集中，恢复日常工作秩序。工休人员普遍体质不好，一是太劳累，一是伙食差。据说白花山有一粮库被敌人挖开抢走，上级下了决心要让部队吃好，让带病出征的同志恢复健康，规定每天一顿红（次）大米饭，顿顿见肉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生活，几乎和日本在华抗战同盟支部的日本友人一样的待遇了，只不过他们吃的大米好，肉多一点。上级又下决心通过商人从保定偷买出疟疾特效药Chinin Hydrochloric，经过认真治疗，加之好营养，大约经过三个

月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改变了因疟疾失去战斗力的被动局面，同志们的身体大有恢复。我们见到供给部的熟人，表示感谢他们，他们说：“过去舍不得吃，有点好粮食这次都叫敌人抢走了，有其被敌人抢走，不如我们自己享用为好，说实在的，如果粮库不被敌人抢去，我们仍舍不得吃呢。”人们拍手称颂。但我们的细粮有限，就是次大米也没多少，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全是粗粮的供应，同志们都体贴供给部的困难。

1941年新年快到了，我所的陕北红军李子才副连长，组织大家搞文娱活动，组织男女踩高翘，扭秧歌，会敲锣打鼓的、会吹唢呐的理发员同志都参加了秧歌队，练了十多天基本已成熟，就各自分担的角色化妆彩排及正式演出，我承担了一位中年妇女的角色。用这文艺形式向军民宣传揭露日本鬼子和汉奸，歌颂边区人民的英雄行为，提高军民士气，用〈大同府〉的曲调填新词，揭露敌人罪恶的封锁沟，记得歌词有：“‘惠民沟’呀哎，像条大毒蛇，拦住了我们的来往路，不让我们过……”，再加之锣鼓节奏、喇叭声声，加上整齐优美的高翘舞姿，甚为和谐欢快。在新年中，除在我们驻地演出外，李副连长还带领我们去栗园庄总院驻地拜年演出，受到当地军民尤其老太太、小孩子们的赞扬。老实讲，有时我们是够苦的，但粉碎了敌人的残酷“扫荡”，心中又迸发出由衷的喜悦，用这种十分饱满而乐观情趣庆祝胜利。我们从不知什么叫发愁，只要有党中央领导，无论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士气高涨，这是十分宝贵

的精神财富。回味过去，再看现在稍缺这股劲。

边区的全局我不详知，但知这次大“扫荡”中的9月25日，一分区部队在易县狼牙山出了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至今壮士之一葛振林同志尚健在，成为我国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的群体，他们的光辉形象是永远鼓舞我国人民抵御异族侵略的不朽力量。

### 3、1943年一年两次惨酷“扫荡”梗概——化整为零，以山洞办院的“高级”形式

日寇虽然连年“扫荡”，但已是处于相持阶段垂死前的挣扎了，因此敌人更加孤注一掷，更加疯狂与残暴，自此，华北形势逐步好转，我们更付出了沉重代价。

先谈谈本题的插曲——1943年春末小“扫荡”：后来得知，我本是在“扫荡”合围圈之外的单位，但因某种凑巧的原因，正好跳入（见图34）敌人的搜山圈内，圈内则十分残酷，圈外安然“无恙”。敌人在外部的骚扰，也是为配合其圈内“扫荡”的。我遇到亲爱的姐姐王艳素（见图35）及王全兴大伯，并得到她们的掩护及支援，才免于遭难，姐姐（和王大伯）和我老区其他善良的人民一样，表现了不仅是对其弟弟而更重要的是对我八路军的深情厚意。

当时我在司令部特等射手训练班工作，这个单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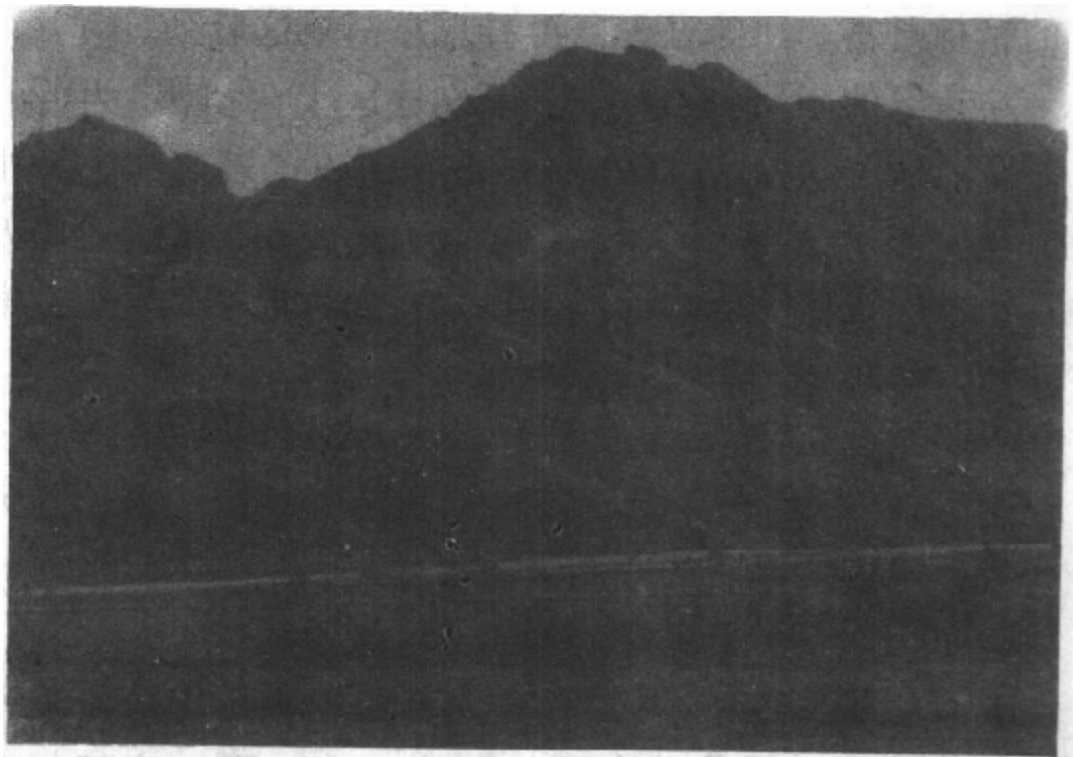


图 34 鸡冠山及钹子山，本拟去鸡冠山南的  
涎拉洞沟，却误入了敌人的合围圈三土门村。

专门训练部队副班长以上军事人员射击技术的临时单位，驻防在唐县齐家佐，后移防下苇村，我请假回家探亲，却正遇上这次“小”而惨酷的局部性的“扫荡”，经查证，是五月一日，我村干部动员人们坚壁清野，说马上有可能进入反“扫荡”，我闻信立即告别祖父、父母及贵银等，立即动身拟回部队，时值下午后半晌，刚要出门，被祖父喊住：“增寿，你回来，不能走！人家荒乱往家里跑，咱家荒乱怎让孩子走？别走了，黑灯瞎火的晚上碰上敌人怎么办？”我说：“爷，我是往北走，不会碰上敌人的。”“不行，不能走！”家里别人也劝留下。我只好照培军装，穿上公家发的军鞋，再得回故言者者者



图 35 善良的老区人民之一、亲爱的姐姐王艳素，  
姐背后东屋是我 1942 年初游击军一支队卫生所的驻址。

衣，经化装后，真像一个“傻小子”，全家视我都捧腹大笑。

五一晚上约八点钟左右，刚睡倒，听到枪声，街上喊“敌人来了！”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多数乡亲跑往西沟了，我家在东沟（汗拉洞沟）有个固定的点，所以拟到东沟躲藏。我全家正要过河时，敌人的马队从南家庄、马牛台已向北疾驰而来，我家被敌冲散，由于祖父、父母、贵银都走得慢隔在了河西岸，我只身一人隔在河东，我向东坡井尔峪上山，漆黑的夜，寂静的山谷，完全被敌人的吆喝声、马蹄声所划破，加之回音振荡，山谷好像沸鼎一样。家里人都互不相知已跑到何处

了。我直上至鸡冠山的北端暂息，以山脊为界，往西仍人叫马嘶，往东则寂静非常，见黄鼠狼从我眼前遛过，好像这里旁若无人。这时我非常懊悔不该留下，免得部队首长和家里人都惦念，然而又很理解爷爷的心情和谅解全家的一片心意。

次日拂晓，还是黑洞洞地视野模糊，片刻钹子山东侧已微露初阳，见敌人已控制了制高点，低得擦头的敌机噪声极大，频频飞来飞去与钹子山这个制高点联络，小鬼子们红布为号与敌机招手，看来敌人正在布署、运动。敌机的腹部及机翼下面的“红膏药”看得非常清晰，每当敌机掠过，好像疾云遮住了阳光，我虽然与敌只隔咫尺，敌人却似不理会所见到的一切，很显然，敌人正在布署战场，我们冒险向西遁去就“无事”了，然而这时我想，我村情况不明，不能下西边找家里人去了，只有往东侧自己打游击了。后来得知，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策，正跳到敌人合围圈里去了。

自钹子山东侧下山，正是墨斗村西北的井尔沟，见猴儿山（尖沟尖）甘亩岭制高点也已被敌人控制，无法突围，只有凭自己肤浅的战斗经验视情斟定行动了，墨斗上三土门的乡亲们都跑到井尔沟来了，找到了姐姐，姐姐不放心不同意我自己走，我们一同从井尔沟向北绕过去迷城的山脊之路下到北沟，唧了沟（见图36），见山上也是敌特把持并喊叫联络，这时遇到上三土门王全兴大伯，他在这里靠梯田凹处的阶子根又自己垒一重阶，实是一个掩体，能钻二三人，他让我和他在一起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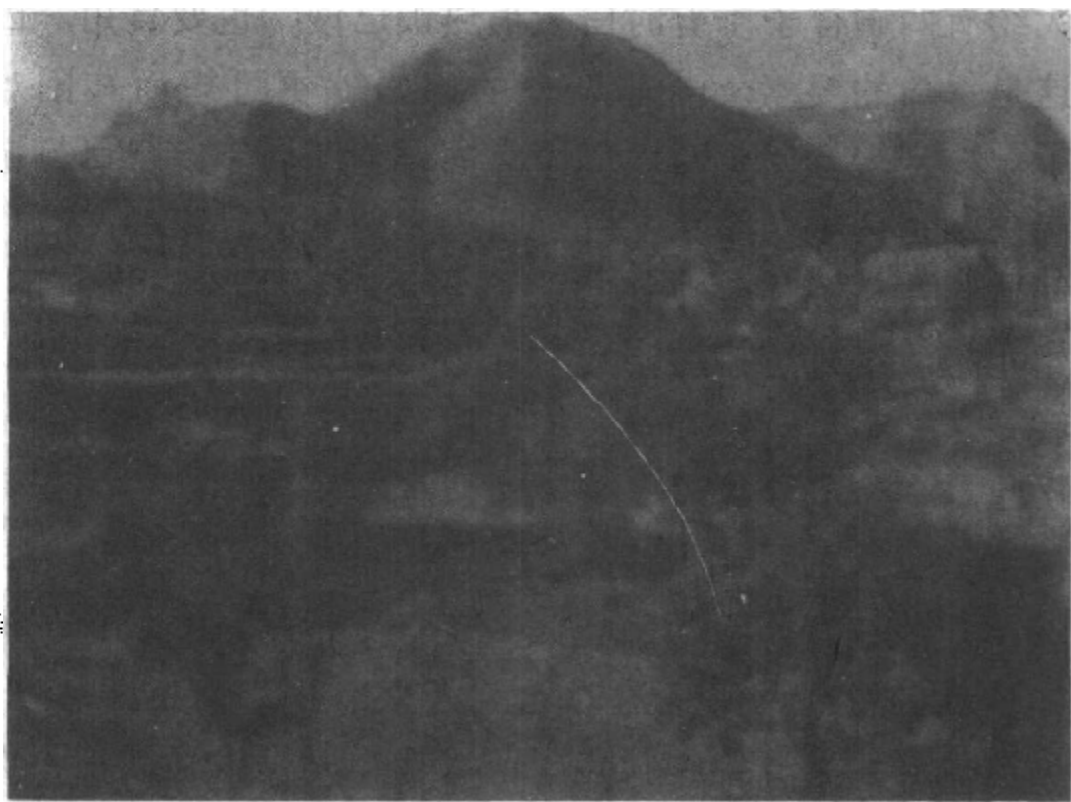


图 36 唧了沟的地形：左侧尖沟尖，  
正中廿亩岭，右下重阶掩体

藏，只是他已年老咳嗽气喘，姐姐告我你就与大伯在一起吧，每天晚上到我们坟地去找我。自昨晚至午后已很饿了，只好拔点兔窝草充饥，后来我看地形，这里很不理想，因地处山坳，能藏不能走，要“走”除非夜间，白天均显露在敌视野以内是不能转移的。见到这个重阶上面的地埕有一棵大青籽树，地埕的稍南侧也有一树，心想在这里绝不能暴露目标，暴露则等于束手待毙，就这样每早看看有无搜山迹象，如有即钻掩体；否则在外边观察，一到黄昏，我二人分别出去找吃的。我每天到姐姐婆家祖坟去找姐，姐姐每天给我装一小布袋枣儿饭

大约有两碗样子，有时白天很热饭已馊，也要食用。因这是保命的要素，若非亲爱的姐姐就更可想而知困难了。后来得知同一时内二团史炳辉等四同志，自己打游击到洞子沟银洞隐蔽，连续四天未能解决好吃的，故夜间冒险才从赤岳、水峪口突围出去找二团。对比之下，姐姐抱着小外甥打游击已很不易了，还得给我做饭吃，我是多么幸运啊！在这个掩体里隐蔽遇到两次意外：一次是有一个老乡拉着一头骡子，拴在了掩体南边的青籽树上，王大伯不认识该人，肯定不是三土门人，也不好喊叫让他拉开，因骡子在此，是一个很招风的目标，掩体怕敌人发现。幸亏这时无敌人来，我二人正踌躇间，见这位老乡解开缰绳拉走了，大概也是嫌太显眼怕不保险故拉走了。我二人松一口气，说，这好啦，很高兴，实际也不一定就被人发现。又有一天，可能在“扫荡”开始后五六天时，这是敌人搜山的正高潮，见搜山的鬼子由下向上沿我掩体地埵的南坡向西搜索，边走边喊：“乌拉坦，乌拉坦……！”与另一敌人联系，小鬼子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六五步枪）头戴瓜皮小帽，拙笨的大皮鞋，敞着胸，看来他们也已疲惫不堪了，因距掩体太近，大伯又有咳嗽病，看来大伯也怕咳出声来招来祸殃，他尽力控制，我也示意大伯千万勿咳，因敌人也未料到阶根的重阶内有八路军，所以疲惫地向西去了，鬼子已走远了，我让大伯尽情使劲的咳吧，二人嫣然一笑，以示胜利。

如此连续十来天，有一次找不到姐姐，我很着急，

因时常听到人被抓走，女的被强奸等语，后来知道姐姐无事，才放心，敌人除在山顶的制高点外，多数敌人在下三土门宿营，他们让民夫给杀猪活剥皮，炖肉吃，将一切地窖能打开的全部打开财物抢走，与敌上下相距各二三里，军民却觉得甚为安全地做饭、睡觉。一天白天老乡们兴高彩烈的说，“敌人已退了，尖沟尖的敌人也走了。”我在掩体一块石上雕写上“避难室”三字，辞别王大伯，回到姐姐家里，见乱七八糟，院内支着做过饭的大锅，屋里地和院里刨开几个大坑，但都未将东西刨开，这次财物未丢失，还好。我和姐姐说，我赶快回家去，还不知祖父、父母等多么着急呢，姐姐同意我回，我即从井尔沟上尖沟尖，顺去贤表的路下山回走，然而在河边洗衣的贵银，老远看像我，即预先给祖父报信去了，说：“像增寿，他回来了！”不一会，我果然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很高兴。祖父、父亲和我说：“我全家被冲散了，我们很不放心，不知你已逃出去，还是被敌人裹走了”，祖父说：“你明天就去将你姐接来，咱们全家团圆团圆”。父亲说“你走了，我们很不放心，但鬼子汉奸从台瓜上突然下来了，我们赶快将素芬、贵银藏到窝牢里（水冲的大坑，梯田石阶也被冲毁处，将大坑留下，外边再砌上石阶一点看不出里面是空的，留一窟窿，让年青人钻进去，爷爷给堵住大石，这种掩体我村不在少数），鬼子下来，一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你爷很沉住气不动声色，芬子在你娘怀里吃奶，所以汉奸检查我手掌，一看全手老茧和鬼子说：‘太君，他是

老百姓，不是八路。’在这个地埝里搜察了好久，又从台瓜回钯子山去了，如果你要在可就糟了，肯定会遭敌人杀害，而且小屋（简易小房、作饭、睡觉看枣儿之用）里就有你的红十字挎包等，幸未进屋搜察。所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好，虽然咱们各自着急，但都平安回来了”，祖父在菜园里劈了不少着达菜，让我拿去感谢王全行大伯，大伯他很高兴，姐姐带刚满三岁的外甥兆民住两天就忙着回婆家去了。

我急着回部队去，以免首长着急，回到下苇村，同志们很高兴，单军装已发，换了换衣服特别感到精神。后来得知：

(1) 这次“扫荡”所以结束得如此之快，是由于北水峪一老乡，机智地偷出敌人一个文件包，发现这次敌人的布署是兵力大，范围小，是由大战犯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吉田旅团的罪恶“扫荡”。范围是从套里山头以东往北鸡冠山、猴儿山、白花山、清虚山向东至（封锁）沟的一块小范围，所以制高点均速被敌占领，敌人的密度很高，所以圈内的军民活动极为困难。领导得知这个布署后，迅速跳出合击圈，在圈外打击敌人，促使“扫荡”早结束。

(2) 我边区军民付了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罕见的。“完县野昌惨案就出在这次。5月7日清晨，在汉奸庞珠子（已镇压）引导下，将石沟掩藏的野场、龙王水、王家庄、解放四村的老乡围在一个地埝里集体枪杀，118人当场壮烈牺牲，王长合、王喜亚、王德子、陈亭

儿四家全部遇难断了香烟，54人重伤，尸体纵横叠枕，不忍目睹，民族小英雄儿童团长王璞母子二人大义凛然，万古流芳。冲锋剧社李劫夫留下了悲愤的《忘不了》歌曲。”（暴行录 236—242 页）。

我分区卫生处医务科主任长征同志马振华及我的同学刘莲田都牺牲在唐梅东面的马尔山，这是对我分区精明能干的卫生工作力量的损失，全游击军（等于全团的）一个月津贴都在供给部胡兆才主任的皮包内，结果胡主任牺牲在干沟（马尔山沟口），这时有一个绰号叫“周大牙”的休养员，他为活命，拿上胡主任的皮包向敌人投降了。该例投敌不比一般，影响非常之坏。二者都是有生命的人，胡主任死的光荣，重如泰山；而‘周大牙’这样的软骨头，却生不如死，无人不骂。

仅短短的十多天，日寇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只白花山下南边的赤岳村，即被敌杀害 4 人，和非人的污辱及酷刑迫害。

①在洞子沟被杀害的人就有：陈九尔、贾小元、春彦母亲、范改凤（岳伯母），被打出肠子爬回住处而死。

②在洞子沟、陈京彦、贾玉民二人被敌抓住，拷打谁是共产党、八路军？他们坚韧地不说，鬼子将他二人倒戳在水瓮中多次拷打，险些被折磨死，但二位乡亲在敌人面前保持了我老区人民的民族气节。

③在枣尔沟将岳父贾新广（图 37）和共产党



员范洪章同志逮住，在沟口看了二人的手掌说是八路军，拷打不招，又拷打贾让他招说范是八路军，岳父大义凛然，坚定地保护范洪章同志，答道：“我二人是一个村的，我最知道他，他根本不是什么八路军，”因此被敌伪打昏过去。晚上把他二人解往行



图 37 岳父贾新广  
(及岳母赵青尔)

1983年摄于石

营沟村，又逼又打，二人相依为命互相保护。夜深由二伪军送往下苇村要处死他二人，途中，二伪军对鬼子不满地说：“他妈的！他们吃稻米，让我们吃南瓜菜”，故将贾、范二人放跑归家，家人团聚了，伪军佯向空中空打数枪回去交差。岳父和范同志所以被放，也不是这两个民族败类的良心谴责，而是狼犬争肉不均所致，否则，为何还边走边打他们呢？！贾、范二人幸存下来，保持了民族气节和阶级友爱，给后代传为佳话。

④当时青年妇女满身是土，满脸是泥，为的是不被敌人发现，可是也有少数无辜妇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了不得！该村贾录琴同志在野外被敌逮回村里，被三四个日本强盗轮奸，对人格的污辱莫过于被人强奸实不能容忍。还有贾改云被敌抓去兰宝家被敌污奸。他们仅是受害者之一。

⑤共产党员妇教会主任贾凤亭同志，后嫁到辛

庄村，由于坏人告密，被鬼子逮住示众，要她承认党员、村干部，她坚韧不拔矢口否认，鬼子将她捆在树上，当众割去乳头，仍不招，被刺刀挑死。

⑥赤岳村儿童团长贾荣儿女孩子，被敌抓住，逼迫她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她坚贞不屈，拒不告诉敌人，被敌人当场刺死，年仅十三四岁的农村小姑娘为了民族气节与革命利益，牺牲了她极为短暂的一生。

他们都是刘胡兰式女杰，老区普通农村妇女，理应受到后人怀念和传颂，但知她们者甚少，她们应该万古流芳！还有：贾元儿，日寇抓住他，让他带路找八路军、找粮食，他拒绝，被当场枪杀。稻园村民张东燕为我军背公粮，被鬼子打死。烈士贾凤亭之父贾狗儿，也死在日寇手里。……这些先烈都不应遗忘，而应永垂千古！

(3) 三土门的乡亲说：“鬼子搜山中还强奸妇女，一个鬼子用麻纸包着他勃起的生殖器，将一年青妇女拉到土洞内强奸，把女同志们吓得不知何时遭此厄运。日本鬼子真是一群没有人性的毛驴和野兽！”

(4) 这次敌人将抓住我边区的军民押送去敌区者颇多，有的被送到去石门大兴纱厂集中营当苦力，有的被解去东北和日本当苦力，鬼子投降后才放回（如高其贤医生、曹玉春看护长即是如此。他们在敌人的集中营，还建立了我党组织，还过党的生活。敌人投降后，老高等同志将工头挤在大桥，工头求饶他们向他头上用铁棍

敲击一下，掉到桥下死亡，所以他们的党龄不变)。

(5) 肯定有汗奸特务与敌配合，将埋藏很好的造子弹机器被挖去，还抢去大批牲畜财物，使边区人民穷上加穷。所以人们对奸细在某种意义上比对鬼子还气愤，因为如果没有奸细配合，敌人是无能为力的。

(6) 打游击夜间或黄昏，由于晴空的反衬，故山下看山上易，而山上看山下难，与昼恰反，所以，夜间转移人影勿过山头；即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被敌发觉，也无奈我何。如在上三土门看尖沟尖制高点就是这样，这条经验适合所有晴天夜间转移作战。

## 1943年秋季反“扫荡”—— 山洞办院的“高级”形式

我们仍以化整为小零的对策对付敌人，突出的一点是创山洞内办院的“高级”范例。所以称“高级”，是我所利用大山洞作医疗、护理、供工休人员吃饭、在洞内作手术、战斗等多种用途。

反“扫荡”前的第一休养所，在当时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医疗单位。

我生平主刀作的第1例截肢术（象征“四肢外科”水平的标准手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奉命从前方调到休养一所工作，驻在阜平县台峪村，所长连肇基同志，曾与白求恩大夫当过消毒员，作

过助手学到一些手术技术，并常述说与白大夫一同工作的战斗生活。在连所长具体领导下，手术工作较其他所要先进行，而且比较放手，记得医生中还有同学谢满城、张世荣。我生平以来第一例截肢手术就是连肇基所长带我完成的：1943年三四月间急诊来一右手炸伤者，他是一位阜平老区的铁匠，绰号“外国能”，姓名忘记了，男，约40岁左右，他村距台峪二三十里，伤后立即送来我所，是比较及时的新鲜伤，记得他的右手严重炸伤，已不能修复，就在台峪老乡家，由我主刀给他作前膊前1/3截肢术后一期愈合。在当时三分区军医中我也是最年少（18岁）完成这项水平的手术者。伤员很满意，他知我喜欢音乐，出院前，将他自制的大正琴送给我作纪念。但对其以后从事的铁匠事业却表现悲观，他设想回家去后，要指挥家人用敌人飞机碎片的铝，作一个被动关节的假手。现在看来，他的设想是大胆而先进的，但是作成与否？不详。

先驻台峪，后搬往台峪南边三里的安王庙内驻，当时还有和尚，其中之一叫国瑞。西院是大院，安王庙及另一大殿内均住着伤病员，与泥胎神像住在同室，所部驻在小东院与和尚们一起住。为了扩大病床给伤病员创造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所长指导员与和尚国瑞做好工作，全所同志动员拉倒神像，筑成土台“单床”，工程就很不小，只神像下面的神台，就有很大的土方工程，由于年久里边蝎子特多，将两个正殿都做成单床病房，十分“阔气”，但不断有人挨蝎子螫，庙内也曾发现过

蛇。这样的病房在战时是十分“高级”的，对医生检查、注射，重症护理都较在炕上要方便得多。病房里边曾有一所原所长苑馨斋住院，因骨结核截去一条腿，还有两个我军在党城漫石道战斗中俘掳的小鬼子，其中之一和我同岁，他的伤不重到处庙外庙内乱转，人们和他开玩笑的玩耍。大的伤稍重，卧床休养，由于语言不同，他向看护要烟抽，看护说没有，他将小瓜皮帽向下一拉遮住眼睛表示失望，每当看护端水洗完脸后，也同样是用小瓜皮帽擦脸，当年鬼子的威风已丧失殆尽，不禁使人好笑。据说那个大一点的是机枪射手，稍顽固一点，但他一看我军冲上去立即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那个小的是中学生，毫无战斗经验，一吓唬就投降了。正在这时军区姜齐贤部长来此视察，向伤病员问好，又有殷希彭、陈棋园两位白校教员陪部长一同前来，当他们知道有两个小日本俘掳时，看望了他们，完全用日语和他们谈话，事后陈教员翻译说：“他们有点意见，想吃大米”，但所里一粒也无，去年颗粒不收也无法弄到。但人们对殷、陈二位教员投以钦佩羡慕的目光，认为他们真了不起。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但无论如何，小鬼子已不是侵华刚开始时的老鬼子了，他们已不按着武士道精神去送死了，就看用小瓜皮帽擦脸的德性，也说明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同时，将安王庙正殿前面的戏台，改作男看护住，南配殿小房改作手术室、外科室、药房等科室。手术室内在西侧还设有参观台，隔一层纱布，参观者不能进

室。石碳酸室内消毒认真，穿手术衣的方法完全是无菌的，手术参加者们都戴着只露两个眼睛的手术帽，所困难的当时还无橡皮手套，现在看来这些布局与操作都是符合无菌观念和要求的。

但好景无几天，1943年9月，鬼子开始“扫荡”了，因是相持阶段敌人垂死挣扎，所以更加凶残。战前上级动员说，敌人想用“铁壁合围”、“梅花形扫荡”企图消灭我们。我们已听惯了这种恫吓，都斥之以鼻！“九月十六日，敌集结全部兵力共4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秋冬季“毁灭扫荡”……12月15日，被我彻底击败。在三个月反“扫荡”中，我主力部队作战2083次，民兵作战2192次，歼灭日军1万余名。……对根据地的破坏是空前残酷的，八个县中即被烧房屋13万余间，抢走牲口十二万余头，粮食14万市担，衣物40余万件，人民群众被屠杀5000余人”。（摘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549页）。敌人来到青山村时（距大庙三十里），我们全所同志才痛心地撤离了自己辛勤劳动成果的安王庙院址，分两组上神仙山上打游击，所长连肇基等带重病人经“阎王鼻”去上寺，将重患移至村西步步登高的跑马梁下面的一个大山洞里，我们这组由文书樊国政负责还有我及看护高福进及一位姓贾的炊事员，我们带几十名轻伤病员，由大庙出发经台峪、龙脖子、白石台、下寺（齐家庄和）住西岸根，这是东麓上山必经之路，所以在神仙山下放下我组，主要是将轻患

在山下疏散减少山上压力；负责向山上送粮及菜蔬供应。将 20 多名轻患疏散在西岸根东南方的一个小村及西南方向步步登高的大盘道村。我和高福进同志负责巡诊、治疗，但跑路要比白花山少得多，所以并不感到费力气。

敌人驻在台峪经常经井尔沟向我们骚扰，其原因是：沟口的白石台原驻有我 42 团一个连负责警戒，连长是我的乡亲李戊己，我们可从他那里及时得到情况，后来该连调走执行别的任务去了，我们即陷于被动，必须按敌人搜山的敌情进行工作，在西岸根，我们坚壁一台破电话机，遇情况缓和或搜山间隙，与王支电话站打听敌情，虽极闭塞，也非与世完全隔绝。敌人专门找我战斗部队企图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另一原因，是下寺就是军区工业部（军工厂别称），这个厂子主要制黄色炸药及子弹中的火药，他们自己用瓷瓮作的蒸馏管道是制作强酸的设备，还可在下寺见到半山建有独幢的小屋，据说每个小房是一工作间，只有一个人在里面操作万一出事故，只能炸毁这个小房及伤一个人，所以，那制作雷管的工作是很危险的，再好的朋友他们也不让你在室内，以免一同伤亡。

这个厂子里有大批凿掉底的小瓮及各种瓷的容器。这个厂子里有我村石丑尔的女儿石艳祝当制造硫酸的工人，我们数人去看她，她很热情地将我们领到一个“客房”，她提着两个夜壶，我们诧异地在想提着尿壶干什么？然而她又是女同志！她说：“增寿你们不要嫌脏，

我们的夜壶都没尿过尿，是专门放炸药的”。并督促我们说“喝、喝、喝吧，不脏。我们都用尿壶喝水”。原来那是用来招待我们的开水。我们被她的殷勤热情所难却，只好喝着她用夜壶提来的水，但总感不是滋味，所以，我们都勉强饮用适可而止。因为“扫荡”已开始，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坚壁，将她们自己做的地雷，在路上、在坚壁的地方埋设，平时都扣着一个筛子，以示危险！她领我们绕过了这些已布好的雷，当时，由于警戒不严，曾将自己人炸伤过。扫荡结束后，艳祝曾去安王庙看过我一次，她感到半截胳膊、半截腿的人太可怜，说你们医务工作太可怕，我反而感到他们作炸药、作雷管的工作太可怕。其实我们的工作都可怕，也都不可怕，因为革命分工不同，当你的工作熟悉了，也就自然从可怕转为不可怕。敌人也为破坏这个厂子不断在周围骚扰，最后破坏了厂房一部，成品的弹药却因他们保护有力受损不大。

在西岸根村，住在粮秣委员田红皂家，除他老母外，哥三个都成家，小孩不少，还有他的妹妹，全家大约十来口人的大家庭，我们也在他家住，军民守着一口七印破锅，人家做了我们做，因为锅破漏水，用黑枣糊后才能用，你一锅，我一锅，军民同屋生活，相互谦让，十分亲切，关系很是融洽，后来我们搬到西边一个军属家，她爱人在部队工作，家里几个孩子，生活也很困难，但由于她丈夫也在部队，所以虽穷的连小米也没有，对我们也很照顾，我们也尽量不麻烦这位“同行”



的房东大嫂。夜晚我睡到他家北面崖上一个小石洞内，只在她家做做饭。这个小山洞，约六尺深，能坐起，距地面约一人高，铺点草睡在洞内，简直舒服极了，我睡在里边真是‘活神仙’了。1991年的老区之行它是我重访的目标之一，可惜风太大，天转冷，未能如愿，很是遗憾！

还有田村长家对过居住的大娘，对我们数人也很亲热，深秋某次敌人“合击”我们回到西岸根时，这位大娘炖云豆角也叫着我的名字让到他家去吃“饭”，这仅仅的一碗豆角，军民鱼水之情有多深啊！大娘家穷得无下锅米，我们回大庙后由她的小儿子（和我同岁）还有田红皂的妹妹等乡亲小伙伴们特地看望我们，我们当年伙食还很差，但我们也热情地招待这些相处甚好的“老”房东们。

为了避开和应付敌人的骚扰，我们步步登高搬到大盘道住，只几户人家，全村共有一盘碾，粮食没有了，请老田给我们秤了几斤谷子，晚上我们碾成谷面，炕成干粮，尚未进咀已先苏，所以同志们称它是“马蹄酥”，天不亮即爬上西边棺岸悬崖的一个小石洞内，下面也是悬崖，太阳伊出我们已钻入洞中，因为地势高，看的远，易于发现敌人。敌人虽强，但他不知我们在崖；我们虽弱，但能看到敌人搜山的动向，所以主动。每到太阳快落山时，敌人撤回白石台了，我们下崖送药、换药、工作和做饭，这个小山洞地势虽高，但在群峰中的共同特点是，地势高也看不到彼面，视野有限，我们商

量着要转移个更理想的地方。在这个小山洞内我看了《红楼梦》书中悲欢离合故事的描写，与我们相处的具体环境很不对味，但应该承认这不仅是在战斗间隙看小说，更重要的是在学习文化。正当这时候，发现洞内有一条盘踞冬眠的花蛇，在石隙内它虽无危害过我们，我们还是搬出洞来另找隐蔽的地方了。就在这时候炊事员刘国权同志，因饥饿，吃了不少尚未成熟的黄黑枣，所以腹痛剧烈，抱腹翻滚，所长连肇基也不敢开腹，明知他是鞣酸凝结的胃梗塞，但就这样看着战友离开了人世，同志们对老刘的去世很悲痛，我们在极困难情况下还找到笔墨写了一个墓碑，注明死亡年月日时，以示怀念战友。

有一天，连肇基所长领着总院政委王之平同志来到西岸根，参加了我们党小组会，王政委在小组会上说：“敌人外强中干，是垂死前的挣扎，他们活不久了。你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共产党员嘛，除死无大灾……”最后五字是多么豪言壮语啊，成为我对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听到这几个字，立即想到王之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1965年病故于北京，我和幸福祥同志特意去八宝山烈士公墓去看望王政委的骨灰及遗容。我们一直按王之平同志的指示坚持战斗与敌人周旋，坚持到反“扫荡”胜利，敌人没捞到多少好处，反而在台峪挨了地雷炸，死伤数人，我们虽无亲眼见到，但我们高兴极了，是敌人应得到的报应和下场。

敌人抓住白石台的一个软蛋段福瑞，由他带路袭击了下寺工业部和休养所及游击组员，他把鬼子领到隐蔽绰号叫“牡丹”的哥哥的山洞来，抓捕自己的乡亲，“牡丹”的哥哥，使用手雷炸敌人时，不幸自己牺牲，本村在安王庙出家的和尚国聪被敌抓去，我组伤员刘成义同志被日寇杀害，将他葬在去上寺的路旁北面，后来被狼群将尸体刨出食光，很是可怜。张介夫处长负伤，山上白校师生遭到三架敌机的轰炸和轮番扫射，听说殷希彭教员的儿子被炸身亡，还抢走了不少炸弹和其他物资。这次敌人搜山最靠腹地，已超越了西岸根的高度，但由于天险“阎王鼻”，敌人未能上到山顶去。总之，这次敌人搜山我们损失不小，“扫荡”尚未结束，就在白石台沟里面一块空地上开公审大会，由区公所宣布了段福瑞的罪行，由我们通信员罗祯同志执行了枪决命令，给死去的军民烈士偿了血债。这些为虎作伥的伥比虎还可恨，是因他们起了虎起不了的作用。所以，落得个枪毙，活该！

这一阶段工作很困难，我们常吃两头不见太阳的饭。连 Tr. jod 也没有了，就用盐水换药，半磅胃灵安用了“扫荡”的全过程。

这次敌人深入腹地搜山时，我们在西岸根北梁下神仙山，经弯沟寺转移到蟒栏、上支三所住一天，又回到大盘道坚持战斗。这是山下的概况。

“阎王鼻”是西岸根去上寺必经之隘口，这里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通行，初次过此甚感眼

晕，万一滑下，定死无生，42团一个饲养员经过三次死三匹马，后被定为有意破坏而处决，但路走熟了，夜间也曾走过多次无妨。这个隘口只要一个战斗小组（三条枪）即可把持，就怕从背后的跑马梁上迂回过来。

后来我组也调到上寺工作，背粮无口袋，用裤子背，缚住三个口，也能背几十斤，看护同志们也曾到跑马梁上用裤装采的野黄花，收获很大，工休都吃不完，记得没有绷带了，看护班张丙基班长撕开一条被子消毒后作绷带，无纱布曾用麻纸垫在敷料里边，以节约棉纱。无镊子换药，看护同志们用钹子齿作成代用品，无大便器用瓦片接大便……。全院同志克服了许多物质困难坚持工作。记得我42团看护长张文江同志是去年阜平追击战中，骨盆负伤的重伤员，这次也在所部休养。相比之下，上寺要比西岸根的环境安全得多。

但为了预防万一，万一从背后的跑马梁上敌人下来，则并不安全，所以，上寺西边距村约三里地的跑马梁下，有一个大山洞，洞口坐北朝南，不到近处，看不到洞口，是比较荫蔽的所在，这个洞里一直“正常”地工作：洞底住着重伤员，西侧住男同志，东侧女同志住，洞口光线好是手术室，还有一口锅，做饭清毒都用它。洞里的物质条件，相对地比别地略好，主要在连肇基所长领导下，各种手术虽然不多但可同样进行，如扩创（切对口引流）、取腐骨、截肢等。我和高福进等同志临时性一同工作，洞口附近风景幽美，在晴天视野清晰，真是晴空万里，能看到层层山峦，能看到我的故乡

的莲花山、猴尔山、钚子山等，最远渐与碧兰的天空相接镶处，能看到雾气腾腾的平原上有一高大的垂直影，这就是有名的定州塔（开元寺塔），但我那时还从未去过定县城。

一有情况轻患能动的到附近石隙草丛中隐蔽，重患动不了仍在洞里，洞口埋设地雷，每次都要首先将锅坚壁好，就怕万一损失，就无法工作与生活了，工作人员在附近隐蔽，高福进给我们在大洞东南侧的辟裂崖处找到一个山缝，远看是条缝，近看是井状，从上面下到缝内去，能占三四人，地势太好了，就是敌人发现，打枪也能侧身隐蔽。我们这样做过几次，但每次敌人都未到此。上寺有时人员里有很多是白校的，有一次转移到此，到处是人。

因为大洞在战时也能和平时一样进行医疗、护理、吃饭和战斗，所以我认为它是无与伦比的“高级”形式的战时医院，就是这样情况下，不少伤病员治愈重返前线，增加了战斗力，保障了战争的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疗卫生工作无论在战时和平时都是极其重要，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作。

上寺所部，也有转来的轻患，有一次我们到上寺南梁背后的菜地村联系一次疏散问题。尚未疏散，大约在新年前，“扫荡”结束了。全所同志回台峪集中过元旦（及过春节），但有几十名重患由大洞移至上寺村内治疗，未能一同下山集中。我们分别在山上山下共庆反“扫荡”的胜利。这时有一个“鬼子剩”——日寇将他

处决时，将他背由左上至右下斜砍一刀，以为将他砍死了，装死一天夜间跑入内地，将肩甲骨及棘突都砍断了，幸无进胸，故活了下来。

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日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惨案（图 38、39），杀死 832 人，敌人将尸体扔到三口井内，“扫荡”结束后死难者家属无法辨认亲人尸体，故集体埋葬，竖有“千人墓”石碑（图 40）。（详见《参考消息》1982.8.8 转摘《暴行录》，《侵华日军丧心病狂的平阳大屠杀》一文，文中载：“……日寇在平阳村一带扫荡了八十七天，屠杀我男女老少村民七百多人，烧毁房屋 5 千多间，抢走的财产无法计算。在平阳村的每口井里都填着死尸，院子里结着一寸厚的血层，大路上尸体狼藉，五个杀人场尸骨遍地，血迹殷殷，令人目不忍睹！”上坟时家属只有到井口去哭，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家庭，敌人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遇难的亲人们，真是心已被撕碎，欲哭无声，泪已流干！

按上书（二）377 页记载：“9 月 15 日，在唐县稻园杀人 17 人，烧房 300 间；9 月 20 日，在唐县江家沟杀人 16 人；9 月 20 日，在唐县军城南关，杀人 10 人，烧房 230 间；10 月 9 日，在唐县和家庄杀人 19 人；11 月 1 日，在唐县西胜沟村杀人 19 人；11 月 1 日，在唐县葛公村，杀人 25 人，烧房 50 间；12 月 6 日，在阜平柏崖村杀人 100 人；12 月 7 日，曲阳贾家口村，杀人 120 余人，烧房 800 间。”

这次灭绝人性“扫荡”，其凶残程度真如红了眼瞎



图 38 阜平县罗峪村当年妇救会主任刘耀梅惨遭日军杀害。



图 39 一九四三年，日军在阜平制造了平阳惨案。这是惨案中被日军杀害的我部分人民的尸体。

徒一样超过任何一年。有的村庄，如以仅约140户左右、人600左右口的唐县赤岳村为例：在1943年两次的“扫荡”中，虽经非人的人身迫害仍残活的不说，只被敌人杀害的就有31人之多，使本来屡遭日寇蹂躏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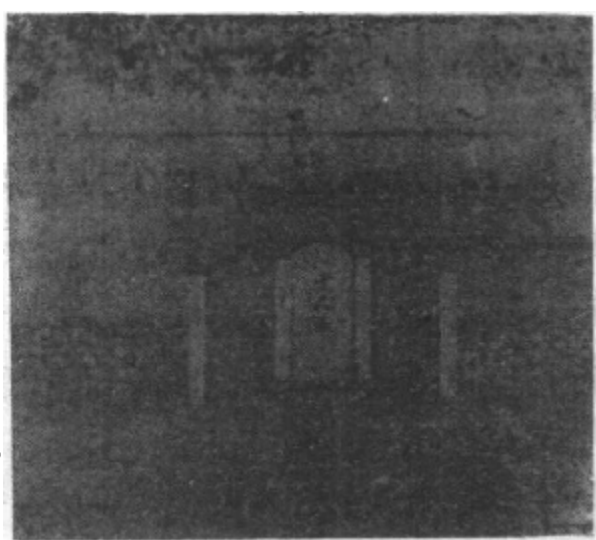


图40 平阳惨案后村里修建的千人墓

去年灾荒之后，生活极端困难十分可怜的普通一小村，一下变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情景，而且死者大都是老幼妇孺，人口一下稀疏了，人间天伦之乐的欢声笑语消失了，代之是生死别离痛楚惆怅，一片凄惨景象。

由于鬼子在村西头井池边踏响了地雷，炸伤一个鬼子，鬼子即大开杀戒，将白灵之母，禄恩之母，胜银爱人和小孩，土元之妻和小孩，陈玉申之妻和小孩，淘气媳妇，陈三尔姐俩共11人，恶狠狠地将这些无辜枪杀在井边，陈三儿姐妹俩害怕不敢看，相互抱着被敌人杀害。

还有村东一位老妇在战乱中病故在野外北沟，其老伴贾六柱还陪伴她同衾而卧，整整哭了一夜，次日草草埋葬，连他们仅有的嫁到外村的独生女儿，也未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据赤岳嫁到稻园的姑娘、知情者、1944年老党员陈素平妹说：

“在赤岳杨家峪沟一个地埕就被日寇刺死 21（或 27）人之多，是鬼子把乡亲们圈下来逼到这个地埕里刺死的，鬼子端着刺刀，还呀呀地喊着杀害乡亲，村东头的叫不上名字，只村西头所知道的死难者就有：

星秤的一家死了七人，即：陈改亭及其母亲和女儿、之弟陈喜才、之婆母（即海其的姑）、之妯娌即小全媳妇，还有她的孩子，她被挑死后，孩子还在怀里吃奶，后来孩子也饿死了。

贾义儿的媳妇和他八岁的儿子国拴子都同一天死的，国拴被刺出肠子，耷拉着露在腹外，贾义儿夜间去找其妻时，这个地埕已血流成河，血浆漫过鞋底，惨忍之极！孩子发现了父亲，不喊痛，只喊口渴，被贾义儿抱到一个叫老兔子窝的山洞里，孩子喝了些凉水，半夜就死在洞里。

贾玉民的妈长着一个很大的瘰袋脖，鬼子惨忍地将她的瘰袋挑开流血而亡。

双胞胎陈大个、陈小个的妈以及贾九儿，都死在这个地埕里。

贾红恩的妈刺得不太深，她就势倒下装死，压在尸堆里逃出来，后来又活了许多年。

……

这个地埕乡亲们至今怀念亲人，夜间有人听到哭声，常闹鬼固不可信，也可能是幻听，但谁也知道这个

地埝乡亲的惨痛史，谁也不申请占用这块地盖房”。

我的表兄区干部潘文卷这次牺牲，千人墓碑上刻有他的英名。我的第一位首长肖直久部长，也是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于柏崖。

这次“扫荡”以平阳为中心据点，将许多人抓去，除去死在日寇魔爪的 832 人以外，还抓去大批妇女，随意被这群野兽强奸，侥幸回来的妇女，不是被家人责备，而是见面抱头大哭。记得平阳一对夫妇来台峪一所求治梅毒，他丈夫边哭边说：“他妻子被鬼子遭踏了很久，得了洋梅，妻子回来他也得了梅毒，要求一同治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阴唇的扁平湿疣和龟头下疳，同志们处于极大的同情心，尽心地给其用 606、914、新撒尔法散（Neo-Sipharsan）静脉注射治疗。听说平阳一带接触感染的梅毒也不在少数，如儿童光着屁股坐在母亲坐过小凳后也患了梅毒，但我未亲自看到。日本鬼子那还有人性？！难道他们无姐妹母亲！真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牲畜！

有压迫就有反抗，群英倍出。在 1944 年边区举行的群英大会上，得知奖励了许多英雄人物，如：麻雀战发明者神枪手李殿冰，爆炸英雄李勇，模范医生季中（他用木匠锯、杀猪刀作截肢手术抢救伤员）。冀中武强县十三岁小英雄温三郁，敌人威胁刹掉了他的食中二指昏死过去，也不暴露八路军。还有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中阜平罗峪出了一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刘耀梅。

但她的知名度并不广，故我略多说几句：刘耀梅同

志，就是一位很平常的农村妇女、一般村干部（妇救会主任），一位普通的党员，然而她在被杀害的 832 位乡亲中，是有代表性的一位豪杰。她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强盗荒井，表现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老区人民、中华民族、中共党员的英雄本色；而荒井在英雄面前脑羞成怒，对一位普通弱女实施多种酷刑，将她大腿、臂、胸部的肉一块块地割掉，英雄几次昏过去，忍着剧痛不呻吟，还大骂强盗是‘两条腿的野兽’，并警告强盗“中国人杀不绝，吓不倒！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荒井被骂得狗血喷头，气急败坏要挖她的心肝，她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英勇就义。荒井还在她死后割掉她的头，留下的烈士照片，是将头与躯体对到一块拍摄下来的。

刘耀梅是我国、我老区人民的骄傲，是我伟大中华不屈的高大象征。

……总之，真是可歌可泣，一代豪杰。相比之下段福瑞还不该处决吗？！“周大牙”这些民族败类还有何颜面活在人世！

时至今日，日寇幽灵之右派仍然抵赖与否认，仍不承认侵略。刘耀梅是在她的家乡被东洋鬼子惨杀的，难道被狼吃的羊成了没理的；而吃羊的狼反到成了善良的，人世间那有这等混帐逻辑？岂有此理！

正如烈士生前所谴责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正告日本右派——豺狼绝逃不过猎枪的惩罚！那些荒井的帮凶们——汉奸、特务、亲日派，也绝无好下场！维

护荒井之流的日本右派敢来我平阳否?! 来，试试看。

1943年秋季“扫荡”是日本鬼子的回光返照罢了。1944年敌人还扬言要“扫荡”我们，但被消灭的不是我们八路军和边区人民而是日寇自己。我们虽然也作了相应地准备，但鬼子再也无力进攻了。

### (三) 反“扫荡”中医院工作的 基本策略和经验总结

1、反“扫荡”是敌强我弱战略阶段的产物，是日寇强加给我们的战役。每次“扫荡”都是敌人主动发动，主动找我们，所以我们都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我们的工作是在积极防御战略指导下的行动。休养所就是医院，是战争时期大型后方医院的雏型形式。其实质是：我们怎样在战乱的山地办医院？及医院怎样适应在任何恶劣的战斗环境中完成医疗任务，使伤病员重返战斗岗位坚持和保证战争进行的问题。

每次反“扫荡”，等于一个战役，只是大小、长短、凶残程度不同。如何完成反“扫荡”全过程的医疗工作，是一个极不简单的组织工作与领导艺术。“扫荡”给我们提出了任务要求。反过来，我们经反复实践，要力求把医院办得日臻灵活机动，能更适应战争要求。

“兵民是胜利之本”，离开当地人民群众是寸步难行的，必须依靠老乡的支持办医院。有如：山上、山下的老乡家、庙宇里、土炕上、草铺上、山谷里、大小的山

洞里甚至山沟露营均可办院。只要有群众支持，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说来易，做起难。真正实现，要有正确的办院思想，并多付出辛勤的努力。只要有支持我们的群众，就象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什么困难都不怕。所以，办医院医生护士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群众是老乡。

“扫荡”开始化整为零（分组、疏散），“扫荡”结束化零为整（集中），是休养所工作的基本战术原则和策略。它是符合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尤其符合“敌进我退”，即敌来我走，敌走我回，我们利用敌人下午退出搜山回据点的间隙作治疗、巡诊、做饭，是符合“敌疲我打”的原则的，而且实践证明工休人员均可自主打游击，然后归队集中点，是成功的方式。

我们体会：化零为整（集中）是共同的特点，但化整为零，要化到多大的零？则要视敌人的“扫荡”意图、强度来决定。如：

1940年“扫荡”，主要是对我百团大战的报复，我们避开它，化整为大零，只分了两个大组就可以了。住了山洞，主要是做为病房使用，未发挥医院全功能；

1941年秋季华北大“扫荡”，是大战犯冈村宁次，推行其“三光”政策、“铁壁合围”、“梅花形扫荡”颇为凶残的意图，就需要化整为小零（南白花、东沟）及小小的小零（即菜地一带），直至将休养员疏散到农民家里，与老乡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结束后结算粮食或

出证在其负担的公粮内扣除我们的消费)，证明这是可行的“战术”方法，很了不起的策略。也是我军不同于任何新、旧军队及党派之点，只有我们八路军能受得了，能办到，而敌人也只有望洋兴叹而已。这是由于农民将我们视为自己人，自己家庭的成员，才使我们能够成为摧不垮、打不烂的“铁军”医院，我们立足于相信和依靠老百姓，任何个人也无这样大的本领。我们所以能够做到“军民一家人”，也不全是出自自发，而是由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逐渐树立起来的。具体说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北方局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分不开的。

1943年秋季“扫荡”，是敌外强中干、垂死前挣扎，其凶残程度可想而知，所以除了基本上同上的特点外，主要利用神仙山（即古代北岳恒山、大茂山，台峪村南的安王庙即古代北岳庙，当时皇帝祭祀北岳不便，才在曲阳城里又建一座北岳庙，以近代远。这是已故华北“联大”教授董鲁安的考察结论（见《游击草》一书）。在天然的、烧不了、砸不烂、避风雨的大石洞内办医院，创造了能医疗，能生活、能战斗的更为“高级”的集中治疗的范例。也是抗日战争唯一的“山洞医院”模式的范例。它发挥了医院的全功能，体现了完善地“山洞医院”对山地战争的重要意义。如果再加强战前建设，相信效果更好。

总之，休养所在化整为零后，集中治疗，还是集中+巡诊，还是集中+分散巡诊+疏散到农家方式？不能

一概而论，主要根据敌人的意图、凶残程度的来势、当地情况（条件）等因素而定，这些方式可以说是边区卫生界军民的共同创造。但无论那种方式离开老百姓是绝对办不到的，边区军民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毛主席题词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万岁！我再加上“老区人民万岁”、“八路军万岁”！

粉碎了敌人今年的“扫荡”，又为明年反“扫荡”打下了群众、战场基础。包括反“扫荡”前后间隙医院工作的改进（如1944年在大庙技术练兵），是我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下次反“扫荡”具有有利的影响，统观全局，可将“平时”的休养所与反“扫荡”视为同一事物而非两件事，都对保证战争胜利起有利作用。所以，休养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是重要的。

我们只有在党和八路军创造的根据地，才有这种必胜的保障。我们有了这块根据地，虽战火纷飞却有十分的安全感，因有了坚如磐石的人民群众基础，才是我们最可靠的胜利保证。敌人虽强大，但它进入我边区腹地人生地疏，人民反对，所以实际由强变成弱；我们虽弱小，强者来能应付，再加人熟地熟，人民拥护就可由弱变为强，由被动变主动，最终战胜敌人的罪恶“扫荡”。同时经验证明，我们丝毫不能大意，不能只迷信居高临下的优势，因在山丛中视野有限，看不到山峰的背面，敌情不明仍是被动，所以必须立足于“今天要搜山”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备无患，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胜

疯狂强大的日本鬼子的“扫荡”战。当然有了先进的通讯工具就更好了，但那时没有，即便有，这种思想准备也非多余。

以上认识，就是经敌对我反复“扫荡”尤其 1940 年以后的几次“扫荡”所获得的基本认识；是我戎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容之一，是我八路军珍贵经验之一。

2、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神仙山一所，曾一度重病无特效药，战伤无药械、无敷料，消毒无消毒器，手术无手套，护理无大小便器，连最常用的镊子也很少……等，影响医疗达到极点的困难，都被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医护人员一一克服，在最为低劣不利医疗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下，可做出出色成绩。如：败血脓毒症也无都牺牲，截肢手术亦能获一期愈合等，进一步锻炼了我们自身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作风的形成及视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艰苦奋斗成为一种风尚，人人如此，遍及全军、全边区，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至全国胜利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政治意义。我深信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我八路军卫生战士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及素质。因为一生是节约，是浪费必将采取前者。

3、通过战争学习战争，“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常常不是学会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我不是在背诵马列主义词藻，而



是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经我们实践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真理，是很高明的论述，因在战争期间不可能人们都取得学习毕业文凭以后再打仗，只有那些脱离那时实际的人，才可能对我八路军非议和歧视，强调学历、文凭之类的指责，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公道来源于另一思潮的。而且我相信今后在某些领域的工作中还会边干边学的。我个人体会：从小孩子——当新战士——稍会打游击——比较进一步掌握军事规律；从不懂医——稍懂医或懂得甚少——解决一般常见伤病的对症治疗的医生——达到“四肢外科水平”截肢术的医生……，完全和毛主席论述相吻合。事实证明我八路军医生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别的什么医生智商差多少，而且我们的工作中就蕴藏着无限珍贵经验的宝藏。否则，则无法解释我们何以能坚持战争直至胜利，那时边区军民十分欢迎城市或受正规训练的医生来山沟工作，但可惜来者并不多，而凡来者后来都成为医疗的骨干与中坚。

4、在反“扫荡”中，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暂时地有能力插入我边区腹地，所以严格讲没有什么前后方，而且越是后方，越无武装及战斗的实力，所以越具有生命的危险性，所以，王之平政委“除死无大灾”的教导，应该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革命人生观。就我军卫生人员整体来说，每个人是千万中的一员，然而对每个人的家庭则只一个，他们已做出了极大的牺牲：牺牲了不全属于自己的青春、家庭幸福、学习机会、爱情，忍受了实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甚至宝贵生命，倒下去长眠的战

友、同志、先辈、乡亲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和无辜人民，他们连抗战胜利都无看到，而凡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如马振华主任、刘莲田同学不都是在1943年春季小“扫荡”中牺牲在马尔山了吗？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虽已不在人间，但他们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聂录》552页说：“晋察冀从创建之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诞生5周年时……五年间，我们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14000多次，毙伤日伪军17.4万多人，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总计歼敌21.3万多人。胜利是辉煌的，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之，聂荣臻所列仅五年间不完全的战绩中，包含着我们的一份力量及痛苦和欢笑。付出之巨大代价，首先就是这些已去世的军民先烈们！

5、为打仗服务，是我们休养所（及一切后勤单位）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党政首长重视休养所的建设，重视医务人员，然而我们的工作目的，就是为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为反“扫荡”、为抗日战争早日胜利。我们努力工作，治愈尽可能多的伤病员重返前线，保证战争胜利进行。尽可能的降低残废、死亡率，为战友的健康和美满家庭做贡献，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做贡献。所以，我八路军的医生，不仅要掌握先进医疗技术，而且要有抗日必胜、军民一家、建立新中国的高尚理想、信念和情操。我们与有奶就是娘的江湖医生是有根本区别的。

6、白花山、神仙山，这二山是我人生路上的“熔炉”，它们锤炼了我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子的人？革命的坚韧性，人们常说延安精神，具体在我本人不如说可融汇为白花山或神仙山精神更为确切。对我具有永志难忘的印象。27年后的“十年动乱”中，将我们当时的乌盟医院一分为二下放到原晋绥大青山老区大滩公社建立“野战医院”，曾在传统教育中，全院人员到抗战时期被日寇“扫荡”过的韭菜沟参观访问，我当时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词，以慰我忆比之情怀。

## 忆 比

调取《忆江南》—1971年4月20日

整党前访问韭菜沟有感

忆抗战，白花、神仙山，  
山洞、深谷疗病伤，  
群山丛中斗敌顽。  
能不忆艰难。

昔今比，首比是大滩，  
黄茂沟内建医院，  
贫下中农俱欢颜。  
怎能忘甘甜！

## 第四章 前方战斗生活与战伤救护

军医当然是在军队战斗环境中学医和从医的。除前述我军主动出击的大战役外，当时的情况是

处于 1942 年是极为艰苦的年份，日寇加紧“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经济封锁”、制造“无人区”，接连对我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我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站在神仙山可一望清晰的敌我分界线，这年平原麦收还有点收获，但大秋作物颗粒无收，是我边区第一大旱灾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灾年，我们受了不少苦，但也增强了斗志，得到了艰苦奋斗的锻炼。最突出的是军民没吃的，体质下降、天灾人祸，十分困难，我军实行精兵简政，以保实力为主，同时还要与日寇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困难的严重性，当年中央指示总方针：“……目前一年内，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聂录》538 页）。“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长期斗争，要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力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群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准备将来反攻，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聂录》538 页）。敌人在我冀西继续推行冈村宁次的“深沟高垒”和抢粮，我

们针锋相对进行平沟运动、保卫麦收，打炮楼。自1941年阴历七月二十七北镇村被敌“蚕食”筑了炮楼，我们的军事哨就设在仅有一河之隔斜对面套里东山上，敌我相觑就在鼻下。直至1943年底，我军为了瓦解敌伪，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我冲锋剧社的老宣传员同志们如霍克、李树楷等，他们冒着生命及被敌俘虏的危险在团队只有几个侦察员的掩护下，夜间到敌驻地演小戏，演完即往回跑。我冀西当时民间流行的《刘二姐劝夫》是瓦解伪军的小戏，短小精悍。当时的演员同志们老实讲是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大不相同，当时他们与众不同的梳双短辫，翻戴毡帽头切割三块的“军帽”，腰系小绳，也算最时髦的“时装”了。我们还利用日俘组织的“日人在华反战同盟支部”去敌区教育日本士兵，方法是身背电话机，搭在电线即可与炮楼通话，如果是我们中国人讲话，敌人一听到就是一阵枪声，如是日本人，则枪声消声匿迹。日本朋友告诉我们，他和他们宣传我八路军的政策，请不要再伤害中国老百姓，不要再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这些日本朋友，我在42团曲阳武家湾，曾见过他们，支部长叫宫本哲治，手持枣木刻的大烟斗，生活上稍有优待，原来让他们全吃细粮，后来觉悟提高，要求和我军一样，最后还是优待他们每日一顿细粮，这当然在食不饱腹的1942年也是得天独厚的待遇了。用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服了身受其害甚至有杀亲之仇的我边区军民，这也为日人培养了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很进步的，在教育敌军方面，

他们可以起到我们起不了的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我46团先西进（反攻受降）后北上强占古北口，当时我们步行3000多里的路程，先后经过了三省二十一个县，<sup>①</sup>进行了多次战斗，只是大的战斗即七次，直至古北口这场鏖战止的全过程中，我作为一名青年八路军战士，看到许多新的事物，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军事知识，最重要的是更进一步奠定了热爱医生这一革命职业的坚定意志，同时在医疗技术上也有初步的经验心得，增长了才干。下面主要叙述1942年大灾年以后至1945年大反攻前，在部队营养低下的条件下的几次主要行动及战斗生活

### （一）保卫麦收的战斗和围困西雹水炮楼

1942年1月接到分区司令部命令，我由见习医生，提拔为医生并调往游击军一支队工作。我接到命令后，由于与四所的同志们共同战斗、工作、生活达一年多，建立了难舍难离的革命感情，记得在马家峪战友们为我提着背包，直送我出村很远，还不忍分别，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劝接替我的马增寿同学带头不要送了，终于洒泪告别了四所，到新岗位游击军一支队报到。说也

<sup>①</sup> [注]：指山西省五台、盂县、寿阳、平定；河北之行唐、灵寿、平山、建屏、井陘、正定、新乐、唐县、易县、涞水、怀来、延庆、密云、怀柔及热河之滦平、承德、兴隆等县。

凑巧，一支队卫生所的驻地，正是上三土门村我姐姐家。这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因我在10岁时，曾在姐姐家跟赵鸿业老师上过一年小学。一进村边，即见到熟悉的戏台上有四五个新土的坟丘，上插着牺牲同志的姓名、籍贯、牺牲日期，原来这是几天前，在夜间打仗时牺牲的同志。1980年我回家探亲时，见还有两三个长满杂草的坟丘未被家属启走，不禁心中一颤，可惜这些去世的同志们连抗战胜利也无见到。

一支队长赵国太首长前几年就见过面了，出操、爬山抓得很紧，好像这是军事干部的固有素质起着作用。支队部及三连驻在上三，爬山时在山头向南了望，可见到北镇的炮楼插入我北进军城通天河滩西山上，军事哨就设在隔河相望的套里村，这个钉子不拔，实是我心腹之患，因时刻对我军民安全构成威胁。

一九四二年春的伙食已很不好，由于粮不够，所以部队和老乡换枣子吃，每天吃枣饭，其中小米很少，主要是枣，一顿饭下来几乎要吐一把枣核，一下食伤了，我至今不愿吃枣饭。战士的身体素质下降，有时感冒流行，在某次连以上队务会上我提出睡眠前渴发汗汤（即辣子稀面片汤）以预防感冒的建议，得到支队长的赞成，并在各伙食单位当晚兑现了，我心里很高兴领导对卫生工作的支持。还有不少战士患足趾冻伤及下腿溃疡，我让卫生所一位叫仇树的看护员专门换药，因他本人也有下腿慢性溃疡，这种溃疡很难治愈，

在这里党内已开始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反对自由主

义》和党中央《增强党性》的文件。越是困难，党性越重要，这个学习虽只党内，我认为它对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是重要的思想建设，多数经得起考验，少数人当了可耻叛徒，困难刚刚开始，三连一个王姓副连长是原皇协军过来的人，已带一个班跑去党城投敌，当了叛徒。

这一时期伙食虽不好，但训练很紧张，由于我卫生所几个人的相互努力，工作还是有起色的，同时正是驻在姐姐家，无事逗逗小外甥，饿了吃姐姐家的饭，生活很有意思。上三的乡亲很熟悉，不断有人到我所看病、要药，我们尽力为驻地乡亲服务。

这时的游击军司令员是唐子安老前辈，警卫员还唤我去给他注射当时的神经强壮剂，即“砒矫基铁”注射液。后来我军三个支队都驻防三个迷城，但不久精兵简政大团变小团，以适应新的困难的斗争形势。1942年5月，在中迷城大操场（参图13），开游击军全体军人大会，动员精兵简政，营以上的原皇协军军官都调到军区另行分配工作去了。记得二支队长，李凤山同志当时在讲话中哭了，意思是说他们与敌人有刻骨仇恨才投诚反正过来，与游击军的同志们是感情深厚的，但表示拥护中央精兵简政政策，服从组织，服从命令。后来听说在1945年又回分区工作了，原因是我们从王令口战斗中缴获日寇的野炮，无人会用，埋在地里二三年，敌人投降了，要挖出来使用。当时已有野炮，平炮共三门，成立三分区炮兵营，懂得炮兵的人员太少了，李凤山是唯一的内行，所以当时的黄永胜司令员，将他调来当营



长，在打灵山炮楼时，虽无命中要害，但把敌人吓坏了。这证明李凤山同志虽是旧行伍出身，但有立功表现，反正过来后又能在精简中经得起降级使用的考验，终究还是我唯一炮兵营的得力指挥员，无论参加革命早与迟，只要经得住党的考验，都会得到重用的。虽然他忍受“委屈”了，但我认为这一措施在当时极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还是正确的，不这样不能保证部队的纯洁性，相信原从皇协军中反正过来的同志是能谅解这一点的。

经过这次精简动员之后，游击军的建制撤消，立即组织了两个小团，即41团、42团，我分到42团卫生所工作，每个小团有战斗连4个，特务连一个：包括机枪排、侦察排、通讯排等，团部包括有政治处、参谋处、供给处、卫生所。我卫生所所长是辛福祥同志，我二人第三次一同共事了。团长李光辉、政委熊光焰、政治主任耿翼周、供给主任庞忆昔、参谋长金中，还有一个定县人马炳谦参谋，特派员可能叫张连仲。后来我们移驻在曲阳武家湾村。这些精简后的小团，机构紧缩，人员精悍、行动灵活机动。

正在这一时期骑兵团撤消，军马交给老乡喂养及使用，马料都做为军粮分配给各团食用。这就是吃黑豆的一段困难时期。

日寇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鬼子深知粮食重要，所以在麦收时加紧抢粮，“这年十一月，又令华北大汉奸王揖唐，在各地抢粮两千万担。”（《聂录》P536）。我们针锋相

对地保卫麦收，不让鬼子将粮抢走，当年麦收还是有收获的，但大秋是罕见的干旱，颗粒无收。麦子快熟了，我们与敌人展开争粮的战斗，在唐县、完县的山根一带。

我42团奉命去唐县境东作保卫麦收的战斗，方式有：平（封锁）沟、杀汉奸、围炮楼等。部队数度驻在东长店村，平时对房东大婶特别尊敬，因她的形象特别像我去世的母亲崔吉瑞，大婶怎知我的隐情呢。区里布置各家挖洞，他家也在挖洞，从一个小夹道内往下已挖二丈余，我下洞一试实是不爽。由万里向东去黄金峪，以此为营地，规定口令、左臂缠白巾标志，数度夜间从此村出发下到山根平原地带龙翅庄、西高和掩护民夫平沟，将敌人封锁我们的所谓“惠民”沟夜间填平，次日敌伪又押着敌区老乡再将沟挖开！挖与平拉锯不止，游击区内的乡亲是很受罪的，要受我军和敌人的双重指挥，所以就产生了由我方区公所批准的两面派村长，否则，以汉奸论处。有一天正掩护民夫填沟时，敌人高和炮楼向我团开炮开枪，我们不予理睬，知道敌伪很少敢在夜间出炮楼，但时有放毒瓦斯的情况。那天团部命令做好防毒准备，人人有个厚厚的内盛木炭的大口罩，同志们都准备妥当，但敌人未放毒瓦斯弹，当时多半放喷嚏型、催泪型弹，拂晓前，通过黄金峪东边山的卡子回营地。以保证山边一带尽速抢收，速征公粮，用大车拉回我根据地。由于没打大仗，我军伤员不多，下来的伤员，我们给予初步包扎抢救，派人护送到西大洋一带再

转向后方休养所去。

有一个夜间在平沟中，前面打得很激烈，机枪、手榴弹声连成一片，我们还以为是我团与敌遭遇，无料到前边呐喊：“他妈的，混蛋！别打了，误会了。”原来是敌伪之间自相以为对方是八路，我们在沟西高兴得喊：“打呀！兔崽子，使劲打！太好了！”以奚落敌人。

还有一个夜间，下平原由我团一个侦察班在大部队的掩护下，顺大车双辙进入一村，侦察排同志们去抓一个姓×的汉奸，不巧，这天这个家伙仍在炮楼未回家来，家里只有他的大、小老婆，将小姨太吓得抖成一团，我们的侦察员临走向她说：“告你男人，我们还会来的！”不久后仍是该侦察排的排长将此汉奸抓住，在敌区处决，震慑着敌伪不敢过份造次。

我团驻防在唐县西雹水村，奉命围困村南的炮楼，碉堡两层，圆形、周围有枪眼垛口等，若敌人下来或出炮楼要坚决消灭，据说碉堡内只有几个鬼子，其余的十来人都都是伪军，记得派三连包围炮楼日夜监视，并同时将报告员、给敌送柴米水的都控制起来，碉堡周围虽有封锁沟河和铁蒺藜网，敌人也不敢露头。白天部队都驻在村里，中午多在树荫下午休，但团首长都很辛苦，时刻掌握周围敌情，以防敌人增援骚扰，影响麦收速度。所以，我们“小兵”可以在树凉下睡觉，然而首长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白天，因为夜间各据点的敌人是不大敢独自行动的。周围的据点有：下苏、城子、温家庄等。情况不了解，大概还有我分区兄弟部队分头监视敌

人。一连围困敌人三天，可能敌人的粮尽水枯了。有一天清晨一个伪军出炮楼好象要取什么，被我三连的一位射手击中身亡，敌人也不敢下来收尸，直至麦收任务完成——不仅将周围村庄黄橙橙的麦子收割和收交，装车后运以后，才将部队撤除。这样的情况，一般说敌人对我“两面派”村长、报告员等均无可奈何，因为敌人自己也不敢下来，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胡弄敌人。

大约一连进行保卫麦收的战斗约半月左右，收获可观，取得了预想目的，而且部队情绪高涨，伙食又好，差不多天天吃刚收获的白面。而敌人眼巴巴地看着敌占区已到口的细粮被我八路拉走，实在是又馋又气，不过干气也无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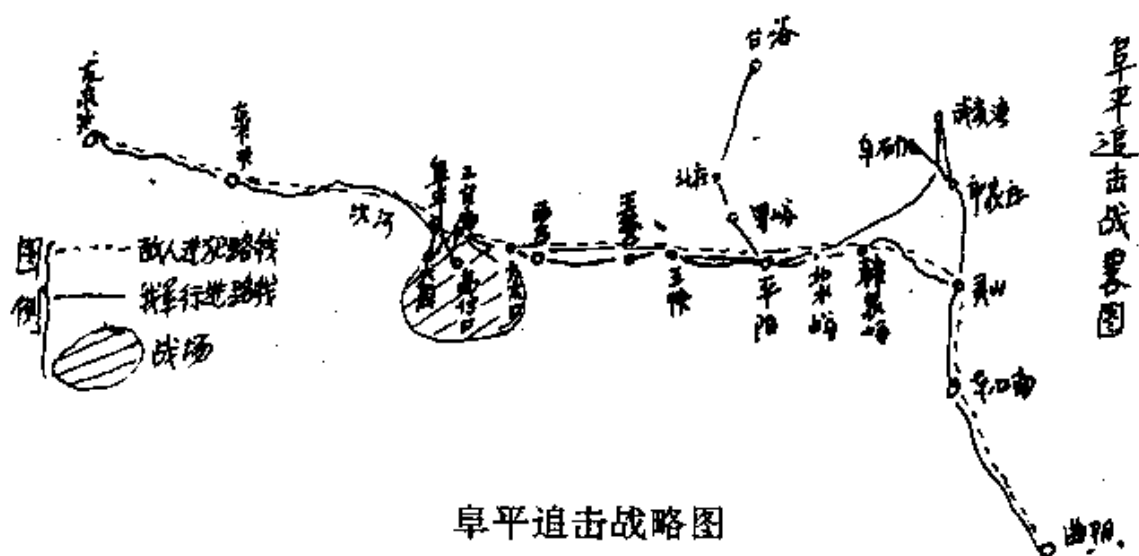
经过 1942 年，冀西颗粒无收的大旱灾，危及我们军民健康与生命的更大的困难是年底和 1943 年青黄不接这一段，有极少数不坚定分子如阎家庄李振英，原是 42 团团部司务长，就在 1943 年春受不了这连续饥饿之苦，跑到山根投敌。我团参谋长金中同志通过侦察员，写信警告李振英，并要他为我们购买奇缺物资如腊纸等，李要求将他妻子送出沟外，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通过灾年的实践，才更理解保卫麦收的战斗意义，无论平沟，围困炮楼等，都是为了粮食而战。因为，只有有了粮食，才能坚持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中央还号召在敌后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聂录》538 页）就指的是从这年开始。事实证明，只有中共领导下的边区军民，才能承受这样大

的困难，而且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大生产”，克服了横在抗战路上的一大障碍，取得抗战胜利。党中央也给了这一时期同志们的政治荣誉和离休多发1个半月的工资待遇，这多出的半个月工资，不仅是对这个阶段战斗同志们的经济“报酬”，而更重要是对这批同志们的政治鼓励，事实求是的讲，这个荣誉，这批同志理应受之是无愧的。

陈云同志这位土生土长的经济专家，对“粮食”即农业与革命成果早就有精辟的论述。（《陈云文稿》210页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后来1960年又遇到全国性大灾年期间的“统购统销”是多么伟大而英明的政策，否则将不知要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由于国家有“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们最低的生活营养之需要。回过头看，陈云同志这个“点子”的贡献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以及过去所谓“陈云经济思想”，即建立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如：经济建设量力而行，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即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生产生活首先照顾占80%以上的农民；工农商业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容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权；计划指示要留有余地并综合平衡；纠正冒进要比纠正保守倾向困难得多……等，当时说人家右倾，二十多年已经过去，

回顾以往无情实践，证明陈云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充分肯定和发展了他的思想。以及近几年来农村节节胜利，轻农经商的情况下，陈云同志还念念不忘“无粮必乱，有粮则稳”的重要道理，提出一定不能轻视粮食生产，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去年代表大会融汇为“无粮不稳，无商不富”的认定，指出各省区加强粮食生产。也符合前人“要在有时想无时，莫在无时想有时”有备无患的格言，即可立于不败之地的教诲。这种战略思想是青年同志有时不理解的。但它是最最重要的。

## (二) 阜平追击战——



1942年大约中秋之后，有500多名日本鬼子和少数伪军，从曲阳、灵山出发，纵深穿过我边区腹地阜平县到龙泉关去，（参略图）上级命令我团进行追击。

当时已处于极其艰苦的1942年中，精简后的我42

团驻防武家湾村，虽然比驻地老乡吃得稍好一些，但在大灾年中的伙食是可想而知的，部队和老乡一样营养不足，同志们的体质很差，但接到上级追击这股敌人的命令后，我团未来得及战前动员，就立即紧急集合采取急行军奔向阜平城方向去。上午出发，行军速度很快，途中基本没有大小休息，路经平阳、王快镇，当天，日刚落时到达阜平西庄，命令部队在大寺庙里暂息。记得王快以西的沿途，老乡都已躲避，这时“面黄肌瘦”长势很不像样的庄稼已经割倒入场，西庄水浇地里的特产阜平大叶烟已开始发黄，但仍长在地里。我团暂息的地方，西边一排平房是原来的监狱，由于敌人进犯，监狱也早已转移了。我们在东边打谷场上休息，由于急行军已走出90里很疲乏了，同志们有的躺在长势纤细的秸杆上，有的在吃炒面……

立即成“门”队形集合，团首长金中参谋长和政治主任耿翼周同志，作简短的战前动员报告，大意是：同志们已经急行军走出90里地，大家很辛苦了；但这股敌人现在已到了阜平城，意图是往西到龙泉关方面去，我们奉命追击这股敌人，不能让敌人跑掉。这股敌人500多人，多数是鬼子，少数伪军，不能轻视敌人的战斗力。同志们，我们马上要进入战斗！……。不到半小时讲话中，就有三四名战士晕倒在地，病号所在连队里喊：“报告！有病号，请医生来”，我们立即前去检查和救治，经检查，都是：一过性昏晕，很快就醒过来，冷汗淋漓，脉细而弱，颜面苍白，精神无欲等……，不多

一会儿，有的病号同志说：“好啦，没事了！”我们分析不是什么急性病，而主要是体质差，饥饿情况下急行军，再肩负约40多斤的背包、步枪、五个手榴弹等行装，疲劳过度，还未恢复过来，又立即站立，形成位置性低血压。我们立即向参谋长报告：“同志们不是什么急病，而是由于饥饿疲劳所致的虚脱。”后来参谋长命令轻装出发，并令各部队要让同志们尽量吃饱吃好。

黄昏时，部队继续急行军西行追击敌人，命令三连去攻阜平城，我团大部在城东与西庄之间的村庄待命，不一会战斗在三官庙而不是阜平城打响了，据悉三官庙仅距城三里，这里是敌人的军事哨。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炮声、机枪声阵阵作响……，敌我都有伤亡，不一会下来几个伤员，经包扎后随我绑扎所同时转移。

由于三连的激战，拖住了敌人，使敌人不能如期西行。

我团各连又向阜平城南、东南的村庄转移，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次日晨担架抬下三位战友的尸体，我前去一看，有三连指导员刘霄同志，衣服都被炸烂，右臂高举畸形仰卧，已经尸僵不能矫正，另两位战士中，有一位即前几天刚让我看过病的王姓曲阳老乡，标准的一口曲阳话，大个、小眼、结核质的红脸庞，才廿一岁，昨天还好好战友，今天却已离开人世英勇牺牲了。刘霄同志，原籍河南，他是知识分子，本是供给部鞋厂指导员，但刘霄同志坚决要去战斗部队工作，他生前平易近人，好开



玩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这些好同志都过早的牺牲了。处在灾年又是战斗环境，管理员四处寻找，买不到棺材，不得已用四块木板架成小屋凑合着埋葬了。虽已过去44年了，他们的容貌仍记忆犹新。

我们在城东南一个村庄，团部和绑扎所设在村外小坡上，该村的特点是村东有块芦苇地，可能叫高付口村。次日上午，疯狂的敌人主动出城向我阵地扑来，战斗很激烈，我团卫生所看护长张文江同志就在这天上午臀负重伤，及时后送；他一直在一所住院二三年。小平坡稍下即是老乡的菜园，只有两畦茄子和北瓜等农作物，天快日落部队还无吃饭，司务长指两畦茄子通知大家说，“同志们要饿就吃它吧，然后我和老乡结算。”不少同志摔裂茄子生食充饥，我感到还不是饿得过不去，食之不进。

傍晚，团首长命令我们去下面沟里打扫战场，看还有无未运下来的伤员及战友尸体，我们三四人与某连的一个班带三付担架下沟搜索，已无我军的伤员和尸体，返回高付口。这天夜间又发现敌情，我们再向北转移，带的廿来名伤病员一时走不了，说妥暂时隐蔽芦苇地里，次日拂晓，及时派看护员袁×江同志（天津人）护送伤员去台峪一所，他圆满地完成了后送任务。

拖住了敌人达一天之久，第三天我们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抬着鬼子的伤员往西去了。”

这一仗，总起来说完成了追击、搔扰的任务，拖住敌人不得前进也是胜利，当然也付出了以刘霄等同志的

伤亡代价，无将敌人歼灭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敌人孤军深入我腹地，但他们这个集团老鬼子多，新的少，配备精良，战斗力是较强的；而我们精简后的小团，在数量、质量上不是优于敌人而是几乎与敌相等，最大的问题因灾荒营养不良，体质很差，是客观因素，这样的敌我条件，彻底消灭敌人谈何容易。

战斗结束后，表扬了各方面的好人好事，我卫生所及我本人也得到团首长的表扬，说我们处理伤病员及时、正确。

### （三）1943年反“蚕食”斗争

1942年12月调我去二团卫生队任医生，当时二团也是精简后的小团，但比42团要大，团长李湘，政委黄文明，卫生队长杨善儒，看护长沈瑛，主治医生马英俊同志，二团曾驻防唐县大长峪、东迷城村，1943年元旦在这里过的。这里就是生活最为困难的秤饭时期，卫生队由于吃过一次饴饬将汤扔掉，多次受到黄政委批评，以教育部队珍惜粮食。

冈村宁次加紧对我边区进一步“蚕食”，站在神仙山上举目观望，的确边区地盘所剩无几了。日寇用“深沟高垒”政策消灭过东北的马占山，冈村还梦想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法来消灭我八路军，诚然这种方法使敌人得到不少好处，但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对象。《聂录》542页里说：“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就

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确保华北。’于是，对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动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它们更重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的活动。……到1941、1942年的时候，形势日益严重，敌人的‘扫荡’、‘封锁’、‘蚕食’日趋嚣张。尤其是它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边区的威胁很大，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各边缘区，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折毁堡垒，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可是，你夜里破坏了，它第二天又修了起来。……我们毁，敌人修，你来我往的僵持着，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43页）。……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544页）。北岳区……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敌人，相机收复一些地区（546页）。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

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550页）。”

可见聂荣臻同志这一创造性的战略决策是对毛主席论述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战法”高精尖的一种发展。对缩短敌人的寿命，加快革命成功的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三分区同样组织了武工队（即武装工作队的简称），如长征同志黄鲜朝及军城北关的甄凤德，他们都集结组织于唐县下苇村，便服短枪到沟外活动，是敌人尤其汉奸特务最害怕的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知何时要将狗命交给我八路武工队。反“蚕食”斗争主要以政治攻势为主，但必须配合以有力的武装斗争，除正规团外，武工队是重要的组成。以三分区曲阳县为例（见《曲阳党史资料》十九期10页）：“……在我们不断的政治攻势中，敌人的内部被我们弄乱了，使敌人互不相信，连最坏的汉奸，敌人也信不住。”“教育振奋了群众，动摇了敌伪。”“有一次在××，堡垒的吊桥被大风吹掉，伪军以为是八路军来了，很快把枪扔下来。另外，伪军伪组织人员不但交纳统累税款，而且自动捐助救灾款。”

《聂录》545页说：“……反‘蚕食’斗争必须是政治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做为我分区主力团的二团，奉命赴四分区管辖的行唐县去正面进行反‘蚕食’斗争，打仗的次数虽不算太多，但震慑敌伪的作用是难以

估量的，全面布署我们当然不知，作为战役的一个小局部，感受也是很深的。我团随军区大部队同行，先经阜平城南庄到达行唐北面廿里的闫庄，记得当时由东向西行进，口音越来越难懂，声尾上漂的行唐话特点逐渐熟悉起来。我们一直在山沟、山谷中行进，所以，有一天部队行至一个当地最高峰的巅顶，举目下望，真是一抹平川，心旷神怡，异常豁然而兴奋！好像头上的紧箍已去掉似的，情绪特别饱满，又好似到了一个新天地。这里就是行唐境内了。

我团到达行唐北面一个大村——闫庄，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里，正值腊月，天气很冷，老乡大多无柴烧，燃料困难；然而这个地主家的过道和院里，整整齐齐批着许多成木锯成小段的劈柴，他家两节院，全家挤在一面房内，男女老少，唧唧喳喳的行唐话，不细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当然也要烧他家的劈柴取暖。

可能还在闫庄驻防时，发过一次津贴费，连级干部才三元边币，三连副连长买了酒和烧饼开玩笑地说：“来来来，喝一点，还不知能否活到明年！”人们都批评他这不吉利的话，这天正值1942除夕，团部命令该连派一个小部队去附近敌据点去扰乱敌人，结果恰巧派这位副连长带一个班夜间前去打了一小仗，结果这一小仗打得很漂亮，打死打伤数名敌人，还缴获敌人一挺歪把子机枪，我们只伤亡二人，伤者战士，轻伤包扎未离队就痊愈了，而亡者正是这位副连长同志。这位英勇作战的好同志竟然真正牺牲在除夕之夜了，多么使战友们伤

心啊！

又由闫庄出发逼近行唐城北 5 里的一个村庄驻防，可能叫解家庄，虽与敌相近咫尺，但知他们没有群众拥护，不敢轻易出城，所以甚感安全。

次日即春节的大年初一，团部依然没有吃上饺子，人们正在谈论：我有生以来还没过过不吃饺子的年，表示怀旧和惋惜之情时，杨善儒队长不知从哪里搞来二斤荞面，并告诉通讯员回民小马，咱们想法捏饺子吃，到哪里搞饺子馅呢？同志们向房东买了一棵白菜，白菜贮在地窖里，窖低口小，白菜可望而不可及，房东将其约四五岁的小孩唤来，请小孩抱出了白菜，四五个人立即动手，和面的和面，剁馅的剁馅，虽然馅淡无味，但毕竟是饺子，同志们高兴而满意地说：全团只有我们吃上了饺子，即便是荞面素饺也很不简单了。虽然军民均无任何文娱活动，但同志们东走走西窜窜，说说笑话也很有意思地渡过了 1943 年的年关。

没想到这个欢乐的年关很快即被破坏。大年初二太阳刚照西墙，敌人的大炮向我阵地打来，部队立即紧急集合，全村乡亲和我团同路向西北方向转移，敌人的炮弹在我部队前后左右开花，也算运气，无一伤亡。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小的出击以扰乱敌人为主，而且次数也不如在我三分区频繁，这可能是四分区首长对我团“照顾”吧。自然伤亡也极微，敌人尤其在夜间不敢离开炮楼一步。

经过一个多月，部队奉命从行唐经曲阳羊平一带回

到阜平北水峪驻地，行唐与曲阳交界一带，只见是背靠山、前临川的沙河流域，回到了北水峪，好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也自觉地恢复“清贫”的生活。

以上，都是在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我军正面战斗的全过程。事实证明，集小胜为大胜，这对消灭、孤立敌人，保卫人民和恢复我边区的地域，及在1942年这样一个大灾年后的严酷斗争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在以后取得胜利，这些不大的战斗，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因其有力地配合了沟外各支队及武工队的战斗，变被动为主动，这一功绩无疑是党的正确领导及全边区人民团结一致，和我们司令员聂荣臻元帅精明善战、深谋远虑紧密相关的。所以，敌人的深沟高垒只能消灭旧军队，然而对我们有全体人民为后盾的八路军，是无济于事的。

#### （四）紧张、幽默与乐观

住在这“山青水秀”的山谷里，在战争间隙，与战友、老乡亲密相处友情融融。但战斗枪炮一响，决无半点含糊。我卫生所住在北水峪一户老夫少妻的屠户家，成天和屠户大哥开玩笑，夸他小娘子长得好，他也得意洋洋。而且我在本村一口气读完了《西游记》古版本，字很小，但读到七十回以后，即感到“前面黑压压、乌沉沉，不是村庄便是庙宇，不是妖魔就是鬼怪”的公式化感觉了，较之《三国演义》大为逊色。但不可否认这

不仅是消遣解闷，更重要的是在学习古代文化。

同志们无事闲聊时，聊到一位绰号“老鸦指导员”，他，张姓，完县人，讲话好不适当地带个‘啊！’字。例如，他点名说：“同志们，啊！稍息，啊！今天我，啊！谈几个问题，啊！”……有调皮的战士，悄悄作记录，啊一下画一道，一次点名大约二十分钟，‘就啊 90 多下，也真使人够受的。又提到二团一位炊事员刘槐树同志的轶事：他就是误入魔窟的一位好同志，他先参加七路，被我解除武装后又参加了八路。刘在被俘后，我们的战士要杀他，被我二团某连李连长一句话“不要杀他”给救了下来，后来就在该连当炊事员，刘同志比较难管理，他工作上有缺点，司务长批评他，他说：“你有意见给我提吧，发什么火啊”！谁也管不了，只有李连长说什么他听什么。他有打油诗的天赋，说起话来合辙押韵，他常述说刚被我战士监押时的情景，他说“刘槐树儿，我好心伤，幸亏恩人李连长。……”又说：“刘槐树，你给的我伤，后头跟着个大杆枪，大杆枪不离手，解了手儿往回走。刘槐树我想尿泡，后头跟着大片刀，大片刀不离手，尿了泡就往回走”……。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这年初秋我虽在定唐支队工作短时，驻防小张各庄村，支队长杜瑜华同志，副支队长甄凤山，但他常在沟外敌区活动，不愿回队部来。主要任务是在平汉路西侧的定县和唐县区域内活动，打击敌伪。我去时，部队正在整训，由于均穿便服，军风纪不够讲究。为了应付战



争，加强最大的机动灵活性，我们经反复轻装，仅剩一个饭包和一个被单，甚至夜间不能御寒，而有着凉腹泻者（急性肠炎）。每次扫荡的情报都是先由几个支队送上来的，当敌人进山扫荡时，支队的任务是在封锁沟外的敌占区内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伪，牵制敌人。曲阳的经验，《曲阳党史资料》十九期 13 页记载有：“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已经体验到游击工作的开展，可牵制向正面蚕食的敌人，而正面反蚕食亦可留给游击区以开展工作的空隙。”这里见到和遇到以下几件事：

距我驻地数里的明福村，有一位妇女，可能名叫三丫头，30 多岁，其实老区妇女很多，她并无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她从不剪发，梳头后卡二发卡，头发分三缕分别垂于背后及双肩之前，经常坐在大门口纳鞋底，一说形状无人不晓，现在八十年代这种打扮已很平常了，但在当时剪发头的山沟里，这种秀丽的“风韵”，可谓是突破性的“新星”，是披发女郎的鼻祖了。由于她发形特殊，所以遇到总要多看几眼，以领略装束之魅力。

我们副支队长老甄，据说看到一个特务带着一块奇特的怀表，它的奇特在于除可看时秒外，表盘上有一个月亮，既有望朔，也有月圆，他迷住了这块手表，跟踪特务许久弄不到手，有一次终于将特务挤在火车的联接处，那时联接处不似现在成为一体，而是甲、乙车箱间，只有“詹天佑”钩相接，甲乙车箱各是一个单独客体。老甄用手枪逼住特务，“请将表‘借’我一用！”特

务知是大老甄，假如反抗肯定无好果子吃，被推下车去，人不知鬼不晓即完蛋了，所以，只好将本来不是好来的爱物乖乖地递给大老甄，免于丧命。我虽无见过这块表，但成为同志们笑料美谈。

由于我定唐支队正在小张各庄整训，敌特获得了我部队的确实住址，有一天凌晨将拂晓，我们被敌包围，并听到到枪声。我支队长沉着冷静地思索之后，命令部队向村东方向（即敌来的唐县城方向）突围！我们全体同志立即迅速地按命令执行，果然胜利地突围成功，无一伤亡。回过头来射击敌人，对敌造成威胁，敌人无意恋战，迅速撤回唐县城去了。

旭日刚露头，支队长命令我卫生所和李××管理员共同打扫战场。我们三四人，检查了村西山头及去我内地的明福村大路等多处进行检查，只有一位乡亲被敌人打死在谷子地里，我检查人俯卧已死，无抢救。另外，还有一头骡子四蹄朝天的死在路旁，子弹正击中牲畜头部而死，其余均无损失，有的乡亲甚至没有出屋。总之，我们按首长命令一丝不苟地认真打扫战场完毕，并向首长报告。

后听首长说：“估计敌人的火力薄弱处是在来的路上，所以决定向东突围成功。”这一分析完全正确，假如部队往西（山头）往南（大路）突围，都将遭敌伏击。打仗，指挥员判断正确与否，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我们为跟这样精明的首长战斗而感庆幸。

总之，我们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武装集体，多是

“涛浪拍岸、高山流水、四面埋伏”，时而又“潺潺流水、风平浪静、鸟语山空”既紧张，又潇洒，其乐无穷。

## （五）反攻后的战斗生活

### 1、鬼子投降

1945年“8.15”鬼子投降以前我正参加整风学习，提前回一所。一所仍驻台峪安王庙内，“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特大喜讯，在当时既无广播，又无无线电的情况下，这一胜利消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顿时传遍台峪周围的各村，人们兴奋极了，欢呼雀跃，喜笑颜开，大语小话，彻夜不寐，有的老乡说：我们苦熬了八年，总算熬出头来了，夜间见西南方相距三里驻河西村的联合大学火把游行，我们久久不能平静入眠。

次日“联大”的师生，来我所慰问伤病员互祝胜利，由于“联大”学生都是从平津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有的女学生，见到我所一位截肢伤员残端外露，吓得直往后躲，然而就是在这个神仙山下的小农村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成了建国的栋梁之材。

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就是战略反攻受降敌伪了。中央号召全军举行全国规模反攻，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敌人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接着延安总部于8月10日发布大反攻命令，

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

## 2、西进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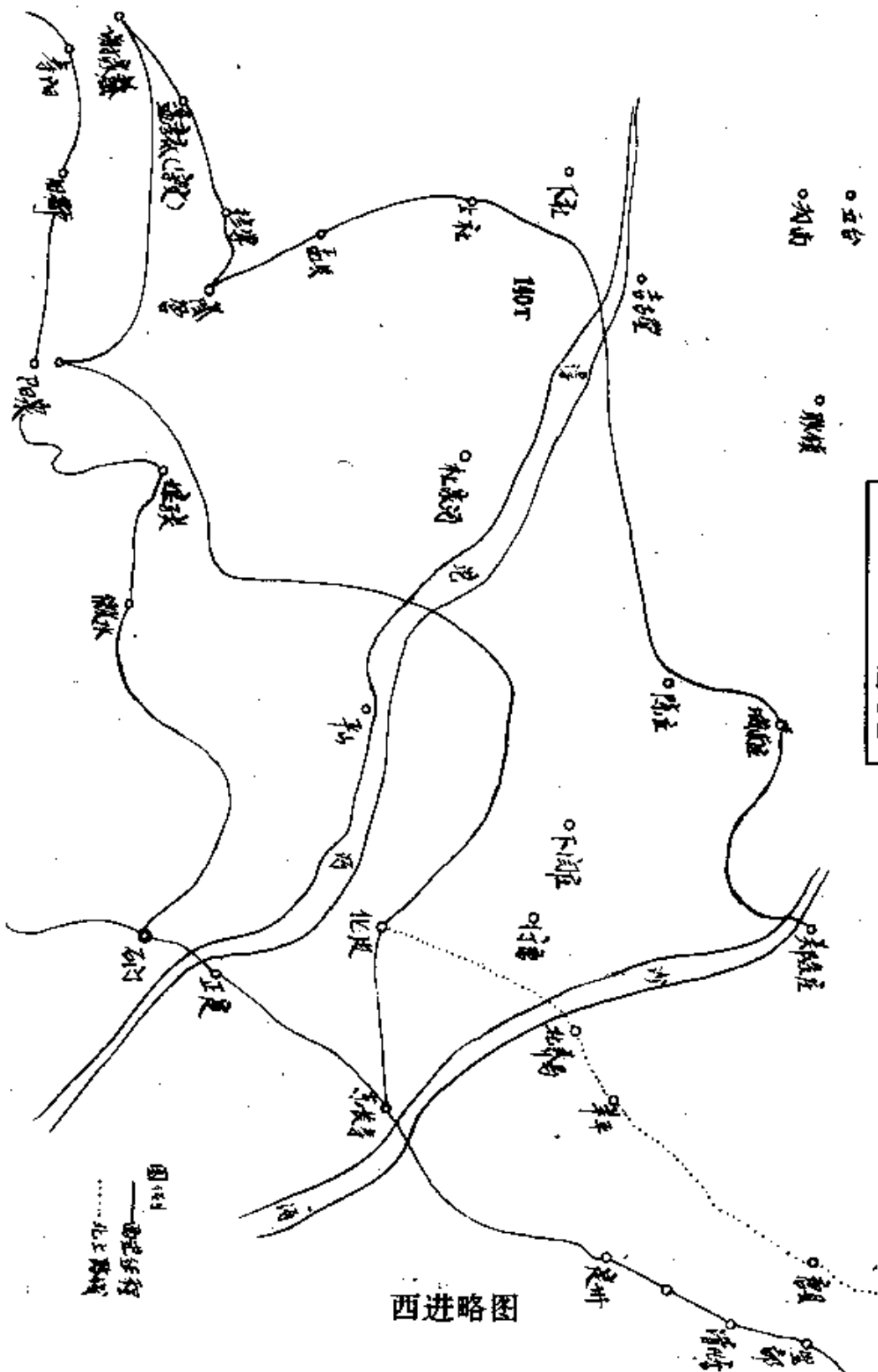
我奉命去分区新组建的 46 团报到，在一营卫生所当医生，营长是高登云同志，团长李育民，政委霍嘉霖，卫生队长齐清海同志。

我团任务是受降日伪，最近的敌伪据点是灵山炮楼。曾派一指导员去炮楼与“活闫王”大江方若谈判，督促他赶快率部投降，据说“活闫王”只是哈哈大笑，推诿不表态，成天饮酒，偶尔向我驻地王家村打几枪，我们李团长通过侦察员说：“告诉‘活闫王’，如果你再继续作孽，小心你的脑袋。”持续数天他仍不投降也不出炮楼。突然在一天夜里全部放弃灵山，逃回曲阳城。过去一个好端端的我八路军发祥地灵山镇，竟被日寇遭踏得完全失去原貌，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灵山阁二层的庙宇完全拆掉，木料修筑了镇压我们的炮楼，只剩下东西南北四个大通道。(到了 1966 年“文革”中，将仅剩的完全用石料砌成的四个大通道也给破四旧彻底刨掉了，这一古绩的痕迹也已荡然无存了)。

党城的敌人，同时逃回曲阳城内集结。

抓住汉奸，叛徒毫不客气地就地正法，如“大老甄”下面原侦察排长张胖儿、诸侯镇的一个汉奸，很快就地枪决。伪军家属也惶恐不安。敌伪政权土崩瓦解，而我们军民喜气洋洋。真是敌人的难受之时，正是我们

815 后成文图说在程略图



兴高彩烈胜利之日。

现在是抗日战争全过程的黄金时期——反攻阶段：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忍受了非凡的艰难，坚持了抗日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红军8月8日与日宣战，消灭关东军进驻东北；8月23日我军攻克张家口；国内形势也有利于我们，各民主党派与人士谴责蒋拥护我党政策；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使日本本国人民也陷入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的战争，使自己不能拔足，人力、物力消耗殆尽……，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利于我国抗日战争迅速转入我强敌弱的反攻阶段，而迫使日寇无条件投降。

正当这时我团奉命西进山西，西进的兄弟部队还有许多，有晋察冀军区一位参谋长指挥。

当我46团行军至平阳镇东南不远的郑家庄时，连绵大雨，大沙河的大浪波涛将我们隔在沙河北岸，雨时而大如倾盆，时而小如喷壶洒地，昼夜不停，一连三天水势不减，三天后雨渐减小，军区首长命令部队立即过河，团首长接令后着急万分，然而沙河的大浪仍是一丈多高，曾组织会水的同志试过也不成功，但雨虽小却仍在下，时间就是胜利，单用老乡的簸箩放在梯子上做成筏子，四条绳子牵拉，一次放不下几个人，结果连筏带人扣入浪内冲走了，三位同志被淹死在沙河，尸体冲出很远才漂浮出岸。原我二所周副指导员冀东昌黎人，多次送河成功，然而这次也牺牲在沙河中。他把方便送给

战友，自己却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憨厚容貌记忆犹新。

次日，雨稍小一点，首长命令各部队立即冒雨过河，我团有位副营长是长征老同志——以他为首，另外组织十余人的护送队，保护一批批的同志过河。他们结成人墙，给同志们打气，动员同志们千万不要拽他们，保证使人人渡过沙河到达彼岸；他们强调如果拽住他们则会有全被淹死的危险。部队全体同志虽然不知整个战斗布署，但都深知现在处于反攻阶段时间的宝贵性。可惜我们山地同志多数不会游泳，更谈不到水性好，但同志们决心尽快地渡过河去踏上西进的征程。

这位副营长我们很熟，并开玩笑的说：“医生，放心！保你无事，有何嘱托？”我说：“保证服从你的指挥，宁死也不拽你。”我们每批约20人——一个排的样子，我们大家都毫无羞愧地脱得一丝不挂，衣裳顶在头上，我只一个小饭包顶在头上也担心掉入沙河，挎包内是我最最心爱之物：一本《局部解剖学》（图41），我委托副营长给我带过去，他毅然同意，我们一群群裸体的战友们，在待命过河。……轮到我们的了，大家头顶衣裳，结成人墙一同过河，幸亏河底是沙而不是大石头，开始过膝——过臀——到胸口了，虽足已轻，还能应付着前进，护送队的同志们行在我们之前，还大声喊着“同志们，不要怕！保你无事！”——再深憋气得很——脚不着地的漂起来了，不能平衡，连喝数口水，耳壳呜呜声的失听了，正是在这段水深过人且有波浪的河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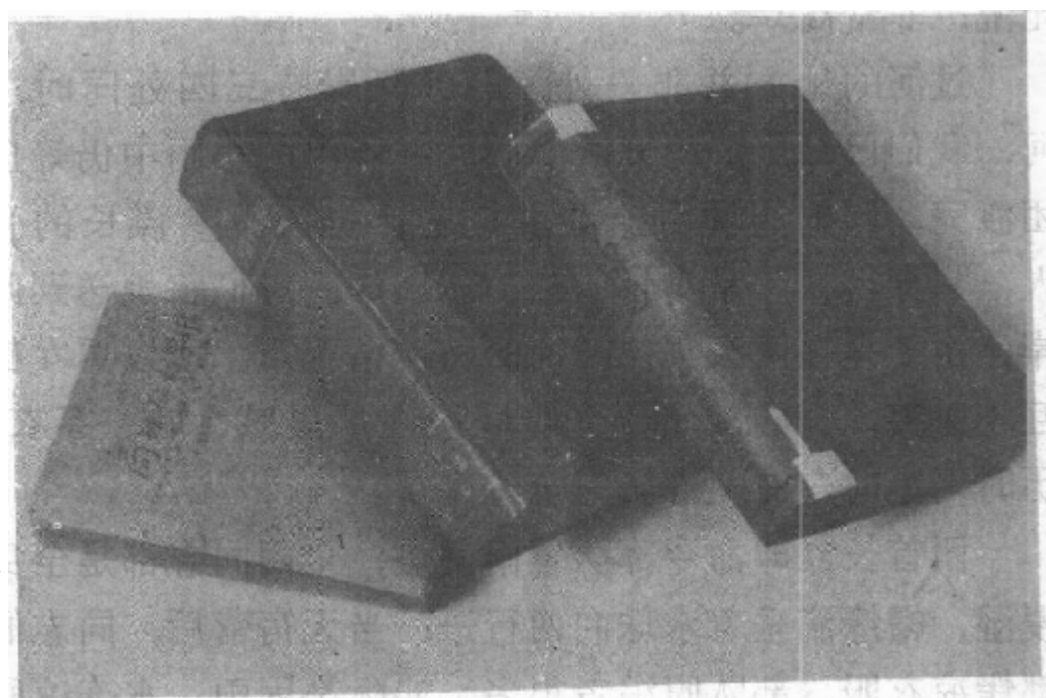


图 41 《局部解剖学》等几本功勋图书

内，发挥了护送队同志们的特长，自觉有人不时地拽着我的一臂在跳跃似地前进，后来得知护送队的同志，见谁不行了，就狠向彼岸拉他一把，一把就能拽出一丈多，就这样被拉三几下就到搁浅处了，足下又踏着地，到达彼岸。多数同志都喝了几口水，呛咳一阵就好了，我们虽然仍在小雨中裸体咳、吐、穿衣，但心情上极为高兴，知道过了沙河，就是西进的重要一步。然而护送队的同志们又过对岸去护送战友去了，他们很辛苦，体力消耗也很大，一日数餐还饥饿不支。团首长后



无湿，非常高兴。

过河的地方并非一处，沿沙河岸有三四处同时过河，我们已穿好湿漉漉的衣服，在不停的小雨中仍等全团渡完，同时也见到一位女同志，据说是参谋长的爱人，只穿裤衩和紧身背心被护送队的同志们将她送到此岸，由于是在两天集体渡河的特殊情况下，所以男女都互不耻笑，有的战士仍光着屁股在那里咳、吐、穿衣。历时两小时左右，部队完全过来了。

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冒雨前进，全团同志都是全身浸湿，帽缘滴垂着水珠向西行进，当天宿营后，同志们都烤凉衣服，部队腹泻者很多，实际都因雨、水冻凉所致的肠炎和感冒，我卫生所忙着给同志们换药治疗，而更多者是保暖、干燥、饮食卫生。

雨过天晴了，在行唐境内的行军中，部队正按号令进行小休息，路边很多老乡围观部队休息，这次意外地遇到了1938年三分区供给部的敌工干事、我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杨文考同志，在反攻的西进路上意外的战友重逢，异常兴奋，话长时短，无法畅谈，但在这仅仅的15分内，我得知他身体有病，已经转到行唐县做地方工作。自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谈够，行军号吹响了，我们只有互相叮嘱注意保重，努力工作，有机会通信等而惜别。但这匆忙的一见，就是最后的一别。“文革”中造反派要坚决打倒我，他们到处调查我所谓材料，才得知杨文考同志那时（1969年）刚刚去世。我相信即便文考同志仍在世，他们也不会捞到任何稻草的，因文考同

志是我可信赖的亲密战友。

行至灵寿县慈峪就想起这是孙大炮的家乡。孙是供给部军械科的创始人。

到平山境内，遇到不大的一道小混水河，说是溱沔河，河虽窄但很深还需乘船过去，否则就会被淹死了。不大的一只小木船，最多每次能运廿多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乘船，船工老乡以长竿撑船先顺流而下，然后撑竿使船转向划向彼岸，这一转变，我立即头晕目眩，差点呕吐上来。我知道这是晕船，心想，我们在山沟土生土长的人，对水实在是太外行了。在平山境内所见所闻的印象是：土地肥沃，水利好、沟渠多，庄稼绿油油……，难怪日本鬼子将四分区划为经济区呢，的确名不虚传。有一天，宿营洪子店村，在短暂休息中，我们见到了那儿的特产——长方形、又大、又薄的芝麻烧饼，同志们，都买一个尝新。虽然，沿路村庄几乎全忘记，然而大烧饼之缘与洪子店紧密相连，至今不忘，是平山的好地方。还见到平山老乡，无论男女老少，吃饭都端上满满大碗饭菜，到街上边吃、边谈；这与我三分区吃饭都不愿让人看见是截然不同的风俗。这个风俗，对我们颇觉奇特。

再往西行，只记得是个杜家庄村，已是过沙河后第3天的行程了。已到达了建屏县境，实际这里以往仍是平山县与山西相交界的地方，是刘建屏同志活动过的地方，刘死后，为了纪念刘司令员，改为建屏县。向山西挺进，山势不小，步步升高，蜿蜒崎岖前进，这即有名

的十八盘。分区宣传队沿途用白灰写了不少鼓舞士气的标语，但这段路上缺水，又渴又累的情况未能得到话梅止渴效果，但有一条标语真正的起到鼓舞前进的作用，同志们正在又热又饿十分疲劳时，突然前面山石上写着：“快到山顶了！同志们加油！”人们的力量顿时倍增，加速了行军速度，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快到山顶了。山顶是“主语”，是人们最向往、最关心的统一目标。所以象这样抓住人们统一思维活动的精彩语言，无疑是可精神变物质的实例，这是政治思想范畴的问题，虽有突出的感受，但不可班门弄斧，妄加评论，仅给政治思想工作者、心理学家提供一点可靠的素材而已。

到达山顶向下眺望，仍是山峦叠障又似断垣的山地，这里已是山西省五台县的边缘，很快即超越五台到达盂县境内，由于下山行军省力，速度也加快许多，这里虽距平山一两天的路程，然而风土人情与冀大异。主要在：口音更趋难懂，真正是“老西”地方了；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石窑洞；吃到了莜麦面饴饴，虽不算好吃，但是从未吃过的食物，而且莜麦长得什么样子还是个谜；见到了大如小指头的大豆；更印象深刻的是老乡们穿衣几乎都是浅色，尤其妇女，人人襟下露着垂三角形的大红色兜兜，男人喜穿红布夹腰子（背心），而且男女几乎都是红腰带。妇女们宽宽的裤腿下，盛装着尖尖小脚，我们以为老龄妇女是这样，年青人可能不是，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就连十五六的小姑娘都是一律小脚和长辫，当然耳坠、首饰俱全。所以，踏入山西的首先

印象是，山西残害妇女缠足穿耳孔的封建残余，是个比河北山区还落后的地方。后在平定县的战斗中证实，这些十七八的女孩子，除了给伤员喂水喂饭，其他任何稍费体力的工作都难以完成。同志们都为她们仍被封建主义的礼教束缚，人身仍被摧残而抱同情，她们大概是人类社会自后唐宫女窈娘缠足以来最后的一批小脚了。

部队向盂县城挺进，这里的敌人已于8月25日被我军威力吓跑窜回太原了，回想为何军区首长那样着急地摧过沙河？就是时间。时间已过，战机丧失，失掉了吃掉日伪的有利时机，无疑是对我军受降的损失，相对地使国民党闫锡山占了便宜。大雨和洪水给我们造成一些意外的损失，真是可惜！

我们进入了盂县这座小空城，商业、人民生活照常进行，记忆中这里卖槟果、沙果的特多，狭小的城廊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呈现出人民胜利的喜悦，虽然在一个大庙中正在唱戏，飞机的嗡嗡声，人群一时哗然，基本上人们照常看戏。

这个小城给我留下了20岁时现存最早的一张照片（在扉页），日期是1945.9.12（旧历八月初七），可算是永志难得的个人收获；但也使我一度染上了吸烟恶习，起始的诱因就是盂县。——在城内遇到在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战友孟绍周同志，和他坐了一会儿，临行，他给我装了满满的一饭包厚生牌香烟，我告诉他，我不吸烟故拒要，孟说：“你真傻，你不抽送给谁也不会骂你呀！”我想是，便带回到营部，将纸烟留下五盒，每盒

10支=50支以学“吐圈”的游戏，其余的都送给吸烟的同志们，大家高兴地一抢而光。过了几天，“吐圈”学会了，纸烟也完了，虽无烟瘾，但有人给就吸。过二年后，慢慢自己买烟而且烟瘾渐大，这个自己心里很明白的恶习，直至1964年9月30日在北京阜外医院进修时，才决心戒除长达十八年的吸烟恶习。进修医师班结业时，吴英恺教授举行座谈会招待我们，有水果，有高级香烟，有人说“老王，今天是特殊情况，可以开戒抽吴院长的中华烟。”我答：“不。”我开玩笑说：“吸一支烟事小，‘政治上’的损失事大，你吸你的烟，我吃我的葡萄”。也有同志说：“老王说得对，不抽了，不抽了！我也要吃水果……”真的，自此以后与烟绝交了，就连“文革”住“牛棚”，自己“蹲班房”的极为苦恼的数月中，也未复燃起来。在后来已过的几十年中，无论什么高级、“便宜”的香烟，对我已毫无诱惑力，“文革”后也有同志夸奖自己的“决心”，我已成为既不害己，更不危害别人不吸烟人群中的一员。

所以，我的“历史”照片与一段吸烟恶习，两者一益一害，均与孟县二字相联。

部队向平定方向挺进，我团行至一个山势不大的地方，我尖兵部队悄悄接近，还未及“正式”打击敌人，敌人则奔巢逃跑了，我团某连去炮楼搜索，已人去楼空，还有一堆未熄灭的火。火中正烧土豆，战士们拿出一些半生不熟的土豆“胜利品”，让大家品尝。我团驻在地属平定县的一个大村庄，不知为何在该村连住约一

周方离开。这个村庄几乎完全用石砌成，窑洞是石砌的，洞洞相连，下边洞内住人，洞顶碾场收秋和出操练兵，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街道也是石砌的，村南不远偏西的山根有一古庙，并留有一位状元亲笔写的石碑墨迹，看来这一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有一天遇到下雨，见家家户户在雨中扫院，由于院子也是石头砌的，所以一刷即净，将污水排走，然后将水窖石盖打开，让所有“干净”的雨水都流入窖内。乡亲们非常热情，给我们连唱三天晋剧以慰劳我们。虽然知道这里缺水，但仍不习惯节水，洗衣盆盆涮洗。部队离开该村时，据首长们后来告诉我们：“这里是敌占区，老乡对我们很热情，临行前征求乡亲们对我们有何意见？老乡说：同志们很好，就是用水较浪费，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缺水，再不下雨，来年吃水就成了大困难。”我们的确用水浪费，以后一定注意改正，听说嫁姑娘也要看婆家有无水窖，所以，水，在这里是决定穷富的标志之一。同志们开玩笑的说：“老乡也真傻，在这样一个穷地方干什么？还不搬到有水的地方去！”其实，谈何容易，一方水，养一方人，穷家难舍，热土难离，那里有那里的生活办法。后来得知，山西省境内缺水的地方不只是平定，还有不少象我三分区干沟那样的地方。总之，虽经首长教育，但同志们还是对缺水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

在孟县时，就曾见到一块块菜地，蔬菜生长茂盛，特别看到：长势很好的“疙瘩白”，因淡绿似芋头的色泽，称“鬼子白”，心想，小日本什么也和我们不一样，

白菜也有“鬼子味”，还有粗大的辣椒及大似指头的大豆……，这些都和河北家乡的不一样。

继续向东挺进到一个山顶地区，气候较冷，山顶因挖不动，鬼子强迫人民顺山势修了一堵封锁墙，约三四尺厚，土石混合墙壁，是专门对付我八路军的。我团在这一带与敌打了一仗，伤员也不太多，还象在河北那样组织兵站，组织民夫担架队及妇女护理伤员，小姑娘们和五台盂县一样的文化落后，貌似踩高跷的小脚只能蹲在一个固定地方给伤员喂水喂饭，其他工作因人为了的残废而无法完成，当然这种人为罪责不在她们，而是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害，然而可怕地是，被旧社会摧残不以为气愤，误以为美。所有女的爱打扮，无可非议；然而这一带的妇女“金”牙特多，听说为了装饰金牙，要到城里化钱将好好的犬齿包上一层黄色，以为是最美的形象。看来这种影响妇女健康的“美”，也和缠足穿耳孔一样实在不可取。

我们住在原是敌区的村庄，向下眺望正是阳泉车站，我们既无地图，也不掌握地形地物，近一时期以来，一直方向不清，由于山下是阳泉，就比较好辨认方向了。虽是原敌占区，但看来老乡们对我军无何隔阂，军民关系和谐。在这个巅顶山区的村庄里，也有两件罕事：

有一天营部吃冬瓜汤，感到味道不同于北瓜之类，不怎好吃，人们都问这是何菜？一炊事员说“冬瓜。”我们几十号人连半个瓜也无吃完，我很纳闷，过去只是

听说过大冬瓜，但到底有多大当然不知，经我亲自去室内“考察”，果然见似碌碡似的大瓜，约五六十斤重，色淡绿似“鬼子白”，皮带一层薄霜，但瓜瓤瓜籽白色，数量不少。立即想起我童年时祖父王朝言在祖坟内讲“西葫二籽”的故事，即：古时规定六十年还甲子，到60岁后，不死也要入坟地的砖椁里，孝顺的儿子每天送饭后垒一块砖直至将口垒死为止，不死也要你死，人生不得超过六十。不孝之子，一下垒死穴口，当然死得更快。有一孝子，每天给在坟内的父母送饭，为了不使父母悲伤，还特意表示欢欢喜喜，一日来送饭时面带愁容，父母问：“何以发愁？”子曰“皇上得到一个很大的西葫贡品，问百姓葫有多少籽？答不对要杀头，已经监禁了许多人，现在轮到问我，谁知里面有几个籽？恐怕以后无人侍奉父母了，我将死在父母前矣！”父母当然很愁，苦想无奈，父说：“古人云：西葫二籽”。儿子想，反正也是死，就答皇上：“西葫二籽”。切开一看，果然是大大葫芦内只有两个瓜籽。皇上诧异地问：“你怎知二籽？”子答曰：“是我父母所告。”皇上大喜，让将所有活葬在坟内的60岁以上的老人统统放出，说老者并非无用，只有老者才知西葫二籽。降旨从今以后废除六十年还甲子制。我们吃的是冬（东）瓜而非西葫，但见瓜之大，的确是我生平首次。

另一是：房东大嫂养着一条大公狗，它毕竟是牲畜，对着我们大家的面，狗即爬向她肩，又舐又吻十分不雅的样子，我们要打它，大嫂不让。乡亲们悄悄地



说：“她男人是伪军，跑到太原去了……！”言外之意，是在笑话她以犬代夫的罕事。我卫生所杨振东看护长，特地吓唬大嫂，佯作着急的样子说：“房东！你的狗被伙房打死吃肉了！”她大惊失色地去找犬，实则犬仍在她锅堂卧着，才知是骗她。人们暗暗失笑。不禁要问：能有这等事吗？但视其情却得不出其他结论来，可见这位大嫂不是精神病学上的变态人格，也是日寇加给中国妇女的苦难了。

### 3、袭击阳泉车站

某天，高登云营长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我们大家到会后，高营长布置任务说：“今晚有任务，即下山去袭击阳泉车站，争取速战速决，规定了口令及所有参战指战员均左臂缠白巾，熄灯号撤除战斗。”营长还谈了阳泉车站内部的敌伪兵力情况及与阳泉镇的地形关系，记得谈到阳泉镇内还驻有敌军，并布置了巷战的可能性……

傍晚，我营三个连参加战斗，并有向导、担架队已组织好，我带几付担架随部队后尾出发了，从我山上驻地向东方行进，然后下山就是阳泉车站，我绑扎所的位置就在山根，看阳泉站是东北方向。大约下午九、十点左右进入阵地，营长带三连突进阳泉，但敌人早有准备，集中火力向我方扫射，漆黑的夜空，被机枪声划破，而且我们面前落了许多噗噗声的“红雨点”，我知

我们已处于敌人的射程以内，我们深知这是近距离的枪弹，敌人一定不远，终究是黑洞洞的黑夜，敌人也是瞎射。并令卫生所的同志们及担架民工注意隐蔽和严密监视前方，备好手榴弹，以防敌人迂回我们。当晚本是轻装而来，只有饭包内有我最珍贵的《局部解剖学》一书及几个救急包，敌人一阵阵疯狂地向我方扫射，由于我们很好的利用了地形地物知识，无一伤亡，当时我想无论如何不能使《局解》书受损，过沙河那样大的困难，书一点未湿，何况在陆地打仗更不能损失此书半点。

我们的部队，开始不吭声地向镇内前进，不久进入战斗，只听敌我双方的机枪声响成一片，我三连的同志们，在排长带领下对敌喊话：“日本、伪军弟兄们！缴枪不杀，快投降吧！……。”伪军可能懂，但日本人是无法听懂的，我心想：如果有日本朋友一同来喊话有多好！只听：“呀！……。”杀声、枪声交织成一片。持续战斗约一小时，听到了撤出战斗的熄灯号，部队撤出战斗，瓮中之鳖似的守敌，自然不可能追击我们。我们仍随部队缓缓回到阳泉西山上的驻地。此次战斗我们没有伤亡。

惊弓之鸟似的敌人，他们的寿命当然是屈指可数，活不了几天了，敌人只有投降别无出路。可惜我们未等受降阳泉守敌，又奉命西进了。

#### 4、向寿阳进军

我们奉命从平定好象居高临下地向西南进军，见到寿阳境内很是贫穷。然而开始却完全判断错误，沿途见到房舍很好，很干净，各家各户都有内部陈设，如房屋都是四合院，卧砖砌墙一直到大屋顶，室内墙壁上都张贴着梅生等画家的年画，几乎每家炕的正中墙壁上横挂着一面照衣镜，躺在炕上也能正容。另外窑洞也多，有一天宿营在一家金碧辉煌的楼式窑洞内，心想这家不是地主也是富农。后来，才得知窑洞是他祖父留下来的，这时刚刚秋收之后，连下锅米也极困难，原来他们是一家每天用炖北瓜豆角充饥的贫农。所以，留有印象：山西不能只凭房屋考究与否分贫富，贫佃农的房子似比河北中农的也要好得多。

沿途见到掰去棒子的玉米秸，还高高地长在黑色的土地里，原来这里到处是煤，挑上筐子随便出去挖一担回来就能生火作饭，甚至挖煤比河北挖土还随便。要说燃料，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了的好地方，由于不缺烧的，所以，庄稼秸秆根本无人收割。

见到沿途石碑较多，有的并非古迹，而是闫锡山所谓“都督训词”之类的石刻，还发现年青人敢于骂闫锡山这个老“灰鬼”，而老年则尽量躲避我们吱吱唔唔不谈闫锡山，因有民谚说：“会说五台话，能把洋刀拷”，还有用五台话说的：“都督姓甚，我（读蒙）姓甚，我

和都督打对门”。以说明五台人吃得开。老年人长期受其统治，思想不解放，所以态度暧昧。

部队行军，常需要些大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协助我们运送辎重和收容伤病员，但寿阳境内的“大车”小得好似玩具，车轮直径不足2尺，车轮多用木板制成，没有辐辏的车轮，只一个牲畜拉着，车上顶多坐两三个人。我们责问其：“为何派来这样的小车？你们四辆大车也不及河北一辆，这是为何？”车夫老乡说：“我们本来也是大车，鬼子在据点，一要就是多少辆，哪有那么多大车，为了应付敌人，就只能用这种小车来充数。”我们听后顿然气消，知道老乡是专胡弄日本鬼子的。

部队进军到离寿阳城北二十里的一个大村庄——盘湾底村（或宗艾），村中一小溪，村东南小山上有一小塔“魁星阁”，这里的人民贫穷而好客。这时我的疟疾复发病倒了，隔日发作一次，身体很快衰弱，不思饮食，尤不喜吃硬而脆的“鬼子白”，房东一家老少都很好，允许同志们为我到他家煤火上随便做饭。这里老乡的住房多半是房连房的砖房，家家有个深达丈余的粪坑厕所，上面横架几根石条，不习惯还无法在这种厕所里解手，然而老乡是利用人肥浇灌土地的。我因疟疾复发两三次未能随部队出去执行任务，那时战斗多半是夜间袭击寿阳之敌。寿阳是石太路的一个较大的据点，城里龟缩着待毙的敌伪。人们蹙足了劲要攻下寿阳。

这里可清晰地听到“铁牛”——火车鸣笛声。当地人民与二分区十九团的关系密切，年青男女都会唱《十

九团的哥哥回来了》的歌曲，可见这里虽然距离敌据点不太远，然而可能是游击区，村里已经有武委会（武装委员会）主任了，说明这里的解放区比平定要老一些。

这一阶段部队另一特点是：我们上下级关系、战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我46团一营干部虽来自四面八方，但相处关系很融洽，营长高登云同志阜平人，对我卫生所的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建议如短训卫生战士等，都能落实，每次营务会都要请医生参加，可直接与各连连长、指导员取得直接联系，卫生工作较易推动。我们与战士们的关系也很密切，相互关心和尊重，一般连队的卫生员都是未成年的小孩，我们象哥哥般的照顾他们，然而我们对各连的病号随叫随到，尤其患下腿溃瘍的同志，我卫生所主动惦记他们，每到驻地及时为他们换药。打大一点的仗每次我们要带担架队尾随部队进入阵地，所以，战士们骂我们：“我们还无死，你们就跟来抬我们，真是不祥之兆。”然而战斗打响后，我们又是十分亲密地、一时也离不开的战友。所以，不仅我营，就在42团时我军就已形成互相关心、互相尊重的良好风尚。（回忆在42团某次夜间战斗，共同蹲水峪山头时，有位连长教会了我如何看北极星，在夜晚不迷失方向。后来，我将识星知识用于1960年大灾年的打黄羊中）。至于军民关系，当然比不上老区人民的遇事直截了当，但在刚开辟工作的新区中，军民间关系还是可以的，如盘湾底房东家十来岁的小男孩和来他家作客的表姐，能够如实回答我们的问话，不象老年人那样吞吞

吐吐，而且活泼天真可爱，相互学习革命歌曲，要不，我们怎知有一首《十九团的哥哥回来了》呢？我的战友李国栋指导员，一参军我们就在石门供给部一起工作，他是野北惨案受害者的家属，他天性活泼，喜唱喜动，常来我卫生所与房东家年青孩子学唱歌曲。这一段李国栋同志让我当支书，他当副支书，党内工作通畅无阻，使政治思想工作，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正因各方面关系——尤其上下级关系密切，故对部队的集体行动、安全性有所忽略，每天下午傍晚前营部通信员送当夜“口令”，哨兵一般命令你“站住！口令？”，如是自己人即答已规定的口令，如“解放”等，如果不答，或答得不对，即可向你开枪，这是军事常识。同志们均知，不知口令夜间在新区行动很易误会和挨枪的。有一天，当夜口令不知是何？我们卫生所已经就寝，我想：不对，为何今天小高未给送口令呢？我派看护长杨振东，让他串房去营部问一下口令是何？没想到，不大一会儿，杨回急吁吁地说：“部队已走了，房东说，天一黑就走了。”我心想：这是新区，部队转移也不通知我们，见面非和高登云算账不可！我决定，我们立即找部队去。下午我在营部，好象听到“谢家鳌”，我想部队是否去该地去了，我们问过房东大爷，他说西南方几十里外有个谢家鳌，我们全所四、五个人，都起来背好被包及手榴弹，辞别房东大爷，向房东指引的大道上走去。

走了几里虽有车道，但越走越渺茫，在道边一村庄

叫醒老乡，请他给作响导带带路，这是一个年青小伙子，漆黑的夜里他也很迷糊，他说：“我从未去过那个村。”越走越无路，想打听一下既无人更无村，深深体会离开群众寸步难行，又是夜间万一碰上敌人怎办？十分寂寞和着急。小伙子哭了，他说：“我也搞不清方向找不到路了”。我们虽曾怀疑过这个小伙子是否好人，但他一哭，我们放心了，知他确实不认得路。走到一个低洼地方，见是一个村庄模样，小伙子也不知是何村。我们唤醒村边一家老乡问谢家鳌离这多远？他指向西方说：“快到了，再走七八里就到了。”这时已是拂晓时分，虽无钟表知道东方发白快天亮了。我们向小伙子道谢，请他回去。我们自己打听走着走，大约又走十来里，正在疑虑我们能否顺利地找到时，前面有人喊：“站住！什么人？”我们一听是二连战士的口音，很高兴。他指前面高地即是谢家鳌，我们很快到达目的地。

我二话没说，气呼呼地去找高登云营长，见面就大发雷霆，中心是“部队转移为何不通知我们？假若我们当了俘虏谁负责？！”高谦逊坦率地承认错误：“医生，是我错了，忘了通知你们，对不起！同志们消消气，请原谅吧！”一个劲赔礼道歉方罢。营长说：“谢家鳌是新区，大家要注意群众纪律和保密。”管理员给安排了房子住下，照常开始正常的门诊和下连看病号的医疗工作。回顾已往的几十年中，好象这是唯一的一次，再无碰到象高营长这样勇于承认过错请求下级谅解的首长，每当想起给高营长发脾气的这件事，就热呼呼地感到，

这是真正生活中的战友之情，不是官压兵、上压下的军阀主义，而是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阶级兄弟的情谊，所以，能够相互尊重和体贴。就是我军中也常遇到“官不大、僚不小”的人，本来无理，因是领导也无勇气好好承认，甚至完全不认错者有之。相形之下，高登云同志谦逊的官兵一致的态度，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和发扬的榜样。我体会这是战友情谊最高峰，是我永远怀念的好同志之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从阜平郑家庄出征西进以来，经过无数的大小村庄，但谢家鳌这个小村，也和洪子店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不忘怀。前几年打听一寿阳的住院患者，得知我们那时驻防大村距谢家鳌不足40里路，却整整走了多半夜。

我们是晋察冀北岳区三分区部队，来到二分区驻地的山西，的确不如在河北人熟地熟。部队精神饱满准备攻打寿阳，却出其不意地命令我团东返。

## 5、袭击东长寿

我46团奉命随大部队日夜兼程向东转移。一天，傍晚才宿营在平定一村庄，渴极了，我们喝了生水。假如连续行军，也就不会发觉水里的小动物了，也巧，部队连续在此驻防数天，次日才知这里也是极其缺水的平定县属地，家家设有水窖、房屋、窑洞、院落都石砌成，遇雨天，家家户户“洗”院子，让雨水流入窖中，



用水时，用小柳斗打水使用。有一次，我们提上来的水，肉眼看来虽很清沏，但细看孑孓丛生，上下游动，腻外透了，悟起喝这种生水多么危险！因非井内泉水，绝不应生喝，所以，平定老乡也有喝开水的良好习惯。才又悟起那个唱大戏慰问我们的大村庄为何对我们浪费水有意见？老乡储点水的确不易！感到老乡们的意见是很客气而正确的。所以，对平定无水及加意节约用水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水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水和粮食、空气同等重要，对人生缺一不可！这对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中是有指导意义的，如：行军遇渴、下乡巡回医疗遇水困难、甚至休克病人、体外循环术后病人的奇渴，有了同病人共急水的医患感情。这实际也是尊不尊重别人劳动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我三分区虽穷，但用水从无太困难过，由于用不着过分为水劳动，所以轻视水的价值，到了平定，还以三分区的观点对待用水，当然就遭到劳动者之不满，而且，真的一年不雨，可让人家怎活呢？这是新区，老乡有意见也不轻易提出，如是我白花、神仙二山，恐怕老乡见你浪费用水，会从你手中夺掉水瓢的。还不只是少为贵的问题，少而重要才贵；否则，少而不重要，虽少也不贵，水是人生要素，故水少就极宝贵。

部队继续东行，好象总感从高向低处走似的，走到一个山谷，壑石嶙嶙，清沏见底的一股清泉潺潺东流，后得知这里是晋冀交界的井陘界，人们说这股哗哗作响的清泉是从娘子关流来的，听到了水母娘娘的传说，一

致痛恨那个心眼坏的婆婆，同情、赞叹这个苦命的童养媳，赞扬神仙对其婆媳二人的不同报应。来到井陘虽然大山仍够高的，首问老乡这里有无水井？只一天多路程，已来到全无缺水的河北省了。记得曾渡滹沱河，有人指划说东南方就是平山城，连续行军抵正定化皮驻防。

正定化皮是个较大村庄，这里完全是平原，盛产花生，见农民整株烧花生及小学教师教授霸王鞭都感希罕，我们房东是一位当地有名望绅士之类的人物，谈起话来对我军抗日很有认识。这里距平汉线不远，离敌巢石门也不过百里，稍事休整，部队接到打东长寿车站的命令。

东长寿位于我驻地之东北，这个据点除有守敌防守之外，村里还驻有伪军，这次战斗声势较大，有几个部队参战不详，动员了几十辆大车及担架，我团的任务是袭击伪军，我卫生所全部出动，带十来付担架随部队设绑扎所。夜间约晚上八九点出发，因是一片平川开阔地，我绑扎所设在村边路口井房附近，部队隐蔽在棉花地里加上类似土色的军服，所以一点也不暴露目标，后来一声令下，部队插入巷内，敌人发现，向我部队一阵阵机枪扫射，火红的“雨点”噗噗射来，同样心想要保护好我的《局解》书不能受损。继而听到洪亮的杀声，呀！……交枪不杀，赶快投降！……接着敌人又向我阵地一阵罪恶的机枪扫射，这时有一人从敌人阵地边喊边向我方跑来，“排长，排长！我是×××，请别打枪！”

我方果然听出他是谁，允许他跑过来，敌人也无扫射和特别追击他。可能敌人正忙于巷战的缘故。这个人原来是不知那次战斗被敌俘去的战士，他说：“我一听就是排长的声音，所以冒死也要过来。”这人穿着伪军服装，背来一支步枪，立即调过枪口参战。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队已与车站交火，这人说，车站鬼子把守。来不及多谈，首长让他带路巷战，敌人在一个大院固守，工事较好，虽然激战很久，未能打开大院消灭该敌。后听到火车站及村内撤出战斗的命令，部队撤出来了，我团没有重伤员，敌人伤亡不详。拂晓回到化皮驻地，受到留守同志的欢迎。这次战斗，虽未能拔除该据点，但敌人防守车站更加提心吊胆。

那个跑回来的战士，因服装格异，人们误认是我们抓住的俘虏，该人苦苦哀求赶快给他换掉那套近邮政绿色日本鬼子式的肮脏皮。由于他是在战场交火中主动携枪投诚回来，所以没有对他后送审查，就仍回原连队当战士了。

据《新乐县人民八年抗战斗争片断》作者由老周写道：“……攻打东长寿，它是行（唐）长（寿）公路和平汉铁路的连接点，住着日军大队部、伪军保安大队和伪新乐县政府治安军团部、皇协军宪兵队和伪警察署等十来个单位，……共八九百人。”看来东长寿敌军还不算少。这一仗，据我看来，总起来说打得不算好。应该集中兵力先消灭车站守敌这一主要矛盾，因而影响全局。

## 6、北上途中

在正定县境内某农村，军民共庆抗战八年的伟大胜利。这里连演三天文明戏以慰劳我军，一面普天同庆抗日战争胜利，但另一面我们心情上并不轻松：国民党在民族最紧要关头向南溃逃，蒋介石还躲到峨嵋，坐山观虎斗，真可谓他打日本鬼子是极大的外行，而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和领导该人民军队的共产党采取防、限、溶、反、灭等策略，是大搞阴谋的行家，如今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及其军队反到成了受降的主要主人了，抢摘胜利果实，对这样一个滑头，美国出自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不谴责它，反来助纣为虐地全力助蒋，虽然尚未宣战，我们做为八路军的普通小兵已经嗅到火药味，知道战争不会罢休，已有了内战难免的预感。

当时的情况及背景：国际形势对我有利，“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屁股冒白烟的B29飞机高空出现，“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在远东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下，分兵三路进入东北。苏联的参战，使日本丧失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因而不得不表示投降。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刻转入全面大反攻阶段。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

令。……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军毙俘敌伪 23 万多人，攻克敌占城市 190 余座，收复国土 31 万平方公里，其中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可是，正当解放区军民对日大举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命令敌军冈村宁次维持现状，不得向我投降，还在 8 月 11 日，命令朱总司令，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所谓向敌不得擅自行动等一派胡言。还“委任汉奸为司令。为了抢占战略要地，美帝国主义派出大批飞机和海船，把长期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天空和海上运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和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面临着内战危机。”蒋介石勾结美帝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为了欺骗全国人民，三次邀请我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举行所谓和平谈判，同志们都不愿让毛主席赴邀，知道蒋介石这个大流氓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但我党为了全国全民利益还是决定前去，1945 年 8 月 28 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赴重庆谈判，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说得避免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基础上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国民党把谈判和协定作为部署内战的掩护，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撕毁了协定。人民却彻底看透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口是心非的故技，所以，人们普遍认定国民党腐败无能，绝不能寄托任何希望于它，《国民党一团糟》的歌曲深入人心。

毛主席在重庆与蒋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全军，要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让它从我手中“收复失地”，以达到它强占争夺战略要地的目的。这时察哈尔、热河两省已全部解放，我们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我们作为普通战士，已很清晰地预感到，代表富有阶级的政党，怎能在关键时刻饶过我们呢？预感到不可能与八·一五日寇投降随抗日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只要为了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生存，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美蒋反动派打仗了。否则，只能束手待毙，断送革命，全功尽弃了。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打比过去大得多的大仗了。

解放战争打出一个新中国，同时由于打大仗，也使我本人军事医学中的战伤治疗大大地得到锻炼，提高了医疗水平，更加丰富了我戎医生涯的内容和水平，使我戎医精神贯彻终生，极大提高为民造福的医疗才干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到应“感谢”蒋介石对我军逼迫的战争狂了。此是后话。

北上，我们为了与蒋帮争夺地域于停战协定之前，不让蒋帮从我解放过的土地上再强占要地，部队从冀西正定开始北上平西、平北至热河省。一路上打了许多大小不等的仗。

我团奉命随冀晋大部队北上，记忆较清晰的地方有：从盛产花生的正定出发，向北经曲阳羊平，又经过唐县高和，通过阔别已久的唐县城北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一营卫生所运输员（背夫）张仲魁

同志的家乡，就离宿营地数里，向我请假回家看看，明日拂晓前归队，不误行军，我毅然同意，允他回家一夜探望亲人。仲魁走后，就有同志提出，不该准假，准假也得向营部说一声，我当即解释：“仲魁是个老实人，不会发生意外，应该相信自己的同志”，记得有一位与我同龄的看护员王志远同志建议我去营部说一声。我不得已与教导员西峰同志打了招呼，他没吭声，没表态。但我本来已行军一天很疲劳了，可是一夜没有睡好，心想：我做为营卫生所的医生的确无权批准任何人离队的，今后一定改正；另外也曾想到，万一仲魁的家属拉后腿可怎么办？我自己的背包可以自己背，但几十斤的药械怎么办？……但我还是深信仲魁不会让我难为的。次日凌晨大约5时左右，仲魁回来了，全所同志都高兴，战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仲魁曾在北平酱园学过徒，知道一些北平的习俗，我们又无什么文化生活，所以除了战斗，空隙中，不是他讲北平，就是我讲边贩边卖的小说故事，如：红楼梦、西厢记、啼笑姻缘等，所以虽还从未去过北京，但通过张恨水的著述，已知北京有个天桥、先农坛、天坛、南苑等，当然想象中的这些地方与实际生活证实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由于小说允许夸张，将某些情景及古迹，说得有点近幻近虚了。看小说的速度极快，如在途中看到一本《西厢记》，虽已累得很了，但一口气当夜就看完了。虽记忆很浅，但也有印象，甚至记住了某些优秀古诗如“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

影动，疑是玉人来”，只一瞥之后，至今永志未忘，说明作品的感染力、生命力之大在我身上已有感受。可以说，讲故事，是我部队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学习文学之必需。否则，哪有机会学文学呢！

记得继续向平西方向挺进，又由山边进入了完全山区易县境内的岭西村宿营，黄昏前到达，到达后即全团集合，枪毙了一个开小差的战士，以整军纪，所以，岭西村名记得较死。而且易县大良岗的口音特点越来越浓。经涞水县境，到达怀来县城，这时的康庄至下花园的张家口的铁路已被我军控制，已经通车，部队从南向北横过铁路之前，见到飞驰向西的火车通过，公路上的汽车也有来往疾驶，而且有的部队运送病号已使用了汽车，速度之快当然是步行难以比拟的，也意味着我军已拥有象张家口这样大的城市及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了，无疑是日寇投降反攻阶段的新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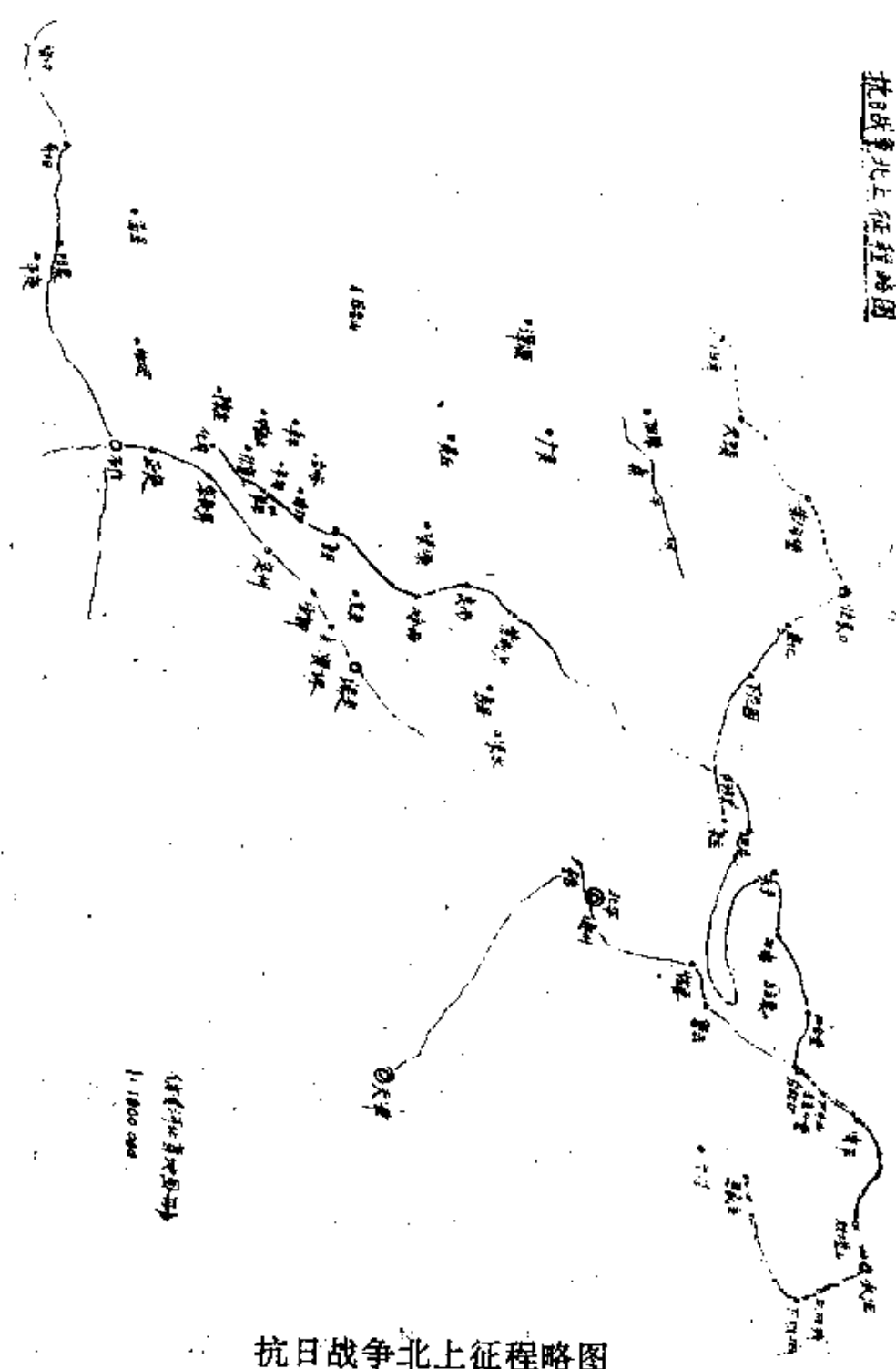
我团在怀来城住一两天，这座小城听说官厅水库修建后，怀来县府已迁往沙城去了。但原来山上带有垛口的怀来城墙也不见了，不可能是泡了吧。

从怀来向平北的延庆县行进，沿途有山，有河，有川、有溪，风土人情已与冀西差别较大，管娘叫妮，见到一些“大”头小脚油头粉面太阳穴带火罐烙印的妇女，人们喜食淹整辣椒，好象对我军还不太理解，无论男女有所回避的样子。

部队绕行至平北盛产山楂、栗子的密云县，记得有一处古迹——太子陵，是乾隆皇帝的皇太子的陵墓，两



抗日战争北上征程略图



抗日战争北上征程略图

个老婆陪葬，虽已年久失修，但殿堂、碑楼、石桥、古柏参天等景致还是很好的古代建筑，十三陵水库建后，这个古迹仍存在密云县穆家峪乡。虽距国民党军队很近，好象比别处要繁华，小小的街道，商铺众多，见到了梳飞机头蓬松发髻型的女掌柜等。这里山上还有土匪有时骚扰我们，被我军赶跑。这里已是冀热辽的辖区了。

国民党曾大肆骚扰过我们，他们没有美帝的装备是不敢出城来的。有一天，蒋军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军及我团方向袭来，然而由于我军当时还无坦克，显得被动，所以动员全体军民，夜挖深沟及用木板、木头等设障碍以对付敌人的坦克。稍一进山，敌人完全不敢猖狂进犯我们。这时虽未宣布处于那个历史阶段，实质上已进入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与解放战争相衔接、过渡的时期了，就是抗日战争阶段，已有了解放战争的成分，因美帝装备的蒋军已在向我开刀了。

记得这时我团已编赵尔陆司令员的冀晋纵队。有一天晚上，离我团驻地不远就是一分区部队的驻地，纵队举行过一次联欢晚会，有一分区三团不知和那个兄弟部队在会场上发生了争吵，矛盾越来越激烈，一分区某部队喊：“×团起立，上刺刀！”会场哗然，被戏台上纵队首长发现，高声制止，并谴：“是哪个部队？团长、政委上台来。”去后肯定挨了批评，才制止了冲突的发展，但战士与战士间仍有对骂，主要嫌三团骄傲自大，首长不出头了，但紧邻的战士不管你那一套，还在喊“你们

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次晚会没有开好，不是联欢，而是联愤了，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思想工作。据悉，诚然三团是一分区的主力团，和我三分区二团一样，打胜仗较多，也不应该盛气凌人，影响团结。所以，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是好的军事素质的表现标志，这只是对敌而言；然而对待自己的兄弟部队，则要教育部队谦虚作风更为重要。这是一个问题两方面，忽视哪个也会受损失，所以《新三字经》上“对己和，对敌狠”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同志，是政治上一般高的人，谁要想高人一等，临了来，只能说明其是真正政治素质上“低一等”的人。

这时，我三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杨舒敏同志当了纵队医务主任，我团卫生队长由任作祥同志担任，后调我到卫生队工作。

## 7、急进热河通过“无人区”

部队要向东北挺进！要在停战协定达成协议前寸土必争，我们的地盘寸步不让！——后来得知“争地盘”的命令是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下的，我们更要坚决执行。

纵队在这一战斗口号下，向热河进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行军前，团里动员；我们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强占古北口。古北口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任务大，时间紧，必须急行军！当时，做为普通一兵不

知古北口在哪里？也不知它的战略位置怎样重要，如在我手，即可顺利经此向东北进军；否则，将大失利。更不知国民党军队，也正在争占这个战略要地。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个极其重要的要害关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以便为挺进东北的战略部署铺平道路。

只有一周左右的征途中，就是通过人们称之为“人圈（读卷）”的“无人区”，见到了难以想象的慢性折磨人的日寇罪行，时间虽短，感受颇深，抗日战争将已结束；对侵略蹂躏我国人民的日寇，却续增了无比的仇恨！不妨，简而言之：

我团随大部队从延庆县属的永宁向东北方向行进至四海，地势还比较“开阔”，再从四海奔古北口，据说为了争取时间，一崮地超近插入高山峻岭的马山山脉贫沟恶谷。由于急行军每天要走上百里路，所以，从无吃过两头带太阳的饭，每天夜宿黄昏，早行拂晓，饭后无论多累也必须强调部队打热水洗脚后才能睡眠。刚酣睡入梦乡，又听到起床号，吃过早饭，拂晓行军至凌晨天亮已走出十多里，进行小休息。这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早晚已很冷，又加地势高峻，每日天亮后，战友们面面相觑：只见别人凡靠天的一面帽顶、帽缘、帽耳、肩、被包、眉毛，都结一层白白的薄霜，却不知自己，无疑也是相同模样，不由得相互为之一笑。这层薄霜吹之不下，必须阳光曝晒，才溶解消失。

白昼行军中，还时常见到一支不成队伍的妇孺队伍同路而行，有步行的，也有骑马骡的，大包小袱缓缓向

东北行进，后得知这些同志都是从延安奔赴东北工作的。看来，他们和我们所不同的，不是急行军，没有队形，也无指挥队伍行动的号声。

马山这一带仍属燕山山脉，人民本来即过着不寒温饱的日子。万恶的日本鬼子（自1933年3月5日侵入滦平），1942年秋，为了防止百姓与我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接头，将所有老百姓从各沟各壑统统赶到大路边，集中建起土围子，老乡只能在围子内打起陋舍茅屋居住，土围子只留两个大门，有的四角筑有炮楼。还有伪特站岗把持，早晚开闭，以防我游击队渗入，大门两侧还写着美化日寇的标语，什么“王道乐土，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胡说八道。假如老百姓拒绝搬入“王道乐土”，就杀人焚房，人们无奈，只好按日寇敌伪政权的指令就范，这就是有名的“无人区”，过去对该词早有所闻，但无体会，现亲眼目睹，即便一瞥之下，也留下了永不消失的烙痕。

乡亲们，由于被敌人驱入这人间地狱，自己的地无法去种，（租种就近地主的地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可狠的是那些日伪特务，六亲不认为虎作伥，欺压人民，对本是中国人的同胞父老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很快出现四多，即：讨饭的多，病死的多，吃糠咽菜的多，披麻袋片、光膀子、露乳房的多，高粱米、大米日伪吃，橡子面代食品人民吃，实行所谓配给，我一生中只在这里见到过大似粉笔盒的火柴盒，不知一盒让划多少时日。有的围子敌特怕来个“八月十五杀鞑子”，将

菜刀都管制起来，几户共用一把。人们无布缝衣，遍身补丁，十岁以下的儿童无论男女虽已深秋都一律裸体，十七八的姑娘也无衣遮体，真似叫花子一般，有的家庭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听说有的围子里的姑娘，用穿成一串的高粱秸围在腰里遮羞。家家户户无炕席，白天变天就不能出门，所幸一路山林较多，弄些木柴烤火取暖。文化教育更谈不到了，人民连命都不保，哪有心思学文化呢?! 所以，一路没有一所学校，有少数过去识字的人家，为了让小孩认几个字，仍在学《三字经》、《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他们还在贫困欲死的边缘上。记得一位眼窝很深的约40来岁的男子，穿着破衣烂裳，还笑话白话文说“老鼠，老鼠，你的尾巴怎么这样长呢?……也叫书真可笑。”敌特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也特别严厉，老乡只知康德几年了，甚至连民国几年了还不知道，共产党的事多数人不知，少数人只知有朱毛。……

这哪里象是地球上的人群? 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有这等可怜、愚昧、不平的角落呢?! 为何这样? 是日寇敌特制造的“无人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我东北人民从九·一八后就沦为亡国奴，这是罪恶的根本原因。有的汉奸大婆、姨太，花天酒地，听留声机里《情人顶咀》之类的靡靡之音，所以，1945年底46年初形势稍好，我政权就杀掉不少汉奸、回奸、满奸、蒙奸、敌特是完全应该的，因这些民族败类，已丧失人性，还留他何用!

我们部队在行程数天的“无人区”内，沿途见不到老乡，见着的就是如此“王道乐土，中日亲善”的土围子，同志们看到老乡如此可怜，听了老乡的苦述，许多同志掉了眼泪，心想，敌人统治区竟如此地折磨人民，和我边区内地不同者，只不过是急、慢性不同而已，日寇“扫荡”我边区时“三光政策”，是唏哩卡嚓的快速杀戮；而对它自己的统治区又如此慢慢地残杀他们的生命。第一天宿营到这种血泪斑斑的“无人区”后，我们住的这家房东，有五六口人。房东大爷，约五六十岁，坐在炕角，面庞消瘦，鬓发松乱，还戴着一顶破毡帽，矮瘦的身材，穿着灰不灰白不白的破棉袄，不知补了多少块颜色不同的补丁，腰里好像扎着绳子样的“腰带”，棉裤破得不可形容，为了御寒，小腿上用条状的东西缠绕着。

两个小孩子，光着屁股在火炕上随爷爷取暖。

他家有位年轻姑娘，大眼圆脸，中等身材，长得十分俊俏。梳着辫子，头发帘垂在前额两边，但她穿的衣服，比他老人好不了多少，也是灰不及的大襟棉袄，补丁擦补丁，不知已经穿过多少年了。袖口布絮外露，好象还不如“白毛女”的衣服整齐，破裤、破鞋，裤口扎着带子……，一个好端端的姑娘，被褴褛的衣裳给衬丑了。她在地上忙着给我们向灶堂里架木柴烧水。我们不禁想到，难道这里的姑娘不爱美吗？否。那她们为何象“叫花子”一般了呢？

还有一中年妇女，叫我们大兄弟，可能是姑娘的

妈，同样衣衫烂褛象“乞丐”。

房舍低矮，不是草顶就是土顶，墙壁被柴烟熏得漆黑。

炕是光光的土炕，没有席子，见不到象样的被子。火炕是冬天唯一取暖保命之物。没有多少盆罐，全家的财产，一瞥之下，尽收眼底。

房东大爷，偌大的年纪，亲切地管我们叫大侄子。他苦述日伪从康德几年就不配给布了，橡子面又涩又难吃，就连这有时也没有。种地没有地，外出不让出，老百姓实在是没法活呀……

都情不自禁地将衣服、军用品等赠给老乡，那怕是一件旧衣，一双旧袜，老乡都喜不自禁，不到完整的一夜就建立了极亲密军民鱼水之情，老乡们认识到八路军是好人，是好军队。当团部传达团首长的指示，说“这一带老乡太苦了，动员同志们将‘多余’的衣物送给老乡”时，人们早已不约而同地都如此做了，老乡们激动地感谢大哥、大兄弟、大侄子，同志们都自发的宣传：不要这样，我们军民是一家人，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这样的鱼水之情实难在纸面上完全形容出来。我们还有抢占古北口的任务，还要继续急行军的前进。次日拂晓，我们整顿队伍要出发了，衣不遮体不能御寒的老乡们，竟在初冬寒风凛冽的凌晨，象“叫花子”一样在村头路边欢送我们，他们不会鼓掌和招手，也不会甜言蜜语，但他们离开热炕的行动和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去地凝视着他们认为的大哥、大



兄弟、大侄子、好人、好军队离去，他们感激、惜别之情，只能从他们的行为和眼神中看出。

马山一带山峦叠障，还有片片原始森林，早晨远望白色接天，近望树枝条上挂满了银花。看到大路旁掠过的土围子，想到把人折磨得已非人样的可怜的同胞，心情十分沉重。“圈”本是圈牛羊的，然而眼前的‘王道乐土’说是“人圈”，可谓自相讽刺、名符其实。

老实讲，做为一个八路军战士，又是经过轻装后的行装，我们身上可有什么值钱的衣物呢？虽是一件破旧衣服，也不是用不着，一双鞋、一双袜也不是穿不着，但同志们都自愿地送给“无人区”这些可怜的同胞们，这是出自我八路军的阶级感情与民族感情，出自我们的人性和人道，在“文革”中“四人帮”所批判的我们是人性论，莫非不人性还象你“四人帮”兽性不成？！

我们几天后，就这样以湿润的泪眼、酸楚的心情，有时善良的“叫花子”突涌心头，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甚至泣抽难抑的心情，离开了人间地狱“无人区”。

我对短暂的路过“无人区”，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非常激动，可惜我非文学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全部感情用文字都叙述明白，后来我三分区冲锋剧社编了军民一家人的《无人区》话剧，由于真实，虽看来情节十分简单，同志们非常愿看爱看，而且评头品足剧中的角色，哪个象，哪个穿得太好而不象等等，所以，在寒风刺骨的夜晚，人们还愿意看下去，就是出自“真实”二字。我相信“无人区”现在肯定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无人区”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卫生工作也必须适应急行军和打仗的特点，由于急行军每日行程百里以上，不能象平时那样正规的上午9点、下午4点一日两餐，而是每日两头不见太阳的一日二餐。白天消耗体力很大，又疲劳又饥渴，平时行军十里小休息、三十里大休息的常规也已打破，有时中午大休息也不能及时喝到开水，所以，喝冷水的情况时有发生。炊事员同志们早起晚睡，行军背着行军锅比我们还累，大休息时，一停脚，立即烧水，而且有时燃柴不便烧不开水的情况常有之，同志们都体贴炊事班的困难，但易给卫生工作增加困难。战友们有时行军很疲劳，一大休息就想就地躺下恢复疲劳，如能遇到有柴草的地方，躺在草上，简直舒服极了！等不及开水就饮冷水，常常引起胃肠炎，腹痛、腹泻，增加了我们收容任务，更重要地是增加了非战斗性减员，所以，还是要求同志们要饮开水，勿着凉感冒等，以预防为主。

还有进入战斗之前，既要求吃饱，又不能吃得太饱，因胃和膀胱战伤的破碎度与该器官的充盈度成正比。以防万一腹部负伤，加重伤情及危险。进食宜淡少吃盐，防口渴，已成战前人人皆知的常识。

行军卫生中，鞋子的大小与软硬十分重要，老战士们都熟知鞋不能小，后跟太硬更糟，有的房东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还未穿的新鞋要缀上鞋带（参历史照片4，我

穿的即这种带鞋)，而且缀于后 $\frac{1}{3}$ ，经过实践这个位置不前不后恰到好处，这样的鞋子行路最跟脚，使鞋后跟（帮）摩擦跟腱在最低限度，以防足泡和“砍疮”（即是跟腱擦皮伤）。由于急行军每日行路百里以上，同志们的足跖、足趾、足跟都不可避免的要“打泡”，而且因连续行军，所以比以往“打泡”都多都重，这是由于足部担负着全身的体重，相同模式的行走动作，呈慢性、连续性集中地压在足的着力点上，由这个着力点向周围边际空虚部位施加压力，以及下肢静脉易曲张体位性回流缓慢而受阻，使足部体液淤滞，加之下肢静脉舒缩差，必须克服静脉流变学的静压，静脉血方可返回心脏右房。推理打绑腿应该有所帮助，但我感性的感觉也不怎解决问题，尤其绑得紧更加影响血回流。加重症状及增高发病率。长时受压及血管渗出，下肢（尤其足）的循环旺盛导致“疲劳”，加之鞋袜束缚的压力，更易致成表皮与真皮间的积液、分离，甚至组织溃破，如不及时、正确的处理，势必影响继续行军，甚至造成感染、溃疡、全身中毒影响机体健康。不能着眼于治疗，重在预防足部行军外伤。强调部队行军，必须睡眠前热水洗脚，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正确处理水泡，即用烧过的缝针，刺破水泡边缘，将积液稍加压力排出，穿净袜，有条件刺破之前碘酒、酒精或红汞消毒。有少数战士处理得不得法，即刺破泡的中心或剪去泡的表层，那样将会造成感染加重压迫局部不能行路而掉队的后果。事实

证明“砍疮”最难治疗，非得消除压迫摩擦因素（拖鞋）才有可能治愈。这样的卫生常识，通过上卫生课和老传新都在掌握着，主要在于自觉性，特别在极疲劳时的自觉性。重症就需我们治疗，故重在平时群众性的预防上，只卫生所几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战前卫生战士的训练和将急救包发给连队战士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因每连只有一个卫生员，是难以照顾全连伤员的。简易的包扎方法，及先止血（后消毒）隔时放松止血带以防肢体坏死等知识，都是平时就应传授给所有指战员的，用时，再教已来不及了，因为战斗的时间性、残酷性是战前难以准确预料的。

另外，战友们对极其重要的担架准备问题是又讨厌又欢迎，担架队必须掌握主动，尾随部队奔赴战场，好象“有失大雅”，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战斗就意味着决斗，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战友有时开玩笑的说我们是“催命鬼”，其实，当他们真的伤亡之后，我们又是战士们最亲密的战友，甚至有的同志多年以后还感谢救命“之恩”。

以上这些，都是行军和战前卫生工作中常遇到，又极重要的“琐事”，我们医务人员必须主动的提出建议、通过军政首长做好的卫生工作，也是戎医生涯常常遇到的“家常便饭”，不可等闲视之或草率从事，必须做为本职工作的大事认真做好。

让我们再回到行军路上来。

记得我们离古北口还有两天路程时，吃过一次人们称颂的米饭，颗粒圆圆，又香又软，既非稻米更非稷米，原来是久闻盛名的东北高粱米饭，当然是我从未享用过的美餐，俗语说的“洋鬼子吃高粱米，没有法子的”，看来高粱米也并不错，只是米的质量，加工方法的优劣与饭的质量有关。记得已结冰，不少人过河时滑倒在冰上，但战友们的热情高昂，边走边自发地高唱着《国民党一团糟》、《死心踏地的坏特务》等歌曲，声音响亮细腻，音色美，的确我成天行军打仗的八路军，竟然也能唱出这样悦耳的歌曲！这是因为歌的内容与我们所见所闻“无人区”的事实极相吻合，所以，同志们对敌人的憎恨，对同胞的炽热的感情，汇聚到一起发出对当时现实的怒吼！

次日急行军向古北口挺进，这是京承关塞通向东北的咽喉，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有火车、有轮船、汽车等现代化装备的运送兵员，而当时的我们，就凭为党、为人民的炽热感情，凭着我们绑着鞋带的双脚，要赛过蒋军的现代化，所以，走，是我八路军在运动战中的法宝之一，而且要战胜蒋军。

## 8、古北口争夺战

天色已晚到达古北口，好象一个集镇，商号板搭已上，空无一人，后得知，这里老乡都已跑掉，躲开是非之地。开饭了，吃了又硬、又散、又难咽下的高粱米

饭，人们悄悄诧异地议论为何今天的高粱米这样难吃？这可能就是洋鬼子吃的那种“没法子”的米吧。这里根本没有好米，而是还带红糠的瘦米，我们又不会做时间又这样紧，哪能好吃呢！总之，人们没有吃好，又疲劳，本来估计可能要宿营了，黑洞洞的古北口是个什么样子？还未看见，首长下命令“不能休息，要立即投入战斗！”我46团立即开赴距古北口东南三里的五里坨村应战，命令一营立即控制制高点（在该村东南方）。

次日即1946年1月13日晨，即遇到正在向制高点运动的蒋军，战斗立即打响，将敌人压下山谷。时间是多么宝贵？这就是为何我们自延庆一直急行军的缘故。一步之差，不知要牺牲多少战友的生命。然而我们提前到达一步，控制了制高点，所以，最后是我们胜利了。

一早，部队都待命，战场就在眼前遮日的山头上约1—2里，团绑扎所设在这个五里坨村村南。

战斗打响，战火纷飞，浓烟在山头上回旋，连续的炮声、手榴弹声及机枪声响成一片，敌军向我高地冲锋，被我团一营的同志们集中火力再次将敌人压下山谷。“寂静”了，我们每个参战的同志都知这个“静”是假象。果然不久，敌人又冲上来，被我一营的炮火及高亢洪亮的杀声，“呀……！”将敌人又压下去，这时伤员和俘虏已经下来了，一面迅速包扎，轻伤暂留绑扎所，重伤后送古北口；接着我们的战士荷枪上了刺刀押着一个俘虏来到绑扎所，这个头部轻伤，额前略有血迹，一身黄抓抓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披着棉大衣，带

着帽耳耷拉下垂的瓜皮顶棉帽，十分狼狈。我们给予同样认真的包扎，押送的战友，在向我们诉说“敌人的营长我们已抓住了。”这个俘虏立即问：“是我们营（他读云）长吗？”我们立即制止他“不准说话！坐在那儿！”他老老实实地蹲在那里。其实，这个敌军战士可能还不知我们的俘虏政策，只要交械投降以后，不再反抗，我们是决不会伤害他的。这个人听来象是云、贵、川方面的人，老想说话，被我们同志屡屡制止他：“不准说话，老实点儿！”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层层下死命令：“不把住山头要你的脑袋！”或是“丢掉山头拿头来见我！”平时最为平易近人的政委，听说也骂开人了，好象换成了两个人，我们预料战斗结束后，他定会向大家检讨的，否则，同志们也不会让过他。一阵枪炮声，一阵又沉寂下来，虽然同志们很疲劳又饥饿，但情绪饱满，士气高昂，见到俘虏和浓烟阵阵翻滚，坚如磐石般的山头稳在我手，虽然绑扎所随机枪声，一阵阵的噗噗的近程枪弹落在跟前，人们毫不在乎的喜悦、高兴。又随一次反冲锋后，这种喜悦的场面立即变为悲痛：我原一营的通信员、高营长的侄子边哭边找我说“我叔牺牲了”，并指向一副担架让我看。我情不自禁地迅速扑向担架，见到我生平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高登云同志，他仰卧，稍瘦长的脸，面色苍白，单眼皮，双眼无欲地微睁，口微张，短髭，肩部棉絮已经炸得稀烂，衣服上血迹斑斑，我立即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我的好战友牺牲了！走得太早

了！又见到徐副营长，衣服也已炸得褴褛，微露多半个面庞，粗黑的眉毛，眼已闭上的遗容及其他十来位阵亡战士的尸体。我让小高将牺牲的同志后送古北口，速找棺材，完后我去“看”营长，尔后我和另一位看护员，不顾村边飞弹袭来，和拉锯式地山头较量，我们主动地去村里找棺材，一家家的找，一口也未找到。

这时二、三梯队都已上了阵地，战斗继续进行着，时已正午，已打退敌人8次冲锋，打得仍很激烈，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去看高登云。正在这时，听到一家老乡的嚎淘哭啼声，后才得知这家老乡父子二人怕当民夫，端着火炉到地窖子里躲避，结果二人都一氧化碳中毒，儿子已死亡，老的经发现后活过来，故而大声嚎啕。无论其父子的行为如何，但到底还是因为美蒋反动派及日寇掀起的战争加给人民的痛苦。

经过敌我8次冲锋和反冲锋，敌人伤亡残重，企图抢占古北口的意图完全破灭，被迫狼狈地撤回石匣镇去了，下午日落前战斗结束，除留下部队继续在阵地警戒防止敌人再来侵犯外，大部分部队已撤出阵地休息和吃饭，我们饿了一天下午才用饭。

这次战斗是战略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鏖战，虽已早过“八·一五”，我认为仍应视为抗日战争在冀热辽的最后一战。所异者，我们的直接敌人不是日伪，而是美帝运来的蒋介石国民党孙连仲的军队，战斗原由，自然是在“停战协定”前的权利分配。我纵队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及周副主席的命令，我们虽付出牺牲80多人的沉重



代价，终于将国民党军队拒之古北口关内一侧，虽敌常来骚扰，由于制高点在我方控制，所以，无济于事。这次敌人的伤亡残重，损兵折将 1500 多人。很快“停战协定”下来了，规定 1946 年 1 月 13 日午夜生效。这时我主力团已完成了正面战斗的任务，用同志们的鲜血换来了强占保卫古北口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承德热河，粉碎了蒋介石在停战令生效前打通进军东北通道的阴谋，我们为反对内战取得了一次战略性胜利。

一二天后，除警戒部队外移防古北口，我团的同志们到处找棺材，总算找到一批，有的阵亡战友立即埋葬了，还有没埋葬的，上级命令暂不要埋葬，等追悼大会后再埋。这时见到一个兄弟部队，骡子上驮着一具同志的尸体，被纵队首长喝住痛斥，让他们速放下来抬着走。我找到小高欲看亲密战友高登云去，小高指着西南方几棵松柏林处的庙宇又哭着苦诉昨晚发生的悲剧：“昨天团供给处好不容易搞到一部分表里新的棉被给每位阵亡同志发寿被一条，以表敬仰之情，但昨天一夜之间将十几位烈士的寿被全部被人偷走，就这样穿着血衣入殓了。”我的心已碎了，二人又是呜呜哽噎地痛哭一场，我首先想到的是连高登云同志最后一面也未看到，他生前对我卫生工作的支持，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尤其在谢家鳌我不该向一位身为首长的营长大发雷霆，而他还那样和颜悦色地向一个下级频频承认错误……；他一切好处及优点，均涌上心头，感到实在对不起他！又十分痛恨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死人的寿被你还偷走，太心狠

了！我要抓住你，非……！但立即意识到偷窃者是否也是象“无人区”见到的人呢？如果是这些地球上罕见的苦难同胞，即便他们扒去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也是人，也要生存，求活命的人，相信高营长九泉之下也会谅解他们，甚至会主动送给他们的。

又过数天后，于1月26日古北口驻军全体军人及民众万余人召开追悼大会，将所有棺材排在会场，我预感自己无法控制感情，所以未去参加大会。但这次大会是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每人胸前带一朵小白花，向死者三鞠躬，主祭人纵队首长赵尔陆向以高登云营长为首的80多位烈士，祭酒三大碗，泼在灵前祭奠，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据说要建个烈士墓地，将战友们埋在一起。同时还有热河省农会主任曹国章参加主祭，军民各界代表讲话，其中古北口火车站铁路工人提议为烈士修碑一座，以志永久纪念，当即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当年七月一日落成了，赵司令员题写了“山河永在”四个大字，五角星下，镌刻着烈士们的姓名。

后来我们环顾了古北口全貌，这里住的居民不多，商业也不多，雄关隘口，中间低洼，有不通车的平承铁路通过，记得有一影壁式的建筑，上面有一幅近代风景画引人注目，及一座名为什么轩的木牌，这些在冀西是少见的。还有一座建筑古朴而近代化的杨家庙，主殿是巾帼英雄佘太君，两侧穆桂英、杨排凤、八姐九妹，有幸在这个殿里遇到战友徐干事，给我和胡青山、张国君二战友于1945年阴历11月20日（即12月24日）摄

影一张留至今日为念（见历史图片1）。庙中有几个道士，老主持给我们讲述：“古北口历来是打仗的地方，许多死难人的尸骨风露沟壑，幽灵难栖，我带师徒三人拣回所有尸骨，用庙资修筑阵亡将士公墓一座，座落在古北口南。”我们参观了这座公墓，一个大坟丘，周围砌花廊，栽了些小松树等，当然道士他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八路军，凡是人骨他都拣来。心想，难道还不值得为我们牺牲的这么多位战友建座公墓吗?! 但一直再无机会重返古北口考察落实情况。还有通向五里坨方向依山修筑的一个小寺，寺里一长一小，小者是七八岁的小孩，问之不答，只是边敲木鱼边念经，也听不清孩子念的是不是字。古北口是沿两个高峻山巅修下来的长城雄关隘口，记得谷中长城门已不存在，但这个地势的确是战略要地。

后来又从古北口转移至火斗山、滦平，经张百湾去承德市及上板城到达兴隆县的马家庄驻防。实际在热河境内已进入解放战争历史阶段了。

时隔41年之后，集体旅游匆过古北口，前一天住在北京德胜宾馆彻夜难眠，并嘱司机古北口请暂停，我要下车祭友获允，但战场故地已面目全非，待发现，已逾八里之遥了，我曾作诗一首遥祭高登云营长等战友，以纪念这些连胜利也未见到亲爱的战友们：

彻夜不寐思战友，  
明日可见“高登云”。  
未料故地面全非，

唯留旧时“肉丘坟”。  
遥呼大哥你在哪儿?!  
幽会只能梦中寻。

1987. 5. 30 作于承德宾馆

## (六) 前方战斗生活及战伤救护的回顾和认识

回顾抗日战争八年来的全部历程，特别是自 1940 年做医生工作以来，医疗实践已构成我戎医生涯的重要基础。我是从游击战争走过来的，离开这一客观现实及前提，任何学术性问题也难谈清楚。

### 1、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中央指引下，在工农红军老前辈们的教导及传帮带下，通过战争中的医疗工作实践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卫生战士，在抗战八年的全过程中承担了革命历史的重任，完成了医疗工作，使之坚持了战争直至胜利。对于战争规律性的认识，已突破“游击战”的范畴，实践证明对后来的战争也大有用处。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书中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重申中共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我一再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例如几百人）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

(432页)“我们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打仗——就是力量的对比，有利就打，不利就走。”(440页)“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关键的一条是发动群众，……”(408页)“把我们看成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409页)，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419页)。“日本侵略军的弱点是兵力不足”(438页)。“……不仅军队会进行游击战，老百姓也会。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437页)等等，许多名言，都是对革命战争及持久战的发挥、创新。我本人受益非浅，身为医生，也懂得了一些军事常识和规律。

我理解“游击战与歼灭战”，是和我们主要对日斗争方式的游击战和必要的运动战是同意语，无论“游击”、“歼灭”、“运动”都离不开走，所以，“走”是我们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我党中央对抗日战争所以采取游击战，并非我们对“走”有瘾，而是由于（在冀西几乎整个）抗日战争需要，充分地体现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的斗争战略，也可以说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本质决定的，我们不打游击战、持久战就不能取胜。所以必须走。在“走”字上我们饱尝了它的甜头，因“走”的目的是消灭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但也吃过一些苦头，可

以说，对“走”的全功能和其技巧，已有了深刻理解和体会。“走”，自然形成我卫生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和艰巨性。但做为武装集团，“走”是需要的，“走”是斗争艺术的基本功。

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的模范区域，是新中国的雏型。我们有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处处相信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与任何部队所不同的，人民战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严格的讲，谁离开人民也休想取胜。所以，将方法告诉敌人，它也是无法学会的。我们有了情同鱼水的群众，任何困难也能得到克服，保证战争的进行。

由于敌人的最大弱点是兵力不足，这一前提就给我们歼灭战、运动战造成了有利条件。我认为（除我未实践的平型关大战外）“百团大战”、强占古北口的争夺战，是典型的运动战，又是歼灭战，即最灵活机动的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相机消灭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不是每个战斗都体现了以上原则，所以有的战斗不理想。聂帅将其作为“胜利中的问题”。

我军在艰苦的1942年具体客观条件下，采取源于政治工作经验的“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伪，取得极大胜利，以政治为武器，军事配合辅助的战争形式，如《刘二姐劝夫》，将日俘组成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利用他们的感情和语言作碉堡内敌人的瓦解工作，获得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使敌伪惆怅、恐惧、动摇，涣散敌人的士气，使敌伪不得不考虑他们不光彩的角色及其未

来的出路，尤其是汉奸、特务（甚至部分伪军）这些中华民族的败类，有时他们比鬼子还丑恶，所以，有了《死心踏地的坏特务》的歌曲，使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我武工队神出鬼没地将他们处决，起到了良好的对敌震慑作用。对比之下我们的政治攻势比鬼子的“王道乐土”要高明的不知多少倍，敌人制造的“无人区”，所得到的是人民的反抗、咒骂、唾弃、复仇，而无法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下场。

抗战八年中，遇到了颗粒不收的1942年（也是我生平记事以来的第一大灾年），给我边区全体军民坚持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给我部队中的卫生工作带来了特殊困难，如：由于营养不足，体质低下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夜盲、浮肿病、虚脱（低血糖）、恶液质、爆发性肺炎、慢性溃疡，甚至有麻子的人又在1943年春重患天花，改变了天花终身免疫的规律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大生产，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等措施，终于战胜了灾荒，坚持了抗战，最后赢得了胜利，成为我军历史上“灿烂”的一页。我们做为无坚不摧的八路军中与病魔死亡顽强斗争的一员，是有极深远的人生意义的。

## 2、我党我军始终关心卫生工作

我军首脑机关的司、政、供、卫就是明证。党对医生一直重视，如医生、供给员都是连级，医生还享有半

个运输员（背夫）的编制。那时虽然还无听说什么知识分子政策，然而党关心卫生工作，对医生也很重视，我做为八路军中的一名医生，心甚感激和荣幸，通过八年卫生工作实践，更加热爱医生职业，更愿为提高战士身体素质、为提高全军健康水平、为伤病员早日康复服务。做为医生要提高医疗水平和治愈率，降低死亡、残废率而努力工作。“三大件”（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计）（图 42）的出现，就出自这一特定的战争环境，是方便病人的优越方法，用起来得心应手，很是方便，所以也是个好制度（后延至解放战争、建国后巡回医疗都很适用），那种环境也不允许医护分工那样明确。

自参军的那天起，就与人民在一起，受到党的谆谆教导。通过前后方医疗工作特别是反“扫荡”的实践，深感我们医务工作离开群众寸步难行，尤其担架队均非专职，都是人民支援。我们所以完成了医疗任务，首先应归功于党和边区人民。老区人民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永志不忘人民爱戴我军之情谊。

通过抗日战争实践，深知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不仅光荣而且是科学的。我愿将这种传统和技术的先进部分传授给下一代，我认为讲传统也是讲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努力使之代代相传，决不使之中断于我的接力点上。

热爱医生职业是形成我坚强信念的重要基础。

由于我们和病魔、死亡常打交道，在具体地与病伤战斗中结识了数以千计的伤病员战友，我逐步了解了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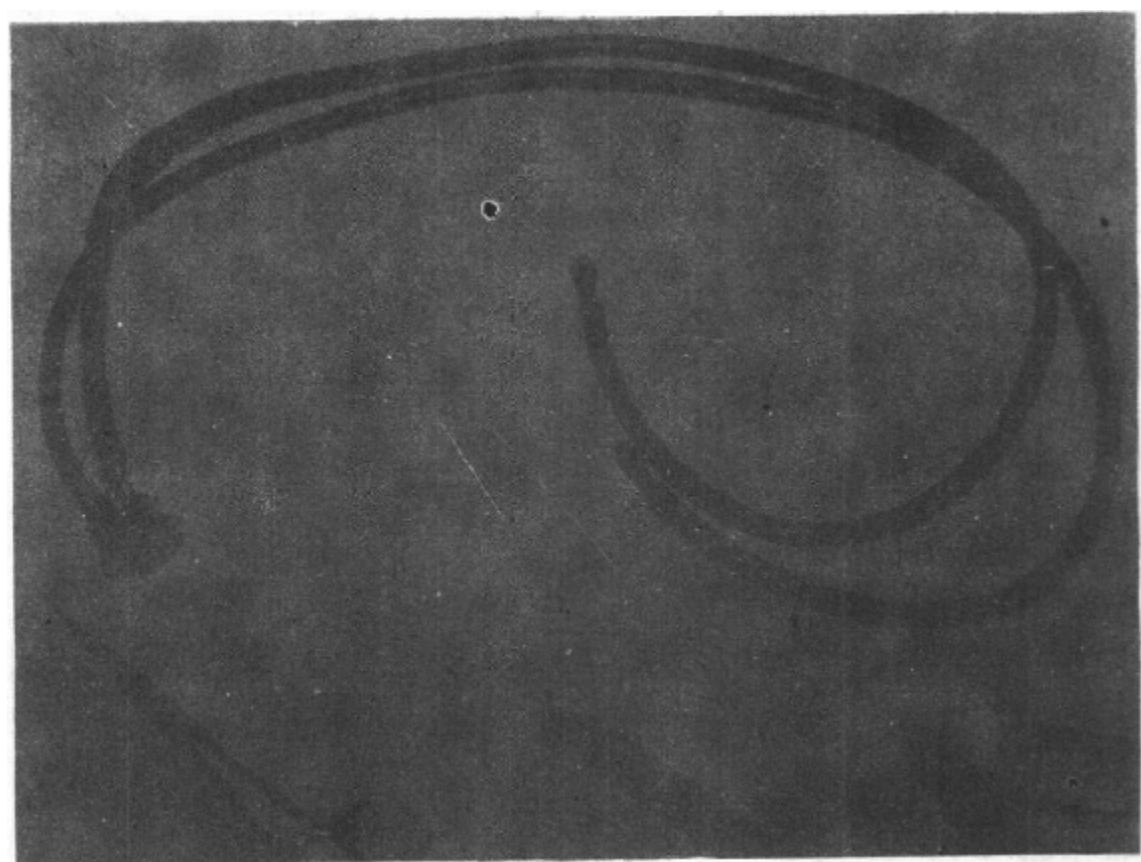


图 42 “三大件”

即听诊器、注射器（体温度）及一把神仙山上寺第一休养所时用过的一把小针头。几十年来，它们对伤病员功勋卓著，直至七十年代还在巡回医疗中，听诊器为蒙古族人民的健康服务。

死扶伤人道主义的真实意义，深深感到伤病员可爱，愿做居他们之中而非之上的勤务员。忠诚地为伤病员服务，是有意义的精神寄托。包括战俘在内，我们在工作中从不欺负人家，而将他们视为我们工作的对象，一视同仁对待战俘，无论他们是留还是走。所以，应该说抗

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医疗水平是低的，但同样可以为伤病员健康、为减少非战斗减员、为坚持战争做出贡献。所以，一批批伤病员重返战斗岗位，就是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微薄贡献，也是我八路军医生所无愧于任何有文凭的“医生”之自豪之点。

我们做为有政治觉悟的医生不是天生的，而是受党的长期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老前辈们言传身教特别是身教的影响，和善于向先进技术、先进事物学习而获得的。

总之，我做为八路军的一名医生，感到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对党、对边区及全国人民尽了微薄之力引以自豪，我们做为一名医生并不感到气馁和羞愧，因为我们为战争胜利，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我们还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我们的先进知识，拿过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但我们决不“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相反，认为我们所以能够完成战时医疗任务，坚持战争进行直至胜利，是有自己珍贵的经验在起作用。那些与此相反的思潮都是错误的。

### 3、部队卫生工作的特点

部队卫生工作特点是：依赖战士，预防为主，医疗为辅，为军事斗争服务，当好参谋，军民兼顾。

(1) 历来以集体活动为特点的兵营（学校、监狱）

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传染病流行之所，我体会它不仅只在医疗上，而且心理上的社会影响也互有因果的联系，而且，那时的我八路军没有专门的军营建筑，时刻与房东们即人民群众产生着广泛的接触。仅就卫生工作保障部队指战员的健康而言，就必须采取依靠这个人群，尤其是我部队人群的成员，以疾病预防为主要手段，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这样的例子随意可举出很多，如“爆发性肺炎”，死亡率高，我们积极就地隔离，认真治疗，随即扑灭了。发汗汤对预防感冒有肯定的价值；然而，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 1939 年部队接触感染流行的疥疮及 1940 年以后的疟疾大流行，都使我们陷于被动，甚至 1941 年反“扫荡”中三千多人的主力二团带病出征者全团才有一个连，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由于蚊子叮咬传染，所以成为军民共患的大“瘟疫”，环境恶劣没有特效药，迁延而成为恶液质时死亡率很高。这关系到部队非战斗减员能否打仗的大问题，所以必须给军政首长当好“参谋”，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抓住关键性问题（如规宁、蚊帐、消灭孑孓和熏蚊，加强营养，一个时期内吃好些恢复体力），即可由被动变为主动。……诸如此类实例，文中已经提到一些。

由于我们的对象是有思维的人，所以必须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形式讲清道理和利害，用行政管理的一致性、纪律性等手段，人人动起手来才能事半功倍；有时还需要动员当地人民共同行动。所以，卫生工作，实则是很

大程度上组织群众的工作。如果不是依赖广大战士，单单我们几个卫生人员是绝无能力办到的，如果一旦疾病丛生，忙死我们少数的卫生人员，也无本领扭转被动局面，甚至我们医生也会成为需待别人治疗的病号。实际上我们充当着公共卫生医生的角色。

虽然，我们努力通过群众贯彻以防为主，有时仍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短暂时间内根本因素不能解除。如 1942 年由于灾年无粮吃得困难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不可能立即解决的，必须等到至少明年粮食生产出来才能根本扭转。象这样的巨大困难，我们做为普通一小兵的确无力解决，但我们做为灾荒人群中的一员，而且是有营养知识的一员，还是有很大用处的，如四分区卫生处魏方忠处长的营养表（见附表）所以当时出名，就因为表上的知识，对解决营养缺乏有指导及实用价值之故。

(2) 有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采取集中治疗手段，“突击病号”。从前述情况，不难看出以防为主的主要作用，但总有这样那样危害战士健康的疾病发生，离开我们临床治疗还是不行的。“突击病号”常在驻军期间进行，“驻军”二字意味着战前或两次战斗之间的间隙，这时往往在进行休整或集训、练兵等，客观上允许我们集中团队的主要力量，对连队病号实行比较系统的合理治疗，以达速战速决尽量缩短病程的作用。例如：我 42 团驻防曲阳武家湾村，当时是吃黑豆马料的 1942 年，同志们的体质差，病员很多，影响训练和战斗。我

附表一 每人每日所需热量表  
 类别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总热量  
 单位 100公分 100公分 425公分 5000卡

各种食品的营养成分表

食品名称	水分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热量	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K	维生素P	维生素U	维生素H	维生素M	维生素N	维生素O	维生素Q	维生素R	维生素S	维生素T	维生素V	维生素W	维生素X	维生素Y	维生素Z	
猪肉	17.4	32.5				0.01	0.105	0.0028																			
猪肝	21.3	4.8	1.4			0.031	0.203	0.0028																			
牛肉	19.0	10.7				0.033	0.229	0.0081																			
羊肝	20.4	4.9	1.4			0.063	0.067	0.0023																			
羊肉	15.5	30.2																									
羊肾	23.1	19.0	5.0			0.012	0.231	0.0032																			
羊心	21.5	2.5				0.007	0.103	0.0002																			
羊肺	13.4	10.5				0.007	0.103	0.0002																			
羊脾	3.3	2.1	5.0			0.100	0.053	0.0002																			
羊胆汁		100																									
花生油																											
白米	9.5	1.2	13.5			0.010	0.130	0.0012																			
糙米	7.3	0.1	10.7			0.032	0.310	0.0018																			
小米	9.7	1.1	13.0			0.023	0.270	0.0032																			
白粉	10.8	1.1	13.6			0.010	0.032	0.0010																			
糙粉	23.1	0.1	23.0			0.010	0.130	0.0002																			
面粉	0.6	0.1	7.0			0.002	0.010	0.0002																			
豆油	9.5	4.4	12.5			0.023	0.310	0.0002																			
黄豆	30.2	17.4	23.1			0.200	0.670	0.0051																			
绿豆芽	9.1	1.8	3.3																								
豆腐	8.4	3.0	1.3			0.100	0.100	0.0025																			
黑豆	18.0	2.6	60.0			0.130	0.370	0.0016																			
黄豆	18.2	0.3	38.8			0.071	0.340	0.0070																			
豌豆	24.6	1.0	57.5			0.004	0.403	0.0057																			
蚕豆	22.1	0.3	58.5			0.005	0.350	0.0032																			
豌豆芽	3.2	0.1	5.3			0.012	0.030	0.0010																			
蚕豆芽	3.1	0.2	0.0																								
梨	0.1	0.1	9.1			0.015	0.025	0.0005																			
西瓜	0.0	0.4	3.3			0.011	0.023	0.0004																			
猕猴桃	0.0	0.1	55.4			2.250		0.120																			
大蒜	2.4	0.1	10.4			0.010	0.017	0.0010																			
红皮葱	1.2	0.1	9.7			0.012	0.037	0.0013																			
白洋葱	0.6		5.6			0.015	0.018	0.0002																			
大蒜苗	1.1	0.4	0.2			0.015	0.015	0.0001																			
大蒜头	1.1	0.1	2.5			0.051	0.033	0.0010																			
蒜白茎	1.6	0.3	4.5			0.045	0.029	0.0011																			
小葱茎	1.4	0.1	1.9			0.031	0.031	0.0015																			
芥菜	2.2		4.7			0.200	0.030																				
菠菜	1.8	0.2	1.6			0.016	0.012	0.0005																			
韭菜	2.1	0.4	3.3			0.009	0.009																				
黄瓜	0.8	0.2	2.1			0.015	0.013	0.0002																			
丝瓜	6.7	0.1	6.8			0.023	0.019	0.0003																			
茄子	0.3		1.3			0.010		0.0005																			
萝卜	2.3	0.1	3.1			0.011	0.034	0.0005																			
胡萝卜	1.0	0.7	25.4			0.014	0.033	0.0001																			
洋葱	1.3	0.1	16.2			0.010	0.045	0.0005																			

附：魏方中部长的《营养成分表》

们在我团卫生所幸福祥所长领导下，经团首长同意，集中了医生、卫生员数人，由政治处宣传干事临时负责，将各连病号，集中在下高堡村一个寺庙内，做为临时病房，实行突击治疗。记得当时最多的病种是疟疾，还有重症夜盲症等。对疟疾按时在发作前 1 时半静注 chinin Hcl Solution，及平时按时（实即系统治疗的维持量）服药，给病员们尽量改善伙食，收到极为明显的治疗效果。患病的战士同志们摇摇晃晃而来，经两三个礼拜的治疗，则挺胸阔步健康喜悦地回队了。

这一工作方式我认为是我军的创造，其实质是，集中我卫生工作优势，就地进行治疗，减轻休养所的压力。而不是将所有重患都送休养所集中治疗，同样可达到减少非战斗减员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效果，是发动卫生人员群众积极性的可喜的创造。

这一工作方式，我们曾用在二团、特等射手训练班都获得明显相同的效果。我相信，它可能适于任何现代化的兵种。因无实践，尚待别人断言。

还有，我们在分区医训班学习时的 1939 年冬，命令我班去套里村集中洗疥，实际也是突击病号的性质，当然这次由于无换的衣服，水又少，衣服不能消毒，使用硫黄膏涂局部，无法清洗，破溃的疥疮也不能换药等原因，故收效欠佳。

(3) 建立群众性卫生组织及各连设一名卫生战士，是扎根我军最基层连队的卫生组织和战救的助手，这个卫生委员会多设在各连救亡室下，有干部、战士及卫生

员参加，按期检查公共与个人卫生，促进炊事员的个人卫生（如剪指甲）及简易厕所卫生等，它可起到调动战士（群众）的积极性，起到检查、促进、保证、巩固卫生工作保障部队健康和整顿军容的作用。因为作战时，不可能点点都到，所以卫生战士在战伤包扎自救、互救上总是有益的助手。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营、团卫生机构的群众工作。

由于，我军有卫生委员会（和卫生战士）的检查督促，所以，我们虽然在灾年（1939年、42年）穿着补丁擦补丁的衣服、鞋、帽，但仍是一个渍点也没有的“穷”干净，“八路军讲卫生”是老乡们送给我军的美称。这是用实际行动换来的荣誉，无论走到哪里宿营，立即打扫房屋、院落、街道，驻防时背包四棱四角的“一条线”，或双竖井字背包放得整整齐齐，饭包（即挎包）、手榴弹带悬挂的横竖划一，我们再穷也要刷牙洗脸，无牙刷自己结制（参图44）也要注重口腔卫生。每人一个小碗（图43）自用自洗自保存，符合分餐制的原则。

我一度作为营（支队）、团卫生所的医生，除给部队不定时上卫生课宣传卫生知识外，还要将战伤初扎技术止血抢救技术，给卫生战士“吃偏饭”，多传授一点使之成为我们的有力助手，尤其我们不在场时发挥作用，所以，将救急包发给战士一些（全体发，不足），防毒（瓦斯）口罩发给每个指战员，是有备无患的正确做法。这样，战友才放心而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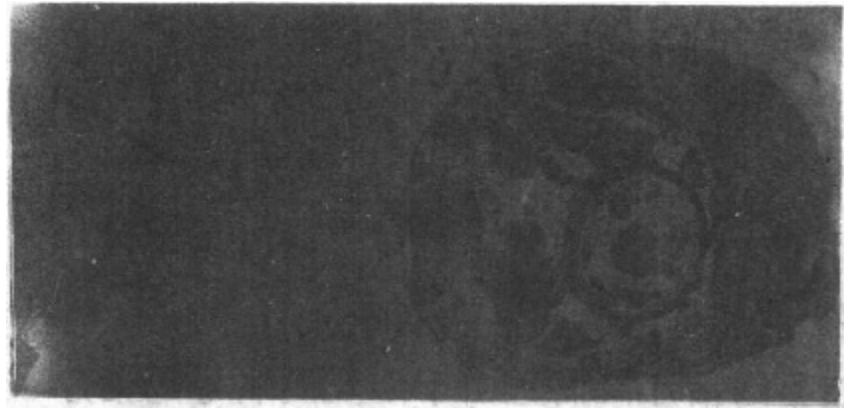


图 43：小碗及碗套，用之方便，又符合卫生要求。

(4) 工作方法必须深入班排，争取连长指导员的支持。

作为营卫生所的一名医生，本是毫无指挥权的，但是，可利用我们掌握的卫生知识，通过营长召集的连长以上的营务会，通过营长、教导员下通知，给全营或某连上卫生课传授给全体军人，而且要下连检查督促也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工作。最好，将所见所闻及建议，每次都去连部向连长、指导员作一谦虚的汇报，人家不但不认为是下去“挑刺”，而认为是善意地为我连队当“参谋”，这样，工作效果较好。上面我是指事实求是地发现缺点提出建议而说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人家的优点和对卫生工作的支持，就是戎马倥偬的连级军官，同样喜欢听颂扬自己单位的好话。但是不能只以此取得人家欢心而放弃必要的批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发现疾病苗头，先取得营首长的同意，利用下《卫生通知》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有效的方法。如：在特等射手训练班、46团一营，都曾利用这一方式推



动过工作，如在气候多变的深秋及气候渐暖百病丛生的初春感冒流行的季节，以首长的名义督促各连队进行预防工作，要较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兄弟连之间还有个好差的比较，都不想落后，所以易于推行。

在二团、46团卫生队当医生，不仅只是从事临床医疗技术的治疗，而且由于涉及到病号的治疗、护理和饮食方面的事，所以，要学会做群众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本领，我体会它非多余和额外，而是非常必要，否则，你的意图（即后来称之为“命令”和医嘱）就行不通。但我们还不知制定个什么制度来约束各方执行，因实质是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已证明肯定地比单人单马的进行要好得多。

（5）关于军民兼顾的问题，向来是我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后在拥政爱民的号召下，从来不将房东、老乡的疾苦当外人看，不仅休养所内常有老乡的伤病员住院治疗，就是在团队同样常给老乡看病。而且有的病人，就是直接与我们共同战斗中罹患的伤病，完全是我们份内的事。所以，我们爱人民，人民爱我军，是当时军民共住一个院，一个屋，甚至一条炕的条件下，特有的军民鱼水关系。

当然，我们卫生工作总的方向和目的，就是为战争——打仗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

### （七）对抗战时期的科技知识与医疗技术水平的浅谈

由于我们主要战争方式是游击战，所以，除平型关、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陈庄、王令口战斗、古北口争夺战等若干大的战役和战斗外，大多数是小仗，战伤救护相对少，战救的技术知识与水平也相对提高得慢，故战伤治疗水平要大大逊于解放战争及其以后。再加，那时的技术都差不多是来于旧中国的陈旧知识，所以，水平是低的。但并不因此而全被否认，我们从历史唯物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知识总是不断在前进，所以永远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技术水平。

我们说它陈旧和水平低，是以现在的水平为度来衡量的，而且并不因知识老、技术陈旧和水平低，而得出否定全盘的结论；相反，它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科学的，对战争做出过使一批批伤病员治愈出院的巨大贡献。又由于当时前方团队和休养所一样环境艰苦、条件困难，所以，它们不仅构成了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而且是符合科学的结论的。这一结语，经建国后用模拟方法重复这一实验得以证实，而非空谈。详见我《——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的调查报告》等文。

当然，我们决不因我军卫生工作传统光荣、科学就停步不前墨守成规，我们要肯定它科学的部分，否定其落后陈旧低水平的部分。随着医学水平不断前进，今天所肯定的东西，明天可能又被更好的东西所替代，不仅我八路军，任何人、任何专业永远如此。

下面我想举例，略加讨论，当然不是技术性总结，仅是为了说明它虽陈旧，但现在也否定不了的科学部分：

1、从那时起就用 Tr·jod 和酒精、红汞消毒及手臂洗手法，实 = Felbelinger 氏法，沿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将该法列为常规消毒法；

2、截肢尽量多留一截，实即兰格尔氏（Lengenbeck 氏）原则，至今仍是重要的原则。但肢体功能考虑相对地少，不如后来 Jusevith 氏想得多。而且牺牲了一些以今天的水平来看本可保留的肢体，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非议的。当然截肢是抗战全过程最高的技术水平的象征了。按 1990 年《国外医学 军事医学分册》第 4 期 161 页记载：

Baumgartner R 等《战伤外科截肢的新发展》一文说：“尽管外科学不断发展，战伤截肢仍是个问题。新式武器的使用造成新的损伤类型，复合伤和多处伤更为多见。不同组织的伤情视武器而异，而肢体组织损害将影响肢体的预后并决定截肢水平。

“伤肢的前途取决于外科原则的应用。（指：清创、固定、延期一期缝合、抗生素应用等），故使越战中感染发生率不足 3%，气性坏疽基本上消除，其预后由于使用氧疗法也得到改善。

“……按二战美国统计截肢的原因：严重创伤 70%，单纯动脉受损（肱动脉）20%，感染 10%。”

然而我们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1）我们的伤种

主要是枪、炸伤，当时无更新武器；

(2) 我们那时尚无抗菌素，甚至 1942 年以前连磺胺也没有，更无战地用氧了；

(3) 在山地战斗，在老乡家，甚至清创的条件也不具备，如消毒液制作困难，故感染率较高（更缺乏清创知识及重要性认识）。但贯通枪伤轻感染者多，大多能引流、吸收而结痂自愈。

(4) 截肢的原因下肢较多，主因伤势严重，尤其炸伤；

(5) 单纯动脉受损及感染均较西方为低；

(6) 在感染的病种上，似破伤风大于气性坏疽，又无 TAT，故它死亡率高。

从以上数点，与近代最发达的国家的军事医学相比，情况不同，我们的条件与美军比较要困难得多。而工作并不比它差，可见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时掌握的截肢原则、水平，仍是高水平的。

3、骨折副木固定，特别我军很穷，副木也没多少，在前方往往就地取材，如木板、木棍秫秸等代用品，不仅正确，而且先进、灵活、取材方便。改良后的 Thomash 氏股骨折固定法，在和平时期的现在，对意外灾害、交通事故甚至医院骨科常规治疗中，也得不出它不科学的结论，因还有实用价值。

4、先止血后消毒的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明几十年以前的我军，在不能用手术方法彻底解决出血问题的条件下，已很重视止血这一立刻危及伤员生命的问题。

题。实际是对战伤救治掌握轻重缓急的工作原则。所以，它做为指导的概念，要比实际技术价值更大一些。当然，现在条件不同了，环境也各异，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及以后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手术中出血，或在已有包扎敷料下的出血等）已是另一种二者兼优的条件和方法了，既达到了止血目的，又无感染后顾之忧。所以执行这一原则中，要掌握具体环境与条件。但这原则从过去至今天仍是不可非议的重要。

5、外伤性休克头低位是正确的，无论失血性和精神性皆不差。

6、棉纱再生使用，直至没有“尸壳”，后来发展为白求恩的“消毒十三步”，既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美德的产物，又对创伤愈合无害，至今仍沿用。可见我国、我民族早就有勤俭、节约、朴素的美德，我认为这是永远应该保持发扬的光荣传统，我相信一个八路军卫生战士是永远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用一次就扔的。扔与不扔

---

的需要，我们实践过除露两只眼睛外，将全部颜面、后头都掩盖住的手术帽，着手术衣的规则，至今仍沿用，那时没有橡皮医用手套，除严格要求刷手洗手外，且冒着将皮肤腐蚀的危险（如升汞水、石碳酸水）去多次间断地泡手，以保持双手无菌。当然那种只留双眼的手术帽已不必用了，可是无菌观念对战伤治疗的效果，是起决定作用的。一句话，我军的无菌观念可贵。

8、绷带学技术大大超过现今，这是由于当时舍不得滥用、也没有足够的胶布，传统做法极其注重绷带学，可以说绷带学技术水平比现今要高得多，以后随橡皮膏的丰富已逐渐替代了绷带，所以也无必要沿用那么多种类的绷带了。但至今腹带、胸带仍沿用，下颌四头带、乳带、臀部三角巾现今仍有实用价值。

9、有许多种老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至今仍有使用价值。如：Rivanol 当时的外科圣药，今天外科、皮科仍在用它 1% 溶液治疗疾病。

Aspirin 仍作为抗风湿、抗凝特效药来使用，解热仍是常用的，虽有出血、粒细胞减少等副作用，甚至有人提出它可造成脑性昏迷及死亡和提高胃癌诱发率，但用肠溶型制剂，则无此弊，《药典》上仍无淘汰它。

Tr.jod 及酒精外科常规皮肤消毒仍离不开。

Lesol 仍在病房、手术室作为消毒剂使用，据我们回顾性研究，重复实验说明它在 0.3% 浓度，即可作泡手灭菌之用，且不受温度的影响。

还有的老药如：jodoform 已见不到了，实际它对

某些皮肤病屡用屡效，它及滑石粉是“痒疹”良方的重要药物，它来源于我的老师尹明亮部长这位长征老前辈医生之手，至今可以说无一失败，就说明知识虽老，但至今仍有生命力。

某些色素制剂 Akthisol 及 ST 均曾在建国后治疗某些疾患获良效。

10、还有与我卫生工作任何技术领域都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一条，即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技术安排，就是：许多工作不必设专职人员而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战伤救护工作即可。如男老乡抬担架而且就地取材捆绑简易能拆卸的担架。女同志喂茶饭的基本护理，拆洗衣服等为伤病员创造舒适的休养环境。构成了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代表人物是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大娘，还有在 1941 年及 43 年将伤病员疏散到老乡家里而能被收留共同生活及战斗的人民群众，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因他们之间非亲非故，这是乡亲父老的政治觉悟的问题。这就使我们的医疗工作能适应任何困难环境的法宝。

抗战初期，我三分区卫生部还设有一个担架队，几十个人的专业队伍，累死也不可能完成这样多的伤病员运输任务。这种专业编制的形式仍可能是来源于旧军队做法，所以，它永远陷于被动而不能拔足。

我说它水平低，技术落后主要是指：

1、知识陈旧，是指从旧社会旧中国耶稣教会医院及旧军医知识间接（或直接）地传过来的，特别是旧中

国的军队政治腐败不求上进，军医技术同样不可能在花天酒地、大婆姨太、吸白面、嫖妓女、麻将、骨牌之赌博声中有所进步的，就是有些立志军医科学研究的正派军医，在这样乱嘈嘈政治环境和腐败反动的制度下，也难崭露头角。我军中的某些高级军医佼佼者即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理应受到我晚辈们称颂，不容易！我八路军的前身，自工农红军建军之日起，就在战火纷飞的战斗环境中过渡到抗日战争中来。所以，可以毫不推卸和夸大的说，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医疗技术水平很落后，是由于诞生于旧社会这一客观造成的。

2、抗战中虽已知道了“休克”一词，好象只限于休克就是“假死”这一停步不前的概念上，自然不会有长足进步的，已看到某些伤如股骨开放骨折伤等重伤，常因休克迅速死亡，甚至内心感到这个伤情“不”重，片刻后已经死亡的实例不是太罕见的。自上而下未将看不见摸不到的休克这一病理现象提高到战略位置去考虑，以降低死亡率。所以，对大失血、血容量严重不足患者，只知局部止血，不知着眼于全身的处理，而且还规定一条“休克不准喝水”的信条，其根据就是进水会增加出血，对伤员的奇渴不予理会是愚昧无知思想造成的。（建国后，我们对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后的同样奇渴，有了来自休克的同情心的感受，所以，在留置胃管情况下，可以喂点水进去，立即又经胃管将水抽出。这样患者大大得到满足。当然彻底解决口渴是一连



串的血容量，水电解质平衡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我们当时技术低，直至 1945 年夏才有了静脉输液的知识，但又因当时的 Glucose、Nomarsalin 的蒸馏水热源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很困难，即便输上了，很快产生恶寒高热等反应，而一下停顿了四年，才学会了补液技术，使休克纠正血容量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1949）也学会了现抽现输方式的输血技术，这在当时效果不显著，但现在看来，是解决战伤失血性休克的一项先进技术。

失血性休克的基本原则是止血和恢复血容量。

原规定“休克不准喝水”的第一个人，可以说是对人类的犯罪，然而现在看来，四肢出血已上了止血带，伤员奇渴要求饮水，我们当时既不会手术切开止血，又没有掌握输血输液补液技术，伤员要求喝口冷水也不给，实际等于成心将人家干渴而死，电解质紊乱是肯定的，再合并战场动乱的精神因素，二者兼有性休克而死者已有之。就这样一条落后的常规，无人敢提出打破，谁要提出，除非不杀人，只要人死了，无论还有何附加死因，也要加罪于你身，所以这种既愚蠢又固步自封的禁锢，就在我八路军中，同样因循守旧了好几年。

3、那时（连解放战争初期）不会处理战伤所致的开放性气胸，肯定也是死过人的，后来，学会了水封瓶的原理及带活瓣的针头，就有效地尽快关闭胸腔，解决负压问题。

4、已知伤口感染对患者生命的危险性了，但对

“三大仇敌”（破伤风、气性坏疽、败血脓毒症）还无认识，虽然见到或听到象白求恩同志那样的致死伤员。所幸者，当时伤员要比解放战争少得多，问题还不象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的严重程度。

5、已知四肢出血扎止血带的技术，但无前后衔接的医疗制度，本应隔时（如20分至半小时）松解一下再扎紧，故而在后送中造成出血远端循环中断肢体坏死。我们在医训班学习的1939年，首次见到的截肢患者，就是这样的伤员，好端端的一只好手断送在松散的医疗制度中，多么可惜！虽然，不久见到了白求恩遗著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術》一书，但并未能推广施行，直到解放战争中的伤票制度才真正解决了先后衔接问题。与截掉的墨黑而污秽坏死的手相比，真是前者该罚而后者当赏了。

6、行军中，特别在炎夏盛暑期，脱水严重，途中供应开水又不方便，我们虽设想在刚打上来的清洁井水内，洒入 Tr. jod 若干，搅拌后允许战友们饮用而解渴，认为 Tr. jod 可能杀死冷水中的细菌。现在看来，饮这种水，所以没有出事致成胃肠炎，是由于我们饮的实际是泉水之故，而井水中到底有何细菌，有什么细菌？并不知晓，故不一定是 Tr. jod 的杀菌功能的效果，虽无作重复实验，但一梢水至少有 10000ml 以上，滴进几毫升 Tr. jod，浓度也是极低的，所以，估计这种浓度，又那样短暂的弥散时间，不一定就能杀死细菌。我们当时无条件，也从未进行这项研究以验证其无菌无毒，可

以说即便成功也是侥幸的，是好心的空想，而不是科学。应摒弃之，要用，需重复实验得出结论后方行。我认为，不仅可抛弃这项具体“技术”，而且更要紧的是要抛弃“想当然”的非科学态度。

7、当时最陈旧落后而谈不到水平的观念是：“伤口必须每日换药，有瘘管（窦道）还要用药捻（纱条）填塞，美其名引流，施行这样落后的医疗技术；对本来就穷得要死的抗战时期的晋察冀，不仅浪费了大量医护人员的人、物力，劳民伤财；又对创伤（伤口）愈合是一人为的大障碍。这一落后的观念，直至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从宫乃泉译著《战伤疗法》上、在钱信忠提倡下才获得正确理论的“新创伤疗法”，即融汇为不痛、脓、肿不换药的疗法才彻底解决了。

……

只这些已可说明我军抗战时期医疗技术水平的梗概，是技术性阐述，由于无原始数据和完整资料，故它不是军事医学的科研和总结，可算是资料信息和实践积累，供我同道特别是军医及交通、厂矿医生们作为参考而已，因为它是戎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所以要事实求是地肯定好的，否定错的，即使它在当时曾起到过某些积极作用亦然。

我认为知识就是力量，随着时间推移永远会有新知识出现，已往的“新”的就变成旧知识了，永远如此，永无止境，知识在一定的历史空间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知识更不会随着某一技术历史变革“一刀切”地同

时变为旧的知识，如刚提到的《痒疹良方》起码出自长征时代的老医生之时，那怕已经过去 55 年，经历了磺胺、抗生素、激素等的技术变革，它仍不被淘汰，仍未被新的所替代，说明它在时间上是老知识，然而仍有治疗价值，所以它仍是“新”知识，仍无过时，更不会随着政治的变革而成为过时，所以，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能视为新的必须全部更换旧的，好象只有新知识才能站住脚，旧知识都是毫无用处的了，其实，新的是不是永不凋谢的鲜花？还是昙花一现？还是根本不香的花？不经实践谁也难定。那种绝对新的必须全部更换旧的观点，是对“新”知识和创造它的人的“铁扫帚”，等于不要医学史，否则哲学上就没有“扬弃”这个词了。

### (八) 技术练兵

它虽是个行政性问题，本身不是技术，但它是“生产”技术极为重要的行政措施与工作方法，即在 1944 年春夏季节，以分区医务主任、白校高级班毕业生杨舒敏同志为首，在我大庙一所进行了有系统、有目的、专题性技术训练，并配合“示范”操作，对提高我们分区技术水平，特别是手术水平起了极为重要关键性的作用，对全分区手术是一个大的推进。遗憾的是，在各团队尚无进行这样的技术练兵。

他从某一技术——如疝气的手术治疗——必需的腹

股沟局部解剖、病理、麻醉、手术适应症与禁忌症、手术术式及各术式的操作等，作了专题性讲解，然后在大庙南边配殿的小手术室里示范手术。还有兰尾、洗胃。从此，就普遍开展了外科手术，截肢术普及到各位医生。还对石膏绷带由于纱布困难，他创用棉（麻）纸代纱，一层层地夹入纱布内制造石膏绷带使用，期望节约棉纱而达到骨折固定目的，经实践是失败的，好像洋葱头一样，一层层互不粘连。但这种创新科学研究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杨主任等写了报导，曾收辑入 1950 年版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建设资料汇编》一书内。

我们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后方医院七分院、绥远军区后方医院一二分院（及乌盟医院）等军队（地方）各医院进行过类似技术练兵的专题性技术讲座，部队上曾一度称为官教兵、兵教兵的练兵运动。后来，被某些“尖嘴的马列主义者”攻击我们不突出政治，只专不红甚至干脆诬蔑为“白专道路”而被削弱或抹煞，成为“文革”中一大“罪状”，其实他们才是不学无术十足空虚形式主义的势利小人，而真正的价值，群众自会心中有数公正评价。

后来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样有目的、有目标短期培养提高卫生队伍，提高技术水平，是行之有效的。由于它可间接地“生产”技术，必定会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出精明强干有出息、有作为的技术尖兵来，这样的技术尖子，经党培养与支持，给其创造有利条件，有可能成为医疗战线上的佼佼者。

以上，就是我对抗战八年着重在前方战斗生活和战伤救护方面及与技术有关问题所作的回顾和心得体会。愿对我军事医学及《晋察冀边区斗争史》稍尽微薄之力，对后人及年青的临床医生同道有所裨益。

## 第五章 大灾年中的医疗工作

我虽在上章“回顾与认识”的首节用 280 多字简述了一九四二年的心得体会，但我觉得还未能说清问题，因其不仅是纯医疗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做为社会的一员，怎样看待灾荒及怎样解决灾荒的态度与认识问题。那年，党中央、北方分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军民出色地做出了不朽的答案。所以，我专辟一章讨论大灾年中的纯医疗及更重要的党对灾荒的“根治性治疗”方法问题。充其量，我们当医生的只不过是治好几个病人，而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见《两种命运的决择》）和聂荣臻司令员等才是“治疗国家大病”的大“医生”呢，因为灾荒年的真正“特效药”是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条件。

### （一）严重问题及严重性

1942 年夏季，在山根平原还有收获，敌人抢粮，我们保卫麦收。后来，由于天旱不雨，可以说三分区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日寇的“华北大扫荡”，对我边区造成的极大的人祸，以及“蚕食”、经济封锁等，这么多军民怎生活呢？的确成了危及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大问

题、大考验。

过去听到过民国八年大灾荒，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等，但这毕竟是来自老人们口传，而1942年这一活生生的严重现实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实际问题。先温习一下聂帅在他的《回忆录》所谈的一些话是有益的。他以“艰苦的1942年”为题，说：“在日本侵略军加紧‘扫荡’、‘蚕食’和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晋察冀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经济生活方面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日本侵略军在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对山区根据地的破坏和摧残是极为严重的。……使各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村庄掠夺一空，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1942年，边区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困难。人民群众吃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部队食粮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等多种疾病在边区许多地方蔓延流行，不少部队发生了夜盲症，各种药品和生活日用品也十分短缺。

“困难是严重的，而且日甚一日。但是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在边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大家斗志昂扬，紧密地团结一致，向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中央指出，目前形势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更加剧烈的阶段，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长期的斗争，要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激烈的武装斗争到敌占区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敌人周旋，力争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群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

……我们的总方针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目前一年内，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休整兵力，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中央还号召在敌后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

以上，就是聂帅对那时问题的严重性及方针政策的看法的总轮廓。

回顾既往，的确当时的三分区只有比它过之而无不及。登上白花、神仙山巅远眺，敌人的深沟高垒已到我们鼻子底下了，边区的面积很有限，以 1942 年为例（见《曲阳党史资料》（曲阳形势图）十九期 5 页附书末）：“我们的巩固根据地一天比一天缩小，……到今天统计起来，全县共有据点 13 个，堡垒 51 个，全县 312 个行政村中，而敌人所谓“爱护村”却有 249 个，而且全是大村。全县 224496 人中，直接经常受敌蹂躏的就有 149709 人，全县汽车路共长 734 里，封锁沟共长 233 里，堡垒如林，沟路如网，假设一个久离家乡的曲阳人，再回到这里，一定会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一样。”

雁北五分区主动收缩了，至1945年才重新扩大解放区，由于斗争的残酷和困难的慢性，人们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有所分化，当然。多数人毫无疑问跟着党克服了困难，乐观、自豪地渡了过来，但也有极少数的不坚定分子如游击军三连×副连长、42团司务长李振英吃不了这种苦，看不到光明而投敌叛变。也有我们在精简中处理不当的如赵成富，被精简后当了汉奸，为虎作伥，领着敌人搜山杀人为非作歹以示报复。这些革命队伍的渣滓，后来的结果如何，我未听到，但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必会受到人民的严惩无疑。

后来，党中央总结了包括我晋察冀在内的各根据地的经验，逐步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组织起来，增产，节约，发展为各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坚持了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那时，一批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等歌曲及《兄妹开荒》秧歌剧等，深受人们热爱，至今仍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这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不必赘述。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

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毛主席体谅了我们的困难，我认为我晋察冀三分区也已圆满地完成了这样的要求指标。

1942年大旱灾所以问题严重，聂帅、党中央、毛主席都勾划了轮廓和细节。我本人体会到：

1、人最重要的生活条件之一莫过于食，当然空气、水等都很重要。人要存活就得吃饭，颗粒无收，年景全无，粮太少或干脆无粮，就吃不饱或吃不上饭，人们会在头脑里立即反映出来，久之就会威胁人的健康和生命，故食比衣、住、行等要重要得多。无粮必惶、必乱，历来如此。但在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全体军民表现了最为憨厚、坚韧的英雄人民性格，他们最听党的话，有条不紊地解决了灾荒，打破了无粮必乱的旧律。

所以如此，是党、毛泽东主席、我边区的聂荣臻司令员用政治家的韬略，精心安排领导人民与日寇和灾荒双重斗争，没有由于无粮饿死一人，这与敌占区、国民党区域形成鲜明的对比。《聂录》（542页）记载有“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的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踩伤30多人，酿成残剧。再以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为例，这一年大旱，饿死了三百万人。而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同舟共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者对比，对照鲜明，这正说明，我们党所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陈云同志向来极其重视六亿农民及全国人民的吃饭

问题、粮食生产问题，是极具有远见的政治家。

事实上，任何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排除永远不遇灾，就是人不失误治理再好，亦难完全不遇到干旱、洪涝、地震及难以预料的飓风、泥石流、陨石雨……这些闻所未闻过的灾害。所以，着力点要放在万一遇灾怎么办上面，才能永胜不败、永盛不衰的。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还是提倡高消费，这一省一费不知要相差多少。

2、大灾后必有大疫。由于粮食不足，热量不够，营养低下，影响人们的健康是必然的，甚至多病丛生，使边区军民失去生产力、战斗力，在部队即增加了非战斗减员，如曾疟疾猖獗的二团。军队不能打仗还了得，是非同小可的大问题。在解决疾病非战斗减员上，医务工作者自然要起到应有的作用，是我们份内的工作任务。

3、由于田地里未长粮、棉、油等作物，使布、日用品、柴等也同时发生大困难，我们部队按照上级的指示励行节约。节约粮食救济灾民，其它日用品低到与群众无异的地步，用的笔是铅笔开处方，处方笺用的是糊窗户的麻纸（我们叫棉纸）；换药以麻纸代替部分或大部纱布，即只在创面上用一二层纱布，上敷麻纸既节约又吸水，经消毒与伤口愈合无碍；棉衣不发新的，拆洗缝补后再穿用；旧鞋底也要上交，割去鞋帮作夹纸，利用旧底作成三带一跟的“草鞋”夏季穿用；没有肥皂和碱，用滤灰水的方法洗涤；没有毛巾，发一块粗布代

替；没有棉絮发黑羊毛 1—2 斤絮被，又冷、又沉重、还有味、滚疙瘩，当然不如棉花好，但同样达到了御寒目的；多数同志无铺的，如能铺上一块粗布褥单，就很简单了，所以，毛柴干草是同志们最好的御寒用品，犹如现在的弹簧床；津贴费每人每月边币一元（连级三元）……。神仙山上寺村的老乡更为可怜，连火柴也无，老乡使用锅烟、火石取火的原始方法。

当地群众想了许多渡荒方法，几乎将能吃的东西都吃到了，如：榆树皮，碾成面与谷子、玉米一起碾面，搅疙瘩、纳糕、恰烙是上等好饭，榆钱榆叶作菜饼搅疙瘩很好吃。各种树叶，以杨、柳、臭椿、槐叶为大量而调菜或作干粮的附加品。谷糠当时已经上市，而且邓家店集上有卖糠疙瘩的，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商品。还有，红薯全身都可食用，香春调味佳品，人人皆知，但作为主食则不如臭椿顶事，还有大麻子叶、秋叶、豆叶都曾有人食用。（这就是聂司令员掉了眼泪的捋树叶）其余还有各种野菜、雨后地皮菜、蘑菇及小溪中小鱼虾都曾有人食用，但只是量小，不解决大问题而已。

孙巨川同学“粥”连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时为了保密混淆敌特耳目，管休养所都改称连，他从三连调来我一连当连长，问同志们有何问题，饿不饿？当然同志们如实回答。他出自关心群众生活解决最迫切问题的好动机，指示司务长明天多下五斤米，但几十位同志们一喝而尽，指示再多下 10 斤，同志们又吃

得净光，他无法了。让上级得知后，不但受到严励批评，还要大家将 15 斤粮食节约出来，结果每天吃的粥更稀了，所以给好心的巨川同志起了一个“粥”连长的绰号，成为一时的笑柄。二团卫生队曾吃一次恰烙扔汤的事，曾受到政委黄文明同志的多次批评，因不仅浪费粮食，而且视为严重缺乏群众观点的错误。卫生队多次检讨，同志们也的确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

……总之，要与边区人民同甘共苦，首先节约，减轻人民的负担。

这一切无一不与大旱灾颗粒无收有关。这样大的困难，如不是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就有分崩解体当流寇的可能，但由于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官兵一致、军民团结、敌进我进、政治攻势、组织起来、大生产等，才得以克服困难，转被动为主动地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党的伟大，老区人民和八路军之伟大，这绝非只讲空话所能办到的。

饥饿与战争相比，还是战争是最残酷的考验，但能渡过灾荒而不搞特殊化，也算平时最严重的考验了。

## （二）灾荒中的医疗工作

这里，我要说到这一章的重要部分。在我三分区说来，发生的病种不是很多，但疾病的主因，都与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易感性增强有关。当然各病种都受自己特异性因素影响，如特异性感染等，所以，在条件相

同的易感人群中，则各病种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和本质的不同，对人们健康的危害也产生不同的差异。

由于党对全体军民的关怀，包括医疗队伍这一抵御疾病的主力军的关怀，使患病的人群在灾荒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尽量提高治愈率，为其康复创造条件，降低死亡率，从而保护了人民健康和生命，保护了我边区兵力、群众的实力，增强了抗日力量。下将军民的几种主要疾病及治疗措施述于后：

1、天花：我三分区虽然年年种牛痘，几乎年年儿童中有所散在的发生，它不仅影响患者健康与生命，就是存活下来，亦常遗留角膜云翳影响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留下皮肤丑痕——麻子，给患者尤其女患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生理缺陷，往往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与欢乐，男的终生鳏居，女的老夫少妻是常见现象。

时于1943年春季，在我军驻地唐县山区的齐家佐、赤岳、军城一带，造成天花军民大流行，民多于军，民重于军。我的妻子贾贵银也未能幸免，险些死亡。

因它传染力很强，空气、排泄物、接触均可传染，我们为切断传染途径，尽量在山沟农家作到另居隔离。治疗手段以对症治疗为主，即：高热、头、腰痛，给Aspyrin phenacetin内服，防出血性、紫斑性重症天花急性死亡，可皮注camphor，还给予米汤等流食、眼用2% Aqua Acid Boric 及1% Liq、Rivanol洗眼，盐水嗽口，后期防止搔抓，痘疹可涂2% Prnanel水以止痒和消毒，尽量防止搔痒造成感染，尤其对面部融合性者更

要注意，尽可能减少皮肤溃烂造成深而大的痕迹——麻子关系着患者的终生幸福，必须提高责任心，防止后遗症角膜白斑或云翼，以保护视力。还有喉头水肿呼吸困难的患者，更要注意护理。积极治疗睾丸炎，进行局部冷敷。总之，要重点保护视力、心力，少留丑痕等方面。

经过这次灾荒中天花大流行的医疗实践，我们虽然当时没有化验和动物接种的条件，但可以肯定的说“天花是终身免疫”的结论是错误的，起码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也未见专家辑入这次灾荒中实践资料，未见有人更正这一错误的结论。因它可使已患过天花的人放松警惕，产生虚幻的安全感。我所以说“终身免疫”是错误的，根据和理由是：A、诊断确切无误，是天花，都有各期特征，尤其都具有痘疹的水泡期，化脓期及顶端凹陷的痘脐特征，而且所有患者都留丑痕；B、有“麻子”的成人又重新患天花，只不过这种病人死亡率相对低，丑痕也比初患者稀而浅。看来是有免疫力，但非终身免疫，当体质低下到一定程度时，仍不能抵抗天花滤过性病毒的再次侵袭是肯定的。C、都是灾荒中体质低下的人群，即均与灾荒营养不足有因果关系；D、“相同”条件的人群，并非大面积流行。而多是每户一人患病。而且不只限于儿童，青壮年男女甚至老头也罹患，唯有丑痕比非灾荒时要轻，死亡率相对也低。

现在全世界均已宣布天花已被消灭，无机会供传染



科专家再进一步研究，而且我们永远不想再见到天花。但上述史实是历史的真实。

2、疟疾：是当时部队的大敌，是非战斗减员的重要所在。所幸者，多半都是间日疟或每日疟，由于没有特效药金鸡纳霜，故迁延不愈形成严重贫血、脾脏肿大的慢性疟疾，还大多不是恶性疟疾或脑型疟疾，所以，单纯的疟疾死亡率很低。后来部队下决心高价从保定等敌占区购进一些规宁，情况才有好转。由于疟疾的定时发作、先寒继热后大汗的特点，诊断并不困难。我们的主要治疗措施是：

发作前 1.5 小时开始服盐规 0.5g（即 Chinin Hydrochloric），或在发作前二小时开始服 chinin 0.3，一小时后再服 0.3。平时每日给 0.3 共三次作为维持量，或 5% 盐规溶液 5—10 毫升，静脉注射，不能漏在皮下，否则发炎皮肤坏死。一旦外漏速用持续热湿敷。

开始我们使用硫规（chinin sulfuric），色泽较黄，但其副作用大，头晕、呕吐，尤其对听神经有损害，由耳鸣至失听，记得定县一女患始终未恢复听力而退伍。连战士们也都有诊断治疗常识，战士们欢迎白面的（盐规）而不喜欢黄面的（硫规），都学会用薄纸或馒头皮作成胶囊性的外皮，以减少口服过苦的不适，这个服药法，是群众的创造。

对脾大的慢性疟，则采取先注射副肾素（Adrenalin）1 支（0.0001g），意欲将疟原虫驱至血液内便于 Chinin 扑杀。

贫血严重者，口服亚砷酸铁丸 *Pil Ferri Arsenicum* 1丸，每日三次。但它有影响食欲的副作用，每丸含亚砷酸 0.001g，还原铁 0.02g。

1940年及其以前还无 chinin，所以，即便想方设法地治疗仍不能控制发作，那些方法是：针刺“大锥”（第1—2胸椎棘突间）、伯华药厂出品的扑疟母星，只是一股浓郁的大蒜味，患者忍耐地服下，多半仍不能控制发作，所以当有了金鸡纳霜（chinin）这一特效药后，其他方法均自行淘汰。

1941年秋季“扫荡”结束后，主用盐规（盐酸规宁）治疗，加改善伙食，仅三四个月，疗效显著。

3、疟疾合并“痢疾”：是当时人们最害怕的疾病之一。规律是：先患疟疾，后并发（或疟疾停止发作若干时后）出现痢疾，脓血便，腹痛，里急后重，其转归往往全身（尤其是腿）浮肿、贫血成恶液质，最后衰竭而死。所以，当时人们只患疟疾还不恐惧，但一旦并发痢疾，则认为非死不可了。冀中三十八团的同志们这样牺牲的数量很多。我们的主要治疗措施：口服 chinin 的同时或不同时，加服 Tannalbin 0.5，次硝苍铋（Bismuth Subnitric）0.5，Salol 0.5 为一次量，一日三次，口服。还用 1% Liq Rivanol 保留灌肠，腹部热罨包（热砖、热瓦片、热毛巾、热砂等），每日吃 4—6 两（16 两制）面片汤，还不能完全保证有白面，因当时连小米、棒子真正的正经粮食也是极困难的。

我现在回忆及分析：有两种情况，一是真正的疟疾

合并了痢疾，一是恶性疟疾，贫血，消化吸收不良而引起的腹泻，实际是“恶液质”，而并非真的合并了痢疾。当然这在既不能输血，输白蛋白，甚至连最起码的营养条件也没有的情况下，就难怪其转归险恶死亡率高了。

4、虚脱：主要营养不足，热量不够所致，是否低血糖？很可能是。因当时无化验条件，只是臆测。我们一般不进行什么药物处理，让其头低位稍微休息一会儿，即可爬起来继续工作或战斗。

5、肺炎：1943年春，患大叶性肺炎者甚多，多半符合《欧氏内科学》上所说的“哥鲁布性肺炎”，即主要侵犯左上叶及右下叶，机制也不明。胸痛发热，锈色痰等体征症状都存在。死亡率高，所以，患者其害怕程度不亚于后来的破伤风。当时治疗方法，主要是：

Oputasin、Chinin Hcl 交替口服，另用 Camphor 水静脉注射以强心，现在看来，一开始即每日注射 2—3 次（2—3anp）以解热，解除中毒症状。以对抗心力衰竭，加胸部热湿敷。我认为，这在无磺胺、无抗生素时代，这样的疗法是合理的，虽然死亡高，但救活者仍不在少数。

另一种，所谓电击性肺炎，又称暴发性肺炎，实在可怕！有一天，我二团在中迷城驻防，头天下午我们还与×排长在一起出操，次晨出操前已经猝死了，同志们很害怕，怀疑其他急性传染病。后来，请来白校刘韶九教员给予确诊，是肺炎，只是性质更恶更凶险，他说，为何未及治疗就死亡了，是因为患者发病极为急速，发

病后高热迅速昏迷。战友们未及发现就已死亡了，他说，该病一旦发现，主要用大量强心药中的樟脑水静注，一日数次，以对抗其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但该病不多见之，所见者，似都比这位排长为轻，都未发生急死现象。

6、夜盲症：即 Vitamin A 缺乏症（见魏方中部长的《营养表》）。当时约在 1942 年末 1943 年初一段时间里，军民中都有发生者，但为数不多，没有酿成大问题，我部队多半是战士患者多，因战士同志们劳动强度相对大，老乡中中老年人多，查其原因，多是尽可能让别人、让小孩吃好吃点，自己舍不得吃，劳动强度也大，显然，这些患者中，不仅只缺 Vitamin，恐怕别的营养成分也是缺乏的。当时部队中这样的强壮药除十全大补丸外，其他都是没有的。

患者多有如下的主诉：“我某天站岗，黄昏以后一下子双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摸摸揣揣象瞎子。天一亮又如往常一样。”当时，首长们对该病很重视，尤其战斗中会误事的。我们当时的主要治疗，也不知是从那里得来的方法是：

(1) 吃肝：无论羊、狗肝，切成极薄的片，用开水浸之，立即由生变熟的模样，不放盐，连汤带水全部吃下去。食量虽小，但很不易做到，人们连粮都缺乏，上那里弄肝呢？说也巧，有的单位就搞到一点，给病号治疗。

(2) 嫩树叶：当时青草将发芽，小杨叶、杨絮及柳

叶已经长出来了，采下煮熟，冷水洗泡，冷调后吃下去。但采树叶，在灾年中，也是困难的，何况军区已有命令，不准与群众争食，所以，凡青绿色的东西，在灾荒中，都是不易得到的。

7、下肢溃疡：即“臃疮腿”，本来为数不多，一个营里十个八个病人，我所以将其一提，是那年这个病显得更加慢性、顽固、难愈合，影响战友的健康，增加了这些病号的额外负担。因为，只是臃疮腿，一般不送后方休养，仍带疮在连队当战士，如出操、野外演习，战斗惟有可不打裹腿的优待，本来已很疲劳了，无这个病的战士，都可休息了，然而臃疮腿患者，要抓紧休息时间来我卫生所换药；否则，流脓淌水，衣服被污，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战友们。记得，我曾让卫生所看护员仇树同志专人负责给他们换药，因仇树也是臃疮腿患者，我们试用过海碘仿局部使用、Rivonal局部使用，这个称为外科圣药的药，对臃疮腿毫无用处，相反，这些方法，不仅不能促进表皮新生，相反，因刺激疮面更加重溃烂，紫黑色光滑污秽的疮面，肉芽颗粒全无，流着花白相间的脓液，看来全无生机，经过耐心换药，好容易长出一层菲薄的表皮，但一经野外演习或是行军，表皮又掉下去了，真是头痛！仇树同志，常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将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出色地耐心换药，病情均有好转，后来从军区发下伯华药厂出品的“溃疡膏”，珊瑚红色，据说内有梅片、轻粉、松香等成分，是粘度比较大的软膏，用压舌板或软膏刀摊在布上，局

部粘敷，三四日换药一次，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外用治疗，多数疮面先从周围形成明显的白色上皮，疮面虽仍紫黑色，但长出颗粒逐步由外而内直至疮面完全消失而治愈。仇树同志很高兴，所有赚疮腿病号都很高兴。可惜，一直未能将处方内的真正可靠的成分获知，又多次问过伯华药厂的同志们，也未搞清到底当年溃疡膏的成分是何。这个药肯定能促进下肢局部血液循环，是一个少遇的好药，应发掘。

事实上，几十年后和平时期的现在，慢性皮肤溃疡仍是常见的病，相信，如有当年的“溃疡膏”，或许治愈率得以提高。不过后来的方法逐渐增多，如：带蒂植皮，在显微外科的今天，应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不过“溃疡膏”用法简易，无手术痛苦，能在1942年灾年营养低下情况中显露其卓效，仍不失其为少遇的好药。

除上述外，那时我自己工作的部队还曾发现回归热、重感冒、肺结核等，但都及时后送或扑灭了，无造成大祸。

### （三）大生产运动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我边区军民、我民族的美德，在1942年的大灾荒中大大发扬了这种精神。我们做医生的，再辛苦，也只不过治好一些病人，而且是在营养不良客观环境中治好的，当然这是成绩；但我们对整个边区的“大营养不良”的灾荒病，则完全无能力解

决，只有党、毛泽东、聂荣臻等政治家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们才是了不起的一代风流。

节约，固然可减轻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但只节约没有新的财富补充上来，仍然摆脱不了被动局面，我们后来在党中央提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大小不同的贡献，为渡过艰年支持抗日战争出了微薄之力，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得到锻炼，对坚定自己一生的人生观起到奠基的作用。

重温《毛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913—916页）及“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021—1024页）感到特别亲切，毛主席还以我敌后之敌后的晋察冀边区为例，说明所有根据地都可开展大生产，并且强调“能够”和“必须”。我认为道理也是简单的，节约仍是节约死钱，化一个少一个，尽力节约可以化得时间长一点；增产才是活钱，生产出的钱多一个是一个，由于是活钱是用之不竭的源泉。简单回顾我们一所在神仙山及台峪安王庙一段驻防时的生产活动：

1、首先学会了织袜子捻毛线：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已经是阴历十月了，我还赤着脚无袜子，河北虽暖一些，也是冻得够呛了，由于棉布困难，上级不发袜子，每人发一斤黑羊毛，自己解决，开始畏难，自感学不会女同志的活计，所以宁肯冻着也不动手，后在汪振宽同志强拉和示范下，我也学会了织袜子的起头、编织、增针、减针，由于兴趣灵感来了，很快学会了织袜，以后又学会了技术更为简单的捻线技术，由使用捻

线砣，到废除捻线砣同样捻出很好的线。既会织袜，将其扩粗，毛背心、毛衣也是同理，所以也很快掌握了织毛衣。这点小小的技术，至今偶尔还用，如拆织毛衣、织毛袜等。

2、**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炊事员、看护班长张文信、调剂员霍烈，我是医生，当时在路土村驻，我们四人自愿组成一个生产组，炊事员、张班长他二人上山打柴（刨树墩），我还有几十个病人的治疗任务离不开，所以，我和霍烈同志，除全部担负治疗、看门外，与他二位同志变工在家做饭当炊事员，学会了熬粥技术。打回的木柴交伙房，还给我们一定报酬。

3、**纺线：**借房东的纺车，我们男女同志都学会了使用纺车的纺线技术，开始虽然不会，但在家里也曾见过母亲、姐姐纺线织布，所以，我们很快学会了纺线合线，产品多了，还要出售，记得还曾作熏枣等产品，当时允许所谓干“运销”，实即商业，不知从那里买来了烟卷、顶针、老太太髻上戴的网子等，离我驻地二里地阜平营儿村就是集市，我组让霍烈和我去赶集出售商品，我提着包袱和霍烈到了集上，看见土昏昏的市场，就在去平阳的大道两旁，我俩同样，展开包袱，将线、烟、枣等摆得整整齐齐，等待着顾客光顾，见到熟人羞得头也抬不起，而霍烈大姐真行，她大声叫卖：“烟卷！烟卷！烟卷！熏枣！……”经她好象“阿信”样的高声叫卖，的确出售得较快，而我自感满脸发热，羞愧难堪！这两三个小时窘迫尴尬无地自容的赶集，也是我永



生忘不了的一次“洋相”。人少了，赶快卷起包袱离开集市，回家路上我和老霍说：“我可干不了这个，我不是这个料，下次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来了，我情愿在家给大家熬粥做饭，保管满意。”老霍也看我的确不行，隔日赶集换别人了。后来我想，我那能和人家霍大姐相比?!人家是演员出身，冲锋剧社有名的“老旦”，她多扮演老太太角色，在大庭广众面前经受过锻炼，我哪里能行呢!

不过，很快上级命令终止了“运销”。但后来政府允许老乡种鸦片二年，去敌区换取我们必需的物资对敌经济斗争，取得好成果。

4、单位喂猪，卖给伙房，伤病员吃肉，我们工作人员赚吃杂碎。我们个人都曾自己喂鸡成功。还有的单位，自己种地、种菜解决相当大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很多，不一一赘述了。

5、干运输：1944年在整风训练班短期学习时，组织学员给供给部运输成捆的布，自唐县刘家庄，抬送到二、三十里外的苑家会，挣的脚钱，改善伙食。

以上自由组合的生产小组，开始规定二八分红，即小组得20%，80%上交所部，后为刺激同志们的生产积极性改为四六分红，大家生产情绪更高了。要求每人要平均上交50斤粮的代价。

6、还有一些不归任何生产任务的“生产”。我也学会了不少针线活，例如：我会纳鞋底，作几个带的简单“草鞋”（即凉鞋，1965年我在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学习

中，让妹妹给我做了一双米字带“草鞋”，虽然北京当时600多万人口，恐怕也是唯一的，所以，无论在电车上、大街上都有人刮目以视)，会锥鞋，会挽纽扣。拆洗被褥等都没问题。

在一位老同志的倡导下，学会了结牙刷，即利用已用过的旧牙刷把，用马尾或驴尾结成牙刷（图44）；因此，一个牙刷，可以无休止的使用到牙刷把不能用了为止。至今，我还保存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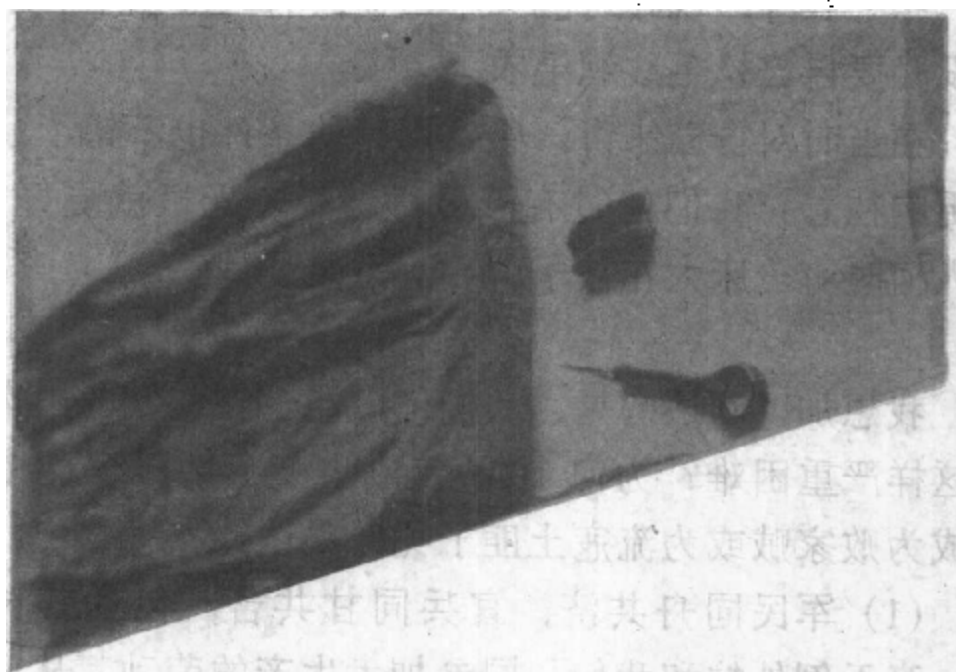


图44 自制再生牙刷（因日久折断仅剩下牙刷头了）及用过的粗布袋和1947在五台上西村贵银用过的铜锥

然而工作条件也有所改善，过去听诊器、体温计、注射器等都系公物，后来单位有积蓄了，每位医生发给以上的“三大件”（参图 42），或让自己求商人在敌区购买，单位给予报销。经过长期医疗实践“三大件”的工作方法，肯定是方便患者的好方法，所以，“三大件”实际形成了我八路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的内容之一。

“大生产”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过去认为只有女姓才能干的事，而那时所有男同志也都理直气壮地干起来不以为愧，如平时纳鞋底，在战斗、行军间隙捻毛线、织毛衣等，现在可能又不习惯，有人笑话了。不过也没必要自己捻毛线织毛衣了。

在当时对自己来讲，感到那时的条件也不错了，当然更响往着：我们何时有了显微镜、X光机就更好了。个人何时有一床大花被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加以阐述的是，我们何以能够在偏僻的山沟克服这样严重困难？为何 1937 年刚事变后的国民党中央军成为败家贼或为流寇土匪了呢？我认为：

（1）军民同舟共济，官兵同甘共苦，包括首长在内，毫无例外的和我们一同参加大生产的劳动。从后来在《两种命运的抉择》影片上得知，当时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我们一样穿的是补丁摺补丁的破裤子，聂司令员还和警卫员一起养羊，我们做为普通一兵还有何不可呢？同志们都是心甘情愿地去参加劳动。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任何时候也有丑恶、不健康的

现象。当时有贪污粮食的罪犯西迷城李德庆被我政府毫不客气的处决了。还有象无赖式的“赤贫”名叫老闷子，在神南集上冷不防抢上别人买的食品，边吐边吃，有时边挨打边吃，因此，一见污秽不堪的老闷子来了，都对商品加以保护，怕他抢去弄脏。

军民关系做到了十分的密切，听听当年三分区供给部粮秣科长庞占双同志的话，就可见一般了。他在1985年12月13日应我之问说：“那时我们规定每人每天一斤七两粮食，由于当年（四二年）遭大旱灾，所以要扣除每人五两粮食救济灾民，另二两救济部队驻地的军烈属，所以，虽然每天吃一斤，因无菜仍很饿。”当年供给主任庞忆昔同志回忆说：“粮食，也不都是好粮食，凡是粮，无论黑豆（马料）、大麦米还是什么粮都算粮食发出。”都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长身体的年青人，就可想而知了。

就这样，我们比老乡还是好得多，老乡没粮吃，只能以树叶、树皮和谷糠等来充饥。

聂帅在回忆录530页中写道：“1942年边区财政会议期间，研究部队给养供应问题时，我曾作过一次发言。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渡过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

也流了泪。会场上，一片哽咽声。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全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这个训令，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群众争食。……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紧密团结同舟共济！”这个训令仍能回忆得起，记得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三分区便下过维护群众利益的纪律规定，部队行军和野外露营，不准侵犯群众的任何利益，规定了不准私拿群众的枣、柿子、萝卜等，如有违犯，规定了轻者禁闭、重至枪毙的纪律处分。当然，更不得有任何特殊化了，这样的军民情谊，任何困难能不向我们低头吗？的确，只有我党我军与人民能够做到真正的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所以，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克服。

(2) 背着锄头打仗的队伍，恐怕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或极罕见的创举吧！首长一方面教育我们节约，尽力减轻人民负担，但同时也是极重要的，是在可能条件下生产粮食和必需日用品，结果证实完全可能。因而克服了困难，坚持战争。国民党的军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根本上不能与我们相比，它的军队后来虽多达800万，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得多，但政治上腐败无能，欺压人民，人民已看透它不堪救药的本质，《国民党一团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所以，它在“七七事变”后，惶慌

向南溃逃，还部分哗变当了土匪残害百姓，与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正如国际友人班维廉语：“……在晋察冀的群山中已造成一个奇迹……这个功绩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中民主政治的建设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试验”（见《晋察冀概况》第26页）。后来完全证实，真正的希望与光明所在，是在延安而不是重庆。

(3) 决不可忘本，列宁教导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进化决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生活、工作条件势必一天天的好起来，而且现在也早已大大超过“显微镜、X光机、大花被”的奢望了，为何还没感到特殊的好呢？这就需要从思想上检讨有无忘本？忘了神仙山的乡亲否？有无人有福中不知福呢？现在条件这样好，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回到白花山、神仙山上艰苦的工作条件去，那就是反对进化。我们不但不能反对，相反更要学习、引进，创造先进，使我们更加幸福；但决不可忘记过去：1942年灾荒年，“大生产”时的艰苦奋斗精神。如果忘乎所以，就可能是被随开放进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潜移默化，久之，即可变质。因享乐是无休止的，忘记多数人民的享受是低级颓废渺小的，是不许可的，迟早会被愤怒的人民所唾弃，五十年代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还不就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吗？！

(4) 我从1942年灾荒年中学到了党中央、党的领

袖们英明的政策和高贵的品德，得到教育和锻炼，虽苦犹乐，虽苦感到高尚、自豪、乐观、舒适，虽粗汤淡饭，感到无限踏实而光荣。

当然，这样大的天灾最好永远不再遇到才好，但天灾是不随人意的，我们愿从过去的灾荒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相信会对后人裨益的。

## 第六章 抗日战争胜利

### 我的简要结束语

(一) 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终于打败了日本强盗这条疯狗，将东条英机等战犯送入了坟墓。抗日战争不仅为我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做出了重大贡献。纵观全局参看以下数字（摘自《文摘报》1985.8.25）是有意义的：

1、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 60 多个国家参战；交战双方动员兵力 1 亿 1 千余万；军民死亡 5000 余万。

#### 2、中国战场

(1) 敌后解放区八年抗战（指 1937—1945.10）毙伤日军 520463 人，俘虏 6213 人，日军投诚 746 人，合计 527422 人。作战 125165 次，毙伤伪军 490130 人，俘 512933 人，投诚 183632 人，共 1186695 人。

（主要缴获见石家庄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展览）：各种炮 1925 门，各种机枪 11895 挺，长短枪 682831 支。

解放区人口：12550 万人。解放区面积：104 万平方公里。人民解放军 127 万人。民兵 268 万人。）

(2) 日军向国民党军投降数：1283240 人。伪军向



国民党投降数：正规伪军 683569 人，游杂部队 779116 人，合计为 1462685 人。

(3) 中国战场八路军歼灭日军数，据日本方面的数字，即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总计达 130 余万人。

(4) 我国军民伤亡及财产损失数：中国军民伤亡数，约在 2100 万以上。军队伤亡总计约 380 余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损失约 320 万人，我军伤亡 617069 人。财产损失约 600 多亿美元。……

(二) 再看看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下摘要（人民日报 1985. 7. 31，作者谢忠厚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一文的精华：“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施行最早的地区之一，毛泽东主席曾指出：晋察冀边区党堪称为‘华北党的模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堪称‘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它‘标志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决策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了榜样和促进的作用。正如聂荣臻同志所指出的，这在全中国及全人类历史都是开辟新纪元的最光荣的一页。’我根据地经常牵制着  $\frac{1}{3}$  以上的华北日军，60% 以上的华北伪军，1945 年抗击着近一半的日寇侵华总兵力。是全国坚持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

“我晋察冀边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边区八路军伤亡 11 万 6 千余人，群众被残害致死 70 余万人，被敌抓壮丁 55 万 5 千人，房屋、牲畜、农具等财产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我边区军民八年抗战；同敌人作战 3 万 2 千余次，歼灭敌伪 35 万 1 千余人，约占各抗日根据地战绩总和的  $\frac{1}{4}$  以上。共粉碎日寇千人以上十万人以下大扫荡 112 次，约占各根据地大扫荡的  $\frac{2}{3}$  以上。收复国土 20 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3000 余万，约占各根据地总面积  $\frac{1}{5}$ ，总人口  $\frac{1}{3}$ 。

“拥有党员 25 万人，野战军发展到 136000 余人，民兵发展到 90 余万人，这些革命力量为完成解放战争又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边区是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我边区在经济方面给日寇以巨大的打击。我边区树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模型。”

### （三）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简要结束语

《聂录》570 页说过：“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异常辉煌壮丽的一页。（345 页说）……是我军的一大转折，因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当时年龄很小，却遇到“我军历史的一大转折”和“挽救国家民族的重担”是

莫大的幸运和幸福。我做为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中一名普通的白衣战士而高兴；更为有幸身处“晋察冀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为边区军民救死扶伤做贡献，尽到医生微薄之力而喜悦和自豪！

经过八年抗战的革命实践，深感“弱则受欺，强则自立”这一无情的结语。我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巨人，驰名全球的文明古国堂堂中华，竟被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百般欺凌、屠杀、奸淫、掠夺、蹂躏……，实乃欺我之太软弱也！这皆是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现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政治反动、腐败无能、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政策及科技落后造成的不可饶恕的恶果。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党领导下，团结、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不甘忍受日寇的宰割，与敌兵戎相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为目的人民战争，前仆后继，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终于由弱变强，能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小日本，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应该特别珍惜它，“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可丧失警惕。如日本国（中曾根康弘内阁）参拜靖国神社；1982年及1986年文部省两次在审定历史教科书中，歪曲侵略事实，掩饰侵略真相，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时过49年之后，仍大肆叫嚣为

最大战犯东条英机等招魂，证明藤尾是典型的恶魔和强盗，我敢说如果他敢来我晋察冀露面，必被我仇恨的人民撕成碎片！他们大大突破所谓防卫费 1%，旨在加强与复活其军事实力；卫星上了天，本来无可非议，但它下一步干什么？！日法院将光华寮判给我们的政敌台湾当局，造成既成事实，他们的巧言花语是掩盖不了其罪恶目的的；数次破坏周总理纪念碑及中日友好的象征，故意制造事端；陆上自卫队采取新的“水边歼敌”战略，改编后的师拥有 5 种类型部队，进攻能力增强；暗杀和我们和好的力量；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实质对我国经济剥削很严重……。我们听其言，观其行，而更重要的是观其行，上述种种，足以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蠢蠢欲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难移，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揭露之，以防日寇再来危害世界人民。日本时至战败后 50 周年之 8 月 8 日，日自民党新任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仍拒绝日本过去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他说：“战争是某一方侵犯对方并决胜负，所以是侵略还是非侵略，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正当我国人民欢天喜地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自民党魁日阁僚外务大臣河野阳平和桥本龙太郎。大摇大摆地去参拜他们的侵华首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还能相信这些言不由衷的鬼话吗？我们愿与日本人民友好，但总有破坏中日友好的右派来破坏两国人民友好，那我们只能是以“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等待它们的是猎枪”来分别对待敌与友了。如果日

本右派还不服气，还想妄动，就有下一个“八·一五”在等待它。血气方刚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还想再体会一下吗?!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不仅使日本强盗就范伏法，昔日欺我之列强，也不敢再来藐视我们，肆无忌惮，轻举妄动，换来了以礼相待，不敢造次的优势现实。看来，软者欺，硬者怕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固有本能。我八年抗战的实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树立争强上进和科技兴国，无论国家或个人，才能免遭侵略和受辱。

抚今追昔，我们必须同情受压迫、受侵略的各弱小民族，我们卓有成效的成果，势必影响他们向我们效仿、借鉴，从各个不同角度、用各种不同方式支援弱小民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特别在我们的技术还较落后，国家还较贫穷时，更要提倡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作风，这不仅对我国，相信对所有的弱小民族摆脱压迫和贫穷，将会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及长远意义。

话收回来，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容不下解放区人民，更容不得共产党八路军，如：他不仅在1941年初春背信弃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使我损失叶挺、项英等七千名新四军将士。而且又在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后，与美帝狼狈为奸，发动了全国性内战，使我们不得不刚打完狼又打狗，结果是玩火者必自焚，我们消灭蒋军807万，终于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使我八路军及我本人有机会通过打大仗的军事实践，在战场救护及医疗水平跃进到一个新水平、新纪元。

##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中的野战医院 及后方医院

### (一) 黎明前的概况

抗战胜利了，本应战士复员，党派和谐，恢复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然而谈何容易！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阶级本性，对我共产党、八路军一直采取防共、限共，溶共和灭共的反动政策。它与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美帝为了它的利益，付出巨款和先进武器装备，并派出顾问团援助扶植武装国民党军40个师以上的军队。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致力于恢复和平，不给予我党我军应有的权益，相反地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收复所谓“失地”，保护日伪军，设置种种障碍阻挠我军受降日伪，抢摘抗日的胜利果实。

至次年——1946年1月10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参予下，国共双方宣布“停战协定”，组成三人委员会（小组），它不过是美蒋拙劣的和平幌子耳！他们在停战的招牌下，调兵遣将密令其部队抢占战略要地。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仰仗美国主子所武装起来的暂时装备优势，悍然摘去假面具撕毁停战协定，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进而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自此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在1946年中蒋介石部队仅在华北、东北地区攻占骚扰我热河承德、冀东及绥远丰镇、集宁，傅作义又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晋察冀中心大城市张家口市。平汉线的敌人也在蠢动。

自此，我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人民又陷入了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全面内战的灾难之中。公正的说是国民党蒋介石、是美蒋反动派将我国推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阶段。美蒋和日寇一样错估了形势。非但未能消灭我军，相反被我大军赶出了大陆，而我们夺取政权成功，诞生了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加速与缩短了革命进程，这是蒋帮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在黎明前，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减租、土改运动，广泛地调动了广大的贫雇农及其他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踊跃参加我军，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对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进行阶级教育，开展诉苦运动，观看〈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获得最快的政治思想工作效果，原国民党官兵迅速提高觉悟，调转枪口去英勇地消灭敌人。这是我党、我军创用的提高战斗力的方法，是敌人无论如何无法学会的战略与策略。敌人低估了我们的法宝——群众路线。



同时，我军整编，改变军事体制，成立若干野战军，以适应由分散兵力的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上来。我卫生工作，同样作了相应的体制调整，方式有：

1、扩大休养所，改为营级机构，野战医院设院长与协理员如 1947 年我曾在的冀晋第二野战医院及绥远军区后方分院（未扩大前）即是。这种机构人员不超百人，设有精干的主治医生领导下的医办公室及一看护排，打起仗来机动灵活，尤适于兵站医院工作。

2、将休养所合并为分院，设分院长与政治教导员，下有主治医生领导的医办公室设 3—4 个所，每所设所长、指导员及住所医生。实际 = 小的后方医院，所以分院主治医生实为小的医务主任，如 1948 年我在的七分院即是。执行任务时，可以整体，也可以拿出一个所去执行任务，如去集宁、大六号。

3、为了适应打攻坚战、运动战等大仗的需要，在 1948 年成立了晋察冀第一后方医院，下设 4 个分院。总院长欧阳兢，副政委任××，医务主任刘信；当时我在一后四分院（见历史照片（5））察南战役中又改为和平医院七分院，实际“和平”并不和平，是我戎医生涯中接收伤员最多，医疗任务最大，技术提高最快的一个黄金时期，是以后成为军区医院的主要实践和支柱。

4、建国后，进了归绥市、包头大城市后，绥远军区则成立了分科较全、正规治疗的分科医院及驻包的后方医院（下设三个分院，抗美援朝中接收了大批志愿军

伤病员，1952年5月1日（实际是1954年）连人带马集体转业归地方政府领导，又将一、二分院合并成绥远省康复医院。后方医院的工作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因为大批（而不像抗日时期的百八十、二三百人）伤病员集中治疗，流动性好，但那时野战军或出国志愿军中的某些伤病员存在纪律性差、要求过高的问题，则常有工休矛盾发生，除严格、正规、服务周到的医疗服务外，政治思想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以上的卫生机构变更，就是为了适应运动战、攻坚战而设置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毫无游击习气了，也有一个过程。（如新乐战役与前无大差别）。

总起来说，解放战争的医疗特点，是军事任务与医疗技术适应战争需要相并行的，如打大仗多、打硬仗多、走路更多、伤员多、医疗任务大、时间性强，任务更加艰巨而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战伤外科）进步快达到了突破四肢外科的新领域。

我本人主要参加了华北战役特别是平津战役。如平汉线上的战斗、察南战役，绥远战役、和平解放后的剿匪、接收志愿军伤病员等。所以，对解放战争（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中的医院工作有较深的体会；对我军卫生工作优良传统有更深刻认识；医疗技术有了飞速提高。是我戎医生涯的黄金时代。

## （二）新乐战役

这时正当国民党蒋介石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又玩弄阴谋，忙于召开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发表（1947）《新年祝词》中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早在二周以前的1946年12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战局在开始变动”指出：“蒋军除几个局部地区尚有战役性主动以外，就全局看来，它的主动已转为被动，与此相反，我人民解放军则由被动中脱身出来，开始转入主动”。文中还指出蒋介石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就要到来。本文作者我不知是谁，但他看的是准确的，均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我军在各地均开始主动向蒋攻击的战役，来打击和消灭敌人。

记得是1946年11月的一天，冀晋三四分区合并后的三分区卫生处驻防行唐县窰村，处长连肇基同志和我说：“现在正组织新乐战役，我正为发愁医生少，你赶快与李福才医生一起去行唐桥头组织兵站，任务不会小，明天就出发，你站的任务是，将新乐战场下来的伤员，作初步包扎后转往行唐一个什么村庄的医院（后查

证有可能是冀晋军区刚刚组织起的驻行唐西城子村的第二野战医院)”。

次日，福才同学和我遵照处长命令带少数几个人从行唐山边的窰村出发，来到比较平原的桥头镇，这是一个完全农村式的小镇，它位于行唐城北，新乐在其南方(可能叫南桥)，我们找到地方政府商定动员当地中、西医生及群众参加兵站的转运工作中的换药、护理和转运工作，妇救会负责做饭、烧水、喂水、及给重伤员喂饭等护理工作。将中西医进行了极简单的换药训练和药品敷料的准备，分成数组，我们还掌握了若干副担架。经过紧张的短时准备，一切就序了。

果然，很快开始下来一批伤员，我们跑前跑后组织医护和转运，见到有的地方医生大把抓敷料，根本不懂无菌技术操作和消毒，口罩鼻外露，有的不敢看伤口……，我们见到这般情况，很不放心，不得不与地方医生共同换药包扎固定，好在伤员不多，还能忙得过来。处理后的伤员在兵站吃饭喝水，如是白天立即向后转送，有的重伤员则要经过在这里略为休息一夜，观察伤情后次日再向后转送。

护理组的妇女同志们工作做得最好，伤员都能及时喝到水吃上饭，还要负责重伤员的喂水喂饭，比山西小脚妇女要顶用得更多，其实这些工作，不都应该是我军看护员来完成的吗？老区人民尤其妇女向来将护理伤病员做为份内的支前工作。从不推辞，难能可贵。

经过数天紧张工作，大约接收转运伤病员 200 —

300 人左右，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兵站任务，撤回窦村卫生处。这次兵站规模很小，比‘百团大战’时要小得多，但其基本优点是：完全依靠、发动当地群众完成兵站转运，而且和人民战争全过程中一样，男的抬担架、妇女喂水喂饭是做得很好的，边区人民对革命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此。但其缺点是医疗质量不高，尤其地方中医根本没有消毒观念，从来没有换药包扎之实践，虽经过最短期训练，但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及时发现后立即纠正，仍以我们为主换药包扎，敢说整个换药过程中不存在不符合无菌观念方面的问题。总的看来，此次医疗质量不如过去，所以，我认为一般情况还是最好不用这种地方医疗组的形式为宜。但毕竟是一次不同于过去（包括抗战期间的“山洞”），而是在最为艰难办院条件下，以兵站形式完成医疗转运任务的。

这次任务，据《解放军大事记》1947 年 10 月称：“在张家口保卫战期间，我野战军另一部在平汉路保定南北地区发动破击战，歼敌 8 千余人，控制铁路 120 余公里，策应了主力于怀来地区作战”。177 页又记载有：（1947 年 1 月）“21 日晋察冀军区发起保（定）南战役。为截断国民党军保定与石家庄的联系，打开冀中、晋冀两共通道，……以第四纵队及独立一旅、第三和第九军分区部队进行保南战役。战役至 28 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 9600 余人，解放望都、定县、新乐三座县城，使冀中、晋察两区联成一片。”

我在冀晋第二野战医院的亲密战友史正明同志曾记

忆：“……从建院后第一次接收任务，是在行唐西城子村，伤员来自平汉线长寿，大概有二、三百伤病员，有不少是重伤员，发生了几个破伤风，”他的记忆是和我们进行的新乐战役桥头兵站是相吻合的。

### （三）对革命卓有贡献的冀晋军区第二野战医院

该院是晋察冀军区为 1947 年初平汉战役而成立的，位于阜平西庄。当时是由军区和平医院分出来的，并有白求恩卫生学校师生参加战役，战役结束师生撤回学校，而将该院（及第一野战医院）继续保留下来。它是一所小型不足百人的机动+后方（基地）医院性质的医疗机构。第一任院长董溪亭、指导员孙秉忠、医生朱绍君、吕恒彬、护士长曹玉春及三个看护班，还有外科（换药）室、手术室、药房以及有炊事班、通信班机构等。医疗设备极差，两匹骡子驮着全部药品器械，当时最好的药品要算磺胺，内服、外用都是它。

一月份医院到了河北省平山县木攀村做好战斗准备，二月由此移防行唐县西城子村接收医疗任务，伤病员是从平汉线新乐长寿下来的，共二、三百人。治疗几个月后，除转走的伤病员，剩下的奉命转移至山西省五台县、达孟县西吉村。我和贵银是 1947 年五月份由冀晋军区卫生部分配来该院工作的。我俩在去卫生部驻地田子口，路经王快镇时留下了我们结合后最早的合影留念（片 3），次日到达田子口。它是阜平腹地山村，土

地贫瘠，老乡生活困苦，室内室外一眼可看到老乡的所有财产，最值钱的莫过于红枣了。它和神仙山上的小村差不多同样的贫苦，俗话说：“阜平不富，平山不平”，可谓十分贴切。而且该村蝎子特多，夏天炎热，夜不能寐，不得不上房顶睡眠，为了降温用麦秸扎“蒲”扇的情况仍记忆犹新。

我俩持介绍信奉命去二院工作，一路分头吃派饭，住房顶或冬暖夏凉的窑洞，基本上还是 1945 年秋反攻西进的旧途故道，曾经城南庄，灵寿（磁峪）……登十八盘，行至山顶，我二人渴极，向深壑挑水上山的小孩化 5 角钱买碗冷水喝的事，也记忆犹新。我俩行走四、五天到达目的地孟县西吉村。董院长和陈世德教导员接洽我们，并分配我去医办公室，贵银去洗衣班与周耀荣、刘青秀、周云秀等一起工作。当时的主治医生是吕恒彬、医生有朱绍君和我，智村战斗后，又调来高其贤、杨振芳、陈志忠等医生。看护排是我们做医生的亲密伙伴，除好说好笑的曹玉春护士长外，几位班长和老护士也与我们结有终生难忘的战斗友谊，有：史正明、史吉科、李来全、钱水子、秘景和、马贵乐、刘俊峰、刘振槐、刘熬儿、刘维普（玉杰）、弓全水、张富贵、武润谦、韩丰年及个子最小的梁昌福、张文英等，司药调剂：李进生、谷玉峰、赵毓敏、曹永秀；司务长采买周福祥、赵大忠、田振刚、马振芳、李明达、管理员赵三楼、炊事班长韩西营；文书任德俊、金文瑞……许许多多老同志，一时难以尽书。但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记

忆特牢而亲切。

我俩对西吉（上西、澧阳）印象较深，因孟县有那时的故物，‘一见钟情’如：火镜、铜锥都是那时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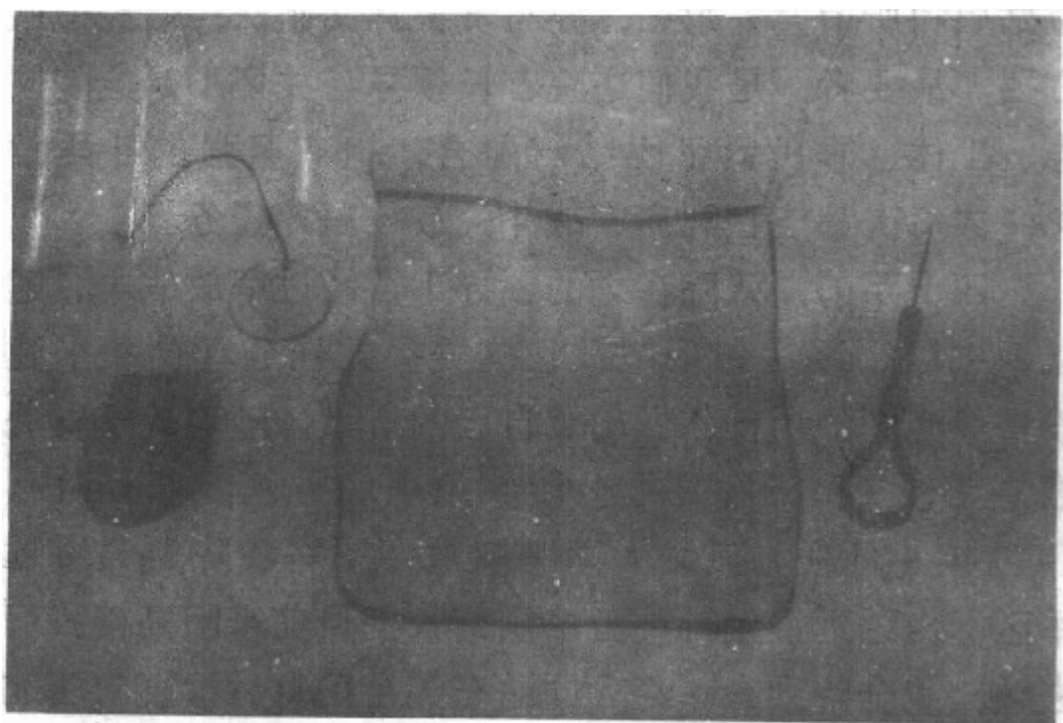


图 45 慰问袋、铜锥火镜等 1947 年时的故物

还有一个“清香美味”的慰问袋（图 45）。西吉位于城东 5 里的贫苦农村，1945 年反攻虽曾来过孟县，但毕竟是一走而过，了解浮浅，这次由于在这里接收二分区及我三分区二团的任务，住了一段时间，有了较前略深的了解。

几乎家家户户院内设有酿醋缸，进门即可嗅到扑鼻的醋香，至今山西陈醋蜚声中外；家家户户吃糠，谷子舍不得脱皮而碾成谷面，熬成稠糊粥，人们常用很大的碗盛粥就酸（或咸）菜，有边吹、边喝地吃热习惯，



后经流行病学调查，这一地区食管癌发病率高，诱因就有粗、快、热。水井很深，用水较河北困难；对人热情，尤其女同志们最易与村里的妇女搞好团结，如有一位姑娘和所谓傻子媳妇，要与贵银拜义姐妹，后经说服方罢。最要者，是我们在院首长领导与关怀下，全院同志、工休、军民紧密团结与配合，抱有坚强的斗争信念，故每次都能胜利完成战斗、战役医疗任务。

四十年前，该院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绥远和平解放、抗美援朝任务（及和平建设）等光辉的历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战争发展数易其名（和平医院七分院、第一后方医院四分院），1949年6月雁北孤城大同刚解放，就将我院调归绥远军区，由绥远卫生部林玉书副部长携员前来阳高接我们去绥，我全院乘火车经大同站东天桥稍息后，直向西北方行驰，在苏集站下车，来到我院最后一个农村老平地泉村驻防，改名为绥远军区后方分院。1950年5月进城归绥市小校场改为军区分科医院，又曾按统一番号改为265医院。1957年与外来的253医院合并，最后发展成为内蒙古军区医、教、研医疗核心的第253医院，至今仍屹立在麻花板，然而无论医疗技术干部、骨干、管理规范、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却都离不开我第二野战医院之宗。

单以1947年至合并前一段的经历言，它非梦幻和传奇，而是党中央高超的人民战争的领导艺术的成果之一，一步一个脚印地由山沟进入城市，由黎明前的黑暗

到新中国建立。而不可一世的大敌闫锡山、傅作义“树倒狐猕散”了。我们这个由不足百人素质很低的小医院至进入现代医学行列的医疗中心，无一不渗透着我院全体战友的辛勤劳动，无疑，它对革命是有着卓著功勋的。这一段的经历，如：打智村消灭武装特务‘飞鹰队’；土改平分土地，完成晋北战役；下五台山，过‘三查’关；军事整编打察南；平张战役；克绥东收大同，开展立功运动；绥远方式进归绥；去后草地解押汉奸；经历‘统战’、镇反、三反、傅军成立二十三兵团东调后的剿匪；抗美援朝服务……等，全院战友在晋、察、冀、绥频频留下了我们艰辛而有力的足迹。

我院前后出现、产生、输送若干技术骨干于各地，如有：朱绍君、王增寿、武权、武少猷、王翰宇、夏哲民、王铁彪、张宝恒、董武臣、薛光、赵瑄夫妇、池云升、周贵卿等同志，他们无论在本院或别处都是学科技术骨干、中坚人才，对我院医疗水平的提高上特别在战伤水平的提高上卓有贡献。主要是：

由战伤治疗的陈规戒律，至实行“新创伤疗法”打破愚昧之门；

由被动的手术数量增加，至手术技术技巧、水平、疗效之发展；

将未“脱胎”游击战时医疗水平与管理，循序渐进至能正规的管理病房与医院；

由少量的评残及处理少量伤愈伤员，到成批统一评定残废等级，大批处理伤愈伤员至不同岗位——重返前

线、退伍复员、送荣校；

由很低的医学素质及水平，循序渐进至能大面积推广、总结先进医学经验，开展有步骤、有计划的科研，为我军留下珍贵资料，而且论文一投即准，刊于《绥远卫生》；

最要者，是由以截肢为代表的“四肢外科”水平，竟在进城前的最后一个农村（老平地泉）期间，成功地达到以肠切除、肠吻合为代表的“腹部外科”新纪元，为我军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另即是，由一般的服从命令，艰苦奋斗，通过医疗实践，发展成熟与完善我军的卫生工作优良传统。……

这些，将在后面有关项下阐述之。然而它却构成了我人生最有价值戎医生涯的重要部分，而且左右着我的全部生平。

我本人也同步经历了成功的喜悦和清白之冤的痛苦坎坷。成功喜悦，是我自一个一般我军培养的医生，在党和首长的关怀下，逐渐成长为能较熟练的掌握战伤（骨、创伤）、普通外科、泌尿外科（及后来心脏外科）等多科的专科医生，（1981年12月10日国家授衔于我心外科副主任医师，1989.4.9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专科带头人、盟医院院长、省医院副院长、河北省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坎坷的是：按理推断我自13岁参加革命，本应受到上级的重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喜的1949年，战友们喜笑颜开之际，我则受到个别人的妒嫉和以权势迫害。

回顾可欣喜的是，我一直热爱医学事业，热爱医生这一光荣而平凡的职业，即在身处逆境亦毫未受风吹雨打摧残的影响，而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地一直为党和人民的健康事业贡献终身。由于工休同志的赞赏评选，先后多次立功，并在逆境中被评选出席了绥远军区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见片10），是引以自豪，略获安慰的。我做为卓有功勋第二野战医院的一员，自感个别人有负于我，我则无愧于医院和任何人的！

#### （四）转战晋北的戎医生涯

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再次组成，下辖二、三、四纵队。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作《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提出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十月十日，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上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战前准备：我第二野战医院前前后后以接收智村伤员为中心，在山西五台渡过了1947年的半年时光。雨季，我院正驻防在盂县西吉村，接到转移的命令，全院带着伤病员行军两三天往水土严重流失的沟壑地带五台沟南村转移，原来这次转移，是为打智村敌人作布署的运动与准备。全院队伍，曾路经五台山麓山边一个设有“五峰咽喉”的寺庙，它傍大路依山势步步登高修建，非常雄伟，可惜寺名不详，好像还未向香客开放，各殿内雕塑异常新

鲜，毫无烟火污迹，殿堂一层比一层高，最高处是佛塔。我院在此休息，老刘（清秀）、贵银等后勤人员从庙前东去，我们几位医生和通信员刘学文，却上山匆匆浏览一遍：各殿空无一人，每殿正中都是大佛，两旁都有十八罗汉之类的陪衬雕塑。好似已到尽头疑无路了；然而佛光普照的大佛背面就是后门，出后门，登高又是一个院落、一个新的天地，院正中又是大殿、大佛、虽层层如此，但都各有千秋，内容完全迥异。记得这个崭新寺院内一大特殊之点，是接近塔前的一所院落里是专管生死的城隍庙，两厢的配殿，左为天堂，右为地狱，与已往所见各寺庙所最不同的是无论天堂或地狱，皆非壁画，而是崭新的泥塑，左侧殿内塑有不同层次的金桥银桥，由小鬼擎着引魂幡通过望乡台步入最美好的金壁辉煌的极乐世界；右侧殿中有闫罗，两侧有呲牙咧嘴、手持铁镣狼牙棒的执勤小鬼，和手持生死簿的判官，还有：血淋淋的大锯活人，下油锅，磨孔倒装人头进去的大磨活人等各种酷刑的地狱罪犯。我们人少，加之空寂无人环境，还真有点毛骨悚然。我们速速上塔草草观赏就匆匆沿原路回到大路上。

通过“五峰咽喉”的牌坊，当天在五台东侧有河的小村宿营，又辗转来到上西村。

这座寺庙在五台山的佛教艺术中堪称是最近代化的代表作了，也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古代雕塑之一部份，但不知后来在“土改”时破坏了没有，如果毁掉实是可惜！

雨季，轻汛季节，我们全院奉命移防到五台东冶镇东部小村五级地，我们全体医生住在一个逃亡太原的地主家的长排正房里，这个地主投奔其主子闫锡山去了，可见是本性所决定的。东冶镇及其周围驻满了我晋察冀部队及首脑机关，听说军政学校王之平政委也住附近，老战友邵泉水、李福才等同志曾来院看过我，我们自然不知战斗部署，但视情都在议论是打大仗的架势。

### 1、消灭顽敌的智村战斗

某日，接到打智村消灭闫匪飞鹰队的命令，命令我院前沿救护，医院做了相应部署，将部份同志及所有女同志随伤病员留在后方——移防沟南一带不动，我们大部份男同志及所有男医护，均轻装带药品器械，随大部队赴定襄蒋村执行任务，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有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刘辉荣同志随院指导，在行进中，曾路经闫锡山的出生地河边村，所见所闻都激起了对这个老牌军阀无比愤恨，他依仗山西都督权势，特为他家搞豪华特殊建筑。例如：他为回家方便，从同蒲路修条小铁路至河边；为用电，特修小电厂一座，修了一个很大的家庙闫氏宗祠，从大门向里注视双排红柱赛如小金銮，这个家庙内曾容住我们一个休养所的伤病员。最突出的是他家修了两个庞大的庄园，名为东西花园，实际河边村主要被他家占据，而真正的村民只有平房小屋占据西村的一点点，与闫匪的中西结合、古今结合的殿宇式的高级建

筑相比，实乃天渊之别了，可见这位土皇上以权谋私到何等程度了！

我们几位医生特去东花园浏览，古式建筑群中前后相通、别致幽雅，建筑群中已有设在后墙外的土暖气通道，后面生火前面既暖又净，房顶已抹好排列整齐的电灯圆形灯座，四围八楞重叠构边，虽然有炕然而炕厢油彩故事花卉壁画，十分讲究，前前后后几经回月门，与做为主体工程的会客厅、办公室、卧室、警卫佣人住所等融为一体。如此豪华的建筑，由于闫匪弃家逃亡，太原五台都已解放，所有建筑已全荒芜破坏，我还捡到一本《工农合一、劳武结合》的闫匪著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然而事实却是官民如此悬殊，油水不能相溶，泾渭分明！同志们浏览一番之后，边开玩笑边走出东花园院门，继续向定襄蒋村方向行进。

智村何许地也？为何非拿下智村不可？原来：智村是闫匪武装特务“飞鹰队”的巢穴，位于北同蒲路忻北东面的定襄县境内，它距定襄 18 华里（距蒋村约 38 里），定襄城属其东北方，北同蒲路忻北方向河边小丫杈上的一个据点，由于这个钉子的存在，给我晋北广大腹地留下隐患，又对我切断同蒲及消灭忻县重地造成困难。智村为何难攻克？我们为什么必须将其拔掉？原因是：

这个反革命武装小集团是由与我党我军有刻骨阶级仇恨的地富还乡团所组成，对我新区危害极大，常常出巢骚扰周围百姓，肆无忌惮地抓捕杀害我干部、军烈属

和群众，并时有无聊地随意瞄准当地农民高耸的烟囱，将其击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帮坏人自知被我捕获也难获饶，所以拼命顽抗，死不投降。

当时晋北同蒲路东广大土地已被我军解放，留下它会与同蒲路各大敌据点相互呼应，对我造成钳制，故必须拔除之；

智村驻敌人数虽然仅 300 多人，但其工事坚固，多系地堡、暗堡，敌人处于坚守和进攻均较我有利的位臵，因地堡接敌不易，所以我军伤员多是头部或小腿伤，伤亡较大。

最重要的是据点守敌政治基础都是闫匪的亡命徒，是闫匪最得力的死硬骨干，军事装备也优于我军，他们每人配有步、短枪各一枝。

所以，敌人为了他的利益必须坚守，而我们决心必须将此顽敌消灭，才有利于战争形势的演变。

我们来到前线医院定襄蒋村后，不断遭到闫匪空中的骚扰。蒋村似四周空旷，来到目的地后，立即展开接诊室、手术室等准备工作，正在忙碌中，自西南方飞来的闫匪一架红头小战斗机，好像在数里之外还有机关炮扫射声。按着一般规律则不应立即防空，随我们一起的刘辉荣副部长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他仰面观察敌机情况是在侦察我们，刘部长下令不要出屋，不要暴露目标，这个红头‘苍绳’果然未能发现我们，在蒋村上空几经盘旋后离去，我们未受任何损失。这次显示出刘辉荣这位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医生的果断精神，人们议



论说：“刘部长是大胆，轻易不表态、动作慢腾腾，但是假若他已表态，则要求雷励风行的行动；否则会吃敌人亏的。”

### 紧张地接诊和初步疗伤——

初秋的蒋村，庄稼将熟，槟果已下的季节，白天活动尚出汗，然而晚间已有寒意。好像来蒋村的次日，上级传达命令说‘智村战斗已打响，立即准备接收伤员’，很快大批担架进入蒋村，我们在两个院内开始紧张的接诊：

(1) 检查伤情（及登记）分别处理。然而多数伤员已在战场经过初步包扎，但伤票很不齐全，有的有，有的无，自然有伤票者，我们将按左上衣袋挂红布条者是出血伤员，需立即止血处理及手术结扎止血。挂白布条者为危重伤员，立即检查换药后，送入重病室治疗。但由于伤票不全，几乎对所有伤员均须像对持票伤员一样地详细处理。

(2) 一批批伤员下来，显然两个院已不够用，不能完成任务，只好让各组，分别接收及处理。医生检查伤情相应换药及决定是否手术。医生们分班上手术，护士同志们则更为忙碌，打饭打水、送药注射、接送大小便，冲洗血绷带等也十分紧张。

(3) 当时，做手术我们大多采取全麻，因麻药是哥罗仿（Chloroform）、（及乙脱 ethel），毒性很大。用一汽灯照明，有时不得已，须有二看护员端麻油灯作手

术，自然亮度较差，但由于当时同志们都是青年视力敏锐，似不误事的完成手术。日以继夜‘马不停蹄’的工作，最难熬过的时刻莫过于后半夜了，因这时已夜深人静，我们间除工作外也寡言少语了，大约凌晨三四点钟，是最疲乏困倦的时候。有时，端着灯的同志就站着睡过去了只要有屁股大的地方，就可蜷缩着打个盹儿。每当遇到这种‘良运’，简直是最大的享受，就可完全精神焕发精力充沛继续工作下去，我们连续工作数天，是有深刻体会的。这是年轻人的通病；如果工作一来，或战斗打响，立刻精神振奋起来紧张工作。

## 2、这次智村战伤特点及创新是：

(1) 以地堡暗堡为特点的攻坚战，带来特异性部位的战伤多，即：头部伤员。但我们医院所见者并不多，因许多伤员战友已牺牲在战场。小腿部伤多，然而躯干部负伤者亦不少见，枪伤炸伤皆有。

(2) 失血性，精神性休克者多、死亡率高。例如：曾记得一位股骨已变形粉碎骨折的战士，颜面苍白、头部冷汗、精神无欲、说话无力，我们刚刚用托马氏架将其股骨固定完毕后片刻，正在别室处理别人时，看护员报告说“该同志已经死亡”。甚至还有下肢伤员，视伤情似还不致于死亡，然而不久有死亡者。何因？前者死因可视为失血性休克为主；后者似主要是精神性休克死亡。数天中，太平间里未曾中断战友的尸体。（战争真

是可恨、可恶！然而，直接夺去同龄人宝贵生命的罪魁祸首，则是打内战的蒋介石及‘地头蛇’山西军阀闫锡山)。这次战斗的艰巨性本来很大，地处不利的我们，却不得不在劣势情况下，硬性地消灭顽敌，当然会相应增大我方伤亡。据说我们用 300 多人的伤亡代价，消灭了相均等的敌人，这样的鏖战，是会增大不良的精神因素的。这次战斗的伤员，在我印象中死于休克的战友是相对多的，虽然其他条件（严重挫灭伤）也与休克好发有关。

(3) 任务密集踵来，但不可能简化地完成任务，而要付出相当大的辛勤劳动，才能完成初步疗伤，尤其是老式换药非常劳累，而且伤员入院后的“常规”治疗也相对密集，增大了我们医疗战线上的困难性。但其任务数量毕竟还不大，在五台全部于转移察南战场前突击治愈出去了。

我们对日以继夜工作的疲劳、困倦毫无怨言，十分愉快的工作，自那次战斗后，院领导看到医生们较辛苦，决定让几位医生享受与伤员相同的群众劳军的慰问品，如槟果都少不了医生们一份，党和领导的体贴与关心，军区部长也和我们共同战斗，心心相印，我们即使累死也心甘，这种感情决非金钱所能换来的，也是我八路军军医院不同于任何地方医院的。

智村终被我攻克，300 多名顽敌绝大多数被我军歼灭，只有极少数被我活俘，对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之一送五台城军法处驻地审判，军民齐声欢呼。但我军伤亡

也很严重，用数量不少于敌人的好同志的鲜血和生命为昂贵代价，换来了消灭‘飞鹰队’拔掉智村钉子的胜利。我一旅黄副旅长负伤也在我院治疗。

我军消灭了这个害人不浅的地主武装。从此再不怕他们来反攻倒算，军民自然欢欣鼓舞，群众送整猪慰问我军。

(4) 战伤治疗水平、技术上大为提高并有某些创新  
接着我院偕伤员由蒋村移防，经河边（见闫氏家祠内已驻有我军休养所全体伤病员，便于集中观察与护理）到距五台城仅数里的沟南村。在这里又接收一旅大批伤员（即晋察冀野战军一旅伤员）。后又曾移防如下地方：

上西村。房东一贫一富，贫的是土改后来的一户贫农，富的是儿子逃亡太原当闫军，儿媳和贵银同龄，我们军民关系处得都很好。在该村，我的战友幸福祥同志带一通信员来看我，住二三天离去。贵银还在这里买到一把铜锥子（参图 45），至今犹存。

蒋坊村，我在这里学术上、技术水平上有所提高。

渡阳村。与孟县西吉间是在山西戎医全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沟南村。这一地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到处是土沟深壑，相距虽然举目可望，但走起来并不轻松，要数倍于所望之路程，才能返绕沟壑。在这些曾驻过村庄，都留下了连续作战、连续忙碌的深刻印象，尤在蒋坊和沟南，是伤员最多（包括野战及地方部队的），环境也比

较乱。这一大批伤员都在延期扩创继续深入治疗，除了“正常”的查房，就是大面积的开展手术治疗，手术数量猛增，主要以朱劭君医生为主的所有医生，都要参加手术，手术种类也较前有所增多，如有效的解决晚期因感染溃烂腐蚀所造成的继发出血，有了明显的进步，即已超越了直接结扎止血，而且可以结扎近心端的血管如股动脉、肱动脉等，可有效的控制末梢部位之出血，记得有一位头部出血不止的伤员，朱医生作了同侧颈总A结扎，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与条件来说，是难度很大的手术，主要难在分离与识别血管的技巧上。虽然控制了出血，但伤员产生了严重脑组织乏氧的并发症——神智模糊，常将某女护士视为其妹，又常对着众人小便。即或这样，朱医生的这个手术是高水平的，否则，伤员已不可能在人世了。

截肢技术之提高与创新——组织极端破碎的肢体，在蒋坊以前已截掉了，在蒋坊阶段，截肢者多半是重症炸伤或其他复合性战伤，如合并粉碎性骨折，常伴有脓毒症。对截肢适应症有了进一步体会，它们是：①血管，神经损伤肢体坏死；②粉碎骨折十神经、血管损伤；③严重挫伤（近代术语叫：墩布手或足炸伤）；④气性坏疽，沿筋膜下迅速坏死性改变；⑤严重软组织损伤，内有异物，严重感染中毒呈败血脓毒症者；⑥陈旧性骨髓炎长期窦道不愈。如下河镇老和截肢三次。

当时氨苯磺胺（Sn. 即 Sulfaniramide）刚刚临床应用，医界经验尚少，更谈不到抗生素了，所以，有的合

并脓毒症状险恶，只有截肢才有可能挽救生命，我们每位医生都做了不少肢体的截断（及离断）。即便截肢，术后也常有手术创伤不能一期愈合而感染化脓，当时我们都使用白色丝线缝合与结扎居多，丝线头在正常一期愈合的组织内，一生没有任何害处；但一旦感染，线头则成为影响愈合的异物，（脓汁及）分泌物成为细菌的良好培养基，故有需作二次截肢者。

为了解决万一手术创内感染线头成为异物的问题，以及在临床上发现截肢缝合并非很简单的技术，尤其股部上 1/3 截肢而且伤员又较肥胖者，有时缝合完毕的残端七长八短很不美观又影响日后按装义肢。我们使用了三四条长的粗丝线，将断面平分数份的全层缝合（即由一侧创缘的皮肤进针，通过皮下组织、肌膜、肌肉，深肌膜再由对侧由里向外穿过肌、肌膜、皮下、皮肤出来），关闭断肢前，先将骨髓内为消毒塞的碘酊棉球抛弃，检查主要血管无出血、神经切断长度适当后，先将这预先全层缝好的间断缝合拉紧，成为减张缝合，然后在各间断线间，加缝些只通过皮肤下的小而浅的间断缝线。开始是为了便于拉拢断面组织，而且断端圆隆漂亮，又便于操作的目的。后来，发现这种缝合，除是减张目的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万一手术创感染，那根线区域感染，即可将那根减张线一下拔除，创内组织绝不会留下线头异物。所以，即便局部感染，经局部拆线，打开局部经过引流换药可以较快的愈合，后来我们视具体情况加缝“U”字及“8”字缝合，更

可有针对性的消灭创腔，几乎完全可避免二次截肢，亦不需要为了清除创内线头而将所有断端缝线都打开的弊病。后来，不仅对下肢而且对任何有感染可疑的肢体残端都使用了这种“全层一次间断缝合法”，取得良好的医疗效果，彻底地解决了截肢术后创腔清除异物的问题。

---

抛在残端义肢着力点之外，以防压迫瘢痕产生疼痛不能行走。

对小腿截肢我几乎均创用后包前瓣截肢法：我深刻的体会到前辈们留下的前包后皮瓣，真是皮包骨，本来将胫骨前角削去，意想留下一个易于按装义肢的锥形残端，但往往皮瓣坏死而不达目的，或是留下的并非锥形而是齐抓抓的残端，在山沟自作的木制桶状义肢无论怎样衬垫均同样压迫疼痛。所以，我决心废弃它。而记得从一位小腿及足炸伤，组织损毁坏死的年轻伤员做起，开始应用“后包前瓣截肢”，即根据伤员日后最佳的功能切线在中（下）1/3处及其具体的局部组织坏死情况，也必须采用“后包前”为理想，不仅皮瓣后留长，而且皮瓣少剥离将腓肠肌也突破过去一律的环状切断而改用与后皮瓣形状一致的斜切。胫后N必须切除够长，以防日后义肢压迫疼痛，动脉静脉当然要扎好，胫骨断端的前角锯去成斜角，这样包裹起来的残端，很快一期愈合，残端完全锥状，不日出院。我相信他日后按装当时的木制筒状义肢定很方便，因瘢痕在前日后的压迫疼痛也定不会大于前包后者。自此，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大多应用此法解决下腿截肢问题，因为它在缩短治愈日程、残端形状、（和近期按装义肢后的功能）等多方面，都明显优于前包后的老方法。但按装义肢远期功能如何？尤其随条件改善，改按“洋”义肢后的功能如何，尚是未获第一手资料的问题。

截肢术的技术本身，并无何太深奥，难度也不大，



它之所以成为“四肢外科”的一个典型手术，的确它对战争的保证与进行，对伤员同志们生命挽救、痛苦减少都起过良好的作用，它对突击伤员的四肢战伤的治愈出院，对下一个战役准备收容条件……等多方面，功绩是肯定的，不可抵毁的。但也不可否认在适应症上有掌握偏宽问题，确有仍似能保留的肢体被截掉的事，尤其像在五台 滹阳的驻防阶段，处于新旧战役交替之中，当时我们是后方基地医院的性质，再无外转的条件和机会，须在新战役未到之前，将现有伤员“扫尾”处理。不可与和平建设时期的现在相提并论，因问题的根源是美蒋反动派造成的。不可与 50 多年后的技术水平相提并论。

除此，这一阶段手术的基本操作与技巧上、如：器械打结法、手结扎法、拱手持刀切断法、腰麻、臂丛麻醉、四头带的下颌及臀部的应用等，均得到得心应手的效果，是很高兴的。但回忆当时对引流问题、换药方法仍沿用前辈传下来的老方法，无论从理论上、人物力费浪等方面，都不敢逾越“四肢外科”一步，是当时裹足不前的症结。

现在评价“全层一次间断缝合法”其意义远超过缝合法本身，而是解决了一个污秽环境下手术创伤的感染处理问题。因战争的残酷性，武器杀伤对方时，是想尽力杀死对方，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伤员负伤时都是十分肮脏的，我们付出再大努力，完全消除感染因素几乎是不可能，该法意义就在于此。

### 3、伤员闹事与“解散”支部

我院在晋北转战中，曾驻防过五台县的沟南、蒋坊、滹阳等村，五台城距沟南很近，县城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除留有蒋、日衙门外，还有稀奇的自然景观，偌高的地势，竟有一眼大清泉形成的小湖泊。

在沟南村的收容量很大，除全部智村下来的伤员外，还有冀晋野战军一大批伤病员在院休养治疗，起码400人以上，布满沟南全村，医护任务都很重，成天忙碌异常地巡诊、换药、手术和护理，这样沉重的任务，即使工休紧密合作，仅百人左右的医院也够招架的了，此时由于某些原因，发生了我军医院从未遇到过的不愉快的事，直至红军老前辈刘辉荣副部长下令再闹就解散支部才震慑住了。

沟南村边修建有雄伟新颖的关帝庙，正殿正面除有红脸关云长之外，两边有关平和持大刀的周仓泥塑，两侧配殿在漆红的武器架上，陈列着红柄的刀、枪、剑、戟、长矛、棍棒等兵器，及虎头饰的“回避”、“肃静”等仪仗设备。却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关老爷的附属设备，却成了伤员闹事的武器库。这里有个插曲：

①我院一位炊事员正是沟南人，由于据说是他妻曾与本村青抗先主任有不正常暧昧关系，他气愤得要与情敌“算账”，不知怎样被轻伤员得知，他们主动组织起数十人，手持关帝庙的武器“一窝蜂”似地帮炊事员抱

打不平，这个“愤怒”多事的人群，有的能跑能蹶，有的拐腿拉脚边喊冲向那个人家去了，全村立即“哗然”，不知发生了什么“战斗”，满街都是看热闹的乡亲，正在忙碌巡诊的我们，也出来到街一观，把那个男人吓得许久不敢回村。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还不全知，即便就有儿女风流韵事，也应由区公所去处理，与我军伤员不相干。这显然有点“狗捉耗子多管闲事”了，而且事实有无出入尚是问题？狭隘盲目的同情“受害”者，会造成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紧张。这件事带来的恶果，即从这件事起遭致院规松弛，又为后来造成更坏的恶果成为纪律松弛的开端。

②由于打胜仗，野战军打大仗、硬仗，冲昏了个别伤员同志的头脑，居功骄傲、趾高气扬，不尊重医生护士，生活上提出脱离实际的要求，本来休养员伙食顿顿有肉、有细粮，在当时已经很好了，却还要提出当时办不到的伙食要求等，本来人民群众很敬重我们，然而由于少数人闹事，相对地降低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崇高威望，还有个别伤员去五台城胡闹，反使群众敬而远之。这样恶果使军民关系罩上了薄薄阴云。就连我军中的野战与地方部队中也出现裂痕，地方部队的伤员很反感个别同志的不良作为，例如将细粮剩饭倒掉不仅群众就连我内部同志也是看不惯的。甚至发展到毫无理智地打骂自己的战友，如因某些休养员中存在的缺点与错误，陈世德教导员曾在伙房院内召开的工休大会上批评某位休养员时，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功臣”，二话

不说，抄起劈柴七手八脚地把这位伤员打坏，甚至领导制止都不听劝说。当时红军老前辈仍在我院指导工作，将这些看在眼里，胸有成竹的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③我全院移防蒋坊村，这时已是中秋时节，庄稼已割倒在场，我们几位医生住在打谷场边的土岸挖成的土洞内，居高临下，可鸟瞰蒋坊全村，住在这个神仙般的土洞里可谓悠哉、静哉，但由于个别伤员闹事，我们巡诊，手术照常整天忙碌不停就够受了，反而有些像“大金牙”（一旅参谋）这样存心不良的人，白天晚上故意让护士叫、房东叫，本来伤病情无需处理，故意折腾医护人员，使我们昼夜不得安宁的稍息。这个“大金牙”是小腿负伤行路不便的伤员，以他为首暗中操纵，表面不露声色，造谣中伤，聚众闹事，他造谣说“医院将一位伤员扔到大沟里死亡”，引起伤员群众误会，找院长、政教提出很难听的尖刻“意见”。实际是该村边有一水土流失形成的大深沟，坑深约20m以上，我们每天手术，手术室的同志们为图省事，将截下的残肢扔到深坑去不得掩埋的事是有过的，并非扔下去了什么伤员。还有一次，同志们玩耍地将一条狗撵到沟里，狗爬不上来，所以白天夜晚吠叫，影响了军民的睡眠。当然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也确是群众纪律问题，不该将老乡的狗扔下去。

陈教导员在工休大会说明实情，做了检讨，伤员仍不信、不依，非说把伤员扔下去了，在“大金牙”的挑唆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地影响工休关系、医患

关系（平时医患间本来是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同志关系）。院长董溪亭、教导员陈世德无奈，请求正在我院休养的黄旅长出面制止，黄胸部负伤，说话困难本来瞒着他怕影响他的身体，在实不得已情况下才告黄。黄副旅长将“大金牙”叫去病房，狠狠地以手势和低微的语音训斥了他，让他答出“扔到沟里的伤员姓名？”他本是造摇煽动，那里能答出姓名来，黄指示他，要向医院道歉，向伤员承认错误；否则要撤职察办他。“大金牙”不敢造次地老实了。

刘辉荣副部长指示陈教导员开全院党员大会，陈说明情况，号召所有党员要成为平息闹事的模范。刘辉荣同志讲话，指出：“个别人的行为影响极坏，就连休养员（指地方部队的重患）也反对他们，败坏了我军的声誉。我们号召所有党员遵守院规、尊重医生护士。如果有人胆敢再闹，我将宣布解散支部，党员重新登记”。“狗头军师大金牙”也呆愣了，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胆敢提出异议，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陈教导员会后又指示所有医生，要更加强医护工作，杜绝闹事的隐患。

我军的伤病员，在自己的医院里闹事，还是我戎医生平以来看到的第一次。解散支部党员重新登记，也是我们见到的独一无二的严厉措施。听老前辈们说过，只有在党内混入阶级异己份子时，才可采取这种非常情况下的严厉措施。虽然无真的实行，但留给了我深刻印象。

闹事的伤员，实际上是这些同志缺乏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思想，是其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思想水平低的暴露，由于缺乏根本的革命人生观，故总认为自己作战有功、荣誉是生命换来的，所以，他总想出人头地，想得到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物质上的额外酬劳。但他们却无想到，这样做的结果正是适得其反，不仅个人被人看不起，而且也影响我军的荣誉。例如：打下智村，消灭这股危害人民最大最坏的还乡团武装，的确是人心大快，受人尊敬。但如自陈功绩并胡乱地要待遇，反而显得这样同志的低水平。而且老实讲，出院时闹残废等级者，绝不会得到什么“高级别”，而有功不居又极维护集体荣誉的人（如一位叫玉中秋的副连长），也决不会让人家“吃亏”。

伤员闹事，是随打大仗、打硬仗所产生的心理社会现象的副产品，抗美援朝中达到最高峰，除了给我军带来了不光彩的影响，还给医院政治思想工作及医院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但可肯定的得出结论：有功不居受人尊敬，居功闹事脱离群众，害党害己。

#### 4、土改斗争与“胜利剧团”

医院移防至距五台县豆村镇只有八里的渡阳村，这里具有全国同样的阶级分布，一切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与五台县相同。例如：

①地主、富农虽是少数，但垄断着该村大部分的土

地，多数贫雇农要为此个剥削阶级服务，养活着这少数的寄生阶级，要遭受地富残酷剥削。

②妇女大多缠足不能下地劳动，在家操持家务负责全家人的吃穿。平时天天做饭，劳务之余清整室内卫生，就连炉灶口（圆形、铸铁制成）每餐以后要用白土粉浆刷白，灶口不留任何烟渍，炕沿桌柜当然更要保持干净。虽如此，在洁净度上仍不如回民。他们能将两条单裤，轻易地在中间夹上棉絮套做成棉裤穿用，过冬后拆开又是单裤。

③燃料好，取暖多用土法炼成的焦炭，炉子盘入木架内，火炉体积虽大，但能搬移，焦炭很难点燃，一旦点着兰色火舌硬而高。

④就连死人送殡也另有特色，棺材要从红樱枪三支搭成的门通过。

⑤老夫少妻有之，与河北适相反。

为什么与“剧团”联系起来？因为我院在沈阳过了两个年，即1948年元旦和春节，当时我军非常注意人们的文娱生活，将其做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医院年青男女居多，尤其女同志好像天生适合搞文娱活动，陈世德教导员十分重视，亲自领导和参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更增加了同志们充沛情绪。元旦过得很热闹，扭秧歌、演剧，组织军民联欢很受军民工休的欢迎。全院同志各扬所长自然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业余文娱骨干队伍，经过两次化妆表演，无论演技、音乐、道具、化妆技巧等方面，都有了一点经验，因而同志们情

绪很高。元旦的节目：白天是河北秧歌，夜晚有三个小歌剧——《宝山参军》、《夫妻顶嘴》和我们自编自演的《张多立功》受到好评。

元旦刚过春节将临，中间只一个月稍多的时间，人们计划要演解放区名剧《白毛女》，角色均已排好，分头背词，正在热火朝天排练中，陈教导员从军区开会回来了，面无表情，表情冰冷，与其开会前犹如两人，其实陈教导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同志，他们所以有此感情，是由于带回重大的政治任务。他立即命令停止排练，召开军人大会动员说（大意）：“全边区都在开展土改斗争，平分土地，打倒地主阶级，那还有心思娱乐，我们要与浹阳贫雇农站在一起，立即转入土改斗争。要求所有同志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参加土改，支援贫雇农翻身，与贫雇农并肩清算地富”。

地方上边已布置下来，浹阳村已在酝酿和准备，我们的房东就是两个对立阶级，北屋是挤在一起的地主，东屋就是贫农团长张黑的一家，有他老伴和已婚女儿，女儿是大脚，这在当时的浹阳是很稀罕的，西屋的两间分别由吕恒彬和我与贵银住着，其他医生都在同院的北院一排北屋内居住。我们与张黑一家关系十分密切，尤其他女儿和贵银亲如姊妹，常以姐姐和“姐夫”相称，打打闹闹亲密无间。而这家地主已死，只剩七十多岁的地主婆，他们全家六七口人很少和我们接触说话，大概也预感到地主阶级已是日落西山了。

浹阳村很快成立了农会及贫农团，由饱受地主剥削



的张黑为团长，胸左挂着“贫农团”的红布条，很是精神抖擞。贫农团定出斗争对象，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清算斗争，我院全体积极参加贫雇农的行列，有些轻伤员也自动参加，喊口号给农友助威，打下地富威风。当然群众起来后难免发生一些“左”的问题。清算地富财产，将他们的一切生产生活物资收入库内平分。这场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遍及晋察冀及全国各解放区。五台山上山下的农民，已充分发动起来，打死了一些不法和尚和二庄主。我们房东北屋的地主婆，我们还未离开滹阳村已死掉了，无声无息地草草埋葬。

在全国各战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陈教导员冷如冰霜的面孔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又继续组织春节的文娱节目，并将我们大约二十来名文娱骨干召开会议，研究正式成立一个业余剧团，并征求团名，人们七咀八舌抒发已见，终感不尽理想。这时我提意见：“现在形势发展迅猛，报纸上已谈到比预定的革命进程要快要缩短，胜利在望，胜利是肯定无疑的，是否可叫胜利剧团？”“胜利”二字意味着我们是在黎明前曙光在望时起的名字，可资纪念。大家异口同声赞成叫“胜利剧团”。在陈教导员的领导下，他亲自组织与整顿补充剧团的宣传骨干，如薛刚副看护长，周耀荣、刘振淮、调剂员赵毓敏、医生高其贤、司药李进生、刘玉杰（维普）、文书金文瑞、和我陈教导员本人分别编戏和担任角色。

金文瑞文书和我二人编了《闹鬼》一剧，共分三四场，以配合当前开展着的土改平分斗争。（这个不像样

子的小戏，竟被一位著名作家剽窃而去成了他的素材，很是遗憾！我们看过他写的一篇散文，题目、内容、人物、情节等完全一样，只是把我们的戏剧台词缩变成散文体裁而已）。这个剧曾先后二次演出，均获好评。现将我后来忆录的该剧“复制品”《闹鬼》附文于末，供君欣赏。

后来我们又排了现成的《白毛女》，尤其刘振淮扮饰的黄世仁十分逼真广受称颂。（后来，到绥远后，又加演《血泪仇》周耀荣“主演”，受到好评，听说之所以卫生部副政委许义华能和她成为终身伴侣与这次演出有缘）。（还排了《张多立功》等小歌剧。

我们这个土造剧团，白天看病治疗作手术，晚上排戏，大年初三正式演出，手术布棚当幕布，借服装、请老乡塑鬼脸面具、借巫婆鼓等道具、胡琴提琴自己有，所以定时演出倍受当地群众欢迎。

说起小提琴，还有一段自强不息的自学、模仿制作和演奏 Violin 的艰巨工程。随着音乐知识的增长，渐渐懂得了世界上各类乐器中包括打击乐、管乐及弦乐中，以四个手指尖随意在音板上的任何部位组成音阶，故以音域最广，音色最美的小提琴为最佳，音乐界对其冠以“皇后”的美称，是其他弹拨乐 2—4 根弦的胡琴之类无可比拟的。我迷恋小提琴，但又无处买，到敌区买也买不起，所以决心要自己仿制一把。在张波医生影响下，学习了教导队翻译的《Violin 演奏法》一书，从琢磨仿制方案，划出琴型，各部琴形尺寸，开始准备最佳替代

的料：琴面以松木、琴背以梧桐木、颈肋、琴头颈、腮板均以小杨木替代，琴马琴轴、音柱、弓把等以最硬的柏木制作，弓用藤棍弦以马尾，为使琴弓能松能紧，而以倒按装的长螺丝钉用螺扣掌握松紧。琴弦以电话线内钢丝为主料：GDAE：A以原粗、E磨细、D以原粗缠细铜丝轻磨光、G弦以原粗缠绕以粗铜丝磨平即成（图46）的样子了。

我用最原始的工具，即作木梳的锯子和铲刀为主要工具，经业余二十多天，把各部件有机地用裱胶粘合在一起，漆片液涂漆，虽然土造，然而f孔音柱设制位置正确达到共鸣效果，琴头的螺旅多了两旋也并不难看。

终于将其完成至维妙维肖的境地，并奏出了宛如西洋真品的 Violin 的美妙琴声。至此大功已就（图50），即可开始自学自练，不必再借别人的爱物学习了。因为我原有胡琴的基础，所以能较快地演奏，配乐于许多节目，如《宝山参军》、《夫妻顶嘴》、《血泪仇》等。在动荡的解放战争中还不断演出，后来进城（归绥市）了，它也渐渐的“失业”，父亲来看望我时，我请父亲带回老家代为妥善保管。

直至转业以后的六、七十年代的巡回医疗中，往往为了配合工作做些宣传还由我来配乐，就是那时的演奏基础了，曾配奏过：“东方红”、“我们是卫生工作队”、



图 46 自制小提琴 Violin 1948.10.27 摄于阳高

“东北秧歌”等歌舞曲，也可称谓小提琴的演奏员了。但久而不练，几成外行了。

就这样在陈教导员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有一定水平的文娱小团体，有导演、编剧、乐队和众多的演员。曾达到平时认真地治疗伤病员，需要演出时，只要陈教导员一声令下何时演出，准能不太费力地预期演出。（如下五台山后在繁峙县境内，曾很轻易的演出一场，自此，才将鬼脸道具和巫婆鼓等扔掉，1949年初冬，到达绥远军区老平地泉时，又能迅速娴熟的演出老节目，并加排《血泪仇》，在军区驻地集宁和官村教导大队都去演出过，倍受人们的欢迎，做为从晋察冀调归绥

远军区的新单位，对勾通与军政民各方关系与感情，不能说是未起作用的。就连当时绥远军区文工团教导员也是胡琴手，称赞我们水平，说业余剧团如此水平不容易，并热情的提示《血泪仇》落幕多了一些，稍加改动可以大大减少落幕，我们虚心的听取行家的指教。但是，集宁的演出，也是我团最后的一次演出。因为平绥战役、绥远和平解放后，进入大城市归绥后，人员、任务变动较大，胜利剧团自然解体。后来，在我白衣生涯的一生中——例如下乡巡回医疗，我们也曾组织文艺形式宣传卫生政策，也是自这个基础上衍生而来。所以群众性文娱活动，在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光辉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我认为既当医生，又做党的宣传员是份内的事，也是我一生中能与医生融为一体的为数不多的一段韵事。在老区农村，业余剧团比比皆是，而且自编、自演的玩艺儿，比“洋”的“古”的还有感情，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艺术”。

而在洮阳印象更深的还是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张黑的女儿与贵银分别时难舍难分一片深情厚意，关系再好也总不能永不离别。（我院要走了，张黑同志甚至可将他隐匿儿子躲避当兵的隐私告诉我们，就可说明一般了。我们劝他将儿子赶快唤回参军，否则理短被动）。

## （五）转战晋北的思索

1、“在刘邓、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挺进中原，我

军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之时十月十日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947年），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断！假如我军固步等待、观望，期待敌人变“良善”，那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我冀晋军区第二野战医院在转战晋北的半年中有两次较大的移防——由孟县西吉——五台沟南；沟南至定襄蒋村澆阳，是战略性质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阵地攻坚战的初步体现。智村战斗占有突出、典型的位置。我院由西吉出发始，在孟县、定襄、五台县范围虽狭窄但在其内转战，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都无可奈何的老牌军阀闫锡山，所以，半年来主要是打老闫，灭闫威，分闫地，灭闫军，建立新政权的半年。同时是反封建破愚昧（如妇女缠足）、开眼界的半年。这个闫“老西”被我党、我军发动的如火如荼的土改斗争在消灭着、缩小着，最后以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而彻底消灭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的闫匪势力。土改斗争是人心之争，因为90%以上被剥削的穷苦农民（包括中农）都在我们一边，而统治者无论怎样的所谓强大但毕竟只是极少数，最终要被拥有绝大多数群众的我军消灭，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对付的法宝。

转战晋北是构成冀晋各战役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华北解放的一部分。

2、转战晋北的半年，是对我军医院卫生队伍的考验和锻炼提高，证明我（八路）军医院有应付任何战争

的巨大潜在能量。它不仅能适应过去，而且也能适应解放战争的运动战、攻坚战，胜利完成战伤救治和医疗任务。然而据我所知，这些完成艰巨医疗任务的骨干，绝大多数仍受到“唯学历论，重在文凭”的不公正的政治待遇，闭眼不看他们做出的巨大业绩，这对老同志们是不公平的。

3、我院以智村战斗的伤员为主体，又接收大批晋北战场原二分区的伤病员，展开了以前沿医院及后方医院为特点的战伤救治和医疗工作，我认为它不是在原游击战时原地踏步，而是在新形势面前不断进步甚至创新。它们是：

对同时大量而密集的接诊，连续“作战”有进一步的实践与体会；

对手术有关基本知识与操作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基本手法、止血、麻醉等；对以“四肢外科”为“标志”的截肢术的适应症、反指症、基本术式均更娴熟的掌握，通过解决手术创不愈合的矛盾，创用了“全层一次间断缝合法”、“后包前瓣法”的新方法，为彻底解决术后感染和提高疗效开拓了新的领域与手段。几十年来的实践，说明它们是正确的。当时未视为什么发明创造，故影响更广泛的开拓与理论升华。试想墨守陈规、不学先进能完成建国前的医疗任务吗？显然不能。

4、首次遇到我军内部伤员闹事，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分析如何解决、应制定何种对策？都缺乏认识，更谈不到理论升华。

5、那一段的思想活动范围有限，眼界很狭窄，不少方面墨守陈规裹足不前，也是长期以来影响我军技术长足长进的痼疾。这从后来和平建设时期很多方面不如地方医院先进可说明之。



## 第八章 察南战役——

也称察南雁北战役。实际它是平津战役的组成部分，我军的矛头是针对老牌军阀傅作义和闫锡山的，分别于1949年1月31日及4月24日随着北平、太原的解放而将它们彻底消灭。紧接着在新保安战斗后即是平张、绥张、大同、晋绥等战役，所以，察南战役是绥张战役的必要构成。毛泽东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所说的解决敌军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战争实践而实现的。

做为我冀晋军区的第二野战医院及其一个成员，我院全体同志紧跟不舍地随我晋察冀野战部队执行战伤救护任务，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是我党接近全国胜利的关键阶段，也是我医疗工作的顶盛时期之一，它表现在：一、伤员密集量大而集中，增加了我医疗工作的艰巨性；二、医疗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四肢外科”达到日臻完善的成熟、并向“腹部外科”进军的新阶段；三、我医疗战线的政治素质更加成熟，为我军珍贵的优良传统做出了贡献。因而它是我本人戎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是我院最后成为绥远军区（内蒙古军区）最高的一所医、教、研中心。

## (一) 背景：

在山西省五台县滹阳村，经过几个月的突击治疗之后，圆满地完成了智村及野战一旅下来的大批伤员。正当这时陈世德政教从军区驻地阜平开会回来，传达了军区指示，即在“土改”之后立即进行三查（查阶级出身成分、工作、斗志）运动，号召所有革命军人必须过好“土改关”，向察南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1947年）四月，晋察冀我军举行正太战役，……转入战略反攻。至5月4日，连克井陘、娘子关、阳泉、寿阳和盂县等城镇，消灭敌33军大部。全战役共歼敌3.5万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

十月，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风店战役，……我军集中六个旅，以一昼夜一百余公里的速度轻装兼程南下，于10月20日拂晓将北进之敌包围在清风店地区，激战22日，全歼该敌（第3军一个师及第16军一个团），生俘师长罗历戎。连日保北阻击战，共歼敌2.1万人，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

十一月十二日，攻克（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人，开创了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提供了攻坚战经验。

十二月前后1948年夏，我军各部遵照中央军委指

示，利用作战间隙，用诉苦、三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它是我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重要发展。毛泽东说‘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我们就在这样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进入察南战役的，接着是：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使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大大缩短，我院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胜利完成战役的医疗任务，遵照命令我院进行了组织扩编及“三查”运动，使每个人思想觉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使全军统一步调投入战役提供了思想准备，结果步步胜利。我认为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突出优点之一；而敌人傅作义的“打下集宁放假三天，烟土三两”类的物质刺激是无法与我相比拟的。

## （二）穿越五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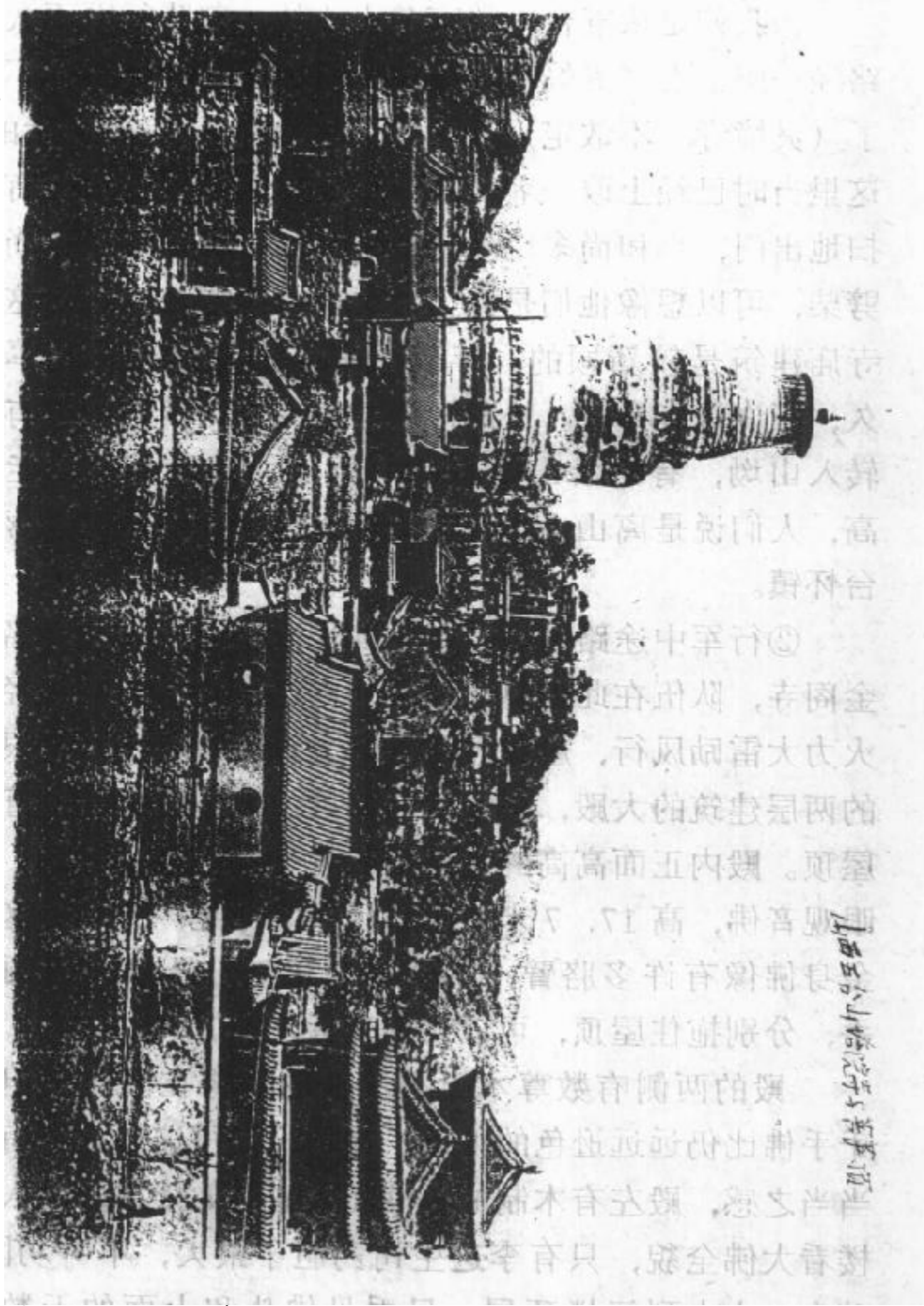
我院当时不足百人，是极为机动灵活的医疗机构，再加我们将全体伤员都已突击治愈出院（和转院），可以极为轻装地向新的战场转移。为了经过五台山后的繁峙奔灵丘，必须取捷径穿越五台山，也是我“土”八路军战士一次饱赏祖国古代文化之良机，可说是一路寺庙一路‘神’，心旷神怡地接受了一次爱国、爱人民、爱家的深刻教育。

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院整队从滹阳向五台山进发了，同志们欢天喜地，队伍在前、几个骡驮及病号在后紧跟，记得：

①我们是从五台山的南麓上山的，部队行军不久就路经一座上书“五峰咽喉”的牌坊，寺院的名字记不清了（灵境寺？不敢定），但“五峰咽喉”是确切无疑的，这里当时已经上改，老和尚和二庄主有的打死了，有的扫地出门，小和尚多已还俗，庙里只有极少数的和尚在劈柴，可以想像他们是无何罪恶的一般僧众，看来这个寺庙建筑是较新颖的，年代可能还不久。因刚行军不久，不许进寺参观。从此，步步登高，循崎岖小道有时转入山坳，有时沿山脊登高，所以，基本上是越走越高，人们说是离山上60里，整整走了一天方到宿营地台怀镇。

②行军中途路过金刚寺，人们矫正说真正的寺名叫金阁寺，队伍在此休息，同志们本已疲劳了，但年轻人火力大雷励风行，趁休息时机都去寺内参观，一幢很高的两层建筑的大殿，殿内却非两层，而是一藻井可直视屋顶。殿内正面高高的神台上站着一位高高的千手、千眼观音佛，高17.7米，两只巨大的赤足，仰面视这尊金身佛像有许多胳膊，各有各的用处，最上面的两只手，分别拖住屋顶，可以说是顶天立地。

殿的两侧有数尊本已很高大的佛像在陪衬，但与千手佛比仍远远逊色的低矮。因此，显得这个大殿有空荡荡之感，殿左有木制的长期无人攀登的楼梯，无人上楼看大佛全貌，只有李进生司药胆子最大，不听劝阻，独自一人上到三楼顶层，只看见佛头和上面的无数双手。



塔院寺及正面远景的是菩萨顶

后来得知，这是一尊唯一无被挖‘心’的佛，土改时贫农团为了找浮财，将许许多多的佛像都挖了“心”，就是从胸部凿开一洞，将“心”取出做为斗争胜利果实所得。“心”实是一面圆镜，下环边有5条炼子各系心、肝、脾、肺、肾“五脏”但“心”质不同，有金、银、铜、铸之分。一个金“心”可卖很多钱，银的也值一些，铜的则不怎值钱。这种本是破坏古迹的举动，是贫农农友在遍寻浮财时开始挖“心”和揭瓦的，有的找到大批银元和金条。我们次日在台怀镇已看到了政府的禁令，不准再破坏古代建筑，要求全体人民爱护、保护古迹。

金阁寺好像是座西朝东，大殿之后沿山势层层修建佛殿。我们层层登高，尊尊参观。有一个送子观音殿内无论泥塑或壁画，完全是像我村盛彬嫂的形象、简直是“她”的庙，经久不忘。

这尊泥塑千眼、千手佛后来在电视内见过，虽然现在看来它与乐山大佛、承德木佛相形见拙，但的确是座高大泥雕艺术品，以致高大到贫农团无法挖“心”地步，因下悬很危险，靠梯又够不着。

③台怀、杨林印象：记得好像是从台怀的东南方到达最高的台顶之后，下行来到台怀镇。在此宿营三天，正是同志们对佛教艺术一饱眼福的良机，也是我年仅22岁时有幸最早的一次游览佛教圣地的绝好机会，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台怀和杨林是当时山上的两个俗民居住的小镇，五

台山实际海拔 3058m，周围五个山峰，中间形成小盆地，我们是沿南（台顶）山峰来到小盆地的。南台西北峰金阁岭海拔 1900 米，南台顶 2474 米，北台顶最高 3061 米，中台顶 2890 米，西台顶 2773 米。（录自〈五台山游览图〉）。各个寺庙座落在绿树荫中，红墙、黄（琉璃瓦）顶的建筑群。（共 124 座寺庙。现存 56 座。）

台怀居小盆地寺庙区内，顾名思义，它位于五个台的怀抱之中。在全国地图上就有这个小镇，台怀、杨林均石铺地、房舍也是石建筑为主。居民们装束风俗与山下无显著变化，刚刚经过暴风骤雨的土改斗争，农民欢天喜地均得到平分土地的胜利果实，欲得俘财的心切；而各个不劳而获的寺院自然是一片萧条，寺院解体，统治者已被处死，众僧还俗，各寺内只留少数的和尚看庙门而已。古迹破坏很严重，挖心是普遍的，好好的佛像上胸部都留凿下的洞，有的铜像已被拉倒在地，有的瓦顶被掀，是为找金银财宝的……但神气数千年的和尚统治已被如火如荼的土改斗争所推翻，而由它原来的佃农当家做主，各寺院的威风已被农民打垮，我们的兴高彩烈，地富统治阶级的大和尚、大喇嘛及“二庄主”们的恐惧万分，形成一幅强烈对比的图像，是十分合情理的。

当时，在小镇曾见到用旧石碑改镌而成的四八烈士纪念碑，记载了 1946. 4. 8 牺牲在黑茶山的烈士们，有刚刚出狱的叶挺将军、我党驰名的能言善辩的外交家王若飞同志和博古（即秦邦贤）等同志。

也可想像得到在旧社会众僧成群的五台山和六月大庙，小镇定是极为热闹的壮观情景。

小镇周围除了极为壮观的古建风景，似乎可耕土地不太多的。有的居民就以雕塑为业，给各寺院修佛像。他们能够很轻易地用榆皮面和泥，很娴熟的技巧作出各种鬼脸面具来。

听说，现在杨林与台怀成为一个镇了，地处得天独厚的佛教圣地内，当然旅游业肯定已很兴旺了，我有心想去重游五台，进一步证实和深化印象，但行动起来已非风华正茂时。

#### ④佛教圣地游览：

1) 宿营台怀的次日，早饭后，院部通知可以参观寺庙，我们几个医生和陈教导员等一同出镇西北行，向寺庙区走去，见前面横着一个金壁辉煌红色影壁，上书工整的“佛教圣地”四个大字，加之环周许多不同风格的寺庙，松柏怪柳，随风飒飒作响，的确有点‘神气’，似感到像吴努讲学那样来到神仙之地。

2) 我们首先来到**宝塔寺（现名塔院寺）**。突出的记忆，是院内有雄威壮观的大肚酒瓶样的宝塔，塔帽周围的惊雀铃叮铛作响，塔周环有凉台，见一个身着紫袍的秃头老人边念边数手中的素珠围绕塔根不停地向前走，嘴里不知念的什么疾行不止，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这群不信神鬼的不速之客一样。后被通信员刘学文喊：你多大岁数？你念的什么？……，老“和尚”才稍停作



答，语音尖细谁也听不懂说的什么，仔细看才知老“和尚”是老尼姑而已，细端详：这位老尼大约60--70岁，颧骨较高宽，颜面虽红润，但前额眼角都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手持一串长长的檀香木珠，其中有一个像小酒瓶样的东西成直角的横置在珠内，绳索从瓶口穿出，看来很不协调，老尼捏住不动。穿着一件又肥又宽的紫色袍，后来得知，穿黄袍的是已成“气候”的大喇嘛，她虽已年高但从袍色来判断，她还不够穿黄袍的资格。这位老尼好像从来不洗手、头，除脸显红润外、头部一圈及手上满布厚厚黑皴，由于汉蒙语言不通，我们刚停问话，老尼又从捏住的佛珠开始边数边围塔而行了。这原来就是草地的喇嘛。

这个寺里僧人的宿舍很是讲究，都是卧砖到顶的大屋瓦房；通铺大炕，油漆炕厢上有花卉图案及故事等，火口在墙外，状似土暖气，室内既暖又清洁，两个大院，据说宝塔寺一边是和尚一边是尼姑住；和尚尼姑掺半，但他们眼前见到的是一片荒凉，除紫袍老尼以外未见一人，还不知这位老尼是本寺的还是菩萨顶喇嘛寺的。我们相信男女掺半可能是传说。

3) **菩萨顶**。实际是后草地蒙藏人的喇嘛庙，记得寺庙位于一个山头上，首先要上一百零八级直上直下的阶梯通道才能到达庙门。这个寺庙很是陈旧，说明它的历史更久远，来到庙内见到还有杜萨克大喇嘛传下来的掌印喇嘛××扎布张贴的黄色布告，可见这个寺的“主持”也是喇嘛。旧社会草地喇嘛为了表示虔诚，不远千

里拉着骆驼骡马一路变卖，将收入的银两全部交给庙里才算心诚，在菩萨顶出去的喇嘛（如召河乌兰图格普会寺有一喇嘛即是），是牌子最硬的响当当的最高文凭，倍受别处喇嘛青睐和尊崇。

我们一群战友去菩萨顶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看一口据说是锅巴需要牛耕的大铜锅，该庙同样是很荒凉的，想找人询问也很困难，终于找到了一位喇嘛，他领我们去距大门口不远的一个“附属建筑”内一个很陈旧很高的房子里，安置着这口大铜锅，锅台之大是惊人的，因锅台两边是石梯大约十来层，锅按在中央，记得色黑绿污秽，露在锅台上的锅沿厚约1—2cm，直径大约2m，深也约有2m±。灶门在前；锅铲是很长把的大火铲，还有大火钩，都是从未见过的。我们中有人问老僧，你们寺里有多少人？这么大锅饭能吃得了吗？老僧答：“过去每年举行六月大庙，就是农历六月初一各庙都开门，六月三十闭门，在为时长达一个月的庙会期间，所有赶庙会的外来人，都可来此用饭不拒，这是菩萨顶庙行善的一种舍施。这锅饭要数名火头僧来做，一个僧人从早挑水，半天才能挑满，不知用多少小米，才能从早烧火到中午熬熟这锅稠稠的粥，这就是舍施粥饭。庙会闭门了，也就停止舍施了。”

我们边走边议论。虽不像传说说得那样玄，但铜锅的确够大，名不虚传，不过这样笨重的炊具只有展览价值而无实用价值了。

4) 和尚坟。从一个山坡到另一寺院参观途中，经

过一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小“塔”区，开始真不知是墓地，后有人告诉方知确实是坟，因多数小塔上都有死者的法号碑文，才更悟出《金玉奴》其父的台词。这个满山遍野的小塔群，虽不像各大寺院建筑之雄伟，但另具玲珑剔透特色，塔身有高有低，有圆有方，有大肚的、也有砖塔银以石结构的……各有特色。无论它们是何样小塔，都为坐葬修筑的，那时和尚有坐葬的习俗，是从未听说过的。看来死者也只有坐或站着，卧位是绝对占不开的。可以说这也是五台山上另具玲珑小巧的艺术杰作。

这个各代高僧墓地，记得没有看见挖“心”这类的举动，建筑基本完好。

5) “无梁殿”。无梁殿一词是从南京获得，但五台山者是更高精的无梁殿（无量殿）属显通寺。

寺内有一座高大雄伟的砖构建筑，它完全是个大窑洞，主洞与分洞之间门均无一根木头。这个殿外墙檐下书写有一圈“阿弥陀佛”字样，殿内主佛是在一个高大的神台上，坐着一尊极其宽大的大肚弥勒佛。两侧的佛像均为坐像，有的已拉倒在地摔成一堆碎土，有的虽已倒栽葱似的被拉倒在地，但因是铜铸仍安然无恙。

我以为如此高大的拱式砖砌建筑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高大了，譬如怎样架起拱托物呢？但大殿就摆在眼前，可见古时匠人的聪明才智。

后来我在南京灵谷寺内又见到一座名胜无梁殿，要比五台者差得多了，因为，该殿低而窄得多；殿内也无

大佛像。

6) 铜殿。是否同一寺院已记不清，但记忆中在坚固的石座上，竖立着一座铜绿褐色的佛殿，从柱到殿顶的风摩铜顶，从殿门扇、窗棂无一不是铜铸的，已被人们多次抚摸而露出黄铜的本色。真是心悦诚服钦佩古代“匠人”冶炼造型技术之精湛。

这样的建筑，只有北京万寿山，有类同的一座，谁先谁后？不得而知，但我从铜炼之色粗推测，五台山者可能在前。

### 7) 巨大的木结构佛殿。

在风箫箫的松柏参天声中，来到该寺，和尚看到八路军扭头就跑，追喊也无追住。这个寺院显著陈旧，这座大殿完全木制而成，柱子之粗、殿顶之高、檐下木咬木的精湛艺术，真是难以想像！赞叹古人，只用木头能造出这样高大的房子，而且如此精致。

后来，在北京午门城楼见到建筑学上的展览，其中木咬木的部件也在那里展出，说明中曾有：这是五台山南禅寺（及曲阳窦王殿），至今已有13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之一。在建筑学上和我国赵州桥一样的独树一帜。可见古人的聪明度并不比当今低。而且还高于现代的木匠。

人们说这座寺内，曾有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军长，看破红尘，抛弃妻妾相伴的舒适糜烂生活，而削发为僧，有人评说他是傻瓜，然而他自己定有自己的一番高见，不知他是否已修炼成“佛”否？我们当时议论，无修成

尚可能活在人间，如已成“仙”肯定被我贫农团送他到西天了。同志们相伴而行，在这空寂无人，松叶怪柳飒飒的环境内，的确是特殊的悠静，是“四大皆空”的理想安逸的所在。

8) “转轮藏”。是从包头、正定大佛寺而获得该祠的。只是其建筑规模远远不及五台而已。

想到建筑皆很陈旧，故亦可能与上是一个寺院之内。

有一座非是供佛而是“供人”的特殊建筑，殿很高大，雕梁画柱也很豪华，中间有一个上下竖直的轴心上，成6或8角类圆柱体，从上而下有数层莲座空龕；但龕内无佛，地面下轴心成一圆轮状，地层（地下室）可供小僧向前推动，圆轮即可转动了。人们好奇地下底试推，果然上面的柱体可转吱吱作响。我们给其命名为“碾转儿”。

人们分析这可能是供修行到一定程度的僧人可以上轮得转，作为一种晋升高僧的考核手段而设的。不可能供任何尚未成“才”的僧人登上转轮的玩物吧。佛教的理论我们不知，但据建筑设备之高级、环境之庄严、目的之独特、待遇之不等（下推上得转）定与僧人道行的级别地位是有关的。凡能坐空龕得转的僧人，可想是不简单了！

从这一设备的殿也可说明和尚中有统治与被统治、享受与侍奉人的不同阶层的。当然佛教转轮藏不会是我说的这个理论。

9) 五郎庙。同志们拖着劳累不堪的两腿来到杨五郎出家的五郎庙，这是当天走得最远的一座寺庙，大概距台怀已有好几里路了。

远远望去，有座与众不同绚丽多彩的大屋顶，它不是黄琉璃瓦，好像是绿瓦镶边，中间镶嵌着一个棱形深兰瓦。这个大屋顶是五郎庙的特征，记忆印象较深。大殿好像坐西朝东或坐北朝南，中央神台塑有一座披发的黄袍和尚坐像，由于它非光头而是披发，也是与众寺不同之点。

我们玩了大半天，仍游兴未艾，虽累却心旷神怡。然而时间已是下午四点了，我们辘辘饥肠的“生物钟”催促我们回去用饭。

10) 普化寺。次日，同志们来到离大影壁最近的一所普化寺（可能是殊像寺之误）游览，记忆中这个寺院建筑很是新鲜，尚少被熏污，说明它的寺龄比菩萨顶等老寺院要年轻得多。正殿内的雕塑极为精制而内容丰富，它除了正面大佛外，周围的罗汉在殿中悬空有泥塑成的云层，将空间人为的划为数层，但都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可见匠人高超娴熟的雕塑技术。好像《封神演义》中的许多人物都在殿里得到理想的造型，如骑麒麟的文殊菩萨，三头六臂的什么神，足登风火轮的哪吒，三只眼的二郎神、两只眼窝各长出一只手，眼在手掌内出现的千里眼，房顶最高处倒悬着鹰咀金翅的雷震子……，奇形怪状，想像力之丰富，造型之精湛，并非绘画而是一坩泥塑，这些能工巧匠的确是一代精英！

11) 有人又结群到距此十里之遥的南山寺去了，可惜我们未遇到同伴而未去成，据回来的同志说，“南山寺的石牌坊真是绝技！是我们曲阳人镌雕的，工程之大是突出的，下面还刻着你们直隶省曲阳弟子的姓名”。可见我县黄山为雕刻之乡、之祖，从南山寺、窦王殿、清西陵等古代工程也可得到验证的。

我们又参观一些新的寺院，但似都不如前述之大，又复游了某些地方和市容，详细看了“四八烈士纪念碑文”……基本上结束了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的游览。

综观五台山全貌，不能不使人得到幸福美好的遐想与享受，可算为一篇不像样的当时真实感受的游记纪实吧。它：

①这在我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生平中，在战火纷飞征程中有幸路过五台山，并驻防三四天游览，一饱眼福，不能不说是意外的乐事，我虽不懂佛教的历史知识，但我们起码知道五台山到处是寺是佛，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对五台山是我国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有所粗浅的感受。

五台位于北同蒲（路）之东，对聂荣臻为首的革命前辈，为何要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对它的贡献，对我军功绩，有所初步体会。对该山横在察哈尔（平绥路）之南，特别横在繁峙之南，我们必须穿越它才能捷径奔赴察南战场成为可能。

②五台气势磅礴的古代建筑，使人达到可想而知

及的钦佩境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使人不无敬仰。我们从山脚到拔海 3058m 山顶的台怀，沿着崎岖小路步步登高整整走了一天艰难的路程。那些巨木、巨石远在 1 千多年以前，是怎样运往山巅的？使人不敢想像而迷惑不解，它确为人间奇迹！

③五台山佛教圣地当之无愧，它的确代表了我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无论在圣地的选址上、建筑艺术上、艺术造形上、对佛教文化之丰富想像力和创造力、在古人创造的雄伟气魄上……等，可以说均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可惜我们这些穷八路，谁也不称一架照像机，无法留下美好的时刻，而仅能以大脑的记忆来萦绕回味，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会有记忆消失或记忆不全，与实际有一定距离的情况，好在这对我们八路军军医来说，不是顶顶重要的。

④整体的五台山是一件大的艺术创作，实际每座寺院与整体紧密相互映衬，而又是一个相对的独立建筑群，就山势修建与客观天然景色相互衬托融为一体，红墙黄（琉璃）瓦，金壁辉煌，松柏飒飒给人以天然的“神”气，这是其共同的特点，然而各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瑰宝”，如大肚塔、大铜锅、和尚坟、铜殿、“无梁殿”，千手金阁大佛和“碾转儿”，以及只听未见的南山石坊等等，都使人久久为之瞠目砸舌，赞叹不已。

（当然我们文明古国，古代建筑极多，如目睹过的承德离宫、外八庙及耳闻荧屏见过的乐山大佛，各有各



的风采，可以相互媲美）为我中华生辉。

⑤当然也不能否认，由历史的变革瞬间，在如火如荼地推翻压在佃农头的封建僧喇统治的土改斗争中，在我贫农团农友取得胜利果实、除暴灭敌的欢笑声中，也使古代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呈荒凉景象甚至佛像倒栽，黄顶鳞伤非一处所见，至于“挖心”的雕像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在两三天中的浏览美景中，偌大的寺院空寂无人、很少见到僧尼、偶而见到撒腿就跑，他们惧怕我八路军之情，正说明我们是站在贫雇农、佃农一边的。但百姓对古代建筑的自毁也是无知的，因为它的真正价值是无法用银元和金条买到的，毁于一旦岂不太可惜了！正因此，政府发现此情，才下禁令。

但不知五台瑰宝在“文革”又遭何劫难！我相信只要林彪、“四人帮”所到之处，所谓“四旧”是不会被放过的。但愿帮气不上山才好。

（这种忧虑已成残酷的事实。据魏国祚着《五台山导游》165页载：“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和被毁的寺庙，台怀北路有七座（其中就有五郎庙……），台怀南路有六座……台怀西路有六座，（共十九座），林彪同党为了给“副统帅”修建行宫，竟不顾当地僧俗的反对，用大炮炸毁了唐代建的金刚窟。宋代杨五郎出家的太平兴国寺、以及章嘉活佛五寺之一的普乐院。“四人帮”罪恶可谓不可饶恕者也！

### (三) 战前准备

实是医院扩编和思想上过“土改”关的问题。这种战备也是十分重要的，无相应的医院机构扩大，就无法完成量大而集中的战伤治疗任务。缺“三查”则可能要犯政治错误，因为土改斗争是农民起来推翻剥削数千年封建统治的大问题，我们所到之处都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新区。

#### 1、下五台山

在台怀小驻三四天，陈世德教导员召开军人大会动员下山赴察南。大意是：我们遵照上级命令上山已休三四天，现要遵令去平绥路南的察哈尔地区执行新的任务，明天听哨音集合出发，同志们做好一切准备。据调查老乡说，明天下山的路难行，要过火焰山、滑车岭，传说是唐僧取经来过的地方，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但其路难行是真实的，同志们不可大意！…会后都为了防滑防冻人人找到木棍以作拐杖，人人将裤脚绑住，以防灌风和使行动利索一些。

我们几位医生的行李一向由骡驮，享受不背背包的优待。但我想到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珍贵之物，除一本《局解》书外，多了一把我费力不小自制的维妙维肖的

小提琴，无硬匣保护，只装在一个粗布长袋里，我怕万一损坏则前功尽弃岂不可惜，所以，从此行军除了我所背的挎包外，就是这把提琴袋，斜背在肩，再手持木棍简直像一个算命的瞎先生了。想起来不禁好笑，也因此给战友们留下对我深刻的印象，如谷方平同志，在我调来本院工作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次晨，队伍集合，在响导的带领下，自感是向北或西北方向出发了（北台海拔 3061 米，西台 2773 米），全院同志说说笑笑，人人手持木棍、坚扎裤口，在蜿蜒小路上行走，从小盆地到火焰山同样是登高到达。不久看见一片红砂山坳和山丘，这里很少树木和枯草，地质贫脊，一看即知地不会是丰产庄稼之地，老乡说：“这就是火焰山，是孙悟空错借来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子一煽，将这里烧成焦土灰尽，从那时起地就发红了”，实际不知何因所构成的质地松软的红岩石风化而成一片红色。同志们并未感到像昨天所说有何可怕之处。

继续北行，见有山水冲刷的浅沟深壑，这就是滑车岭。还无感到怎爬高就到达巅顶了，下面是一个地势陡峭的类似阶梯状的大山涧，推想，如是夏天可能还是流水哗哗的山泉和小瀑布，然而现在仍是一片冰天世界；冰锥倒悬，冰窟由上而下大小不等，我全院同志互相提醒要注意防滑、拐弯、慢下、搀扶一下等，出现感人的团结友爱之举。我们来到该岭，基本上无上只有下，正因为只有下山涧的问题，所以滑的问题是最大问题，我们从山涧东面从岭顶沟壑绕到西面来，基本上绕来绕

去，沿冰窟的山涧的左侧下来，边走边看边想，的确有点望而生畏。登高下望难免有腿软之感，我们遇到今天风和日丽的天气（无风之天）是太幸运了，也算出师有幸了，假如碰到风雪天，再加小路难行光滑，就十分危险了，向导告诉我们，下面的冰窟里有一年滑入一头驴，拽不动、拉不出，周围完全是冰，驴也无法走出来。活活冻饿死在冰窟内，几个月都无法移出来，冰融消之后，驴已腐臭了。设想假如是人被风刮倒掉入冰窟的话，相信也不会比驴的命运好多少，因为在这种冰冻险境是无法救甚或未及抢救人已冻死是可能的。同志们捏着一把汗，从带有山涧的悬崖陡岭，慢慢走下几十丈高的滑车岭来才松一口气。同志们的话匣子这时才打开，边走边说“不怨地昨天陈教导员还批评了陈志忠同志，说他起了扰乱军心的作用，下岭后要他检讨”。事情出在昨天军人大会之后，好开玩笑的陈医生，毫不顾忌地像平常一样和女调剂员曹永秀笑嘻嘻说：“明天先冻死（刘）双贵（男护士，正重病中，坐着担架来到台怀），然后再冻死你！”一句话将正在发烧的曹同志吓哭了，看来这个地方的确有相当的危险性。

实际上火焰山、滑车岭都是属于五台山北麓的固有风景，应该说是和五台佛教圣地相辅相成的部份。是五台山胜景不应分开的全貌。

当天已进入我原五分区的繁峙县境内，见到驻地老乡生活十分贫穷，比阜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衣服褴褛，刚过春节一家家多无粮吃了，家家户户多半用北

瓜、干豆角之类充饥，我们在宿营地吃了一顿基本无米的山药蛋（土豆）饭。同志们用穷山恶水来形容该地区是一点也不过份，这也是日寇对我原根据地人民的罪恶，敌人从我们手里蚕食掠夺，才使人民缺吃少穿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后来虽然又被我攻克解放，但终究元气大伤非短日内能复原的，况且这块地方自然条件的确贫脊。

记得连续行军数天，曾经经过一个叫大营村的大村庄，这里条件要比五台山根好多了，还有日寇留下的断断续续的汽车路，行军也较省力了，数天后来到了涞源县离灵邱很近的落水河村。

## 2、过土改关与军事整编

在该村，用了两三周时间进行“三查”，由素有修养的教导员陈世德同志主持，始终未将“左”的一套引进来，人们都受到了政治、阶级的教育，提高了政策、政治水平，能更好地在新区适应我党发动的土改斗争而不犯阶级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普遍性的政治运动和战前思想准备。

我们不足百人的第二野战医院扩编为和平医院第七分院，我院的董溪亭院长、吕恒彬、朱劭君医生夫妇（杨振芳）、孙秉忠指导员都调出医院另有他用，搭成了分院架子，虽然人员是逐步充实的，新调入长征老同志董兴谱院长，教导员仍是陈世德，院部下属政治干事

(原文书) 金文瑞、医干刘玉杰、统计员苑廷才。下属3个连(所), 每连医生数人, 看护排1个, 前后有许多同志调出或补入我院工作。如:

刘保田 延安医大三年来院作主治医生; 后提为副院长。后由我作主治医生兼一连负责医生。

李耀、李蕴兰、齐子平(平山黄尼村), 均是华北医大毕业的女医生来院、后来又来了王文辉、武权、武少猷等, 加原来的高其贤、陈志忠、王仲原、管理员赵三楼, 司务长田振刚、周福祥、赵大忠、马振方、采买上士、李明达、韩丙营(平山人)、看护长曹玉春、李鸿文、刘风荣(女)、李来全。

司药: 新来的李进生, 加原来调剂刘凤山, 谷毓芳、赵毓敏、曹永秀、杨增山、刘东占(均完县人)。史正明老同志回忆是: 看护在广灵左町新来山西郭丙元。卜宝珍、卜志明、郝耀泽、郭伟、张连山、杜贵年、王培田、陈俊生、高继贤、武润谦、赵俊秀(五台小个子)、张富贵(五台豆村人)及河北刘东福、韩丰年等。

在阳高时来了: 马占梅、张俊莲(均曲阳人)、耿志平等女同志。

在大王庄时来了: 王作益、荆玉莲夫妇、刘精华。

在老平地泉时来了: 唐山一批姑娘李俊花、高云英、李翠花、赵秀兰(爱唱)、郝玉贤、秦万昌、马贺明、丁文英、张秉珍、郭登祥、调来医生: 周贵卿、李忠建、赵瑄、潘震、王汉字、原在西吉的护士骨干有:

史正明、史吉科、秘景和、刘俊峰、刘振淮、刘敖尔、刘东福、梁昌福、张文英、高东栓、崔世岐、钱水子、曹永福、周耀荣、闫同月、张金川、巩昌水。

通过战争实践，有不少新同志成为骨干如：郭登祥、高继贤、韩丰年等进步很快。

而最与我们医生关系密切常帮大忙的有：史正明（手术室）、崔世岐、李来全、刘凤荣、周耀荣、马贵乐，各连连长指导员大都在伤病员中留用，如一连连长张明月、李明文指导员。二连庞克禄（长征同志）后调高其贤医生去当连长，政指齐平。

在落水河“三查”整编期间，已有四纵队六旅的同志们路经这里向察南战场运动，偶遇熟人，相互寒暄和祝愿保重这是前方见亲切的战友用语。

### 3、左町印象（一次丰收的尸体手术实习）

“三查后，随着察南雁北战役的节节胜利，雁北各县新区进行土改，共 501 村”可见土改斗争开展得及时而普遍。

三月二十日，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一旅进驻阳高，全县获得第二次解放。

三月二十三日，一旅二团担任主攻，天镇突破，二十四日胜利结束，歼敌补训第五师全部，保安 20 团大部，天镇、阳高伪警察队、“红黄会”和九宫道共 5500 余名，其中击毙 673 人，俘 4911 人，获轻重机枪 40 余

挺，迫击炮 60 门。

二十六日，我晋察冀一纵队由天镇向绥远进军。

同月，我晋察冀野战军围歼傅作义暂四军 5 个团，在谷前堡歼护路敌 600 余名。(216 页)”。

大约就在同月或四月初，我院奉命，由落水河向广灵移防经数天，驻广灵城西南左疃村，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风景悠美，村西有一小溪直通一个不大的水湖泊，垂柳嫩绿、湖内绿色、水草随波逐舞，内有链鱼成群迅游，显得颇有生气与活力，我院同志们常三五成群沿小溪漫步闲聊很有意思。不看周围战火，只左町小溪这一点好像世外桃源。广灵境内的另一特点，似比灵邱还信神，家家户户三间屋子两头住人，中间供佛和客厅兼伙房，记得有一房东老太太每天烧香念佛磕响头，至磕得前额一块皮肤变色，我们宣传破除迷信，老乡仍每天烧香不止。女医生们的房东腹泻，经齐子平医生治好，我们走时，老太太问齐叫什么？说我把你供饷起来，引起人们一阵哄笑。

在左町驻了些天，似仍在扩编过程，从山西补来不少新同志加入院行列。(见前)。

所奇怪的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四纵六旅由盛子华、钟化农率 16、17 团经灵邱北上围攻广灵城，激战一天解放广灵城，叛徒吴存体、惯匪头子封国章被我活捉，公审后枪毙 [2] 39 页”，上级亦未让我们接收医疗任务，反而上级十分照顾我们的技术提高，授给一具处决后的新鲜尸体让我们尸解，学习提高医疗技术，说



是血债累累最坏的一个汉奸。

四月八日，我们在一农家小院，在手术室护士同志们帮忙下，我们每位医生做了许多手术的练习，回顾我在〈医疗随录第一集〉解剖随记一文作出5页之幅记录，记载了：“颈总A结扎、迷走N识别、肋骨剪除（脓胸模拟）、蚓突炎手术（兰尾切除）、脱肠（疝）手术、肠外A结扎、龟头切除、睾丸摘除、造尿道（实即造尿痿）、兔唇修补、三叉N第一枝切除或捻挫、肱动脉结扎、股动脉结扎、腘动脉结扎、胫后A结扎、正中N切除，足跗骨解剖等”现回忆起来，人们的学习热情极高，好容易上级照顾给予尸体，一定要好好利用之，这要比我们用截肢后的残肢学习要好得多了，记得这具尸体个子不大而消瘦，正适合我们操作的需要。尸解完毕除躯干基本上无什么好地方了。由于当时技术水平所限，胸、腹各脏器无使用都浪费了。即使这样，收获也是远远超过我医训班那时的尸解，而且学了就用，很快用之于临床，为急救战友锻炼了本领。

尸体舍不得扔掉，第二天我们还想利用残尸再做些手术，结果反受了批评，院部让赶快将尸体处理掉，原因是，由于手术室护士未看紧，当尸解完毕后，被房东进院来看到了，不用说，还得做一番解释、安慰、和用具赔偿的善后工作，不知陈教导员等怎和房东做工作。相信首长和房东说明死者是某某汉奸，老乡一定会理解的，甚至希望我们多割他几刀呢。经这次优越条件而充分利用的尸解，很快在以下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有：

(1) 手术止血达到新水平，原除股、肱、桡 A 较熟练的掌握外，其他则作得很少甚至无，经过这次尸解，四肢各 A 止血范围扩大，且无一例肢体坏死。并在 1950 年首次投稿《动脉结扎了为何还出血？》被《绥远卫生》刊登而受到同行好评；

(2) 兰尾切除、疝修补均于次年开展，已涉足入腹腔外科（记得 1944 年在安王庙曾有一例化脓性兰尾炎死亡，当时权威杨舒敏主任也无法进一步解决）。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于 1950 年我们已获肠切除、肠吻合成功，说明已打破了抗日战争“四肢外科”水平而跃入了“腹部外科”的新纪元。开展新技术，是我获得工学代表有力的根据之一。

(3) 记得：跗骨的解剖及为从那里下刀分段截除伤足奠定了基础，原来较生疏的，而经解剖熟悉了距骨、跟骨、舟骨、一二三楔状骨及筛子骨的确切切离线，和前面 1—5 跖骨的切离线，为提高足部手术预后的功能，尽量少切多留，保留足面提供了知识，也为 seom 氏手术奠定了基础。

(4) 还记得：上肢手术常用的臂丛麻醉，经过尸解简化了找臂丛的手续，基本上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大大减少了全麻尤其当时是用毒性很大的 Chloroform 对伤员的危害，提高了阻断麻醉的技术水平。

总而言之，这次尸体的解剖与手术练习，是我生平以来最认真收获也最大的一次尸体练习，为造福战友，为提高我军医战伤救治水平，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理想

境地。是边干边学、学中干而更重要的是干中学的实例之一。实际我们已进入察南战役，由于未让我院接收任务，也列为战前的技术准备吧。

#### 4、打应县

应县是雁北重镇之一，由土匪头子张朴驻扎，部队从左町出发，路经一个斜坡向浑源进军，看护长刘凤荣和周耀荣，在行军途中赛过男人的“假小子”，她们在同志们已很疲劳又渴又饿的情况下，抢着给病号和身体不好的同志背背包，对活跃部队情绪也起到带头作用，“二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部队从浑源境内的北岳恒山脚下通过，好像是在行进方向的西侧，曾见到一个断壁小崖名曰悬空寺。是由于崖上有一洞穴，说是原来有一位道士在打座修仙，洞穴外口依崖断面修一寺庙门罩飞檐峭壁，画梁雕柱，虽已褪色破旧，但依然可辨认之；下面由竖木顶着，而且由弯曲的木梯蜿蜒去洞。有的同志想去洞内看看，但部队正在行进，又未听到休息号声，听说由于年久失修，木梯难保不蹶陷，所以人们均未能去成。但后来听女儿宁娟说：她们拉练去的北岳恒山，则与之比要雄伟得多，可见我们边走边览看见的悬空寺，则并非真正恒山（翠屏山）那个悬空寺。

过了恒山脚，来到较平坦的浑源城郊，人们窃窃私语着：这就是“到了浑源州，回家把妻休”出美人的浑

源县了，人们不由的观察能窥到的年轻女性，给人们的印象浑源妇女的确容貌俊秀，穿着旗袍大方美观，但一咧嘴都是满口黄牙一下完了，可见这一带是高氟区，所以老乡牙齿都有黄斑。

部队未进浑源城，在城郊向应县西留村行进，而且当天在该村宿营并暂驻。准备接收任务，见到该村虽有能行大车带有车辙的大道，但建筑大大不如五台，多是土垣土房。据悉应县战斗已经打响，敌人在应县木塔最高的制高点上顽抗，我军失利，未能攻克。虽未攻克，但敌已受震动，知是瓮中之鳖，是注定要完蛋的了。

按《雁北大事记》（155—182页）记载有：“1946年4月至5月，晋察冀野战军一纵队组织解放应县城第三次战役。由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指挥。4月15日完成对应县的包围。……4月21日总攻开始，……突击队和梯子队运到外壕和城根遭敌城上城下明暗火力点的猛烈射击，伤亡太大，故此未攻下。30日再次发起攻击，……一旅突击队已登上城头，但由于后续部队遭敌城下暗堡的侧射火力扫射，伤亡太大，上城的突击队未站住脚，又被敌人反扑下来，此次攻城又未成功。”

直至“5月18日，发起第三次攻城战斗，……24日16时，城内守敌张朴重创难支，在大同敌38师接应下撤离应县，25日应县城宣告解放。此次解放应县战役，我军毙伤敌人2307人，俘敌121人。我伤2050人，亡403人。”“两次攻打应县未克。这与先是轻敌，

后是战术问题有关。地方工作主要是清奸反霸、支前和土改，有一度时期执行政策上偏“左”，后虽进行纠偏，但在工作中造成一定影响”。

从以上资料，可见这次战役不太理想，我之伤亡大于敌，我院在小石口村，西留村接受大批伤员，我们医护换班手术连续两昼夜不得休息。由于连续手术，夜间在民房的手术室内乙醚在空气中的浓度可能太高了，照明光源是汽灯或端菜油灯，所以在陈志忠医生的班上，不幸遇到失火，差点将伤员烧着，可喜的是火在地上燃烧而非向房顶燃烧，用棉被扑灭。可能乙醚比空气比重高故。敌傅作义打来了，我们才带伤员转移。

这次接收伤病员，任务虽大，但我感觉只是数量偏大累劳而已，在技术上仍同过去无何创新之点。在我们年轻人来说，劳累根本不是问题，打个盹即能消除疲劳继续工作。工作虽累手术虽多，仍不过是每天巡诊换药，手术仍是取腐骨、取子弹、弹片、止血、截肢而已。

但紧接着带伤员转移至灵丘下关后，则在战伤医疗、手术治疗、病房管理、科研萌芽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对大批伤员的医疗实践，进一步拓展充实了我八路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

#### （四）战伤医疗的顶盛时期

##### 下关与杜杜河

1948年夏，我院奉命从雁北应县战场，辗转来到灵丘县境的下关及杜家河村，主要接收察南战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的大批伤员及陈正湘司令员的二纵及四纵等部队的伤员。雨季也在这里渡过。这三、四个月中，不仅接收伤员的数量特大，而且成批而集中，增大了工作的艰巨性。更主要的是在这解放战争的一段空间中，突破了战伤医疗的陈旧观念。许多方面亦像我军所向披靡一样有所开拓性大踏步的进展，为我军医疗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实、丰富了内容。

下关驻着分院部和我一连（所），下关是一小镇，每旬有两三个小集，附近农民来此交易，主街东西向，村稍居高，村东西头及南西都较低洼，并有一条小河在村南通过。地处丘陵，而在当地还算是好地方，主要农作物长势良好，可望丰收。再加上前线的捷报，军民均沉浸在必胜的欢乐之中，所以，军民关系也很好。

杜家河距下关二十多里，是个更小的村庄，是我院二连（所）所在地，大多接收二纵伤员。朱劭君杨振芳夫妇还未调离，记得一天大雨滂沱，他俩还蜷缩栖身在大席棚里，然而这次山水暴发，房壁倒塌多处，我和护士排住在一屋，在瓢泼大雨中听到哗啦的一声好似有什么倒塌了，次日一看，原来墙壁向外倾塌，房顶有四角的木柱支撑着，否则，我们早已不在人间了。这次大雨给全村军民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柴也买不到，消毒吃饭都困难。但军民挤在一起，困难终于被克服。

下关位于城南方，好似当时的“大后方”，听不到

枪炮声，从察南、雁北及平绥各个战场，送来的多数都是不能行动自理的重伤员，任务十分艰巨。

所幸，我们每位医生得到一本战争年代不可多得的专著——《创伤疗法》，由宫乃泉译编，特别是由原冀鲁豫卫生部长钱信忠老前辈倡导“新创伤疗法”及当时总院的组织领导，我们抛弃了连抗日战争也未敢动一根毫毛“老祖宗”给遗传下来的“伤口，必须每天换药”的陈旧观念，而改用不痛、脓、肿不换药的“新疗法”，不仅大大减轻了医护的繁重劳动负荷，而且治愈率提高，“新疗法”可谓对战伤医疗立了一大功，是对战伤治疗禁锢的伟大突破，产生了系列化的变革。不仅医学理论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锻炼了我们这支年轻队伍，从而为比较系统的形成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是很值得甜密的回味和骄傲的一页。

我们的工作条件和往常一样，当然还是完全利用民房土炕做病房，下关有个车马大店，它的对面的大炕，最适合接收重伤员，便于集中医护，杜家河有个什么厂子留下的席棚简屋之类的“大舍”，也成了我二连的病房。手术室在下关就设在村妇救会主任“黑”大婶的厦子里，简易布棚就挂于厦内，由于有个小打谷场面，所以对集中接诊伤员和手术都是良好的条件。

这时院长已改由长征同志董兴谱及老教员陈世德同志来领导，这时又新增加了白求恩学校学生李蕴兰、李耀和齐子平等女医生新生力量。

在这里军民关系极好，像“黑”大婶样的乡亲不乏其人，相处十分融洽。

**下关罕事两桩：“闹鬼”和下大冰雹。**

正当贵银来探望我期间她患了腹泻病，一日数次腹泻消瘦得很快，不巧此地又下了一场大冰雹。我们住在下关村东居高临下的一家老乡西屋，小小的院子，窗前还种了一畦黄瓜、豆角，已经果实累累将可入口时了，村外田里种的罌粟成行，像大小拳头一样的果实刚刚开镰割了一二刀，其他作物也绿油油的长势良好，看来丰收在望；没想到转眼之间夷为平地！

①有生以来首次见到大冰雹灾害，记得是个炎热的午后，我和贵银正在室内，忽然像小说里妖魔降临情景——阴云密布，狂风呼啸而来，顿时，风雨交加，好端端晴朗的天空，立即变成“漆黑”恐怖的世界，只听得房顶上、院子里咚咚作响，霹雳兵喇好像一阵乱石投击、大石下砸的恐怖声。核桃大、鸡卵大的“小”冰雹有的自门窗溅入屋内来，还没想到外边还有更大的。

仅仅大约几分钟，冰雹平息了，本来酷暑炎热的大地，骤然变成了冰冷世界，极为惨痛。窗前的黄瓜架已经砸入泥内，瓦房顶上的瓦片都成为碎片，整个村里没有一所完整的房顶，院子里、狭窄的街上冰雹成缕，每个冰雹鸡卵大、核桃大、鹅卵大，最大的有碗口大小，山水哗哗作响，次日阴凉处还有成块的冰迹积留，村外



的罌粟，头叶均毀，只剩下布满田间整齐成行的小“直棍”，乡亲们唉声叹气痛惜已到口的劳动成果毀于一旦，我院的工休人员都很痛惜这场灾害加给老乡极大困难我们安慰乡亲们不要着急，政府总会想办法救济的，但乡亲们明白，罌粟即鸦片，本是毒品，但为了与敌人作经济斗争，政府允许种植，这种东西对腐败的国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边区可向敌区换回许多需要的物资，而今天“烟土”成为泡影，怎会不伤心呢！但这无论如何也是短暂的困难。

仅仅几分钟的狂风巨雹，将许多成搂的大树折断，就在这一刹那，正在田间劳动的一位乡亲被活活砸死，怎不使家里亲人伤心呢！也正在这短暂的时刻，有我曲阳县伤员之父，来此探望儿子，正在村南遇到此灾，老人毕竟经验丰富，见到一头牛撒放在附近，他机警地迅速钻到牛腹下面，脱下两只鞋顶在头上，牛人虽都被砸伤，但幸免於难。车马大店里的工休人员关切地问这问那，我们给大伯上药包扎，都赞扬大伯到底比我们年轻人经验丰富，祝愿大伯的好运气。

在当时七八十岁老人都说，从无见过这样大的雹子，当然在我本人来说，我生平以来只见过这唯一的一次毁灭性冰雹灾害。我一生遇到无数次暴风雨和小的冰雹，但那一次也未能超过它。贵银也说，幸亏你我都在，否则，一个人可要吓坏了。每次狂风呼啸和风雨交加之际，立即很自然地想起下关这次大冰雹。

贵银住了半月左右，经治疗病情稍好，就经涞源回

唐县娘家去了。

②闹鬼：与豆铺那次闹鬼近似，然而这个“鬼”与男人无缘，专到女宿舍去闹，就可冒然断定他是风流之徒流氓之“鬼”了。

事情发生在女护生宿舍，正当酷暑季节女同志的住室门口和男同志们一样的敞开着，房东们的门窗同样大开不闭。某天，早上凌晨发现一个男人在她们炕上睡觉，经女同志们喊叫起来，这个人才大摇大摆的离去。自此，不断发现有赤身男人蹲在女宿舍窗前，吓得刘精华等不敢睡觉，连平时最胆大的刘凤荣护士长也害怕三分，严重地影响工作和女同志们的安全。

医院领导及村里妇救会“黑”大婶等村干部都引起注意，连续派人在夜间持枪捉“鬼”也未捉住。不久医院移防了，闹“鬼”的事遂平息。其实那有什么“鬼”？真正的鬼是汉奸、特务、流氓坏蛋。否则为何这“鬼”专找女同志处睡觉，从来不来我们男室来。然而在黑灯瞎火的山沟农村，在对深夜工作（或休息的）女同志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真实的考验。在这一点上，护士周耀荣同志（和后来新从唐山入伍的赵秀兰小姑娘）却做出了表率，他们值夜班，在鸡不叫狗不咬的深夜里，往往听到她那嘹亮的歌声，据她说这是为壮胆的。

（初稿于1987.8.20，夏令时下午4时10分，39℃高温中）

我曾写过《怀念战友周耀荣（图47）同志》的文章给历史研究会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以寄托我们对

阶级姐妹的哀思。她出身贫寒的童养媳，在我第二野战医院，她与贵银和刘清秀三人在洗衣班工作，非常勤劳、干活泼辣，山西孟县的水井深水位低，然而每次都是她首当其冲地搅辘轳汲水，供大家洗涤血衣脏物，或和贵银二人抬上脏血衣到远远的死水坑去洗涤，



图 47 周耀荣同志遗像

从不怕脏累，谁能料到这样一位健壮而俊秀的女同志，竟然患上了结核性心包炎，曾二次手术后过早地离开人世，真可惜！以此来了解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成千上万的卫生战士，是怎样为革命做贡献的！以此来歌颂边区人民、烈士、战友，了解他们的为人、情操、抱负，我想这不仅是周耀荣一人，而是一代天骄的光荣形象。

### （五）战伤医疗飞速发展

从我野战二院自灵丘转战察南，至离开下关、杜家河，数渡阳原桑干河铁索桥，到达阳高大王庄之后，至此，察南战役好似悄悄地告一段落。以我医疗战线而言，以察南战役为舞台，通过浑源小石口、西留村，灵丘下关及杜家河的大批河北籍战士的战伤治疗实践，战疗水平有很大提高，战伤医疗颇有成果，很多新的技术观念、项目是这时奠定的，无论政治思想、医学理论、

新的技术均有长足进步。我认为，这些原本不成文的素材是珍贵的。

我们全体医护逐步接受与实行“新创伤疗法”简称“新疗法”，遂在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医学理论等方面采取了若干重大措施，克服前进中的阻力，以适应“新疗法”在新形势下的需要。

### 1、换药的突破实行新创伤疗法

实行“不痛、脓、肿不换药”，“不换则已，要换就彻底处理”的新的战伤治疗方案。

#### ①首先是对换药观念上的更新

新观念首先认为：伤口能否愈合，主要在于机体组织的新生，而不在于上什么药。包括当时的外科圣药Rivanol也不能替代肉芽组织的新生。当然药物本身的优劣会影响疗效是不容否认的。

我们医生的责任，在于给机体尽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肉芽）新生的环境和条件，例如：手术切除坏死组织，取弹片、取腐骨、肢体制动、骨折固定，患肢抬高（以及后来的良好引流，“三大仇敌”的处理）等，都是为机体自己的组织修复创造条件，也仅仅是条件和构成伤口愈合的全过程，达到脱痂、治愈、出院目的。

换药一词沿用至今，一直是手术各科的重要治疗措施之一。

“换药”二字，在解放战争以前，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挣脱的禁锢，好像天经地义地必须每天给伤员上好药，伤口才能好得快，才算尽到了医生天职，否则自感对人不起；伤员更如此要求我们为其服务。所以，在推行“新疗法”的过程中阻力很大，伤员催促我们必须天天换药，我们则要反复地做许多解释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宣传新疗法的道理和优点，有时伤员特别对年青的刚从白校来的女医生（如对李蕴兰）提出非难，甚

---

制或至少说明炎症没有进展，不应“换药”。炎症系指：红、肿、热、痛、机能障碍，都是伤口感染化脓的佐证，就需要“换即彻底处理”的必要，如常常作的：局部引流、罨包（湿敷）、伤肢制动等保护组织生机合理的“换药”措施了。这个“新疗法”的核心，宫乃泉部长的书记载“贝雷耳氏法：是维也纳骨科权威贝氏主张采用的。无论作初期缝合与否，撒大量消炎灭定粉就不再更换敷料，任创伤自行愈合。在设备完善、环境安定的医院里，这法比奥耳氏法更好”。

由于这一理论的引伸，更加强了无菌观念及创造“无菌创伤”的观念，尤见于：a、新鲜软组织贯通枪伤，一般日制65枪弹破坏力不太剧烈，入口往往很小，除非当时战场环境特别恶劣，如战壕、粪便等，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而出口往往较大，如果周围组织破坏不显著，也无需特殊处理，如果创伤不整组织破坏较重，经充分扩创及清洗后等初步疗伤，即等于将有菌伤口变成相对“无菌”创伤了。这样处理后的战伤，除非引流不畅，可大大减少“换药”次数而自愈；

b、新鲜软组织战伤，包括枪伤与炸伤，无论贯通或盲管，应行扩创；切除周围（坏死）带，取异物，按放橡皮膜引流后，即变成相对的“无菌”创伤了，也有利于缩短疗程，加快愈合；

c、个别的刺伤，例如我们一位姓贾的指导员，被日寇连刺9刀，均在四肢，深浅不一的盲管刺伤。按“无菌”创伤未加任何处理很快全愈；

d、截肢术后，更是无菌创伤了。自不待言，因为截肢手术操作均在无菌下合理地进行。

同时主张全身治疗，增加营养改善伙食，多喝开水、多睡觉、整理便通、抬高患肢、动静配合（实以静为主、也不全面）、发炎上罨包（冷热敷）争取早扩创手术去掉化脓障碍等。现在看来，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及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

以上数例，均为“不痛、不脓肿不换药”的主要适应症。但反之只要剧痛（炎症进展，引流不畅，脓汁排不出）、化脓、局部红肿就是需要及时“换药”的指征，以达到控制炎症发展、不“换药”的目的，促进伤口早愈。

我再次强调指出，实行“新疗法”并非易事，需要冲破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来自伤员的阻力，由于误解或其他原因，认为医护懒惰、怕麻烦，本来不痛，他非说痛，那我们只有耐心地解开绷带检查并解释，时间不久就有一批批迅速结痂治愈伤员出现，这些同志就能现身说法，帮助我们作政治思想工作，由于这一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经过一段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在下关我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由得到真正益处的伤员成了我们的好助手（活标本），是最有说服力的，于是迅速在病房形成遵守院规、服从治疗听从医生的话的良好的休养环境，一批批伤员出院入院新陈代谢，亦未乏帮我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伤员。

那种天天成为医护重大负担的换药劳动强度大大减

轻了，每天“换药”者约在 1/3 左右，大大解放了医护“生产力”；

天天塞药捻，一拔一撮脓的情况没有了，所以，窦道光滑坚硬，伤口周围紫黑的情况基本消失了。

实际早已有过化脓也“不换药”碟形切除石膏固定的 Orr 氏疗法，更对其合理的优越性方面原理理解了。〔最初美国奥耳（Winnett Orr）医师提倡治疗骨髓炎的〕书 106 页。一句话，现在回顾既往，我们长期的被愚昧无知反感正确的错误观念禁锢着，寸步不敢向前的责任由谁来负呢！

### ③推行消毒碗制

“换药组的组成和工作方法”——全院分成若干换药组，每一医生带一组，各组均由看护排派遣外科室人员。

一般为五人组成，即“换药”者、递器材护士、解打绷带的助手、消毒员。外科室，是我们当时与药房、手术室齐肩的重要科室，均由护士组成，它为轻伤员集中“换药”；为全院各“换药”组准备“换药”的敷料、镊、剪、探针等器材；还负责绷带、敷料（纱布块、条、棉球等）的制作与消毒；还要按白求恩的消毒十三步（泡、洗、晒、制等）来洗净脏敷料，制成消毒的再生使用。尤其外科室的消毒员，记得几位叫甄克辛、白玉春、张文英等；他们都是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当时无“洋”的高压消毒器，只好用大木桶蹲在老乡的大锅



上，拉风箱一拉就是（低压）蒸汽消毒4小时，内加硫磺粉一小包，打开看，如果还未化（溶解），赶快放进去再蒸，辛苦得很。如果出现了破伤风、气性坏疽，则要加蒸至4小时以上。比炊事员还辛苦，但他们总是有节奏拉着“二鼓子”高高兴兴地工作，有时还边“拉”边唱以消磨时间，多么好的战友啊！伤员们只知是某医生给他作的手术而表示感谢，却从无人提过感谢为他们手术治疗服务的战友们。

当时强调“消毒碗制度”，即每换一人，必须使用一份无菌的器材，包括：一个消毒碗（真正的边区粗瓷碗而非小盘），三把镊，碗里由递器械同志主动放入干棉球（拭脓）、酒精棉球及盐水棉球等，虽然当时农村环境十分困难，但从不允许器械混用，以防相互交叉感染。

“换药”顺序：必是先净、后脏最后特殊感染伤员的顺序，以免医源性感染。这个顺序要医生决定，不能随意打乱。

由于多数都是不能行动或自理的重伤员，我们“换药”大都到每个病房（即老乡家）去巡回完成，有时一个院子要来两回。

一组人来到某一病房，器械台（大木篮作成）放在门口，以便及时递去需要的东西。每个消毒碗内有镊子3把，棉球及酒精适量，严格无菌操作。

换药者手捧消毒碗（而非手端、易污染碗边缘），由一助手解除脏绷带，按以下方式进行“换药”：一把

镊揭去脏敷料及引流条（凡士林或盐纱条 Iovanol 纱条），挟干棉球（或纱布）拭净周围脓汁，弃之不再用；第二把镊持酒精棉球创口周围皮肤消毒（遵守无菌者由内而外；化脓者由外而内）；同时又持第三把镊，拧干盐水棉球，撕成毛边，轻轻上下拭（而忌用左右来回擦，这样会将新生组织挫灭，势必疼痛）。尽可能轻轻拭去创面脓汁，而不或尽少的“刺激”，经验证明完全可以达到“换药”无痛，最后用那第三把最净的镊子，在第二把镊子的协助下可以适度拧干纱条，拔去纱条边上断丝，用第三把镊或探针，轻轻将纱条填入创腔，纱条一端要留在创外，以防掉入创腔，发生像李子才连长那样的事。最后用第三把镊盖好新纱布垫（这个垫为了节约纱布、多半只一层纱、上铺适度厚的脱脂棉）。随由解打绷带的助手，按绷带学要求打好绷带放好位置，支撑好被子，“换药”完结。

清毒员，记得一位和我年龄近似的耿喜珍同志，她煮沸消毒，提一洋桶制成的手提炉，下添小劈柴燃烧，一边架火，还随时将用过的脏镊、碗洗净放入锅内煮沸消毒。消毒毕又放回器械篮内，供重新使用。亦可谓枯燥无味而辛苦的工作，记得她有时忙得满头大汗，理理垂发继续工作，从无说过苦累。

这时，往往有一位同一“战壕的战友”剃毛护士和我们一同工作，有名的“刮毛队长”刘东福同志就是一例，他往往借我们“换药”之机给明天手术患者备皮。

以上，都说明当时条件比抗战时期好不了多少，但

无菌观念是要严格遵循的，不得马糊半点，否则意味着伤员的手术失败，试看 47 年后的今天临床，不是还同样需要如此吗?! 我为纪念今年将临的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特画一幅《蜜蜂精神赞歌》的作品，来歌颂赞扬这些无名英雄的白衣战友们。每例战伤治愈和手术的成功，都蕴藏着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 ④ 医生亲自换药和无菌“三环节”的意义

后来，为了更好地掌握伤情，总院规定“医生亲身换药”，经过一段实践体会到：小小的三把镊，做到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并非易事。例如：拧挤湿棉球，撕出棉絮不仅吸水力强，能将创面脓汁拭净，而且毫无痛苦，是伤员很欢迎之举。

拆线：为了使暴露在组织外面的缝线不通过组织造成感染，需要将埋在组织内缝线暴露于外，才能剪断拔掉。这几乎是像两双手的协同动作才能完成这样精巧微细的操作。

还有用两把镊子挤、卷纱条，拔去边缘断丝，以及为了引流有效，需将几十林纱条纵摺等操作，这都需要不断地实践，才能达到熟能生巧且无误的目的。

2) 更重要的还是医生亲身“换药”，能更密切地观察伤情和更深刻地了解伤口的局部（及伤员周身）情况，从而能更恰当的掌握新疗法的实行。但也不是毫无问题，主要在大批伤员接诊及集中精力进行扩创（初期疗伤缝合）、止血等工作量特大情况下，仍需要护士同

志协助“换药”。即如此，让医疗决策的人，能亲身感受客观情况，而且这种感受是从实践中直接而非间接获得，从而决策的医疗方案当更可避免主观主义，取得医疗上胜利。

无菌“三环节”：即为严格遵守无菌观念与操作，为不造成相互感染（后称交叉感染），也为不造成由医生自己造成的感染（医源性感染），当时强调对人（对病人皮肤）、对己（对医护自己的手、等强调用消毒镊子接触伤员，呼吸强调换药时要戴口罩）、对物（药品、敷料）消毒的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均可造成伤口（尤其手术伤员）的感染化脓，最终导致失败。

通过当时（及抗美援朝、建国后多次农村牧区巡回医疗）手术实践证明，这三个环节是十分正确的，甚至急症手术，来不及收拾房屋（不打扫、不挪动物品也无进行空气消毒），按照“无菌三环节”也可取得无菌手术的成功。这方面的问题，待后阐述，有充分根据证明其正确性。

#### ⑤优、劣创面（肉芽组织）的识别与处理。

肉芽的好坏，直接影响伤口愈合，所以，打开伤口，往往可在一瞥之下得出清晰的诊断和“开好合理的处方”。是战伤治疗特别是成百上千大批伤员治疗的重要问题。

我们从无所谓“换药“实践中（等于现在的双盲法）感性的认识到黑痂不可揭，揭之延长治疗疗程。而黄色痂皮必须揭掉，因为痂下往往储着黄色的脓汁，这

种黄痂就无治愈希望的。另外发现肉芽鲜红周围一圈白边似的新生上皮，这种创面即或有脓也可治愈；否则，创面光滑黑褐色则无治愈希望。我们逐渐地由无所谓不去想的“换药”，到有意识地实行“新创伤疗法”。慢慢得出好坏肉芽的识别标志和处理方法，用之无不“灵验”，这说明我们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简单概括之：

创面色泽：良性肉芽鲜红，周围有新生上皮形成，向心性的白色环边，要加意保护之；不良肉芽色泽暗红或黑褐说明血运不良所致，粉红色是增殖性不良肉芽，营养低下难以愈合。

组织疏密度：肉芽呈颗粒状质较坚实，不易出血，说明创面下无腔，要加意保护；肉芽增殖性，无颗粒、松软，有时似“鸡屁股”样高出创面很多，说明下有窦道排液不易。

有无知觉？：有痛觉，说明 N 末稍已长入创面；无知觉，剪除或搔爬也无知觉。

最常用的处理方法有：将增殖多余无痛觉的肉芽组织，切除或剪除至有痛觉止，如下面腔很浅，可撒布 sn（氨苯磺胺粉）可结黑痂而愈。如果创窦道较深，除将增殖肉芽尽量剪除外，创腔内可用 2% 硫酸铜纱条（浓度较高的有腐蚀及浓度低的有收敛作用），数天后取掉纱条，改上橡皮膜引流或改撒 sn 粉促痂形成，即似“黄痂”，也略观察一下，往往结痂变黑痂而愈。

对良性肉芽，实行“不痛、不脓肿不换药”原则，

则脓汁往往渗透敷料，仍需“换药”但换时更特别注意，操作轻柔似羽毛扫尘一样，不增加任何对创面的不良刺激，例如对创面上的脓苔，可轻轻挟去或用湿棉球撕成的羽毛样边上下沾拭，且不可摩擦，然后上 Rivanol 纱条或纱块或凡士林纱条〔但后者，矿物油脂，虽可保护肉芽生长，但它影响水分蒸发，下面脓汁蓄留形成细菌培养基者则用之不当。就不如用 Rivanol 湿敷则更为显效〕。

再加上绷带学知识的妙用，都对伤口愈合起协同作用。当然现在绷带已被巾膏或创口敞开治疗所取代了；但有些情况如胸腹、臀、下颌等部位的绷带学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不可“一刀切”鲁莽取缔之。

#### 几种常用外用药的“妙”用

①里凡诺尔 (Rivanol)。当时称为外科圣药，黄色粉末，溶于水后仍呈黄色。几乎用于当时的所有领域：

外伤敷布及创腔引流，无不用其作为消灭细菌的主要手段之一。前已述过，但创腔引流不畅，坏死组织存在或特殊感染，它也无能为力。

用于洗眼和点眼，点眼无滴器，用消毒注射器替代，急性结膜炎效佳，然而对淋菌性者效差，但在当时无抗菌素情况下，仍用它来治疗。

配制成 1% 灭菌溶液静脉注射，治疗部队传染病回归热及外科的败血脓毒症、泌尿系化脓性炎症、皮肤丹毒。

龟头炎、湿疹也用它来洗涤。口腔炎用它洗涤或含漱。

开放性的局部炎症用它来湿敷，请病人（或别人）昼夜点滴保证湿润，确对控制炎症有著效，包括不开放性闭合的局部红肿炎症也有效。

至今临床仍未丢弃，说明确有实效。它的另外特点是使用简便（除静脉注射）、无痛、无副作用。

②盐水的药用。这是我们一时也不能离开的最常用药，配成1%（而非严格的0.85%）溶液洗涤伤口，制棉球以净拭创面，都每天使用，是战伤医疗最卓著功勋药物之一，有时其他药物，甚至连220（红汞）也没有时，在艰苦的神仙山几乎都用它分别不同情况处理伤口，当时经验是：

新鲜战伤或手术创口（扩创后、截肢后感染者），完全用低浓度即1%（近生理盐水）盐溶液冲洗、上纱条、纱块，以保持局部生理的新陈代谢，活跃局部组织生机，促进伤口早日修复结痂愈合：

对感染伤口，尤其创面附有很厚的脓苔时，则改用高浓度（高张）3%盐纱、或纱条局部敷用，等于将脓苔部分淹起来，只要伤员周身情况良好，如不发热、营养状态好有抵抗力者，数日后脓苔即可与创面成块、成栓的脱落，经冲洗，可得到一个基本无脓苔的清洁伤口，再改用Rivanol或低浓度盐纱（二者选一），可使感染伤口，转化为良性创面。这是由于利用改变局部组织渗透压的作用达到目的的——我们人工的造成局部渗透

压不平衡，由于高盐（NaHcl）这边的存在，使浓度低的好组织一边的水分，向高  $\text{Na}^+$  这边流动（这种细胞间液与细胞内液通过细胞膜进行交换）（参〈基础医学问答〉第 57、61 页）。

如此，即可将它分别情况利用其渗透压作用，巧妙地用于战伤的任何阶段的治疗，从现代医学也得到证实，1990 年 3 月唐山工人医院烧伤科主任翟君鹤主任医师的研究证明，“他首先发现盐水纱布，水先结冰，



下过一次大雨，伤员无法栖身，只好挤到本来已满地各农户家里。

我们当时没有响亮的医嘱制度，但有一个上下皆知的〈命令簿〉，医生下命令，，护士去执行，如弄清病房（室）号和科室住址便于工作，每到一处必须先号房贴房号，粘贴护士办公室、外科室、药房，护士才能有所遵循的去寻找伤员、执行医生命令。

我们没有大查房，基本是医生们各查各的，但也有实际存在的医生“碰头会”一般手术均医生自己决定，如扩创、取弹片腐骨、止血等，但截肢术要经主治医生（等于医生兼医务主任）或住连医生（各所的主治医生）决定，所以，虽无严密合理的病房管理制度，但由于医生与主治医生的密切的工作关系，时常上下联系，并不觉得有各自为政局面。

每连（所）看护排，三个班，每班十二、三人。

由于打仗时，多半是青一色的战伤，所以医生、护士在病房治疗与手术，手术与看护排的《命令簿》（医嘱）关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工作实体，因而工作上关系密切。同志感情亲密无间，至今留有建国后所大大不及的甜蜜印象。前年原护士班长、手术室负责护士史正明同志从天津特意来石试找，当找到我后，他说：“我这次回家（平山）是次要的，主要要找老战友你，今天找到了这是这次最大的收获”。还有在雁北的秘景和、在内蒙的肖玉龙、杜贵年、刘精花等都有类似的同志情谊我们经过在战争中的协力合作为伤病员服务，所

建立起来的阶级友爱和革命情谊，的确比亲兄弟、亲姊妹还要亲。

手术增多，足够昼夜连续作的，这样情况，必须建立手术室的组织和固定人员。如当时：手术室班长是史正明，护士有韩丰年、刘精华、史吉科他们专门负责手术室的设立（打扫卫生、挂布棚、设灯光、洗手筒或盆、摆手术床台、地铺席子上泼石碳酸或来苏水等工作），敷料准备、抱大腿（截肢时不刷手的助手）、端油灯（有时汽灯不能用）、手术后倾倒残肢体污物和敷料洗涤与再生消毒等。

每一医生带“换药”组，下“命令”要到护办公室，实际室内时常无人，都去各病房执行医疗“命令”和打水、打饭、端大小便、洗脸、洗脚，护士同志们值夜班。所以医生、病房、手术室是三位一体一刻不能分开，同志们都十分忙累。

手术通知用一张掌大的麻纸处方签写上：伤员姓名、诊断（如：左上枪贯骨折、右下炸盲、左股炸折坏死等）、手术名称（扩创固定、扩创取弹片、左股截肢等）、交给手术室即按时手术，还有时口头通知，尤在出血急症时。一般谁的病人谁作术者，截肢有主治或住连医生参加，以保证质量，麻醉吸入全麻（哥罗仿、乙脱）医生轮流作，其他麻醉如局部浸润、腰麻、后来的臂丛麻醉和荐椎麻醉都由术者自己操作。

如果连续手术，则由术者口头（医嘱）告担架护士：放入哪个病房（分类。如新疗法病房），同时口头

转护办公室“命令”，如抬高患肢、禁食、观察肢体循环等。医生下手术后，来不及吃饭，工作是很忙累的，有时日以继夜，记得1948年雨季酷暑，父亲和贵银到驻地关来看我，父先归，贵银我们住在一个老乡家，当时的女同志们如李蕴兰、齐子平医生、刘凤荣看护长及看护员周耀荣等对我们很是关心照顾。但当时由于伤员一批批地来院，工作很忙、手术多，晚上手术也多，而一天休息不了多久，记得一天夜里史吉科同志来叫我去做手术，我在睡梦中随便应承下了，其实还根本没有清醒，又呼呼入睡，贵银反复推醒我说：“史吉科来叫你，快去手术室吧！”我嗜嗜迷迷走出屋门，史还在院内等我呢，我很不好意思表示歉意，两人快速去手术室参加战斗了。有时无汽灯，就有二史（史吉科、史正明）端着麻油灯照明，照样扩创、截肢不误。全靠当时年轻体力尚好，视力好，要是现在可就糟了，白天还得戴花镜。

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晚上也无任何优待，然而同志们像一团火似的热情，真是如火如荼，医护团结协作，任务不分你我，互助友爱，毫无怨言和倦怠，工作起来严肃认真，工作完了活泼天真……，这种可贵的战斗生活，的确是值得认真回味的。然而有的战友已过早的离开我们（韩丰年、周耀荣），有的也不知去向（史吉科），有的又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党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史正明天津拖拉机厂医院院长、刘精华在怀来县医院任医师），我是多么想念战友啊！

脱掉手术衣立刻先去看自己手术过的伤员已成常规和惯例，否则心中忐忑不放心，看病人末稍有无紫绀、苍白、坏死，肢体制动抬高残端有无出血，吸入全麻者是否已醒和呕吐否？等等。除“命令簿”还随时有口头命令告护士执行，及病人想吃什么？还要亲自去休养伙房告诉班长解决特食问题。一天睡不了多少觉，口袋里装着听诊器和体温计以及止痛药片，边查房边给药，回去处方交司药。我们医生与护士就是这样团结协作工作的。

护士同志们更是忙累异常，除了比抗战时多了大、小便器外，没有什么更多改善，特别是夜班护士，一手拎着大小便器，一手提着开水壶，个个病房巡回护理，还负责随时去找医生。我一连看护长李来全、刘凤荣以身作则，关心下级，因人分配任务，女同志值班黑灯瞎火不放心要增加一人。

遇到伤员同志死亡，主要是护士同志帮穿寿衣寿鞋（不纳底的鞋）寿单（一块长方白布，偶有），抬死者去村边的太平房（一个村边偏僻的小屋），有时我们医生主动帮抬，尤其女同志值班时。说来常事，但在漆黑的农村，要将死者放入空室；有时三五具尸体在地下躺着，对一位女护士来说，不是没有困难的。

从下关开始，在“黑”大婶的厦子里（手术室）我们才使用黑色的橡皮手套，使伤员望而生畏，我们竭力安慰“不怕”，有手套不感染化脓，过去从无手套，所以要多次泡手，保持手的无菌。即或这样，我们比白求

恩大夫的流动医疗队的手术棚好得多。

手术棚也逐渐改进，由开始四壁落地蚊帐式的手术棚，逐渐可以随意按当地地势悬挂，除顶子必须悬挂外，其他壁可以少挂或不挂，可以隔一个洗手间。这是流动手术棚的改进。

以上，虽然还称不起什么完善的体系，但不能不承认解放战争时期的手术室专业化、病房管理制度已经有了初步的系列化，从而才能适应伤员成批增加，集中接诊的形势需要，而“手术通知单”、“命令簿”就是这种进步的明显标志。

(1987.6.20, 夏令时 1 时 35 分)

### 3、对战伤“三大仇敌”的认识

即破伤风、气性坏疽、败血脓毒症三个特异感染的病种。(非指那休克、出血、脓毒三者。前二者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有关章节中已叙述过了。)

深刻认识它们，首先是从破伤风开始的，记得一位年轻伤员，伤情并不很重，但角弓反张，满头“白毛”大汗淋漓，张不开口的“痉笑”不时抽搐，但神智清醒，还语不成声的哀求：“医生，我不行了，还能救不？”……等充满期望、碎心的哀求声。我们尽力“撒着无罪的谎言”去安慰伤员、战友。不久，他离开了人世，送往太平间，他的所有敷料，我们“大方”地都烧掉了。

还有一位十多岁的小战士，下肢盲管炸伤，病情很轻，但说话已经“咬舌”语音不清了，患肢抽搐而伤口出血。我们商量着给他立即截肢。但无用，残肢断端被动抽搐而崩裂出血。只好用吗啡（平常用皮注）来缓解，果然有短暂效果，后来就用吗啡静注的方法终于使他获救。他虽然染上了吗啡瘾，但得救了。认为是无法中的一法。

还有类似的伤员同志，大多的特点是，临终神智清晰，嘱这嘱那，十分不忍和可怜，故记忆犹新。可惜当时没有大量连小量的 TAT 也没有，一旦发现就意味着死亡了。所以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惨痛印象。（然而现在由于 TAT 及麻醉环的应用，破伤风已经不成问题得救了）。

再即，败血脓毒症，我只记得朱云生指导员在东迷城上肢截肢以后的高热稽留，弛涨，病势虽险，但终于在周密护理、静注福百龙，规宁溶液及 Aspyrin 等治愈了。在 1943 年以前不要说抗菌素，就是有磺胺，白求恩大夫也可能不致于死亡的。这样的实例当时是不罕见的。

至今，虽处于广谱抗菌素时代，但仍不能不承认这“三敌”中的“两敌”（除破伤风）是战伤性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疾患，现在病人虽不易死亡了，但并发脑、肺、心包、皮下多发脓肿者并未完全消灭。

色素制剂诞生了。（Akathisol）记得曾用该药给一位完全尿白色脓汁的泌尿系感染的患者治疗起到立竿见

影的好效果，静注数支后，脓尿不见了，终于得救。用于皮肤丹毒也有奇效。另外已广泛使用了磺胺制剂如SN、ST，虽然存在严重肾损害（无尿）的可能，但总是有治愈的。

气性坏疽：还是以后才认识的事物，是认识“三大仇敌”中最晚的一个。记忆中这种病与破伤风所不同的多半是重伤员，如下肢炸伤，在远离伤口的全下肢至下腹、腹部均可触到皮下握雪音（皮下气肿），这样的伤员，当时多半高位截肢（切断或关节离断），有时所有组织呈铁锈色坏死，甚至截肢也不怎见出血点。另外的我认为早期治疗也是合理的治疗，就是凡是皮下气肿蔓延的关键部位，要多处切开皮、皮下、及肌膜（肌膜张力很大，不切开是不能减压的），即便肌腹外露也不怕，说明已得到有效的减压，因气性坏疽菌是厌氧，切开本身就能使细菌因遇 $O_2$ 而得到控制。见到的没有几人，但凡组织成锈色的没有一例成活，都死亡了。所以G、GS（气疽抗毒素）的早期应用，加早期合理手术多处切开减压，还是有希望的治疗。

总而言之，当时战伤的这三种要命的严重并发症，确是战伤的大敌，也是战友的大敌，尤其破伤风患者的大量死亡，造成惊人的印象，这种惊人，是由我们许多战友的生命换来的。凡事不可事事自己经验，吸取别人的间接经验，对我们医生执行其医疗天职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当年的“老敌人”已不像那时危害战友生

命，或不是问题了，但近似的“新的敌人”还会出现的，如各抗菌的广泛应用及滥用，细菌的抗药性日趋严重、剩下“谁都不怕的细菌”真菌感染、肿瘤（外伤性巨细胞瘤等），所以对付“三大仇敌”的指导思想是不可没有和松劲的。

#### 4、“对孔”引流问题

我认为它很重要，拟辟专题加以叙述。在此之前有许多伤口不愈合或延缓愈合，甚至新鲜的软组织贯通枪伤也有许久不愈合的。查其原因：一是由于愚昧落后的“天天换药、”的错误治疗，造成增多感染的机会，妨碍组织的正常生理性修复。（而且还阻碍了我们“发现”引流这一重要原则）；另是，从根本上讲，我们还不懂和违犯引流这一客观规律。

规律是不能改变的，能改变就不称谓规律了，所以，对规律只能利用它，而不能违犯它，否则定会失败。

我认为，“引流”实质上乃是地心引力所致的重力作用而来的“水往低处流”的问题。它虽浅显然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极为重要的客观规律。人只要在地球上，因受地心引力作用，水总是往低处流。如果人到太空已失重，这一规律可能变化。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小至日常生活，大至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如河南林县红旗渠引漳入豫、天津的引滦入津，无一不是利用这



一规律，逆此行事决不能成功。

临床上产生的“水”，是常见现象和事实。我们做为医院，真正能在几小时内处理新鲜创伤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有，也限于战争环境和条件，往往只能止血、消毒包扎，而真正的清洗创腔是困难的。所谓最“人道”的六五步抢的软组织弹道，也由于穿透衣服，皮肤，而将细菌带入，所以，可以说，凡伤员受火器伤后，都应视为已感染的创伤，而非距离近（如局部弹头烫伤）或弹头温度高就是无菌的创伤。因为，（以枪伤为例）弹头是单向前进破坏机体生理屏障的，虽然入口小，出口大，亦都是有菌的。

临床上也确有过“单纯”软组织贯通枪伤很快愈合的实例，但回忆其过程，也并非无“水”，只是这些伤员大多是轻伤，伤员能自理生活，甚至尚能跑跳，伤员可经常的、主动地更换体位，并非经常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体位上，所以，实已由生活处理中的起床、吃饭、活动、睡眠等，达到了体位引流的目的，所以，这类战伤可以比较快的结痂愈合。（反之，伤员胆子小，不敢活动或局部引流不畅，招致创腔内潴脓自溃的实例可以反证之）。

临床上，能肉眼见到的“水”，是由于伤员机体的生理屏障（如皮肤、粘膜等）被人为的破坏、细菌进入弹道组织、局部生理的血液循环被破坏——血液（久之血浆）、淋巴液、体液等新陈代谢被破坏，以及这些“体液”不能引流出来，甚至成为细菌培养基，感染化

脓成为脓汁等，这些可统称之谓“创伤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如果伤口向上，又不加橡皮膜引流，就像一个小水库一样的被积在伤口之中→扩大为腔→向四周组织（肌肉、肌膜、骨间膜等）渗透→吸收中毒，高热、脓毒症形成，这样的创伤是无可能愈合的。假若创口向下，即实际等于体位引流，能够达到排液通畅伤愈目的。我想，许多轻伤员所以得较快愈合，正如前述能自己调剂体位姿势达到体位引流，所以，创伤愈合过程缩短。当然，一个伤员的创伤愈合，受许多因素影响，但可肯的的说，“引流”通畅与否，是战伤愈合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不适当的治疗可以反证之）

大、小战伤均同理。小的战伤还不太显著，至多延长治愈日程；尤其严重的、复合性、大的战伤，不解决引流问题，简直治愈无望，还可能脓汁吸收、消耗而死，因为“水”不能往低处流，例如：炸伤股前侧或内侧，或严重枪伤（七九子弹、破坏力强）股骨粉碎性骨折、后者有的截肢了，如果无截肢，患肢必须制动固定抬高。这样的重伤员，必须平（仰）卧，创腔分泌物（如脓汁）很多，腔底无出路，只好向周围溃烂、腐蚀，向创口溢出，经验证明，这种重伤员置入橡皮膜引流也不解决问题，必须扩创、清洗创腔的同时，在脓腔底切一对口（称“对孔”）或切一“侧口”，充分与创腔交通，切除引流中的障碍物（如肌膜），置入软橡皮管或较宽而长短适宜的橡皮膜，这种处理，可立竿见影，换药时管、膜都不必动，（后来发展为状似潮氏引流样的、

连续持续上滴入洗涤液，下面随排出)，创腔积脓积液可迅速排“空”，中毒症状立即减轻，高热速退，可大大缩短创伤的愈合日程挽救伤员生命，诚可谓战伤治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橡皮管，战争期间亦不富余，而且管壁再薄也有张力，所以，伤员总有胀痛症状，是其缺点。橡皮膜：即破旧的像皮手套制成，同时，可根据创腔深浅、走向、宽窄，当时在手术台上自制。还有凡士林油纱条，去掉断丝也可用作引流。但要注意，这些引流物，都不能长期留在创腔内，待创腔消失后，可一次或边拔边剪最后取除。

“对孔”引流至今在骨科创伤、普外等方面仍有实用价值。如由于化脓性阑尾炎、宫外孕术后的直肠膀胱窝（Dogera氏腔）的积脓，用任何抗菌素也不解决问题，故仍有经直肠；阴道前穹窿切一对孔引流者，可迅速解决积脓问题。

我要强调的，决非认定脓汁是必定产生的。更非是切口愈合的一个过程，如果伤员能在伤后六小时内得到彻底清创是完全可变成一个“无菌”创口而闭合的。但在战时（平时条件差也会遇到）环境条件达不到及早清创目的，则应想到：

创伤的“水”生成是难以避免的，应尽早解决“水”不再增长（如止血）及尽早解决“水”的引流问题。橡皮膜质软而薄，对组织刺激很小，适于“单纯”用它引流或“创腔”闭合前缝数针间断缝线，为防止引

流不畅而用它作引流，一二日内拔除，可预防引流不畅及分泌物蓄积，故是首选之引流物。

“对孔”引流是解决“水往低处流”的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之一。一般可以认为创伤分泌液是肯定的，大的创腔可取腔底侧孔引流，这是最常用的方法。违反“水往低处流”的客观规律，后果则不堪设想。

#### (5) 与流注原理密切有相关的两项手术——（取弹片与取腐骨术）

当娴熟地掌握了“对孔”引流的措施后，对战伤常见的取腐骨、取弹片等取异物手术就有把握，在当时没有X线及碘油、碘化钠造影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做到得心应手、准确无误呢？主要根据脓腔及流注方位。主要体会：

a、化脓愈重者，腐骨及弹头、弹片，受地心吸力影响，愈易降到创腔底层方面去。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相信异物已随流注脓疡降下去了。所以切口要恰到好处，距异物最近，也才最易取出和取尽；否则，伤员可能受切口多、痛苦多，还可能产生取不出的后果。

b、触诊：异物距皮肤较近时，即可浑然扪到，如有时扪到一个硬尖状物，这往往是腐骨和形状不整的弹片。手术时在创腔用手指轻巧的触诊，往往达到准确无误的定位，接着下钳挟出来。有时创腔深手指达不到，或创腔狭窄手指不能进、巧妙地使用银质钝头探针也有用处，但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重要器官和组织，以免误

伤（副损伤），所以，正确的定位和距异物最近而好取的切口，是很首要的。

c、取与水冲并举效果良好，白求恩大夫推荐取子弹使用 Alis 钳，我本人实践并不得心应手。但能取的取出来，取不出的借助护膜球用一定冲压力，将异物比较干净的冲取出来。取出的弹片或其他异物，可征询伤员是否要？若要，可洗净包好交伤员作纪念。

d、失败者，多半由于对异物存在的位置估计错误，切口容易偏高，异物取不出，白受一次痛苦者有之。换句话说，就是对流注脓疡的有无、方位及其有无间隔（如骨间膜、深肌膜等）等估计错误，招致手术不达目的。所以，我认为有时要相信伤员的自述：曾有一山西籍指导员，记得他是股部盲管炸伤，但他告我们弹片可能在膝关节以下的小腿部位，他主要根据其可移动性压痛点，自相判断的。我们触诊也疑似弹片，结果在此切开之皮肤，肌膜流注的脓汁里，裹着形似大骰子样方形的大弹片，取出后很快治愈。这当然与异物感染源已消除及对孔引流排液通畅有关。

但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异物形状不整、创腔深部的棉絮、木屑等异物，有的不易流注到创底之故。

腐骨也要看大小和是否已完全与健康组织脱离，由于粉碎性骨折微细血管断裂，骨内的钙离子不能被血液循环带走，而形成碎骨钙沉着，极硬，故它也和金属一样，是机体内所不容的异物。还有大块碎骨片，“骨尖”已完全坏死，然而由于骨膜血液循环，不可能立即坏死

而脱离。有的还能成活，只将坏死的骨片尖“凿”去即可以了。在有了 X 线的今天已不是问题，但创伤感染化脓、流注仍不可轻视之。

上面说的，只指“水往低处流”这一点有关问题加以引伸，而非取异物手术的所有问题。而且以后随着医疗器材改善，前述方法可能完全废弃成为军医历史，但其思路或许还有用处。

#### (6) 评定残废等级问题

“评残”是战伤医院对成批伤员出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序”和政策问题，直接关系到伤员个人利益及党和国家利益的正确的实施，体现着党和政府对为国光荣负伤同志们的亲切关怀，政治性很强，而我们做医生的，正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人，要求必须有对战友的阶级友爱的感情和对党和国家政策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才能十分认真、负责地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大规模进行过“评残”。而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到了我军医疗史上最为突出的善后工作。不是对伤员出院交给地方了事，而是首次在医院评好残废等级后，由医院派得力领导组织护送成批伤员到转建大队，该组织机构再经审核与短训后，才做复员处理（如：1953年6月，我曾代表绥远军区后方医院护送300多名痊愈伤员，到廊坊转建大队。本来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但出现个别调皮捣蛋的人总会

难免。认为将要脱掉军装了，可以无理取闹一番。当时我在转建大队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坚决兑现说话算话，行使领导权，决定将这极少数调皮捣蛋的人带回绥远省包头市后方医院驻地处理，虽然这些人有的急于回家退伍，表示决不再“闹”，但我也不能让步，因为军队纪律无论前方后方，都应体现铁的纪律。所以，成批送伤员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我后方医院的一兄弟分院在廊坊因处理不当不能脱身，最后这位副院长带护送人员悄悄溜掉，这样做就不好了。此是后话）

大约在1948年7月，将我调去距灵丘下关村廿里左右的杜家河二连（所）工作。让我兼做住连医生，当时已有刚刚毕业不久的白校学生李耀和老医生高其贤同志。李医生是女同志，看来终究还是医疗经验不足，一大批轻伤员，由于伤口处理欠当延误结痂。我去二连后，发现多数伤口是增殖性肉芽及“换药”较勤影响结痂，所以与李、高医生商量，首先按“新疗法”撒布磺胺粉（S.n），上盖干纱，不再动它，争取结痂。如此一次脱痂治愈者达二、三十人。另对小创面的增殖性肉芽，采取锐匙轻轻搔爬+S.n粉促其结痂；有创腔的则检查创腔深浅、有无异物（小骨片、丝线头等），有则取出之，这种操作不需要手术室麻醉下进行，因是无神经末稍分布的增殖性肉芽，毫无疼痛，在外科室（换药室）内即可彻底处理，当时的缝线都是白色丝线，所以检查起来并非很易鉴别，就依仗当时年青人的锐利的视力也并无太大困难。创腔经轻搔爬或上CuSO<sub>4</sub>纱条腐

蚀之，再更换一二次生理盐纱，创腔肉芽可以转良，自创底修复而治愈。总之，大约不到一个月的突击治疗，已有六七十名伤员完全脱痂治愈，等候出院。杜家河“评残”是我首次的尝试。

当然，二连还有不少危重伤员，也经手术治疗大为好转，我首次投稿——“动脉结扎了，为何还出血？”一文，即出自这里的医疗实践。

这时上级指示，组织评残，长征同志庞克禄连长指示我进行这一工作，但我年轻毫无组织工作能力，不知怎样做才好？当时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工作方法的线索：

有的轻伤同志，估计评不到残废，所以积极要求回前方杀敌立功；

有截肢以上的同志，自知肯定评残有份，表现得平稳、不急、不燥、不闹；

但相当多一部分同志，心中无数，不知自己是否够得上残废？问题主要在这部分同志中，他们对医生们实施“明察暗访”、“软硬挟攻”。如：有的“主攻”女医生李耀同志，悄悄询问我评几级？她很焦急、害怕，也有极少数例如一位定县人张排长，以三八年参军老资格自居，自要等级，说什么不给我二等甲级小心你们的腿！这位同志消瘦中等个，挎着一只胳膊，两只大眼睛滴溜溜的转动，是一位“精悍”不好惹的同志。还有一位右上腹炸伤肝脏的伤员，行唐籍战士，经火烙止血方愈，留下大凹陷，，也有类似语言……。



我安慰李医生不要怕，要沉住气，咱们千万不可随便许愿或改变主意，你如实在对付不了，可让他找我，我不怕！她立即提到这位排长很厉害，我们惹不起他。当张又一次要挟李医生时，李医生果告诉他找我，张果然找我要挟，被我碰了一下，这个人扬言要打我，正遇到护士长李来全同志和他说：“你可也碰上了一个“老”医生，他三八年参军，十五岁当医生。王医生吃软不吃硬，软点好商量，你要硬他比你还硬，不信试试看”！来全这一有意的传递信息，的确对工作是有利的，他立即一五一十告诉我，我说：“你别胡扯了，廿二岁的人什么老医生，什么吃软不吃硬，应该是软硬都不吃才相宜。”来全说“他摆你也摆（老资格），他就老实了。”果然，张同志被全来的话震住了，见面也不像前些天那样盛气凌人，而有了笑意，我果断地告他说：“有你，你不用问也有你，如无你，问也白搭，老张，你是老同志了，你说是呀不是？”他无言答对，蹒跚走开了。后来我告诉李医生，张要闹，我们必须把他“打”下去，否则就乱套了。顶多，我们到那儿，把他带到那儿休养了不起了。

长征干部庞克禄连长指定我负责这项工作，我坚决地接受了从未干过的工作，我想我是住连医生（即后来各所的主治医生）；李耀年轻刚刚毕业参战的，高其贤同志虽资格老，但无文化，工作起来确有困难。我三人（主要和李）商定，谁也不许随便答复问题和许愿。

冀晋军区发下了《残废条例》我们首先学习，比较

好记，当时达到了滚瓜烂熟地步，可一字不漏的背诵下来，记得主要界限是：

失去一肢，一肢强直丧失功能，双目视力模糊（但还不瞎），阴茎或双睾丧失，又聋又哑者，属二等甲级。回家享受国家补助。

肢虽尚存但已僵直运动不能，及比上稍差一些的为二等乙级。享受补助。

失去双肢（或一手一足），双目失明、下肢截瘫，脑神经损伤遗留痴呆癫痫，手指全失等属一等残废。国家抚养终生。

失去二肢，或三肢以上麻痹，属特级残废。抚养终生，专人护理。

失去拇指，一目失明，双耳全聋等，属三等甲级残废，一般按退伍处理回家享受补助，再次，为三等乙级，可留部队工作，享受国家补助。

只失去小指、软组织贯通枪伤等，凡不影响功能的不算残废，回前方战斗岗位。加以技术理论上的解释很重要，说明为何缺失拇或小指悬殊如此之大？同志们是懂道理的。

大体如此，大概建国后民政部门的《残废抚恤条例》也大体按此而来。

我三人商定：“评残”主要对象是已愈伤员，必须将《条例》精神向伤员广泛深刻的宣传，自己会去对照。随在大席棚里召开轻伤员大会宣传《条例》；

三位医生共同检查，共同填《评残表》，必须按

《条例》医生们共同研究决定残废与否及等级。一旦决定，不能再变，无论对谁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单独答复伤员所问和许愿。就这样，经过在大席棚里集体工作数天，效果良好。

看来，这个集体学习、宣传《条例》，将政策交给工作对象的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多数人是讲理的，但我们应有对付不测的思想准备。

集体检查与决定等级，既省力省时，又符合技术民主的原则，不易出偏差，工作较主动，可望做到恰如其分。

（后来又更进一步）对“刺儿头”决不让其沾便宜，老实人也决不让人家吃亏。我们决不整人，也决不当傀儡任其摆布。而是以战友阶级友爱之情，正确地按《条例》办事，正确体现党、国家对伤员同志的关怀。

以上数点，则成为多次大战役“评残”的主要方法，是成功的经验。实际上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胜利。事实并非总是有板有眼文皱皱的，有时甚至是接近滑稽可笑的。

老实讲，多数伤员在出院前忧心忡忡地考虑自己可能的去向，尤其介于残与不残之间的人员更是如此，例如记得有一条“伤筋动骨，相当于三等乙级”者，这里边定会有个合理的界限。这个界限就需要我们医生们事实求是、不偏不依的定残，因为这部分同志，仍可能继续留队工作。无论留队或转业，总是应该让同志享受到他为革命负伤的光荣荣誉和微不足道的抚恤补助，而那

时的同志们，对政治荣誉比物质补助更为重视。

这次出院，可能是军区为了迎接不久举行的平绥战役，统一安排腾出医院床位的。当我们进行完毕之时，恰从军区政治部派来一位干部（原二所文书）郭玉峰同志，来院检查这项工作。我们依然在我连“礼堂”大席棚内，由我将评残根据、评残理由、等级及理由产生的名单当众宣布之后，绝大多数伤员同志表示满意，当征求意见后，只有少数人提出：

那个右上腹肝炸伤落了个大凹陷瘢痕的行唐战士提出意见，经我们当众解释，满意的笑了。

我们就等这个定县姓张的排长发言呢，记得他是右上肢神经损伤，肌肉萎缩功能障碍，给评定相应等级，结果这同志一言未发，说明满意，或闹无市场。

这时，郭玉峰同志代表军区政治部，笑嘻嘻地以他平时幽默而诙谐的“艺术”语言说（大意）：“我完全同意和支持医生们的‘评残’结果，因其符合《条例》政策，评残公平，不能更改。”这时有一位双辜及阴茎部损伤的战士说：“我不要残废，我要蛋子儿，你们得赔我蛋子儿！”大家悄然好笑。老郭操着一口标准的满城话说：“我也只有两个蛋子儿，赔了你呢，我就没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个没头脑的也笑了。我们也很同情这位同志，年纪轻轻失去性器是十分可怜的，可以想像他不可能建立小家庭，失去了天伦之乐的基础条件，罪魁祸首是美蒋反动派。再征求，一致高喊“没意见。感谢二连全体、感谢二连医生的辛勤治疗与关怀”。圆

满地结束了评残，两三天后，同志们都骑着牲口出院了。

## （六）对已往战伤的回顾及体会

战伤，泛指枪炮火器伤，当然也包括白刃战的刺、砍伤。但我们与“二战”及其他欧亚国家的战伤，也有很大不同。我军对负伤部位、伤类、及损伤程度的诊断表达，是简明而全面的。如：左股枪贯、臀部炸、盲，即是解剖部位是左侧股部（即左大腿）贯通枪伤及臀部盲管炸伤（说明臀组织内尚有弹片……）等等。下面我结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各种战伤，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 ①关于枪伤问题——

枪伤是指火力枪弹伤而言。凡一切枪弹伤，均应视为有菌，原则上均应进行扩创（清创及初期缝合）术，从理论上是无非议的。

以抗日战争而言，我们的敌方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工业发达，他们的步枪或机枪均以6.5mm枪弹为标准。这种在当时直径较小的枪弹，杀伤力相对较小，故有人称“三八式步枪”是“人道主义”武器。

我们伤员，尤其软组织贯通枪伤，有一大部分伤员未经扩创而治愈了，何因？“入口小，出口大”是共同

的特征，局部血肿及坏死带、震荡带（也称移行带）均相对范围小，虽是有菌，也产生炎性创伤分泌液，仍因损伤相对轻而能自行愈合。如二团某护士长李国禄同志，腮部横行枪弹贯通，除双侧腮部具有全层贯通外，牙齿毫无损伤，经保守自行愈合，反成为双侧“酒窝”的“美容成形术”，这当然是极个别的幸运伤员。

只软组织损伤，无重要神经和动、静脉损伤。伤员生活行动一般均能自理，等于体位引流。

弹道小，血肿小，易于吸收。一般伤后第三天，坏死区被白细胞形成的障壁与健康组织分隔开来。伤后1周末，弹道壁出现新鲜肉芽组织，并长满弹道，血凝块被吸收。

首次“换药”很重要，虽按“新疗法”合理处理枪弹出入口，制动并抬高患肢，促进静脉血回流炎症消退而自愈。

另外，弹头（尤其较近距离，夜间呈火点）相对（比炸伤）“无菌”。但那时无条件验证，看来，现在搞清是很容易的了。

以上，是未经扩创而自行愈合的实际情况，但遇下列情况，必须手术扩创，即扩创适应症：

重伤：枪伤期间，还有……种控制……枪（即“上

者，……等。

但也曾体会，入口周围有出血区及很窄的挫伤带，也无何可切除的。（但那时对清创的认识及彻底性均不如现代，是应接受的经验）。

## ②为何 6.5mm 枪弹也能重损伤？

损伤的程度，“不是决定于绝对动能，而是决定于枪弹在组织中穿行时传递的能量，取决于枪弹与组织相接触的面积”（见于《军事医学分册》1990. 第4期164页。下同该材料）。

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工业尚很少，武器主要来自战利品和过去收缴的老武器，如：连来复线也磨平了的老七九、老套筒等，这些旧枪不伤则已，伤则较重，因一是弹头粗大；二是枪弹穿行，与组织接触面积增大且不均称，故同样的功能，破坏组织严重。入口相对大，出口则更大。（我们见过用七九马枪枪毙犯人时，几乎将颜面都给损毁。还看见过枪决人犯之前，将6.5mm子弹，在粗石上蹭几下，使光滑的枪弹变为粗糙，也因穿行时与组织接触面大，而增大对组织的破坏力。）

“小弹径枪弹（指5.56mm）不稳定，在组织穿行传递更多的动能。大部分动能，向伤道四周传递，因此杀伤作用增大。特别在近距离枪弹伤，因为枪弹在组织内以较高速度穿行时，形成瞬间空腔，引起组织器官结构和动能的巨大变化。”

5.56mm枪弹飞行速度增高，但是由于它的质量较

轻和‘翻滚’，使它的穿速力小于7.62mm枪弹，因此常常造成盲管伤。”负伤时的体位，对诊断参考价值较大。

“……由于各组织和器官的密度不同，使不稳的枪弹向各方向偏转”，我想这种情况，不同于我叙述过的‘流注’问题，取起子弹来在无X线设备的前沿（兵站医院）也是困难的。像1942年秋我42团护士长张文江同志的臀部枪伤，弹道长而扭曲，扭曲的原因，是因臀部组织器官（直肠、髌骨、臀肌等）的结构不同之故。

“四肢枪弹伤时，伤道中段和出口处损伤最严重，皮肤出口比入口大10—20倍。血肿常常沿着肌肉间隙扩散。……长骨粉碎骨折和断端严重错位。……骨片常常成为二次致伤物。”这种枪伤就是很易发生神经性休克、变化极快，刚才还好，片刻后死亡了。我们军医，对这类伤员要特别重视抢救，必要时专人护送去兵站医院。我认为只机械的规定红、白伤票还是不够的、会误事的。

### ③关于炸伤问题——

我军的各种炸伤，从来比重较大，包括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平炮野炮弹、枪榴弹，但最多的是手榴弹、地雷炸伤。

手榴弹也是我军自己能较大量生产的武器，而且数量能成批制造，甚至在抗日战争步枪很缺少的初期，在



“百团大战”前，刚入伍的新战士，曾有一段每人只背一把梭镖（即双刃的长匕首，按在长长的木柄上）、四个手榴弹。但无论那种炸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以自己的引火装置辐射爆炸，来杀对方。所以，伤时的体位，不同于来自一个方向的枪弹伤。

各种炸弹，都以其自粉碎的弹片来直接杀伤对方，而且杀伤的程度与自身动能（爆炸力）大小和弹片的形状（钝锐）成正相关。所以，1938年夏三分区修械所自制手榴弹，仅能爆开两三瓣，杀伤力当然小，至1943年继黄色炸药的制成和成功的使用雷银雷汞做雷管，爆炸粉碎力大大提高，故杀伤力也随之提高。地雷也同样，尤其发动群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东西作雷壳（如石头、酒瓶等等），开始也是雷管问题而爆炸力不强，后来逐渐制造的生铁雷，则是很厉害的武器。相比之下，日本鬼子的无柄手榴弹，弹壳上有许多井字形的小方块，爆炸后杀伤力也很大。后来，我们将缴获的小日本的“小裂瓜”手榴弹，为使其发挥更大的杀伤效能，发明了枪榴弹筒，即每个战士除步枪外，还腰系一个“小炮筒”，使用时按在枪口的准星前后，和步枪一样瞄准目标击发，使“小裂瓜”引发“链锁反应”，远远地抛向目标——爆炸，就这样使人力仅能最好成绩抛出60米的“小裂瓜”手榴弹，一举提高到200米，犹如医生用的听诊器接长了耳朵一样，使本来只能贴耳听诊，通过管子可以延长到1.8尺或更长。

后来，在1945年反攻前不久，又用这种原理，发

明了60小炮（掷弹筒）发射的“飞雷”，曾向灵山敌人据点使用过一次，把鬼子吓坏了，他们说“八路的有了大炮”，实则是用器械抛出的地雷而已。

然而，无论枪榴弹、“飞雷”都曾发生过炮筒爆炸事故。

地雷是我晋察冀军民都会使用的武器，可使敌人闻风丧胆甚至寸步不敢行。但也曾发生过踏响地雷或制雷者自己的爆炸事故。

所以，炸伤是短兵相接与枪弹伤同样好发的伤种，我军对炸伤的处理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它丰富了战伤治疗的知识，成为戎医生涯的重要组成。

它与枪弹伤虽同属火器伤，但它是由于爆炸而致伤，特异性感染（如破伤风）的伤种，有的弹片碰到质硬之物（如石头、小铁锨等），还可成为酷似“反跳弹”性质的二次致伤物。

凡是炸伤都意味着严重的污染创，都蕴藏着厌氧菌感染源，都具有很大危险性，必须扩创、清创。

其常用的处理方法及原则已在“流注”中及有关项下叙述过，在无X线设备情况下，很难取尽弹片异物，但我们经过大量的医疗实践，摸索出了犹如后来的棱形基底麻醉“三针交叉取弹片法”等好的经验，所以，炸伤治疗，是我“穷”八路战伤治疗的强项。

还有一种炮震致聋，声浪破坏了鼓膜，这种伤员多半有外耳出血，疗效预后均差。自然不必扩创。

#### ④刀伤、刺伤问题——

至于砍伤是很少的，仅在神仙山“山洞”医院中，见到由灵山附近送来的背部斜形砍伤，绰号“鬼子剩儿”，是被日本鬼子抓住的老乡，鬼子处决后，该同志虽伤很重，连棘突、背肌、骶棘肌等都砍断了。但无进入脊髓和胸腔，所以，他白天装死，夜间逃出被送到我第一休养所治疗的。

刺伤（即刃器伤）有一些，也不多，例如：前述之我二团贾指导员，战斗中被敌人连刺九刺刀，活过来。还有1940年冬反“扫荡”中，宋家峪一乡亲，被刺数刺刀，主要一刀是刺破胸腔，形成张力性气胸，最后窒息而死。

但有许多机会，我们却见不到刺伤及刀伤，因为，这些伤员，都是在白刃战中负伤，死亡率高，或者是日本鬼子集体残杀我边区人民，生还的机会很少，故而少见。

关于刀伤敞开者，反较易治疗；多数情况是盲管刺伤，有入口，无出口，特点：入口小，创缘完整，但血肿相对多。治疗起来仍很棘手，主要视刺伤部位、深浅、损伤的组织和器官而定是否扩创手术？我们见到者，大多已超过六小时，很少遇到新鲜伤，所以“初期缝合”的机会等于零。

其治疗原则：消毒包扎、扩创、清创、初期缝合、

引流等均同其他战伤。

以上，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我们与苏、美各国的战伤异同点；是我们在无“洋”设备情况下治疗战伤的实践与体会。不过，我感到现在步枪是自动半自动的，比过去的要进步得很多，但枪身较65步枪（即三八枪）要短得多，加上刺刀也没过去的枪身长，假若还有遇到白刃战的战斗，我们可能要吃亏的。供广大读者——尤其军医同行参考，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信息与梗概材料。

## 第九章 驰聘晋、察、绥战场的日子里

当时战史概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结束的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歼敌47万人解放了全东北。它是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最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从而使五年左右夺取全国胜利的预期大为缩短。

“10月举行太原战役，……12月上旬转入围城休整，1949年4月24日攻占该城，整个战役，我军共歼敌12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卅八年的反动统治。

“11月6日开始，12月16日中央军委为稳住平津之敌，进行战备休整，开始政治攻势，争取了万余名敌军向我投诚。

“1949年1月6日—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的），全歼敌55.5万人，是三大有决定意义战役中最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

“（自1948年）11月，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自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我军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北平古都，共歼灭、改编敌52万余人，是三大有决定意义中最大战役最后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分三阶段（290页）：从11.29——12.20遵照军委

对平津张地区敌实行“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原则，华北第2、3兵团和东北先遣（第2）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等地，切断敌人西进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入平津和津塘（沽）之间，先后占领通州、廊坊、杨村、军粮城、咸水沽等地，切断平津和津塘之敌的联系及海运南逃的通路，完成对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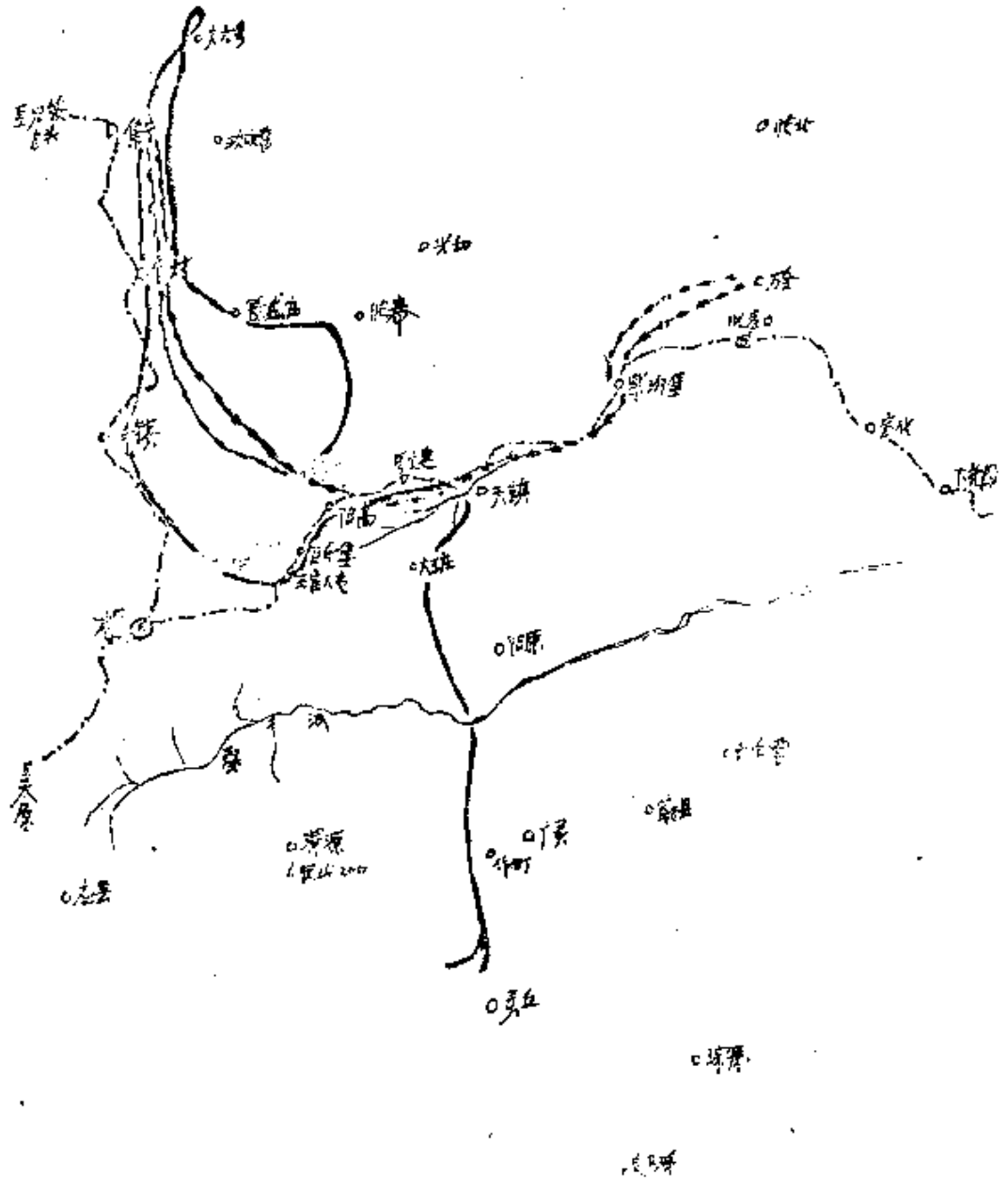
“12月21日—1949年1月15日，我军首先歼灭新保安傅系主力第35军两个师；接着歼灭由张家口突围之敌第11兵团所属3个师，1月14日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动总攻，经29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13万人，俘警备司令陈长捷。

“第三阶段：在北平地下党和民主人干的有力促进下，经过谈判，傅作义率领北平守敌25万余人，接受我之改编，……31日我军进北平，宣告北平和平解放，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平津）战役中，东北、华北两解放区直接用于支前的民工达150余万人，担架2万付，手推车20万辆，运送粮食3亿1千万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就在这1948年秋至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这段时间里，我院随冀晋部队驰骋转战在华北之平张、平（晋）绥、大同等各战场上交叉进行的各战役中，在晋、察、绥衔接地区的阳原、阳高、天镇、怀安、大同、丰镇、集宁、官村、大六号（察右后旗）、万全等地数次穿插行进。后来得知，这都是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

平張、平綏戰役征戰略圖

1948年1月—1948年(河套(通遼))



的指示，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需要而行军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在不太宽广的地域内，来回穿梭式地驰骋在晋察绥的地域内，走路之多是空前的。我亲眼见到和亲自经历与服务过的新保安战斗、歼灭张家口突围之敌孙兰峰兵团、追歼大同奔袭之敌、大同和平解放、绥远包头顽敌被迫起义，（大同 1.1 万 + 绥远 6 万共 7.1 万多人），就足以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了。

下面我拟分段加以简述：

### （一）在山西阳高大王庄和绥远丰镇的日子里

我院从灵丘下关和杜家河村出发，移防到阳原境内桑干河南岸揣骨町村待命，总院在河北岸驻防，我们曾数次经过颤颤悠悠的桑干河铁索桥到彼岸去，这座桥修建年已久远无疑，北岸桥头立一石碑，镌刻记载着修桥的经过、桥名及修建年代。这段河倒也不宽，大约 100 米左右，河的南北岸间，悬有大约五六条环环相扣的粗铁索，铁索上横置着无数的小木杠，既无栏杆扶手，也无桥间柱桩，桥至水面约高 30 多米，当年的雨水较多，混水汹涌澎湃而过。这个工程按现在水平虽不算太大，但也不是很简单的工程，能够保留至今说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样艰巨的工程还是为数不多的。

我们起码在桥上走过三次。第一次无经验，由于大



部队行军，加之牲口驮子也与队伍同行桥上，只要桥上有一人或一头牲口行走，势必引起全桥像波浪一样的上下左右晃动。由于我们的步伐不统一，所以刚举足时桥面突然降下去，正要落足时桥面又出乎意料地涌了上来，大家都感到头晕腿软，很不适应，不得已蹲在桥上暂静一下再走。但第二次、第三次过桥，已很迅速地适应了，由于过桥的人畜少时，可从颤颤悠悠桥面上跑过去。而民工和老乡们的毛驴过桥，则没有我们熟练，需要前拉后搯才能勉强拉过对岸。过铁索桥那惊心动魄的场面，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以至四十年后的河北省医院遇到谷方平同志（当时在军区卫生部医务科工作），一眼就认出是一同过铁索桥的战友了。

大王庄，这个村子很大，总院也在该村驻防，我院接收了部分伤病员，总院医务科刘信主任和延安医大毕业的王承文医生经常来院指导工作，我们在战斗空隙中组织了医务学习，在医学理论上、医学基础及新的知识等各方面得到不少提高，由于我有一把自制小提琴，王承文同志常常借去学习并和我交流演奏“经验”，所以渐渐很熟悉了，得到他不少的医学理论上的帮助。我们除了查病房、作手术、看门诊处理轻患以外，曾学习了宫乃泉译著的《战伤疗法》，我查了那时的笔记《医疗随录第一集》，可见在当时来自北平协和医院之刘信主任及在大后方学习三年医大的王承文医生是医疗上、特别是医学理论上的权威人士，受到他们的教益不少。王承文医生一直跟随我院指导工作，直到丰镇解放后才离

院。现经查原始笔记起码在以下方面受益非浅，充分体现了我军“边学边用，干中学，学中用”的良好学风。有：

四肢战伤（王讲）。在当时的水平是有指导意义的，虽未突破“四肢外科”的范畴，但质量有所提高；

托马氏架的正确使用。以治疗股骨骨折，比白求恩大夫的足踝牵引、绷带缠绕肢体的固定法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改进，实际等于现今的皮牵引疗法，上、下三块托布，粘膏足板其意义是非凡的，提高了治愈率和医疗质量，既能随时在牵引情况下“换药”检查伤口，又能准确无误地牵引固定患肢，又便于随时取消重锤（砖头、沙袋）将牵引绳固定在架子的W字形端处，便于转运和减少伤员疼痛。我认为时至今日在困难的农村条件或常规战争中，仍不失其实用价值。

腰麻与荐椎麻醉。前者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我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应用了，而荐麻是刘王传播的“种籽”，经过学习在膝肘位的体位上，在荐椎三角区开始实用于临床。现在有人称它谓“鞍麻”，只用于会阴、肛门手术。记得有一小战士荐麻后尿闭三天，经导尿处理才愈。当时还没有麻醉专业，无论浸润局麻、阻滞麻醉（腰、荐麻及臂丛麻醉）以及哥罗仿、乙脱（乙醚）吸入全麻均由外科医生操作。

植皮术，刘给讲了瑞文丁氏法，虽有某些不足，如以针挑起一个“小馒头”样的皮片，无论取皮以及受皮处都很难看，但它毕竟是加速大创面愈合的新方法。我

本人在建国后一开始就摒弃了该法而改用 Thirsh 氏法。这个先进的理论和观念是接受于 1948 年的，仍该归功于刘信同志。

蛋白溶酶疗法。治疗感染化脓的软组织创伤（刘讲），经查记录，起码我总结 6 例，疗效不著而中止。

还有，刘信讲的就地取材，纱、棉作无菌瓶塞的方法，虽简单，开启瓶盖亦符合无菌原则，老实讲并不次于现在洋包装的。

头部战伤是禁区，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都无所作为，但王承文讲了中央沟及前后中央回的表面解剖，对头部脑战伤的预后估计增添了新的知识。

我们八路军中的医生都渴望提高为伤病员治疗的本领，回忆起来这样的学习热情是宝贵的。在后来打仗的行军途中，我曾借王一本外文《局部解剖图谱》，只要战斗间隙稍有一点时间，就赶快抓紧用我国水墨画手技将我认为最重要的图谱临摹下来，如头颈、四肢等共 24 幅，与我麻纸本的功勋图书——《局部解剖学》相映生辉，更有利于战伤治疗。所画下的图不怕水浸、不褪色，至今仍清晰可辨，真可谓达到了我国古老文化为我战伤服务的古为医（今）用的目的。

总之，在紧张劳累的战斗行军途中，抓紧间隙自学、总结经验、不耻下问请教高明，渴望业务技术的迅速提高，是与我以往作日记和医训班的紧张作风分不开的，后来又加以发扬光大。这种主动自学的热情，我认为是对我军那些所谓无学历或学识甚浅的人的光荣美

德，是我八路军卫生工作优良传统之一，对我一生直至“离休”退出手术台后的余生中，仍有永恒的启发和激励作用。

我与王承文同志及刘信主任在1948年6—11月期间共同工作、学习、共同战斗及共喜音乐的短暂时间里，我们建立了融洽的战斗友谊，但自平绥战役中丰镇解放分别后，至今杳无音信，不知现在他们在何处工作去了。

## （二）交叉进行的平张战役与 平绥战役期间的辗转行动

1948年8月，第一次平张战役开始，我冀晋军区一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主要活动在平张段以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县属的王官人屯及聚乐堡一带。部队路经天镇，涉水淌过南洋河，经过长着秃矮的小杨树林的沙滩地带，来到平绥线的罗文皂站，继而来到阳高城西三里的织锦庄村，接收了数量不大的伤病员，很轻易地能够完成医疗任务。这期间我们不断在夜间进城看那老掉牙的山西梆子，王仲源医生还与我一同进城将我自制的小提琴摄影留念。

这一阶段，阳高、天镇本来业经我军二次解放，但大同城的敌人有时还出城骚扰。记得我二连住过阳高城西北的一座大庙的正殿里，我们随便铺点柴草于高大泥胎神塑之间，虽然都不信迷信，但睁眼就看到这些不会

动的巨型神佛，不仅在有月光映入的夜晚，即使白天在殿里仰卧休息，偶而也有寂寞不适之感。

有一天，我与王仲源医生一同进城去取照片，突见城内人们惶乱不宁，东奔西走的散去。我们迅速回到大庙，同志们已整队待发，这天我们终于躲开大庙，据《雁北大事记》记载是：48年11月3日敌卅八师二团团团长候颖杰率所部由大同出发奔袭阳高，侵占一昼夜。”这股敌人与其主子于镇河、田尚杰一起终被我军解决。

另外，“（9月）22日，驻大同孤山敌保安21团一个营到镇边堡抢粮，在二墩子村被我友军（一分区一团一营）袭击，毙伤敌连长以下70多名，俘敌119人”，“10月，大同闫匪军不断逃亡，从七月以来，我大同县政府就收容投诚闫军官兵144人”，敌人龟缩在大同城内，人心惶恐，士气低落。

同志们议论下一步可能往张家口方面进发，但事实是接上级命令：要我冀晋部队向绥远进军，协助三兵团打察绥。

我第二野战医院没有全部随大队执行任务，留大部于阳高，只派一个连随军区王平司令员出发西去，我院院长董兴谱老前辈是经过长征两万五的的老看护长，他要亲自随队执行任务，指定带我二连同往。当时由于大同尚无解放，铁路仍不通行，故仍须斜插山路西行，当时我院驻防阳高县老官坟村，该村地处长城之边，生活方式与人情风俗已完全是绥远地区的山村模式：住土房睡火炕，吃莜面、山药蛋，主要下地劳动男人承担，妇

女以衣、食家务为主和抚育小孩，就连死人的糊棺、画棺葬俗也似与山西内地不同，唯一的尚保留一座古老的庙宇。这里妇女的做饭高招是能搓莜面窝窝和鱼鱼，又薄、又好、又快，技术之纯熟，令人惊叹，还能用小案板、小擀面杖将面数次折叠擀出长长的面条，而我们在那样小板小杖加工那样大的一块面，显得特别笨手笨脚，所以，老官坟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记得，大部队顺山路及河沟西行，一天到达了官村，这里人民极为贫穷，老乡们连炕席均无，全家人全仗光光的热炕渡过严冬，当地人民尤其老人和小孩衣着破烂不堪，这都是绥远军阀傅作义长期统治的恶果。人民看到我们布衣陋服很自然地与我八路军精神上息息相通，军民关系很易打成一片。

两天后即可超越集宁，在一个黄昏继而夜幕降临的晚上，部队在敌人修筑的公路上小休息，王平司令员与作战参谋，借助手电微光察阅地图，调查响导方知前面村庄叫大六号，王司令员笑了，他说：“这个地方连地名也起不出来，到用数字几号几号作地名！”所以，对大六号村记忆较牢。

在绥东这一带活动几天之后，奉命南行，曾到过一个个刚刚解放的大村隆盛庄，上级指示，这一带还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准单独一人外出，尤其夜间外出必须二人以上，还要带武器，同时要注意群众纪律。该村较大，有集市，有铺面，白天有商业交易，但对我穷八路来说是无缘的，想买点什么，无钱，也不必要。

次日，果然路经一个叫张皋的村庄，竟还有几十名小股土匪骚扰我们，用不着派战斗部队收拾他们，仅以直属队的监护排就把土匪击溃了，还缴获了一些胜利品，其中有一具血压计，交给我们使用，这在当时是“洋”器械，经过学习，同志们很快掌握了听诊及手触测压法，又为伤病员服务多了一项新本领。

记得这时已秋后季节，粮食均已收拾完了，柴草秸秆还凉在场面上，早晚很冷，中午还是暖和的，战斗部队无去处，不少同志在场面上休息说笑和擦枪。部队接到解放丰镇城的命令后，立即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但当部队行至离丰镇 5 里的北面小村庄时，接到情报说“丰镇之敌昨日已溃逃”，我们在这小村及丰镇城内驻防数日，听候命令。

部队按命令经王官人屯特别阔气的富人坟墓，四角有石兽，有松柏，有石碑，，夜间回到阳高西北大庙。董院长住到老和尚有火烟的住室，我们大部分同志住在老和尚住室的这排厢房内，同样铺点柴草席地而卧。亲切的老前辈董院长，还将他的大衣拿来给我盖上，暖烘烘睡得很香。当天亮后一看，室内满布大牲口粪便，显然是喂牲口的地方，但稍稍打扫一下，仍是个很“悠静”的住所。

不久，又命令我们去集宁，几乎和前次一样，插山路西行，当天行军到官村宿营，次日到达集宁。集宁是第二次回到人民手中，这个地处平绥路咽喉的战略要地，十分寒冷，城廓极小，寒风刺骨，巨沙扑面，只有

桥东有个小小的稻香村饭庄，但我们穷八路也无缘惠顾，只能看看就走。我们住在桥西一家易县来此的买卖人家。心想，这个地方有什么好？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一个寒冷异常的小小的城市，我的大部生平却在这里渡过了。

还无站稳脚跟，还想好好看看集宁之际，又接到返回阳高的命令，基本上按原路返回阳高李元庄暂驻。

这些日子，几乎不停地奔波于山西、绥远及察哈尔三省的衔接地带，特点是：行军频繁而接收伤病员甚少；这么些天，记得只在张皋附近曾作几次手术，如截肢，取弹片及气胸伤员，还大多转往阳高我院。董兴谱老前辈由于自幼医务工作出身，对我战时医院工作领导十分得力，如：担架让我们自行掌握；对下肢重伤、伤肢是留是截都很干脆，不拖泥带水；对医护同志，特别对女同志十分关心照顾。所以，同志们士气很高，虽然每日行军也毫无怨言。

后来方知，（按《雁北大事记》）：“9月14—10月31日，晋察冀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发动察绥战役。我一纵队配合晋绥解放了绥东丰镇集宁与察北地区，控制了平绥线大部。10月10日（？）我收复集宁及柴沟堡以西绥远以东大片土地，除大同外，雁北全部解放。”又据《解放战争纪实》第304页有如下记载：“9月5日，察绥战役开始，为调动华北国民党军向绥远转移配合东北战场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和新组建的第三兵团



(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发起察绥战役。……23日夜,第三兵团在晋绥军区部队配合下,向绥东进攻,攻克了丰镇、凉城、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县城,27日攻克集宁,歼国民党二千余人,俘伊克昭盟少将警备司令李玉山,击毙骑兵第十二旅少将副旅长兼绥东警备司令王彬儒。随后包围了归绥城。28日,主力回返丰镇,卓资山地区由北平、张家口地区西援之国民党军第35军等十个步骑兵师。第二兵团乘机对平绥铁路东段发起进攻,先后攻克崇礼、尚义、沽源、商都等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团,迫使西援之敌返回张家口地区。第三兵团于10月12日挥师转战绥西、绥北,至11月初,攻占了陶林、托克托、武川、萨拉齐、包头等地,再度包围归绥城。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为抑留华北国民党军,以便就地将其歼灭,第三兵团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于11月14日撤围归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2.1万多人,迫使华北国民党军东平绥路上往返调动兵力,无力增援东北,保障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

这一段总的情况如此,就不难理解我冀晋部队在一块不大的区域内频繁行军走路,都是为了军委的整个战略布署的需要。但事实我军的频频调动,却为配合主力歼灭敌人2.1万余人造成条件,这可能即运动战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的一大不同之点。我们部队的同志们,虽不了解当时详情,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所以,上级指到那里就走到那

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像九月八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其结果是我们必然胜利。

### （三）绥远孤山战斗战场治疗的成败经验

1948年继11月离开丰镇之后，我院驻防阳高，我二连随战斗任务驻防前沿阳高西元村。

12月1（或2）日，我部队与国民党在大同残军在绥远孤山发生战斗，下来一批伤员，同志们照例忙碌了几天，除以往常规接诊及手术外，又在技术上有两方面的失败与成功经验，虽然都离不开过去的战伤医疗实践。在此之前，我们读了《华北医刊》创刊号，第71页有一篇主张“伤口延期缝合”的“先进”经验，文章指出：“凡在伤后14日无严重传染的微候，都可缝合，就勿须施行那种无味的敞开疗法了”，又指出“延期缝合……与伤口内撒布磺胺粉否无影响”，就按这一理论，我在孤山这批伤员中，在12月8日（伤后1周）选择了软部组织炸伤5例，作了延缝，这5例都有轻度感染，但急性期已过去了，将创面切（或剪）去成新创面，然后缝合。次日，由于战斗情况就转到分院部去了，但结果得知，除1例较好外，其余4例均化脓哆开失败。尽管我当时在《一集》上找到4个不愈合的原因，但基本的是延期数日至二周再缝合，这一主张实践

证明是错误的，建国后的长期实践中，对新鲜创伤经过充分而合理的清创是完全可得一期愈合的，然而这个“延期缝合”的主张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从此，我们不再做这蠢事，不久（1949年初）二月十日驻防阳高西元村时，我华北军区的后勤卫生部指示：“除头部、关节等在初期可缝合外，其他部分可敞开之”已否定了这个所谓先进经验。

这次战斗的伤员接诊总数已无从查对，但根据我《一集》上所记载的总结、观察性资料，估计伤员起码也在一二百人之多，这些资料有：

伤口延期缝合的试验观察（即上述之文）第71页；

（1）手术中的几点需记中：①怎样拆线；②器械与手的打结；③连续缝合的最后打结法；④取碎骨片（总结了须按碎骨大小考虑皮肤切口的大小与位置、手指腔内探察法、锐匙沉着取出法、骨尖的取出与处理、游离大骨片顺从创道的取出、取腐骨的时期愈长愈好，因那时与健骨已全分离等等。

（2）“全层一次间断缝合法”即截肢技术的提高与创新问题。但提高到成形、美观与否的高度还是多次的体会。

从“取碎骨片”是以往医疗实践的积累和体会。在当时无X线照片检查的条件下，采取文内所说。几项原则及方法仍不是多余、完全无用的经验。因这个经验是不同于创腔脓汁流注情况下的取腐骨。

还有24帧头、颈、四肢局部脉管解剖图，可能完

成在这一时期内。以及软组织提起器代替了二裂带，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总之，在这频繁行军而接受孤山战斗任务的成败经验中——以无 X 线条件下的取碎骨及延期缝合，占有较突出的地位。

#### （四）平张战役间隙医疗经验小结的回顾

这种性质的总结，也只能是小结，自然是在战斗间隙进行，但它却对下一战役奠定和创造了新的条件，从而使大同战役中有计划、有步骤、大面积推广先进经验和科研成果成为可能。但这个间隙也是艰苦而紧张的。

“1948年第二次平张战役12月开始”，我院做为军区的主要医疗单位之一当然是要参战的。记得12月中旬，将孤山战斗的伤员转往其他医院，我院全体奉命执行第二次解放张家口的任务。说起张家口，我晋察冀部队对其有特别的感情，即：1945年8月24日首次从日本鬼子手中解放后，不大的山城，在当时我解放区内仍是全国最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人们自然欢天喜地。然而由于蒋介石决心内战拒绝和平，终于在翌年10月11日又落入绥远军阀傅作义之手，傅还洋洋得意给我八路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去电讽刺，说什么：“败将傅作义又占领了张家口”来奚落我军，我军——尤其我晋察冀部队对傅恨之入骨，所以同志们对二次解放张垣心急如焚，一定要回击、教训傅作义，部队士气高涨，情绪激昂。

这一段中，记得我七分院曾驻过下花园附近的涿鹿县双树村，而且曾接收伤病员医疗任务，当时曾有总院派来的，自以为了不起盛气凌人的一位医生，但很快调走，由于作风专断，给同志们留下了不良印象。

我院是从阳高老官坟村于12月20日出发，曾在城西大庙内宿营一夜，又经两三天行军，到达万全县境的一个村庄，夜幕已经降临，村庄不大，部队很多，号不出房来，凡犄角旮旯到处是人。我连住在一二户老乡家，有人在室内，有人在室外，过道、牲口棚内都是人，记得这时月亮已出来，人们到处找毛草打地铺，我即抱了一点毛草住在院外一个猪圈棚里，矮矮的小“屋”，铺上毛草，跪式铺“床”睡入室内，头顶“屋”底，足露“屋”外，虽然已是严寒季节，但我们穷八路掌握着巧盖被窝的诀窍，眼望着皎洁的月亮，身上不觉冷，身下暖烘烘，赛过现今的沙发床，很快进入甜蜜的梦乡。起床哨响，睁眼已经旭日东升，迅速打背包送给饲养员处，开饭，出发，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征程。1982年战友高东拴、崔士歧同志来我家作客，高还提到我睡猪圈这件小事，然而当时诸如此类之事是很平常的。后来，院首长战斗间隙总结时，还提到这次宿营同志们克服困难的精神。

接着到达万全县，它位于张垣西北，是一个不大的小镇，但有几桩事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①有一个似是土岗，岗下有水溪通过，风景比较秀丽。岗上有个奶奶庙，庙虽不大，但泥塑考究，富有明显竞争的精神：以

奶奶的鼻尖、肚脐为中线分别由两班泥塑匠人来雕塑，可很明显的见到各自的技艺高低。有意思的是除中央这位送子奶奶外，两侧各有一坐位陪妇，竟是土洋、古今结合的服饰，上边是古代衣服，下面是近代鞋履，不是金面金身，而是两位近代的白面裙衩，不光赤脚而是足登一双在当时很时髦的墨绿色白云口带眼的鞋子，真可谓近代化的“奶奶”们了。这里虽然有我们的司、政、供、卫机关驻防，但仍有虔诚的信女去烧香求子，有时香烟缭绕。我们当兵的年青人反正也无去处，不断地去看“奶奶”。两厢的壁画，各有千秋，同样可看得出那家画得好！

②我们房东家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耳聋八听，还每天拿着活计到我们住的炕上盘腿纳鞋底，因为这个屋是她的住室，我们在炕上工作，想和她谈点什么，她却胡打听，后来干脆各干各的工作吧。见到老太太拿着拙笨的工具和繁琐纳底“工序”，使人不可能不目眩头晕，老太太右手腕上缠着一块用旧鞋帮做成的护腕，左手持着很厚实笨拙的鞋底，右手持锥用力的锥呀锥呀捻转动作，好容易锥透一个针孔，拔呀拔呀费不小劲才拔出锥子，放下锥子，将纫好一根长长绳子的针认进针眼，将长长的绳子一圈圈绕在手腕的旧鞋帮上，吭吭嗤嗤才将绳子拉“紧”；又放下针，拿起锥子做着前述同样动作，所不同者，当拉鞋底反面绳子时，不用旧鞋帮，而是改用一个约20cm长的小擀面杖，缠绕那长长的绳子并同样费力的拉“紧”，……如此一针针地反

复操作，哎呀！我实在看得太着急了，就想将我们“大生产”时所熟悉的方法传给老人，我告诉老太太：“你这纳鞋底方法太费劲了，而且还拉不紧，不结实，我们老家纳鞋底，根本不用小擀杖和保护手腕的东西，就用一把针锥和顶针就够了，而且铛铛作响，来来来！我纳两针你看看，又快又结实，老人听不进，也不肯放鞋底，照例操作不止，无办法也只好由人家自行决定去，只好忍耐的各操其事了。不看吧，长着眼睛；看吧，天哪，这种急死人的慢节奏，实在使人头痛死了，幸亏那时年轻，要是现在，肯定血压早就升高了。这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烦恼，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之一吧！老太太辛辛苦苦地纳了半天，也不过松软的两三行而已。后来得知坝上塞北地区，不仅年过七十的老太太是这样纳法，年轻妇女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她们年青有力，动作比较麻利点儿。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即：想干好一件工作，应该快速度；慢腾腾≠质量好。我曾和我的下级、同事讲述过“老太太纳鞋底”的“故事”，从而联系到医疗质量一定要好，但还不能慢腾腾的工作，要干出又好、又快的工作量来。

③记得在此驻防期间，张家口已经二次解放回到人民手中。相当于平津战役中叶，按《解放战争纪事》第335页记载有：“十二月22日，……当日晨，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经十一小时激战，全歼傅作义的精锐部队第35军军部及两个师。23日，华北第三兵团

及东北第四纵队，对向北突围的张家口之第十一兵团共七个师（旅）展开堵击、追击，当晚收复张家口，战至次日将第十一兵团 5.4 万余人歼灭于张家口东北地区。”

在万全驻防的几天中，我利用平张战役间隙总结了些材料，特别是本月初接收 100 多名伤员的医疗经验（《一集》66—80 页），成文时间是 1948 年 12.25—30 日万全县。有：

1) 试打“石膏绷带的疗法”，虽在抗战时期已打过石膏，做为强有力治疗战伤的石膏模疗法（及接着使用的阶段石膏绷带疗法，以治疗关节畸形）。

2) 对基本的手术操作如：手及器械打结、拆线、连续缝合的最后打结等，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3) “破伤风的两个疗法”，即：A、哈伯列尔氏疗法，犹如现今的麻醉环，几种药物交替使用，该方法虽然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可惜我们当时不可能有 TAT，而且又须有每日脊髓腔内注射，在动荡不宁的战争情况下是困难的。B、正定韦家祖传秘方，即斑螫鸡蛋疗法，经实践照样死人毫无用处。

4) 记录当年 6 月刘信主任的“瓶塞作法”、“蛋白溶酵疗法”及眼、中耳炎二疗法等，完全是向别人学习的间接知识。

5) 最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新疗法专号》等材料，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体验到新疗法好，然而却拿不出系统经验来，其根本“症结”是：没有登记、统计，作的再多也拿不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从各处搜集先知之长



注意的不够。已想到了把大家组织起来，实验、观察体会、学习的执行新疗法，成立组织，首先是人命关天的抢救组织，集中伤员便于推行及观察，统一工作规范，建立登记、统计，推行那一种要根据“看什么伤种多的实际情况”。当时我已想推行：磺胺乳（及粉）用于战伤治疗、延期缝合、石膏模、8字或褥式缝合（以消灭创腔）等项目。并在不久后的大同战役中获得优异的成果，为我本人留下了唯一“大”数量的技术资料。

当时，虽未想到这就是科研方法之一（通过病例治疗，总结治疗经验），但这一组织大家共同探索的想法，是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只有依靠、相信群众，并把意图告诉群众，统一我们所有医护的认识、步骤、方法、目标，通过实践，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伤员疗效，去比较、寻找最为优越的最佳治疗方案，这无疑是符合唯物辩证的认识论的，而且将其精髓指导我终生的医疗实践，因为它是不分军队或地方，不分党群，不分我军伤员还是敌军伤兵，也不分其政治信仰如何，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凡医学科学工作者，凡军医，我相信谁也跑不出这个范围。

我当时是二连住连医生兼副连长，也就是我一后四分院二所的主治医生和副所长，所以，欲想达到我前述大面积推广某种治疗计划的目的，就产生了必须组织群众，如何更好发挥技术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大小“领导”、“带头人”，都必须掌握这样的基本工作方法，这

要比单纯宣传领导、争取领导的方法更为有益。

### (五) 科技丰收的大同战役

当时处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平津、淮海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顺利开展之中，捷报频传，今天打下沈阳，明天攻克营口，今日歼灭新保安，明日解放张家口……，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正像《大事记》及《解放战争纪事》说得那样“（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以6.9万余人的代价），歼敌47万人，解放了全东北。……（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有重大意义），从而使五年左右夺取全国胜利的预期大为缩短。”这时华北国民党军大的敌据点已所剩无几，往西只剩归绥、包头，往南还有大同、太原，敌人如同蝇拍下的苍蝇，我们挥拍打了这个打那个，总之，凡是苍蝇，都在我们必打之例。我解放区军民士气高昂，而敌人沮丧，例如大同士兵纷纷弃暗投明，跑出城外向我投诚，它的头子于镇河、田尚志举棋不定垂死挣扎，企图逃跑太原或归绥，当然我们不会答应。

我院在柴沟堡过1949年元旦，这里虽然气候严寒，冻手冻脚，同志们还是在这个有土围子的小镇内串门聊天，但谁也不知下一步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突接到打大同的命令，日期肯定在一月十日之前，由柴沟堡急行军经天镇、阳高、聚乐堡、王官人屯到达大同城西北方十五里铺村。出发这天气候特别恶

劣，我院全体男女在寒风刺骨、大风弥漫中出发南行了，狂风呼啸，巨沙扑面，尘土迷目，可见度范围极小，同志们一上路，即被这恶劣气候打乱了我们整齐的行军队形和大小休息的惯例，前进一步和呼吸都很困难。由于我们的装备与抗战时基本相同：每人一套棉衣、一顶棉帽，连以干部增发棉大衣一件，甚至连内衬的毛衣也没有，御寒能力极差，寒风刮来好似，耳鼻、下腹自感冻得已不存在了，扪之尚存，知觉丧失，这样的狂风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普遍掉队，尤其女同志，我与炊事员郭山同志一同掉队了。

我们与东北入关的部队同路南行，得知他们也是奉命去大同战场的，见到人家人人都有大衣、有皮帽，心甚羡慕，均深绿色军装，装备整齐优良，心想如果我们也有这种暖和装备就太好了。后来，听说举行北平西直门入城式的，就是这支装备优良的部队，好让北平人民看看我解放军的雄姿。

与郭山同志相伴南行，见路旁一个土洞，进洞稍息才觉得温暖些，打起精神继续出洞南行，被大风吹得趑趄难以成行，我想这风起码在八级以上。当天我俩住宿在沿途（可能阳高境内）一个小村村边的老光棍家，无被无褥，只是热炕就太幸福了，夜间村长领我俩分别吃派饭，热腾腾的稀粥加酸菜，仿佛比饕珍佳肴更好吃的上等饭菜了，饭后全身暖和，只是耳鼻手足都冻得痒痛了。与老光棍同炕熟睡一夜，疲劳恢复，次晨，吃派饭后，开欠条交给村长和老乡，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狂风

已停，太阳露面，见到天寒地冻的闪光的冰霜，与老乡辞别后又上路了，路上不断遇到三三两两各部队的男男女女，不用说，这些同志都是掉了队赶部队的。

我俩晓行夜宿一日二餐，连走三四天，已超越了阳高城，大约相当于聚乐堡附近的铁路沿线，在低凹处有个小村，找到了我院，很是高兴。已经几天不盖被子了，这天洗洗脚，擦擦身上，睡在自己的被窝里，真有说不出的格外乐趣。记得接着院部移防阳高西元村，又派我二连由副教导员王作益带队，我连随部队到前沿执行任务。

其实，早在（《雁北大事记》载文）“1948年11.24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奉命率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雁北军分区两个步兵团和雁北部分县大队及晋绥部队约4万余人，开赴大同，在口泉、云岗、孤山设有重兵，阻敌向绥远逃窜”。这次大同之敌破罐破摔死挣扎，出城骚扰，遇到我军区部队的严重打击，弃尸狼狈逃回大同城内，其中还有30来名敌人伤兵与我军伤员同时送来我连医疗，次日即奉命将敌伤兵送回大同，以瓦解敌人。

十五里铺距大同40里，在此驻防四天，老乡们吃穿困难，甚至连火柴也并不富裕，贫穷得很，老乡们很易和我穷八路搞好团结，和偕相处，说城里的国民党是灰鬼，不断出来骚扰，不得安宁，八路军来了就好了，甚至鬓发银白的房东大娘连他儿子不孝顺的家务事，也

和我们述说，可见新区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这一点非常重要，谁能取信于民，谁能取得人心，谁就能够胜利；否则，武器装备再好，城防工事再坚固也要垮台的。我们在十五里铺严阵以待，突接命令北移聚乐堡，次日（1月11日）下午部队出发移防了，房东们都相送惜别。房东大娘还将陈志忠、我二人送到村边，叮嘱以后来村一定来家作客等寒暄语，可惜，自此再无到过该村，大概老人也早已谢世了吧。

我连奉命由聚乐堡来到大同西部三十里铺，打仗的气氛更加浓厚了，我以主治医生副连长的身份，找看护长李来全商量这次接收伤员的具体布署与计划，即在十多天前在万全拟定的推广与总结新疗法等，均取得看护长的支持，并为了及时通气，要建立每天上班“换药”前讲话等。

“1949年1月13日，上午固守大同的闫匪军38师师长田尚志率顽军一部，分路向牛家堡、五千户、卅里铺抢粮，被我围城部队击退毙伤敌304名，俘敌318名”（《雁北大事记》65页）这次被我前沿部队将敌人，打得焦头烂额弃尸鼠窜回城，不要说死的了，就连活着的伤兵都扔掉不要了，还是由我军打扫战场的部队一同收容回来，送来我连治疗，当天就送来150名左右伤员，在还不知要接收多少伤员的情况下，我们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医疗工作，主要依靠我和陈志忠医生二人，一个看护排（30多人）的基本力量，来承担人少任务重的医疗工作。主要有：

①建立了三重领导方式，即：医生→护士组长→护办公室，医生以此方式推动工作，护士组长都是德才均好的同志担任，我们让组长们做一些较护士更重要的工作，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一些常遇到的问题，如“换药”、褙包、调房、登统等，只要合乎新疗法的原则，就让他们大胆去作。当然护办公室也可在医生意图下调剂病房等。这样做的结果是：启发护士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好的经验，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总比一两个医生要大得多。同时，医生也省力不少，有精力使疗伤的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比单纯“下命令”要好得多，顺利得多。这实际是组织与发挥技术的问题。

②上班前讲话：每日早饭后上班前，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到，尤其“换药”组长、护办公室的同志必须到护办公室集合，有值班班长（如马贵乐）喊口令整理队伍，请主治医生讲话，将工作计划当众宣布并分配任务，要求属于谁的谁必须完成，有困难和新的问题可及时报告医生，当天分配的任务要求当天必须去做，如：我们为了推行磺胺乳的疗伤先进方法，就必须将其适应症、使用方法、登统格式加以说明，又为了观察，随手术将使用磺胺乳的伤员适当集中在一起，当时称为标准试验病房，既方便治疗，也方便统一认识和总结。

讲话利用时间极短，因为等于战前下命令，不能罗里罗嗦占用宝贵时间，所以，真正做到了利用片刻布置、检查与奖评一天的工作，今天做点，明天做点，天

长日久成果可观，而且使医护间增进了解形成统一认识与信念。可惜，当时我说得多，而让看护长、陈医生等同志说得少，没有更多的发扬技术民主，让医护群众多说话。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病房行政性管理，也适合医务学习，如讲“怎样拆线”？弥补了无暇上课的缺陷，达到更密切的学用一致，学了即用的战时目的。

多少年来继承下来并把它发扬光大，说明它是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我们首创，后来推广到全院各连效仿。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发展成后来称之为的早会、晨会制度，可更好的发挥（军事）技术民主、上下通气，体现集体办公制度，创造了一个雏形形式，这对加强组织纪律性有辅助作用，因不仅可奖优也可评劣，是节约时间，适于战时（也适于平时）、适于业务指导，也适合政治思想教育的好形式。

至今仍有不少军队和地方医院保留早会制度、集体办公制度（即周会），说明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③有秩序地调动（剂）病房进行病房管理：在战时过精细的分类住院是困难的，但为了抢救重伤员，方便医疗和护理，按战伤的类型、轻重、传染与否分别住院是对伤员利益大有好处的。很多情况接诊组也不可能做到有条不紊，尤其成批伤员、密集来到医院时就更难做到，需要事后有计划地逐渐调整。

我们的方法是：医生必须与看护长、各“换药”组长、手术室担架组长，共同先看房子，编号，计划好那个院子（编号）、那个房子（病室）打算住何类伤员。

当然希望一次接诊就住得合情合理；否则，看护长可以按医生的意图加以调剂（搬病房）。手术室担架组长（即接送手术患者的组长），对合理调剂住房很起作用，他可按医生的意图，在手术后将伤员按类送到应去的病房去住，既不额外增加搬病房之麻烦，又可顺便调剂病房至合理。具体是：他可代替手术医生写一（命令）吩咐：住几号院、吃何饭（普食、特食）、抬高患肢、患肢制动、观察四肢末梢、冷热罨包（冷热敷）、隔离（传染病如破伤风、败血脓毒症以及濒临死亡的重患）等有关事项，他将术后伤员送到指定病房去后，将吩咐单交给护理组执行，并去原病房将他的物品取来。

医生在战伤治疗中起指挥员的作用和战斗员的作用，就是他亲身给伤员作手术、处理伤口、固定伤肢以及亲身“换药”，同时他又是指挥战斗的司令员，所以他在军医院的位置及重要性自不待言，因而他有权在“命令簿”上下命令，人们就要遵照执行。这实际即“医嘱”制度，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词，自然医嘱制度也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医生手术或巡诊病房，吩咐看护组（即护理组）做某种治疗或护理，就成为当然的名正言顺的了。所以，医生决非单纯的执刀者，而是真正保护伤病员利益的战士，同时又是指挥全盘战斗的指挥员，使战友同事，可以按照自己的又经过商讨的计划，去大面积地推广先进医疗经验，总结成败心得体会。否则，只光棍司令一人，在人少任务大的战斗环境里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



我认为一个连（所）的管理工作，重要的在于医生和各护理组间，而非护办公室。所以最基层（各号大院）护理组医护团结，工休团结，医疗疗效突出就是一个所的最重要的基础，连长、指导员就可大大省心了，否则，做好全连的政治思想及行政管理谈何容易！我们当时不懂得什么护理单位和“医嘱”制度，但是我们通过屡次的战伤治疗，就慢慢地有了一套得心应手的战时病房管理方法。

④按照及时总结医疗成败经验（即当时的试验经验），找出成功和失败的教训，那怕不准确的问题也应提出自己的认识，并确实奖评好坏典型，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程序，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的物质奖励，关键在于对工作成果的赞扬或批评，这是我军不同于任何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事实仍应以正面教育表扬为主，但失败之处不是不提，而是必须提出以作警戒重犯。

我由从来没有行政工作经验，至能做些组织群众工作，并得到战友及首长的好评与支持，使战友满意、医护满意、伤员满意，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的战伤医疗工作，提高了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和行政组织能力，其结果，必然是组织同志们更好地发扬技术民主，更有效地发挥技术功能为伤病员服务。当然我是主治医生副（连）所长，有权这样去做；否则，我有此意，无条件组织也是无法实现的。要实现，就必须向首长宣传，主动争取领导，使之支持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碰上不虚心或和你做对的首长就无法实现本是正确的意见了。

我们在经验很幼稚的基础上，在战争环境下，自发地利用这些方法，并在翌年——1950.10.10日绥远军区首届工学代表大会上做典型报告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就非偶然的了，这些方法与后来（1951年三分院刘贵平院长）的集体办公和早会、医嘱制度很吻合，而又有其不同的战时特色，也是引以自慰的。

另一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敌军伤员的问题：对待原来百般凌辱我们的日寇伤兵，在上册中已经提及。如何对待伪军或国民党军的伤兵，我们基本是优待俘虏，与我们自己的伤员一视同仁，实行人道主义，决不歧视或虐待放下武器的敌人，这是党的一贯政策，一个已经取得伟大成果的英明政策，如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及我军中无数负过伤又参加我军的解放战士。固然，他们原来给敌人干事是很不光彩的，尤其是给日本鬼子摇旗呐喊为虎作伥的人，抗战时期并非一个小数目，而是1, 186, 695人。如果没有伪军，单是日本人撒胡椒粉也不够啊！他们为敌所利用，为敌杀中国老百姓，是中国人首要的人格品德、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情况有不同，很多士兵是敌人抓壮丁被迫为敌干事的，对于“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有良心的好人，我们不但不能埋怨他，还应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我做为八路军的医生，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我藐视、憎恨为敌伪干事的人，做人何要给强盗野兽干事？然而对被迫为敌干事的寄予同情不加责备。

在大同城郊给我们送来的三十来名敌人伤员，我们

同样查房巡诊，同志们都说这些人特别“老实”，不提意见，不喊痛，但很快奉命将他们送回大同，他们将会成为我军的天然义务宣传员，成为我们瓦解敌军的喉舌。

⑤我们在1月13日以后的战斗中，接收了大批伤员，我和陈志忠医生常规接诊与手术，并运用前述强调的几个工作方法，仅在15日—25日的十天中，就有“不小”的科研收获，可谓科技丰收，在我一生从事医生职业中，也是屈指可数有数的几次科技大丰收。简述于下（均见《医疗杂录第一集》）：

(1) “这几天的手术所遇”一文（86—88页）：总结了：一个局麻处方，U字缝合不适于成形（当时还叫不上U字）；8字缝合的拆线法；截肢切皮同时将肌膜切开即退缩了，退缩平面切骨，适宜缝合残端；环切皮办不好；上驱血带的体会；减张缝合；结扎鞘内血管的体会；腰麻体会；土制蒸馏水法；磺胺乳用法……等等，成文于1月22日，即战斗后仅9天时，其及时性和全面性，自然一目了然了。

(2) “麻醉为何出危险？”（85页）成文更早，在战斗后的第三天（1949.1.16），是记录15日、14日两天手术中，有三名开放吸入全麻的伤员术中休克，幸急救及时措施有备，方免死人，总结认为原因有三：手术室内温度太低；哥罗仿是否变质（该药本身对心脏毒性很大，早已废弃不用）；皆重伤员，术前查体不够。我们立即纠正消除以上三因素。

(3) “腹膜炎的饮食心得” (88 页), 写于 1.25, 记载了腹部贯通枪伤的董金志同志, 他 13 日负伤, 25 日死亡, (泛发性) 腹膜炎是肯定的, 进食不能, 死前四天只能饮用冷糖水。以现在水平看来, 这些处理都是愚昧的, 但在还无进入腹部外科行列时的医院, 用一切方法为伤病员延长生命服务, 是无可挑剔的。

(4) 进一步总结了“动脉结扎了, 为何还出血?”一文 (84 页), 通过下肢炸伤曹长庚、顾凤祥和一位腹部盲管枪伤薛兰亭等伤员, 三位伤员不同情况结扎股动脉后, 还有不同量及色泽的出血, 我分析了伤员结扎动脉后出血的原因, 提出了究竟从那里结扎为宜的意见, 以及结扎中要注意的操作事项。及时刊载, 引起许多同行来院参观交流经验相互学习。甚至同年 (1949 年 10 月在集宁) 我身处不白之冤挨批斗的逆境中, 竟然也有刘耀华等在李振智主持大会批斗隙中, 向我求教, 我虽身居矮檐, 但为了伤员的生命, 我振作精神尽情介绍。我当时不认识他们, 但得知他们是为了活着的阶级弟兄的生命在向我请教, 所以, 我毫不介意他们在批斗我时说的什么。

(5) 还记载一个 (82 页) 动脉注射失败例, 这种治疗是将药通过 A 直接达到患肢末稍病灶的先进方法, 以治疗冻伤, 足趾坏疽等。

这例是我连一位小炊事员, 足患冻伤, 因室内太冷 (室温太低) 而血液立即凝固而失败。后来由磺胺药 (如 S.D) 直接从动脉径路给药, 发展为高张葡萄糖液,

经股 A 注射，以促进血压迅速上升治疗休克，直至现在（如保定偏瘫康复医院）仍有人经颈 A 将抗凝溶液，血管扩张药直接经股动脉送入病灶，其疗效远较经静脉注射，转一圈才有微乎其微的药物来到病灶的方法要好得多，所以至今仍是未被淘汰的先进疗法之一。后来无论部队还是地方医院曾广泛使用此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6）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首次大面积推广某一先进经验的临床观察总结报告，原题叫“10 日来磺胺乳试验结果”。

我们为大面积推行此疗法，专门成立了标准试验病房，将凡新鲜战伤适应磺胺乳的伤员，相对集中在一起，以便于统一治疗方法、观察、登记和总结，这个极有意义的科研工作，是由当时看护班长、手术室护士，我的最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史正明同志等完成的。虽然病例有限，共才 46 例，但在我军医院的战时农村环境内，还是首次，诞生是不易的，我将它视为我本人科研之始，是我戎医生涯中现存数字最“大”唯一的一篇宝贵资料（88—90 页），治疗对象是一月十三日大同城郊战斗的伤员，从 15 日开始至 25 日治疗十天的总结。

当时的统计结果是：实行 S.N 乳局部治疗总数 46 例，轻度化脓而肉芽好者 25 例（54.3%），未化脓而肉芽好者 14（30%），化脓（失败）者（15.2%），化脓百分率为 15.2%，

我总结了该疗法成功之点在于：

凡用 S.N 乳者，无论化脓与否肉芽都很好（颗粒性组织新生），此也与创伤之新鲜有关，13 日战斗，14 日接收完毕，15 日开始使用 S.N 乳；

疗效好坏与切除、扩创彻底与否成正比，如田志明创面还有坏死现象，但切除彻底，差不多一期愈合；而张振东、程兆禄创面似乎“很好”切除姑息，结果意外的化脓；

与营养状态似不密切，（如田志明身体很弱），或是次要的；

S.N 乳适于大的创腔深的新鲜创，即或化脓，肉芽多半良好；

S.N 乳用前先振荡或用消毒探针搅拌一下，若欲手术缝合，最好先穿线→擦血→倒 S.N 乳→缝合打结。否则，S.N 乳随血液而流出，有名无实。

节省药品，46 名伤员 = 4 名伤员用 S.N 粉量。

不成功的一面，有：

对浅表良性肉芽创面，反不如用 S.N 粉效好，因其可很快干燥结痂愈合；用 S.N 乳延长结痂日期的李如山，因油剂妨碍水分蒸发使结痂不易；

S.N 乳好沉淀；化脓者是否消毒不严或手术室内人多走动，尘埃飞扬是否污染？以及与葫麻油有关否？

扩创勿姑息的原则一般是对的，但切除多少？还是一个问号。

从本节所述，不难看出病房科学管理及战伤治疗本身，仅仅十来天，我们这个医护集体所做的工作，可以

说是硕果累累，在我戎医生涯中大同战役占有显赫的地位。

记得重兵压境，攻下大同当是不成问题之事，但接中央军委命令对太原、大同都采取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迫其投降。我们与敌相隔三十里之遥，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卅里铺过的1949年春节，工休人员改善伙食，轻伤员集体会餐，我们组织医护同志给休养员端盘子，工休关系空前密切。但不久，我们奉命先后回阳高县西元、织锦庄、李元庄驻防，去后很快接收来自平绥路东段转来我院的大批新保安伤病员，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4月24日，天镇县敌保警大队队长候凤凯，保安十三团副团长李克栋等残敌骚扰浑源、广灵，被两县公安队员及民兵包围，敌被迫投降。”（《雁北大事记》65页）“大同敌军曾试图从孤山方向打通逃往绥远的退路”（26页），卅里铺战斗后，按王平司令员指示，把俘虏敌副团长放了回去，几天后又将全部俘虏放回，促使敌人思想混乱动摇，政治的作用很大。

大同之敌，早在“1949.2.3日，在我军四面包围之下陷于绝境，敌城防总指挥官于镇河，卅八师师长田尚志（按解放战争纪事376页是二七五师师长），行署主任孟祥祉接受我方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同的条件，（我方谈判代表指出，你们只有投降一条路而不是起义），4月27日大同敌军被迫与我讲和，29日第二次和谈成功，解放军进入北关。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敌

1.1万人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至此，山西全境宣告解放，同月，公安部门在应县边跃山、广灵、阳高之大王山，阳高、大同之采凉山剿匪”（200页）。老乡们说灰鬼被我消灭了，军民自然欢天喜地，记得夏天，院首长曾派我去大同接管组找张怀祥同志去要一台显微镜，因无有，故无成，火车虽已通，但时走时停，边修边行慢得像牛车，好不容易才从大同回到阳高李元庄。

新区军民自然是欢欣鼓舞，华北只剩下傅作义老窝的归绥、包头及河套之敌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不会比其主子命运更好的，活不了许久了！

## （六）解放战争以来医疗经验前瞻性的回顾

①以“四肢外科”为代表的截肢术：更多的实践了后（瓣）包前瓣，得到理想的一期愈合。

更多的实践了“全层一次间断缝合法”，取得了更多的经验，例如：有的伤员肢体严重化脓，但在离开伤处健康组织截肢，并不一定还化脓，甚至顺肌束已流注，不少人经过本法缝合和适当的引流仍可获I/乙愈合。

适当的引流包括橡皮膜引流，即用破旧橡皮手套，剪成宽窄、长短不同的条状物，经煮沸消毒，浸泡在消毒液内，不仅截肢可将橡皮膜（即条）插入创底，而且也用于深创腔的“换药”，不是一次取出，而是逐渐边拔边剪最后拔除，以保证引流畅通，消灭脓腔，细菌赖



以繁殖的培养基即不存在了，从而保证残肢（或深创）愈合。它是无刺激、无痛好方法，又废物利用，理论、方法都是对的。

留下的皮瓣长短适宜，肌肉断面充分留足肌肉，主要动、静脉结扎和主要神经轻柔的切去一段 N，以防 N 纤维瘤形成，以及骨不可留长，顶起皮瓣者将难愈合，但是要考虑到肢体以后按装义肢后功能问题，如股部必须留下内收肌管，小腿必留至中上 1/3，才能保证肢体的伸曲抬举。再短即影响功能了为此，必须根据伤肢的具体情况，考虑留下合适的残肢，这是关系到伤员的终生幸福问题，应与病人的生命同等重要的去全面考虑，采取最佳方案，留下功能长度是很重要的。

皮瓣部分坏死，多半与感染有密切关系，亦与不适当剥离和留下尖状皮角瓣有关。因这些都可破坏皮瓣的循环，缺血而坏死，在抗生素还无问世的磺胺时代，往往招致手术全部失败，增加痛苦最后须二次截肢。但多数情况仍可经合理“换药”、引流，控制感染，由于“一次全层间断缝合”的优越性，缝线拆除后，是不会留下线头异物的，一般说，能够经肌肉组织新生而治愈，当然瘢痕会大，影响按装义肢，这对下肢功能也肯定有不良影响。所以，手术全过程从切皮、刀刃锐钝、挫灭轻重、留何皮瓣？不过多剥离皮瓣，不影响肌肉切离，骨端留的长度等所有问题，均不可草率从事，如骨端长应立即再截短，不能勉强、凑合，那样定会增加创面张力不能愈合甚至皮瓣坏死洞穿。在无抗菌素的情况

下，手术操作更加重要。所以随后实行的“术者对手术（患者）要负责到底”的要求，是有警惕作用的。

②取子弹与弹片意义截然不同：子弹与弹片比较，除形状对组织破坏的影响外，可能还存在弹头本身的高温相对“无菌”有关，所以，有的子弹在伤员体内存在许多年而不影响伤员生命和健康。弹片则与此完全不同，它的形状、大小、径路和存在的部位，都与伤员的健康与生命密切相关，这均与其本身都是带菌的，形态圆钝光滑而数少片小者，可以缓取或不取；反之，形状不整、破坏力大，弹片体积大、数量多，或与重要器官相邻（如重要 A. N 器官）者，应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取出，较对伤员有利。这是与流注情况下的取弹片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视之。如弹片过小无法摘取者可以不考虑取之。

③扩创清除坏死组织，是战伤入院后的一大工作，但有两点值得回顾：1) 清创不够彻底，当时的环境，物质条件，甚至不过滤的食盐水也不是太充足，所以，与现代创伤清创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彻底清创是保证愈合的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细菌株与量，促进一期愈合，现代的断肢再植成功就有力的说明了初期清创的极端重要性。但话说回来，彻底清创固然好，然而当时物质条件不具备和观念上未达到现代水平，也是勿庸非议的事实。2) 组织切除多少为好，“移行带”只是一个术语，但到底距创口多远才是移行带？很难在农村条件无病理、无显微镜及显微外科的情况下

确切地确定。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凡无生机的组织都应切除是肯定的。我想，这一点和清创掌握的更好一些，当会在今后的战伤医疗中，大幅度的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而可大幅度的提高一期愈合率。我们当时的化脓率是 15.2%，是与现代Ⅱ类切口感染率 14.74% 很接近的（见《健康报》1985.1.1），如果有了现代清创观念，相信比这要大为好转。

④刘信主任在 1948 年 6 月示范倡导的可调性妥马氏架治疗股骨骨折的方法，无论闭合性（彻底治疗手段之一）还是开放性（有效的减痛治疗工具）都适用，实等于现代的皮牵引，这在当时是比白求恩大夫的方法更为先进的方法。股部三条不同宽度的托布、足板、随地取材的重锤，可保持牵引（重力）和患处高低，内外旋的可调性，保持骨端正对位，既适合战时搬运和固定，又适合平时任何“病室”的牵引治疗、局部引流“换药”治疗，是一值得确定其价值的简易方法。因为现代战斗情况下，也难以立即作骨牵引的。

⑤U 字及 8 字缝合，虽不适于成形，然对消灭死腔是有用处的。再使用于不同部位、不同强度的压迫绷带疗效更好。（和后来常用的“飞机式”缝合，可扬长避短，各兼其长）

⑥外科手术有关操作的演变及其思考：

1) 术前剪短指甲是多年的惯例，那时我们可用最笨重的土剪“左右开弓”地灵活的使用于双手，但随着洋甲剪出现而逐渐废除土剪，双手“左右开弓”的功能

自然也就废用性退化了。

术前一天养成术者磨刀的习惯，是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思想指导下和当时穷得叮咣响的条件下养成的好习惯，是肯定不可非议的光荣趣事。但随着手术刀的数量增多和活柄刀的出现而不必再术前磨刀了。

我们也无必要再回到那困难的战争环境去弃洋用土，但我认为双手“左右开弓”及术前磨刀的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2) 手术照明：开始由两位同志协助我们端麻油灯照明夜间做手术，后来改成煤汽灯，同志们很是高兴，认为条件太好了，久之得出座式汽灯劣于吊式汽灯，因后者近似电灯，灯下无物遮光，手术野较清晰。（进城后条件更好了，可用电灯、日光灯管、无影灯）亦感到手电照明那怕是两个三个齐照也并不适用。

3) 手术设备上：双管骨部位的三裂布及二裂布，软组织提起器，足踏吸引器，在察南的使用，已方便了许多，自制手术台一桌三节，能支能降，可置腿架能做仰卧、侧卧、半坐位及截石位会阴、肛门手术；也在骶部放一自制骨盘托起器，可上可下适于任何身高及胖瘦病人打石膏裤之用。

4) 操作、手法多样化：

打结：先有器械（持针器）打结，以及针持打结不过轴的体会。手打结中：一般的外科结、血迹中的双手交叉打结、双食指并探深部打结，都是一步步地熟练

的。当时还不会深部结扎和深部缝扎这一做大手术极其重要的手术操作。五十年代末学会，并发现其十分浪费缝线，因一根线，只打一个结，我本人鉴于穷八路的本能，略加改进——实际即不放开挟线的深部钳，钳头绕过深部止血钳，拉过相当长度（而不是1/2）后，即用左手深部打结，并起线头剪断后，还可连续使用一次。即同样的深部结扎，不放开挟线钳，就可用一根线打一个结变成一根线打两个结，可节约缝线一倍，做一次手术扔一团丝线的习惯，可以大大节约和改进，久之，数量极其可观。这种手法我一直沿用至离休。并在带下级医生时传授这一方法，与上级大夫共同手术时，也用这一方法影响上级大夫。收到一定效果。并且我本人主张在浅层术野内如皮下、肌肉等层均用轴线结扎，既都有“事做”又节约缝线。

用剪：由开始只能右手正向用剪，慢慢熟练可以做到“左右开弓”双手用剪及右手正反用剪法，都各有千秋之妙。拆线技术也随不同的缝合而逐渐合理。

缝合：间断（结节）、减张、U字及8字缝合已常应用于临床，（后进入腹外新阶段后，对连续、康乃尔氏、毯边、革匠缝合自然要跟上；否则无法完成新的手术）。缝合的针距及解剖层次的准确性以及无损（圆形）针、三菱针的不同缝合都要由浅而深，甚至皮肤缝合的笨手笨脚，实乃力学之应用于缝合操作的问题。力学方向及用力的量均与缝合密切相关。

5) 止血带在过去一直由台下使用，勿过紧过松，

保持创野清洁，都需一套人马密切配合。（抗美援朝期间才由术者们台上使用，以及有压力表的止血带，逐渐趋于科学化，都是后来的事了）。

石膏技术：开始由膝关节使用之，和结核等许多手术一样，先从膝关节开始。平绥战役时已可使用阶段石膏绷带技术，以矫正屈曲畸形。

煮器械的用水，护士同志们由生水发现器械上沉淀物而改用沉淀后的开水，解决改善沉淀问题。

6) 在医护同志们共同的战斗中，随着技术之进步，越来越感到医护是不可分的“两把手”，已不仅是医生“命令”护士执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相互协助的团结友爱的阶级弟兄与姐妹的关系。台上台下，室内跟台与担架组的室外接送手术病人，已成为一个互不可分的战斗集体。护士同志们的奉献精神十分可贵，例如史正明手术准备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耿喜珍提炉跟随换药组煮镊子消毒；刘东福绰号“刮毛队长”术前准备皮肤；甄克辛拉风箱木桶消毒；周耀荣、赵秀兰的“夜半歌声”及一手提水壶，一手提大小便器之女性。……等等。他们真是好同志，医生的挚友和助手，他们的奉献精神实乃可贵，他们是多么值得我们怀念啊！然而有的战友已与世长辞，多么可惜！

以上这些值得留恋的及其变化，是当时起码两代人奋斗的结果。这些是由不自觉地感到它珍贵的过程。是同事、战友们，根据不同的物质条件下的不同需要，奉献聪明才智，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完

成医疗任务的。没有受到困扰和痛苦的人，是不理解什么是享福的。我认为当察南战役结束至大同战役技术丰收的过程，我们已基本上形成自己光荣传统的雏型，以后又逐渐完善起来，它决非少数人的创造，而是首先源于各位长征老前辈医生们言传身教，如尹明亮老师、董兴谱首长，他们的辛勤培育后辈及大力支持工作，董院长善于在我们难下决心关键的时候，为我们撑腰作主、亲临手术台前指示怎办，是难遇到的好首长。以及我军数以千万计的医务人员通过实践，由低而高，慢慢使人们形成并接受他们认为合理的行动准则、信念及规范。我认为这就是传统，加之经过无数次重复实践，皆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科学而正确的，并且运用这些正确思维指导形成规范，就成为了比较完整的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

这个事实也提示我军医疗工作也经常需要完善和进化，虽看来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但是进化的，一共才三年多（至抗美援朝才七年），应该说这种进步还是快速的。无论任何事物，永不可能固定不变，总会被更先进的东西所替代，而且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以能否克服困难，医好伤病，提高治愈率、降低残废死亡率为尺度来验证的。既然我们在上述条件与水平上，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说明它们具有先进珍贵的内涵与“宝藏”，所以，看不起自己的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不可谅解的忘本，虽极少见也有之。

以上这些在解放战争起过良好作用的医疗实践经

验，是我院调往绥远军区——内蒙古军区分科医院（后第 253 医院）的主要技术资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四肢外科”进入“腹部外科”水平，而且已为事实所证明。人员几乎差不多全部新陈代谢了，但该院仍是该军区唯一的医教研核心机构。

我将以“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为题的总经验中加以阐述，当然它会与这一节前后映照生辉。

我院做为军区卫生部直属的主要单位之一，我本人在逆境中，被分科医院民主评选为工学代表，出席了由绥远军区卫生部于 1950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首届工学代表大会，并在 10 月 10 日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部首长参加大会指导，广泛交流了经验，我认为这个大会是进城后一次成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我在绥远军区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发言稿》的注及原稿复印件。附于书末。



## 第十章 彻底打败美、蒋反动派， 成立新中国

### (一) 护理教育势在必行

大同战役中，我们由三十里铺奉命移防至阳高县西元、李元庄（及织锦庄），当时它仍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阶段，但距曙光更加接近了。

从新保安方面转来的及本地别处转来的大批伤病员，虽然急性期已经过去，但延续性手术（如取弹片、取腐骨、引流扩创）相对增多，危重患者是不少的。记得：脓毒症仍很猖獗，严重影响着重患者的生命；晚期或后期后遗症的处理任务颇重，如一位正中神经疼痛的患者彻夜难眠、脊髓损伤的幻觉痛、截肢后的末稍幻觉痛等是很多的。

我们对病房及医院管理，经过察南、大同战役的临床实践，积累了新的经验，有了一套在当时得心应手的“科学”管理方法，就是：它能沟通内外联系，医护配合，保证对伤病员极端负责，医生要言而有信，巡诊频繁说到做到，即使患者的饮食（特食）也要积极与伙房联系给予办到，护理要严格执行医生的“命令”（医

嘱)，尽心尽责，从而保证医护工作的正常秩序。但还总是离不开抗日战争阶段山沟、山洞的那种工作方法和质量。

由于技术水平与医学理论不断提高，客观医疗任务极其繁重，病种随医疗水平的进步而日臻复杂，护理教育势在必行，否则，将不适应医疗要求的需要，难以提高治疗效果；要想将医疗水平推向前进，必须首先解决医生的最亲密的助手——护理工作的不相适应的状态。我与看护长李来全同志交谈，发现我们的认识一致，从而商定实际措施，主要从讲授做起，加强业务学习，在工作间隙抽暇每周上课一次，李护士长请我做教员，内容由我自选自编，全体看护员参加学习，注意着眼于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原则。内容主要有：何谓“新创伤疗法”？以宫乃泉译著《战伤疗法》为主要参考，加之其他杂志所选的浅显材料，结合临床实践，如“新疗法”的内容、方法？为何不痛、不脓肿不换药？为何抬高患肢及制动？怎样护理败血症？怎样护理石膏绷带及出血病人？怎样观察肢体末梢的血循环？怎样包扎？等等……。教学主要采取听讲、记笔记方法，发现不少新参军的同志文化很低，写字很不像样，因此教学中注意检查笔记质量的同时，也注意检查与修改写字是否正确与规整，并给予修改评分及批语。通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发现不少新同志进步很快，写字也很快规整起来，郭登祥、马鹤鸣等同志接受能力很强，几乎全部吸收，并立即能在临床护理中应用。但也有文化特低

甚至与文字无缘的小同志，上课成了他的最大负担，自然成绩很糟，幸亏是极少数。

可惜我们自身的水平也很低，恨不得将自己能掌握的一点知识全盘教给同志，通过授课，不仅教人而且自己受益非浅，无形中要加强自学增加才干，提高了教人的能力。由于以往也最怕听长演讲，所以，注意不延长上课时间，不因上课而使同志误饭，注意语言精炼，防止“疲劳轰炸”。因我体会人们接受快慢、接受与否并不与讲的时间长短成正比，那种语无伦次来回反复唯恐别人听不懂的担心，就是“疲劳轰炸”，其效果不会好，是教学之大忌。

通过这段教人的实践，对 1951 年扩大绥远军区后方医院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因那时为了完成由朝鲜战场大批后转伤病员的治疗任务，后方医院由一个分院扩大为三个，那次将我由分科医院调往先玫瑰营健康大队，接着调去军区后方医院三分院，全分院二百来名护理员，都是绥远本地入伍的男女青年，由我执教办了护理员训练班，一个多月就能应付工作了。时间虽短那次也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成绩优秀的青年同志，如：王富、张允文、吕素珍、刘世范、苏惠文、吕俊英、陈玉兰、左秀琴等等。

那批人立即投入战斗，参加一分院的护理工作，一个连（所），一个护士排 30 多人，四个连很快配齐投入接收第二次战役转来的大批伤病员，一次就接收 680 多人，后来他们很多人成为骨干，以后改行者也不算少，

例如：王富作了记者，刘志宏作了摄影资料师、陈玉兰改作医生等。证明这些同志通过短训能够达到护理工作的标准，而且可塑性很强，能够应付任何数量及频次的战斗护理任务。

## （二）立功运动在我院

立功似早已有之，如：大渡河十七勇士、十年红旗勋章、模范党员、模范青年队员等，但做为一个全军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初是从苏鲁皖开始，我们是从1949年才有的。那时盛传冀鲁豫边区有一位在高树勋将军起义部队里的战士，名叫王克勤，进步很快，英勇杀敌，火线入党的真人真事，以及落后变先进的李国栋，火线剧社曾编成戏上演，以教育部队，我亲眼见过该戏。1946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1947.2.4该报再发社论“再论立功运动”，号召我军“更高度地发扬新英雄主义，建立更多与更大的功劳。”

中央军委（部队内传说是朱德总司令）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将士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为党、为人民立功，开展争当功臣的立功运动。后来衍化为竞赛、评模、工学代表等形式，但其基本宗旨，仍源于立功运动。我认为它和当时的诉苦运动，可谓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前者树立榜样，后者立竿见影，确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屡行屡效的正面教育方法。我们见过众多原在敌

军过来的解放战士，经过几次诉苦大会，看过《白毛女》等可迅速提高阶级觉悟，新老同志共同洒出的泪水，可迅速将我们的感情融为一体，因而解放战士立即调转枪口，对敌瞄准开火，再加立功运动的引导，很快前后判若两人，说明诉苦与立功运动的威力，来源于抓住了我军多数是贫佃农成分，抓住了当时阶级仇与民族恨的心理要害，就能发挥出无可估量的革命能量，造就了大批英模人物。这种能量绝非重金所能换取的，庞大的美蒋反动派，最终还是被我军一文不要的革命英雄主义将他们彻底打倒，这是谁也无法否定事实。二者一直延续到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时过景迁，现已过去了几十年，已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没有那种备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典型人物了，所以诉苦运动似已不合时宜了，但立功运动我认为仍有先进性。所以，我着重结合实践阐述立功运动。

我“一后”四分院，在院党委领导和陈世德教导员的具体组织下，全院同志投入立功运动中来。从1949年初开始，经过一段筹办，政治人员下病房征询伤病员对产生功臣的意见，及全院同志的民主评定，产生出七八名功臣，于5.12护士节隆重庆功。在一个大房子里作会场，会场布置得很壮观，上写“第一后方医院第四分院庆功大会”字样，墙壁上贴了一些“向功臣同志学习”、“向功臣同志看齐”……等类激励人心的标语口号；前面横置几张桌，烟水招待是历史所无，请功臣同志们坐在台前，面向全院成排席地而坐的同志们。陈教

导员宣布军人大会开始，今日主要是庆功，他代表分院党政阐述意义及各位功臣事绩，并且宣布每人发给笔记本一个（上写分科医院护士节奖品，五〇年五月十二日），上写“纪念5.12效法南西格尔救死扶伤的精神”，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散会。不记得有什么人致答辞或讲话，但这种鼓舞士气的政治气氛，并不因奖品而有任何逊色。当时，我也是前面坐着的功臣之一，那种自谦心情、荣誉感和死也心甘情愿及今后必须再接再厉，决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心情……，是炽热而复杂的。那种蒸蒸日上，团结上进、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足以说明这是党、人民给予同志们的最高奖赏，功臣是崇高的政治荣誉，所以，鼓舞士气，激发奋进，争当功臣，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的功能肯定已经达到无疑。后来，医院医护服务工作更有新面貌，使全院新老同志间、工休之间的关系，更为团结、密切。

对我来说，给予功臣荣誉甚感抱歉，因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只不过是多年来，一直热爱医生职业，一直专心致志为伤病员服务，抢救活了一些同志，治好一些伤病员，这本是医生份内的事，组织上给予的评价是高的，如对病人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团结群众，深入病房与工休打成一片，学习努力，知识传授他人，技术好并力求上进，卓有成效，在全院工休中享有威望，等等。

我没有辜负党和同志的期望，在逆境中的1950年全年就立功三次（5.12护士节、被评选出席军区卫生

部工学代表大会、模范工作者)。

记忆中有这样一位要好的伤员排长同志，山西人，身材较高，长脸短髭，眉清目秀。第一次查房见面，就见他双手抱着一条炸伤剧痛的左腿，痛苦不堪，昼夜难眠，经过我们手术治疗逐渐治愈，哭变笑脸，从此好开玩笑。有一次，我查房刚出门不远，听到他和同室伤员议论，一片夸奖之声，当然我心里也感热乎乎，后来查房，我告他不必那样，因为当医生为病人是我们份内的事。又一次查房，他非将在新保安战斗从敌尸身上得的一块银壳怀表送给我不可，他说：“王医生是好同志，最好的人，这块表你的用处比我大，你留做纪念吧，今后你见到表就象咱哥儿俩见了面一样”，我婉言力拒谢绝：“没有这块表，我也不会忘掉咱们同志间的友谊”。我当即想到，人家在枪林弹雨的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死尸上获得此胜利品是很不易的，他比我更有纪念意义。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那双手抱腿的痛苦容貌及持拐跛行的形象记忆犹新，然而我却真的把同志“忘掉”了，经久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来了，经过查找故录杳无踪影，十分遗憾！对这位似比我大两三年的排长，印象如此深刻，原因有二：一是赠表，他是我戎医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二是他的真挚阶级弟兄之情，我在一次查房中，他让我坐下，攥着我的手哭了，我问：“何故？”“我不明白王医生你这样一个好人，怎么还受了处分？我不信你犯错误！”（指1949年初，在大同巨乐堡所谓抗上一事），我笑了，并告他“请别哭！”

我是与教导员王作益，意见不一致，我无任何错误，总院任副政委也承认，因此，任何处分对我都是不公正的，无效的，不算数的。你想如果算数，我还能当功臣吗”？！他点头表示赞成、理解。他（及秋后的李俊同志）这种与我荣辱与共的革命情谊，是我终生难忘的。

这种感情何以而来？为何素不相识的同志之间会产生这样真挚情感？我认为，这是在我们医生职业和伤病员间特定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我们为其忠诚服务的言行和效果，所产生的相互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是病人对医生的最高奖赏，是作医生的最高兴的时刻之一。病人的心情是想遇到一位心眼好技术高的医生，来为他的健康和生命服务，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尤其当他生死攸关时做到这一点，患者就欢迎就满足，甚至将你当成恩人，最忠诚的亲人来看待，才会发出肺腑之言行；否则，定遭病人的反对和唾弃。所以，要想当一位当之无愧的好医生，并不容易，就必须以自己的坦诚的心灵，优良的技术本领去为病人精心服务，才能达此目的。这即红专关系，缺一不可。

我在戎医生涯的十多年中，遇到同类情况亦不胜枚举。能得到伤病员的理解，是我们做医生的欣慰、自豪，然而又是鞭策自己之时。

我在后来做领导医疗工作的全程中，无论部队还是地方医院，一直沿用立功运动的精华，做为组织群众发挥技术才能重要措施之一。我认为它是正面教育良好方式，以此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英明之举，直至今天，



各级领导，各个部门仍以不同的名称加以运用，如：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优秀党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年终先进等荣誉很多，这些，足以说明立功运动是符合人类心理功能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利于人们力争上进而树立榜样、典型引路目的。证明它无论在日常还是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都能起到发现英模、英雄与群众均能理解的作用。庆功就起赏罚双向功能的，由于它的先进性、科学性，所以其效果久盛不衰，就连长期“左”倾路线的日子里都无可奈它何，就说明其正确性及生命力了。

但过去也非一点问题也无出过，例如利用权势产出的假先进，或已失去先进形式主义的老先进等，因为实际已无先进性，群众不佩服的信任危机，不但不起好作用，反起“消极”作用。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先进人物”尤在“左”的日子里确实有过，但毕竟它是个别瑕疵，不影响其本身科学性、先进性、珍贵性的价值的。

### （三）最后一村老平地泉—— 进入腹部外科新纪元

我院在繁忙紧张的阳高驻防期间，风言风语听说要将我院调归绥远军区了，由于绥远医院少、医务人员很缺，经问分院首长，证实并非讹传。同志们感情上都不愿离开晋察冀，留恋之情是易于理解的。人们正在纷云

之际，由绥远军区卫生部林玉书副部长带一二随员来接我们赴绥，同志们虽内心不悦，但上级命令一定要服从。

两三天后，在六月份的李元庄，全院男女奉命随林部长在阳高乘火车南驰，途经大同车站，天桥下停车稍事休息和打尖后，继续驰向西北的集宁方向去了，在闷葫芦车向外了望，越过丰镇越行越感黄坡土岭，逐步村庄减少，多见荒凉，土房盖逐渐增多。我们直达集宁南边一站的苏集下车，步行八里来到宿营地老平地泉村，将我“一后”四分院改名为绥远军区后方分院。谁也没有料到该村竟然是我院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征程最后一个农村了，次年5月进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小校场兵营内，自此出门进门都是军人，而与老乡自然就隔离开了。

老平地泉村地处平绥路，战略要地集宁之南25里，北通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草原，可直达苏联的戈壁滩开阔地，东达张家口、北平，西通归绥、包头榆林至兰州。

这个村地处由老虎山卧龙山咽喉间的集宁要塞的大风口上，所以气候相对寒冷，除天主教堂外多数是土房土壁，口音偏晋，刚到此地分不清是晋还是绥，久之方知有别，老乡们冬穿白茬皮袄，多吃莜面山药蛋，标准的塞外生活方式；土匪较多，几个月中就有两起图财害命打死外来买卖人之事，一个裸身送来，颅骨被击大洞不久死亡，另一人在去集宁路上的石燕房村北，见荞麦

地里一道被毁荞麦形成“小径”深入田间，顺径寻觅一具尸体抛在田里，看来是在大路打死后，拖到荞麦地丛中去的。

这个村有一所鹤立鸡群一般大教堂，是绥远地区与玫瑰营、包头齐名的教区，全村农民多数信奉天主，每晨早早地去教堂祈祷礼拜。这个教堂很大，与钟楼紧紧相连通向堂内。因为伤病员增多，不得不将教堂占用，记得，我一连（所）一百多病人都打地铺成排住在堂内，唯有伤员陶寿琪参谋长一人住在钟楼这个“雅座”内，部分重患住在教堂的附属建筑的房间内。教堂内住伤病员给医护工作带来很大方便，因为集中查房、开药、护理都较省人省力，缺点是乱哄哄的，给医院管理带来麻烦。我一连连长张明月是新保安伤员中留下来做伤员管理工作的，由于他是河北人与绥远的语言不谐也有部分麻烦。甚至因为方言土语闹出笑语，我管的伤员赵三虎伤后喊痛，我给开了止痛药，问他“疼得好些了吗？”他答：“可（克）痛。”我立即吩咐护士给打吗啡，再问“好些否？”他仍“可痛”。我感到奇怪，为何来到绥远老平地泉止痛药不止痛了呢？！久之方知，可是克，是不痛了的意思，才知是对语言理解的错误所致，还有那“眸眸（读毛），我们理解为用手触摸，而人家“眸眸”原来是“看看”的意思……。

当时绥远的大城市如归绥、包头都尚未解放，平绥路上陶斯浩车站以北都被敌人占据着，我们接收的伤病员都是绥远军区（即原晋绥、绥蒙合并而成）的，大多

是步兵汉人，也有少数骑兵蒙古族人来住院，开始病人还不多，军区司、政、供、卫各部及直属队都驻集宁，教导大队驻大站官村。由于我们刚来绥远人事不熟，教导员陈世德同志带我们那个成立于山西渡阳的业余“胜利”剧团，曾去官村和集宁各演出一场，名声“大震”，传开说从察哈尔过来了新医院，廿二师、骑四师、五师卫生领导先后前来参观，我们将手术室重点布置，将自制万能手术台、足踏吸引器，外科室的蒸汽消毒器请人家看，又向人家介绍我们推行“新（创伤）疗法”推行消毒碗制、查房、初一、十五定期转连（科）等给人家听，从此重患及新鲜病种逐渐增多，伤病员有男有女，有轻有重病种较前大为增加。有：（1）我们最熟悉的战伤如赵三虎（凉城人）、李俊（骑五师侦察参谋上肢负伤，定县人），炸伤而致的脓胸岳生云等；（2）危重病员增多，如麻疹，合并肺炎的芦志义、中耳炎脑脓肿董存虎及心肌炎等；（3）病理外科开始进入我院，如疝气、兰尾炎、肠闭塞、肠刺伤，痔瘻、脱肛、肛门湿疣（梅毒性）、皮肤结核甚至过去不关痛痒的“腋臭”，也来医院治疗，过去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正常分娩、小儿患者都涌入院来。这些新的病种给我们医疗增加了新的困难性，但由于病理性疾患大量涌入，促使我们必须从狭窄的“四肢外科”走出来，迅猛地进入以肠切除肠吻合为代表的“腹部外科”及广泛的病理性新领域来，才能适应新的客观要求。前不久进行的护理教育，对完成新的医疗任务起到积极作用。我按我《医疗杂录第一集》

简述这老平地泉时期技术上的进展：

1949.2.10 （在阳高西元村）解剖残肢进一步熟悉了“足的骨性组织”；

2.14 “脓胸”知识学习，及《阿洛夫医生》胸穿治疗王观澜脓胸事绩，与我们将其用于临床意义。

2.23 Hernia 手术记（147页，1949.4.20）记载有患者王二东、李如山、王成贵等人已疝气修补术后半月多了，说明最晚也在9月初开展了疝修补。

4.18 腹痛割兰尾记载：上周刘合延是首例，文云：腹部胃肠疼痛，特别是上腹疼痛，割去兰尾痛消失，证明我们在4月中旬已进入腹腔，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时已掌握了我西北解放区卫生部长、外科专家张查理氏“兰尾根表面测量法”先进诊断技术，1950.5.2郭×兰尾腔发现猪毛是首例，也是唯一的一例。看来，兰尾切除应先于疝修补，九月仅秋季（见154页）即作10例，而且得出的血压偏低即收缩压90mmHg也未影响手术（秦国庆），发展了张查理切口的改良切口，对化脓性者（孙焕文）按放引流条不缝合切口的新的经验。

5.20 腰麻刺激法与大脑按摩术，系《国防卫生》上的材料，它述可治许多病，我们曾实践后者，患者头痛随停。我认为它是该时期唯一的糟粕。

5.22 血液型的一二问题，即输血知识的学习，当年在老平地泉临床实践并达到纯熟现抽现输的直接输血法，在后来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尤起作用。记得曾为胸、

腹、股部盲管炸伤的蒙族骑兵伤员色依宁布及肠闭塞重患杨桑（蒙族战士）多次输血，全院同志积极献血给伤病员阶级友爱团结的生动局面，我曾给色依宁布献血中，见抽血的护士同志，多次静脉穿刺不成功，使我发生神经性虚脱，受到政教陈世德同志亲来宿舍看望并于大会表扬。

8.15 （腰麻后）头剧痛治疗，患者杨来全，静注高张盐水（5—10cc，每日二、三次 iV）获卓效。说明我们已初步掌握了降脑压治疗。

9.16 肛门部疾患几点处置事项（127页）文中记载了：无腿架的截石位、痔核；痔瘻手术疗法；脱肛固定术；缩肛术（银线及阔肌膜）均已在临床开展了。

自9.7开始“化验知识”学习，由我院第一任化验员梁昌福主讲，有：血像片的做法与意义、血沉意义、血型测定，标准血清制法、查虫卵等，说明我院开始有了精密仪器显微镜。

1950.4.22 腋臭手术（4.26）内翻足矫正，记述了伸趾短肌折叠缩短缝合术。特别是：

2.25 由某团送来腹部刺伤已廿二小时的伤员李元，（152页）记载有：①5% G.S + 生理盐水静注1000cc，说明我们已学会不经口的补液技术；②当夜9时在两支蜡烛光照明下，作了小肠部分切除端端闭合十侧侧吻合术成功；③比较正规的使用了 Penicillin 4万 Q3him 等，该例是我生平自学基础上，无任何外援情况首例而成功的病例，该例的成功将我院技术水平推向

了“腹部外科”新领域及主要依据，是我本人被评选参加军区工学代表大会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我军区首例。

当时 我经派军区后方分院在最后一村老平抽息时

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56 人，……最后通过宣言，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他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阅兵式上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以上见《解放战争纪事》411—412 页）。

按上书 387 页记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解放战争战绩公告，……自 1946.7.1 至本日（指 6 月 30 日）止，人民解放战争的三年中，人民解放军歼灭、改编敌军及起义、投降敌军共 5691400 人。（我按本书建国前七、八、九三个月摘录统计为 350500 人，与前述数字相加为共歼敌 6041900 人），解放土地面积 677000 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43207000 人，解放城市 608 座。”

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同志们自然是欢天喜地，同



日，在老平地泉村天主堂西南侧我们伙房东侧的小广场上，搭起了席棚，张贴标语，全村人民和我院全体工休人员举行军民联席庆祝大会，隆重庆祝我新中国的诞生。同志们虽未像日寇投降那天的异常兴奋，但都笑逐颜开，表示我们三年多来东战西征没有白费辛苦。虽然蒋介石及其残兵败将已逃亡台湾，但国内还有许多地方尚待解放（尤其西南各省和西藏、新疆），我绥远省内国民党头领董其武虽然已于9月19日宣布起义，但归绥、包头、河套等地实际仍在敌手，还有不少残敌尚待肃清，然而人们心情上却都表现出完全胜利的安全感、放心感，认为独裁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注定要被我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的，只是时间问题。剩下的只是我们进取绥、包大城市，痛打落水狗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更进一步深入体会，中央军委大兵团作战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我们所参战的地区而言，更加理解了“全军一盘棋”的必要性。按本书（290页）记载平津战役的一段材料说：“从11月29日12月20日（指1948年）遵照中央军委对平津地区之敌实行“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原则，华北第二、三兵团和东北先遣（第2）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等地，切断敌人西逃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和津、塘（沽）之间先后占领通州、廊坊、杨村、军粮城、咸水沽等地，切断平津和津塘之敌的联系及海运南逃的通路，完成对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12月21日—1949年1月15日，我军首先歼灭新

保安之敌傅系主力第 35 军两个师；接着歼灭由张家口突围之敌第十一兵团所属三个师；1 月 14 日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动总攻，……”这段话说明中央军委、毛主席及所运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之伟大。三大战役是中央提出的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几次大战役，但它们是有无数部队举行的小的战役、战斗并为其服务的，打或走是大战役的需要，而非某局部一役一仗之胜，这些局部性的军事活动，都是为整体的大仗取得胜利，达到统一歼灭大敌的目的。所以，运动战、阵地战中打的有名的大仗就源于此。这是否可理解为“全军一盘棋”呢？故而理解无论怎样辛勤或反复走路都非无目的无效活动，而是平津战役的总需要。

1949 年是我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获得翻身解放大喜之年；十月一日是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获得政权硕果最为喜庆的国庆日，意味着我们已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征程，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我们梦寐以求的、当家做主的、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军全体指战员怎能不欣喜若狂！

### （五）厄运缠身

这里我要说的，和前面所说的不和谐，因为它是历史，所以，只能如实反映，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场对我来说完全是黑白不分、人妖颠倒的一场恶梦。按理说我自幼参加我军如同一张白纸，应该得到领导重视和信

任，然而恰恰受到无辜的迫害，人为的精神枷锁，实在使人不解，多次申诉，得到的是“凡‘反右’前的问题一律不做甄别”，甚至受到（如“文革”）进一步的非难与打击。我坚定地相信党组织，未受任何风吹雨打的影响，仍然几十年如一日热爱医生职业，忠诚地为伤病员服务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然总感受到不公正的不白之冤，直至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英明政策，才能使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成为可能，终于在党中央“有错必纠”政策的照耀下，得以打破“左”的禁锢而平反昭雪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使我从内心感激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正确、伟大。我卫生系统的悲剧何止唯我独有，假若这些不应产生的悲剧能避免的话，那又是怎样蒸蒸日上为党做贡献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 为什么整人的总能得势而被整的总该挨整呢?! 难道不值得从中汲取教训，告诫后人吗!

1949年是全国人民普天同庆的大喜之年，然而我本人（及家庭）却实际被个别人剥夺了这种与大家共同欢庆的权利。真可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一年在我坎坷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本节只述1949年因逆境带来的恶果。

幸亏我有一位好伴侣、好战友贾贵银，厄运与逆境将我夫妇紧紧联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一次又一次的冲破羁绊活到今天，可谓实在不易!

我妻子贵银于1949年4月初由老家来到我院驻地阳高织锦庄来看望我并要求参军，个别人从中作梗，还

是在教导员陈世德同志协助下经请示准予二次参军，并分配了炊事员工作，由于世俗偏见，好像做饭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低贱职业，但贵银愉快地接受了承担起部队从无妇女干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多年传为佳话。这一带都烧烟煤，当时农村环境，条件之差是可想而知的，移驻到那里立即盘大灶或借用老乡的大锅做饭，烟熏火燎，不要说洗澡换衣服的条件了，就连洗洗手也很困难，当时部队没有工作服，自己的军装一身“滚”，我俩时常没有单独的宿舍，想帮她洗涮洗涮都不可能。她生平爱洁，虽时常拆洗衣服也无济于事，仍是一身乌黑，烟尘好象已钻入肤内和发间无法清除烟臭。在老平地泉村，有幸蒙张明月连长给找一间房子让我们住，房东二旺（杨再兴）家，贵银每次回来，我见她满身乌黑，甚至头发上带着轻轻浮动的烟絮，进屋一身烟臭，……我不嫌弃她，而是更加同情她、心痛她、体贴她，我从她乌黑的外表上，看到了她那水晶般的纯洁心灵，使我更加尊敬她，更加深了我们革命伴侣白头偕老的情感，我为有这样一位不嫌贫贱、对我事事体贴入微的好妻子、好战友，感到幸福、骄傲和自豪。因而，我院调归绥远军区后，卫生部林玉书副部长、后方医院程传忠院长都曾十分好感地对着我的面夸奖她：“你讨了一个好老婆”、“王增寿的爱人是个好同志，是吃苦耐劳的模范”等语。首长所以如此感触，仍不可避免的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所致，当时我军内女同志当医生、当看护、当演员等的确不少，然而当炊事员的当时贵银是

仅有绝无，所以，工休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加以赞扬，甚至编出一些虚实兼有的传奇就非偶然的了，这种传奇自然是我和贵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了。

我二人在不同岗位上辛勤工作，并不感到苦、脏、累，而是感到十分幸福与美满。但我们就这样兢兢业业的工作，个别人仍容不下我们，生活虽是绚丽多彩，但现时又是无情的，犹如晴天霹雳，时时干扰我们，使我无辜的遭受几乎人亡家破的不白之冤，竟长达 35 年之久，这在我党领导下，不能不说它是咄咄怪事！

我仅谈黑白颠倒的所谓医疗事故：

我们刚去绥远不久的九月份，有一位危重患者芦志义同志送来老平地泉，他患麻疹合并支气管肺炎渗出性胸膜炎，胸腔大量积液，呼吸严重困难不能平卧，口唇紫绀，当时我军的医疗技术水平是很低的，在抗生素基本没有的磺胺时代，我受一本小册子《阿洛夫医生》所述在延安给王观澜政委，用胸腔穿刺抽液，治疗脓胸方法的启示，对芦的病曾经会诊同意胸穿并请示医院业务领导同意，在患者十分危重快要窒息的情况下，我请护士崔士岐、张俊莲二同志精心协助与监护下，由我操作胸穿并抽胸水，共三次，每次抽后症状大为好转，唯第三次胸穿后，三四小时病人突然死亡。由医院业务领导召开死亡检讨会，硬说“胸穿”和抽液量大是死因，而且那位领导见人死也不敢承认了，并否认自己同意过胸穿。

不久，绥远军区卫生部在驻地集宁召开医干会议，

由卫生部主要领导，将我调去诡称“开会”，在大会上对我进行斗争，并结论为医疗事故行政撤职处分，后由副政委于数天后带我回院在军人大会上开展斗争。

在军区对我斗争的事，全院无人不晓，只有贵银一人无人相告仍蒙在鼓里，她只见参加会议的人都回来了，却不见丈夫回还，贵银满腹惆怅，要去卫生部看个究竟，房东二旺奶奶劝她路上不太平，碰上坏人可咋办，她心急如焚，整夜不寐咽喉疼痛，在黑洞洞的拂晓，贵银只身一人从老平地泉动身踉跄向北疾行，还不到9点开饭，已到达集宁桥西财政街卫生部驻地，我见她乌黑的绿军棉衣，憔悴的容貌，眼泪汪汪，我心都碎了，我虽力陈自己积极抢救危重患者自己无错，尽力安慰，也难免她悲痛哭泣，万分难舍之情。接着又一位部领导逼我在通报全军处分决定上签字，经在我院斗争我之后，事情的真象更加清楚了，人们不是恨我，而是有不同看法，更加同情我，然而由于我在工休、军民中所处的关系，却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同志如陈丑班长、周耀荣及房东二旺一家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见到护士张富贵、伤员李俊参谋我们一见面，他们都哭了，经我手术治愈这位李俊同志一句话也说不出，而是用滚滚的热泪表达其心意，而我还强打精神安慰同志们。

这次斗争对我以炽热的兄弟之情抢救治疗危重病人，则是一次沉重打击。我当时陷之于迷惘、彷徨、懊丧，不解为何我遭此厄运，为何自幼投向我党我军怀抱，而倒霉的灾祸却落我身？一度不想再存活下去，迷

惘出路在哪里？但我一想起妻子贵银，又不忍将她孤独的抛下。

我在卫生部住闲十多天，开始对我“流放”了，那位让我签字的部领导将我唤去说，打算调你去军区警卫营工作，在卫生所做医生工作，护士待遇，你的中灶待遇已决定取消。一半天就去。我很快奉命到警卫营就任，进入离开战士三四年的战斗部队做卫生工作，接着随军区首长进驻归绥，实现“9.19”起义协议，此是后话。

从此，我和贵银就在这已胜利的新中国的国土上，又过上了凄凉的生活，受到许多人为因素的歧视和打击，例如：

1950年发单衣，医生本来应发黑皮鞋干部装，却给我发的苏式钻头战士服，据说是优待我，发给一双排以上干部软底反毛皮鞋。老实讲，我并不感谢，因这时已又调我回分科医院，战士的钉子牛皮鞋和过去日本鬼子的毫无二样，走起路来夸夸作响是不适于病房工作的，人家司务长给我发软底鞋不是照顾我，而是照顾怕噪声的伤病员；

让我一直做比我实际职务高1—2级的工作，如已撤成护士让作医生工作，一年后取消处分恢复医生，让我实作医务主任、医政股长、副分院长工作，责任很大，而待遇却无改变（35年过去了，现在（按《中共内蒙古军区委员会（1983）后党字021号关于撤销王增寿同志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取消了处分，恢复主治

军医。过去的罪已受了，而且现在已晋升为主任医师了，我还要那主治医师干什么！虽已无实际经济意义，但我仍衷心感谢党的关怀）；

最要者，在后方医院集体转业时上级说，今后仍保留军籍，我们已改称康复医院归绥远省政府领导后，军区还每人发给祖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一个纪念章、水笔、茶缸等纪念品，给人们的印象，好象还在保留军籍，然而授勋时却一直不予授勋，我应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三级勋章各一枚，贵银应得独立解放奖章1枚，但拖至今日也无人给授。

组织上明知错了，也不给平反，所谓“抗上”，既然总院副政委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何还给处分，实际自打自咀，后者否定前者。所谓医疗事故，我感谢许义华副政委这样的首长，即使整我时有他的份，但一经承认错误向我道歉，我完全不计前嫌，云消雾散了。而做为主要嫉妒作祟我的那一位业务领导，时至今日还不敢承认说“会诊意见我同意过”的话，为了一文不值的面子，竟让同志遭受35年不白之冤还躲躲闪闪不谈实情，让同志怎理解你是同志呢？做为处理我的主要部与院领导互相推托责任，时至今日仍操持那条“反右前的问题一律不作甄别处理”的大棒，谁能服气！而且，我就不信，你亲自主持大会斗争人，在大会上高谈阔论分析批判，比马恩列斯毛好像还“高明”，现在竟然说“想不起”、“忘记了”，怎么许政委忘不掉而你亲自将同志迫害打击35年之久竟然忘记了呢？！你想不起，但受



到不白之冤的我却一直记得很牢。……这说明，即便中央已有了极其英明的好政策，却仍有人在那里阳奉阴违或消极抵抗着。我要揭露与批评那些，让同志痛苦几十年的当权者，至今仍讳疾忌医连句真实的话也不说的人，他们的政治品质可见太次了。

另外，以所谓医疗“事故”而言，错就错在处分的依据，因为他有权，他可以将黑白善恶完全颠倒，例如：胸腔积液呼吸困难，至今仍沿用胸穿抽液的治疗方法，时间和历史证明胸穿是有生命力的良好方法。说抽液量大也站不住脚，现不仅可胸穿抽液，而且还可按放水封胸腔引流瓶有多少流多少，历史实践证明它是解决胸腔积液、脓胸、血气胸的常用方法。死因是心力衰竭特别是右心衰竭，因肺循环内瘀血，缺氧→呼吸困难→更加缺氧→再加胸内压增高，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心衰是死亡的本来面目，而非胸穿本身；有权定音的领导，你们的处分依据和对象完全是非颠倒了。你们对积极抢救伤病员生命的医生，不但不表扬支持，反把他打入“冷宫”几十年，扪心自思何以自容！

由于对绥远军区后方分院这件事的错误处理，招致了起码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损失：

(1) 正当我院技术水平进入腹部外科向多方面现代医学技术进军的黄金时代，你们将外科技术带头人搞掉了，从而使朝气蓬勃的科学进化的新局面，被迫停顿，延缓了科学进军阶段的进程。尤其在华北医大来了部分毕业生的新生力量的新情况下，这样的错误处理，更加

拉了技术进步的后腿，打击了知识分子积极性，迫害了急于进取的技术骨干。(这时来了王翰宇、赵瑄、潘震、张宝恒、董武臣、池云升、李凤山、李忠建、周贵卿、薛光及一批新护士的生力军，有唐山姑娘李俊花、李翠花、高云英、赵秀兰、郝玉贤及秦万昌、丁文英等)，如果你们不向我们泼冷水，我们新老科技人员共同扬长避短，定会技术水平进步更快。

(2) 部、院领导，对国民党傅作义的军医寄予希望过大，但无料到进归绥城后，没有一个象样的外科医生，而嫉妒我的那位又在技术上取代不了我，所以，你们才在无可奈何的窘境中，将我又从“流放”的警卫营调回分科医院外科任职，手术才又作起来。回忆我回到医院，同志们那种雀跃相告及军民那种关怀我的热情使我异常感动，房东二旺一家就是实例，使我更加坚定地热爱医生这一神圣职业，任何风吹雨打不会扼杀我的生机。

你们两位那种相信敌军医，不相信自己培养的医生，这究竟是什么阶级的思想感情呢？我真对你们这种不红的厚脸皮难为情，到底相信谁、依靠谁，谁是基本力量，谁是争取的对象？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个基本原则问题尚未搞清，可见你们的水平之低了，要不就是你们另有图谋，否则，让人们怎理解你们的言行呢？！

而没有被你们致于死地的我，仍在工休群众的信任下，带着你们强加给我的沉重精神枷锁，继续顽强工作为伤病员解除疾苦服务，并做出当时有新水平的成绩，

如肠切除、肠吻合术成功，使你们不得不按民意选送我去军区卫生部参加首届工学代表大会。

(3) 我党多年来实行过“左”的路线是事实，但为什么不少同志坚持真理不犯错误，领导群众团结大家做出了显著成绩；而偏偏就你等对这“左”的一套臭味相投，倍感兴趣这样易于亲和？分析之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他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别人在敌后艰苦抗战时，他却得到延安医大的深造机会，出校工作自以为理论“出众”，但可怜你作个疝气连解剖的层次都搞不清，手术台上一片狼籍怎作手术，能让病人放心吗？别人吃中灶你眼馋；但你的资格又不够可怎么办呢？你们应该想想：为何整人的老是你们？！

这些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的影响，是不可能不在行动中越旧越“左”的顽强的表现自己，我做为这二位的牺牲品，却忍受不白之冤 35 年。我不禁反问：为何挨整的老是我们呢？！而时至今日，他们竟连一点歉意和惭色都没有，难道他们连最起码的人性都丧绝了吗？！可以得出确切结语，这二位所以既无超人的本领，又能整人于死地，他们一定具有政客般的权术，即依靠、仰仗党的伟大威望，阿谀钻营才能得到某些人的信任，并以权势打着党的旗号来锄掉他们认为须锄掉的人，从而我对长期给党的事业造成罪恶之“左”倾思潮及其执行者，有了进一步深恶痛绝的认识。

诚然，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又可变好事，经过你二

人对我的迫害与磨难，使我更加珍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医生的真实价值。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做正直人的可贵性及如何写好我人生的历史。

下面，附我的《所谓医疗“事故”获平反感怀》一诗，结束我这一节的叙述：

胸水天经应胸穿，  
好心反受不白冤。  
花儿岂能红百日？  
人有几个三十年。  
三十五年辛酸泪，  
人到白头才拭干。  
水落石出感谢党，  
不悔、不馁医终年。

## 第十一章 “绥远方式”的斗争实践

### (一) 新形势下的战斗部队生活片断

这是我遭受不白之冤后被“贬”去警卫营卫生所的一段插曲，时间虽只40多天，却都是部队生活。使我又回到战士身边，与他们一同严格军风纪，立正、稍息、开步走一同出操，出入营门敬礼还礼，下连检查卫生，共同与各连连长指导员等参加营务会等，在40多天中，部队移防4次，而且其中还有半个月出发到草原执行战斗任务，这种与战士同志们共同滚爬的战斗生活已经间断好几年了。

来营后执行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保卫姚喆司令员、高克林政委等军区首长于1949年中旬的某天落实“绥远和平解放协议”。我们保护首长，乘京包线火车北行至陶思豪车站，就有董军代表超先4站，来接首长进归绥（即现呼和浩特）城。到归绥站后，董其武将军简单致欢迎词仪式后，遂后去麻花板司令部去。

记得警卫营没有营长，只有一位教导员律少卿同志领导该营工作，看来开始人家并不欢迎咱去，可能认为给派来是一位犯错误的医生。

我去不久的一个晚上，听到一连吃了一顿炖肉后，当晚多数人呕吐，少数人腹泻不止，我闻信已意识到是肉毒中毒，立即带卫生所全体同志，下连进行食物调查，并立即投药解毒及对症处理，整整大半夜方稳定下来。

次晨，律教导员派通信员来叫，我立即去营部，律很严肃地问：“医生！一连的事你知道否？”“知道。我们已做处理”，并简要汇报了处理经过，律立即由原本的气势凶凶想训人的架势软下来，并转怒为喜。

“绥远和平协议（即 9.19 协议）”刚落实，接到中央命令，并来了一位小个子的保卫处长，让派一支精悍部队随这位处长去中蒙边界押解一个大汉奸回中国。

律教导员亲自带二连随处长去草原执行这一任务，律也派我同往，并带了两位蒙语翻译，律在出发前介绍说：“那里是新解放区，蒙古老乡对我们还有疑虑，土匪骚扰严重，那里也不花我们的钱（边币），所以，排以上干部每人分带白洋 200 元”，二元一叠做成子弹带形，我们每人佩带在内衣之外，很重，行动不便。并每人发白茬老羊皮袄 1 件，毡靴 1 双等御寒装备，行动极笨。

我们乘火车由归绥出发，首先到达京包线的终点站包头，由包头董军派三辆大卡车随我们前往，全副武装，首车前面架着机枪，两边坐指战员，自包往西北方向，直驶入草原，杳无人烟，只遇到一骑马的人，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土匪。天色已晚，搭起布帐篷宿营在草

原，夜间很冷，这天正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次晨，给每人发饼干1包，并且自己烧水吃些饼干，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直奔只有很少一片房子的乌拉特前旗所在地，在此暂驻防。

这里的主人热情招待我们，用马奶酒、羊贝子（全羊）宴请排以上干部，跪着敬酒，每人一把刀，一棵葱，未用餐前，先让喝一碗汤，然后才吃肉，用刀看准那块割哪块，食后心想一定得让洗洗手，没想到用餐后即喝茶，才悄悄地自己擦擦手。这种不用筷子的无盐食习俗，还是生平第一次尝试。主人给战士们一头牛数只羊改善伙食。又给律政教数张狼皮作皮袄，部队给了蒙古老乡几百发七九子弹，老乡很喜欢，关系逐渐融洽，才见到女老乡了。

在乌拉特住数天，后得知牧区沙漠变化万千，前面的沙丘不见了，据老乡说是被风刮走了。这里还未经改革，还有不少国民党的散兵流寇。一日，律政教传达×处长的指示，说已请示中央，中央批准返回，不去边界了，大汉奸已在外蒙给扣留，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回，随后部队离开乌拉特回返。

回返途中到达五原小镇，这里是汉人居住区，有一小商店贴着一幅很合逻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对联，这里都是国民党的原班人马，每日早晨让人们早早起床，到一座学校的操场上举行升我五星红旗的仪式，据说，过去每天照例要升国民党青天白日旗。

在五原住了数天，因地处河套地区，野生织机草很

多，这是一种制做扫帚的好原料，二连在这里采回了不少织机，以备回归绥作扫帚。

在五原驻防的数日内，我帮二连建立了卫生委员会，设了一名卫生战士。以后相继全营成立卫生组织。三连连长王三同志患精神分裂症，犯病时无人敢接近他，我在归绥营地主动去看望、治疗、谈心，受到人们好评，后来三连卫生工作也较顺利地开展起来。通过此次执行任务，与二连的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更熟悉了。执行任务的半月中，二连没有发生病号，没有非战斗减员，保证了这次任务的完成。

回到包头后，×处长乘火车回北京了，我们与三位原国民党的解放战士司机也惜别了。

回归绥后，在律政教的大力支持下，在各连干部会上，我批评了一连食物中毒，表扬了二连成立卫生组织并无发生病号，后来三个连都相继成立卫生委员会和各设卫生战士一人，协助我们做好卫生工作。该营卫生工作情况得到基本扭转，推动工作比较容易了。

后方分院迁到归绥小教场后，改称军区分科医院，并在人、物、技术等方面给予充实。不久得知小教场原国民党医院无象样的外科医生，军区卫生部又下令调我回分科医院外科。要离开警卫营时，律教导员向部打报告不同意我走请求留我，后因工作需要，律说：“我已知道你是唱红的，走吧。”虽只短短的40多天，和全营干部战士都熟了，和律少卿成了朋友，转业后我们还有来往。



以上，即是这一段的工作情况。回想如无这次“流放”，也不会有这段与战士同志们厮磨的机遇，从这点讲，到应该“感谢”迫害我的那两个人了。

这仅是部队卫生工作的小片断，与我们以往战争期间做得有声有色的 42 团、二团、46 团、定唐支队的工作是不能相比拟的。

## （二）绥远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纪事》9月19日记载：“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等率部四万余人起义，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平解放。至此，绥远全境解放。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次日给董其武等起义将领复电慰勉。中共中央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起义部队于1950年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廿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政治委员康健民；第37军，军长徐世珍、政治委员帅荣。”（408页）

又《军史资料》1986年第三期51页记载“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绥远国民党军“9.19起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率第七师、八十六师、二二八师、二五八师、三〇一师、三二六

师、独立骑兵三旅、骑兵五旅、骑兵十一旅、骑兵十二旅、骑兵十三旅，第 111 军所属三一九师、三二〇师，及绥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孟昭弟、归绥警备司令张潜、包头警备司令包玉申、绥西警备司令于霖瑞，绥远保安第五旅、保安骑兵第四旅、保安骑兵第六旅，三十二兵站在绥远起义。董其武部队编为我廿三兵团，刘万春任第三十六军军长，徐世珍任第三十七军军长。整编后三十六军、三十七军合编为我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

历史记载就如此简略共有 200 来字，诚然这些起义的同志们都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这是决定新我与旧我的关键性的行动。然而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在“9.19 起义”前后的斗争激烈程度，我军曾付出了王士鑫、杨青山、彭子昌等 60 多位好同志的血的代价，说明当时斗争的复杂而严酷。我想谈谈目睹耳闻的一些问题，那怕是一孔之见。

1、绥远位于我内蒙西部地区，当时有人口 200 万，国民党控制绥包二市及河套地区共约 120 万人口，绥东为我解放区。

1949 年继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以傅作义为首的敌人大本营已被消除，在 4.24 太原解放，5 月 2 日大同解放，国民党残军已处于秋风扫落叶急转直下的形势，对绥远残敌来说，已是树倒猢猻散的末日了，但当时他们的头目可以说仍不听从我党我军的劝告，仍无投降我军之意。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在

平山西柏坡)接见了起义将领傅作义和邓宝珊,商谈了如何解决绥远问题的大计,使原来晋察冀人人深恶痛绝的一等战犯傅作义有了立功恕罪的好机会,此后才出现了“绥远方式”一词。

### 1、何谓“绥远方式”?

按我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同志的回忆文章《忆绥远起义》一文中说:“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毛主席解释说:‘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和平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晋绥军区李井泉政委向绥东解放区第八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传达全会精神,缓和指战员同傅作义、董其武军队的对立情绪,从战略方针上加深对‘绥远方式’的认识。”

简言之,“绥远方式”就是要绥远地区解放区化,绥远的国民党军要解放军化。其目的就是经过统战工作,以期最终消灭敌人。

### 2、“绥远方式”的斗争复杂性

按裴周玉文章说:“由于双方都有诚意,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1949.6.8正式达成‘绥远和平协议’,主要内容有停止敌对行动,划定我军与董军的临时分界

线；恢复铁路全线通车，通邮、通电、通商、货币兑换、文化交流；在归绥设立我中国人民银行及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办事处等。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进步势力愈发展，反动势力愈猖獗。联络办事处驻归绥不久，就发生了枪杀我工作人员王士鑫同志的流血事件，立即引起了我军的强烈愤慨，要求严惩特务、杀人凶手，党中央毛周主席顾全大局及时当机立断说服群众，平息了剑拔弩张的事态，挫败了反动分子破坏和平的阴谋。尤其我原晋察冀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原傅方面基于十分的不信任感，认为他们本性难移，易将进步与反动势力相混淆”。

“绥远方式”无疑总的来看是会减少伤亡的，保存我们一部分生力军，减少牺牲，减少战斗减员，以对付更需消灭的敌军，但由于暂时不拆散不改编其部队，所以，表面看来和我们的军装帽徽毫无两样，然而其旧部队中的反动势力蒋匪的残渣余孽仍在兴风作浪进行破坏，自1949年12月中旬我军进驻绥包二城市之后，不断发生杀害我们同志的事件，例如：

我军区教导大队长、长征干部杨青山同志，带“绥远解放区化解放军化”检查团去某骑兵师检查工作中，被哗变敌人杀害；

派入旧部队作统战工作的彭子昌政委，被敌人从窗孔伸进步枪将其杀害；

原有名的土匪鄂友三部队与鄂一同工作的白政委，他二人带数名警卫员曾来过我军区分科医院驻地——归

绥小校场，表面上看二人很是和谐，我也首次见到这个过去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的长象：小个，干瘪的头，粗眉，小眼……，虽然当时已是我军某骑兵师长，但总不免与他罪恶的过去相联想，而我们派去的白政委，两眼炯炯有神，风度大方，可谓我军最理想的统战干部，听说随白一同下去的一些指导员同志们，都是特别精干的。早操后，白政委下命令“各连指导员来此集合听候指示”；然而鄂友三也立即下令“各连连长来我这接受指示”！总之，与我们对着干，不久，鄂部队一部分哗变，白政委被杀害，还有的指导员被暗杀。难怪；有一位白头发的老政委，从中央派来，该同志千方百计不愿去旧部队，记得李振智部长带我一同去麻花板政治部裴周玉主任那里，给这位老政委去看病，他确实患有混合痔两三个，裴主任指示要尽速给老政委治好去执行统战任务，记得特别住在一个较优越的病室，由李部长亲作术者，我作助手，将痔核切除，又经一段时间恢复治疗而痊愈出院，捏着鼻子勉强地去执行统战任务，不久也被敌人杀害；

我军区卫生部林玉书副部长及科员王振光同志随首长及傅作义将军的×秘书一同去部队检查统战，王振光说：“一天夜里林部长正与×秘书在下象棋，突然听到枪声和喊声，这时首长已被打死，警卫员和敌人战斗负重伤，林等正诧异间，大约有十来个人持枪破门而入，对林喊“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秘书说了话：“他（指林）是医官，‘不要杀他！’”这伙坏家伙好似万能的分

辨器一样，对×秘书丝毫无伤害，对林先下了他的手枪，又让他脱去衣帽，只留了一条裤衩，扒得净光扬长而去，王科员也幸免于难。由于敌人的破坏，制造杀人事件，我共产党派去的人员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检查组解散回各单位。有一天傍晚，有五六名持枪战士到达分科医院，打听是那个单位？李部长在哪里？我们见到了林部长，光着头，面庞漆黑与帽痕形成鲜明对比，穿着一套破旧的棉军装，一见到我们他放心了。然而我们还不知怎么回事，领他们去病房中间唯一的一间小楼阁找到了李部长，才打发来人去吃饭休息，原来护送林的是我骑四师特派了半个班乘马将林部长送回军区，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详情。给同志们制造了恐怖的气氛。自然林部长很快换了新军装。

类似之事屡见不鲜，共有60多位好同志遇害。而且这些同志，都是我军挑选的精华、骨干，直至“镇反”以后才逐渐平静下来。

我分科医院驻在归绥市小校场，西邻家属队和我71团，东邻军区军法处，前面是空阔的操场小校场，北邻一条护墙小沟，沟外是国民党的乱葬坟。有一天夜里同志们玩扑克，夜已很深，陈志忠医生去后墙沟外东北方向的火车站去买花生瓜子，陈胆子大，只身一人欲径直去车站购买，没料到沟外不远处有哼的声音，他吓了一跳，接着又听到有人哼的声音，他听得毛骨悚然，壮起胆子稍向哼处一看，原来有一个奄奄一息快要死亡的人。他赶快回到医院报告领导，当即有部首长（许义

华政委)告诉陈医生说：“陈志忠，你准备假若人家硬一口咬定是你图财害命，你就准备为革命牺牲吧（大意）”。陈腻歪坏了，提心吊胆怕董方的人诬陷他而承担法律责任。所幸很快破案了，死者和凶手都是原国民党兵，其中一人见财起杀人之心，这天晚上他用棒将被害者打死，慌忙逃窜，慌乱中凶手将自己的帽子丢在现场，后按帽子的线索很快破案，方解除了陈志忠同志的忧虑。自此人们都间接接受教训，再无人半夜三更外出营房了。

按说，我分科医院在小校场这个大营盘里的位置是理想的，虽然院后面护墙沟外是荒郊，而西邻是军区家属队和我71团，东邻是军区军法处，东西都有武装警戒，应该是很安全了，实非如此，夜晚常常听到零星枪声或我71团巡逻排的同志们的喊杀声。有一夜只听一声枪声，结果是暗藏敌人向我巡逻同志打来黑枪，就恰有我们一位同志牺牲于敌人手中。我71团每夜由一个军事排执行游动巡逻，杀声和枪声是我军事哨向敌围歼之声。

我院情况还好，由于我们是进驻单位，所以绝大多数是我方同志，只有少数“新同志”调入我院工作，有医生、护士、文化教员、干事等。从外表看，同一服装相貌也难分辨谁是八路军，谁是董方来的人，我们在一同工作稍久，就发现“新同志们”的风度言行和我们大不相同，如：一说话，就起立、立正，管医生叫医官、长官而不称同志等，所以，根据其特点，很快就能分辨

新老，唯有新来的女同志不易鉴别。当时上级指示夜间不准外出看戏，看电影，要去必须整队。为了安全陈世德政委等组织我们老同志每晚带医大毕业生放游动哨，因为新同志连枪还打不响。

次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曾调包头市东门外军区后方医院工作，该院原班人马是董方的，我军派入的同志毕竟是少数。由于地处东河村的南边，院墙北面东面都是董方部队刘万春卅六军驻着，听同志们说，这里更是复杂，白天都是解放军模样，然而晚上吃喝嫖赌完全国民党那一套生活习惯。由于敌特的破坏，夜间常闻黑枪声，就是医院内部也与我们大不一样，里边有义父义子、大小婆、日本太太，住院病人里还有一名过去当妓女的女兵、我军叛徒……，总之，看不惯的事物屡见不鲜。这样乱嘈嘈的医院，怎会有成果？！

这些混乱情况直至“镇反”及将原董方部队组成廿三兵团移防内地河北后，这里才逐步平静下来。我方的老同志们时有议论，表现对“绥远方式”不理解，它虽避免了大量同志的伤亡，却给少部分派入董方部队做统战的同志们带来很多困难，后患可谓不算小，如采取正常打仗的方式要比这干脆得多，长征老前辈也不会牺牲，然而杨大队长却死于哗变敌手。末了，还是离不开部队对这伙人进行改编、“镇反”和剿灭残匪等措施。当然党中央、毛、周、朱前辈是高瞻远瞩从全国一盘棋出发，而我们因所处的小兵地位难免一孔之见。



### 3、解除思想“疙瘩”，促进改编的进程

我们进城前部队一度思想混乱，由窃窃私语变为公开不满，主要有以下几件事促成的：

1) 我们当时驻防集宁，听说是中央派傅作义赴绥慰问他过去的部下，每人×块白洋，乘专列经集宁去归绥。军区请傅去暂息，他的专车停在车站，人们纷纷好奇地去看专车，见车果不寻常，车厢走廊都是紫红地毯，当即有人骂起来。虽然都知中央此举是为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的，但一见是傅作义乘坐如此高级的车（其实也无现在的软卧高级），人们都想不通。集宁地势高耸，风大不断，气候很是寒冷，人们纷纷三五成群地在严寒中去看傅的专列。专列底确成为勾起积仇的导火线。

2) 傅作义又成了我绥远军区司令员；

3) 出了一位不寻常的副政委王克竣，人们传说他是傅、董的高级“政工骨干”。

4) 他们（6月8日）已签了“和平协议”还杀我们的人（将好坏人混为一谈的观点，实际王士鑫烈士牺牲早于“协议”签字日期）……

同志们发些牢骚也是事出有因，难以避免的，（我部队中流行如下牢骚话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干脆回家抱娃娃”、“特务头子成了我们的副政委”、“开党委会他参加吗？”

……等等。可能上级发现部队思想混乱，所以，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宜民同志在集宁桥东礼堂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由于我是警卫营医生，所以也被通知参加了会议，这个礼堂除有一个舞台外，地下空空如野，无凳无座，人们席地而坐听雷主任讲话，开始未料到这个会的重要性，但越听人们思想越趋于集中，最后起到顿开茅塞的积极作用。雷主任针对人们思想大致谈了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起到了给我军基层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之目的有：

1) 派傅作义去归绥做他部下的工作，你看他们不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话，但听傅的话，他不去前他们就顽抗；他一去就起义了。毛主席还说傅作义有劳绩。我们应该宽恕他。傅作义的话他们听，这是让他去归绥的基本用意，不要只看他坐的什么漂亮的专车；

2) 不要只看他是司令、政委，我们还是听我们姚司令员高政委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或许同志们还记得我军包围绥、包中，突然接到立即撤除包围的命令吧，为何？这时北平还没解放，为何撤除？当时蒋介石拉傅让他南调，傅说共匪正包围着他的家门，不能离开老窝，离开有困难。就是傅作义正在与蒋介石讲价钱，我们得知后，立即撤除包围后退数十里，以堵傅咀，促他早下投降的决心。同志们要看实质，不要只看表面是我们的司令员；

3) 那位副政委他不代表共产党而是他们的代表。他连共产党员还不是怎能参加我们共产党的党委会呢？

当然不能参加。他是我“绥远方式”特殊条件下的副政委。

4)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大家深受过其害。我们的一切做法，无论专车、白洋、司令员、副政委等等，只有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我们，特别对“消灭敌人”四字是同志们未解的症结，消灭敌人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人喜气洋洋士气高涨。这次首长讲话，是我见到的最为成功的政治思想工作范例之一。

记得我们还专门学习中央制定的“城市纪律的决定”，以适应进大城市后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都齐心为了“绥远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消灭敌人为目的的党的政策而努力奋斗！

#### 4、反谍胜利，一网打尽

有这样一件人人皆知、皆大欢喜、人人点头称赞的反奸细胜利成功的案例。不但尊重董其武将军等起义同志，而且消灭了起义军中少数害群之马，人鬼分明，新老拍手称快。

“9.19 起义”后，暗藏在董军中的敌人虽然大势已

---

政委，就牺牲在鄂毛驴的魔窟。包头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也不是真心起义的好人，也跑不掉蹲班房的后果。

“9.19 起义”后，他们以其反动本质在包头密谋策反哗变，刘万春等派了他们心腹一个营长，经大陆转道香港去台湾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联系，得到蒋的大加奖赏，回到包头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又二次派这个奸细去台请示，得到蒋的重赏，给鄂友三等每人一份重奖和嘉奖令，给刘万春一份委任状，委任他为绥远省主席及重要军职，并给他发来一份电报密码，以资与蒋联系。但这伙反动分子高兴得太早了，我们的保卫部门早已掌握了他们的全部活动，当这个奸细携带奖状等一登陆，已早在数天前发给各地逮捕的命令和这个奸细的相片，当这个人正要在北京转车去绥中，一下车即被我北京站公安人员将其抓获，并查出这些作案的证物。而刘万春等还在绥等候这个奸细带来蒋介石的命令呢，而这个奸细已落网于人民手中，该犯供认不讳，自然这个人也要和其主子一样得到应有的严惩。

中央掌握了确凿证据后，指示绥远军区，通知所有师以上高干到北京饭店开会，据说我军区首长只有三人知道要在这次会上逮捕上述坏人，这三人是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并由姚高二人通知了起义将领董其武，事前已慎重讨论与分析，必须要通知董，因为要抓他的人，不事先告诉人家，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不信任；据分析告诉了董，他也不会事先泄密给刘、鄂、

张，因为他们的立场、观点已起了分水岭似的变化，而且董如泄密也会考虑自己的后果。果然这样作后，取得预想的结果，听说董将军只是向姚、高求饶给他们留条命吧。

各军接到通知后，都按时来到归绥集中，刘、鄂等见有他们的“代表”董其武、王克竣等同往，也就无何疑虑地乘车去京“开会”了。听说一进北京饭店，我们早有准备地立即将刘、鄂、张下枪逮捕，宣布各自的罪状，将鄂友三、张朴押赴刑场枪决，结束了他二人罪恶的一生，将刘万春押赴监狱看管。据说中央首长为了留下一个反面旗帜将刘留下，我国十年大庆时，还将刘万春等特大罪犯送上天安门“观礼”，回狱刘万春懊悔莫及，痛哭流涕，表示服罪要更好的改造自己。

接着高干会开始，由薄一波同志讲话说：“你们（指董等）的路走对了，起义的路是光明正确的路，只要按《绥远和平协议》走，就既往不咎，人民会谅解宽恕的，是会受到信任的，假若破坏协议也会新老帐一起算，受到惩罚的，我们共产党是从来说话算数的。刘、鄂、张与人民为敌，是咎由自取的可耻下场。

记得此后还曾特开直属队军人大会，由军区首长副政委王克竣传达宣讲北京饭店高干会议的正确性，并指示各单位回去认真讨论理解其意义。

当年1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廿三兵团，司令员董其武。随后该兵团东移驻防河北内地，听我家乡人说：“有原傅作义部队几十人哗变，跑到我

老区完县，就被民兵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廿三兵团，在朝鲜战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5年授衔董其武为上将，据说董谦虚的不要说他不够，聂代总参谋长说“你够”。然而已年迈的董其武同志已在1984年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驰名中外的起义将领。也毫无疑问的董虽还是董，但已变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人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军高超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水平。谁说我八路军是大老粗、土八路？然而董军中的间谍竟被我大老粗如此了解得淋漓尽致，此次反谍如此成功，可谓对“军队解放军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加速了改编速度，缩短了统战进程。而且在如此敏感随时可能砸锅的重大问题上，又如此恰当的信任、尊重起义同志们，这是“统战”这一法宝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应用成功的范例。从此，人妖分明，互消疑虑，加强了新老团结，岂不是我党政策的又一次胜利！但也不能否认“统战”工作用于带枪的对象代价是很大的。

## 5、我院进城前后不同的感受

我随警卫营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归绥，大约历时40天于1950年2月又调回老平地泉医院外科工作，前不久来的王翰宇、赵璋等华北医大毕业生，他们热烈欢迎我回院工作，是因为一个医院，尤其是一个野战性医院没有外科是无法进行正常医疗的缘故。过去我们素不

相识，我又不是白校学生，他们对我的了解是完全来自我院医护和李俊、赵三等伤病员的。当然只要各科需要我外科协助之时，我们是大力支援的。

大约 1950 年 4 月份，李振智部长指示我院全部进驻归绥，他亲自带数人去看房号房，其中就有我一个。指定我院驻归绥小校场，这里是国民党、日本鬼子驻过的兵营，营门座北朝南，前面是开阔的大操场即小校场，有四五个大门成一字形排列，我们是第二个门户，西邻我 71 团，门前马路东通去火车站的大马路，西面有直通向南进旧城（北门）大北街的小马路，后面是乱葬坟。我们进营门后，见到唯一的一栋日本修建的带阔走廊的高层平房，房间较长、较高，房分阴阳两面，中间只有一间二层小楼，号给李部长驻，这栋大房从西往东住手术室、外科室、药房，阴面消毒室作敷料，由此往东共有十来个房间可作病房，共可摆床近百张。这栋房的东头有孤房可作隔离室重患室及太平间，后面有几排低矮的平房可作行政科室、宿舍，在内科要求下，全部内科均住在后面平房，王翰宇医生主动要求将妇产科病房及产房设在后面平房。然后将营房粉刷一下，摆床完毕，就让全院工休人员迁入归绥新居。

5 月 日，全院从老平地泉往苏集上车，直达归绥车站，我们先到的同志分工接同志们来院居住和工作。天已黄昏，全院人马来到，并有管理员周双合领各科同志去指定的住处。我特地去接贵银来院。那时由于战争环境，全院也没有多少东西，两马车就拉完了。同志们

住进“新房”，自然电灯照明比农村是好一些，然而由于房子太少，拥挤得很，不要说照顾夫妇的住房了，就连公共宿舍也还不足。

由于进入了城市，医院组织机构不得不有所改变，各连已取消，最基层就是科，我后方分院奉命改为绥远军区分科医院，院长黄光煜、政委陈世德、副院长刘保田、医务主任武少猷下有助理员刘玉杰，政委下面有政治干事金文瑞，成立总务管理科由刘双合、赵三楼负责，全院只设工休两个大厨房，设清洁班，即洗衣班，贵银由伙房调去洗衣房工作，虽然还是冷水洗衣，但比山西孟县条件要好些，使用压水井。

进驻归绥市后，虽无大的突破性变化，但各科机构与工作秩序日臻完善，当时已正式建起：内、外、妇、儿、五官（口、眼、鼻）、皮花等科，手术室归我外科领导，产房由妇产科领导，辅助科室建立了：化验室、X光科（由池云升操作一台200Am85KV的小机器）、药房调剂室等科室。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将工作开展起来，在治疗上开展了一些新的项目，如：刮宫、接产、卵巢囊肿切除，我外科肠梗阻稍有增加，肋骨切除、三针交叉取异物成功、拔牙、皮肤局部治疗、透视照相、一般化验一律蒸气消毒、血压检查等项目，但在技术水平上仍未超越腹部外科的水平。实际等于“放大的老平地泉”。让我代理医务主任兼外科负责人，这时武少猷主任已全部回内科工作。另一无突破性进展的原因，部院个别领导对傅作义的老窝，估计过高



认为必有高级技术的医生，实则适得其反，他们空空如也，有一所医院驻包头（后改为军区后方医院），所以，又回过头来，重视我院使其成为绥远军区的医疗中心了。我们的任务扩大，接收全军（无论新老）送来的伤病员。

我院团级建制，全院几百人，进门出门、抬头低头都是着绿装的男女军人，看不见一个老乡了。过去的化整为零已无必要，相反随战争胜利和建国后的新情况反到需要化零为整，将连的建制完全取消了已由科替代，从长远看，必须集中建立大而全、现代化正规化医院，但从我军长期在农村办院实践来看，军医性的医院，缺少了群众（老乡）的支援，是万万完不成任务的。进城后缺少了老乡的支撑力量，短时期内还不以为然；久而久之，不能不说对我军民关系密切程度上是潜在的重大损失。

从 1950 年 9 月分科医院“秋季工作总结摘录”（见《医疗杂录第一集》154 页至 156 页）可以看到：

外科：兰尾全季共作 10 例。皮肤转移术，治疗皮肤结核，对成形外科的基础知识有所实践，并扩大范围用于局部秃鬓（罗占清）、瘢痕秃发（李怀林）都取得满意的成功。痔核、痔瘻、手术治疗有所进步，对不全瘻管切除准确缝合消灭死腔而速愈（王顺田、苗生贵）。从淋巴腺（结核）摘除患者武元生的手术治疗中，首次发现触诊腺体数与实际数相差悬殊约 1:3 或 4:7 之比。Pantothol 静脉麻醉已开始学习。

内科：Mapharsan 治疗回归热，在 6—8 小时内退热，樟脑酒精澡对结核盗汗及胸痛有显效。肺结核病人用氯化钙治疗，每日静注一次 5% 10cc 的无效二例小结。

眼科：推行 Penicillin Palaffin 混合液点眼。砂眼治疗：颗粒压出法，血管翳自家血疗法。

……从以上，现能找到的纪实片断推断，水平仍未超出腹部外科。因为这个总结，是我代医务主任中，由我收集各科资料自己撰写的，所以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任何疑点的，是最后一村的水平的。

当然，进驻归绥小校场后，工作、学习、生活较农村更趋于稳定和经常。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可否认的有一定优点，如电灯比麻油照明好得多，电话我院 2034 号至今还记得，通信员跑腿口传的比重有适当减少。由于作息时间统一，所以每天的活动几乎程式化，即：每晨跑步早操、早饭、查房手术、午休、学习或开会、小查房、晚饭、自由活动或开会、熄灯，闻号令统一行动。每周六晚上多半放映电影，如《翠岗红旗》、《钢铁战士》、《白毛女》、《狼牙山五壮士》、《留下他打老蒋吧》，还有活泼明快的苏联影片《夏伯阳》、《沙漠追匪记》等许多政治性、艺术性都很好的影片，至今仍感生气盎然。在农村从无何活动的星期日，这时白天只要不值班，还可与伴侣或同志们一同进旧城逛逛或看戏，回民区与旧城的阁式三层古建筑，可以鸟瞰旧城大北街东顺城街全貌，内有一头多面及多手的神塑，是很

好的古迹，由于阁下太窄影响公共汽车通行，于1963年回民区遭水灾前已全部拆除，十分可惜！还有路西“都一处”的饭庄内，见到了涂脂抹粉红咀唇的所谓“女招待”，不过对我们穷八路来说，一不吃酒席，二不给小费，顶多吃碗面条，所以不受人家欢迎也是肯定的。还在北门外文化馆的展览上，见到了那时正在劳动教养的一群妓女的照片，妓女中有小脚老嫗，也有年青女孩子，过去只是听说大城市里有这一行当，见到照片，更加证实归绥的确如此。但这些女招待、妓女多半都是穷人出身，是饱受压迫的阶层，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摧残妇女的罪恶。全国解放之后，她们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中国有用的人。

我与贵银也曾一同到新生堂看过电影（后改为人民电影院），也曾经看过晋剧名伶康翠莲的《海泊娶妇》、《天仙配》及从北京来绥演出的评剧名伶喜彩莲主演的《吕布戏貂蝉》等脍炙人口的优秀节目，评剧戏报是《翠屏山》，但由于我文化局的干涉而禁演，可见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人们的精神食粮是认真选择的，在这新老交替乱嘈嘈的归绥城里很需要严加管理的。“镇反”以后，社会秩序大有好转，人们才敢于夜间外出看戏看电影了。

1950年已开始发苏式夏装，干部大沿帽、黑皮鞋、短上衣，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的首次改革，并第一次减去吊兜，女同志们一律大沿帽，连衣裙装，别有一翻风姿。

我院文化教员是董军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在陈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对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如数学、语文）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过头来加以思索：为什么生活设备、文化生活等条件都优于农村的大城市，还要我们老战士夜晚带医大“新战士”放哨呢？如果有游击组、有广大的老区老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何必要白天当医生、晚上当哨兵呢？！老区人民是我军的基本群众，有了他们，我们就会精神充实、自然的安全感；没有他们必定精神空虚与失落感。党将我军与人民的关系喻比鱼水，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后来实践过的访贫问苦、巡回医疗、军民共建等方式，无疑是对军民团结是有用的措施，然而必须看到，由于我们进城离开了“房东”，总比进城前低头抬头“一家人”接触群众的机会少得多了。我认为由于革命进程的变化，环境、任务变化，与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八左右的农民不同吃同住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不可忘记他们对我军革命时期办医院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忘掉就一定是变质了、忘本了。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住城市，城市有城市的群众，我们为他们服务、受他们监督就行了。”这话也对，但不全面。因为我国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农民。如果忘了或削弱为农民服务的办院宗旨，就实际上已否定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思想。必定会脱离党的基本群众；久之是很危险的。

总之，依靠人民支持办医院，是我军多年来的历史

事实，是我军民共同创造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一条在任何恶劣条件下均能胜利完成医疗任务的珍贵经验。简言之，办医院就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人民群众（包括多数是农民群众）治病的天职，否则要医院干什么？

### 附：这段战绩

按《解放战争纪实》440页记载（减去我院驻防最后一村老平地泉新中国未成立前的七、八、九三个月歼敌350500人）：我人民解放军战绩公报为（自1949.10.1至12.31）“共消灭敌军1205500人，即消灭敌军259个整师，缴获各种炮7403门，飞机49架（内起义5架），舰艇49艘（内起义18艘、投诚6艘），解放县以上城市953座。”

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315页“总部发布解放战争四年（1946年7月—1950年6月）战绩分报：

1) 消灭敌军兵力：正规军——两个战区总部、一个剿匪前进指挥部、一个长官司令部、三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边区司令部、35个兵团部、4个整编军（内三个兼整编师部、183个（整编师）部、572个整师（旅），包括师以下部队共5542470人。非正规军——103个整师（旅），包括师以下部队共2528880人。两项总计，消灭敌军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内被俘者4586750人，毙伤者1711110人，向我投诚633510人，起义者846950人，接受我军改编者293030人）。

2) 向我投诚及被我俘虏与击毙之敌高级军官 1668 名, 计: 投诚者 273 名, 被俘者 1310 名, 被击毙者 85 名。

3) 缴获: 大小炮 54430 门, 各种机枪 319958 挺, 长短枪 3161912 支, 掷弹筒 21462 个, 枪榴筒 15191 个, 火焰喷射器 228 具, 飞机 189 架, 舰艇 200 艘, 坦克 622 辆, 装甲车 389 辆, 机车 1016 辆, 汽车 22012 辆, 击落敌机 190 架, 击毁坦克 156 辆, 击毁敌军舰 9 艘。

4) 全国解放国土面积 8495500 平方公里, 人口四亿八千二百五十三万二千, 县以上城市 2031 座。

此外, 我军共负伤 1048900 人, 阵亡 263800 人, 伤亡共计 1312700 人, 被俘 13700 人, 失踪 196100 人, 总计共损失兵力 1522500 人。敌我四年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 5.3:1。”

## 6、剿匪与手术队工作总结 (摘要)

自认为不可一世的反动分子, 随着 1950.3.31 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而自食其果。这些人本来早就对人民犯有罪, “9.19 起义” 既往不咎, 就是对其很宽恕的英明政策了, 但他们继续残害人民, 当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记得归绥第一次枪决三人中, 就有杀害彭子昌政委的那个凶手, 大快人心, 认为彭政委可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了。

后来逐步而迅速地掀起了群众性“镇反”运动，在归绥新生堂（人民电影院）大加宣传，开公判大会，而且按法律顺序问答验明正身、背插处决的令箭牌、推上囚车，从众目睽睽的大北街押赴刑场处决。人民（包括开明的反属）拍手称快，从而夜间黑枪声、暗杀等匿迹了，人们也敢于夜间上街看戏看电影了，社会秩序大为好转；而暗藏的敌人则吓得要死不知何时被捕。每晨我们在分科医院驻地前面的小校场的操场上出操，有时驶来卡车，在操场上点名，让他们站出来，宣布他们被捕，装车拉走法办去了。不几天后旧城东门外，一张大布告上就有几十个人被判刑，多人判处死刑。从此，原来暗藏的敌人急了，不知何时点名装车，我们则喜看敌人的威风扫地成批坏人被逮捕的正义行动。

1950年12月，紧随廿三兵团向东拉走移防内地，中央及军区指示立即开始后山（大青山北）的剿灭残匪战斗。四川、西北、绥远都是全国驰名残匪最多最凶的地方，而我绥远可能是剿匪最晚的军区之一了。因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311页记载：“1950年1月，我军进行大规模剿匪斗争。……贯彻执行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及其它反动武装展开清剿斗争。……经过1950年至1953年的剿匪斗争，我军取得了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的伟大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廿三兵团一走，成批暗藏敌匪的温床被拔除，再加“镇

反”与剿匪，匪巢得以清除，社会秩序大大安宁了。

随廿三兵团东移立即开始后山剿匪，我卫生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是军区卫生部医务处处长、长征老同志程传忠同志负责，命令让我带一手术队同往，记得手术队人数不多，医生中有张英、陈志忠等同志组成，技术力量是精悍而有战斗力的。我们于12月28日之前奉命从归绥小校场出发，与程处长同乘一辆卡车，开车疾驰经大青山南麓红山口，上险路蜈蚣坝后，缓行在大青山绕山间开辟的公路上，行至一处地势陡峭下面是深壑处，司机同志停了车，下车向程处长报告说：“长官，请暂下车吧，这段路太险，绕过后再乘车”，大家一听“长官”二字即知这位司机是董军中的新同志，大家感谢司机好意，空车西行约100多米方乘车，从山顶回顾该岭的确是条很险的路，险就险在无任何缓冲地方，后来多次改修并铺油路后，仍每年多少总有车毁人亡之事。车上山巅再向西北下行之时，路就比较平坦得多了。我们当天宿营在武川县城东南居民区内。没想到从12.28剿匪战斗打响，29日夜间接收伤员，却一直未变地方，一直将剿匪医疗任务完成。

这一带是鄂友三最为活跃的藏污纳垢之地，由于鄂匪依仗势力搞女人很多，几乎每村都他的干女儿之类，所以，人们给起绰号鄂“毛驴”。但这里也是我绥蒙军区骑兵游击队黄厚同志的老根据地，所以，黄厚司令员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武川城里也和乡下一样，大多土房矮屋，气候很冷，睡觉常被冻醒，窗子上长满



冰霜和银挂。居民大多主食山药蛋莜麦面、辣子占咸汤。老乡作的鱼鱼、窝窝等莜面熟食制品，可真有独到之处。我们吃饭外行，都习惯先挟莜面于碗内而后浇汤，人家一看就知你不是后山人；这里的食法是每人先盛大约半碗咸（菜）汤，然后在热炕上盘腿端坐挟莜面蘸咸汤吃。

由于气候寒冷，无论烧柴烧煤家家户户炕很热，无论男女都穿红腰子（即棉背心），婴儿出生不久，即穿上腰子以防着凉。

武川县法院不断枪毙罪犯，有一次枪毙两个惯匪，其中一人是杀他妻子和岳父的杀人犯，名子忘记了，另一个惯匪叫白三娃，那时杀人没有囚车，连大车也不用，犯人从监狱提出直至押赴西门外刑场，要走很长一段路，不宽的大街人山人海，刑警队持枪两行纵队开路，犯人背插小小的枪决令箭牌，戴着沈重的脚镣，五花大绑，行起路来极其缓慢，刑警队的战士们维持秩序不准太接近罪犯，小脚老太太们，一直吃力地追赶着这些“灰格泡”（杂种，骂人话）看其可耻的下场，押到西门外一片沙滩地后，刑警扇面向刑场四周扩展俯卧（以防劫刑场），执法刑警则推搡着罪犯至刑场的合适位置，命令他们跪下，后面开枪处决，白三娃一枪即截倒在地，面部全被炸掉；另一杀人惯匪，连毙三四枪，仍鼾声大作，才由执行者加刺刀刺死。后面就有老乡跑去抢人脑，血糊糊的捧在手里，说是治病用的，接着两个背锨的老汉，就地铲些浮沙将他们埋掉为止。人们包括

小脚老太太们才喜洋洋的离去，这对内地胆子较小的老太太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原董军大队已拉走了，但仍有不少国民党、鄂友三等的残渣余孽，继续依仗其地形熟悉和骑兵等优势为非作歹。有一天，离武川城不远的小村里的小学教师被土匪活活用绳勒死，土匪们说他向我军报告了其行踪；相反，土匪们曾在一村老乡家喝水打尖（实是土匪侦察员），夜间来到该村，作恶多端，唯独没有伤害这家，以此威慑当地群众。

随着剿匪深入，曾捕获一批土匪俘虏，大约 20 多人，从前沿押来武川城里监禁，我们曾去看过，一个个贼眉鼠眼多穿白茬老羊皮袄，并有一人刚剃了半个头就被我军抓获了，老乡们也认识其中的坏人，据说里边有重要罪犯，拟不久枪决示众。这批犯人押在一个老乡小院的北屋和东屋，可惜我们的警备战士缺乏高度警惕，只注意门窗的看管，忽略了房顶是土的，没料到土匪们避开我军战士的注意，将房顶挖开一洞，当夜有数名土匪越狱逃跑，击毙一人，正是那个剃了半个头的家伙。从此，加强了看管，夜间更提高了警觉，以防再生意外。

有一天上午，从前沿驶来一辆卡车，卡车的前面护栏上，面向后捆着一个土匪，武川的乡亲们，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鄂匪的团长李春英，他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罪恶滔天，因而不少老乡向李投石击其头面部，经押车战士劝解，人们也不听，受害者仍用小石打李，以出

气，有人愤怒的说：“李春英你也有今天！”这天天气特冷，李犯两手在捆绑下冻成紫色，垂头一声不吭，任愤怒的受害人群尽情追打。这个人因影响面很大，拉回归绥出告示枪毙的。

由于我军处于胜利者剿灭败军的绝对优势，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从 1950.12.28 战斗打响——51.1.9）就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由于战斗的时间短，所以伤员少，任务轻，在武川作了几个病理性疾患如“疝修补，并遇到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名骑兵疝囊内容为膀胱脱出者，还做了神经纤维瘤等手术。伤员一共不出 20 人。我的“手术队工作总结”，成文于 1951.1.9，文中共总结了三个问题：

①、无统一的领导，使工作遇到障碍。一去武川，就让我队与四分院一个连（所）共同工作，但主要手术任务又是我们承担，病房归他们，影响及时接诊，伤员程连的手术延迟一天多。行政上也不能协助我们进行医疗工作。这是伤员少，如果任务大，工作更受影响了。

②、从负伤到入院，手术时间一张小表，可以看到此次剿匪战斗主要在：第一批 12.28 负伤，29 日夜入院，31 日上午手术；第二批 1、2 日上午负伤，3 日下午入院，4 日上午手术；第三批 1、4 下午负伤，5 日晨入院，5 日上午手术。可以看到伤后 20 小时才能得到手术治疗，失去了初期切除疗伤的良机。幸亏伤员不多。

③、汽车是运输伤员的好工具，然有因坐汽车使本

来无完全骨折的肢体完全骨折的病例有之（如程连）。

## 7、与日本人一同工作的回顾

这些人都是我军东北战场的俘虏，少数（满洲国）东北生人。我军政策一贯是只要放下武器投降，就不能杀害而且优待俘虏。他们一批约卅人左右随朝鲜战争爆发，东北成为当时的前沿阵地，可能为了安全，将他们调来内地工作，他们来绥后先在我分科医院后去后方医院工作，直至1953年夏全部遣送回国。我在抗美援朝这一阶段也由军区分科医院调出经健康大队来后方医院工作，所以，接触时间较长，经过约三年，在这一特定环境下一同工作、生活，对他们有了深刻的了解。我认为这些日本人多数是好人，由于我国和他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教育，已变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及个人间的友谊。如成田、五十岚××等朋友，回国前表示“不愿”回去，怕某些人在中途海上迫害他们，五十岚××行前与我在一起谈了很久，我鼓励安慰他回国去与亲人团聚和为日本人民服务，成田回国后，曾来一信给我，大大赞扬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八路军是最好的军队，充满十分友谊之情。

也有漏网的罪犯如××（内科医生），在包头第一批遣返的同时，公安局来人先将他唤出来宣布逮捕问他：“你明白吗？”“我的明白。”服服贴贴被带上手铐入

狱，后果如何，以后再无听到。

也有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人，例如：他们中有一位标准的日本长象的××一郎，他是帝大毕业的外科医生，胖墩矮个，不足四十岁完全秃顶，满腮胡子，汉文程度高，汉字写得好，能操外国人式的中国话，如腓，他读“排”，说话虽吃力，但配合动作和写字可完全交流。他从不枕枕头睡觉，使用着一个十分破旧不堪的小脸盆，人们问“××医生为何不买个好盆用？”他在手上写了“卧薪尝胆”四字，他又说“中国的佛教是从日本传来的”，我们严以事实驳斥日寇侵略，他哈哈大笑。有一次，在我们闲聊中，他说他参加了1941年对我晋察冀的“扫荡”，他在纸张上画着准确位置的小地图——黄土岭、银坊、倒马关，并说：咚咚……到处敲地的声音，看地下有无地窖？有人问他：“那次你抢了多少东西？”他说“没有。”“那次你强奸我边区的妇女没有？”他边笑频频摆手“没有……”。有人问他：“你常常有情人来信，你回国后干什么？”他写三个字“挎洋刀。”根据这个人的言行，他肯定是参加“扫荡”我军的日本鬼子无疑。我想这个人从根本上说，他不是我们的朋友。在他身上显现着鬼子的魔影。

他们中大龄妇女很多，如：××妙子，妇产科医生，还有护士××橙子，××美子等人，都是举止端庄、文温尔雅，除在工作、生活与我国同志相遇行我八路军的举手礼外，她们也常对人行鞠躬礼。还有一位老女护士，责任心堪称模范，在包头一分院1951年接收

首批志愿军伤病员中，有一位抑郁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是文书，识文断字，但从来一声不吭，屋里吃喝，屋里屙尿，进屋臭气薰天，还不断用粪便胡乱写画在墙壁上，所有人都无法将该患者的卫生搞好，只有这位象老大姐般的女护士，铲去墙上粪便，用大壶提温水，将该病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换洗衣服，拆洗被褥，开门窗通气……，不到一周，终于将这肮脏的病房改变为清洁无臭的休养治疗场所。这位从不离屋离床的病人，也终于能摇摇晃晃自己出来走一走，虽然病人仍抑郁不说话，总算离开了屎里的小天地，全院工休无不夸奖这位女护士，可惜她的姓名已无法回忆起了。其实她并无何绝妙之术，就是用不怕脏臭的辛勤劳动换来了患者的舒适，她能这样做而且很出色，就足以说明她尽到了“病人卫士”的作用。

还有那位××妙子医生为人正直，有一次，所有日人在“水上漂”的戏院开会时，曾有人发表反动言论，妙子面红耳赤仗义执言予以驳斥，申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了罪行，应该悔过自责，由于我们语言不通，成田干事回来说妙子的言论是正义的，表现得好。

也有嘻皮笑脸的一位“假小子”，爱跳舞，很愿找中国丈夫。

最年轻貌美的××佐一，她喜欢跳舞，但我军当时不会也不准，终于嫁给了比她年长十多岁的内科医生××素行。

男护士石原，和我们同室居住，是个很讲正义的

人。

多数人注重礼节与文明，例如鞠躬礼，以我看来它总是文明举动，不能与其奴化教育视为一谈。但也有很不文明的人，如××重广医生，对其妻子曾恶狠狠地打骂，日人中只有他的夫人是随军家属，没有工作，在家除夸背着儿子外出买菜买粮抚养小孩以外，就是侍候丈夫，还是用他们民族的习俗，跪着给秋野递送茶饭，忠心耿耿地照顾丈夫，然而还有时挨打受气，一次打得鼻青脸肿，依然忍气吞声。可见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表现很突出。

××一郎有一次谈话很有意思，他指着包头东门外一分院的原日本军医院王字建筑说：“这个医院在日本是乙级的，有80人就可完成任务，”我们警异地问：“你们那样少的人怎样完成医疗呢？”他答：“你的是院长，我们院长查房，所有轻病都要喊起立，并喊“立正！敬礼，重病人起不来的也要睁开眼睛；否则，院长‘三揆的有’，（打）！”大家都笑了，原来你们是用军阀主义管理医院，那么，80人也多，再少些也能“完成任务”，他又说：“星野的（内科医生，在日军是联队级医官）对我们（相当连级）可以‘三揆’的干活；现在他不敢了。”一分院本部收480多人，加之结核连、健康连起码伤病员600名以上，而工作人员400多人，全院同志兢兢业业地在各自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还要发扬民主，虚心听取来自休养员批评（与表扬）建议；而日本鬼子在医疗战线上实行它不尊重人格

的打骂方法来“管理”医院。我们的官兵一致相互尊重；而他们则可上打下级。由于我们将他们俘虏，实行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使之他们之间原来的不平等关系也得到改造与制约，星野也不能打下级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深刻的改造，对他们等级制消除，非我军则不能之。

日本朋友掌握的好的医疗理论与技术，我们也努力组织学习，现查笔记（《一集》）：1951年2月27日××素行讲了“人工气胸”，2月28日—3月15日讲“药理总论与各论”，如作用于中枢N系统的药物 Camphor Coffein strychnin. Lobelin Alconol, 镇痛剂中：原因治疗 Uorphenin Opii 等。××一郎 1951年3月6日讲“骨折治疗的常识若干”，及留下了“石膏床”近似鸡蛋壳很简单易行的治疗脊柱结核、婴儿股骨骨折纸匣悬吊固定法等，星野于1952年10月7日讲 Asiner 氏征候（压眼球现徐脉）、Heid 过敏带（胃溃疡）等。从上述内容，看来是适用的，有的至今还有用。

他们中几对夫妇的子女都很活泼天真可爱，如大胡子××一治的小女××真人就很惹人喜欢，他们掌握两套熟练的语言，对其父母用日语，对我们则说标准的包头话，第二批走得最多，我们许多同志到车站送行，相互都很依依难舍，尤其××将小女从保姆手里强制性的抱走之后，小真人双腿乱蹬喊“姨姨！我不走，我不走……”保姆哭得泪人一样，就这样悲喜交加地送走了这些在特定条件下一同共事二年多的日本朋友。



他们好的方面（好的技术、老女护士的责任心）我们虚心学过来为我军服务。回顾这段也颇引人深思。

### （三）为抗美援朝战争医疗服务

1950年在归绥稍稍“平静”，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难移，它又在6月25日发动了朝鲜战争。《聂录》733页：“……十月一日，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举进攻，并向我东北地区边境鸭绿江、图们江逼近，还以空军袭击我国东北地区。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一场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0月8日，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30日，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大约夏末秋初，绥远军区在归绥麻花板广场召开大会，号召与动员赴朝参战，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全院同志表决心服从组织的召唤。《聂录》736页：“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江，10月25日，美军进鸭绿江约三十多公里的大馆洞，我们同敌人接火，开始了第一次战役，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一入朝就连战皆捷，为胜利奠定了基础。10月至12月志愿军举行三次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了三七线以北广大地区。1951年1月，

志愿军举行四次战役，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朝鲜战争统计（按《大事记》）：“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6.25起，和10.25起至1953.7.27为止，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其中美国侵略军397593人，李承晚伪军667243人，其他帮凶军29003人。1958年3月，我志愿军从3.15至10.26，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

《聂录》759页提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员抢救、后送、治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朝鲜战场，在后方，都发扬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迹和经验。今后，我们必须在着重加强战场抢救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如何组织好重伤员的后送工作，并且要十分重视野战医院的建设。”这是作为当时我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对医疗工作的一段话，做为我军医院一部分的绥远军区后方医院走过一段不同于抗战和解放战争之路，不同之处就在于建国后的物质条件大大好于过去，接收朝鲜战场大批伤病员的医疗任务。我仅以当时驻包头市一分院的情况辅以其它加以叙述为抗美援朝的医疗服务情况。但随着接收志愿军伤病员的任务，而拖住手脚使我后方医院不得不实际在1954年集体转业归地方领导，包头至今还有个别的伤员留包长期治疗的。

1951年初已有准备接收志愿军伤病员任务的消息，

我们做为已报名随时听从召唤的下级来说，是随时要有赴朝参战的思想准备的，大约四五月份，我分科医院接到命令要调我们数人去玫瑰营健康大队工作，准备接收志愿军。我和贵银同往，就经集宁小东门外向东过了霸王河步行40里，来到玫瑰营，大队长是从某骑兵部队调来的陕北红军老同志，卫生所长郭增义，我是主治医生，我们都住在天主堂里。我们盼望赶快着手准备接收医疗任务，然而这位大队长所抓紧的不是接收医疗任务而是军事训练，尤其早操抓得很紧，我和老郭着急赶快建立医疗制度，训练人员，因为接收的不是健康人而是伤病员，到时主要任务是我们的。正在这时，见到一个马戏团的艺人们穿红挂绿，在铜鼓洋号的导引下，在玫瑰营东西往返穿过很有吸引人之处，我和贵银等生平首次看了马术杂技表演，如高空翻跟头、小脚老太太足蹬罐子、车轮的蹬技、钻火圈、钻刀圈等硬功及在马上各种表演，在当时是有水平的技艺。老实讲，我很发愁来了任务怎么办？制度、组织刚刚硬着头皮有所准备。正在这时，又接到指示，让我马上去包头后方医院报到，说是调错地方了，我很高兴，因为这个健康大队以我看来无法接收医疗上的战斗，因为指挥员所指挥的不是要打医疗上的仗。听说不久，解散了这个单位，白白劳民伤财一番约一月。郭增义医生后来调到公安医院工作去了。

我奉命与贵银从玫瑰营动身，首先来到寒冷的集宁乘火车，途径卓资山、旗下营、归绥、麦达召、萨拉

齐、蹬口等站到达终点包头，早有白树基主任来接站，我们一同换乘马拉大车首先来到东门外一分院住下。报到后，首先在一分院上班工作，已如前述不赘。

不久，又调我到新成立的三分院帮刘贵平院长共同组建各连并立即在南门外着手训练护理员 150 人左右，我亲任教员，短期训练达到能立即应付工作的目的。当年冬初又奉命赴农村小巴拉盖驻防的二分院任主治医师，在我军当时还无统一规章制度情况下，立即建立有统一效能的工作制度及医疗组织，健全是头等大事，刚落实，约 40 天后又调回一分院任医政股长工作。这个“走马灯”式的频繁调动，我自感尽了我主治医生天职，走到那里，准备接收伤员的工作就落实到那里。我认为这还是大同战役时成功经验的复现，做到有备无患，来了伤员得心应手。

### 1、大兵团作战，接收大批伤病员医疗任务

当时的后方医院在总院部领导下，直属三个分院。后方医院院长长征同志高力、程传忠，政委肖新书，医务科主任张俊哲，总务处主任单振华。三个分院情况各有不同，除三分院是新建的外，一分院即原军区后方医院，人员大部分来自董其武国民党旧医院留下的人，又加我们新增一部分人，房舍条件较集中，是日本鬼子修建的乙级医院。二分院在萨县农村小巴拉盖村驻防，人员都是原我晋绥同志们。最后决定先由一分院接收志愿

军伤病员，总院也将不少力量投入这次接诊。

一分院经调整力量较强，院长长征同志刘松青，政教刘均，副院长卢杰，副教导员李贵章，医政股长李云，各连连长、指导员负责医生都较齐备，加之从地方上调来郭殿宾，老护士主任焦秀娟等，又处于铁路终点交通方便，医院有一个小礼堂，虽不太大，但是过去战争中不可能有的大接诊室。这时，三分院刘贵平院长说，总院让你暂去一分院工作，并由三分院支援几十名护理员给一分院，但后来，随着三分院的取消而均成为一分院的人了。

以 1951 年六、七月份这一次接收志愿军伤病员为例，叙述一分院当时的“大兵团作战”式的接诊工作。这次接诊的特点是：1) 准备已全部就绪，各自坚守岗位等待接收任务；2) 接诊室面积大盛人多，分组多，响导、初诊、分配病房、登记、急救等各组成部分，都很齐全；3) 领导重视，首长亲自动手，总院记得有张俊哲主任直接参予接诊工作，自火车站至到各连病室，岗岗有人；4) 动作速，工作效率高，虽然当天从车站运来六七百名，而且大多都是不能自理的重伤病员，由于如此的流水作业，几小时后都接诊完毕，顺利分配进入各连病室。当天一分院本部就住入 480 名，加之，医院南侧的结核连、轻患连 200 名共 680 名全部接收完毕。

我主要在重伤病连一连工作，负责医生张英，虽然这些患者多数都是半个多月前的老伤员，甚至更早的伤

员，但重患多（轻患都驻在东北，后送的都是重患），伤口感染多，脓毒症多，骨折由于长途后运，固定位置欠佳而畸形者多等特点，所以，每位医生平均管 40 多人，由于伤情重，已感到很吃力了。加之，初步检查、建病历、作手术扩创、取碎骨弹片、对口引流、骨折重新固定等也忙了约一周后方平稳下来。当时我要负责治我全病房的伤员，可有一位伤员指导员吴德友同志，原来左股骨骨折引流不畅，固定欠佳，而重新手术与固定，开始很挑皮，白天夜间叫得不能安静，后来我告诉他：我准备夜间住入你的病室，有事随时找我，也是我真正的内心话，由护士同志们传给他说：“王医生是工学代表模范工作者，12 年的老医生了，和你一样也是三八年参军”（大意）等语，吴同志听后，给我代口信并亲自告我说：“你是老同志了，不必来病房睡”，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将他留下在二连任职指导员，做了许多工作，甚至伤员闹事时差一点挨打。

伤员的情况，多数都是南方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部分是我新四军的老同志们如吴德友；另外多数是刚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不久就入朝上战场的，思想作风、觉悟等都还未获很好的改造，从战场下来，居功思想较重。语言虽都是南言口音，然而政治觉悟却大不相同。《人民日报》1987.1.14 第四版上曾报导过《失踪三十多年的英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同志，就是当时的伤员之一。因为当时只有我一分院接收了任务，别无第二个接收的医院，虽然当时我们也不知晓这

位英雄。

从1951年8月15日—24日，从北京军区总院来了留美医生沈天爵一行三四人，来一分院协助工作，并抓紧机会，请沈大夫讲了一些骨科方面的进展情况，通过数次讲课，对战伤植骨、植皮、畸形骨折愈合切开复位植骨、固定，关节检查，骨髓炎等，并协助我们做了一些手术，对畸形愈合的手术复位植骨，基本上都已掌握，对战伤治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进步，他们走后，我们照常独立开展起来。

后来，1952年4月及11月又有从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及天津来过两个医疗队，都是由我亲自陪同协助客人一同工作，因我这时已正式调来一分院任副院长了，直至1953年秋一、二分院合并为康复医院任副院长，这两个医疗队的来院，主要是对提高我一分院的内科技术水平有所裨益，尤其对心、肝、脾、充血性心衰、贫血、肺结核、化验知识、梅毒治疗常规等方面的诊断、治疗有所提高。病房管理方面趋向于现代规章制度，如病历书写、查房、手术更趋正规，对化验知识的利用增多。逐步走向正规医院轨道。外科手术方面也积累一点新的经验，如对糖尿病嵌顿疝患者郑法锡可以耐受手术治疗的经验（《一集》351页），及处理阴茎皮肤成形的经验（231页）、学到一些小的手术如六针缝合治疗倒睫。并通过与包头市医院共同工作，对胆囊、脾、结肠手术有了进步，对肾切除有了感性认识等。总之，在技术水平上仍未突破腹部外科的范畴。

这次接收志愿军伤病员，要比往常做更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用于解释安慰要比任何时候动咀都多，政治思想工作几乎占我们医生医疗活动的 $\frac{1}{2}$ 以上，就是说每天有大半时间用于非医疗性精神安慰。这一点是地方医院所没有，我们所独有的活动，由于政治思想工作之重要，我本人曾有计划、有日程地下连、下各病房探视看望病人征求对医院意见，受到病人一致的好评，能达到相互了解，便于沟通思想，所以，我认为，作医院特别是接收志愿军这样医院的领导工作，深入病房，了解情况，发扬民主，又做了政治思想工作，是防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医疗工作所需。

由于全院同志们的辛勤工作，除少量出院外，于1953年麦收季节的6月份，我一分院首批300多已愈伤病员出院，由我带杜贵年等数名医护人员护送河北廊坊转建大队，从包头站上车，共集体占三节车厢，车长列车员同志们，由于是送“最可爱的人”给予特别照顾，尤其供应开水，通过车厢安全措施（当时的车厢与车厢之间没有甬道，须从甲门出来通过“詹天佑”挂钩处才能到乙门内，所以有一定危险，告我们作了防范）。伤病员在北京站停车时表现得特别守纪律，安全地到达了廊坊转建大队。这里有段弦外之音：二分院刚刚送来一批，来后，由于伤病员提出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扔下踎了，所以当我一分院这批来后，人家也怕我们扔下就走，尤其有一位政委同志做了些不该做的工作，他告伤



病员，你们有问题和他（指我）说，否则，他们走后，我们可不管了。果然有部分人提这提那，我在那里数次开会与伤病员同志们做工作，肯定了路上的好人好事，合理的予以解释回答，无理要求坚决拒绝不能让步迁就。数次会后，我相信还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和感情已经相互理解了，因而多数同志表态出院，不再给党、国家增加负担，对极少数的三两个人的无理要求，我除严励批评外，坚决将他们带回包头重新“住院”，结果极少数人中也分裂了，两人已经“拉稀”，表示有错误，请予“照顾”出院，只有一人，我们坚持让他长期“住院”吧，老实讲，这种无事生非的人，从来不会得到什么便宜的。后来，大队长一直很好，帮我们做工作说真理，那位政委见我们态度诚恳，坚持原则，办事认真，随之转变了态度，也帮我们做工作，说什么：“同志们，好了好了，你们王副院长说的是真诚的话，你们回去也解决不了，那里有那里的困难。”总之，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告别了伤病员同志，我们数人带着那个伤员经京回包头。

这次，大批送伤病员出院的工作，我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思想工作成果。然而，回包头后妻子分娩到失去了我大女儿的生命，她在分娩中死亡了，二人忍住悲痛，又投入了正常医疗和学习文化的运动中去。

## 2、伤病员闹事及我的思索

这大批志愿军伤病员 1951 年夏入院，时隔两年以后的 1953 年夏收季节，才首次大批出院，由于留院时间很长，工休之间逐渐产生一些矛盾。自从魏巍在报纸发表“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的报导文学后，全国各地各界军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全国人民掀起捐献支援抗美援朝的高潮，有多次文艺团体前来包头，由市长郑天翔、书记李质亲自来院代表各族各界慰问“最可爱的人”。由于志愿军同志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与朝鲜人民共同打击敌人，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三八线以南，保住了我国边境的安全，国内才能够进行和平建设及当时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和稍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及我军内进行大规模的文教运动（文盲大扫除，普遍提高文化水平）等。人们意识到，这都是由彭副总司令领导的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用鲜血保卫着国内的和平和幸福生活。这是伟大的壮举，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天长日久，工休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个别伤员居功自傲，再加极少数的坏人从中挑动，便发生了伤员闹事的事件：

医护同志们甚至还有日本朋友共同为伤病员辛勤服务，但有时也有不够耐心之处，当听到不现实、难以办到的要求而有反感，特别得知对方并非什么新四军老战

士而是一个刚过来不久的解放战士时，就更易产生不说话的裂痕。有一位东北战士产生了癍痕疙瘩，非说是医生害他，非让再次切除不可。我们经多次解释方稍收敛，后又曾将其癍痕切除，当时见好，但久之因是癍痕体质当然疗效要差。但这种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医护的责任心好坏的问题。

伤病治愈或好转了，他们自然有文化娱乐活动的要求，除经常每周至少一次放映电影以外，他们穿着我院睡衣（是原董其武伤兵的服装，灰色，左上胸有一红十字）翘翘起翘，挎肘持拐成群结队的到戏院、电影院等看节目，开始人们给予照顾，从爱护出发，将最好位子让志愿军坐，而将观众往后推，原座位的观众也只好给腾开座位。这本来是对志愿军的尊重与照顾，但后来变成理所当然，不但不买票，而且位子不好要发脾气，甚至有一次砸了戏院门，引起观众不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虽经医院党政教育，收效甚微。短日内稍有收敛，稍久旧病又复发。总院首长高力、程传忠院长讲话他们根本听不进，只有另一老红军肖新书政委的说服教育，到能起到部分作用，起码不会中途退场。

有一次晋剧团名伶康翠连慰问演出及另一女歌唱演员的演技，博得大家一片掌声；然而部分人无休止地让人家演唱，嗓子都嘶哑了还非“欢迎”不可，引起人家不满，认为不懂礼貌。

另有一次小偷侯某，偷了志愿军墓，被我保卫股夜间抓回，伤病员得知，一哄而来，将他绑在旗杆上，几

乎打死，将其胡子都捋光了，按当时惯例肯定不致死罪，但在他们要挟下，法院无奈判了死刑，但要求枪毙时不要再去打。

本来吃得够好得了，几乎天天杀鸡宰鱼，甘水内飘浮的肉片和膨胀的馒头……，这些在当时是很脱离军民群众的。

这些“恶作剧”很不象话，绥远军区政治部曾来一主任也压不住“场”而归。情况越来越不象话，使医护人员也无所适从。这些丑事不但好人反感，连不能自理的重伤病员也很反对这种行为。

经过了解，这虽是长时集累、演变来的，然而其中主要有一伤员连长许××幕后指挥，另一个我亲自给他手术而愈的大腿骨折东北伤员宫×，带头闹事，打人很狠。总院指示分院必须解决，在本有困难，但必须出面解决的情况下，开了全体工休大会，由刘均教导员讲话批评这些不应有的坏现象，还有总院管宣传的张处长，大会刚散，刘、张二位同志被宫×等数人毒打一顿，这就是所谓“拜年”丑剧的前导。

正是1952年除夕这天，总院高力院长来分院开会教育，时间是在黄昏，高院长是长征同志，很会说话，语言精炼，讲的完全没有错误，但由于肖政委高烧未来，伤病员起哄了，也凑巧，正在这时停了电，会场内一片漆黑，高院长指示：“算了，不开了，年后再说”就离开会场走了，伤病员在木地板的长廊内，又跺脚，又用拐使劲击地，又喊又叫说高院长跑了，还有人在廊

内放炮。大家在这样一片嘈杂之声下渡过了 1952 年除夕之夜。

次晨，还未及开饭，吴德友同志持拐来到我住室说：“许××等要闹事，并要打我，说我是伤员中奸细，你想法保护我，千万不要再将我这条左伤腿打断”，我立即安慰他：“不怕，请你躺在我床上，吴将伤肢放在下面，健腿压在伤腿上，面冲墙一动不动，我坐在床边保护。宫×这帮人已呼吼喊叫地来到了分院部，将刘均教导员又打一顿，踢开我屋门，正是姓宫的，一看是我虽恶狠狠地，但无动拐就将我屋门咣的一下关住，喊走！我（和吴德友）幸免于祸，我分析，可能看在我曾给他亲自作手术的面子上没有动手，也算沾了医生的光了。

这帮人又照丑样翘翘起起向市内进军了，有人还手持大小便器，去到市中心西面的总院住处，要找高院长“拜年”，当然高院长没有见他们，他们闹着而回，可想而知造成的坏影响。

我鉴于 1947 年在五台沟南那次差点解散支部、伤病员闹事的感性经验，立即召开了各连负责医生及看护长会议，要求同志们越是乱哄哄，越要谨慎坚守岗位认真工作，尤其不要让重病人和老实人吃亏，不给坏人一点可乘之机，不给留下任何找岔子的借口。虽然同志们认识不一致，有同志说：“不管他们了，事大了，就有人管了，咱们又管不了”，但最后趋于统一认识，在过节这几天里特别加强了医护工作，照常坚持进行医疗工

作不止。为此，得到肖政委的特别好评，因此指示刘均同志“每次党委会，都要请王增寿同志参加。”

“拜年”丑闻报告了军区首长，后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耀南同志来处理此事，王原在晋察冀我三分区当过分区副司令员，当时司令部驻稻园村，我卫生部驻军城北关，每天早操要人们去稻圆河滩集体出早操，抓得甚紧，曾发生过卫生部管理科长将熄灯号当成起床号的笑话，他一听号声，立即吹哨集合，一看是刚刚熄灯而非起床。王副司令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望及魅力。

1953年6月的一天，命令一分院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工休人员一律参加，工休都挤在不大的小礼堂内，主席台上坐着肖新书政委、特派员王廷云站立一旁，还有我分院刘均教导员在台上，会场内一片严肃气氛，好人喜气洋洋知要出气；许××、宫×等脸通红预感到要大祸临头。过不久，肖政委迎接王耀南首长来到会场，气氛更加紧张，人们鸦雀无声一片寂静，还是首长首先打破了“寂静”，他问许、宫来了没有？下边有人答已来了，又问王××来了没有，某连连长说“他伤重来不了”，王厉声说：“去，将他抬来会场！”果然将这个不能动还打人的人抬来会场。王耀南同志的长相，也很使人望而生畏，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绿色呢绒大衣及栽绒皮帽，自来严肃的圆形面孔上，两只眼睛特别震人，眉毛粗大，上眼皮较窄，睁开眼来眉毛与眼球距离特近，稍远望去，双眼好象两个圆形黑洞，虽然年龄较长，但说话声音宏亮，首先伸腰作呻说：“我的胸痛得

很！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在我肺里……”，无任何人敢吭声。接着他说：“许××、宫×等，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戴着八一帽徽，但用（标准的南方口音说）爱凯斯光一照，一崭国民党，将许××、宫×抓起来！”王廷云将早已备好的手铐，从台上下到会场，立即将二人铐起，他二人一歪一趟地带出会场之外。王又说王××该抓，但他伤情还重，看其转变如何？不转变也要抓。又谈了许多正面的道理，正由于许××等人的破坏我军荣誉，我军威信受到很严重的破坏。强调了今后要服从院规，听从医生护士的指导与治疗，谁破坏院规要给处分。……王副司令这次来院伸张正义，严肃我军纪律，平息了这场“拜年”事件。事后，工作人员都拍手称快，伤病员多数也拥护此一处理，继则情况好转了。

但不久，听到上级指示要我分院连人带马集体转业给地方管理，工作人员（后来又只排以上干部）保留军籍，时间从1952.5.1就算转业到地方了，实际这所医院地方无人敢管，仍归军区管理，经大批出院送转建大队后，伤病员逐渐减少，比过去要好管一些。当时同志们思想不通，要求仍回部队医院工作，不交胸章帽徽，有的女同志哭哭啼啼要求先进城照象留念后再交。后来，中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同志们曾来院慰问了我们这些已转业的同志们，并每人得到纪念章、金笔、茶杯、笔记本等礼品，好象还是真的保留军籍似的，但1955年后的授勋授奖，却一拖再拖至今未授予。

对伤员闹事的思索：应视为是一社会现象，但成因、解决的政策是可以随因果关系而变化的。事实证明：有功不居的人是最受人尊敬的，如前述失踪自己匿名不扬的柴云振同志是多么高尚伟大！而许××、宫××本来也确有功，但居功高傲，脱离群众，最后把自己也搞臭了，成了罪犯。但也应该承认“有功当赏”的心理仍是多数人的心理状态，观点，从这一心理出发制定人们乐于接受的政策是重要的，也是应该的，否则是对战争有影响的。我们强调休养员遵守院规服从治疗无可非议，但如何改进部队医院工作方法，深入病房，解决其困难，政治上帮助开导，与伤病员交朋友，他们最反对不关心他们疾苦，甚至不见面的官僚主义。正确的政策，按现代语言叫“双理解”使伤病员理解医院同志们，为他们健康辛勤劳动，应受到理应的尊重；我们更应理解伤员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每个战役、战斗所做了的巨大贡献，付予及时治疗以及合理（合格、合等级）的物质待遇特别是政治荣誉。双理解，不易也！我们首先应理解伤病员，才能更受到伤病员的尊重和理解。例如，现在我认为老山前线这一点做得好，就自然会无闹事的成因了。但重要的，首先我们的言行符合伤病员利益，就会赢得对方理解和好评。这基本上是双方心理学问题，在我们来说做一名好医护人员，必须是技术好、思想好，看问题境界高，自重，又平等待人。

怎样做医护工作？前已述不赘。我们过去仍未对伤病员闹事，影响医院正常医疗，严重损坏党在人民群众



中声誉，视为严重的纪律和违法犯罪问题的高度去认识，尤尚缺乏理性的开拓和阐明，包头闹事可谓达到了最高峰。历史证明：政治工作有伟大的动力功能，但它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纪律和法律。做为党的人民的军队一定要赏罚严明，毫不要客气。

1953年10月初派我去京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后称卫生行政学院）学习，四个月结业。学习中我收到了贵银作为文盲的第一次亲笔来信，非常高兴，内心欢呼我军文教运动的伟大作用。

1954年初，一二分院合并为绥远省康复医院，院长刘勋，政委白崇山，副院长我和张嵩山。不久，我奉卫生厅之命于4月份去集宁市平地泉行政区医院任副院长而离开了亲爱的我军，从此转业到地方了。

## 对流逝岁月的回顾

(14) (1953.10.  
北京) 在北京中央  
卫生部学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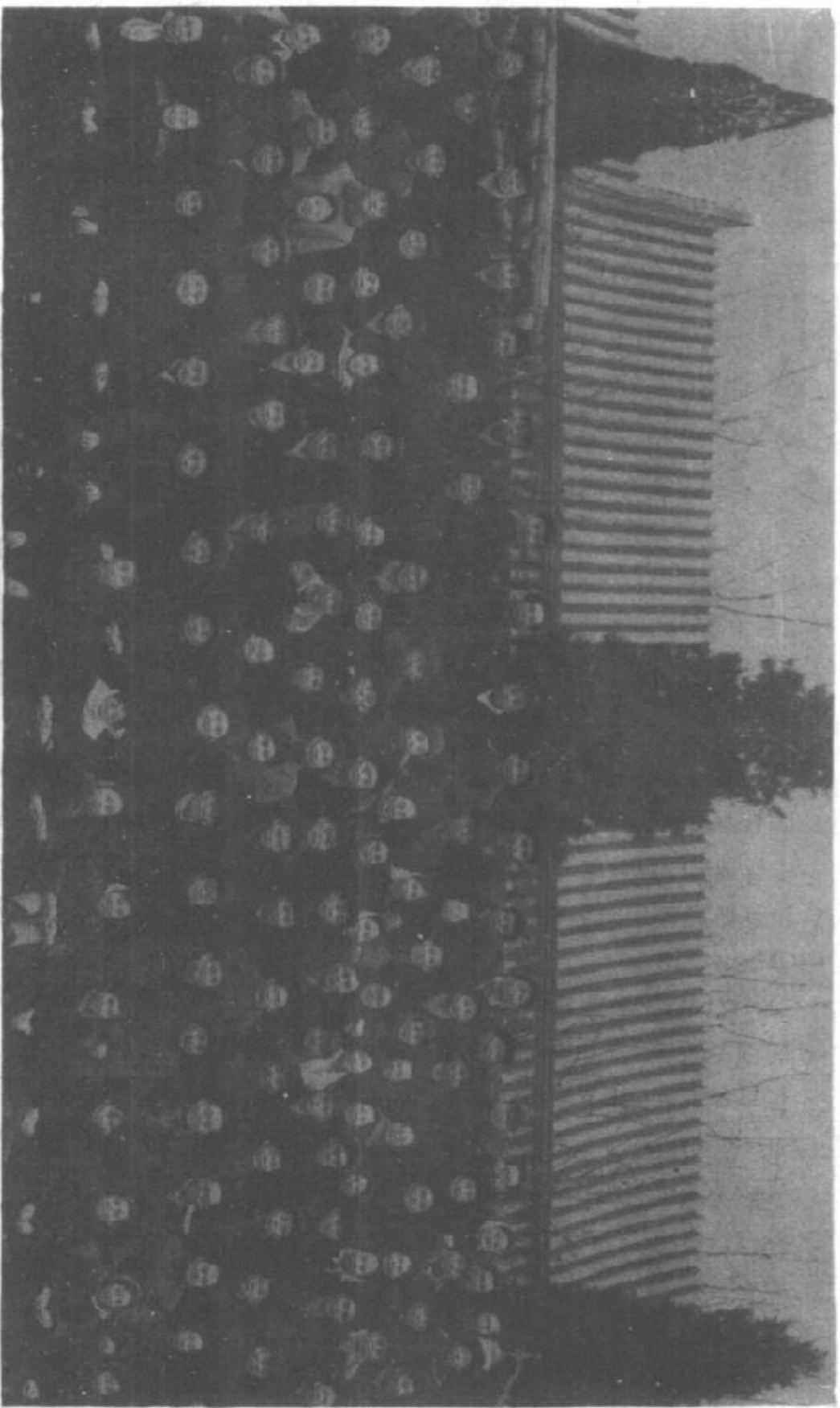
(15) 派我去北京中央卫生部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 (下班改学院) 学习 4 个月

12/12-1953 摄于天安门 (左 2 系作者)





(16) 1960·特大灾年中我家(部分)合影于内蒙古集宁市 摄于 13/6--1960



(17) 照片是中央卫生部部长于1964年1月16日全国医院工作会议全体在北京和仁堂接受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彭真、林彪等领导)接见时合影作者位于前三排左起第8人(大皮领者)。该照片已在“文革”中被破坏,此是其中小的局部硬  
翻相保存下来。

## (18) 赴农牧区巡回医疗——

(18) 图示乌盟医院 1966 年组成两队分别赴达茂、中旗巡回医疗半年，取得很好成果，扩大了党在边疆农牧区群众中的影响，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虽然在‘文革’开始我本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我们的成果是水存的，也逐渐取得群众的理解和谅解。

仅以我队赴达茂而言，我们在该旗遭到重灾之年情况下，以大苏吉为中心，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指导，严格自律要求全队全心全意地、风雪无阻的为农牧民的健康服务，巡回六个公社行程 9813 华里，诊病 11304 人次，住院 366 人，抢救重患 81 人，手术 415 人次，而且手术种类除心外均在乡下成功地开展了。群众最欢迎立竿见影的各科手术与蒙医治疗。而且用现代化手段完成《农村牧区影响手术创伤愈合的因素——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的调查报告》等共 12 篇大小论文，不仅是白求恩流动医疗队的继续和发展，而且为我军传统找到科学依据，这是我全队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晶。

a: 赴达茂巡回医疗队出发前



b: 作者在 1974.1.18 科技年会上作《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的调查报告》受到军地医界的热烈好评



## (19) 开展新技术回顾



(19) a: 系 1975.12.23 为内蒙先心病室间隔缺损患儿韩庆菊在低温麻醉体外循环下, 作室缺修补术成功。患儿, 女, 9 岁, 住院号 69078, 术者王增寿 (右 2)。该院是当时步入全国地区级医院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先进行列的第二家, 是我院自力更生独立手术首次成功例。

五十年代的乌盟医院就在开展新技术、医院管理等方面全区较领先, 以心外为例:

1959.3.9 首次开展风心病二尖瓣狭窄闭式扩张术成功, 术者邱帮梁。接着于同年冬为结核性缩窄性心包炎康义梅, 心包部分切除成功疗效显著 (术者王增寿), 组合心外技术班子, 磨练配合技术操作, 自此连续开展起来, 因结核、风心病是当地的多发病。

1962.4.23 又为 MS 李河继续开展二尖瓣闭式扩张术 (术者王增寿), 同时向低温麻醉心内直视进军。

自 1961.11.15 至 1962.4.30 先后进行低温麻醉犬实验: 犬 5、犬 10 号先后开肺动脉瓣切开及开心室均获成功, 见 (19)、BCDE (同时购置人工心肺机), 临床准备病人。正当要移行于临床之大好形势下, 被‘文革’无情的打乱, 班子分化, 工作停顿, 本人被撤坐牛棚, 将本来在全自治区名列前茅的乌盟医院, 一下打入“冷宫”。

1972 年情况稍稳, 我们又重整队伍恢复心外工作, 继北京阜外医院小分队来院大力协助下, 仅不到一年即全面恢复与开展了心外的各级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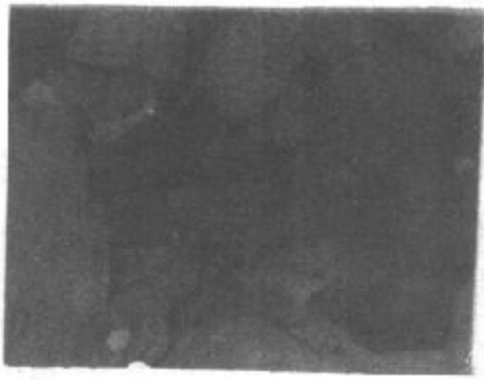
[作者回河北省医院后, 在党委领导各兄弟科室大力协作动物实验先行, 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仅在 1978 年 262 天的短期内, 即全面开展了心外各级手术, 率先为填补河北省医院心外空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除 MS 闭式扩张外, 其余各级心外手术均由本人担当了术者。

1978.3.3 刘利江缩窄性心包炎, 常温麻醉下心包部分切除 (心外围手术);

1978.6.22 吕素莲先天性肺 A 办狭窄, 低温麻醉直视下, 肺 A 办切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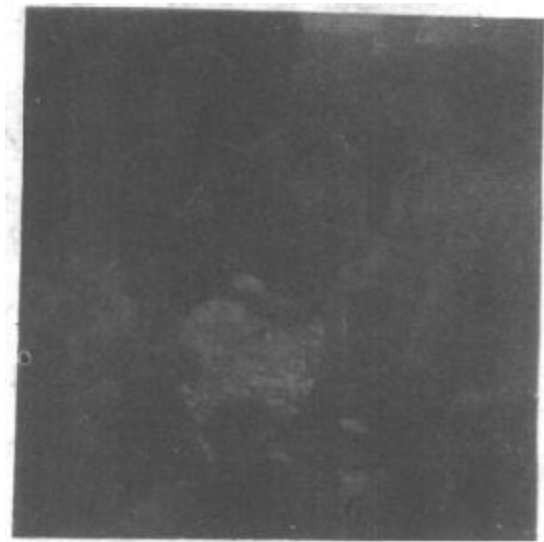
1979 年 1.16 宋绪平先心病房缺, 在低温体外循环下, 心内直视修补术。……以上均获成功。]

以上, 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 没有党的领导与支持, 任何个人也无能为力, 因此光荣属于党和群众, 我本人在这些工作中, 充其量只不过是排头尖兵之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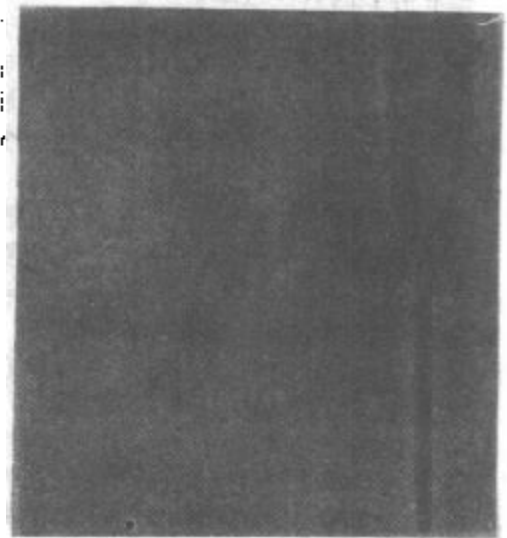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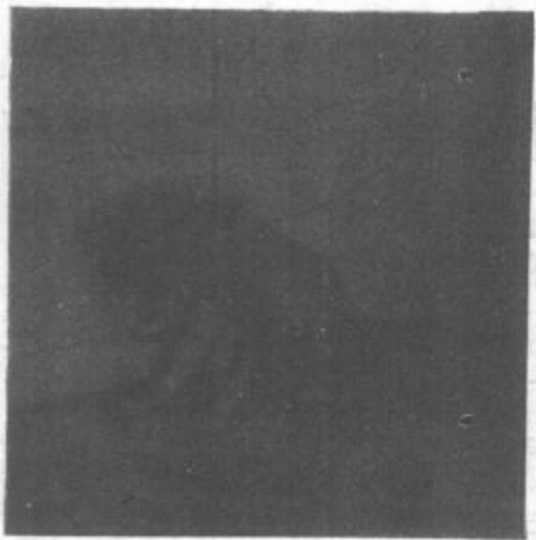


(19-b): 低温麻醉下, 动物 (犬 5)  
试验心直视下肺动脉瓣切开成功。  
(右 1 是作者, 助手是李元煜大夫,  
1961.11.15)

(19-c): 低温泡冰体表降温,  
正中是宁培尧大夫



(19-d): 犬 5



(19-e): 犬 10 术后, 1962.4.30, 动  
物试验犬 10 号, 低温麻醉开心室成功。



(21): 1973年春节去包头看望战友中，与原后方医院一分院的部分战友相会在包钢职工医院（中排左3是作者）



(20): “文革”中按“支左”前指的指示：乌盟医院一分为二，即一入大学校，一赴大青山老区的大滩黄茂沟成立野战医院，并于1970.9.7冒雨出发到中旗大西村黄茂沟建院劳动。

作者在大滩黄茂沟野战医院的山谷里，左系手术室，背后是没有木料的拱式宿舍，远景是白雪皑皑的山梁。

我院担负着察右中旗、后旗武川、四子王旗及来自集宁城市的患者的治疗，到也另有一番风味：同于和平病人少，同于战争无炮声。

该片摄于1971.3.17





(22) 此系在抗日战争爆发 40 周年前夕之 1987.6.4 留影于芦沟桥头



(23): 乌盟巡回医疗队由我和哈森带队赴牧区西苏尼特旗巡回半年(1974.8至1975.1), 我队全体忠诚地为当地牧民解除病痛, 普查普治冠心病、手术解除瘤疾, 对哈森其其格蒙医药治疗特别欢迎, 扩大了党在牧民群众中的威望, 甚至与建国初期驱梅相提并论。为时不长就与蒙族人民相处融洽情同鱼水。

照片系我队在关其格书记的陪下同去巴坦老人家作客, 与老人及儿媳玛希巴吐欢声笑语, 医患一家。(1974年国庆节中摄)



(24): 1974.9.21 我队去给达木登新生小女儿赠名莎其娜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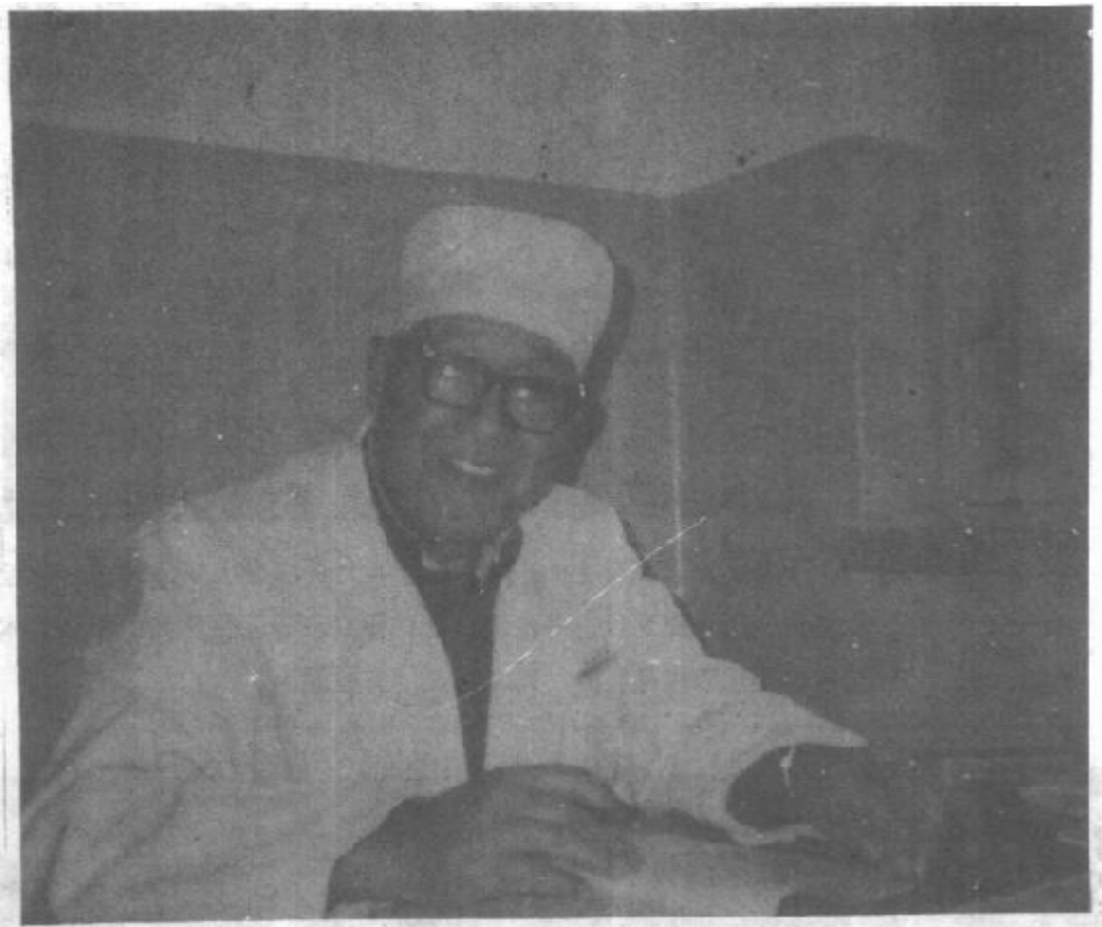
我们并写出《内蒙古纯牧区冠心病防治的几个问题·普查普治1604例的调查报告》的论文, 在1976.6.9华北召开的心脑血管防治经验交流大会上宣读后, 受到各方面重视和热烈欢迎及好评。



(25):前追后赶医患一家:在冰天雪地中,阿其图的乡亲们骑驼赶来我队看病、看亲人。时当1974年12.14,我队正在赛汗乌力吉公社巡回医疗,阿其图时坦巴父子、苏格勒、额尔登达赖及丈夫巴图德力格尔、吉里格拉、格尔满都虎等来我驻地,我们热情的欢迎他们。

(26):原颈椎结核截瘫女患苏布登格日勒,经我们在集宁手术后已全康复,她是脑干诺如公社敖伦淖尔大队人,闻信特骑驼于1974.12.12来我巡回点赛汗乌力吉来看我们。





(27)：离休后一直受聘继续专业工作发挥余热。  
该照片是 1991.12 在胸心外科门诊由新华区人大孙兰敏主任摄



(28) 写作：正在写 40 多万字的  
《戎医生涯》一书上册结语一章时。

1986.4.20

摄



(29) 绘画。读老年大学：自 1988 年河北老年大学招生以来，曾先后读绘画（山水）班、花鸟班、山水提高班、书法班及花鸟研究班等。使学到的书画艺术知识，为自己爱与憎的理想和情趣服务，陶冶情操，有益健康。

（该照片系 1988 年酷暑的 7 月 21 日作《护秋》一画中摄）



(30)：由医院组织离退休专家赴革命老区平山县下槐镇  
为人民义诊 1990.5.17

## 第十二章 戎医生涯的总思索、 总体会与探讨

### (一) 没有红军，焉有八路?!

至此，我的军医生涯已写完了，在收笔之前，很自然地想到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因此还有许多重要的话要述之于后。有的观点、心得凡在各章节中阐述过的不再赘述，但也免不掉有些是有所关联的。我首先想到的是，感谢中国共产党和长征老前辈们对我们这代后来人直接与间接的培育之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而红军则是在党领导及缔造下的党军，这个革命的火种，走到哪里，即在哪里燃起熊熊烈火。红军来到我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唤醒群众，人们不愿当亡国奴，在抗日旗帜的号召下，纷纷参军参战，故很快壮大子弟兵，我有幸参加了八路军。由于在党诞生时我还无出世，没有赶上长征，但红军老前辈们艰苦卓绝的丰功伟绩，永远使我由衷地敬佩和赞叹。我熟悉的原绥远军区长征同志《小脚万里行》的周起义大姐，就是红军中活生生的坚强女性。人们对毛泽东主席“长征诗”、肖华

同志的《长征组诗》反映红军时代的杰作，是很熟悉的，但人们对陈毅元帅 1936 年作的《赣南游击词》可能还较陌生，我今摘录几段如下：“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  
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

诚然，我们后来人从抗日战争起，都各在岗位上做过不同贡献，克服过一些困难，但比起老前辈们我们算

不了什么！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他们言传马列，尤其身教革命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我做为我军一位普通的医生，永远不会忘记启蒙老师长征老医生尹明亮部长。

红军老前辈们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高尚品德，永远鼓舞和鞭策着我们。我决心要接过和下传革命火炬接力棒，使之不断于我辈之手，我写这个材料就是这一目的的体现。现今老前辈们已因年事已高和长期积劳成疾先后谢世所剩无几了，我衷心地预祝他们健康长寿！就连我们这些人，也都白发苍苍年逾花甲或古稀，但回首往事，为革命五十八年来没有虚度年华而欣慰，但若没有党和红军，幸福的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没有红军，焉有八路！

（二）为何我军医务人员能在恶劣环境下胜利完成医疗任务？

1、首先在于有坚定的政治头脑。我军有一支既有医疗技术又有坚定革命意志“又红又专”的卫生队伍。这支队伍具有高尚理想、事业要求高水平，而生活要求最低水平。他们首先是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八路军反抗日寇侵略，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对建立新中国和壮丽幸福的共产主义寄予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新中国已经在国内国际充分兑现，对共产主义亦深信不疑，坚信正义必胜。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这支队伍的任务



是，以高要求、高水平建设美好的未来。

我感到，这样的头脑不是先天带来，而是经党长期培育接受马列后天获得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种信念保证我军统一认识和行动，不离开根据地如鱼得水似的群众，从而蕴藏着无穷的潜力，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以弱胜强，这样的政治信念，不是用任何重金所能够买来的，故是我军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敌人从来看不起我“土”八路，然而这支队伍生活享受之低是不能再低的了，只要有能维持生命的粗茶淡饭，无菜盐也行，无新衣穿旧的也可，连这都没有就自己与农民共同生产，克服难以想像的物质困难，创造生存条件，继续与敌战斗，直至打败自己的敌人难道这不是事实?! 所以能够如此，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头脑中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这是我军全体指战员能够艰苦奋斗的思想基础，能吃苦是我军的精神优势力量。现在和平以后无战争，有战争吃苦就难免，能否吃苦是对人的信念的试金石。我八路军医务工作者始终不忘政治身分，将政治落实在医疗工作上，全心全意为战争胜利服务。因此，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内，同志们才在严冬创造了有如“巧盖被窝”这样的取暖法，（铺点草，头枕包袱，上盖薄被，足下平盖棉裤，裤腿折入被下，头侧盖棉袄，两袖两侧掖紧，裤裆形成的漏风洞以布袜塞之，最后将两袖拉到肩部掖在两侧挡风，就这样充分地利用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装备，它可巧妙地将一层薄被变成2—

3层来御寒，却“暖烘烘”的熟睡过夜，犹如现代的沙发床)。

不可忘记陈毅同志“又红又专”的教导。我认为不是红+专=红专的总和，而是像化学一样，红+专=变成了新的“物质”，即让专可为红服务的、红专不能“分离”的专了。他以飞行员形象打比喻说过（大意）：“只专不红将飞机开到台湾去了；只红不专开起来又栽下来了。”我认为又红又专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坚定政治信念，不受任何风吹浪打的影响，尊重科学，不懂不装懂盲干，不耻下问虚心请教，凡是有用的知识，无论古今中外都虚心学过来，为我军、为战争服务，善于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不犯“十足狭隘的经验主义”错误。的确，只专不红有技术也用不上，是吃不了那种苦的，只红不专，对患者态度再好治不好病也是枉然。所以，我们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才是我军医不同于任何旧军医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我们要成为思想境界宽广、技术高超、心眼好（救死扶伤）、又平易近人（平等待人，非恩赐）的医务人员。

毫无疑问，技术本身无阶级性，但同一学校、同一班次、同样内容培养出来的医生，由于思想境界各异，医绩可以全然不同。有政治觉悟的卫生队伍，能出色地完成医疗任务，有可能在技术上出大成果，治愈成批的伤病员。没有正确政治方向的卫生队伍，人多追求名与利，个人吃亏他不干，所以，在极端艰苦困难环境下，其作为就可想而知了。什么是医护最高兴的事呢？莫过

于经我们亲手手术治疗、护理而完全痊愈的伤病员出院时之惜别之情。我们深知，痊愈的成果不只是医护之功，还包括病人配合治疗之功绩，所以，在医院这个与病魔搏斗的战场上，我们也是战友。医生与伤病员息息相关，同悲同欢，他们治愈出院，是医生最大的喜悦和自豪。

由于有这样一支卫生队伍，才能保障我军指战员无论平时或战时的身体健壮，从而保障部队打仗，坚持战争至完全胜利。

2、有老区人民的支援和拥护。我认为不是只要有了人就能获得对我们的支援，有了人≠都是基本群众。老区人民才是我党我军真正可靠的基本群众，我军常以“房东”、“老乡”（谐音老香）来称呼这些可爱的人民。有了他们作后盾，我们就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恶劣环境下办医院，完成不可思议的艰巨医疗任务，而战胜当时强大的敌人，上述所说的老区人民，当然包括根据地，有一块有党领导与创造的坚如磐石的根据地，是我军宝中之宝！我在文中曾多次强调过“办医院固然离不开医护，但更离不开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我军所以在没有前后方的游击战反“扫荡”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因素。依靠“宝地”和其人民，才能与敌周旋获得生存、发展、战胜敌人，在“宝地”内即可十足放心“高枕无忧”。我们为何在归绥大城市却需要老同志带新同志夜间放哨呢？就是当时的归

绥还不是我军真正的根据地，更缺老区那样的房东和老乡，所以，精神空虚是必然的。

根据地的老乡，可真是值得回忆的“老香”啊！以我们医生常用术语“人群”而言，他们是多么好的不当亡国奴、有抗日觉悟、火眼金睛般能分辨敌我的“人群”啊。正因为有在老区军民鱼水相依，亲密无间，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而敌人则办不到，即或公开告诉敌人，他也学不会、学不了、办不到的，因为多数在我们一边，这就是我党我军的优势所在。这个优势是源于党的政策的胜利。（我不是军政首长而是一位普通医生，通过革命实践，但我也充分体会到，要想生存一刻也不能离开老区人民）。

然而在1979年（中越边境）中越自卫反击战后，我省曾派慰问团去平山等老区慰问，我院长征老同志尹丁凡院长回来传达说：“老区人民有意见，说了两句话，是：‘进了城忘了我们；打起仗来又想起了我们’！多么严厉的批评啊”！我们绝不可忘记支援、拥护、养活我们的男女老少没穿军装的战友。因为我们是从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过来的，老区和八路军的关系，首先是鱼水关系，我军与老乡相比永远是少数，有了他们才有我子弟兵。也不能只从局部、暂时的表面看问题，抗战时几户人家的小村，有时要住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如大西峪、大岸村、上寺等）全村暴满，但从总体来看，我们永远是少数。老区老乡是对我们“听其言，观其行，而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得出的印象，是值得我们好好检讨

和改正的。按聂帅的结论是：“党的领导是胜利保证（381、459页），关键的一条是发动群众，是奥秘的所在（408、413、419页）群众将我们看成自己人，打仗就是力量的对比（440），老百姓也会打仗意义极大（439）等，都是说军民鱼水关系的重要性的。

总之，虽然还有一些因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前述两条。

我对戎医总印象是：理想崇高、艰苦奋斗、团结、乐观、紧张、严肃、好学、牺牲大、军民鱼水情、认真、上进等是总概括。白花、神仙二山，晋北、察南、大同、平绥等地的第二野战医院的战斗生活，我做为幸存者永志不忘的。

### （三）我军卫生工作重要性的分析与认识

卫生工作直接与人类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整个社会是这样，八路军同样离不开我卫生工作的保障，才能使之平时不生病，病了有人医。在旧社会传染病最易大流行的地方是监狱和兵营等人员密集接触机会多的场所。我军实行预防为主、医疗为辅的措施，四十年代几乎年年种痘，连驻地小孩有时也给予接种，1949年注射鼠疫疫苗及破伤风类毒素，对提高人群的抗病能力，对消灭“病人叩门”，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做出了贡献。尤其对疟疾大流行采取集中突击方式及扑灭回归热、黑热病、猩红热、天花、水痘以及皮肤病疥疮都起

到积极作用。保障战伤救护坚持战争，都有我卫生队伍一份力量。我军虽穷，但素以“穷干净”著称，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我军卫生工作始终以保障部队（甚及驻地群众）的健康为宗旨。

军队是为政治服务的武装集团，战斗部队是以打仗为中心的斗争集体，所以，从部队整体言，我们军医必须为前线、为战士服务。由于打仗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死亡是不可避免，所以，战伤做为火器伤占有重要地位。武器无“眼”（即无阶级性），碰到谁也同样发生损毁组织的作用，无论敌、我、和人民群众无一例外。而我们军医则是对损毁后果负责处理，无论谁遭战伤，有时包括敌俘都有救护治疗之责。我八路军医生，首先是战士，义不容辞要为我军（民）、为战争服务，这要有坚强的意志、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尚的理想，无此就同旧军医一样了，失去了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可能性。为谁服务、怎样服务？似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不然，医疗实践常有你是爱病还是爱人问题，即医院是否真正做到治病救人的问题。

医生，特别是军队医院的医生，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人的生命属于人一生只有一次，人一死就完了，所以，不能出“废品”。我们的工作性质就规定了我们的医疗工作必须特别细心慎重，丝毫不可马虎从事；否则，不是增加病人痛苦，就是残废死亡，后果确非一般。原则上要求只能胜利，不准失败，要打有准备的仗，要迅速认识与解决病情变化所发生的矛盾，政治责

任心要特别好，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员服务。无这种素质和品德，是无资格干医疗这一行的（内蒙集宁市医院某女护士抢救病人误将箭毒当西地兰静注，未等拔针病人立刻死亡。她是有意杀人吗？否。是粗心。但其如此恶劣的后果，是不允许的。）

收治战伤，从营、团包扎所、兵站医院、到安全送达后方医院，对战友的生命负有重要责任，工作质量好坏，后果十分悬殊。过去战争中我认为尚缺乏严密无误地系列连续性治疗，特别在抗休克、上止血带、骨折运送上，均有过严重的问题，不合理甚至不成文的愚昧规则。为了战友的生命及幸福，各级卫生组织及卫生人员均对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与残废负有完全的责任，而重要的责任在领导。尤其正确合理的初步疗伤，及尽可能将急救措施送到火线的最近距离，在全过程中尽可能缩短初步包扎至住院得到手术这段宝贵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失血性、精神性休克死亡率高与战场急救及有效的手术止血处理很有关系（那时还不会补液及时解决血容量）。

做为医生，应该成为全体指战员健康的卫士、开拓军事医学新领域的尖兵，为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 （四）我军医院特点及工作方法的分析

军地医院我都工作多年，我认为军队医院（尤其军

区后方医院)有其一定的特点,了解它们大有好处(与地方医院大同小异)

### 部队医院

1、接受的对象是最宝贵的人,多是年轻的军人,男>女;

2、医院成员多半是健壮青壮年,快节奏型居优,编制较大;

3、医院成员女性比重较大,有不少妇女生理问题;

4、科学性强,是自然科学工作场所,主要在病房;

5、流动性大,住院期间相对长,民主性高,难管理;

6、要求“四好”(医疗好、护理好、吃好、文化生活好);

7、病种单纯,战时战伤居多,评残是一重大内容;对象面窄;

8、战伤密集,来势“汹涌”,手术集中是一大任务,交换绷带任务大;

9、医疗任务时间(要求)性强,有张有弛,以便腾手接收下一个战役任务;

10、集中性强,强调请示报告批示,组织纪律严,有集体办公上下通气;

11、政治思想教育抓得较紧,强调统一认识与言行;



12、战时患者多是前线功臣，要求高，思想工作约占 $\frac{1}{2}$ 以上；

13、公费医疗国家负担一切，药械请领；

14、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受病种的限制（一度曾受“左”的管理影响）；

15、技术（如手术）等级观念较淡，能者多劳，手术机会相对多。出人才较快。

### 地方医院

1、工作对象更加广泛，包括男女老幼妇孺；

2、老少不等，节奏相对慢，不适下命令的方式，编制相对紧；

3、同；

4、同，门诊、病房住院均重要；

5、流动更快更大，犹似“住店”，留院时短，病人临时观点得过且过，较少提意见，较易管理；

6、同，重患多，文化生活要求相对不如前者高；

7、病种复杂，重患相对多，“病理性”疾患居多，无评残工作；

8、相对工作量小，择期手术多，一般不需要连续手术；

9、经常性，一个劲儿；

10、相对松；

- 11、相对较松，民主性大；
- 12、无，医疗活动为主；
- 13、公费、自费均有，药械自购为主；
- 14、技术水平因病种多相对进步较快、较全面、较少受“左”的束缚；
- 15、等级较森严，相互制约较明显（即过去所谓资产阶级等级，没有民主成份）。

还可想到一些特点，万变不离其宗，因军、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战”字上。了解了它，便于比较和寻找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我多说几句，在国家改革的年代里，我想我军医院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向社会开放，既密切军民关系，弥补进大城市后离开房东、老乡的不足，解决治病住院难，扩大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又可大面积增加病种，促进、加快我军技术队伍的成长速度，病种单纯是影响我军医院技术进展的严重问题。

加强横向联系（合），扬长避短，在不影响我军医院的主要任务前提下，与地方医院相互协作，解决各自的困难问题（如技术配套、病种联合等）。我相信这不仅是军民共建的一种形式，而且对我军医院的主要政治任务即为战争服务也会有益的。

### （五）怎样做好（外科）医生工作？

“医生”二字，当然是指医疗系的医生而言，非指

其他。

我在几十年的医生生涯中，始终热爱医生职业，虽在坎坷崎岖的大半生中，如前述曾遭受不白之冤，但我至今不懊悔、不气馁，拟以医疗知识及技术，忠诚地写完自己的历史。在写这一节时，我对这崇高的职业，思绪万千，感觉十分自豪而光荣！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告诉我，医生和其他革命职业一样，是个高尚、纯洁、光荣、自豪，最为辛勤却鲜为人知，默默无闻耕耘的救死扶伤的职业，也是自感对得起良心的极其欣慰而受人欢迎、尊敬的职业。我们不搞任何特殊，经济上不贪占，否则政治上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这在大灾之年的内蒙古草原达茂旗，西苏旗可得到充分的答案。

医生本身，就规定了他的责任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须以极其热情负责的精神，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向病魔死亡做殊死斗争，协助病人摆脱困境，早愈康复。我们的最大幸福是病人的彻底治愈，特别是经我们亲自手术、治疗解除了病痛而完全康复的伤病员笑脸和在出院时的惜别之情；我们的最大悲伤莫过于看着“老虎”似的病魔将自己的病人吞噬而去，特别是经过我们奋力抢救已取得令人鼓舞的疗效时，病情急剧恶化而死去，真比束手待毙更痛苦的了。我认为这种极朴素的感情就是医德。如果离开了治病救人的天职，无论如何这种医生不是好医生、医院也不是党和人民的医院。

我这里强调做医生要特别勤奋，查房（巡视病房）是我八路军医生重要工作之一，查房也是军医院管理的

重要问题，是上级医生传授医风医术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教学查房不可少。它和手术同等重要。我们从来是对轻患者每天查房 1—2 次，最少 1 次，重患无数次，借以了解伤情病情的变化及时处理和沟通工休思想感情，即使是大年三十也毫无例外。我们不同于地方某些医院的所谓查房，只查（病历）（也重要），而若干天不见病人的陋习，甚至患者不知他的经治医生是谁，这在我军医院是不允许的。这种陋习的恶果是纸上谈兵，脱离医疗实际，只管病不管人，即只关心“与己有利”的病种，而不关心病人的思想情绪和将伤病员真正视为阶级兄弟和战友。所以实际是服务态度和—个医生的政治态度问题。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并忠诚地为其服务，才能使伤病员感到医生是真正救死扶伤，使其具有的安全感，甚至将挑皮的伤病员（如吴德友同志）感化过来，将消极因素来一个 180° 大转弯，成为我们病房管理的积极动力，这是我军擅长甚至独有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应视为是我军医的优良传统之一。

没有伤病员，医生就无存在的必要；但医生的存在，是为从根本上消灭疾病保障人群健康而工作的。例如，天花已经从地球上消灭，已完成了对天花医疗的历史使命。但在最困难的 1942 年、1943 年，抗日根据地内仍有天花发生，我们不仅给全体战士也给驻地某些人群广种牛痘，直至消灭天花，（1948 年起注射破伤风类毒素，1949 年注射鼠疫疫苗等），所以，消灭了天花也

有我八路军卫生战士的一份功绩。

医生应是“又红又专”的卫生战线上的战士，应有崇高思想境界，又掌握高精至少一专多能的医疗本领，视病人如亲人（如父母、兄弟、姐妹），对病人心慈面软，同情关切，体贴入微，并能主动为病人承担重任，对内对外不摆架子，对病人不以恩赐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对病人不能衣貌取人，一视同仁，才能常以微笑自谦平易近人。我们与病人的关系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是同志，是战友，犹似工人作工、农民种田一样，为病人医疗是份内事。这样的医生才能做到我军爱人民，人民爱我军，并热忱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能做到与战士的情谊难舍难分。应将自己永远置于群众之中而非之上，永不欺侮压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确有道理的。只有忠诚地为伤病员服务而无索取受恩得报的权利。总的说应具有良好的医德和职业素质。

医生对伤病员、对疾病首先应有必胜信心，作风严谨，实事求是，尤对危重患者总体上要藐视疑难，具体治疗方案要从坏处着眼，计划周密，应急与以后的转归相关考虑，争取最好的疗效结果，主动负责，争取领导支持。如果是总住院医生以上者，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可开展技术民主群策群力讨论对策，实施中与护士严密观察，对发现的新问题要迅速认识和做出相应反应。经验证明，如此认真负责地抢救病人，往往可出奇迹，如此事例枚不胜举。相反的消极态度，必会对危重疑难有畏难情绪，没有信心，客观上起了不同情病人效果，影

响积极治疗。应发挥医生主观能动性，力争抢救属于人只一次的生命。经验证明，即或失败病人牺牲，也往往不遭非难而获同情。（当然揪住某些所谓意见不放的人也是有的，所以，必要的手续要有，要签字以示同意。确遇有过不做积极抢救死亡而无怨，反而竭尽全力而死亡有怨言者，尤其有创造性抢救如剖胸心脏按摩、急症手术后死后有怨言者），但我们相信党、首长、科学和战友们的正义的舆论。但我尚难苟同“安乐死”，因它与我们所追求的相违背。我认为我们做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而地球上的某些角落提倡“安乐死”，恕难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医德和技术政策问题。略微陈述我做为一名医生的初步看法：

（1）提倡“安乐死”的理由是“该死”者都是患了不治之症，如癌症晚期等，再救也无用，不如给他一针让其安乐的离开人世，以便使病人少受折磨，也减轻了亲人的折磨。诚然曾经见到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生命线的病人，也见过病人自己拒绝抢救和家属拒绝者。但这不能做为执行“安乐死”的唯一根据。因为，今天“不治之症”，明天就可能有救了，如战伤新的“三大仇敌”中的破伤风、败血脓毒症、肺结核等过去谈虎色变的“不治”之症，自从突破性发明了TAT、青霉素、链霉素等都已由“不治”变为可治了。即便现在尚无特效药，尚无认识和未找到解决办法，迟早总能认识、总能解决，迟早总能药到病除，这已为以往的医史所多次充分地证明了的。

(2) 有的病人活着诚然是痛苦的，但仍应与医生大力密切合作，创出奇迹者已确有之并为数已不少。病人应该懂得即或生活质量差而很痛苦，然而就是这痛苦存活，也是我们医生创造而且得来不易的，做为医生我们爱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希望病人和舆论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希望病人能为未来的病友做出贡献。

(3) 如果不顾以上基本事实硬要其“安乐”地死去，岂非杀人或者病人硬要死，岂非让医生做他自杀的帮凶？二者我都反对。

(4) 医生若硬坚持人家“该死”，就说明他自己的无能。我相信没有要杀人的医生。但无信心、无能力去找到矛盾的关键所在岂非自己无能？！让病人死去，岂非等于是掩盖自己的无能。诚然存在许多棘手的困难，但不能否认有成功者（如 1948 年尚无可能使用 TAT 时就用 Morphen 注射 + 截肢救活了一名破伤风；死前心内“三联针”的确等于安慰，道义剂，但是“三联针”后活了的麻醉意外李秀梅也是事实……。这些，过去可以说都是要死亡的。）

(5) 我相信不会强迫我们执行这样的“安乐”；否则，岂非和老前辈们对我军白衣战士的长期救死扶伤的教导相悖吗？！你要死，你去死，让我帮你，我不干这种与我们干了一辈子的信念相逆的事。

(6)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有无死的权利？我不是律师，我不懂。）要保护准生而不准死的权利。他之所以想死或说人家“该死”，都是由于生不如死的

痛苦而来的。医生的责任是让病人无痛苦的生存。

医生要善于掌握病人心理，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注意自己的言、行和表情，均应以增强病人自信必胜为主，尤其对危重患者、恶性肿瘤、破伤风临终前等治疗困难的病人更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特别我们在病人心里，已占据信得过的专家权威位置时，我们音语笑貌或叹一口气，都可影响病情发展。法律允许我们医生为了医疗上的需要，可以无罪的“撒谎”以安慰垂危战友，要注意须有刚毅有望的神态安慰病人。对病人要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一件小事也要兑现，不可忘记，这是做医生、做人必备素质。使病人配合我们一同向病魔战斗。同时，要实事求是，曾有过手术病人本来不是他的术者，病人在宣传他的功而默认不喧，是不道德的，应严肃地纠正，不获贪天之功。

医生应善于学习一切先进医疗经验，对先进知识有分析地用于自己的病人。善于边实践、边体会及时总结成败经验，扬长避短。善于听取学术上不同流派的见解，不强加于人，不求像军事动作一样的千篇一律，允许人家用自己得心应手的最为熟悉、有把握的方式去治疗病人（如某一手术方式等）。尊重师长，尊重兄弟医院和上级医生的意见。

对任何医疗工作要认真负责，如查房要无次数地去看你认为易变性大的危重伤病员，甚至守在（或有条件“睡”在病房）危重伤员身旁，以促其脱险。举止稳重端庄，敏捷乐观。



以上，我体会是任何专业的医生都应具备的政治修养和职业素质。我想它应该是终身素质，即或离退休后，也不应息手蓄甲，对呻吟挣扎的病人也不应无动于衷吧！

关于如何当好外科医生问题，许多问题拟在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中结合手术叙述，在这里我仅简要提示几个重点：无菌观念要特别强，例如刷手浸泡消毒、着衣是否有污染情况，只有自己最明白，一定要认真再刷、再消、再着无菌衣。认真按照“三原则”制定设计手术方案，尊重病人组织和生理皮肤纹理。手术是外科重要医疗手段，但非唯一的手段，应该实事求是确定治疗，应尽可能减少手术痛苦采取保守治疗，如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外科医生并非单纯的执刀者，而是病人的保姆、亲人，必要时护士与个别动员，说明利害加强其责。不仅手术前检查要详细、手术有指征，而且要认真周到地处理术后病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这是体现术者对手术病人负责到底的重要方面，不可偏重“只一刀”的恶习。

医生与护士不仅是医护关系（即下命令“开医嘱”护士执行）。他们及炊事员都是医生的有力助手，这对保证手术胜利成功与康复不无关系。对医嘱有布置、有检查，应有预见性和告诉护士遇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解决办法，尤其术后三日危险期内更为重要。要作病人手术前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其信心，解除其焦虑，预见性告诉术后可能发生的症状，如疼痛、腹胀等及怎样

办，一般均会收到良好结果，得到病人的充分合作。做外科体力很重要，相对更需年富力强，也和演员、运动员一样年轻，中年最出成绩也是最“得时”之时，不可高傲，要更尊重、维护老医生们的威望，因老者的今天很快就是你的明天。这是工作所需也是道德问题。外科医生做伤员的思想工作最方便有力，因伤员接受我们的亲身手术，治疗中感情已经融汇，由于我们日以继夜的辛劳，取得了他最大信任。1951年冬伤员闹事我是一分院所有领导唯一所谓“不官僚的领导”，而受到伤员“不伤害”我的所谓“优待”。所以，我们医生站出来做工作，他们比较易于接受。

这一节，我着重从事临床最“前线”的经治医生（地方医院称住院医师）而说的。但一位医生不可能当一辈子住院医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需要和医生自身的“红专”进步，而组织分配你做主治医生、科主任（那时其责任为全科业务负责，等于现在主任医师，无明确分工），如可能让你做医疗行政领导工作，如医务主任、医政股长、医务副院长、院长等职。所以，我讲的永不离开临床第一线，我理解的医生包括经治（住院）医、主治医、主任医及其领导一个专业、一个科甚或一个医院的医生而说的。如果已完全离开临床医疗，就实际已不是我所说的“医生”了；“医生”只不过是他人担任过的历史职务而已。是两码事。不客气地讲，这种人往往技术平庸而善玩权术的“官迷”，他们依仗的是别人嗤之以鼻的所谓“航空”路线，取得某些

领导的信任，反过来他们可以依靠他的后台对人大打出手甚至加以欺凌为非作歹，这种人岂能有何真正的本领可言。例如绥远军区某位业务院领导，这一实际是已离开临床的医生，已失去了“中央医大”毕业的实际存在意义，他所以终身当“官”、整人，其伎俩就是他们有意地将技术问题扩大为路线政治问题，而打击陷害埋头临床第一线的医生，灵魂是卑鄙肮脏的。

## （六）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的形成、内容及意义

1、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的形成，是在党的领导下，长征老前辈医生们培育下及我们成千上万的后来人，共同通过残酷的战争，在老区人民的无私大力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在恶劣环境下完成医疗任务中慢慢形成的行动规范与信念准则，从而成为我军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转业到地方医院后，将其播种在和平环境下，同样灵验地生根“开花”结果。起码经过内蒙古乌盟医院的重复性实践，证实我军的传统不仅光荣而且是科学的。证明它已经突破部队（医院）的范畴。

我相信，全国各行各业的卫生医疗机构，也必定能从中汲取营养改进与完善自己的工作。

这就是说，不仅我军医护要顽强不懈地将传统代代相传，永远不使火炬接力棒滞留或中断于某一代，使革命火炬永放异彩，发扬光大。而且应该扩大范围，使我

戎医生辉。当然我说的是传统的精神，而不是硬性推行那一件具体的事物。

我们现在的条件（包括地方医院）不知比过去要好多少倍，因此应把工作做得更好。当然不是要人们重回到艰苦环境，去弃优就劣，但过去的历史不可忘记，忘记即意味着思想生锈了，“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内容，我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 1、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唯我军独有（告诉敌人也学不了）的一个法宝，它能战胜任何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要有人民，在任何地方均能办医院，开展治疗并完成任务，能视敌情变化自己的斗争策略。如抗战时的化整为零，与伤员一起疏散至农村，使伤病员能吃、能睡，医护人员能在山洞作手术，等打不垮拖不烂办院。解放战争又化零为整集中治疗，“大兵团作战”，最后战胜敌人完成医疗任务。

那时无专职麻醉医生，由外科医生轮作哥罗仿、依脱吸入全麻，腰椎、臂丛、局麻，均由自己完成，人人锻炼成了多面手，以适应大批而密集的手术任务。

镊子少用竹耙、铁丝自制，无纱布用麻纸代一部分。无大便器瓦片代，老乡夜壶作尿壶。从无工作服，日夜军装一身滚。要说我们是白衣战士，实在是穷得穿不起白衣，直至1946年夏才每人做了一件粗布红十字白大衣。

由于敌人对边区封锁，药无来源，食盐曾成为我们最为得心应手治疗战伤的常用药物，因为可以就地取材，虽困难但到处可以找到。当然 Aktithol Rivanol、红汞，不仅可外用，而且可用壶咀蒸气自制土蒸馏水，制成注射液，用于若干疾病的治疗，如脓毒症、回归热等。当时边区虽有一个伯华制药厂供应些土中成药，我们始终不为无药而叫苦，同志们都理解当时处境，叫苦也无用。然而正是这种“主动想法”的精神，却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老乡协助下，用裤缚住三个口做口袋背粮，采野黄花保证重伤员的伙食供给；在杜家河全村伤病员暴满，又逢大雨滂沱，克服燃料困难，保证伤病员吃上饭，终于使伤病员痊愈出院。

无米时领来带皮谷子夜间推碾，做成“马蹄酥”干粮打游击食用。特别在反“扫荡”中，常常拂晓前已与伤病员钻入山洞、草丛隐蔽，白天绕山头，下午敌退下山巡诊，换药和做饭。

解放战争中伤病员密集而量大，更加重了人少事多的困难程度。由于任务的变化，知识不够，干中学、学中干，边体会、边总结，在自学中提高水平，适应医疗任务的需要。

由于环境和任务不同，我们曾实践一人担任伤病员最少十数人最多 400 多人的医疗任务。抗美援朝战争阶段，每人经治 40 多名伤病员，已感到十分忙累。

节约药品器材是我军一贯的优良作风，我们养成这

种良好习惯，决非可有可无之小事，而是做一辈子外科医生的素质问题。我们当时“换药”消毒创伤周围十分认真，而且，棉球很小，干湿适度，每毫升酒精可作6个小棉球，节约手术用线（当时均白色无黑色丝线）剪得很短，既有利于锻炼外科打结技术，又很节约材料，我们从无挤酒精棉球的恶习，一生从事外科工作，一省一费，效果差异悬殊。是传统问题，是困扰下的工作所需；否则大手大脚瓶空罐尽是无法坚持战争的。现在有人提倡高消费，“以高消费促进高生产”，这已为近几年无数严酷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本来我国还连温饱问题尚无完全解决，又来一个超前消费，物价飞涨至人们不能承受的程度，实在是太不应该。全国十一亿人口都来个高消费这还了得！事实证明，高消费未必能真的促进高生产，反到生产出了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成为顽症。

连续战斗当然精神上十分紧张，没有小憩的机会，但同志互相关怀择机和衣打个盹也是十分好的，既可使同事继续不间断地连续数天工作，又可照顾了同志身体健康，虽然劳大于逸，但比不逸也好，更重要的是可使医疗质量得到保证，不出或少出事故。记得1948年冬孤山战斗下来的伤员手术，汽灯下失火，险些出大事。又曾有过夜晚手术没有汽灯，而是护士同志们端着麻油灯照明做手术，端灯的史吉科同志，由于连续手术过于疲劳，端着灯立位姿势下，已呼呼鼾声小作，睡着了，人们不禁嬉笑，他在笑声中惊醒，又振作精神揉揉睡

眼，坚持手术至完毕，他是多么好的同志啊！

## 2、严谨合理的手术制度

严谨合理的手术制度，体现着我军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作风，有集中、有民主，有劳有逸。

严格的无菌观念，是外科必备的根本素质。在无橡皮医用手套条件下，为了达到无菌手术效果，同志们认真地刷手、指缝、前臂、尺侧等浸泡肘下的全部前臂，当时用升汞 1% 溶液泡，台上同志们常遭升汞侵害甲成乌褐甚至造成舟状甲。后改来苏水浸泡一直沿用至今。

在战斗间隙，找到在农舍就地手术的经验，室内器物不动，不使尘土飞扬，反而一期愈合，否则打扫一翻再手术，心是好的，然而往往使空气污染创伤感染化脓，实则是“画蛇添足”，（这一点已在 1966 年达茂巡回医疗中重复实验得到证实）。

“换药”推行消毒碗制，每一伤员三把镊子作为常规，消毒员提着火炉随换药组煮沸镊、剪、探针，虽然粗碗笨镊，但完全符合无菌原则，严格而合理。这一原则延续至今，器械高级了，但仍沿用这一原则。如乌盟医院一直坚持来苏尔消毒制度，值得称赞。敷料再生实行白求恩消毒十三步，直至无“尸壳”不能再生为止。

日常医疗中，无论手术或“换药”，已养成了先净后脏（即先无菌，后感染的）、先危重、后轻缓顺序处理习惯，尽可能避免院内交叉感染，虽然那时农村环境条件极差，但这一原则是完全合理的。一旦发现破伤风、败血脓毒症患者，立即隔离，污染敷料烧毁，有时

连残肢一同深埋处理，一切敷料彻底销毁，以保证不使当时称之为“三大仇敌”的烈性病蔓延扩散危及全体伤病员的生命。这在察南战役中，曾多次遇到。但避免了传播，床旁（即病房门外）常放一盆来苏水，就是供查房医护离开前消毒手之用，然后再接触其他患者。

按无菌原则，当然不准手术中途下来解手等能污染手术行动。人们久之获得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战术”经验。即：早饭适量吃稀，上班前大小便排鼻涕，刷手之前无论有尿无尿再去小便，排空膀胱，这样就可连续站立四五个小时甚至以上，尤其手术者不致因精神集中着急出汗多而脱水，人们不致中途便溺而坚持不下来，因为木桶消毒衣服数量有限，而且中途离室也是不符合无菌要求的。

手术虽不是外科的唯一手段，但它毕竟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手段，尤其战争年代，好好的健康人群，霎时间就可能被无情的战争吞噬一片，伤与亡是司空见惯难以避免的事，尤其是敌人主动进攻之时是如此。我们做为野战医院，要有最大的机动灵活性，适应瞬息万变的战斗要求，要有一支自学训练有素的手术人员及机构常备不懈，十分重要。一个战役一声令下，就能有机地连续轴转地连续“作战”，战役过去，又可择时总结或整训，以利再战。我想在这一节中较详细地叙述那虽未成文的手术程序及素质。

我们实行“手术三原则”，即：术前详细检查；必有手术指征；手术者对患者负责到底（这一点地方医



院，流动性太快，办不到。部队医院，因移防，也有困难）。

术者与助手间（尤其第一助手）相互协同操作（不是一人独揽，所以就无地方医院抢手术操作的因素）各司其责，台上台下互相配合，台上同志要相互体贴与关怀照顾，共同围绕患者利益的执行者——手术者服务，不是主角配角，而是一个分工负责的战斗集体；他们间有不同之分工，但更是战友关系。以一个手术操作为例：

第二助手要最先洗手，然后消毒皮肤、术野、铺第一层无菌巾，然后他下去再泡手一次，术者先用美兰划切皮痕、碘酒、酒精固定。

术者与一助穿衣，张开双臂便于台下同志协助背后绑带子，戴好手套，上盖一层纱布，以防污染。一助和术者共同铺好无菌布，如创伤骨科二助缝扎固定；

各站其位，术者站在手术最方便的一侧，对面一助，二助可在术者靠患者头侧，可以用巾钳扶持无菌巾，巾钳双圈由可预先备好剪线剪，及若干把止血钳的临时小仓库，以便术中最迅速的递予术者或协助术者止血；

手术护士递刀把于术者（这是为术者方便），术者不必调转刀把就可立即开始切皮，使时间十分节约。

皮肤保护巾，不准戴手套的手直摸患者术野皮肤，因虽已消毒，但是杀不死毛囊深处的细菌，故仍不洁净，是相对无菌区（皮肤保护及胸腹膜保护都是先进合

理的操作)；

术者切开皮肤，一助协助纱布压迫止血，并立即与术者一同接受器械护士与二助递来的钳子止血，再深切皮下至肌膜按血管钳止血，止血操作，术者与一助可互相配合止对侧的出血点（术者止一助侧血，术者一侧帮一助纱布压迫由一助止血），然后二人用细丝线轴结扎对侧的止血点，方法是：一助先提起钳以便术者好套住血管钳，结扎一扣时，一助将血管钳头翘起，便于术者结扎，随术者结扎二扣时，一助放开血管钳给器械台标拭备用，然而术者将已结扎的两个线尾并住提起，暴露结处，以便二助剪断。就是说三人有机配合，都有事干，又都为术者服务。缝组织保护巾，也是以此同理操作（但那时不会或不懂深部结扎的先进方法，是后来学会的）。

深部当然已形成创腔，护士递的是由长钳挟着的单根丝线，医学院习惯于一根线打一个结，双头线尾再长也弃掉不用了，一个手术下来要收一团线头很是浪费；我一直是不放开长钳，一根长线绰绰有余可打两个深部结，已如前述不赘，而且只要是未脏的线头，可由护士或二助保存起来再用于浅部缝合或缝皮之用。

如是胃肠手术，要注意防止消化道内容物污染术野，为此，必须再放一层单子。而且注意：

完成浅层（如胸腹壁）操作后，一进腹腔（比喻），除必要使用腹膜保护巾外，要将台上一切器械收回器械台，并且纱垫、器械（钳、针）都要记数，以便关腹后

清点。凡进腹腔的纱垫，一律使用带尾的纱垫（一角缝一带）尾上挟钳，钳子不准进腹腔，要避免遗留异物于腹腔，人人要警惕起来，万一暂无带尾纱垫可用直钳挟住，置于腹外。关腔前术者要极重视地重复检查各操作部位，是否出血？如有活泼出血点则要结扎止血，渗血可用纱垫热敷止血。有无异物？尤其开胸之肺叶之后，胸壁后角、胸膈角有无填塞纱布？如开腹要特别注意各肠攀折叠之间最易隐匿纱布。如是对口引流，尤其流注之远方创腔内有无异物。如是截肢因创腔浅，但要看看骨断端的骨髓腔内有无填塞之碘酒棉球，（以往曾有人忘记取出，术后又二次打开重取，增加患者痛苦），而且要常规的在关腹腔前要问器械护士，敷料器械是否对数有误？要听取器械护士的警告，如果缺数，即使已关部分或大部，也必须拆开再找（台下污物桶内也同时核对。有的怕遗留，一切用过的纱垫都在台上）。阜外医院用的是长纱垫一个角上用红布包角，里面装入一铜圈，以防异物存留在胸腔或心包。同时要规定数字失误要器械助手负责，以加强其每个步骤的责任心。当然如果出事，术者要负主责。但其他助手（尤其二助）要提高警惕，注意记忆各处的纱布操作情况。而且要经常提醒，千万不可犯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凡事都要自己经验才信，那就糟了。一旦发现，要严肃处理，批判从严，以达到教育其本人和他人之目的。我们多年来一直注意防止遗留异物的手术常规，还从未在六十年代以后再见到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时过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偶

有报导，可见其顽固之一般！

手术完毕后，注意清洗创腔，按放必要的引流，逐层关闭缝合，可连续（如关腹）可间断（如关胸），针距可“疏”（指常温手术）可密（低温用抗凝药肝素化后，必须准确和有一定的密度，以防渗血）。

缝合胸腹壁，均可用无损针带一条长线，一头交给一助左手握住，一头则由术者在二助的协助下缝合，术者在捣针再挟之时，一助即可结扎，二助随将线剪断，如此一针刺地三人合作，有机配合的缝合，既有速度，又可保证质量，质量并不因三人同时协同操作而降低，又可大量节省缝线。但当缝合皮肤时，则不能用上法缝，要用梭针一针一线打一个结的方法，这是因为皮肤虽然最浅，但真皮毛囊的细菌，仍有感染创口之可能，故要单针单线打一结。这是为了将“好”字放在首位，符合无菌原则的操作。术者，自然是让技术较全面而熟练的医生担任，但我反对一人独干，好像什么非要自己操作才算放心，有人称这种人是技术垄断，暂不定论，这是不相信战友，认为自己总比别人高明，当然关键的地方术者一定自己亲手操作。更不能与同事摆架子，发脾气。我见过这样的“大”医生，但往往是不受欢迎的人。反之，七手八脚，到底谁是术者？！其结果必是秩序混乱，不按规程，容易发生事故或留后遗症，更是不能容许之举。

正确的操作，即在术中除器械相触声外，一片静悄悄的严肃气氛，台上台下，又极重视术者的每一指示，

全力协同完成之，然而手术完成后，却又呈现欢声笑语之气氛中。

缝皮完毕、翻皮对皮，再次 Tr·jod 酒精消毒再绷敷料。四肢骨折的病人，放下床的下半部，用骨盘支托器支起荐部，打完石膏裤，整边，清拭，写日期送回病房。战时往往均有担架组长替代医生吩咐病房护理（建国进城后，有必要医生亲自将手术病人送回，并将肢体体位摆得最好满意为止）。

半天或多半天过去了，医生脱掉白衣以后的第一件事，哪怕已经精疲力竭或饥肠辘辘，也要去病房看望安慰被手术者，检查“命令”执行情况，然后再回去吃饭或休息。

我认为这全部的手术过程，就是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医生要养成节省药品和缝线的习惯，既节俭又合理、技术娴熟地外科医生，一生的医疗实践中给国家、给患者所节约的财富将是很可观的数字；一个病人一团线不算什么，但一生不知要有多少病人接受我们的手术，不知要节约多少团线这就不是小事一桩了。

术中用血或截肢一定要养成“小心又小心、不相信自己”的良好习惯，必须在消毒开刀前再问一下周围同志，这是左、右？请朗读血瓶笺上这是何型血？这本是“平常小事”，怎能理解一个堂堂大医生连个左右也分不清，然而生活中就有大教授众目睽睽之下硬将左侧当右侧，当人们将其提醒后，他自己也不解为何糊涂到如此

地步！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如果人将事物认识错了，就必然错上加错，然而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绝对不准搞错，一旦搞错（或血型搞错）人命关天，非同小可。所以术中决不可讲谎话，后果不可设想。做外科医生要严重警惕粗心，一生不可犯遗留异物这类的错误，因这是绝不可原谅的；也要不犯或尽可能少犯技术性、解剖性错误，因后果恶劣，无可弥补。

术者若是上级医生、老师带下级作，当看到下级医生完不成或可能违反患者利益时，要主动地接过来弥补操作，以保证医疗质量，对病人生命负责。但也要为培养技术干部而放手，否则将后继无人，将会绝迹，但必须在保证医疗质量前提下。这样的矛盾，医院越大越突出，应正确严格的掌握。但我们基本的还是要多培养一些技术骨干，加速技术队伍之成长。因为技术非己所私，没有党和八路军的培育，我们将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战争给人们造成的量大而密集的伤亡，其医疗任务决非少数人所能完成，所以，我们军医对战伤的救治任务，仍是须要依靠群众路线，使之体现在手术实践上，才能胜任。

我们也反对不讲实际能力的手术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种制度，他的下级医生只能为他服务，从写病历、查体，术前准备、甚至上台的消毒铺单准备好后，正当开刀的关键时候，却必须交给他的上级医生，他做完主要部分抛下就走了。这样的制度弊端是：不一定适合国情，更不一定适合我军医院的

实际情况，放慢培养干部的速度，却只讲学历年资而不讲下级医生的实际能力和工作任务之需要；只拉一刀别的不管显然不是对病人负责的制度，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放手”解决。时至今日，这些人仍看不起“土八路”，说明他们中“洋”毒之深的顽疾了。

一台手术的完成，是台上台下分工协作的战斗集体，无论是台下端灯照明的、抱大腿和肢体的、打止血带的、接送病人的，台上助手拉钩暴露术野、拔针剪线、把持位置……兢兢业业地协助术者完成手术。下了手术这些同志又各营其事——查房看病人的、洗涤晾晒、敷料消毒，又在准备下次手术，以利再战。这个集体从不讲什么待遇补贴，只图治好战友，减少非战斗减员，保证战争进行，以利下一个战役再战。

### 3、一丝不苟的严谨科学作风

做为外科医生，手术毕竟是重要的工作手段，要爱护病人组织，尊重生理纹理，不乱开刀，也不切无效切口，不虚张一钳、误剪一剪，对手术病人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想到病人的生命已经交给了我，我们是病人的卫士、保姆、亲人，我们制定的医疗措施正与误，均可直接影响病人的利益。有时我们遇到病人不愿接受某项手术，就应设身处地地想到假若我要是他，我是否乐意接受？事实证明，只要给病人留下最有用的功能器官，哪怕是一个拇指、一个睾丸、一只眼睛，病人是十分感激医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老话，在这

里是有用的格言。

我们一度在下关实行的医生亲身“换药”，按现代语言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合理的方案，使疗效更加提高。

为了有组织的最有效的做好医疗工作，由“上班前讲话”（等于早会，只解决临时问题，当天工作布置与检查）逐步演变成的“集体办公”制度，（有的单位叫科主任联席会，碰头会、周会）经长期实践，证明它能上下通气，能有领导地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能将党的决议通过行政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的良好方式；且又能利用较少的时间，集中解决较多的问题，便于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良好的工作制度。

医院以医疗为中心，要组织全院各机构为伤病员治疗服务，“后方”供应“前方”。教育全院同志作风严谨，就是按科学办事不可马糊，一丝不苟、实事求是。

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是一位党政领导、上级医生，责任更加重大，要组织技术力量发挥技术效能，当下级医生遇到困难请示（而非推脱责任）你时，你应迅速认识并做出反应，答复并做主，是最得人心的，就像长征前辈老院长董兴谱那样果断、大胆，敢于负责，是下级最欢迎的。应该认为这是医疗技术主动争取党的领导的问题，当请示时又不做主遇事推诿，好像只有医护应该救死扶伤，而领导若无其事毫无责任，那就错了。事实上是放弃领导，是失职，应该



受到谴责和检讨。

要形成一套适合自己非常机动灵活的白求恩流动医疗队式的手术队伍。我们曾在 1966 年 2—8 月内蒙地方医院——乌盟医院，带着问题下到农村牧区巡回医疗，调查战争年代那种布棚式的简易手术室的科学性及实用性。普遍对己、人、物、空气的洁净度作了细菌培养及敏感度科研，并与城市作了对比，当时为五个公社作大小手术 415 人次，无菌手术达到 94.68%，即（化脓率）5.32%，并调查了细菌分布、生长、药敏与手术创伤愈合的影响。为便于肉眼观察，取其 238 例手术作为观察对象。对战争年代的做法经过现代客观研究手段，对许多疑点作出了客观的结论：

农村、牧区到底脏不脏？比城市干净。城市的手术室比乡下布棚简易手术室要干净，=1:4；即使这样完全可作大手术，而手术室不断来苏尔消毒越用越干净。

空气消毒以硫黄熏的方法最好，适于择期手术准备。酚次之，急症消毒为好，来苏尔最差，空气中弥散差，可用于地面消毒。空气消毒的作用是肯定的。

布帐，只一层布帐对防止空气污染，效果是肯定的，所以，布棚式手术室是有实用价值的。

细菌分布：乡下空气除大肠杆菌外，均为非致病菌，乡下有克雷伯式菌是一特点，可能与草有关，城市则无。城市空气内则脏得多，除三种致病菌还有四种杂菌。有霉菌是一特点，脏多少以菌株数计，城与乡=1:65:1。而且乡下细菌对各药物敏感度高，相同的药为何

农村老乡效果好，原因即在于抗药性小。

对已消毒关键在于手， $\frac{1}{300}$ 来苏尔溶液是理想的，培养（一），配制方便，目测淡乳白色即可，杀菌力不受温度影响，无皮肤刺激痛，非易燃品好携带，洗手后，残液还可作手术室地面敷料消毒之用。我们配制浓度，实较战争年代还低。是理想的外用消毒液，适于战争及流动性大的手术消毒。

对人消毒的关键在皮肤；对物消毒，15P压力已够。骨科髓内穿针固定这样要求严格的手术都能一期愈合，其他如疝、兰尾、乳腺、脊柱结核病灶清除及植骨、甲状腺等手术，将更不成问题，子宫全别术、膝、腕关节结核、慢性局部性布氏菌病囊肿切除等，肠坏死肠切除吻合、直肠悬吊+缩肛术、巨大胆囊结石胆囊手术病种之大，不亚于城市；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农村、牧区乡下棚式简易手术室是完全可以做大手术的。

据我们调查结果表明：手术创伤愈合与性别、年龄、民族无关，所以无论男女老幼或少数民族皆可在乡下作手术；与营养有关，这年所去之处都是大灾年后，老乡健康情况较差。局部是否用青、链霉素无关。但我们主张对大的手术、无菌要求特严的（如骨科）手术用抗菌素有备无患。

我们重复了机构灵活性的实践：在石宝公社，从整理手术室，糊窗缝、扫地、钉布帐、洗手、采集空气标本至59分时已开始了局麻，又9分后已开始切皮，即

从整理房子至手术开始只用 68 分钟。

在西营盘公社，已有备好的手术室，我们上午 11 时 20 分到达，随即看病人（嵌顿疝肠坏死）交底后将病人移入手术室。11 时 30 分洗手，11 时 53 分皮肤消毒，12 时切皮，下午 3 时 30 分肠切除吻合，并疝修补，术终。从开始准备到开始手术仅用 40 分。

这种到达战伤医院立即开始工作，我想与部队医院时也差不多长短，那时，无留资料无法对比，但在和平时期的模拟实验中，有可能较那时为拙手笨脚，但总的速度约在半至 1 小时，我们是 40'——68'。以上各疑点的揭示，就是“为何山谷、山洞内作手术也能愈合？”的答案。

这次《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光荣传统的调查报告》（附书末），我在乌盟科协 1974. 1. 18. 科技年会上作专场学术报告，受到与会所有单位及军地同志们的极高评价，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得出了“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科学的”的结论，也间接对白求恩大夫的流动医疗队做出有科学根据的评价。当然自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应争取好上加好，就是条件可以变（如从端麻油灯照明改为汽灯、无影灯、棚式四面壁改为两面壁（即只有顶子和手术室洗手间与洗手处隔一层帐子即可），蒸桶改为手提蒸气消毒器……等都可力争好些；但农村环境棚式“简易手术室可行手术，甚至可行大手术”的精神是不能颓化的，其实，那时何止棚内能做手术？在老乡的任何房间、厦

子、庙宇、山洞等地，我们都成功地做过手术，只是当时无法赋予客观数据而已，但根据当时实践的效果，是肯定在任何地方，为了抢救战友生命也是“可以”手术的。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应该而且有最充分的理由和实践，肯定它们是我军卫生工作光荣传统。棚式手术室仅是其中条件“最好”的一种。既是光荣而科学的传统，岂能让它中断于我辈之手。

#### 4、泼泼辣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实际和艰苦奋斗是一码事，培养出勇于克服困难并有说干就干的作风，才能更好地完成医护任务。过去曾让刚参军的男女青年先锻炼处理死人，夜间看太平房，以防野兽牲畜吃尸体。记得1944年刘维普表现得“焉大胆”，而也曾有过声泪俱下的懦弱者。前述事例已很多，从略。

### (七) 我军医院常常遇到的若干重要问题

#### 1、正确认识与处理学术问题

医院是我医务人员与病魔和死亡作斗争的战场，科学性很强，所以医院的工作均属学术范畴的问题，而且永远不会有永恒不变的医学模式和固定的水平。

学术本身就包括对问题的不断探索、发掘和各抒己见地寻求正确答案的问题。不承认进化决非马列主义观点，今天先进的东西，总会被明天更完善的东西所替代。所以对待学术问题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例如，战争年代常作的截肢术，首先应看到它为战争及军事医学立过功劳，从而使当时的医院能成批治愈伤员腾出手来为下一个战役的医疗任务做准备，即承认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积极作用；但以几十年后今天的水平来衡量，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如指征偏宽感染率高等。一方面是当时物质条件、工作环境困难及药品缺乏，另一方面是那时不可能隔开实践就有今天的水平。这本是常识问题，尤其做为医院领导，应该不断组织与发动技术队伍，发挥最大的医疗效果，使之好上加好，使医疗技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地向高水平发展。同时不惜“化钱”和工作暂时受影响，也要选派人外出深造，参加学术会议，取经取宝回来改进工作，提高水平。

从理论上讲，无人公开指责或反对医学水平的不断进化，但实际生活中就有不懂不学还装懂的自以为很“高明”的假洋鬼子，他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他不开展也不准别人开展新工作，其结果必是贻误事业，对自己、对人、对事业都不利，最吃亏的是伤病员。

死亡讨论会，本来是医院一个发扬技术民主的好制度，医护同志自发地总结成败经验，以期扬长避短用于还活着的战友，这是军事民主在医疗工作上的体现。但

来缓后，某院领导将这种大好的技术民主空气搞成杀气腾腾、追究责任的声讨会，以他的作为看来，他认为“检讨会”就一定是医疗上有错误有问题，每次开会他挟着一本别人从未见过的《希氏内科学》，挖空心思地照本宣读，好像宣布圣旨一样，“按律评刑、判刑”，还有极少的自以为是医大毕业的“歪咀和尚”，跟着他鼓噪一时，危言耸听，吓唬“百姓”（下级医护人员）将好端端的技术民主，变成了“左”倾大棒，使本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良好方式，变成人们藏头缩尾怕碰“律条”的应付手段，将朝气蓬勃的大好的学术空气，搅得一塌糊涂，使很有作为的青年医生，变成谨小慎微，以蜗牛速度向前爬行。其实正是这种人，既能巧言花语取得信任掌握医疗大权，而其真谛是并无真才实学的“科盲”，科盲挡道，是技术进化的大敌。然事物本身是按规律发展的，是科学的、非瞎说的在继续发挥其生命活力。当然我是指当时的我院，然而我军是否还有这种“老左”政策？我推理相信在“左”的年代里不会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是严重影响技术进化的，我军后来固然有如301、沈阳总院和几个军医大学附院、石家庄和平医院等许多蜚声中外高水平的先进医院，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不少单位技术进步速度较地方医院为慢，除病种单纯、服务面窄而外，对医疗技术活动，左的禁锢与干扰不能不是原因之一。我认为无论军、地医院欲想技术大踏步前进，必须排除“左”的干扰。

正因为我有过其痛苦遭遇，所以，在我从事临床和医院行政领导的所有过程中，从不随便给人戴医疗事故帽子。我一生见过严重的事故如腹腔遗留纱布等，也赞成严肃处理，引以为戒，严肃我党我军的组织纪律性，以教育其本人和全体，但其根本出发点是教育而非惩办。老实讲，我一生从无见过什么政治事故，银幕上的东西，毕竟不是生活的真实（当然一个人一生活动的范围有限，我不能完全肯定的否认有），但我更坚定地相信，一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怎能下得手去昧心的害人呢？一个病人的治疗成功或死亡，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看问题要从客观的多方面全面的去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真实的结论来，尤其对于技术水平所致造成的某些失误，是个长期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即便病人牺牲了，也无可奈何。正确的处理，也只能是努力学习先进技术知识，提高医疗水平。做为医院领导，应教育人们“又红又专”，开展必要的科研，攻克难关，进入更新的医学领域，技术精益求精，为全体指战员的健康、为伤病员缩短疗程早日康复、为军事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那种将己置于医生行列之外和之上，脱离医疗实践，更谈不到是有经验的战士；自感高明，依仗权势欺侮同事，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实际这种已离开临床的医生，已无资格指挥临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难道事实不正是无情地将其抛弃到九霄云外了吗？！但是这个人物，却终身做“官”，终身整人，使人迷惘不解，很大原因是他们善于将学术问题混

淆为政治（路线），即“左”扩大化在学术上的反映。

在医疗实践中，我深知战斗在最“前线”的经治医生的苦衷和心情，尤其理解他们抢救危重险症时，要迅速认识病情，迅速做出急救反应，那种果断采取措施的救死扶伤的高尚精神，医院首长应在这时为其撑腰并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而不是袖手旁观或转归不良就去整他们。

生活中，我们为了贯彻党的人道主义政策和做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也曾奉命给俘虏甚至犯人治疗，这与我党的俘虏政策并无矛盾，医疗和对犯人如何判刑是两码事，医疗并不影响对罪犯的严惩。

## 2、学术问题的正与误

这个问题是前述问题的延伸，“学术”二字既包括探索，就好像没有什么错误而言了，否。我认为还有正误之分的。

学术问题的确充满医学范围内许多领域活动之中，做为有政治头脑的医生，依然有个如何看待技术及如何扬抑的问题。例如，以外科言，治疗某一疾病的某一术式，有时多种多样，但其中对当时的病人按其轻重缓急各方面因素，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最理想的术式。（对同行允许他用最熟悉最有“把握”的术式，因各有各的长项）。这种术式，推理能使病人得到最大利益，就是可取的正确的，但是否正确？还要受医疗效果之好坏来



检验其正误。应该承认凡病人手术成功就是正确的；死亡的就是失败的、错误的。不能主观片面固执己见，否则你的术式再好，医疗主张再有理，但病人死亡了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医生要以医疗效果来检验自己治疗措施的正与误，不能以主观动机来“定弦”。当然凡疗效好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因为，医护的技术水平如何、政治责任心怎样，可直接影响医疗效果，即是刀尖、针尖、笔尖上都有指导思想效应；但效果不好或不理想的，动机不一定是坏的，只是尚存未被认识的规律而已，它们之中总还可能孕藏着相应的内涵，应该肯定失败例中的“对”的部分；否定成功例中“失败”或不完善的部分。但正与误，不可强行定论、强加于人，应允许不同见解继续探索。总之，我们的医疗工作必须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我们与旧军医不同之处。

只准胜利成功，不准失败的要求，总旨是正确的，以加强医务人员对病人的政治责任心；但从无绝对不变的正与误、因为事物总是不断进化，认识也随之深化，正与误总是随着实践认识的提高而逐渐完善达到进化。为了加速找到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认真不懈地总结经验，总有可能慢慢找到，达到突破性认识，解决关键性难题。若有可能应组织技术协作攻关。

应完善技术民主风气，死亡病例讨论会、出院病例讨论会，就是有力寻找真理的方式。因正确的东西往往从“失败”不完善中引出，取得经验再用于临床，使之

逐渐达到理想的目标。这是临床上正常思维的过程和趋势。过份地只听所谓“上级医生”的意见（专家发言），闭塞畅谈总结也是一大失误，不可否认上级医生有好的知识传授，但更不可忽略主要“干活”的医生们的亲身体会，这即技术民主的益处所在。以上，掌握是否妥当？均可影响医学科学进步发展的速度，归根结底对事业是不利的。

历史证明，不适当的干预和“左”的管理有碍技术进步，终究是事业与病人吃亏。

### 3、关于医生对医疗事业的指导思想问题

医院的事业门类很多，可以肯定的讲，首先脑子里想到它，才会去解决它，夺取理想目标。这一点极重要，要首先取得党政的支持。

应该有不惧艰苦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我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得出：“凡是别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甚至别人不能干的我们也能干”。这已为以往的实践所证实。我们尊重科学不说无边大话，说了就一定力争实现。豪言壮语是人们向往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所以是永远需要的，只要党政重视，创造条件，有技术骨干班子和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的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过去所反对的是像“大跃进”中无边的大话，那时我在沈阳医学院进修，当时领导提出何时让“高血压低头，让癌症让路；攻克外科粘连”等口号，这些也确是医学前进路上

的“拦路虎”，提出搬掉它们，无何指责，然而，已经过去近37年了，各方面有不少收获，但尚无突破性进展，这样不但未能精神大振反可使人扫兴沮丧。

豪言壮语符合“战略上要藐视敌人”的教导，但是医学某专业的宏观战略思想≠战术思想，为此就必须多下苦功，学习欲达目标的一切基本知识。不能在进修学习中随大流地学到多少算多少，要自身要求高一些，不能只安于现状平庸地渡过宝贵时间，要超负荷的多学多问，多看、多请教高明（包括进修同学在内）这样，就有可能使战术问题得到解决，使奋斗目标实现。我本人在逆境中由于自学已掌握了肠切除肠吻合技术，所以当时绥远军区的我院率先进入腹部外科新领域。（来地方医院后也有类似经验，即在1975年全国地区级医院我院率先名列第二进入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的先进行列[见《历史的回顾》（片19）]）。我认为攀登高峰的某一目标成功，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医院）的荣誉，是这个集体在党领导下，共同劳动的结晶，所以，不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集体英雄主义的体现。

但要特别遵循“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我们的对象是人，必须从坏处着眼，做好各种不测的准备，争取最好的效果。必要时，要动物实验先行，技术练兵，为病人创造最大的安全条件，依靠党的领导，大兵团作战，各兄弟科室的相互支持，力争首战告捷，就会士气大振，接受手术的病人也会成为有力的宣传员，为今后开展该项技术奠定与开辟道路；否则，第

一炮打“臭”，就会影响工作开展。这样的“红、白事”我都亲身体验过。

做为医院的领导核心尤其业务领导，就必须向所有“参战”的科室及人员做充分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目标一致，统一认识和行动，才有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大兵团作战，使各方面积极为其目标服务，才有可能获胜，也往往首例获胜。特别像开展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这样的大目标，绝非少数科室一个术者所能完成的，因涉及到心内、麻醉、生化、药学、护理学等许多学科，必须同时同步工作，才能完成手术。这是病人利益的需要，决非什么主角配角问题。

实践证明，虽然多方面努力，但仍有时失误，领导者必须有祛邪扶正的魄力，严防勾心斗角，幸灾乐祸，无风三尺浪的歪风邪气的侵袭。因为那样的政治空气，无论医院如何重视，力量多么雄厚，也是无法前进的。

要着眼于自力更生，配套精明的技术班子，要有争先精神，不怕慢，就怕站，并努力争取外援（条件、外因），往往外援又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如阜外医院当时派小分队去院协助开展。我们每战均从0开始，术前详细讨论，不可有一点马虎，每次术后必须总结讨论，活跃学术空气，以利再战。有时失误，完全来自“轻敌”，所以要时常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技术班子，由于人的变化，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的“文革”，不可能不受破坏而解体，就要及时坚定顽强的

再送人深造，尽速配套，开始工作。事实证明，送人进修提高技术水平，比从失败中干中学要快得多，而且代价相对小。

总之，我赞成在事业上永不满足，永不“服气”，永无止境的学习先进知识，决不能拒绝进化，争上进，与同事一起攀高峰，而反对安于现状，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平庸思想和作风。这样做是可能成功的，这就是我认为主要的成败体会。

#### 4、关于“医生永不脱离临床”的信念

一个人一生通过生活实践会形成许多自认为真理的信条，我们过去在党的领导下，在漫长的实践中，与敌人、“左”右倾、宗派、民族分裂主义、不良倾向、不正之风等斗争中形成了信念。以我而言，五十多年中就形成了来之不易，消之不能的信念，如：共产党好、党的领导、八路军好、老区人民伟大、毛、朱、周伟大等许多条，其中还有一条我主张的“只要当医生在医院工作，就不应该脱离临床”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指的临床是：门诊、查房、手术、科研、教学、学术活动等项而言。在我军医院工作，我前后做过医务主任，副、正院长等医疗行政工作，但我开始由盲目到后来清晰地认为不能离开医生工作。

离开临床犹如球员离开球场，指挥员离开战场，教员离开讲台一样的无所作为。以球类运动员而言，如果

离开球场不再练球，不要说创造更好的球艺和新成绩了，甚至天长日久连球也接不住了，干球类事业还会有何出息吗！医疗事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隔时稍长知识匮乏，不要说有效地领导事业继续前进，甚至连个处方也不会开了，这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培养一名医生实在不易，然而医生不看病岂非可惜！以往的模范人物大有人在，如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金茂岳老医生，擅长妇产，转业后分配宁夏自治区当卫生厅长，还要每周去区医院做一次手术（北京孙衍庆也如此，但后来这样的同志就不多了）。他们既是某一专业的高明医生，又都是厅局长，但他们还要不离手术实践，可以肯定地推理，他们领导事业会更有效的前进的。换言之，不这样即会慢慢由内行变外行，就自相否定当领导的资格了。

外科医生更如此不能离开手术台，（当然手术不是外科唯一方式，但是最主要的手段）离开日久失去了熟能生巧的实践机会，不要说有何创新，恐怕笨手笨脚连个结也打不好了，勿须多久，就定会大大落后于一直手术实践的医生的。我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医生脱离临床，外科医生离开手术台，技术生命即已基本中断或停顿，基本上已否定了医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一直忠于自己的这条信念，当随年龄增大，由于健康原因坚持台上手术确有困难时，即立即退出手术台，心甘情愿不当自己信念的叛徒，继续以医疗技术做些力所能及的专业工作，为病人发挥余热，继续为其服务。放下手术刀的同时，就拿起笔来整理撰写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

供年轻人参考。当然“著书立说”，也是专业所需，虽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但做卫生战线上的“老战斗员”只要生命未息，即永远存在“戎医生辉”的新目标。实践证明，地方医院若能融汇军队医院的特点和长处，将会更有出息，发展会更快和更好。

历史需要自己写，我会努力用自己的夕阳余辉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

做一名医生无论他是否从政（医疗行政），只要在医院，就不应脱离临床实践的；离开医疗实践，就不可能再取得新认识，更何谈有新的技术长进！？我认为这是一名军医的也是广义医生的事业心问题。我从不赞成从政医生同志们有的说“因为行政太忙，不得不放弃技术”的论调；相反，我认为，由于从政，责任大了，应以从政的责任为主要，但正是随着更有权了，“红专俱兴”是完全可能的，“红专”俱废或偏废是很可惜的，哪种“行政太忙”的言论往往是从轻视医疗实践的价值而产生的，对己要求不严，势必技术逐渐平庸，做业务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比下级医生高明一点，下级解决不了的问题请示你，你也解决不了，还称得什么领导呢？

做为党员，我们应该永远做正派人、正直人，做群众的表率。

自感理想信念力量虽无形，却无穷，它能催人奋进。我做为普通的白衣战士，只不过是革命力量中的一滴水、一粒粟、一个细胞，充其量是治病的医生（而非治国、治人）但我们的工作汇入祖国、党、人民、中华

民族奋斗的长河之中，无论贡献大小，人生才有了真正的价值。

有人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见《健康报》1985年9月10日“我读贺诚传”一文）。也确有人如此，如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都学过医，而从未从事医病的“下医”，而是从事医国的“上医”。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全面，容易造成红专的皮肉分离，我们实际上立足于“下医”，以精湛的医术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又是医人（工休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医国（从事战争各时期的戎医岂不是医国）的医生？！如果片面说他们谁贵谁贱是不确切的，而它们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而非相互分离的，正如文中颂扬贺诚那样。还有傅连章同志更是具体的医生，又是中、上医——我军首任医院院长、部长、顾问等等。所以是从一滴水、一粒粟意义上说，他们互相≠也=。

## 5、医疗上的快与好问题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其生命只有一次的人，所以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好坏，是极为重要的立场问题，对病人是否认真负责是关系我们的政治态度问题。

我们的每项治疗、每个手术一定要好字当头，以保证医疗质量的高水平，在好的前提下，再加多、快、省就更好了。在过去本来从未有人提起这一问题，但在



1958年“大跃进”中却成了一大问题。当时我在沈阳医院进修学习，我们的某些上级医生片面强调快，结扎血管只让打半了结（一扣）以节省时间，但手术未完线结已经脱落出血；要求兰尾、疝等小手术，术后两天半拆线，加快病房周转率，拆线后因刀口小的确有“好了的”，也有立即刀口崩开，达到可笑的地步，病人也反对我们过早拆线。“信”不住这样的“快”，这种只快不好的“快”有何意义？所以出现如此恶果，是某些同志头脑里犯有“速胜论”，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战术上也藐视敌人则是完全错误的，战术轻视的结果，就是违犯事物的客观规律，事物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左”的错误在医疗上的延伸的，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由于我们是医院，是给病人治病的，而人，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回炉”，所以，医疗质量最为重要。如果将好放在前头，在好的前提下，再考虑多、快、省我想就不是这种恶果了，例如手术，快可给病人带来减少痛苦；省，可以带来经济负担之减轻，有何不好呢！

这种只快不好的流毒，蔓延一些日子，其结果势必手术后遗症较多（如肠粘连），使我们一贯所倡导的在人身上治疗“只准胜利，不准失败”对医务人员有约束力的原则规范受到冲击。这种教训，希望今后不再重演，但我相信重演也必定有更多的人来抵制。

## 6、关于病人挑人治疗的问题

无论军、地医院，都常常遇到病人利用直接、间接的方式提出请某医生给我手术，某人做某项检查（化验、造影等）、某人护理的问题，不少同志认为病人挑选人为其治疗是不正之风，“走后门”，要求过高，甚至说是病人违犯院规，不予允许而招致工休矛盾的事曾发生过。理由是若病人都这样要求，我们将无法应付，影响我们正常秩序和培养技术干部计划等。这有一定道理，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体会解决挑人治疗的问题只能说服病人，不能硬行蛮干，应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考虑解决方法，如向病人解释清楚：“一定请你提出的那位医生上台指导，虽然他不是术者，但我们一定保证你的医疗质量。”这样的方法往往病人可以接受。

但我不认为病人挑人是不正之风、走“后门”，因为我们不是百货公司副食商店，他可利用“后门”得到好的商品，而我们是医院，有时是对病人有所创伤的治疗，要求少受痛苦，多得康复的实惠，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在不怎影响工作秩序的情况下，以尽力满足病人的要求为好；否则，将人心比自己，假若我们是病人，也会有同样心情的。主要：

(1) 做一位不幸身患疾病饱受痛苦的伤病员，他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尽速解除病痛、尽快康复，他想寻觅技术最高责任心最好、工作最细致、操作最轻柔的人为他

治疗，以尽可能减少痛苦，治疗彻底不留后遗症，同时要求心肠最好，服务态度最好的护士（国外有称护士为心肠最好的姑娘，但我军还有一些年轻男护士）来护理他，是他最信得过，最放心的最大幸福。这样的要求并不过火，病人有权获得这种高质量医护，因而是合理的、正当的要求，是病人的权利。

(2) 一个人的真正威信，是群众对他的真正信任，这种信任，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换取，除此，没有任何窍门。而不能用什么威风等来换取，换是换不来的。病人所以指名挑人手术或护理，是由于被挑的人以长期的良好医疗效果、周到服务及辛勤劳动，换来病人的崇高信任，所以这种信任是来自内心的最为珍贵的情感。我们应该表扬奖励、保护这种来之不易赢得病人的信任，不应事实上的压抑和贬低。启发号召人们被信任的人他们的美好医德、医风和医术，扩大我们被病人群众得信过的队伍，这不仅对每个人有益，而且对扩大党的医院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有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今后还会有病人挑人检查诊断、手术、护理的事，这是客观存在，起码自抗战至今是如此，说不定古今中外还都如此，既如此之“顽”，是否成为规律？即是不能强制改变，只可引导，取得最佳效果。

这与受贿、接受礼物等不正之风不能认为是一回事。

我们如前述的方法的结果，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正是先有病人信得过的技术佼佼者，然后才有名医

生、名医院，招引病人慕名而来，本质是信誉问题。你眼前有几个百货商店，谁不到大的有信誉的商店买东西呢？驰名医院也一样，有了名医生，它才驰名。

## 7、关于怎样处理病人“感恩”送礼问题

这是一个棘手而又不能回避常常遇到的问题，战争年代有人，但很少，也未提到议程上考虑，建国后和平时期更为增多，情况往往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视为“觉悟低”、“贿赂”、“走后门”。我曾遇到各种类型的送礼，原则上我们一定要拒收任何形式下的礼物，因为我们是党培育的新型医生，我们的劳动成果完全是为人民服务——具体是为伤病员服务的，是我们份内的事，完全无权接受病人的任何酬劳。所以，遇到送礼，只要讲清“我们之间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我们都是同志，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我们医生就像农民精心种地是他们的职业一样，所以完全不必如此。送礼是低估了我们当医生的政治觉悟，将是让我们犯错误”。只要婉言谢绝坚决拒收，一般是可以使病家接受而顶住的，造成一种拒收的风气，患者中也会相互传递“某某这人很倔，有事尽管找他帮忙，但千万不可送礼，送礼一定碰钉子，一定得挨训！”这样才是正常的医患关系，有利于实行党的正确政策，杜绝“贿赂”甚至“糖弹”式的侵蚀，这是医德所需，也是我们医生最为身心干净与问心无愧的甘甜感情所在。

我转业后在内蒙乌盟医院工作的 20 多年中，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良好的医患都能满意的政治空气，术前和术后为了治疗找我者甚多，但送礼者甚少，甚至没有。认真分析，送礼，不外乎以下几种心理。

(1) 用送礼方式达到找一个所谓技术高、疗效好、心肠好、最负责的医生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例如：

乌盟医院有一胃溃疡患者，术前他们家属送来烟酒，满口奉承，请我亲自给患者作手术。经我和善而词严地讲清道理批评了他的行为，我照样答应去作术者，他的表情极为窘迫尴尬的提起烟酒表示歉意的说“我们觉悟低，请原谅”，术后疗效甚好，患家很满意，避免了低下趣味的东西。

先心病房间隔缺损女患赵玉兰的家长，基本上与同样方式来家求情，我也与上同样处理，患家遗憾地携带礼物而去，但这例手术遇到了不顺利的情况，与阜外医院支启华主任共同在低温麻醉下作心内直视缝合修补术，历时 9 分 15 秒，术后患者不醒，我们急坏了，在手术室看守直至夜间 10 时以后病人才清醒，我们大家松了一口气，家属更不必说早就等在手术室门外焦急万分，见病人清醒并打招呼地被担架车推出去了，大家都转惊为喜。家属又拿两面小锦旗来我办公室说“你的批评我们接受，但这面小锦旗是我们的心意，你必须收下。你要知道，我们不会拿着小旗来贿赂你们的”，我见上写（大意是）“医德高尚，技术高明”分别赠与乌盟和阜外两所医院。我见有送阜外医院的收下了，医患

都满意。

回河北后，曾有史家佐教师食管癌患者霍永文的家人来家送礼，扔下就走，说也不听，我无奈只好全部给他送回病房，病人很不好意思，学校组织也表示歉意和好感。

先心病动脉导管未闭小女孩樊景云之父，术前同样送来礼物并声称没别的意思，我同样解释与拒收，精心治疗，很快痊愈出院，特意来信表示歉意，并说了许多夸奖我们热情洋溢的话。送礼，是贬低我们政治身份甚至人格的低级趣味的恶习，必须坚决反对，并用严词拒绝，送回病房等方式是可达到拒收礼物、顶住不正之风的。

但是对病人挑人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的称为不正之风，送礼是手段，我们要坚决反对，请心上人是目的，不能视为不正之风，故支持或“妥协”。但术前送礼还谈不到感恩问题。

(2) 最难处理的莫过于手术后，痊愈后的送礼往往涉及到感恩问题，我们虽然反复宣传“精心治疗是我们做医生的份内的天职，根本谈不到什么‘恩’，你要感恩就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吧！”病人由于病痛解除，或生命得救家庭未被拆散等情，确实是出于真心实意感谢医生的心情，将认为可感恩的礼物送来，硬拒收，还批评人家“觉悟低”、“不正之风”、“勿来这套（指糖弹袭击）”……之类的语言，可能真的刺伤病人的心，招致不良后果。这类情况很多，略举数例如下：

①内蒙半农半牧区的乌盟后旗一位蒙族牧民，叫丁格，男，年龄50左右，患食管癌，经我们手术治愈后，于严冬的一天送来一些粉条等食品，因为今年正是1962年特大灾年之后，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如前述理由说明情况拒收，他立即大怒：“你们汉人看不起我们蒙人”，气烘烘地拿起就要走，我立即意识到党的民族政策问题，我们多年来蒙汉民族交往中，深知蒙族老乡的憨厚，说一不二民族性格，我答应他先留下，他满意地走了。我当时还无立即想出良策来处理这些一团团的湿粉条，后想到，我们常常教育下级不能受礼，我们怎能忍心在这大灾之年与众不同地享受这些食物呢？后来，我与食堂谈清来路，将粉条交给炊事员赵金瑞让全体职工吃了，我的心里舒畅，同时未影响蒙汉民族关系。

②回河北后，老区北大洋村农民尤占娣，患右肾畸胎瘤，经我科治好，出院时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有一天，接到邮单是她邮来的芝麻、虾皮等农产品，我无法处理，去信说清我们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估价寄钱给她。后来钱早收下了，又隔了一些日子，又专程携带农产品来看望，并且进门就声称我是看你来了，不是看病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又说：“我爹说了，王医生一定是个正派人，你和他说，我们不是贿赂他，也不是巴结他。如果他硬不要，就说我说了，让我认你干爹”，我立即说“这可使不得！”，热情地招待人家，并回赠她一些肉罐头，饼干等食品，这个

姑娘毫不客气地收下装入袋内，临行并说“以后我要常来”。的确如此，时常来往成了朋友。看来给人家钱，回赠礼物也都不解决问题，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的论点也不灵，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但并不能得出老区人民“觉悟低”的结论，难道我们的水平就比老区人民高吗？还难定。

③新乐县南大岳北李家庄农民李进岐同志，有两个女儿（永琴、月琴都患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先后都由我们科手术治疗痊愈了。采用同样方法不解决问题，而且他不断介绍病人来找我看病，经常来往成了朋友，直至老李 1986 年 4 月 5 日因肝硬化去世，还嘱咐他的后代念念不忘所谓恩情和友谊。

④对同村的乡亲更是处理困难，如冯文才嫂张登娣等，非给点什么农产品才满意，根本听不进什么“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这一套。不是这一套不对，而是病人不理采。

总之，还无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所谓感恩问题，但体会到：

送礼毕竟是低级趣味的习俗，所以，要坚决拒收，硬放下就给他送回病房，他本人也无趣就顶住了，更不能与社会上烟酒之风互相利用同流合污，虽得罪一人，但可顶住送礼陋习，造成舆论反击是有效之举。然而，术后感恩送礼较难处理，寄钱（赎买礼品）不是办法，回赠礼品略微有效，但也不能解决根本。我想根本的是使送礼者理解送礼是不必要的，因受礼对象并不喜欢这



一套陋习。你本意可能是敬他，相反你玷污贬低了他的形象，以达医患共识改变这一陋习。

术前送礼请求最信任的人治疗，是其权利，一般可以“满足”或说明情况，但送礼要坚决顶住，可顺便结合其病种宣传卫生保健防病知识，及党的卫生方面政策，收效是较好的。

“随访”是医院的科研制度之一，往往病人感恩医院或医生的关心而表示谢意。必须与病人谈清是我院制度，对谁都一样。请勿误解。

今后还会有，不易绝迹，要分别不同情况坚决拒绝送礼陋习。

## （八）给后人留下未竟的课题

这个题目很大，我的《我对抗战时期我军的科技水平及医疗技术浅谈》一节，是我对往事的回顾，除提示继续前进以外，仅谈谈与军、地医院相关的几个问题：

### 1、继续解决“病人叩门”问题

我们在几十年前就曾常受首长教育，即“白求恩同志曾说过，“病人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查证文献（河北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101 页记载白大夫曾说过“……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意思是

勿等病人叩门，我们应该主动上门解决病人的疾苦。几十年过去了，诚然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我国做了许多工作，比旧社会不知好了多少倍，我军的问题还好些，部队内有卫生机构建制，能做到伤病有人医治，起码每个连队还有一名卫生员来照料。

然而，地方的问题则大得多，虽然每个乡有卫生院，每村有“赤脚医生”，但由于人口比建国前成双倍地增长，技术高明之医生农村有限，“万元户”毕竟是少数，而且由于物价滥涨“万元”也无何了不起，……等因素，人们的生、老、病、死基本上仍听其自然，管不了，有的地方“叩门”也管不了。特别是老区过去对革命最有贡献也最偏僻的农村，缺医少药，治病谈何容易！无急救条件，发生急症死亡率高。例如，只以我原晋察冀三分区的曲阳、唐县一带问题就不小：

还有因嵌顿疝而死亡者（宋家庄、张大月），急腹症急救都存在困难，我村外嫁的姑娘冯四多晚期肛管癌，作个“人工肛”当地也作不了，而让病人往返于城乡之间。

威胁人们健康与生命的慢性乙型肝炎盛行，人们不了解其危害性，不害怕，无人管，也管不了，因肝硬化腹水死亡数人仍无动于衷。文化落后，仍未脱离愚昧，思想不开朗，故还有瘵病发生，如：某女同志，总看到做饭锅里有其公爹，所以，不能进食，体质衰竭消瘦。也有神经官能症发生，张某自以为得了噎食，精神紧张，实际正常。这例是中年人，正在年富力强，是家庭

主要劳力，经在省医院检查，完全否定了他们最害怕的那个病，一旦确诊，立即眉开眼笑症状全消而愈。这是由于人们的惧怕心理，当地不能确诊，确诊也解决不了，故精神因素起作用，自觉症状就很重。男性吸烟恶习十分普遍，明知有害，偏要“自杀”，所以恶性肿瘤病种广泛，后果恶劣，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至于营养结构的调整更谈不到了，人们普遍吃得口重，盐量较多，养猪吃肉更为熬油吃，所以心脑血管病在原来十分贫脊的地方也时有发生，高血压、脑卒中、偏瘫都曾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也时有发生。因为文化水平不可能一下子提高，所以，乡下巫婆仍有活动场所。

由于人口猛长，增大了解决问题的困难性。过去立有功勋的老区病种不少，炎症、结核、创伤、肿瘤、慢性传染病等样样都有，影响老区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固然，那么大的地方，解决起来确非易事，但要努力解决，天长日久，会有成效。

至于我城市对晚期癌瘤、外伤性截瘫等慢性重患，已形成不成文的“普遍不要”的规定不予医治了，好像这些病已不在“医德”之内，得不到临终前的起码安慰，减状和支持治疗。

上述诸多情况，三十年代有之，现在虽有好转，但仍有大量问题存在。但三十年代就有外国友人新西兰耶稣教徒 Miss Katheren·Hall（何明清）女士，能从北平、祁州来到曲阳腹地山村安家落户，为病人服务（参《曲阳党史资料》总 21 期 26—35 页），做了许多好事，

深受当地人民敬仰，直至日本鬼子焚烧她的诊所后被迫离开。我相信我国自己人总也应该能够办到，但遗憾的是，由于城乡条件悬殊还未能彻底办到，原因是，人们不愿离开城市受苦，也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怎办？应想出人们乐于接受的妥善政策与办法，才能较好地办到；否则，“6.26”一下来了许多人，但后来打倒“四人帮”，呼啦一下又都回城市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老区人民“两个我们”的批评意见，的确应该认真地考虑和解决了，否则，再过50年也不一定完全解决了“叩门”问题。而且从报纸上看，已将初级卫生保健在报纸上宣传了；说明要提到日程，这无疑是卓有远见之举。普遍做到我军连队这样的地步也不容易，只要做即使慢点，久之也会有成效。我想：

①我国农村自古就有闲散的中医，走乡串户为病人治病，还有“赤医”，总还能缓解一些看病难的问题，正式医生又无人去，然而正式医生正是解决“叩门”的关键。

②医疗条件差，老区就更谈不到，应把重点放在急症抢救问题上，如分娩难产、大出血，失足摔伤、“三衰”等，应在病危中得到救治，应投资培养或想别的方法培养人才，建立健全充实解决急重难症的医疗机构。

③上帮下，虽不彻底，但总比不帮好，有的城市医院已数年来轮流下乡，人人有责巡回医疗或去条件较差的县医院帮助提高技术，培养人才，也可使具有条件的医院技术腾飞，不是一点不可能的。

④解决文化落后愚昧，非一日之功，也可能是几代人的事，基本上要从教育入手，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开阔人们精神世界与文化，从根本上解除愚昧，增加卫生知识、卫生组织、预防医学的投资，卫生人员（如家庭护士、医生）到各家各户是远期目标，但只要办就比不办好。

总而言之，“病人叩门”仍在“叩”，应坚定地加以解决，首先应该重点解决老区问题。

## 2、使创伤愈合功能达到得心应手的问题

无论军、地医院外科各专业都希望创伤（包括战伤即火器伤）能早日愈合，而不留下瘢痕疙瘩，不形成（关节）挛缩而残废甚至恶变成癌；外科医生们总希望手术创伤（切口及手术部位）早愈而又不遗留肠粘连之类的后遗症；心外医生以风心病二尖瓣狭窄而言，希望手术切口愈合而又能避免二尖瓣再狭窄，此类的一左一右、一粘一开、一聚一消地各种治疗目的，势必涉及到我临床各学科的各个方面，相信今后医学的发展必将为这些新领域肯定是伤病员的福音。

过去已做过不少工作，但还未圆满达到目的，其根本问题是以粘多糖为主要来源的结缔组织在起重要作用。经过各专业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果，尤其从祖国医学对消除粘连、瘢痕疙瘩（蟹足肿）想过许多办法，取得好的成果，如消痔灵、消积排通汤、少腹逐瘀汤已见

表彰，还有松解汤、活血化瘀等西医的胎盘组织液、冷藏羊膜用于烧伤创面、胸腹腔里置入 G·S 等法。依我看来，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都还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得心应手之需，使它随医生的意志为转移地发挥作用。

### 3、战伤各级救治机构完善其约束机制，提高其素质问题

从战场到团绑扎所——兵站——兵站医院——后方医院，过去做过许多改进。尤其进入解放战争之后，进展较显著，使伤员生命得到进一步的保障。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不同，战斗性质、武器对人体的组织破坏、运输条件的不同，必有许多改革，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例如：兵站医疗组还要否？设几个梯队的层次才能到达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各个层次所应承担的具体医疗任务是什么（哪级站作何手术及处理）？

过去的伤票制度：红票 = 出血、白票 = 休克危重，起过相当积极作用。规定了多长时间须松开止血带后再扎紧，如此保留了伤员的肢体，减少了像我们在 1939 年学习见到的那种因未放松止血带使伤肢（上肢）坏死而截肢的惨痛教训。但由于在战时，有时不允许（如迂回战中）按部就班地工作。对白票，尤其对失血性休克，当时还不会输血补液，还不能有效地解决血容量的问题，所以，即使派专人护送也不解决问题，伤员还是牺牲了的事有之。归根结底，是救护人员的知识与素质

问题，如遇到出血不止的伤员，不仅会上止血带压迫止血，又会手术切开近心端的动脉暂时性（阻断）或永久性结扎止血，才能最有效地抢救战友的生命。现在好了，我们已掌握了补充血容量的技术，相信会比以往少死很多人的。

本人认为只有某种规定，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还是不行。抗日战争期间的反“扫荡”中，由于没有“相对”固定的前后方，伤员反而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后方医院接受合理医疗，比有伤票还及时。毫无疑问，时间就是生命，能将伤员在战场合理包扎，以尽快速度得到合理救治，是减少死亡的关键。但战争这个怪物，常常使人们处于动荡和环境变化之中，因而使合理的要求如“手术者对手术负责到底”的手术制度及约束机制得不到贯彻。所以，过去的兵站医院是救人生命的关键的一环。

总之，本人认为只要有前后方，就实际有兵站工作，无论设不设兵站。应尽量减少救治层次，尽快到达兵站医院或后方医院接受合理治疗。

另外，对以往所称新的“三大仇敌”，即破伤风、气性坏疽、败血脓毒症，虽在抗菌素时代，已基本可得到救治（如破伤风），仍因其战场不可能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故仍然威胁伤员生命等等。究其根本，还是个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及素质提高的问题，才会主动地、合理的救治，减少死亡残废率，提高治愈率。

#### 4、对前人传下来的知识应予甄别的问题

对待这个问题，必须经过科学研究加以验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①班蝥鸡蛋治疗破伤风，已证明其无效照样死人，不要再以讹传讹误人生命下去；

②原伯华制药厂出产的溃疡膏，治疗下腿溃疡，连营养低下条件下，治疗实践证明它是珍品，据说它含轻粉、松香、梅片等，柿黄色、味香、粘度大、局部贴敷，由外向内新生上皮。可见它与目前显微外科之带血管的皮瓣移植的效果相媲美，但其成份至今未查清，也无进一步的研究报导。

原冀西曲阳、唐县、阜平一带秋季盛产黑枣，吃了不熟的黑枣，有使其喝酸菜汤解之等说法和作法。到底为何带有硝酸胺的酸菜汤，能将胃梗阻的“团”分解或溶解？1943年秋反“扫荡”中刘国权因太饥饿吃了黑枣后成胃梗阻，活活痛死的残痛教训应吸取之。

(3) 陈酒、陈醋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为何好？

(4) 蒙古牧民素喜质粗的砖茶，为何不喜绿茶和花茶的嗜好，不能仅停顿于砖茶可帮助消化奶食的低水平上，应搞清砖茶奥秘的生命力。

(5) 神仙山人将扇子草（射干）捣碎成泥与米粥混合可杀苍蝇，它到底是麻痹苍蝇致死还是其他中毒致死？等等……



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尚未见清晰的结论，而且有的疑点，按现代科技条件与水平并不难澄清，无疑涉及到许多学科，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不能一代代停于想当然的水平上，应深入研究挖掘它们，为我人类健康服务。

### (九) 回首与盼望

我《戎医生涯》已初稿成文，谨以我不像样的两首小诗，作为我对全部叙述的结束语吧：

少小从戎八路军，  
父母生身党育心。  
黄牛奋蹄五八载，  
戎医生辉贯终身。

往事坎坷无虚度，  
革命火炬燃至今。  
吾今留《言》递接力，  
喜盼后人胜前人。

1995.6.6 于石家庄

## 编后遐思记

我的拙作，能在这伟大的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庆典声中问世，是我本人的一大快事，因可了却我人生的一大夙愿。也是对培养我们这代人至今尚健在的老前辈们一次汇报性的举动。

在筹措本书出版过程中，联系到了几十年未曾会过面通过信的老师、长征老前辈尹明亮将军，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这为今后必要时继续请教老师成为可能。

一个人一生能遇到几次世纪之交的盛大庆典?! 由于责任感的驱使，以此为契机，我做为业余爱好已创作书画新作 24 幅，积极参加各级书画展览。我身边尚存几件战争中的实物，若有必要，也可作一小展，以飨年轻同志目睹为快，尽到我做为战争幸存者应尽的传帮义务。今年三月底，我应中国中央电视台黄志刚主任记者之邀，参与他执导的大型历史系列纪录片《胜利》见证人之一的拍摄活动，自感也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然而，出版这本书是我最大的愿望，因是我要献给“两个”战争胜利 50 周年及为精神文明做贡献的一份厚礼，现已梦圆成真，心情十分激动。

本书能获得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与我年龄悬殊同志们的鼓舞和帮助。他们是：

王平、孙毅、尹明亮、钱信忠将军等老前辈们，为我的拙作题了词，虽深感评语过高，但我要向老前辈、老首长们提出的方向努力去做；

战争中广大农民“支前”担架队员和伤病员战友们对本书的伟大历史贡献；

内蒙古乌盟医院巡回医疗队全体同志及达茂农牧区的患者同志们，对本书回顾性研究做出的贡献；

我书第一读者、老战友幸福祥同志及胞妹素芬，他们阅读我初稿认真，审稿严格、供史翔实、批评直率，提出肯定与否定意见。尤其后期，妹妹全家可谓全力以赴地使本书问世期限缩短；

原晋冀鲁豫的老同志们，他们是长征老前辈尹丁凡院长和夫人张治华主任医师，及“北后党史办”副总编纪德桂同志的道义同情和纪四处奔波为我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与心血；

许多亲朋好友帮我提供史料等做出不同贡献。如：二姨王荣仙、舅舅庞占双，尤其老党员陈素平妹的惊人记忆令人敬佩。以及战友刘凤山、史正明、齐清海等同志，老房东的后裔葛欣侄女，陪我们重登白花山重访、考察核实史实；

著名书法家赵士恒老师为我书写书名、篇名；

党刊编辑蔡峰峰同志曾主动帮我奔波寻找出版的单位，儿童文学小作家金育青同志一字不漏地帮我审稿修稿，我弟永寿医师偕冶金理化师孙爱新、景利明及我院聂纪池副主任技师等同志，均帮我处理过照片资料。

军科院军事科学出版社张健主编、张晶特约编辑，以及陆军参谋学院科研所张似松大校及印刷厂车间主任方恒俊等同志均给予了竭力支持，才使本书问世成为可能。

如此等等，不能一一列出。对所有有助于出版我书的单位和个人，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当时河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立昌同志，他在我出书愿望将破灭的关键时刻，极其敏锐的发现、赞同与支持，而且雷厉风行地帮我组织赞助，才使我已经冰凉的心，得以复苏实现夙愿。

当小方主任将大量毛校样放置在我案头之际，当然最艰巨的工程就是初校、二、三校了，我的心情十分焦躁，幸有女儿宁娟，在她过去文学编辑的基础上，主动地帮我日以继夜校对修稿，我的后裔同时也得到了我辈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熏陶和锻炼，可谓一举两得，我何乐而不为？！

另需说明：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很少，后来照片大多是建党70周年我们重访考察的“老区行”中所摄，以及历史实物照片，但也相得益彰。

因成文先后时间不等，有的章节保留了完稿时日，以便于读者了解分析当时情况。

我做为战争的幸存者与见证人，深知日寇之无比残忍，今天的幸福来之真是不易，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她。时至日本帝国主义

战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国的右派官僚们毫无思过之意，仍然美化抵赖侵略罪行，在 1972 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长久友好的根本愿望出发，一切向前看，表现了最博大的胸怀，不予追讨经济赔偿，然而这对毫无人性的日寇来说，不但未引出其恻隐改悔，反而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日本鬼子的魔影，时常公开地或幽灵般的出现和作祟，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我们素知善恶与敌友，我们历来将日本人民与日寇严格地区分开来，那就只能是：“对待朋友斟好酒；对待豺狼用猎枪”来分别对待了。

正当我十分忙碌的校稿期间，突接老首长、长征老前辈朱明辉同志去世的噩耗，十分悲痛，他那样强壮的身体，竟然于今年 4 月 15 日谢世而去。朱老生前十分关怀我拙作的出版，万无料到朱老未及过目已与世长辞。我将此书的出版，以慰英灵于泉下。

本来本书拟分前后二部分即“曙光”、“生辉”二篇，现虽然后部分内容已被压缩，但与书的顺序、结构并无矛盾，故仍保留了篇名。

前述的同志们尤其年轻人，何以能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对我拙作伸出援助之手？我认为他们才是思想境界高尚、真正饮水思源的人，是老同志们的知心朋友。我们为有这样的后来人感到欣慰和自豪，尤其继往开来近至雄伟蓝图 21 世纪壮丽的革命事业，何愁不更加光辉灿烂！我做为一名普通党员、八路军一小兵、河北省教

育下一代委员会成员之一，我衷心地盼望年轻人后来者  
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未来属于年轻的同志们！

王增寿 1995.7.1 于石家庄

附件 1:

## 《内蒙古农村、牧区影响手术创伤愈合的因素——对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附 238 例手术的调查报告》

### 一、前言、调查方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敬爱的周总理在 1967、12、10 接见卫生系统代表时说过：“……农村照样动手术，我看那里边细菌要少一些，我们在农村打了二十九年仗，身体很好”。

我们过去在抗日、解放战争年代的实践，以及近至 1966、2——8 月在农村牧区巡回医疗及 1970、9、7 后在大滩野战医院期间，都是在农村民房、庙宇、厦子、戏台、山洞、办公室内作手术，我们都完成了大量医疗任务，使广大伤病员重返战斗和生产岗位。

今年我乌盟医院医疗队，半年来在达茂旗大苏吉周围的六个公社（大苏吉、石宝、西营盘、小文公、坤兑滩、乌兰图格），将以往战争年代，简易手术室的工作方法加以发扬和运用，采用孵卵箱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度试验方法，对己（术者们）、对人（病人）、对物（敷料）、对环境（空气）等进行了全面调查，为白求恩大夫流动医疗队以后，首次大规模、全面而深刻地付予科学剖析的结论。半年来共为农牧民 396 人进行大小手术 415 次，达到 I/甲 94.68%，II/甲 5.32% 愈合，为更准确的分析研究，仅将外、妇、五官科 238 例作为肉眼可见的分析 I/甲 91.2%

Ⅱ/甲 8.36% (Ⅱ/甲以往称之为化脓率, 实际又和战争时者不完全相同, 而只要拆线后稍有哆开趋势或切口液化者均算Ⅱ/甲, 所以实际比临床鉴定条件要严)。

简易手术室, 是指室内挂帐棚, 幕帐, 手术间与洗手间用一布幕隔开即谓之。洗手用带龙头的水桶、无菌冷开水刷牙 5 分, 1/300 来苏尔水浸泡过肘 5 分, 着手术衣帽口罩, 敷料用蒸筒 15 磅压力 20 分钟, 病人皮肤用 FeLbulenger 氏法 (碘酒、酒精涂布消毒), 照明用汽灯、手电筒, 煤火炉取暖, 就地取材, 以桌当手术台, 窗缝糊严, 地铺苇席洒来苏水等。

达茂旗地处祖国北疆边陲, 气候二、三月还很冷, 干燥而终年多风, 最大 7—9 级以上。

细菌培养以琼脂为培养基及对若干种抗菌素进行敏感试验。视各菌种的生长与菌株分布量多少, 作为洁净度的标准。

我们对手术间、洗手间、病房 (一般民房) 和城市 (集宁我院) 的相同功能房间用相同方法与条件进行调查, 以资城乡比较。

## 二、资料与分析讨论

1、洁净度就是脏不脏: 根据我们的材料, 见表 I、II

城市空气要比农村脏得多, 即 1.65: 1, 乡下除大肠杆菌外, 均为非致病菌

城市手术室要比乡下干净 (1: 4) 但随着不断消毒 (来苏尔水泼地, 使席子保持湿润及 1% 的酚喷雾等), 可使城乡洁净度接近, 而且乡下手术室越用 (不断消毒) 越净而不是越脏。(我院手术室最低菌株 1 最高 6 个; 大苏吉卫生院手术室最低 4, 最高 33), 在严密地消毒与遵循无菌原则下, 乡下同样已可使髓内穿针固定术严要求的骨科手术获得 I/甲, 所以乡下同样可作大手术, 因为空气洁净度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非全部问题的关



静(所有)

表: 城乡菌种, 菌株比较:

项目	菌种			手术室			洗手及衣室			一般环境			
	城市	农村	城乡之比	城市	农村	城乡之比	城市	农村	城乡之比	城市	农村	城乡之比	
平均	67%	43%	1.5:1	5	18	1:3.6	110	5	22	1:4.9	77	43	1.8:1
菌株	枯草杆菌	枯草杆菌	○	卡	枯草杆菌	○	枯草杆菌	枯草杆菌	○	枯草杆菌	枯草杆菌	○	枯草杆菌
最高量	20-104			1-6	4-33		309		11-14				166
次数	均等的	工作室			11次		309		洗手				洗手
备注	枯草杆菌, 大肠杆菌, 卡那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致病菌 霉菌, 链球菌, 肺炎球菌, 四联球菌												

表II. 在以下几种空气消毒法效果之比较:

以下几种

表II. 空气消毒效果之比较

项目	消毒前	消毒后	二者之比	备注
300米 尔油地	31	33	100:109+	洗手室 臭气重, 风刺菌多, 未作消毒, (何来) 药剂未作, 浓度低故。
	呈菌苔	33 溶血	大: + (X)	手术室 消毒后10时, 即作消毒。
硫磺	31	12	300:4=100	洗手室 再+时, 臭气, 消毒后风天菌数为21个。
	呈菌苔	4	大: 1	手术室 杀菌力强, 产生酸味, 且对菌有杀灭, 这作作了硫磺熏蒸, 杀菌力强。
酒精喷雾	164	118	169:100	手术室 酒精喷雾, 酒精可作细菌立即死亡, 所以消毒效果良好。

从表来看, ① 消毒效果并不一样。

键。

我们查阅了《公共卫生学》，这本书有水、土壤的洁净度而无空气的资料，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白。

## 2、消毒效果大不一样

多种消毒法之对比：硫磺法最好，但味道难闻是一缺点，（在 41.8m<sup>3</sup> 的房间内实用 67gm，闭门 9 时 30 分，可收到与 Lesoll<sub>12</sub> 与 33 之差和手术室内 4 与 33 之比）可用于慢性择期性手术准备之用。

酚法次之，效果也好；立即可收到菌落 164 与 118 个之比，适于急症手术准备。

来苏尔法最差，消毒前后无大差异，原因可能对空气弥散最差，故不理想。但可作为地面消毒。

手术室与洗手间仅有一层布帐之隔，而且上下通风，还放有牛粪水缸等物，就这样环境，菌落竟有 31 与 12、164 与 118 之比差，可见白布帐对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是肯定的，说明战争时期的白布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农村、牧区乡下的手术室虽不如城市洁净，但因不断消毒，手术者们遵守无菌操作的严谨的素质，所以越用越净，而不是越‘脏’，所以不必担心创口不愈合。

我们下车伊始七手八脚整理的手术室，要较事先整好的要脏，为 164 与 31 之比，但用喷雾法（捕蝇小喷雾器）后，立即可收到减少菌落 7:1% 的效果。农村、牧区的细菌对各抗菌素的敏感度要比城市敏感，见表 III、IV。

乡下的各菌种，包括对病人很有威胁的金黄色葡萄状球菌的药物敏感度要比城市高，这可能由于城乡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有关，即城市人患病，可用到各种抗菌素，而农村尤其牧区患病用药的条件要差一些，所以，乡下人的耐药性要比城市小，一旦用药疗效较佳，甚至城市已基本废弃的磺胺药，在农牧区也对金葡

萄球菌及  $\alpha$ -链球菌也有较好的疗效。

3、无论城乡（集宁与达茂）各型结核是常见病，然而半年来培养均为（-），有的标本孵化时间很久也未生长。客观事实说明达茂并非无结核菌，而是我们的方法不符合它生长的规律，或无采集到带菌标本，所以，呈假阴性。我们找到的几个菌种，仅是城乡空气中的部份或非全部菌种。有待我们将其规律进一步澄清，使之服务于人民健康。

4、严格的无菌观念和素质，是保证手术成败的最重要关键

所有参加手术的人员，必须对患者有强烈的责任感，严谨的科学作风，遇事一丝不苟，按无菌操作工作，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天职。

对己的关键在于手：

对参加手术者们的洗手 5—10' 浸泡 5' 已足可达无菌，而且体验到淡乳白色的来苏尔水，恰等于 1/300，不但操作简便肉眼可以定浓度，比药物书上的浓度要小许多，且节约又不刺激皮肤；不受药液温度高低的影响（例如升汞只能在高于体温才有杀菌能力，长期泡手可使指甲变为乌黑和舟状），用过的药液还可泡脏单和洒在地席上，保持潮湿而达杀菌作用；路上携带非易染品，非剧毒都较安全和放心。

对人的消毒在于皮：

对患者的消毒，主要在手术野内的皮肤，认真 Trjod 酒精消毒，这个 Felbelinger 氏法和前述的来苏尔水泡手一样，都已经过长达 40 多年的实践考验，是靠得住的皮肤消毒法，虽然理论上存在毛囊的细菌有杀不死的问题。

从表 IV 看可知，我们在乡下所作手术的病种和手术种类是不不少的，几乎与城市一样可作大手术，（这次除心外手术没有作外，而后来在 1975. 8. 随阜外小分队在西苏旗同样作了常温麻醉闭

表四. 城乡细菌对号抗生素敏感程度比较

菌株	对各种抗生素敏感程度											备注			
	土	链	青	多	链	ST	合	金	红	素	新				
枯草杆菌	城	+	+	-	-	-	+	+	+	+	+	+	+	+	链霉素-敏感, 四环素-敏感 包括克雷伯氏杆菌
	乡	+	+	-	(+)	-	+	+	(+)	(+)	(+)	-	(+)		
四联球菌	城	-	+	-	-	-	+	+	+	+					- 链霉素
	乡	(+)	+	-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城	+	+	+	-	-	+	+	+	+					- 链霉素
	乡	(+)	(+)	(+)	(+)	(+)	(+)	(+)	(+)	(+)	(+)	(+)	(+)	(+)	
白色葡萄球菌	城	-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乡	(+)	(+)	(+)	(+)	(+)	(+)	(+)	(+)	(+)	(+)	(+)	(+)	(+)	
大肠杆菌	城	-	+	-	-	-	-	+	+	+				+	其中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乡	(+)	(+)	-	(+)	-	-	(+)	+	(+)	(+)	-	(+)		
枯草杆菌	城	+	+	-	-	+	+	-	-	+				-	
	乡														
大肠杆菌	城	+	+	-	+	-	+	+	+	+				+	
	乡														
金黄色葡萄球菌	城	-	-	-	-	+	+	-	-	+				+	pol- 链霉素
	乡	(+)	(+)	(+)	(+)	(+)	(+)	(+)	(+)	(+)	(+)	(+)	(+)	(+)	

表五. 城乡葡萄球菌抗生素敏感试验比较表

菌株	对各种抗生素敏感程度											备注			
	土	链	青	多	链	ST	合	金	红	素	新				
1963年资料	+	+	+	-	+	+	+	+	+	+	+	+	+	+	1963年资料
1966年资料	(+)	(+)	(+)	(+)	(+)	(+)	(+)	(+)	(+)	(+)	(+)	(+)	(+)	(+)	1966年资料
白-	(+)	(+)	(+)	(+)	(+)	(+)	(+)	(+)	(+)	(+)	(+)	(+)	(+)	(+)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

① 红加克雷伯氏杆菌之一特点, 可能与某些因素(如风大, 草原)有关, 城市则少见; 而城市除多种链球菌外, 也有真菌(霉菌)存在, 且培养以后大量生长。

式二尖瓣扩张术，效果同样理想)。

当然不可否认的由于输血、麻醉及各科人员配备总比城市不方便，因而对大的手术种类不可不慎也是事实。

我们资料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1) 手术创口的愈合与患者性别，年龄无明显关系，并不因年龄增长而愈合低下，换言之不受男女及老幼的影响。但愈合却受营养状态的影响，因1966年达茂旗地区是重灾区，蛋白、脂肪、尤其蔬菜吃不到，是直接影响患者的体质和组织修复能力的。石宝公社灾情略轻，体质稍佳，还如武川县二份子村病人智桃花，43岁，起初妇科误诊为卵巢囊肿，切开探查盆腔内没有蒂，方知是巨大胆囊白化、结石，切口向上延长几至剑突，全腹上下的大切口，亦获得一期愈合。

(2) 手术创伤愈合与民族(人种)无关，愈合与否不受人种血统的影响，所以，在乡下无论是何民族，均可放心的手术治疗。(但据我们另一材料——《纯牧区20例蒙古族兰尾炎分析》一文可见到补蒙古族人民的兰尾较汉族长，且盆位者居多。前者可能与血统有关，盆位多可能与其骑马骑驼的生活、生产习惯有关。推理凡因体位而颠簸者如骑兵，兰尾可能致成盆位。但已往无注意统计。)

(3) 手术创口愈合与创腔、创野里放不放青、链霉素粉都无关。因而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放弃创口内用抗菌素的措施。但我们主张大的手术、无菌要求更加严格的骨科手术，还是局部用点有益无害、有备无患。

(4) 手术创口与麻醉的关系：局麻数量大，且一期愈合率达88.6%，是与过去战时手术结果相吻合的，另一多用局麻的原因是术后管理较易，较少发生并发症且节省护理人员，否则医疗队人员均在极少的极限，一旦某一环节受挫，即会影响次日的正

常手术与医疗。局麻药多是我院制剂室配制的1% Procain 溶液，包装100——200毫升，用起来较方便，浓度多在1%，有时稀释0.5%甚至更稀，如作腹膜封闭时。

腰麻基本都一期愈合，是符合情理的，因局部无增大感染的问题。但数量少，无统计学意义。

对我军“机动灵活性”回顾重复性研究——

对于棚式简易手术室的准备可繁可简，繁至彻底清扫屋顶墙角墙壁，糊窗缝糊窗户然后挂顶棚及竖帐以隔开为手术洗手二间。然而简可简至室内器物不要大动，以免尘土飞扬。这一次虽无如此实践，在以往的战争年代尤其解放战争时期是这样做过的。但在三月四日巡回石宝公社时，则可进一步说明之：我们正要由大苏吉去石宝公社巡回之前，却从石宝公社来了一位颈部淋巴结核的小姑娘荆英兰，将她带在车上打算按战时急症考证一下时间和效果。我们去石宝后下午2时20分开始七手八脚整理手术室，扫地，糊窗缝、钉布帐，3时15分洗手完毕，室内1%酚喷雾消毒采空气标本送培，3时19分皮肤消毒局麻，3时28分切皮手术，即从整理房舍至手术开始，共用68分钟。

到西营盘公社巡回医疗，因正有一名12岁嵌顿疝肠坏死的急症患儿段海深，由于提前通知将手术室备好，我们5月18日上午11时20分到达，随即看病人，与家属交底后，移入手术室，11时30分洗手，11时53分皮肤消毒，12AM已切皮了（作肠切除肠吻合，疝巴西尼氏法修补）。即是自到达目的地，摆开箱子至手术开始，仅用去40分钟。

以上二例均一期愈合，所以，机动灵活性的核心=快。

乡下均非什么正式手术室，大都是用公社的有炕的一般办公室，均收到理想效果，扩大了党的医院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称颂，从而使巡回医疗更加顺利地展开手术。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意识地重复我们过去战时的经

表下 农村牧区对己、对物、对人传染病的细菌培养基及敏感度的登记(原由)

取材料环境	日期	培养基	接种	菌落	敏感	备注
王增青	1966-2-27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自连元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王自连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香五环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肉连元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加玉增青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汪香忠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使恩芝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教料	2-27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州柳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右斜	"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傅巧玲	3-2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张白莲	3-2	琼脂斜面	接种	金黄色链球菌	敏感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初起未接种, 培养后在斜面上即可观察到菌落, 培养基, 在斜面上生长





表四. 性别、年龄与手术种类对伤口愈合的影响

性别	1-10岁		11-20岁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70岁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	2		3	15	1	3	1	3	11	1	1	1	1	108	41.18%	
女			4	23	1	3	3	2	16	1	1	1	1	120	53.82%	
小计	2		7	37	2	6	4	5	27	1	2	1	1	228		
合计	2		11	5.25%	4	1.75%	8	3.5%	33	13.6%	4	1.75%	2	0.88%	5	100%

其中男患者总数共有18人(100%)未做一期缝合 = 28例手术及4人(22.2%)一期缝合  
 女患者总数共有44人(58.3%)可一期缝合

表四. 民族与手术种类与伤口愈合的影响

民族	汉		回		蒙		维		其他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汉	107	15	14	11	219	92.22%					
蒙	6	2			8	3.36%					
回	1	0.42%			1	0.42%					
维	17	14	11	238							
其他	23	7.15%	14	4.42%							
合计	154	100%	238	100%							

手术总例数238人中无维吾尔族(0%) = 总数为238.9%  
 有" (24%) = " 10.1%

表II 麻醉与性别对各病种伤口愈合之影响

术项	性别	麻 醉 种 类							合 计	
		局部麻醉	镇痛	乙醚+液全麻	局麻+镇痛	局麻+镇痛+液全麻	局麻+镇痛+液全麻+镇痛	局麻+镇痛+液全麻+镇痛+液全麻	数	%
无 菌 手 术	男	%	72	12	4	2			90	37.52%
		%	9	1					10	4.2%
	%	2	1	1				4	1.65%	
	%									
有 菌 手 术	女	%	102	3			1		106	45%
		%	4		3	1		1	8	3.36%
	%	3						1	0.42%	
	%	3						3	1.26%	
小 计	男	%								
		%								
	%	2	1					3	1.26%	
	%	2						2	0.84%	
女	%									
	%	4					1	5	2.1%	
		%	3					3	1.26%	
小计		数	206	18	8	3	1	1	2	238
		%	85.56%	7.56%	3.36%	1.26%	0.42%	0.42%	0.84%	100%

我们说的平均与现重意义不同，实际之除确为局部麻醉者外，多数之切口液全麻向这，就之者拆线时不有吸开之势，如第一例之切口缝合及补缝时缝线快一吸，稍用石膏垫保护即给愈合，合统计为平均。

验，取得了真实的数据，给我军棚式简易手术室的优良传统找到科学的答案。当时我们称之为机动灵活性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这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地颠倒黑白的攻击，但毕竟在还未结束‘文革’运动的1974年1月18日的科技年会上，受到军、地医院同行们的热烈好评，而恢复了它应有的光彩。因该文不是哪个人能完成的，而是当地党政及人民群众支援尤其我队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的结晶，是我军的而非其他什么人的优良传统的光辉所在。

对物消毒：敷料用15磅压力20分钟已足，洋式的手提式蒸气消毒器代替了战时足达4小时的木桶蒸汽消毒。

### 结语和跋

1、棚式‘简易’手术室传统，是白求恩流动医疗队的延伸，简易二字是我们相对地加给这一事物之冠，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的简单。在战争期间认为有布棚的手术室设备已是很高级的了，但与近代化、正规化的城市手术室相比，毕竟要简陋许多。

我军的任何传统，都离不开群众支持，才能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去完成医疗任务，保证战争进行直至胜利，所以，它有资格在我军军史、战伤医疗史上占有位置，从而构成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突出的不是为了技术，而是在技术工作上实行正确路线，并为其找到了科学根据。

这种精神和传统，是我军的闪闪发光的胜利源泉，是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体现。

地方医院学习掌握其精髓后，同样可得心应手取得成果。机动灵活高节奏，无论军、地医院都需要。民族虚无主义者一味崇洋永远学不到手的。

2、我们在半农半牧区的达茂旗大苏吉等六个公社的手术实践，用近代客观科学的细菌培养与药敏手段，重复战时的棚式手

术室，通过严谨地回顾性研究，获得了科学结论。

我们为材料准确无误，仅以 415 次手术中的肉眼可做明确判断的 238 例的手术切口为据，进行了严谨的调查和分析判断。238 例中有 214 例无菌手术（= 总例数的 89.9%）I/甲 196 人 = 214 人的 91.6%，II/甲 18 人 = 214 人的 8.4%。然而对这一定义与近代概念有所不同的是，判定标准较严，即凡拆线时有哆开趋势或稍露创面，或液化的均判为 II 级愈合，即或这样与我本人在解放战争中创伤化脓率 15% 相比较，还降低 6.64%，= 提高一期愈合率 6.64%，这个成绩是我们全队主观能动性包括病人的积极配合所取得的。我们能在 40 分钟内进行紧张的手术战斗。

238 例中有：有菌手术 24 例（10%）I/乙 14 人 = 24 例的 60% 弱可以获得一期愈合，一是病人自行痊愈；一是与我们医务人员消除其感染灶不无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手术治疗，是一个综合性整体医疗工程，要发挥我们各项工作的主观能动性，给手术创口愈合创造有利条件，提高一期愈合率。已被我们的材料所证实。我们忠实地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员服务，是我医务人员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线不应成为被攻击的口实；相反，医务人员不尽职尽责，有悖于手术创伤愈合，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批判的。但在文革“左”的形势下是不允申辩的，否则将会受到更惨的折磨。但我对广大群众善意的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并不反感而欢迎的。

3、消毒对己、对人、对物的三环节，无疑是我们这一传统的重要核心，对己消毒在于手，对人消毒在于皮（肤），而且我们填补了《公共卫生学》空气中细菌材料中的空白。Feibulinger 氏消毒经得起历史时间的考验，目前仍无更优的方法替代它。经 51 年的手术医疗的实践（起码包括我们的 238 例的实践）证实是正确的。

乡下空气洁净度比城市高，致病菌少。而且手术室随着不断消毒而日趋洁净，所以不必担心手术创口不愈合的问题。由于我们能动地综合性工作措施，已证明：无论男女老幼民族血统的大手术（参表V），均可泰然而认真地去作，争取一期愈合是可能的。

4、结语：我军卫生工作传统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科学的。

1968、1、31、春节上午9时至下午2时47分初稿成文于内蒙集宁

注：本文因在‘文革’历史背景下成文，故仍保留有一般科技论文所没有的政治术语，为历史的真实，不再改动。

此次医疗队的组成：王增寿（队长）、李满粟（指导员）、李婉兰、乔玉环、哈森其其格、毕焕章、乌力吉、张恩芝、叶乃荣、阎连元、刘彩茹、谢玉凤、黄静娴等13人。

参考材料：

①《巡回医疗在内蒙古》 1966. 2—8。

②【公共卫生学】

③纯牧区20例蒙古族兰尾炎的分析 1966

④【细菌学】余贺著 1957年版

⑤周总理、李先念付总理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讲话 1967、12、10

⑥10日来46例磺胺乳试验观察结果 1950年《绥远卫生》创刊(?)号。

附本末②

# 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 (片斷)

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遺著



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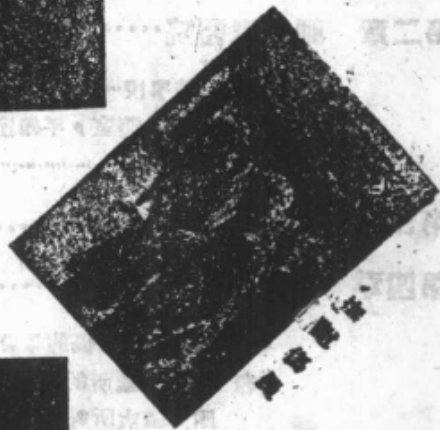
1940



白求恩同志像



戰地初景



檢驗病號



檢驗出院病號



戰地初景



模範病院開幕

# 目 錄

## 總序

## 自序

### 第一章 師衛生工作的組織..... 3—5

### 第二章 師野戰醫院..... 6—25

    預備訓練學校..... 7—8

    外科室(換藥室,手術室,可藥房,消毒小組)..... 8—18

    病院..... 18—25

### 第三章 旅團營衛生工作..... 27—30

### 第四章 換藥及外科手術..... 30—74

    ① 在火線上受傷的救急工作..... 30—31

    ② 團營結核所的組織及設備..... 31—35

        團營結核所對傷口的處理..... 32—33

        團營結核所對骨折的處理..... 33

        托瑪那夾板的說明及使用法..... 33—34

        毒瓦斯傷的治療..... 34

        枕破傷風血清..... 34

    ③ 旅收容所對傷口的處理..... 35

    ④ 師野戰醫院的設備..... 35

    ⑤ 師野戰醫院手術室對傷口的治療..... 35—61

        1 摘創術..... 37—38

        2 外物之採取..... 38—39

        3 開腹術及腸縫合術..... 39—43

        4 胸腔之縫合..... 41

        5 負傷部位之治療..... 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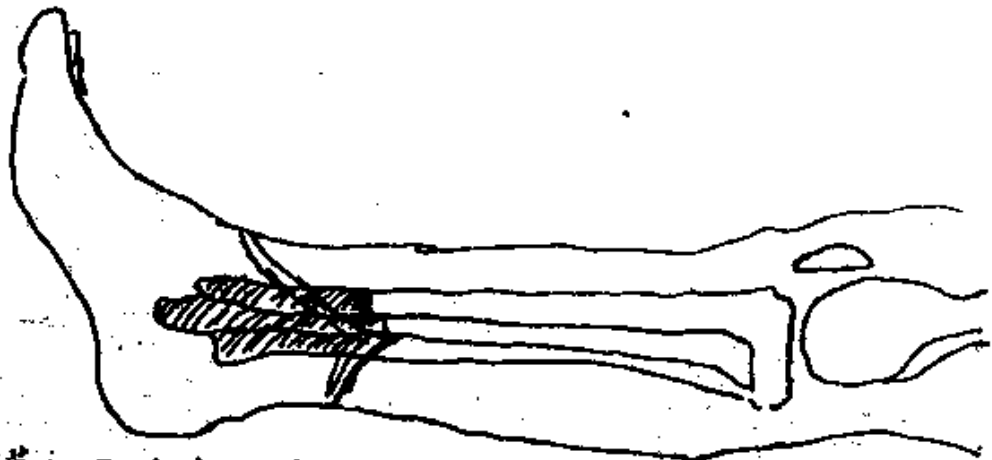
        6 關節之縫合..... 42

        7 關節之縫合.....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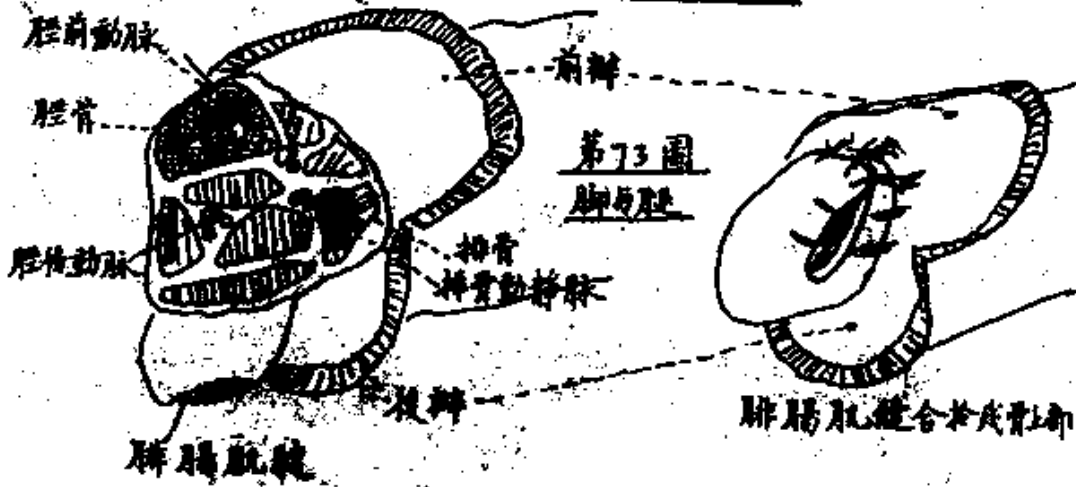
        8 股骨骨折之切開術及夾板牽引使用法..... 43—49

        9 股骨骨折之治療原則..... 4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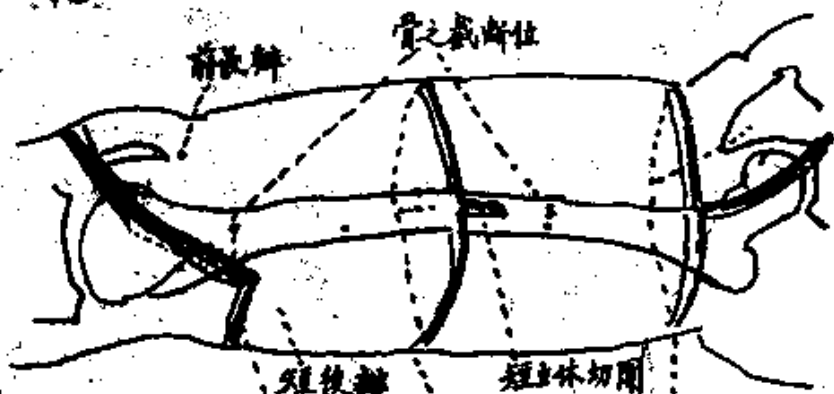




第72圖 自脚部至膝分三段第二段下端截断術  
用前長瓣及後短瓣肌肉切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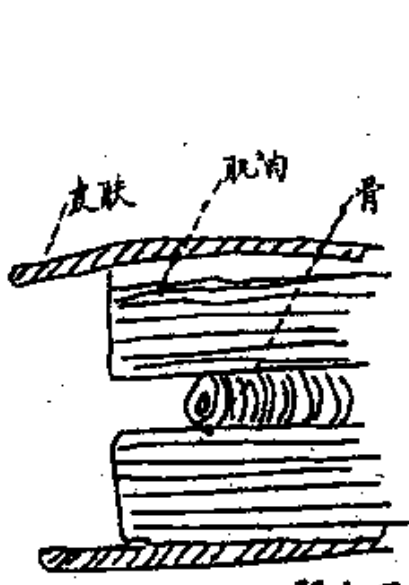
第73圖  
脚与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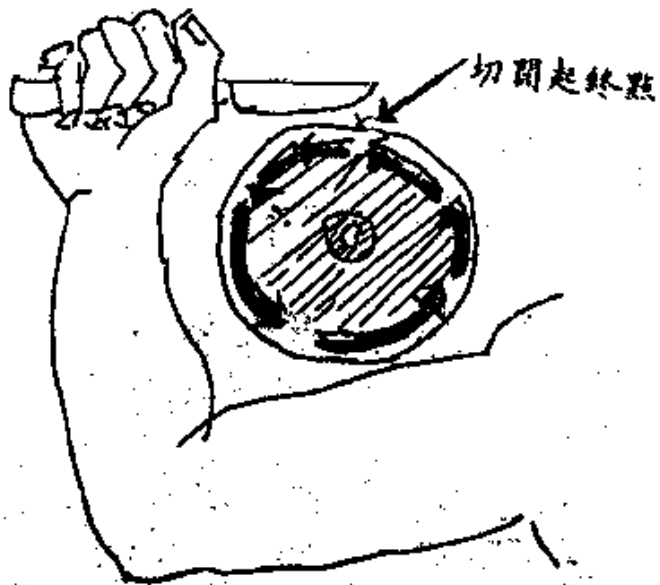
第74圖

腿之截断法

① 瓣形切開 ② 鑿形切開 ③ 環形切開 ④ 鑿形切開



第76圖 股之環形切面  
皮肤肌肉及骨之表斷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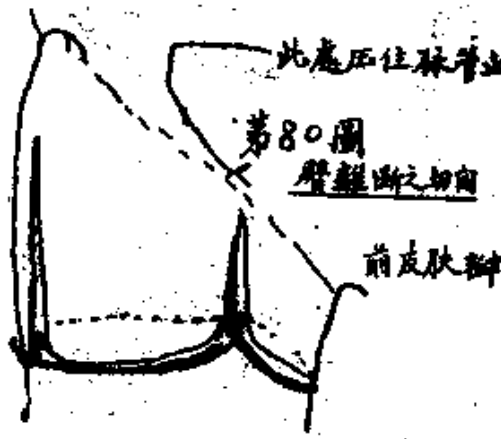
第75圖 股之環形切面持刀法  
皮肤用一刀切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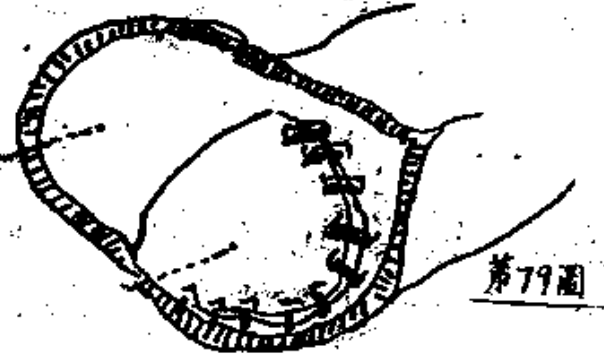
第77圖  
環形切面之  
五條縫合  
一條縫合  
一部排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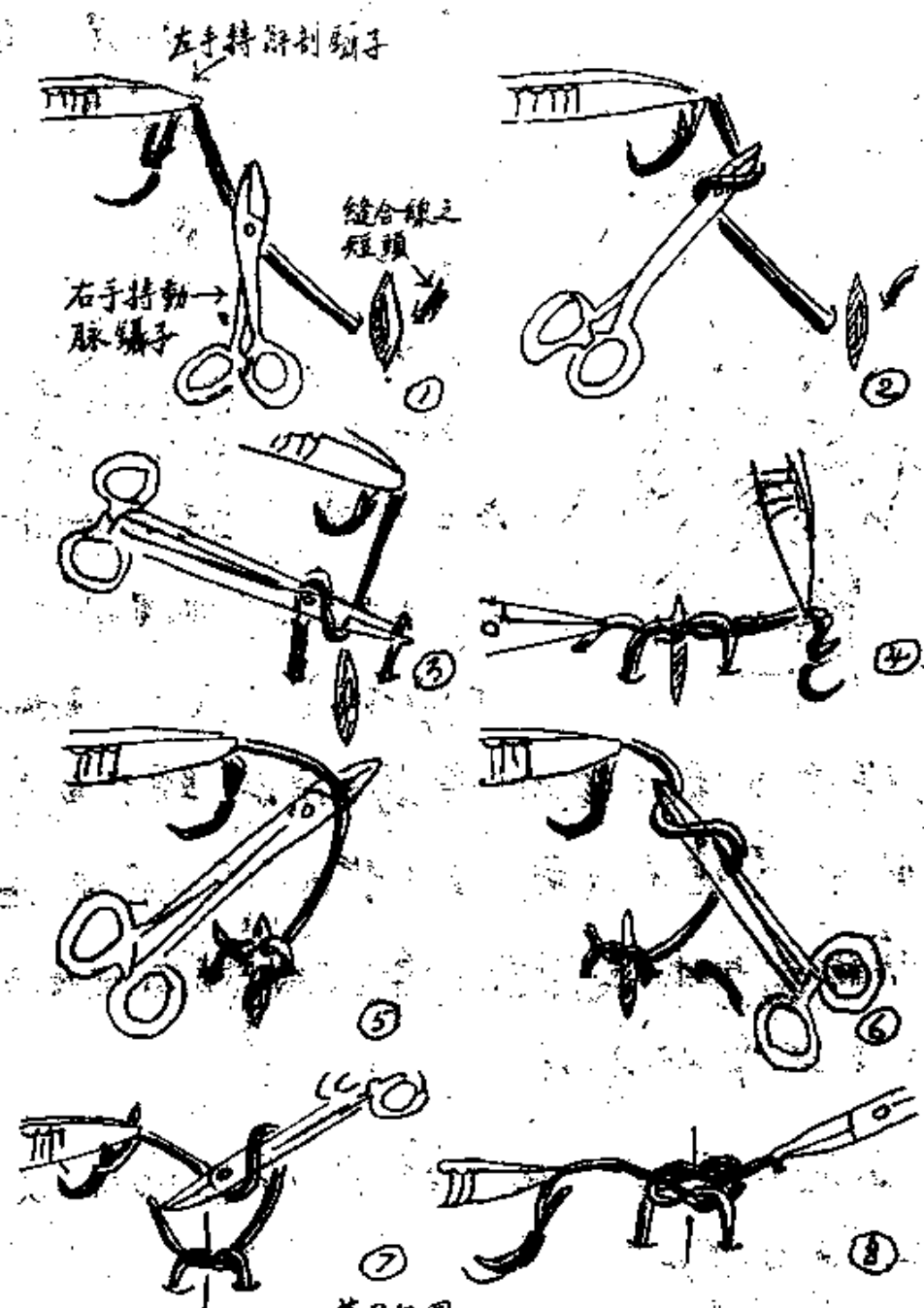
此處壓住麻管止血 第78圖 股離斷用長前辦法



第80圖  
臀離斷之切面



第79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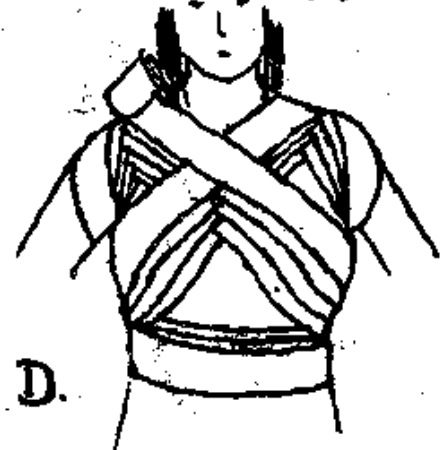


第95圖  
用两把镊子及短线头打结法(尖尖)

③ (图) 拔毒片断 (编学、妇科、眼科等)

腋窝及肩前，包背面，绕行回至患侧腋窝及腋窝作，经枕环行。

D. 旗提乳带，先捧高乳房，旋乳下环行，次至右侧下



方和埋  
右侧乳



房至左肩上，经同侧腋窝  
后方下行，至左侧乳房下，将  
左侧乳房包裹而至右侧肩

上，旋后方绕至该侧腋窝及肩前，经背面，绕  
左侧腋窝绕至肩前，经包背面，回至右侧腋窝  
反绕作走上行性，环行终，於胸骨正中及两侧  
腋下，交叉作提袋形。

五. 固定上肢的 用於鎖骨折整後欲保  
持肩關節時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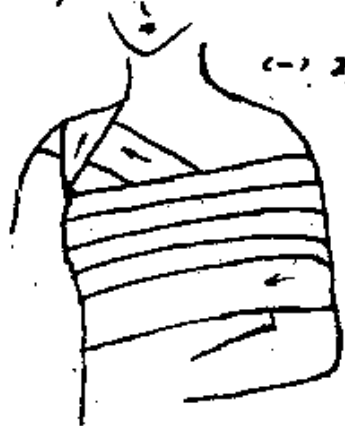
(一) 應用此類帶，共分三帶。第一帶，插置在患側  
腋窩之楔狀枕，用此類帶固定之，先供上肢外  
轉，將楔枕之基底，插入腋窩，將帶尾置於枕

或预先缠住，於健侧肩上做8字状缠绕，次於胸部的螺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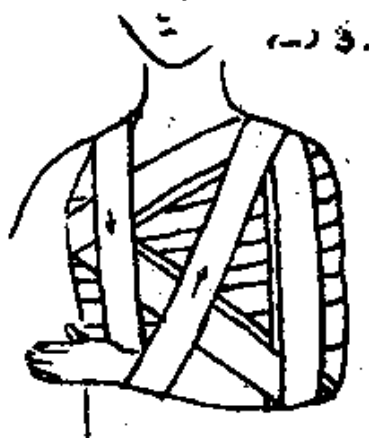
第二步，欲使患侧向外后方用力，垂下上臂，固定之。



(1) 枕上，自肩峰至肘部上方，已架螺旋带。



(2) 第三步，用以吊住前臂，先使前臂后作直角，手掌置在上腹部，将带置在健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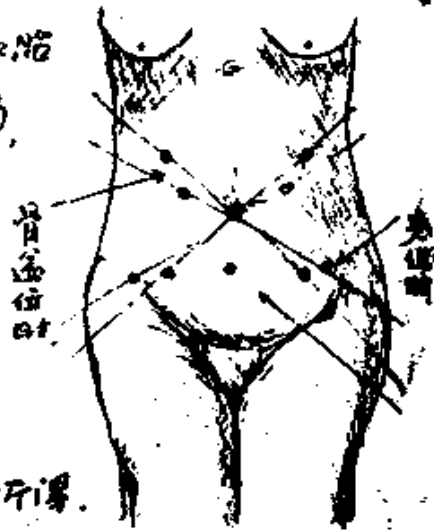
腋窝，从胸前绕至患侧，其后再绕至肘部，回至健侧腋窝，次於经背部上行至患侧肩，从其后绕至肘部，背面，回至健侧腋窝。最后从肘部经背部上行至健侧肩，再经手掌面绕在手臂，患侧患侧固定於背部。

(3) 高尔比绑带，患侧手掌置於健侧肩上，肘部置

便着灌肠，候胎气稍定，即而仰卧，听胎身律一呼吸，腰肌柔，胎心在脐部，候其注意心处，后置于下腹部，不用力，若胎父起收缩，待步经后行之。触诊妊娠子宫大骨面时，概由胎心在脐部，七个月前，只知得球感，知胎男之存在而不知男身各部。故定胎男之位置，由七个月后。胎男身体各部触上之特徵。胎男之各部区部由大部分（臀背），小部分（上下肢），以头为球形，表面平滑硬度一律得球感，从颈部之颈项部运动和运动。(1) 臀部不正球形大而硬软，因表面凹凸故球感有头着地，其躯干运动无硬小部。(2) 背部球形弯曲硬而不可推抵玩。(3) 小部分即上下肢触知小部结构状冲空而运动其位。

3. 听诊：胎心音普通一分钟一〇至一六次

音在妊娠五个月后可听得。听取胎心音在七个月前，因胎位位置变动，故心音部亦不定。但其后概如图中一定部位。即头位时在脐棘线之中央附近；在臀位时，为脐之侧方或其稍上方而为脐棘线之近长方面。横位时多在脐之下方或侧方听得。



内诊：即以示中二指由外宫道运入宫道中，而按摸子宫体，查胎位之位置如何，及骨盆状态等。妊娠初期时，以外手压入肠壁内，另一手向前探子宫体之法，曰双合诊。



但須注意行之  
否則起，起血  
血流產者。(左  
姬妹油未好  
則無行以  
之也。

附記：喉痛時，多予增  
肌呼吸，呼吸時，膈肌  
乃由前口停止呼吸，當呼吸  
運動，使膈肌緊張，使  
膈肌收縮緊張（經過肺  
起者也。膈肌收縮二起

塊(子宮口前大，正破規水而至胎兒經三起之也)之聲動力  
起第一起之噴嚏，因產婦疲勞而延至延長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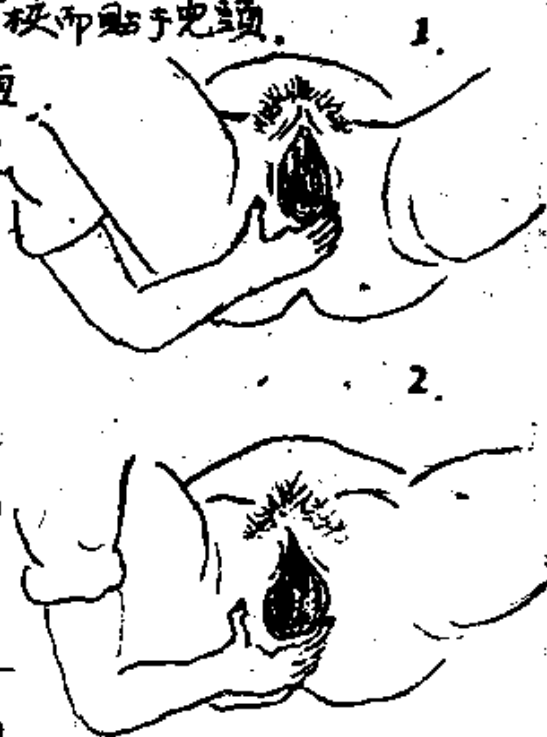
gotin, Pituiturin (或用法用 Adrenalin) 皮下注射。一時  
子宮頸前口內再注射，以幫助陣痛時效。

- 保 Birken 法...
1. 他的發藥片進入陰道，可以溶解破口。
  2. 用最好的 Chinin 加 Vaselin 潤滑，抹入子宮頸也。
  3. 用瑞府之醋酸進入陰道，廿四時足可起效。
  4. 或普通的開水加淨水亦可。

故失術之前始產比初產時略早。

丁. 實施法 - 仰臥位時保護法 命產婦仰臥，脊骨下墊高枕，下肢將股及膝關節屈曲，股角充分弛緩，俟外陰部充分充血。(圖1. 2.)，以拇指當陰唇右側，其他四指當陰唇左側，於陰唇之上，在拇指與中指之間，常見陰唇緊著，即前方陰唇緊著，指與之接觸處約1cm，以是得知陰唇之狀態。又在手掌與陰唇間，置以曾浸利噴爾水之紗布或藉脫脂棉，以防大便污染或之滑脫。(右手之位置又有以手根部者，陰唇手掌被肌肉，以相抵向尾骶骨(圖3)。) 如上以右手當陰唇部，同時左手將其指並列，由耻骨縫緣上，起直線而貼于兜頭。

會部保護法 - 在供后頸結節處，神經痛作，兜頭得產出時，可反將兜頭壓回，即于右手之小指球之部，不用充血力量，向相指之方稍施其力，壓前頭以助後頸之彎曲，左手亦可與右手共同向後方會陰壓迫後頸部，以時由此兩手之壓力，促後頸之產出。如是由後面陣痛反獲其操作，俟后頸深。



娩出，在陣痛間歇時，以左手之指注意于軟部(陰唇、尿道)



勢) 在于上方及側方。

如上所述若后頭結節

而呈現於耻骨弓下

處其腹在去足之固定

側地開口使行短呼吸。

若陣痛則向左手之指

抵持后頭(圖4)止其

向右手助之, 待胎兒頭

露出, 如是反復操作使

胎兒頭漸由全陰產出,

此時以右手協全陰輕越

腹股面而全產出。

如上所述全陰保護可使

腹股緣產出, 但須注意勿妨

礙以頭產出之操作, 又施壓兜頭亦有害。

側卧時之全陰保護 命產婦左側向上卧, 臀部近床緣, 屈兩

膝, 下腿之間插一枕, 倘若坐在產婦之背側, 以右手由腹間向全陰,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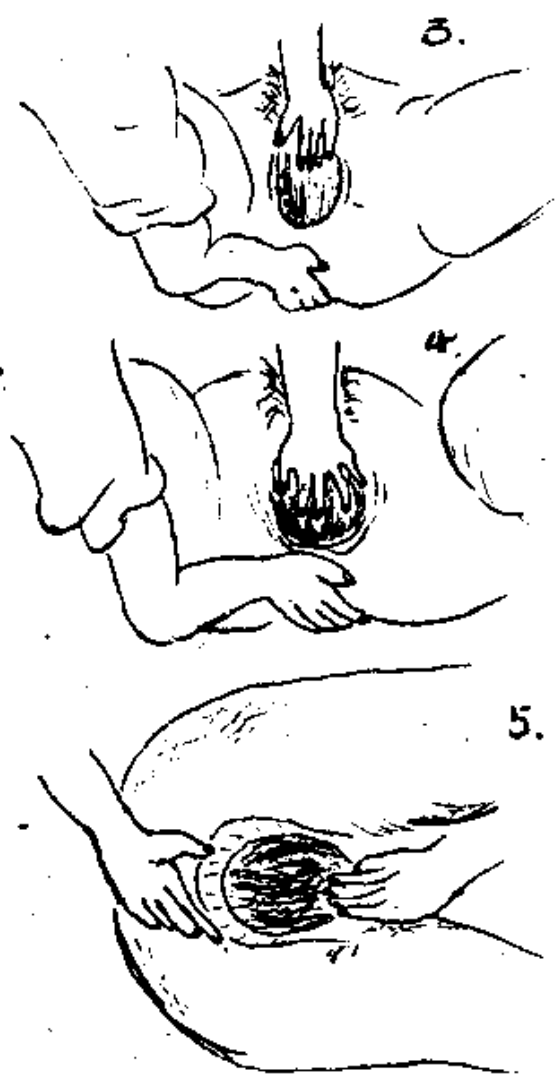
腹股間而點于兜頭(圖5), 此時之注意及方法与仰卧位同, 而全陰

則以仰卧為宜, 視其情形, 各有利弊, 普通應用仰卧且容易現全陰, 其腹

以側卧位時為弱, 故凡在業施腹壓者應側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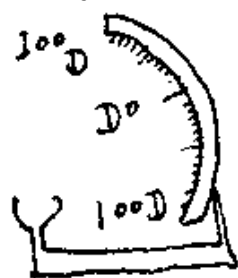
全陰之紫化泡, 全陰之前端變白而蒼白, 經方亦免全陰破裂

則引側切剖, 因切剖之裂面比破裂之裂面易癒之故也, 所謂



ter)中心点用Byram氏法,查他的中央(黄斑)为中心性  
 视野类别分。 Forster氏视野计为半径25cm之

半圆筒先使受试眼正对弓之中心安置于该器之支持器上闭  
 一眼,使他眼正向前方注视弓中央 $0^{\circ}$ 之白标,将视野标  
 由弓之一端( $100^{\circ}$ ),按弓之弧面向中央转动,定其入视野之  
 境界其度数记入视野用纸次以白标为轴,将弓面转 $45^{\circ}$   
 顺次计测上下左右及斜之方向,视野之境界完全测出。



视野  
40cm



令患者注视视野中央用视野标,从  
 100度处转动,什么时候患者能

记录D数。

正常人值

检查结果:

	上	内	下	外
白	60	60	70	100
青	50	50	60	90
赤	40	40	50	80
绿	30	30	40	70

同心性狭

窄——视野

常的视野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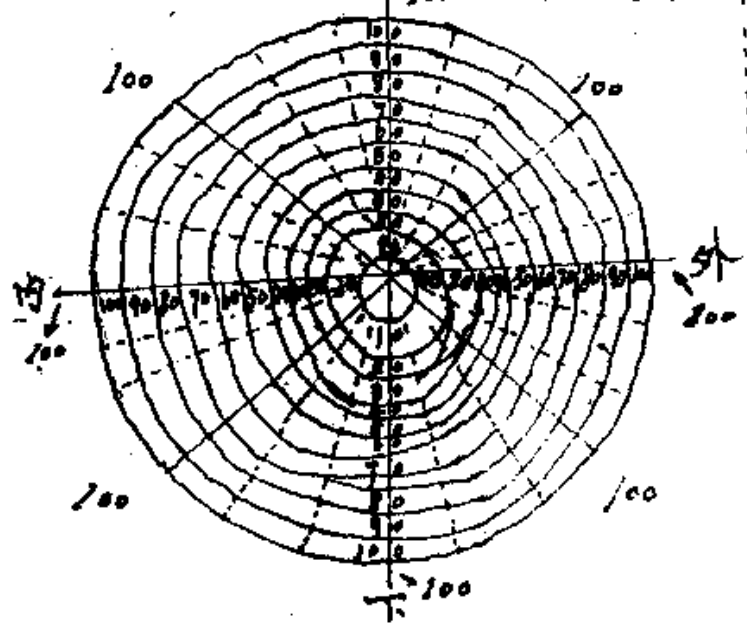
發生視野缺損者圍繞着中心部。以中心性視網膜色素變性樣

面時在左，希司特里亞者更難言。切餅狀缺損。視野一部的缺損

視網膜剝離是視網膜之脫離。臨上中間有條狀，因是第1視網

膜剝離，但常以管於下部。(檢查周圍視) Bjerrum氏法：

7. 上 100 野用紙。



使受檢者面對列有

度數之黑板距離以

為1—2cm先予

黑板上用粉筆作

目標。用一眼鏡

受檢眼注視板上之目標。檢者手執棍棒，于黑板上移動。先是到

mariotte氏盲點之境界。(註：離視野之中心部外方約15°之位置，

有圓形之黑點，其直徑約為5°，謂之mariotte氏盲點，為視神經乳

④

# 在绥远军区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发言稿

## 作者识注——

这份历史资料距今已有45年了，是保存文字最早之一。（见下原稿复印件）

是我人生逆境中一年才受到的最迟奖励。

文中所列抢救与治疗方法，在当时是最初、最迫切、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如：

脊髓管内注 Penicillin 治疗上行感染性脑膜炎；

肠粘连、肠扭转手术整复；

肠切除、肠吻合手术之成功，是当时全军区的首次成功例，是当时高水平的新技术，因而，自此例

后，算已（绥远军区后方分院）跃居“腹部外科”的新阶段，转折点。是我院全体同仁一致在译定难逃线为工学代表的重要依据。

直接输血技术，救治体弱患者，第……

我提出做好外科医生的论点，当时具有先进性，在45年之久，却仍不失有实际意义：

外科医生不是一位执刀者，而且是患者最亲密的保姆。

手术后脱掉白衣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病房慰问自己刚手术的患者，并借以督促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

必须建立无论多么危重的患者也能治好的信心。要有预见性尤其术前危险性的准确判断。

1952年12月20日在卫生部首届工学代表大会发言稿

一、关于……

……

……

……

……

……

本人自任以来，

首先，自任以来，本人首先从思想上入手，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其次，在工作中，本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第三，在作风上，本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四，在生活上，本人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搞特殊化。

第五，在廉政建设上，本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第六，在履行职责上，本人尽职尽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本人自任以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如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工作方法有待改进等。今后，我将进一步加强学习，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以上是我的述职报告，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述职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将这个一九五〇  
 年奖给我的小本子，  
 用到提高工作上去。  
 来纪念跃进英雄区渐  
 生部首届五好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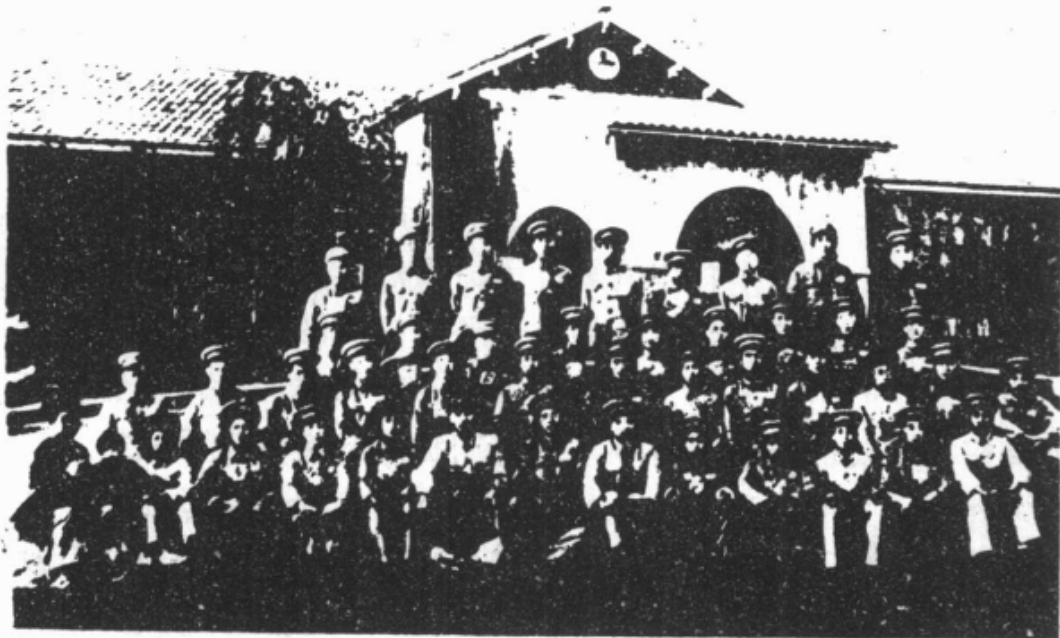
倪寿 1954.1  
 旅京

只有与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  
 知识青年。——刘 宁



月 日

1950年10月10日 卫生部白区工学代表会全体代表合影



1954. —

不怕人家说有缺點，勇於改正缺點



闹鬼——这是 1947 年冬末，我院驻防五台为配合地方“土改”由金文瑞我二人编的自演小剧原型

### 一、王殿臣夫妇怀恨张黑

滹阳村是五台山下一个中等大的乡村，1947 年冬末，天气虽然很冷，但扭秧歌的、演戏的……非常哄火庆祝自己的土改胜利，并坚决的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然王殿臣和与他年龄差一半多的小老婆，却在家中漫骂着共产党贫农团。

王殿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子，颈短、秃头、大脚掌、小屁股，从背后看象是一个大肚蛤蟆，还衬托着两道又宽又浓的眉毛。他在幼年时与他父亲常在各大寺院修塑佛象，后来由于他吹牛拍马压榨农民的伎俩，得到了各掌印法师的赏识，而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二庄主’了，他从山上各寺租上地，经过他的手又转租与农民，根本是不劳而获，方圆二三十里地，一听到“王殿臣”三字，无不咬牙切齿。

他小老婆到还俊俏，比王殿臣的女儿还小两岁，但已与王殿臣过了十来年了，处处与王殿臣一个鼻孔出气。

那年十月，农民报仇的日子到了，斗争了王殿臣……最后禁闭起来，贫农团对他的处理是扫地出门。他的小老婆那时还讨过几天饭吃，讨饭都无人给她，农民们讽刺着七言八语：“寻个大家主一辈子不愁吃穿，不是以前了吧”！“你家的干水我们都喝不上；现在，活该”。“忘本的东西”……只有一个据说是虔诚修善的巫婆——郭大脚，背着大家的眼睛，偷偷摸摸给她点吃。

王殿臣的四合大院，正房东西厢房都已分给了贫农张黑，只



给他留在一个南屋住。而王殿臣已由政府放回令其在劳动中改造，几时转变几时给他改成分。他的小老婆也结束了短期乞丐的生活，二人相会痛哭一场，王殿臣住在新居，四顾无人说：“他妈！你跟着我受治了。我在九泉之下不能忘掉你的忠贞，迟早要报仇，他们长不了”。“别说那些了，过去咱们将人都得罪了，讨饭都无人给，特别是黑子，不但不给，还说了好些风凉话，这口气实在难咽啊”！妻答。王殿臣皱着两道浓眉说：“咱们迟早有出头日子，现在是狮子脱毛猴尔笑，老虎下山不如猫，有那么一天，让张黑这个贫农团长还有那帮东西，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 二、张黑夫妇

张黑今年 38 岁，身强力壮，解放后满面红光起来，两唇上留下了两撇短短的八字小胡，他从小种和尚的地，受王殿臣气，劳动一年还不够王殿臣的，就在 1945 年这里解放那年，还再三央求王殿臣留下个斗八升，王说：“少一粒也不行：一家五口，前年因灾荒母亲连饿带冻的死了。现在只留下了一个年岁相当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英儿，今年九岁，小花今年五岁。

自解放后，张黑（又名黑子）精神焕发，早就听说阜平那边减租减息，农民一般不受地主的气，地主欺侮不行，由政府作主。心想，咱这里何时能够那样，那怕能让穷人享上一天福，死了也甘心，他回忆起了老娘死的惨景，连送终衣服也没有。棺材更别说了，连一文钱的盐都买不起，那还能买棺材呢！就那样用炕上铺的唯一破席卷上尸首，上露头，下露脚的由乡亲们帮忙埋葬了。两个孩子从小没有享过起码的人的生活滋味。老婆照例，只要做饭，做衣服看管孩子就行了，但在我家却什么也得干，结果连王殿臣的还不够，他家始终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赤贫人。想到这里，不禁涕零。

解放后，立即成立武装，区武委会让他当队长，领导民兵。二年来在区和区政委的教育下，知道了很多道理，眼光也看的远了，由于他工作积极坚决，1946年入了党，他宣誓：“坚决跟共产党走，为穷人过幸福日子奋斗到底”。

今年冬天他领导农民推翻了二庄主王殿臣，他们联合起来赶跑了科伦扎布法师。自此，五台山上山下天下太平，成了穷人当家的天下了。群众公认他能为穷人办事，大家推选他为贫农团主席，一提起张黑，穷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富人无不心战胆惊。连张黑自己也笑，看看过去的年月，谁能知道一翻过儿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 三、张黑搬家

贫农团开了一个会，决议让张黑搬到王殿臣的正房去，东西厢房也归他所有，委员们都说黑子受他的气最多，所以按理也该让他去。张黑原来推辞，说王殿臣的房子最好，让我去是不合适的，后来在委员们的再三说服下，他表示同意说：“好吧！我去住，这就叫作穷人翻身了”。大家大笑一阵高兴极了。

一位光棍老大爷拍了一下张黑的肩膀说：“孩子，去到可以，可王殿臣鬼计多端，要多加小心，时时注意，你忘记他的女婿宋鼎还在太原吗？王殿臣不会死心的呀！千万别听他的甜言蜜语，狗嘴里决不会吐出象牙来的……。”谆谆嘱咐了好久，黑子一一答应说：“大爷！你放心，无论他们什么手段，我张黑不会上钩，说句迷信的话，下辈子脱生个猪也不能和他在一个槽子吃食的”。

就在这天，黑子全家要搬到王殿臣的正房，一进门王殿臣要帮张黑搬东西，他冷笑着说：“贤侄，这简直太好了，咱们两家住在一起太好了……。”黑子正要说：“好什么”？王殿臣看到张黑面带怒容窘迫的说：“我是说你来了，谁还敢随便欺侮我呢！斗争时，没有你，我早完……”。张黑未等他说完，将一个破凳

子从肩上一扔，愤怒的说，“什么东西！还想用什么巧言花语讨我好不成，王殿臣！现在迟了30多年了”稍停黑子又警告他说：你要规规矩矩好好守法，如不老实，要知我们穷人的厉害“！王殿臣低头弯腰只是说“是是是，岂敢……”讨了个没趣，蹑蹑地躲到屋里去，再也不出来帮忙了。

乡亲们大人小孩也帮助张黑搬家，不一会新居已搬好了。张黑的妻子高兴极了，她说：“哟！这房子这么宽绰，多明快呀！”又开玩笑的问黑子说：“他爹，你可注意住上可别烧曝坏了啊”。停了许久似有所思，郑重的说：“没有共产党怎能有今日，自今日起每逢初一、十五我要跟毛主席烧香”……英儿和小花东摸西看，看看那儿都是新鲜的，然黑子妻子叨唠不休。黑子实在忍不住了，气愤的说：“你别叨唠好不好？你过去也迷信，神究竟怎样呢？”“不怎样还是受罪，不我说要跟毛主席烧香啊”。妻答。“烧香，烧香毛主席也不稀罕。你今后只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毛主席比你给他烧香还高兴呢，还是别信那一套了吧”。

黑子媳妇见他生气了，再不说下去了。

张黑还是几乎每日出去开会，今日夜晚一踏进新居大门，心想：“三年前，谁敢登人家门边，有人说谁敢进来，如今是我的了”。进门即见南屋幽幽的灯光突然吹灭，黑子想起了大爷的话——王殿臣鬼计多端，小心，宋鼎……。听了听没动静，四顾看不出有什么，就到正房睡觉。

#### 四、宋鼎

——王殿臣的女婿，向来在闫锡山下当飞鹰队的头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由于他一贯是干武装特务勾当，一次与八路军的战斗失利以后，化了装暗暗逃回渡阳。

经打听郭大脚后，才知道岳父王殿臣住在南屋，而正房是他们所谓的穷鬼张黑住着，当夜他越墙悄悄溜入王殿臣家。王殿臣

结结巴巴的说：“黑子，我完全守法呀，劳动中改造，定做……新……人。”小老婆说：“你们叫怎着就怎着还不行吗”？宋鼎一听完全是自家人，尤其可怜那个叫怎着就怎着的小老婆，虽是母婿相称，那些年代也曾背着岳父与小老婆是“一半情人”。

宋鼎悄悄说：“爹！二妈！我是宋鼎”。王殿臣没敢点灯说：“孩子上屋就是穷鬼黑子住着，千万别让他听见。”三人谋划了一回，愁得王殿臣和小老婆没办法掩蔽他，而宋鼎说：“无妨，住在这里才是最保险的，那帮穷小子不会怀疑”。将他白天藏在马槽底下，夜间出来放放风，不几日宋鼎根据这里的情况向王殿臣献计，第一……；第二……；并说：“我不给二老报仇，死不为人”。王殿臣心中暗喜，还是我这女婿是有出息的。

## 五、造谣

王殿臣次日即接着特务宋鼎的计策行事，一见黑子不在家了，就在院里踱来踱去叹声不绝。起初黑子妻子不理睬他，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后来王殿臣仍呢呢喃喃似在祷告，其中似听到，“王母娘娘饶了他们吧！这事与他们无干，她个妇道人家”……。张黑妻子向来迷信，当越听越是说自己时，却只好上前追问：“你说什么”？“你刚才……”。王殿臣假惺惺的说：“不瞒你说呀。谁不知你是一个修善人呢，可这话让黑子知道他又不信，昨天晚上我明明醒着，听见沙沙沙的一阵风到窗前说：‘我就是王母娘娘，看不惯上屋黑子的作为，他的两个孩子将受戒数！’我将要向老人家为你求情，却什么也没有了。你是知道金阁寺娘娘的灵感的。唉唉戒数”。

黑子妻默默无语，回自屋中暗自思量，告诉黑子是一顿骂，不告诉害怕极了，英儿、小花什么容易修好长的这么大了，忽然想起来，转身外出。王殿臣见他出去了，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女婿这一计是否好使。

## 六、破邪

黑子妻很是信仰巫婆郭大脚，一直奔向他家求救，郭大脚说：“无妨，或许破破也就好了”，但她接着又说：“不行，你家男人可不信这，若让他知道可不得了”。黑子妻好久静默无语，最后说：“小花他爹从小不信神，不过他总是每天快睡时才回家吃晚饭，他不会早回来的”。

郭大脚从小设着香案，每年六月五台山庙，寺寺都到，只有当解放后一天天的不吃香了，分胜利果实时，黑子还告诉她：“今后可不敢再用什么跳神治病拴娃娃……那一套把戏哄人了，如果你仍不务正业，不参加劳动要按地主处理”。如今又到他家破邪，万一碰上可就糟了，但秉性难移，当听到黑子妻说：“不会早回来的”他想这是一个空子，催着黑子妻子要走即快走，阿弥陀佛，千万黑子可别回来。

拿着鼓子来到她家，看看屋里井井有序干干净净，正墙无神象，只有毛主席，大脚不耐烦的说：“在院里吧，你家连个神象也没有，不怨你家孩子遭戒数呢”。摆好一点供品，点着三柱香，大脚不一会合上眼睛在打呵欠“啊”！黑子妻子忙问：“这是那驾大仙来临”？大脚手持鼓子接着巫婆们向来跳神的步伐——剪子股的形式跳起来，唱着惯用的佛词：

“我是那五台山的雷震子，我是那金阁寺的老神灵；  
这孩子本是那童儿下生，不料想他爹不信神遭祸坑；  
穷的我的桌子三条腿，桌子上供献的是泥烧饼；  
要想着你家玩童免灾星，初一那个十五挂红灯……”

黑子媳妇——承诺，王殿臣在窗眼里看着，乐的合不上嘴。心想女婿真是有才，谁想到黑子不知为什么突然回来了。他媳妇吓的钻到屋里去了，大脚的神立即也吓跑了，黑子狠狠教训大脚一回：“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这是欺榨民财，造谣惑众，

再不改可要按地主……”。大脚没有听完溜着跑了。王殿臣大大扫兴，心想怎么就赶的这样巧。

张黑自然盘问了老婆好久，老婆不敢吐露真情，却正中宋鼎的第二个鬼计。

## 七、闹鬼

王殿臣没了主意，夜间又与宋鼎商议，宋鼎指示他仍按前计行事，王殿臣前两天已刻下模子，用破衣烂裳糊了一个青脸红画锯齿獠牙的鬼脸，白天看到也令人懵然。张黑照例每天快睡觉时回家吃饭，半夜左右回来睡觉。

这天半夜张黑大背着六五枪回来，忽听得“唧”一声，突然将也吓了一跳，又突然从东南角显出一个可怕的东西，他倒退了几步，只喊“好怕、好怕、谁”？那个东西仍然摇摇摆摆边摇边叫的移向他来。本来一个大胆的张黑这时却一时着急，连枪也摘不下来了，他边躲边喊“好怕好怕”，只见那东西头大如柳斗散披着头发，未及详看，赶快闭上眼睛摸枪，枪摘下来了，哗啦……一声，那个东西知道坏了，这是在拉枪栓，连忙唧唧几声向东南角遁去，而张黑一板枪机“乓”的一声，那个东西已不见了。

回屋后妻子惊慌失措，张黑一面擦着头上的冷汗，也未及与妻详谈。就想起了大爷的话，院内如此乱，却王殿臣屋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鬼神，就肯定此事定与王殿臣有关，怒火燃起，拿着枪又出去了。

## 八、一网打尽

王殿臣听到张黑又出去了，心中不安，心想事情可能要糟，很快通知宋鼎让他逃跑，宋鼎来到他屋告辞，正要走“嘭嘭嘭，快开门”！吓的宋鼎及他一家变颜失色，宋鼎一时着急，钻到小

老婆的被窝里躲避，外边仍敲门和喊：“王殿臣装什么孙子，快开门”！王殿臣老奸巨滑，故意拖拉时间，张黑喊：“包围起来，砸”！王殿臣一听说砸，便假披着衣服赶快来应付张黑。

将门一开便说：“黑子真是忠心耿耿的干部，披星戴月……”张黑大喊别装孙子，捆起他来，民兵立即将王殿臣五花大绑起来，他们点上灯进屋搜查，将柜一开发现了那个披头散发的鬼脸，张黑拿着向王殿臣说：“狗东西，你还不死心，三天以后枪毙你。”王殿臣急忙跪下求饶。而张黑并不理他，仍去搜查，距小老婆很近了，小老婆娇声的说：“黑子，你离我远远的，俺可是脱的光光的”。张黑一时气愤说：“你当我不敢撂你的被子？”宋鼎知道事情已糟，持手枪“呯”

的一枪无打住张黑跳下来就企图逃跑，民兵们七手八脚将宋鼎下了枪捆了起来，张黑大笑说：“原来是宋鼎小子，我们正找不到你哩。你怎么钻到你小丈母娘的被窝里去了”。他又喊小老婆，快滚起来，“举起手来”小老婆只好从命，三个坏蛋一起被张黑等送到区里去了。

(文成于1957年暑期文学作业题，是集宁业余文化学校让按《小二黑结婚》体裁写的一篇小说)

